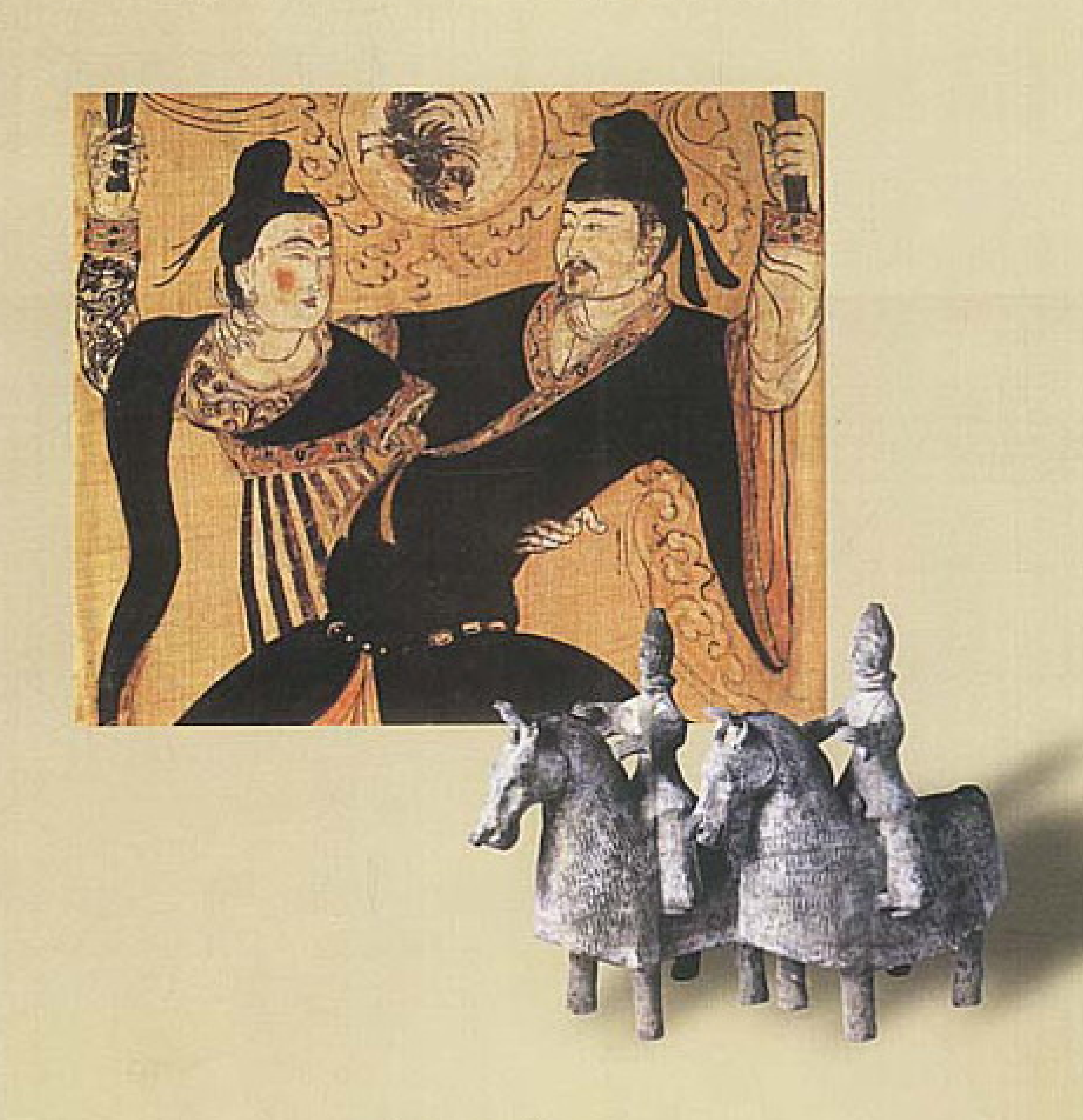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剑桥插图中国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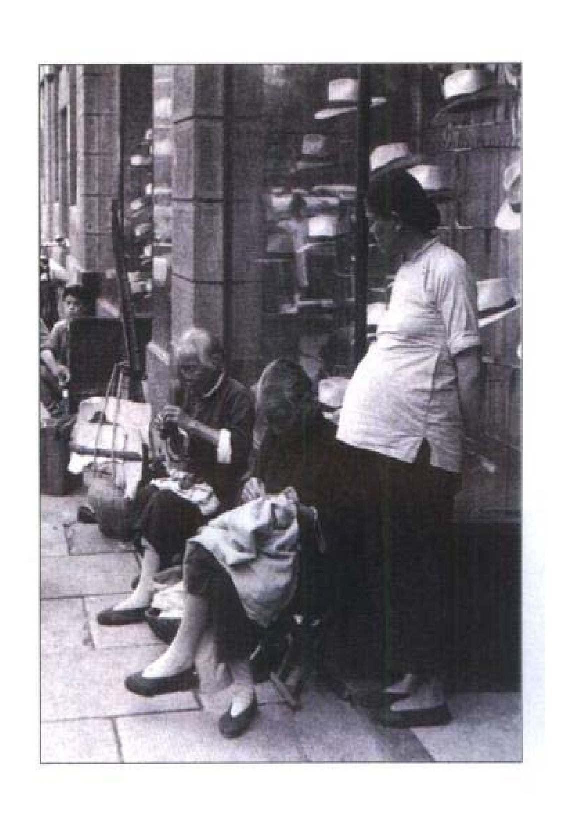
〔美〕 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赵世瑜　赵世玲　张宏艳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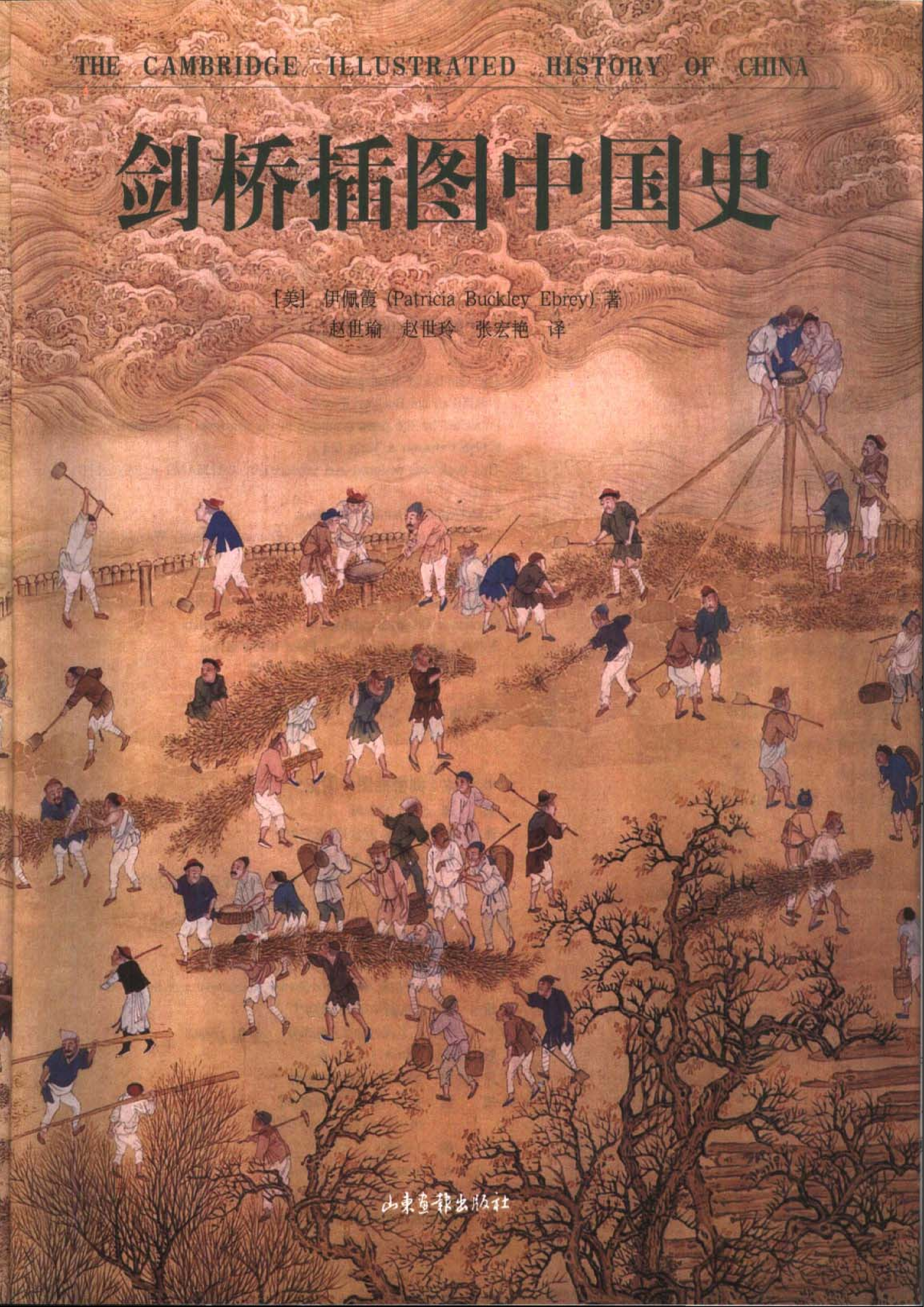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剑桥插图中国史



山东画报出版社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CHINA

剑桥插图中国史

[美] 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 著
赵世瑜 赵世玲 张宏艳 译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剑桥插图中国史／（美）伊佩霞　著；赵世瑜　等译．
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3

ISBN 7-80603-493-5

Ⅰ.剑…　Ⅱ.①伊…②赵…　Ⅲ.中国－历史

Ⅳ.K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5869号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roy of China
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
Published by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This book was designed and produced by CALMANN & KING LTD, london
Project editor: Damian Thompson
Picture research: Merilyn Thorold, Zhang Shuicheng, Wanglu, Qiu xi
Layout: Andrew Shoolbred
Cartography by Harelines, Charlbury, Oxford
A catalogue record for this book is available from the British Library
Library of Congress cataloguing in publication data
本书据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年版译出
中文版权通过上海市版权代理公司帮助获得

山东省版权登记 图字：15-1998-007号

书　　名　**剑桥插图中国史**
著　　者　〔美〕伊佩霞
译　　者　赵世瑜 赵世玲 张宏艳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 编 室 (0531)2060055-5420
发 行 部 (0531)2052472 2906847(传真)
网　址　http://www.sd-pictorial.com.cn
http://www.sdhbs.com.cn
电子信箱　webmaster@www.sd-pictorial.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厂址:临沂市解放路76号　邮编：276002)
版　　次　2001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3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16开（889×1194毫米）
19印张 217幅图 292千字
印　　数　1-5000
I S B N　7-80603-493-5/K·115
定　　价　8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中译本序言

最初让我写作本书是为出版一套世界各国的图说历史，面对的是英美的一般读者。它必须很简明，要避免出现太多读者不熟悉的名词和术语，尽可能好地利用图片资料。尽管我以前作为研究唐宋史的专家写过学术性的著作，也为大学里学习中国史的学生编过资料，但我此前从未试图为普通读者撰写关于中国的书。为了让那些随时都会合上书的成年读者兴趣盎然，我试图着重勾画一两个有关中国的最紧要的问题：它的巨大和历史连续性。这十多亿人口——比东欧、西欧和北美人口的总和还多——逐渐认为自己拥有相同的文化，享有认同感，这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世界其它地方的人那样，因在方言、宗教或生活方式上的差异而分裂成一个个相互猜忌的群体？在本书中，我试图表明，有几个因素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其中包括中国的地理位置、它的形声书写系统，以及强大统一政权的长期经验。以比较的视野来看，中国历史的长期性也是很突出的。

多年来，中国史学家集中解释了王朝的兴衰，但在世界上多数其它地方却不是王朝而是整个文明此兴彼衰。人们发现，现代史家可以从当代西方国家的某些思想或制度，追溯到埃及人、苏美尔人、希腊人、罗马人、马雅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但没有哪一个现代西方国家是这些文明的直系子孙。人口随着连续不断的移民和入侵浪潮而变化，新的宗教则创造了与过去一刀两断的意识。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类型的例外？难道中国从未遭受过同样的毁灭性的打击吗？新民族的涌入从未有这样大的规模？新的思想或宗教对于人们的认同感从未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或是中国人在别的民族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选择留心连续性？尽管我不会离开中国历史经验的特殊性质，但在本书中，我更强调中国文化，在其他文化注意非连续性的地方注意连续性的趋势。

在写作本书时，我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对付这些问题而且不会非要有个所以然不可。因为我相信历史充满了偶然性。我已试图表明在各个时期，在创造我们称之为中国的这个社会的进程中，中国人如何利用他们继承的遗产，以及他们在拼命发现意义与和平、强加他们的意愿或与对手竞争、幸存和发达、关怀其家庭及履行其责任的时候，如何提出新思想、进行新实践。依我看，中国的今天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有活力的历史之上，它总是具有潜力，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发展，这意味着每一个阶段都是故事的精华部分。我希望，这个译本的中国读者会发现我作为一个外人的兴趣所在。尽管研究中国史的西方学者利用的史料与中国史学家的相同，但他们提出的问题却迥然不同。我期望着能从中国读者对我的努力的反应中获得教益。

写在前面

中国历史常常被看作是西方历史的镜子。在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汉（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中国统一之后，后来的统治者被北方游牧民族和外来宗教的传人颠覆了，这颇类似于罗马。但中国与罗马不同的是，它再度兴起，在唐朝（618年－906年）统治下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世界性的大帝国。汉朝的许多体制得到了恢复，自汉末以来就很强大的门阀政治依然保持着影响，但是它却认可一种具有真正权力的世界性君主。唐代中国的世族门阀也不像欧洲的封建领主，他们需要朝廷授予他们的爵位和名号，这会给他们带来保护其大地产的特权。

自唐至宋（960年－1279年）皇权得到进一步的集中，门阀贵族变为一种社会—科层制精英，而成熟的考试制度越来越多地造就了他们。那些致仕之后退隐乡里的官员常常被称为中国的士绅，其思想本质上是与帝制政府一体的。随着明清时期家族组织的日益扩展，儒家的社会伦理逐渐被认定为中国政府所依赖的准则。

中国史是一个具有内在吸引力的对象，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而有了更强的魅力。例如，中国尤其是从元朝（1260年－1368年）以来，对西部和西北部的穆斯林世界的态度如何？从宋代直到20世纪，尽管有了长途贸易和意义重大的城市化过程，却不存在政治上活跃的商人阶级，我们从中又能获得什么教益？

伊佩霞是研究从汉到宋中国家庭与家族史的杰出学者，曾经细致地分析了包括男性和女性在内的社会——科层制精英们的文化社会观，也分析了由宋朝帝王和哲学家们制订的冠、婚、丧礼。她是一部被广泛使用的资料书——《中国文明与社会》的编者，在此书中，她又探讨了研究对象从明清直至20世纪的发展。她以一种平实、凝练的文体，将其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渊博知识运用于研究中国的现实，因为她确信历史的连续性是不可避免的。

本书大量的图片展示了艰苦探索的成果；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陶器到食品）和著名作家生平的形象也为本书增光添彩。但是，作者对中国悠久历史仔细而清晰的概述，才是最引人注目的。我相信，本书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经典。

刘广京

序 言

首次访问中国的西方人可能会发现大量好奇、惊讶、迷惑、刺激乃至沮丧的事情。中国人的人口总数就让人大吃一惊：有10亿多汉族人——比东欧、西欧、北美的人口总数还多。这么多人怎么能把自己视为共享同一种的文化的呢？为什么语言、宗教或生活方式的差异没有使他们像世界上其他民族那样分裂成相互猜忌的群体呢？一个单一的政府是怎么统治如此众多的人口的？

除了被其人口吓了一跳之外，访问者也会对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感到好奇。男人们女人们在农田里耕作，在市场上买卖，在公园里爱抚着他们的孩子，在餐厅里品尝着美餐：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上个世纪的混乱是如何影响他们和他们的家庭的？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是如何思考的？

中国的乡村也可能会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讲中国话的人定居的地区），可以用来种庄稼的土地被看得太珍贵了，以至不能作为放牧之类非生产性用途而被浪费。甚至那些可以提供木材和劈柴的山林也经常被开辟成梯田来种庄稼。为什么中国人把他们的土地变成了一个大花园？在中国的农业技术和中国的社会组织形式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对于一个具有如此悠久历史的国家来说，中国的城市空间也有着意想不到的面貌。在中国的城市中，当人们伫立在实实在在的名将贤相的塑像面前，历史并没有悄然而至，人们也无法找到曾发生过许多历史事件的古老的房屋、庙宇和宫殿。甚至像西安、洛阳、南京、北京这样的古都，都缺乏实在可见的纪念物，而这些却可以在与其类似的罗马、雅典、伦敦或巴黎随处可见。难道中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英雄人物，抑或中国人在以另一种方式尊崇这些英雄？的确，我们可以在博物馆中发现古老中国的遗迹，但是这些人工制品向它们自己提出了质疑。古代的杰作——青铜礼器、山水画、书法、瓷器——似乎常常对人们眼里的当代中国的诸多事情沉闷无声地进行抗议，提出了使人苦恼的问题：中国文化的鼎盛期已经过去了吗？今昔之间的文化联系难道变得如此弱小，以至二者可以被视为不同的文化？那些问这些问题的人，可能也正好开始考虑问这些问题是否公正：我是不是按照西方的而不是中国的审美标准来评价中国文化的美学成就？我是不是在把中国历史上的精英文化与今天的大众文化相比较？本书正是为那些愿意思考这类问题的人所写。

中国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复杂的社会，它经历了数千年的形成过程，不理解它的过去就不会明白它的现在。与西方那种把中国视为静止不变的、几乎是没有历史的陈旧观念相比，中国如何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大国的故事更充满了戏剧性。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都利用了他们所继承的遗产，但是他们在创造这个我们称之为“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在他们奋力发现意义和秩序、实现他们的愿望或与敌人抗争、生存和繁荣、照料他们的家庭和履行他们的责任过程中，他们也提出了新思想，做出了新实践。因此现实植根于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动态的历史之中，而历史又以某些看上去不明显的方式继续发挥着它的潜力。这些都意味

着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都为这整个的中国故事提供了实质性内容。

人们可以写一部“大中国”的通史，这个“大中国”是东亚的一个区，中国在其中起了支配性的作用，而这个区的大部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疆土。但这里我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多少小一些的工作：中国文明是一个不局限于明确的边界之中却又与中国本土具有松散联系的文明。当邻居们将其统治施于中国之时，我的参照之点就是这种遭遇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影响，而不是其他什么别的。尽管我已缩小了我给予“中国”的含义，但我并没有把它缩小到中国的政府或中国的受过教育的精英。我关注的重点在于中国人及其创造的文化。

伊佩霞

致 谢

本书的大多数思想都得自他人。我在将近30年的研究中国历史的过程中学到的一切，都对本书的形式和内容产生了影响。而且，在我的书桌干干净净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写；而在试着从记忆里提取我所知道的有关中国历史进程的东西时，书桌上却总是堆满了书和文章。我重读了许多记忆中那些有力的和有刺激性的东西，我查阅了——有时甚至是全神贯注于多年来我所购买的、但在此前实际上没时间读的书籍。我引用的许多书被列入了“建议进一步阅读”的书单中，但这个书单决没有偿尽我的知识债，因为我也依赖了一些并非为一般读者所写的专业性研究成果。我希望那些看到我采用他们的学术成果的作者会感到高兴——因为我为他们的证据和论点所折服，而不会因为他们没有因此得到报酬而不悦。当然，我欠他们的真是太多了。

写作此书的部分愉悦来自于为寻找理想的图片而翻阅的大量绝妙的艺术书和考古书。在试图减少我选择的东西时，我把初步挑选的拿给别的汉学家去看，并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建议。应该特别感谢吴虹、艾伦·梁、约瑟夫·迈克德莫特和杰西卡·罗森的建议，他们建议颇丰。我同样感谢那些慷慨地阅读和评论了本书一章或几章的同行，他们是罗杰·阿美斯、阿兰·鲍姆勒尔、蔡宗琪、周凯文、约翰·达代斯、彼得·格里高利、爱弥丽·希尔和戴维·凯特雷。在此书的架构方面，我要感谢得到伊利诺伊大学科研处资助的三位研究生助研。姚平帮助整理图片，凯西·巴托斯和萨曼撒·布拉姆两人帮助准备参考资料和处理相关的杂务。最后我也感谢刘广京教授，他作为顾问编辑阅读了全部手稿，并且为本书撰写了《写在前面》。

我还要将此书献给两位中国史学者易劳逸和霍华德·威希勒两位先生，他们是以前我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写作此书使我更难和他们见上一面，但我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会常常停下来想想他们是怎样处理某个问题的。[①]

① 以上译名除刘广京、易劳逸以外全系音译。——译者注

在今天的世界上，有很多而且是越来越多的人自视为中国人，他们的数量比欧洲和北美居民的总和还要多。作为一个国家、一类文化，中国何以发展繁衍得如此之大？它为什么没有像世界上其他许多帝国，如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那样土崩瓦解？它的单一专制的政府为什么能够而且又是如何统治如此众多的国民的？

《剑桥插图中国史》探讨了中华文明形成的诸多基本问题，涵盖了中国历史上的艺术、文化、经济、社会、对妇女的态度、对外政策、移民以及政治等方方面面。尤其侧重考察了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及其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为了避免外国学者阐释中国历史的局限性，作者尽可能地参考了中国各界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发展走向的阐释。

对于中国这一独特文明，本书既有宏观上的综合概述，又有微观上的如对它的历史连续性、断裂带所做的具体剖析。这是一本西方人了解中国历史及其社会文化的必读图书。



作者简介

伊佩霞 (Patricia Buckley Ebrey)，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在东亚研究领域，她著述颇丰。著有《中华文明史资料》、《中国唐代和宋代的宗教与社会》等著作，其中《屋里人：中国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于1995年获得约瑟夫·P·利文森奖。

封面图片介绍

伏羲与女娲（中国神话中的人类始祖）

唐朝横幅绘画。复制于《中国美术全集》绘画卷之二，第8页。经版权所有者剑桥大学图书馆授权使用。

四封文字由曲守臣、王铁军译

目录

第一章 中国文明的起源：从新石器时代到西周（公元前771年以前）

大多数民族都有关于他们自身起源的神话，中国人也不例外。在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有学问的中国人用一套“伟人”理论来说明他们的文明是如何发展的。中国人不像其他民族那样通常把上帝作为他们的造物主或祖先，而是把那些使中国人一步步由原始人变为高度文明人的发明创造，归功于一个个光芒夺目的超人。伏羲意即牛的驯化者，他驯化了动物，创造了家庭。神农意即具有神性的农民，他发明了犁和锄。黄帝即黄色的帝王，发明了弓箭、船只、马车、陶器、文字以及丝绸。他还与其他部落进行了一场大战，为他的人民夺取了黄河流域的大平原。在中国的早期历史上，他被列为“五帝”之首。五帝之中的后两位是尧和舜①。尧据说制订了历法和礼仪，他没有把权力传给他那没名望的亲生儿子，而选了舜做继承人。舜是一个贫苦的农民，他全心全意地服侍他的瞎眼父亲和邪恶的继母，这说明了他的孝。舜不仅成为尧之后的统治者，而且还和尧的两个女儿结了婚。但无论他们的品德是多么高尚，尧和舜却无法制服洪水，于是舜任命了一位官员——禹去处理此事。在此后的十多年里，禹穿越土地、疏通河道，把洪水变成了华北的河流。禹治水是如此专心，以至他几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停一下去看望自己的妻儿。舜指定禹为他的继承人。禹把统治区域划分为九州，铸了九鼎作为各州的象征。禹死后，人们无视他指定的继承人而拥护他的儿子来领导他们，开了世袭王朝统治的先河。这样，禹和他的儿子便成为夏王朝最先的两个王②。夏朝的统治延续了14代。到夏桀这个暴君被他的一个下属废黜时，夏朝被推翻，篡权者建立了他自己的王朝——商。商朝的统治延续了30代，直至一个荒淫无道、不听劝谏的王失去他的贵族和人民的支持，而被自西而来的周朝的军队轻而易举地推翻。周朝是上古三代(夏、商、周)中的最后一个王朝。

这些传说揭示了从孔子时代(公元前500年)开始到“中国”形成这一段时期有文化的中国人的看法。对他们来说，中国可以被定义为技术与国家管理——农业、文字、治水，结合了美德和世袭继承的君主制，等等。他们把中国的故事记载成为单线的叙事故事或家谱：专注于一个个统治者的继承。因此，中国的过去就像一个家庭的过去，它可以通过一个个的祖先的单一线索由近及远地追溯回去。

通过研究地质学、古人类学和考古学，现代学者会毫不令人惊讶地构造出中华文明起源的不同故事。他们的描述并没有对农业、文字、青铜技术和国家结构不屑一顾，但往往与传统故事不同的是，他们强调了礼仪和宗教在塑造中华文化的重要特征方面所起的作用。同样重要的是，他们没有把中国历史看作是以王朝世系为中心的单线发展的历史，而是把它看作是多元发展的历史，各种优秀的文化相互作用，其中一些或许还曾经被商周统治者明确视为外夷文化。这些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的演进。

① “五帝”中的另两位是颛顼和帝喾。伏羲和神农是“三皇”中的两位。——译者注

② 一般认为，禹的儿子启是夏的第一个国王。——译者注

中国次大陆的地理环境

中华文明是在一种特殊的地理环境中得到发展的，它处在欧亚大陆东部较温和的地带，幅员辽阔而又具多样性，为初民创造了许多机会，但同时也造成某些困难。中国本土南北长和东西长都在1610公里以上①；从北方的北京到南方的广州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从班果尔到迈阿密，或从奥斯陆到巴塞罗那；从西部的成都到东部的上海之间的距离则几乎等同于从巴黎到华沙，或从得梅因到纽约。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山脉纵横，把更适合人居住的河谷相互割开，而正是在这些河谷地带，建立起最早的人类聚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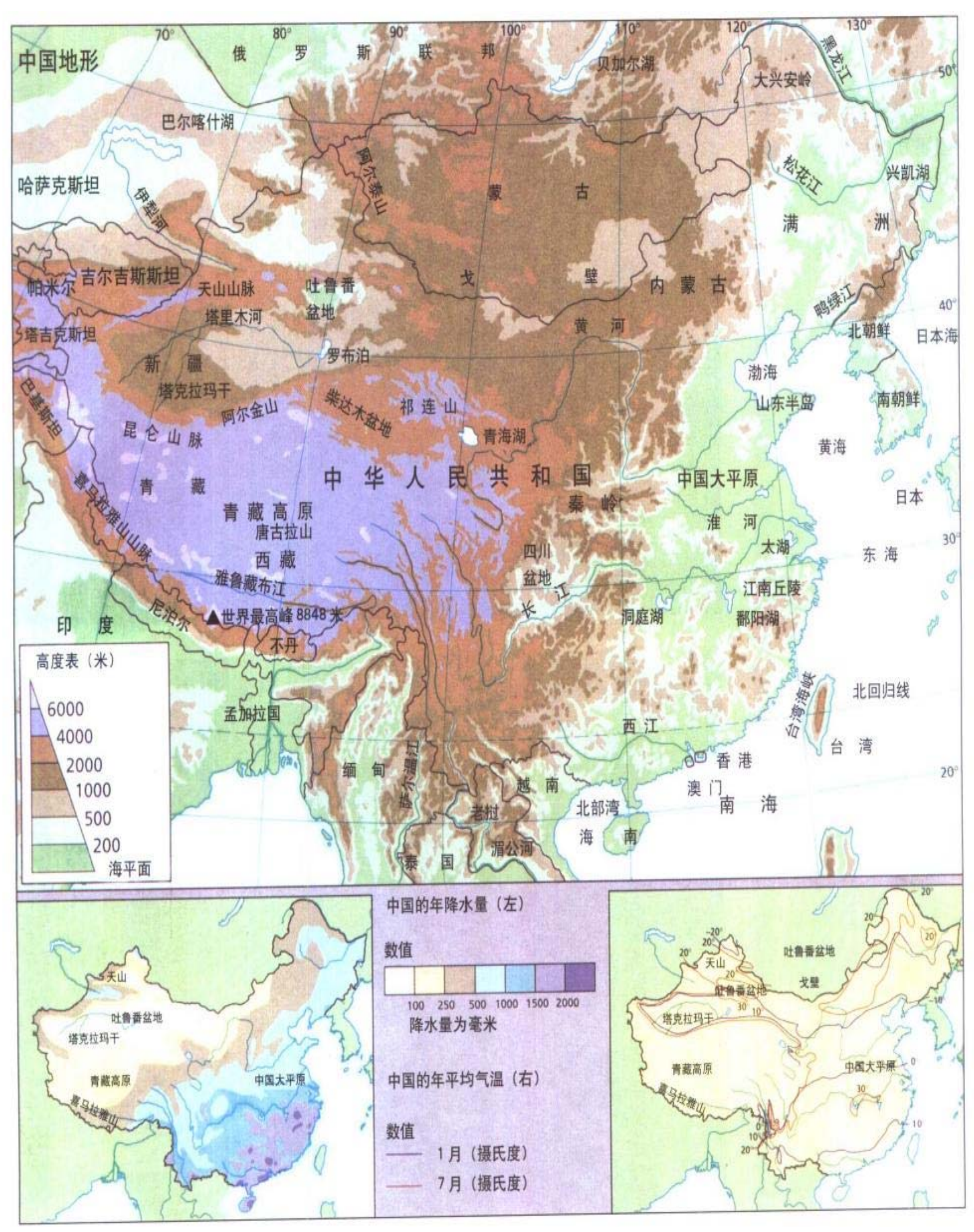
两条大河由西向东流过中国本土，黄河在北方，长江在中部。黄河源于西部高原，几经急转，流经北部沙漠，然后迅疾地由北向南，穿过黄土高原——这种黄土是细小的、由风携来的黄色土壤，很肥沃，即使用原始工具也易于耕作。在黄土高原的南端，黄河急转向东，河面渐宽，有大量黄色泥沙，两岸间有一英里或更大的宽度。最终它穿越了整个冲积平原，流入大海。另一条大河长江汇合了许多支流，携带了巨大的水量。它起源于青藏高原，跨过环绕四川盆地的高山，流过峭壁千仞的险峻峡谷，然后向东奔流千余英里到大海，每天都要把平均半立方英里的江水送人太平洋。

被这两条河灌溉的区域在土壤、地形、气温和雨量上都有不同。北方较寒冷、平坦、干燥，生长期较短，土壤更富碱性，这使其适合于麦、黍等作物的种植。黄河以北的雨量对于灌溉农业来说尚嫌不足，许多地方的年均降水量少于20英寸，水旱之灾的发生率高于南方。黄河易于泛滥，是因为流经西北地区的黄土高原时，它携带的泥沙在河水东流且流速减慢的过程中慢慢沉积。由于泥沙使河床增高，千百年来，农民和官兵筑起了坝堤，保证河水不漫出河道。但由于洪水极具破坏性，经常大面积泛滥，所以洪水发生的时候，总是要进行这样的工程。

被长江灌溉的区域比北方湿暖，大多数地方四季长青，年降雨量在60英寸以上，适合于稻作和两季种植。长江和数不清的、纵横交错的小河利于航行，使南方成为适合水路交通的地方。相反，在北方直到现代以前，人们还都是借助陆路交通，或徒步，或骑马骑驴，或乘牲口拉的大车。

一大片不适合农耕的地区把中国与其它最近的早期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流域隔开。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北方，是中亚大草原，那里比中国北方更寒冷、更干燥，土地用于放牧而非用于农耕。中亚的主要居民不是汉人，那里是匈奴和蒙古人——汉人的宿敌——这些游牧民族的家园。这些大草原横跨欧亚大陆直到乌克兰，但广袤无垠的沙漠把中国本土与西北的大草原相分离。在那些沙漠地区，除了极少的绿洲之外寸草不生。在它们的南边，也就是在中原的西南，是"世界屋脊"的西藏。那里的高山峻岭就像北方的沙漠和草原一样，不适合于汉人的农耕生活。西藏东南的多山地区(今天的云南省和贵州省)并不是那么不可逾越的，但是直到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直接穿越它们进入南亚和东南亚之时，航海是一个更切合实际的选择。

① 此处说法不准确。我国领土最北端在黑龙江省漠河以北黑龙江主航道的中心线，最南端在南沙群岛南缘的曾母暗沙，南北相距约5500公里；最西端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以西的帕米尔高原，最东端在黑龙江省抚远县境内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的主航道汇合处，东西相距约5200公里。——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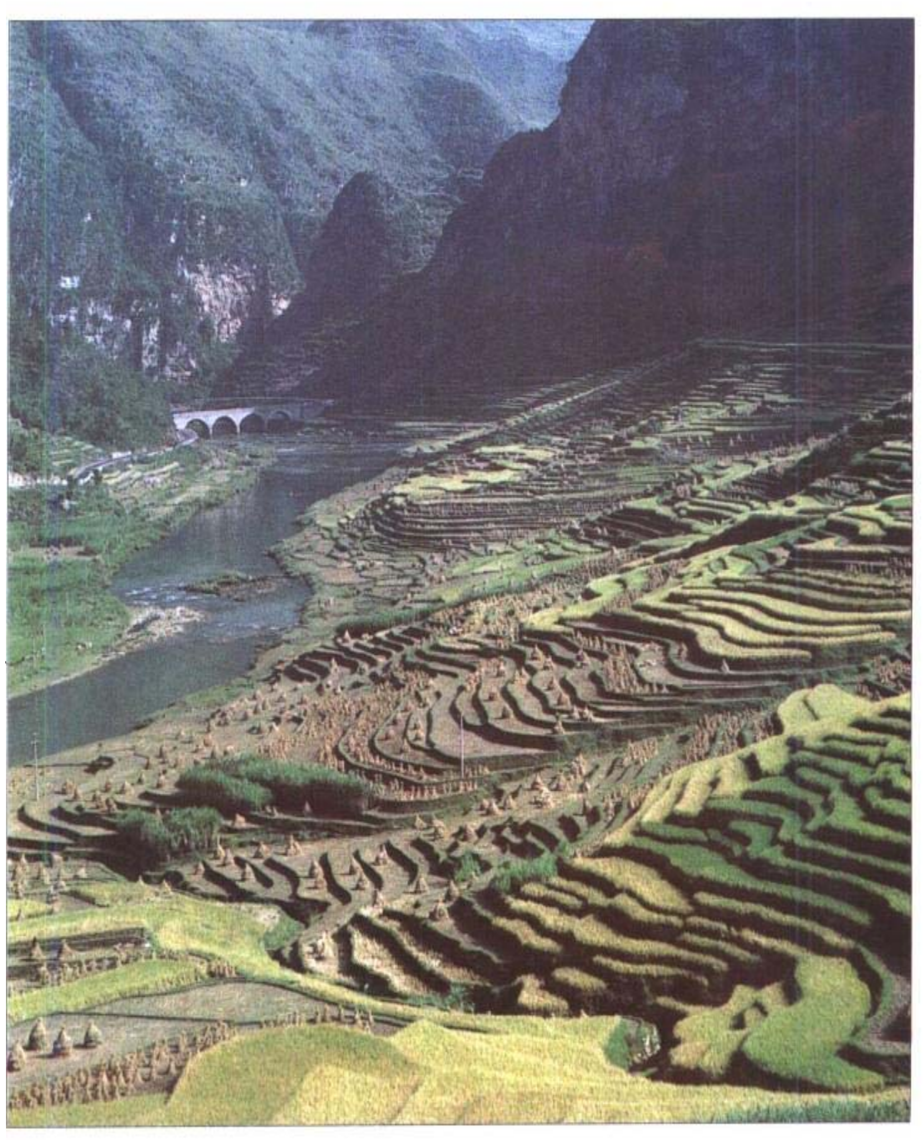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看待中国次大陆，我们一定要把曾经见过的所有地图从心中抹去，因为那些地图只是将中国视作占据了欧亚大陆的一小块土地，而且离大陆的另一端是那样的遥远。中国次大陆是如此辽阔，以至于在公元前的第一个1000年时，中国人就把它视为“天下”，是人类演出文明戏剧的地上舞台。它周围是辽阔的海洋、荒凉的沙漠和险峻的高山——对于人类文明的进程来说是不那么具有中心地位的区域。它们之外是什么，没有人确切知道，但是毫无疑问，在中国人看来他们这里就是文明的中心。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文明与农业有着很密切的联系。中国文化的最早阶段发育于河谷地带，在那里，即使是使用原始技术，也可以栽培谷物。这些早期聚落在欧亚大陆东部气候较温和的地区不断扩展。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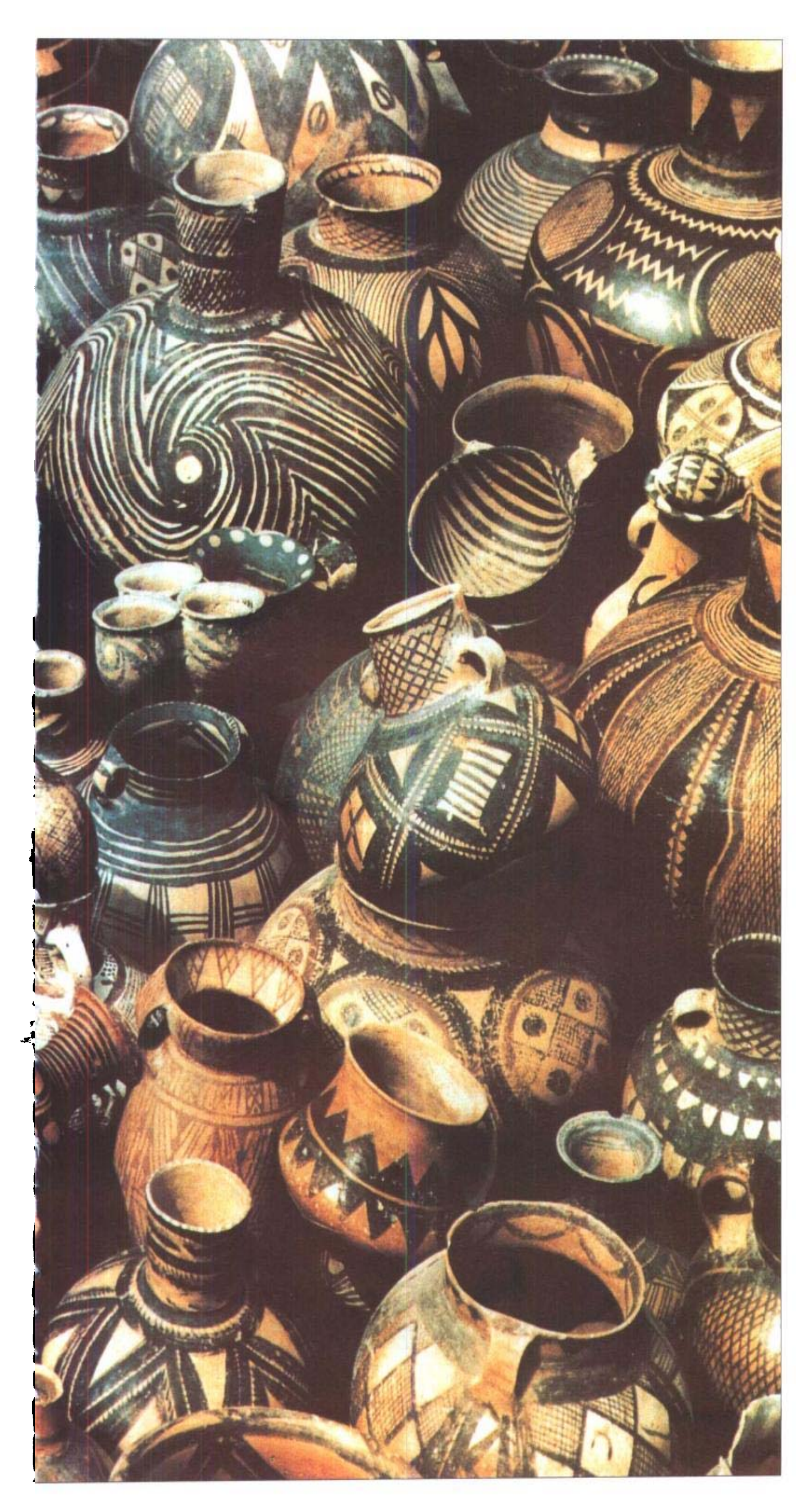
① 此处原作者使用的地图在西部中印边界上采用的是我国并不承认的麦克马洪线。特此说明。——译者注

图中所示的黄河系因所携带的泥沙使它看上去很浑浊而得名。中国北方平原的土壤主要是风成黄土和水成黄土，这致使早期的中国人认为土地就是黄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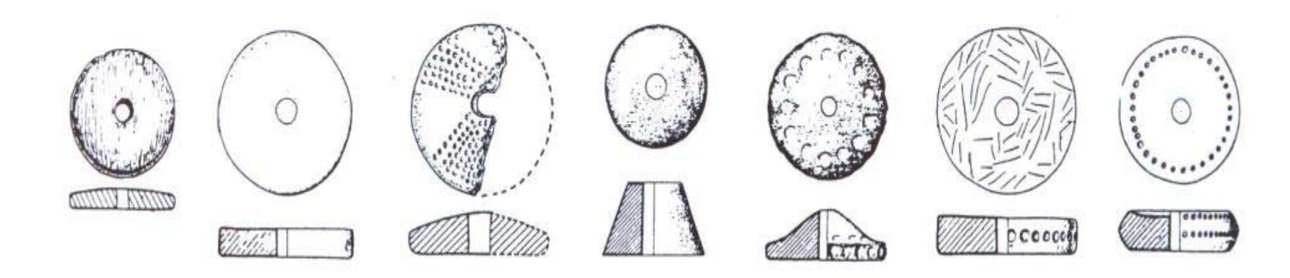


与寒冷干燥的北方相比，南方水源充足的丘陵和山谷提供了更为繁茂的景观。



仰韶文化(公元前3200年—公元前2500年)[①]陶器上的各种图案经常来自于鸟、鱼、蛙和其它野兽的形象，它们最初可能具有图腾的意义。这一大堆彩陶上有各种各样的几何图形，但并没有显示出这些陶器的用途，因为没有一座墓葬能把如此众多的陶器摆放在一起。

① 仰韶文化的最[illegible]点是分布广、延续时间长、内涵丰[illegible]时间跨度为公元前5000年—公元[illegible]0年。——译者注



纺织技术的最早标志是浙江河姆渡发现的纺锭盘的出现，时间约在公元前5000年。这些木、陶锭盘被用于捻麻纱，以使它们结实得足以用来织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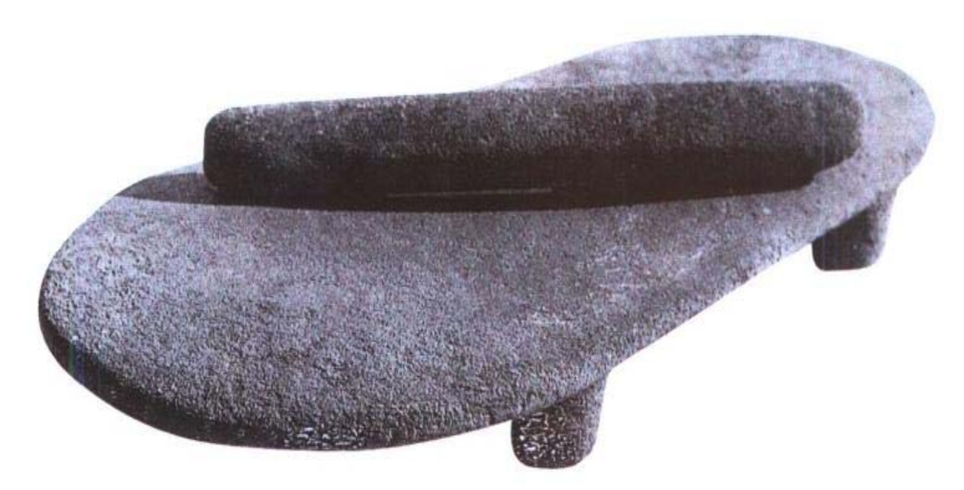
史前史

称为直立人的早期人类在中国次大陆上已经出现100多万年了，在地质年代的更新世时期(冰期)从非洲和西亚渐次迁移而来①。即使没有大冰川扩展到中国，但平均气温也比后来要低，在华北，猛犸、麋、驼鹿在四处漫步。20世纪20年代发现的北京人是直立人的最好例证之一，他们能直立、打猎、生火，并会使用切削石器。

现代人在大约10万年前出现在东亚，大概也是从非洲某地迁转而来的。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0万年—公元前1万年)，随着食肉的猎人和采集者的出现，人类开始说话。语言扩展了象征能力，例如语言促使了神灵与亲族观念的发展。在这漫长的时间中，我们有理由设想，有许多人群横跨中国次大陆，四处迁移，在遭受对方威胁的时候，他们相互搏战，在命运使他们幸存下来的时候，则或分或合，有些早期的族团迁移到了太平洋诸岛或者美洲大陆。在何种意义上那些在中国次大陆度过一段时光的早期人类，应被视为历史上中国人的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因此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史开始得更晚些，大约在公元前1万年的最后一次冰期之末。到公元前5000年，具有农业、制陶、村落和纺织的新石器文化在今日中国大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出现。农业无疑是一个关键的变化，因气候变暖变湿而受益(甚至比今天还要暖湿)。栽培作物使中国先民的聚落更密集、更长久，制陶和

这个制作精美的石磨盘大约长20英寸，宽8英寸，出土于河北省磁山的一个新石器村落遗址，时间不晚于公元前5000年。甚至在谷物得到驯化之前，石器就被用于食品加工。这件石器大概就是用来磨碎未被驯化的植物根茎的，以使它们更易被消化②。



① 原始人类是一元发生而后向外传播的，还是多元发生、独立起源的，这个问题在学术界还有不同的认识，这里只是作者个人的看法。——译者注

② 此说不确，因为已经发现这一时期的驯化了的农作物。——译者注

纺织使他们的生活大为舒适：陶罐对于汲水和储存粮食非常便利；用布制成的衣服和被褥能够御寒。照料庄稼、织布和制陶要求有与狩猎不同的各种技术和社交技巧，这样武士们就不得不与熟练而有经验的长者平分领导权。与此同时，永久性的聚落导致了社会组织的新形式：一种地域性的单元——村落，补充着以亲族为基础的组织形式。

如果无视后来的历史传说，而只是考察实物遗存，我们可以根据纬度把这些新石器文化分成南方稻作区和北方粟作区。在长江流域，早在公元前5000年时就已经开始种稻了，并有鱼类和水生植物作为补充，如莲、荸荠以及菱角。在河姆渡(浙江省的一处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们建造了高脚木屋，制作了雕有几何图案的漆碗和黑陶器皿，筐和织物得到高度发展，居民们遗留下的纱锭的锭盘是用来捻纱的，还有一些织布用的梭子。其他木制工具还包括锄、叉、槌和桨。换句话说，河姆渡村民的技术水平已经高出于17世纪多数的北美印第安部落了。

中国的北方既寒冷又干燥，不适宜种水稻，所以谷类就代替了黍类成为北方农业的基础。公元前5000年前的河北磁山遗址表明，人类用石镰割黍，并把它们放在饰有绳纹或梳状印记的陶碗、陶罐或三足钵里。中国北方到处是黄土，这对于当时原始农民来说，其耕作相对容易些，原因在于黄土比较容易开垦，且土质疏松，为新鲜的营养进入土地表层提供了条件。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在南方，动物的驯化总是伴随着植物的驯化而来。早在公元前5000年，中国南北两个地方都有了狗和猪。到公元前3000年，羊和牛已成为北方的主要牲畜，而南方则是水牛和牛。

除了基于生产技术的南北差异之外，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也可以根据艺术形式和丧葬风俗被鲜明地划分为东西两个部分。西部的仰韶文化区(在今陕西、甘肃境内，时间为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葬制一般比较简单。陶器上经常刻画着几何符号，盛谷物的罐子被画满了红色和黑色的螺旋型图案、菱形图案和其它一些几何图形，这些陶器的外形相对来说是比较单一的，大多数都是一些实用的瓶形或缸形。与之不同的是，在东部即从辽宁到上海这个地区，陶器上很少有图案，但是外形更复杂的陶器却很早就出现了。这其中就包括了三足钵以及有基座的陶碗和陶杯等等。最漂亮的陶器是在陶轮上制成的，壁很薄，表面非常光亮，看起来就像金属一样。还有许多陶器是用复合构件拼成的，包括足、喷嘴、把手或盖子等等。在这些区域，最常见的外形是大口水罐和高脚杯。这些都显示出了这一地区举行盛宴或祭祀时的种种礼仪。同样地，东部的葬制也日渐复杂。在山东地区的大汶口遗址中，某些死者被埋在棺材里，偶尔也造一个木头的墓室并把葬坑排成一列，这些措施起了进一步的保护作用。在这个遗址的最富有的墓穴里，有50件、60件或者100多件物品，比如包括用玉器、石头或陶制小珠做成的项链和手镯等等。大汶口文化还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就是许多人的上侧门齿被拔掉了，很久以后，中国学者认为这可能是蛮夷的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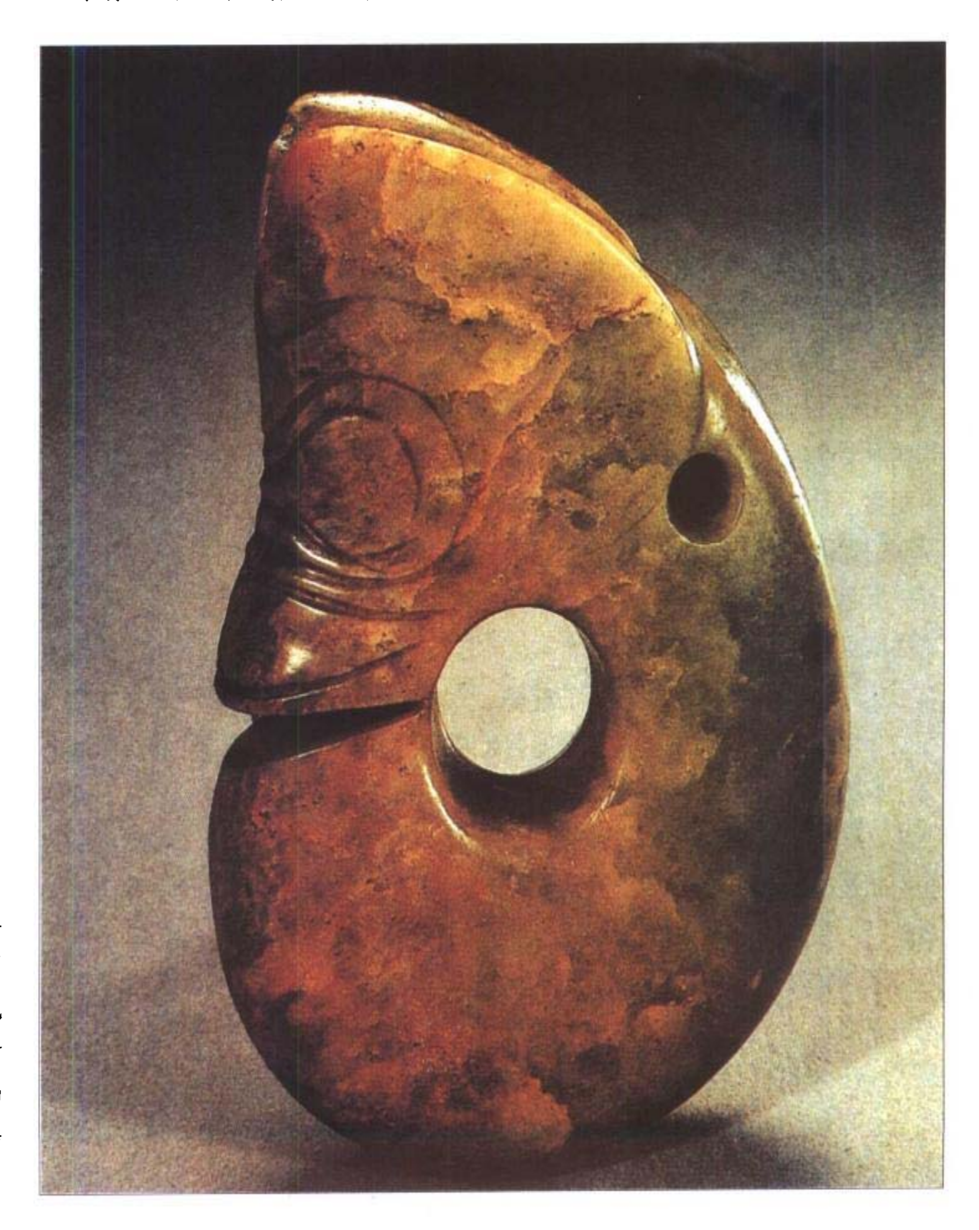
新石器时代最壮观的发现来自辽宁省的红山文化(约公元前3500年)和江苏省的良渚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这两个地区直到2000年前还不被视为纯粹的“华夏”地区。在红山文化中，玉被做成各种装饰物，或者是一些小雕像，如海龟、小鸟，还有奇怪地被弯成环的“猪龙”。这些小雕像是在祭祀用的石制建筑旁边发现的，说明它们已经有了象征的或宗教的含义。同样，在良渚文化中，玉也被制成

这个高脚杯是在山东泰安出土的。杯壁极薄，薄似蛋壳。这样制作精美的黑陶器皿代表了大汶口文化的风格(公元前2300年)。



各种仪式用的物品。至今已有上百件的璧(圆板)和琮(圆筒)被发掘出来。一两千年后，玉璧和玉琮仍然在仪式中使用，而且被看作具有宇宙的意义，环形与正方形则分别代表了天地。在中国东半部的其它地区，玉器并不是那么引人注目，但是一种可能为祭祀所用的玉斧却被广泛发现。

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是这些地区文化逐渐加强联系的时期。陶器的设计和制作技术传到新的地区。例如，三足钵炊具就传到了西部，而几何形纹饰则传到了东部。这一时期也是不同社区间冲突逐渐增多的时期，金属开始少量地应用于制造武器，在华北平原出现了用墙围起来的聚落。山东省城子崖的围墙估计有20英尺高、29英尺厚，用这些夯土垒起的墙围成一个聚落，无疑需要协作劳动的能力，这也表明了社会组织的进步——这时候出现了控制相当数量的人和资源的首领。宗教权力或军事领袖权力的另一个标志，是人牲的出现。在公元前2000年的华北平原，人死后仍然被埋在主要建筑物的基石下面，人牲可能被看作是取悦祖先或神灵的一种做法，它也可能是紧握生死大权的领袖们加强政治权力的方式之一。社会差异也在墓葬中体现出来。在山西南部的一个有1000座墓穴的大墓地中，有9个精心营造的坟墓，每个都有木棺和100多件



猪吻蛇身或龙身的玉器有6英寸半长，出土于辽宁省的三官甸子(红山文化，公元前3500年)。新石器时代的村民用了很长时间用沙子或别的打磨物来修饰这件小饰物或辟邪物。



最壮观的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发现于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250年）。在江苏寺墩发掘的墓穴中包括一连串25件琮（带有圆柱形孔洞和四方边的管子）和33件璧（圆板）。考古学家认为，埋在这里的是个巫师，与他埋在一起的还有他在举行仪式时使用的珍宝。

在良渚发现的玉琮需要精确的测量和设计技巧，以取得高度规则的图案。在江苏寺墩的这个高2.75英寸的玉琮上，那突出的眼睛和对称的图案，表明了它与上千年之后的青铜器上的著名饕餮纹之间的某种联系。

随葬品，其中包括乐器、玉器和壶罐。有80个是中等规模的坟墓，内中有类似的物品，但数量要少些。有600多座坟墓葬制简单，既无棺材，也无随葬品。

甚至迟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次大陆的新石器社群分化的程度，与欧洲人到达前的北美类似：无疑已存在很多方言，其中有些有关，有些则无关；在一些部落中，巫师可能是非常有权势的，而在另一些部落中他们则不为人知；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地方，战争很可能主导着人们的生活，而在其它地方却不是这样。虽然

祖 先

在埋葬死者的同时，也随葬一些盛食物和酒的容器，或其它一些生活必需品，这一现象与相信生者和他们死去的祖先互相依赖是有关系的。死者需要生者提供坟墓里的物品和葬礼以后的祭品来供养他们，而生者也需要取悦他们的祖先，这样祖先就会保护他们，至少是不伤害他们。新石器时代的墓葬中既有一些实用的盛食物和酒的容器，也有玉器、贝壳之类珍贵的东西，表明这种信仰可以一直回溯到史前时代。有关这些信仰的最早的确凿证据，可以在晚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找到。

商王通过祭祀和占卜与祖先打交道。最通常的占卜方法是由贞人用一根灼热的金属棒或别的热东西烤炙龟甲或牛骨，甲骨受热爆裂，其裂纹就被解释为对贞人提出的问题或声明显示出的一种吉兆或凶兆，或是一般性的回答。甲骨上的记载显示，祖先经常被问到有关进献的祭品的问题，如供奉一头牛是否合适。祖先们同样也会被问到其它一些问题，例如是不是他们使商王牙痛或是做恶梦。除了先祖以外，还有一些神灵——尤其是上帝，他们能够赏赐好收成，在战争中助一臂之力，送来风雨雷电、干旱或是瘟疫。但是在同这些神灵打交道时，商王往往请自己的祖先作为中介人。

在西周，祖先仍然是信仰的中心。青铜器上经常刻有向祖先详细叙述其后代成就的铭文。《尚书》中就把周公描绘为这样的人，他对周王族的祖先能够影响其后代及整个国家幸福这一点深信不疑。他的哥哥周王生病时，周公举行了郊祀，向祖先祈祷，表示如果先王能宽恕周王的话，他愿贡献自己的生命去侍奉先王的在天之灵："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如果这篇文献准确地反映了周朝早期的信仰，那么此时家庭伦理观和祖先崇拜已经结合起来了：对祖先的祭礼有了一种道德上的倾向，反映出儿子对父亲应尽孝道的观念；因父子关系总会变成一种祖先与后代的关系，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就有了一种宗教上的倾向。

《诗经》中记载的祭祀上的颂词，将周初贵族集团的祭祖描绘为对伟大的象征性力量的一种充满激情的仪式。通常由一位扮演者——一般是孙辈的孩童——来扮演祖先，通过扮演者这一媒介，祖先的灵魂就能降临于那些对他进行祭祀的人中了。人们向那位扮演者进献许多酒和他们所能弄到的最好的食物，并载歌载舞来使他高兴。通过参加这一盛宴，子孙们便与附在那位扮演者身上的祖先互相进行了交流。颂词经常暗示一种互惠：既然已经小心谨慎、正确无误地完成了祭祀，祖先们就应赐予子孙多子多寿。



这是在安阳出土的刻有文字的牛的肩胛骨。商王武丁（约公元前1250年）几次让人用这块卜骨来进行预测（如"未来10日内会不会有什么灾难"），并记录下占卜后发生的实际情况。所记录的事件中有一次死亡和一次狩猎事故。

⊖ 引文出处详见书后注。下同。

考古学家们已经考证出那些仍然存留于后世的文化的特征，但如果简单地认为他们就是最早的汉人，那会是个误导。

商 朝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华北平原星罗棋布的新石器文化之中，产生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青铜文明，这一文明的标志是文字、金属冶炼、马的驯化、阶级分层，以及稳定的政教统治。这种政教统治是围绕着一个祭祀中心来管理大片地区的。这个转变的最早阶段传统上是和夏朝相联系的。由于没有确定的夏遗址能与文献记载相符，因此仍不能确定在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50年)以前是否有一个发育成熟的夏朝。但确定无疑的是，中国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发生着巨大的转折。从这以后，有组织的政治实体成为有关中国古代历史的首要因素。与政治组织相联系的知识精英们通过制造文献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所看重的，而这些文献使我们如何跳出这些文献去审视一切有了意义——不仅是包括被视为蛮夷的异族，也包括他们社会自身的其他成员，从奴隶直到对手中的精英。

商朝并没有控制中国本土的大部分地区——它的统治区大概还没有把整个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和陕西都包括在内。但它的技术和装饰艺术被长江流域各民族接受，商文化的影响远远超出了这一地理界限。据说商朝先后有5个都城，而且几个较大的商代聚落都已被发掘出来了，郑州可能就是一个早期的祭祀中心，安阳则是商王统治了两个多世纪的地方。商文明不像是美索不达米亚那样的人口稠密的城市文明，但这些祭祀中心宏大而复杂。在它们的中心地带有巨大的宫殿、庙宇，以及建于夯土地基上的祭坛，其中一个宽26英尺、长92英尺。围绕这个中心地带的是青铜匠、陶器匠、石匠和其他手艺人居住的工业区。再往外则是一些建在洼地上的小房子，最外面则是墓地。

在安阳发现的甲骨文展示了一幅中央政权正严阵以待来犯之敌的场景，它和一些方国联盟而与另一些交战。国王一般派出3000到5000人的军队作战。诸侯不断变成敌人，而敌人又不断变成盟友。战利品给国王带来财富，战俘可以作为奴隶或作为祭祀的牺牲。然而自早商以来，农业技术并未像军事技术那样获得极大进步。铜尖矛和戟、组合弓箭以及马拉双轮子战车在与强大敌人作战时显示出了巨大优势。战车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时引入，很可能是从西亚传来的。在两匹或四匹马的拖动下，军队将领可以在战车上指挥军队，使弓箭手和装备着长戟的战士更为灵活。战车也用于皇家狩猎和那种可持续数月的壮观出巡或军事演练。当时的鹿、熊、老虎、野猪、大象以及犀牛数量不少，这表明在华北平原上曾有过大片的森林。

然而，商王朝并不只是建立在军事强权之上的，同时它也牢牢植根于宗教仪式之中。商王在对至高神——“帝”和王室祖先的崇拜中扮演了一个僧侣般的角色，一个使其政治权力合法化的角色。换一种方式说，这是因为在死者中，他的祖先是最能与帝交流的；而在活着的人中，他又是最能与他的祖先进行交流的。由此，王就最适合于统治国家。知道了王室祭祖的重要性，我们就不会惊讶父系原则同样支配了王位继承：既可以兄终弟继，也可以父死子继，但却不能传给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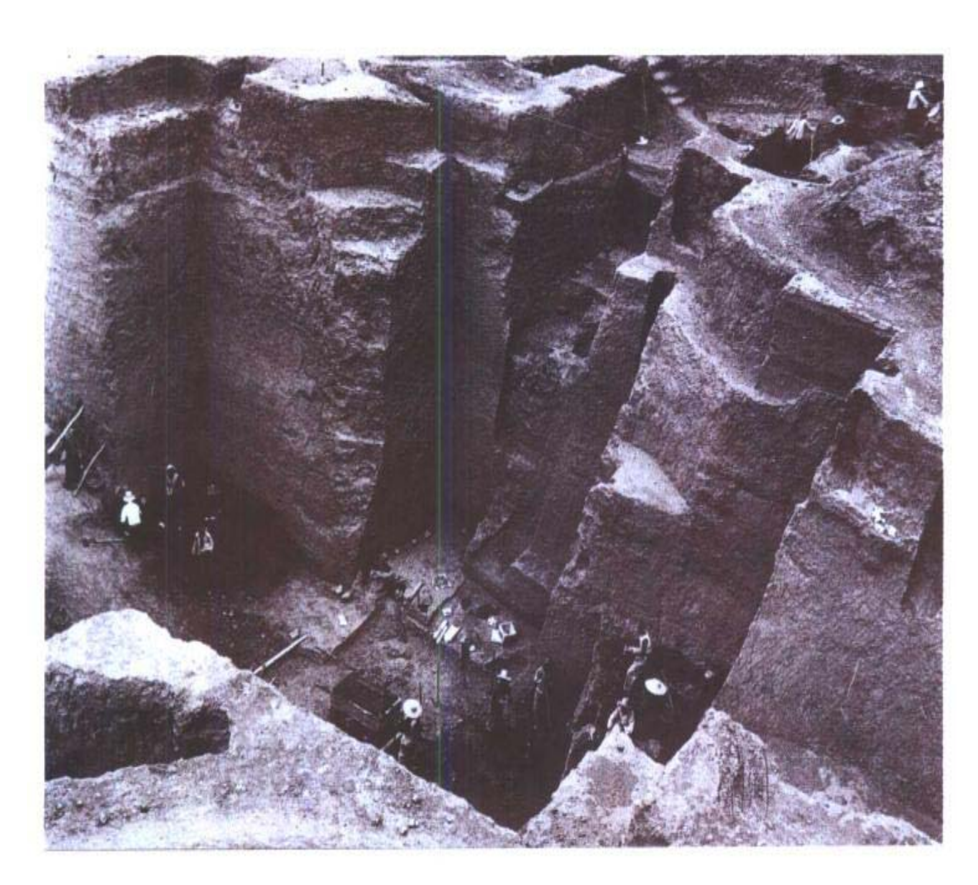
妹或女儿，或是在她们之间传承。

为了发现祖先的旨意，国王使用职业卜者来准备占卜用的骨头。但对于骨头因受热而产生的裂纹的含义，则由国王自己来进行阐释。国王所做的许多预言听起来好像是巫术咒语或祷告——“降雨”或“今后十天中将不会有难”。国王在他的领土内进行频繁的巡游时，也同样扮演着僧侣般的角色，他会经常停下来祭祀地方的神灵。

与其它许多社会一样，动物和人都会被用来祭祀王室的祖先和各种自然神。在中国和其它地方，所强调的祭祀原则都是互惠和供奉食物。人们要向那些他们想求得其帮助的神灵献祭，他们也为变得强壮而向神和祖先供奉丰富的食物。商王频繁使用人牲，有时一次十多人。下属们也许有志愿为主上“陪”葬的，说明他



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时突然出现的轻型辐轮战车、表明了与印欧文化载体的接触。在高加索，具有巨大多辐车轮的类似战车已存在了几个世纪。战车在商代晚期和周代的战争中所起的统治者象征的作用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们被随葬于主人之墓。这个葬坑发掘于北京琉璃河，属西周时期，其中有车马的遗存。



商王第1001号墓是安阳发掘的11座大墓和1000多座小墓之一，所有这些墓都是南北向的。尽管这个墓在古代被盗过，而且也许就是被入侵的周人干的，但在发掘时还是发现了大量的石器、玉器、贝、骨、角、齿、青铜器和陶制品。由于坑深超过60英尺，长300多英尺，掘土造墓要求动员大量人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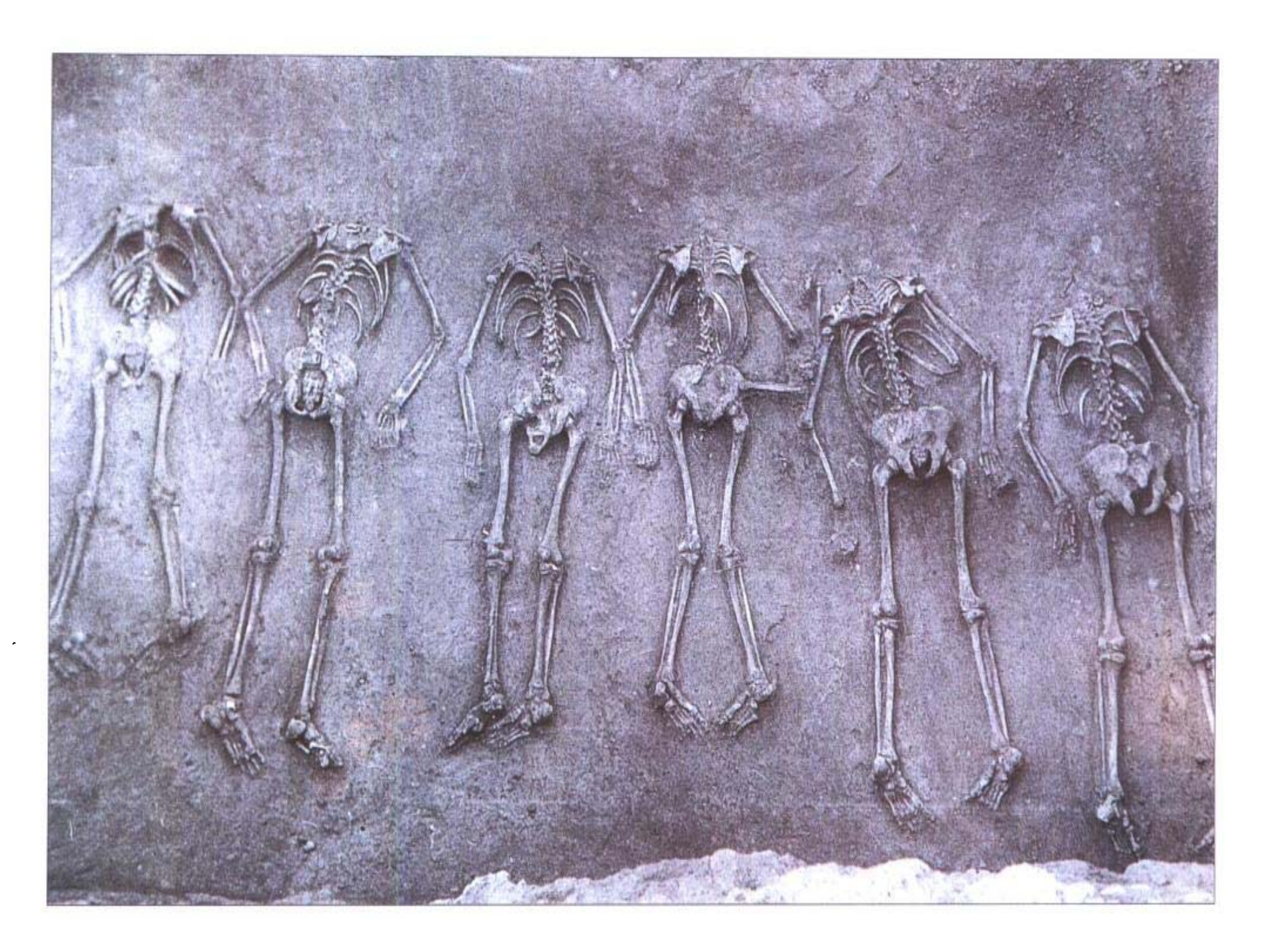
们认为这等于是为那些地位高于自己的人尽上做奴隶的义务。在郑州的早期或中期商王室墓葬中，经常会有一个、两个或三个殉葬的人被埋在内外墓室之间和外墓室的顶上。到商晚期，为统治者陪葬的人更多。安阳的1001号墓可能是公元前1200年在位的商王之墓，其中发现了90具陪葬牺牲的遗骨，内有74个人，12匹马，11条狗。这些牺牲均被置于坑道、壁架和坡道中。其中一些陪葬者有自己的棺木、青铜礼器或属于自己的武器，一些人(一般是妇女)虽没有棺木，但有个人的装饰物，其他人则没有陈设物，而且有的被斩首，有的被劈为两段，还有的则是被其他残酷的方式处死的。

王室家族的大墓表明了商统治者动员人力物力资源的能力。成千上万的劳工被迫集合起来，去挖掘那些深达40英尺的大坑，建起大规模的木制墓室，然后再用夯土层将它们填满。这种调动劳动力的能力使其迁都安阳的时间明显提前了。郑州宽60英尺、高30英尺，长2385英尺的庞大城墙耗时一二十年，仅运土和夯土就动用了1万个劳动力。

书 写

商的行政组织能力大概应该部分地归功于文字体系的完善。像在别的地方一样，在中国，文字一旦得到采用，就会对社会和文化发展起重大作用。由于大多数文字写在木头、竹子、丝绸之类易腐烂的材料上，因此还不能说出中国最早使用文字的准确时间。刻画在新石器陶器上的符号、图徽，可能是中文象形的早期形式。早商的青铜器上有时也铸有类似的符号。

完整句子的最早证据发现于晚商的甲骨文上，从这些卜辞来看，商人所用的



上图　这是安阳第1001号墓中人牲的无头骨架。记载人牲活动的文献被这类清楚地排成一列的无头骨骼的发现所证实。那些被砍下的头颅在同一座墓的其它地方被发现。

语言无疑就是现代汉语的直系祖先。此外，他们还使用了一种书写体，逐渐演化成至今还在使用的标准的汉语表意书写体系。在已经识别出的3000多个字中，某些图形文字看得出是代表一种东西或一种思想，某些则借用了它们的音，还有一些则是两个字合成一个字，那两个字一个表意，一个表音。像别的地方一样，在中国，随着文字的使用，出现了列表和组织思想的努力，这有助于高水平的抽象、推理等智力活动。在商代，一个复杂认知组织的标志是使用两个连续的系统，一个基于10（天干），一个基于12（地支）。10的循环被用于10天1星期的计日，而两者的结合产生了60天的一个循环（甲子）。

商人与在欧亚大陆各地占支配地位的多数文明的情况不同，它发展起表意的而非表音的文字，基本上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性对于中华文明的发展道路却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塑造了精英的本性：掌握这种文字之难，使那些精于此道的人成为很少却又必不可少的社会精英。由于中国的表意文字在反映发音的变化时并不改变，所以知识精英能读懂其他人所写的文字，从而相互认同。他们能读懂几百年前的先人的思想，也可以理解那些根本听不懂其方言的当时人的意思。同样

下图　现代中文书写体系源自商代卜者所用铭文。

牛	羊	木	月	土	水	鼎	示	田	就	祖	逆	天	祝

妇好墓



古代中国人并不费劲去建造石头的纪念物。在中国，没有类似金字塔、米诺斯王宫、巴台农神庙那样的令后世游人惊叹其宏伟的东西。但从铺张和希望永恒这一点来说，与之最相近的当数商王大墓了。它的壮观一直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地下，不为人知。

在发掘之前未被盗过的惟一一座商王墓是为妇好（约公元前1250年）修造的安阳5号墓，虽然它规模较小（入口处大约13×18英尺，深约25英尺），又不在主陵区之内，但却满是数量惊人的随葬品。人牲显然存在（有16具人的骨骼，男女老少都有），但数量少于那些大墓。这是一个埋藏着大量贵重物品的墓葬，这些物品是这座墓葬的最重要特征，表明那种几乎是夸富宴一般的奢侈铺张。这座墓中有460件铜器（包括130多件武器、23座钟、27把刀子、4面镜子、4只虎或虎头）、近750件玉器、约70件石雕、近500个骨笄、20多个骨箭镞以及3件牙雕。此外，还有近6900个贝壳，这可能是贝壳用作货币的证据。这些东西的多数具有明显的都市风格，而其它东西则是来自远方的贡品。



200多件青铜容器构成了商墓出土的礼器中最大和最完整的一宗。这里有20多种样式，包括卣、爵和盆。装酒的器皿最多，表明葬礼的最后一项，是送葬者用酒祭奠，把酒和酒杯一起掷出。大约有60件铜器上镌有妇好的名字。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那些做成动物形状的器皿，它们反映了南方的影响，在更早些的时候，那里出现过类似的东西。

这座墓中的制品并不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妇好的真面目。也许她就是那位许多甲骨文中提到的妇好，即武丁的妻子（武丁，约公元前1200年）。武丁曾为她的疾病和怀孕而占卜。从这些铭文中，我们可以知道，她负责某些仪式，在王都之外还有自己的封邑。她甚至率军征战，一次曾率13000名战士去远征西方的羌人，另外还征讨过西北的土方、西南的巴方和东方的夷。

上图这件2.75英寸的玉器和左图这件近1码高的镶嵌着饰环的象牙酒杯是妇好墓中的器物。那个人物跪着的规范的姿势，在2000多年后椅子普遍使用之前的中国是很常见的。

关键的是，这种文字也影响到文化扩展与涵盖的进程。居住在华夏文化圈边缘的民族，出于发展和捍卫其利益的实际需要学习了汉语，这使他们被更有效地吸纳进了汉文化之中。如果汉语是一种拼音文字，情况就不会是这样了。对于他们来说，读写汉文不会轻易地与中国传世典籍的主体相分离，而后者渗透着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使他们难于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去清晰地表达当地人那种与中国人相反的看法。

在商政治控制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落后，但因没有文字记载而使我们对其几乎一无所知。这件异乎寻常的铜像大约6英尺高，下有2.5英尺高的底座，出土于四川三星堆。它埋在两个坑中的一个里，这两个坑装满了铜头像、面具、象牙和其它东西。它们都可以显示出一种技术发达的文化，其宗教活动与商和周初的情况判然有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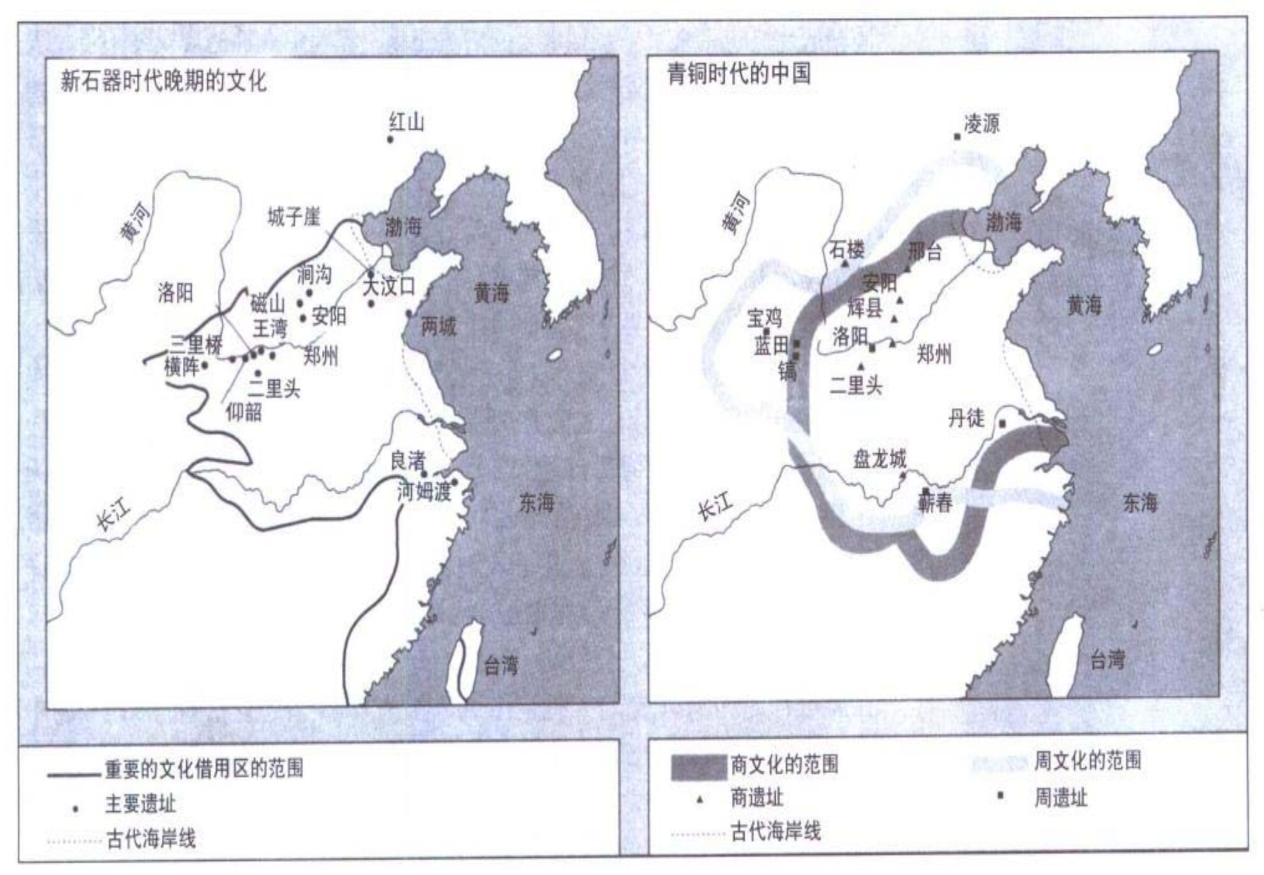
青铜器

与世界上别的地方一样，商代中国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发展是与完善的冶金技术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冶炼金属矿砂的方法可能是在用高温制陶时顺便发现的。已知最早的青铜器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600年，发现于河南的二里头遗址。有些青铜器壁极薄(有一件只有1毫米厚)，形状也很有特色，比如尖角和卷边，显示了仿造金属片状原型的可能性。但它们逐渐变大变重，商代晚期已制造出巨大的青铜器，有些竟重达200多磅。

保存下来最多的青铜器是杯、爵、甗和鼎等。它们有着精美的外形和纹饰，形状、大小各异，据推测是用于祭祀仪式之中的。在商代青铜器中，再现了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一些与众不同的风格，比如那时的三足钵就在商代的青铜器中重现，表明商代的艺术传统与这个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商代青铜器的复杂样式是通过铸模和预制件来实现的，首先制造的是器物的足、柄和其它一些凸出的部分，然后再把器身粘铸到它们上面。

商代中国制造的青铜器在很大程度上展现了商代的文化和社会风貌。数以千计的青铜器保存到了今天。我们从考古发掘中可以得知，一个单人墓穴中就可能埋着200件青铜器，这个数量证明，商代贵族为了仪式的需要而毫不吝惜地一掷千金。能生产如此多的青铜器也进一步证明了商统治者的管理能力，因为他们必须动员人力物力去开矿、运输、冶炼矿砂，去制作铸造过程中使用的黏土模型、泥心和铸模，并经营铸造作坊。另外，商代青铜器上的装饰也为商代文化变迁的原动力提供了研究依据。动物面具或饕餮是整个时期占主要地位的纹饰，但它们的样子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显著的变化。在某些时期，工匠们较为开放地向邻国学习新的风格；而在另一些时候，他们又回到原来的风格和母题上，对它们进行再创造，似乎又从这些古老的东西中发现了很好的东西。

青铜工艺传播到了商朝统治区以外，甚至传到了连商王朝也认为是异域的地方。1986年，考古学家在四川省三星堆发现了似乎是与晚商同时期的一种青铜文明，但它们之间既没有共同的艺术传统，看起来也没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这个遗址不仅有同样的夯土城墙，墙外还有两个不同于以往发现的任何祭祀坑。其中一个放有约300件金器、青铜器、玉器及石器，还有13根象鼻和近100立方英尺的兽骨，这些兽骨上往往有被灼烧或砍砸的痕迹。最令人震惊的发现是一个如真实尺寸大小的青铜头像，它有一张瘦削的脸，脸上有巨大的眼睛。在100英尺远的第二个坑里，有一个如真人般大小的雕像和41个大小不一的青铜头像，其中有一些还戴着黄金面具。由于大多数都被灼烧过或已破裂，考古学家们因而认为这两个坑



文化区：青铜时代中国新石器晚期文化的两个大国商（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50年）和西周(公元前1050年－公元前771年）的文化影响从黄河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多元文化在中国次大陆的许多地区出现，但到青铜时代的中国即公元前三千纪[①]借用变得如此广泛，以至使中原地区变成了相互影响的文化区。

是相隔一代的两次大规模祭祀仪式留下来的遗迹。在这些坑里没有人类的尸骨，于是人们据此推测那些青铜头像和那个雕像是被用来代替人牲的。

虽然青铜器保存得最好，但它当然不能构成商代艺术的全部。精致的绿玉物品、许多不朽的新石器时代的风格形式，比如琮、璧、匕、斧，一直都是富人墓葬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丝已经用于纺织，精巧的丝织物的遗迹也已被发现。人们发现了经过雕刻的木头和象牙，有时还镶嵌着绿松石，还发现了漆饰的遗迹。所有这些都表明，商代的国王或许还有其他贵族家庭，生活在一个由美妙器物构筑的天地中。

周人的征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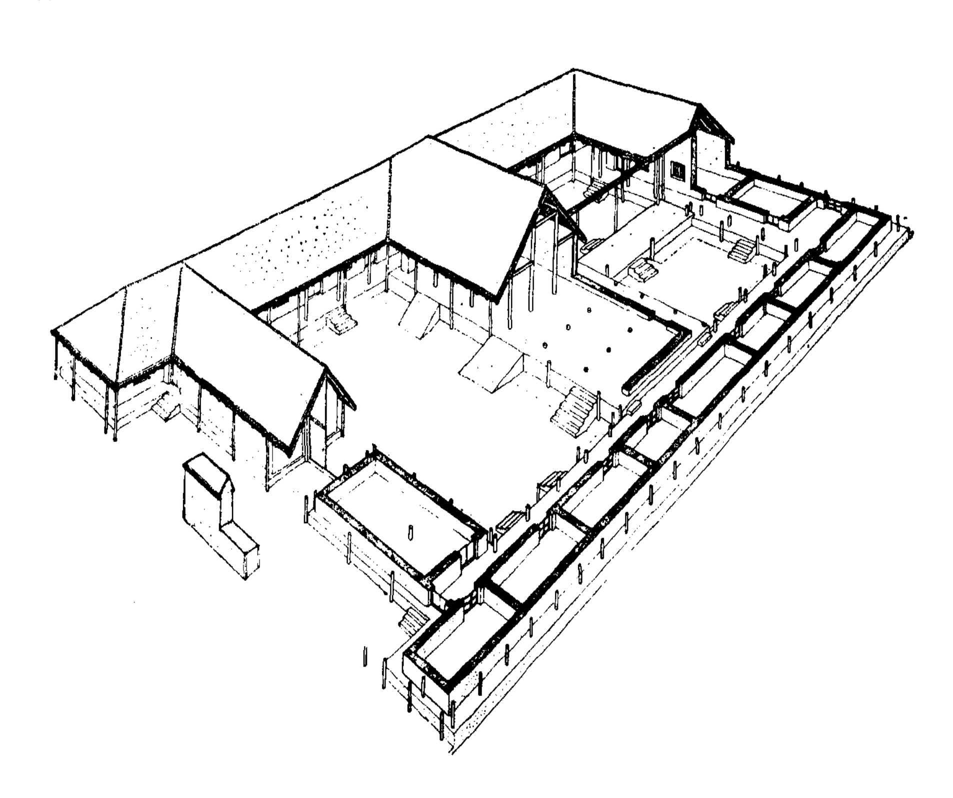
要想知道商王对其疆域的控制有多直接或多严密，仅通过甲骨文和考古发掘来了解是很含糊的。商王总是不断地打击敌人。在西面是凶猛的羌人，被认为是野蛮的部落，大约操的是原始藏语。在商都与羌之间，有一个处在边境上的政权，叫做周，它似乎既继承了新石器时代西北各部落的文化传统，也吸收了很多商的物质文化。在大约公元前1050年，周人起兵反商并打败了它。

周初是最早有文献流传于后世的时期。《书经》是儒家经典的一种，似应包含了自建周以来的文献，告诉我们周人对自己历史的看法。这些文献把周克商描述为正义、高尚的武士对荒淫无道的君主及其谄媚之臣的胜利。同时，它们表明周人意识到商居天下之中，因此渴望继承这个角色，而不是质疑它，他们把历史当作权力合法化的主要依据。除了这些流传下来的文献以外，还有很多青铜礼器上的铭文。后者特别有用，因为它们记录了王的善行，也提到了受王喜爱的服务。

① “千纪”乃指一千年的时间段；此处公元前三千纪应为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编者注

周朝的建立也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的宗教变化。葬礼中人牲的规模缩小了，表明死亡和身后的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自愿的随葬行为还是存在，但规模也大为缩小。用甲骨来表现神意的事也不多见了，而新的神谕系统体现在《易经》之中并日渐普及，那是对随意选择的几组中断的和没有间断的线段所做的解释。另一个重要的变化是出现了天的概念，这个天被设想成宇宙的神圣道德力量。只有在获得天的眷顾时，王及其王朝才能进行统治。在古文献和铜器铭文中，周天子的统治都是与天连在一起的。如果王忽视他的神圣职责，实行暴政，天就会非常不快，展示不祥之兆，送来自然灾害。如果王把这些警告当作耳旁风，天就会收回成命，天下就会大乱，政治和社会秩序就会出现混乱，此时天就另选他人，将大任另行托付。这样，道德价值观被看作与宇宙运行方式相联系，历史则被读作上天意愿之鉴。在天和人之间，由统治者居间调停，他的德行如何，关系到二者是否相安无事。在商人的宇宙观中，这些思想似乎没有什么位置，周初统治者对其详加解释，作为收服被征服的商民民心的某种宣传。无论其起源如何，在近代以前，这些思想被证明是令人信服的，而且居于中国政治宇宙观的核心。

在周初的文献中，已经详尽地记述了周的三位统治者建立稳固的周政权的丰功伟业。周文王与周围的方国建立了联盟，准备灭商。其子周武王在丰水以东营建新都镐京，并发动东征，击败纣军，攻占朝歌。武王并未将商王族全部处死，他立纣王之子武庚作为商王畿名义上的统治者，以续殷祀。武王在灭商以后六年英年早逝，其子尚年幼，其弟周公为少年即位的武王之子摄政。周公拓展和巩固了新的版图，他进行了一系列东征，将整个黄河流域纳入了周的领土之内。据说，周公在东征中征服了50个商的属国。他在现在的河南洛阳营建了新都洛邑，目的在于加强周对东部领土的控制，他还将商的贵族迁徙到新都居住。武王之子成王长大成人后，周公就还政于他，并成为成王最忠顺的臣下。这三位周初统治者因此而变成象征性的人物，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建立持久的、稳固的政权所需要



陕西凤雏的夯土地基遗址可以让考古学家复原出周初宫殿或寺庙的平面图。其建筑面积为145 × 105英尺，中间的主厅为56 × 20英尺，整个院落的整体风格是后来中国建筑中颇为典型的。

的领导才能和品质：有勇有谋、治国有道、忠诚。

兼并周外围的方国部落的过程是缓慢的，并非一帆风顺的(昭王在南征撤兵途中，在现在的湖北境内遇难)。周初统治者并不试图直接统治周的所有领土，而是派出亲属或可靠的大臣率军去被征服之地建立有城墙的要塞。在那些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地方，他们承认当地的酋长作为他们的代表，这些诸侯被赐予爵位，爵位可以继承。对于周王，他们有提供兵役、缴纳贡赋的义务。但周王并未将所有的权力都分配出去，他也建立了一个中央的原始官僚管理体制，更广泛地利用文字记录。而且，周王还拥有一支王室军队，他们与诸侯提供的武士并肩作战。

亲族及其相关的祭拜仪式把诸侯与周王相互联系起来。周王称“天子”，拥有在都城祭天的特权。他也像商王那样主持祭祀王室祖先的仪式。诸侯也举行类似的祭祀仪式，既祭祀其封地的第一位诸侯，也祭祀他们的近世祖先。由于同姓不婚，所以周王和姬姓诸侯只能同异姓诸侯通婚，这实际上是通过父系的亲属关系或姻亲关系把所有的贵族上层联结了起来。在这些贵族中，忠诚和勇武很受尊崇，顺从、虔敬和孝悌等家族伦理观念也很受重视。

上图　青铜不仅用于礼器，而且也有许多实际用途，比如制造武器和甲胄。这顶周初的头盔大概是用于战争的，因为它是在北京地区某遗址中的一批武器旁边发现的。

到公元前800年，西周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中25个封国较大，具有重要地位。在封国中，诸侯之下又有许多卿大夫，他们职掌祭祀、行政或军事。这些职位和相应的头衔也渐渐变为世袭。这样，每一个诸侯国中都有这样一批贵族之家，他们继承职位和相连的封地。社会也是完全按照等级制设计的，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宫廷侍从等诸多等级。最后，普通农民似乎一般都被束缚在封地上，处于类似农奴那样的地位。

在周的周边和周统治区当中，散布着一些不服从周的霸权地位的非华夏族。研究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国学者，把他们划分成四个族群：聚居在现在山东一带的夷、聚居在长江流域的蛮、居住在北部边境一带的狄，以及聚居在现在陕西境内的戎。这些外族人不一定是原始部落民。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存在着一些独立于周的政权楚、吴、越，他们的首领自称为王。但到公元前8世纪末期，他们承认了周天子将他们作为周的封建格局中的边缘部分。

周的艺术与商的传统迥然相异。早期大型的青铜礼器继续大量生产，它们也许就是由那些曾为商朝统治者服务的工匠制作的。然而，在商朝开国一两代的时间内，商青铜器的主要母题——动物面具或饕餮几乎消失了。随着纯粹修饰性饰纹的出现，鸟状形象越来越重要，比如穗状纹和绫纹。当仪式在众人面前进行时，由于穗状纹和绫纹十分醒目，这些礼器从远处就可以看见。同时，青铜器渐渐被当作文献长期保存的载体，这表明青铜器在制造时就被看作传家之宝，凝进了通过它们对祖先或后代产生影响的想象。

中国最早的诗歌产生于周朝早期。《诗经》305首中，有许多首可能就是在宫廷进行重大庆典时所吟唱的，一些是庆祝周初统治者的伟大功绩的，另一些是歌颂祭祀时的庄严肃穆的，在诗歌吟唱造成的庄严气氛中，子孙向祖先供上食物。有



刻有铭文的青铜礼器，出土于陕西扶风的一个窖藏坑。铭文共284个字，为公元前900年前一点由史墙所做。内容与从文王到穆王的六个王统治期间的大事有关，比如对各“蛮夷”的战争，还有史墙自己的祖先服务于这些王的事迹。

一首宫廷颂歌对妇女参与政治和政府事务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

> 哲夫成城，哲妇倾城。
>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
> 妇有长舌，维厉之阶。
> 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

《诗经》的另一些诗歌看来来自民歌，这其中包括情歌和描写普通人劳作的歌，比如清理田地、耕种、采桑和纺织等，也有对征税者和沉重兵役的怨恨。一首情歌里有这样的一节：

> 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
> 岂敢爱之？畏我诸兄。
> 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

一首怨诗里有这样一节：

>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
> 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这样的诗歌让我们想到，生活在古代中国的远不只是国王、武士、卜者和铜匠，在那时及以后，农民才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在田里辛勤劳作，努力创造幸福的生活，但却受制于武力震慑下的苛捐杂税。

古代中国文明的大多数基本要素并非中国所独有。在世界的许多地方，人们发现动植物得到早期人类驯化的证据，所以认为农业是起源于一个地方、然后通

过人口迁移和思想扩散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关于宗族与宗教的基本思想——比如按男系继承、用动物或人向神或祖先献祭，还有关于社会秩序的基本观念——比如把战俘沦为奴隶、王位的兄终弟继或父死子继，都是相当普遍的跨文化的东西。把这些现象归结为共同的人类心理而非文化接触，似乎是合理的解释。

在世界历史上，向复杂文明、向促成人员大规模协作的思想、艺术的飞跃，并没有一条共同之路。文字书写、金属冶炼术以及强大的兼具神职身份的国王，一齐出现在几个古代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河流域、中国和墨西哥。人们一般认为，美洲文明的起源一定是独立于亚洲文明的，而古代近东文明则是相互影响的。但中国如何呢？它完全是自行完成这项飞跃的吗？或者是近东的某些发展的观念跨越了欧亚大草原，刺激了中国、或在中国引发了类似的发展？这些类似的地方是否都是社会-政治-技术发展的共同结果，或者有些是扩散的结果？多数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认为，他们的祖先向外学习的越少、他们自己发现或发明的越多，就越是中国的荣耀。他们指出，新石器陶器上的符号可能是文字系统的早期，以此反驳某种认为文字背后的思想(那些符号可以显示字词)有可能是一些无文化的民族从大草原的另一边辗转带过来的观点。他们强调中国铜范的独特性，是为了批评这样的观点即导致冶金术的思想(即岩石可以被熔化成为强度很大的可冶炼的物质)可能是以同样的方式传过来的。他们也不注意小麦、木轮子战车、驯化的马和复杂的弓，有自西亚传来的极大可能性。

在把中国尽可能地塑造成一个独立文明的爱国主义努力的背后，隐藏着关于文明价值的主张，而这主张是令人怀疑的。如果古代的中国人因为害怕精神污染而拒绝接受有用的但却是间接学来的思想，那么他们也就不那么值得赞美了。在任何重大的意义上，中国文明都显然不是任何古代中东文明的一个分支，因为它的语言文字、宇宙观和艺术都是十分独特的。然而，让中国文化成为世界上伟大文明之一的，不是它的孤立隔绝或纯粹单一，而是在古代相互联接的思想、社会组织、工艺和技术的组合方式，它赋予了中国成长、适应和扩展的能力。

青铜器上的人兽图案

古代中东的艺术，比如埃及、亚述和巴比伦的艺术，表现农业（驯化了的动植物）和社会等级制度（国王、僧侣、犹太法学家和奴隶）的十分常见，正符合我们对那些王国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理解。这样，在商代艺术中，野生动物的形象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商代青铜器上的动物形象，从明显模拟的、凹凸不一的鸟、蛇、鳄鱼和鹿的图形，到想象的动物龙，再到高度风格化了的饕餮图案，后者实际上是在描绘一种动物，但却不是如实描绘。青铜器上的人形很少见，即使有，也一般是与动物图案同时出现的。由于青铜器是祭祀仪式的食器和酒器，所以多数人推测，这上面的纹饰象征着商代政治和宗教宇宙观中的某些重要成分。不幸的是，只是在相当晚近的时候，才出现了讨论那些图案意义的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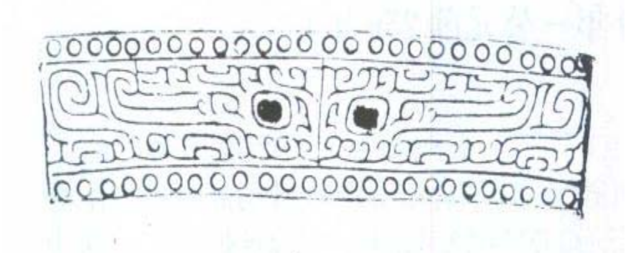
上图是在山东苏埠屯的晚商墓葬的入口坡道处发现的铜钺（13 × 14 英寸）。它可能是用来杀人牲的，因为在此墓还同时发现了48具人牲。铜钺的正面为孔饰，与更标准的饕餮形有相似之处，但同时也像人。

一些动物图案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可能的意义。有时候人们会在死者的嘴中发现玉蝉，所以青铜器上蝉的图案就容易被解释为在祖先灵魂的王国中唤起再生的形象，正像蝉在现世以前要在地下度过很多年一样。对于许多人来说，鸟同样暗指信息传递者。这种观念认为鸟能够与其它领域沟通，特别是与空中的领域进行沟通。

更有疑问的是最常见的饕餮图案。有些人认为它是怪物，可以用它那可怕的形象吓走邪恶力量。也有些人认为它是龙，龙的巨大力量导致人们更积极的联想。有些人认为它是用于仪式的面具，也有些人认为它继承了良渚新石器时期玉器人脸状的图形。还有许多人只把这些图形视为图案。通过追溯饕餮在整个商朝的演化过程，可以显示，晚商时期生动的、极像动物的图形，是如何从商代早期的由细线和点组成的图案演化而来。也许，饕餮只是和商王以及他们的统治秩序有关系，它作为权力的象征受到崇敬，专注于认同，而不仅仅只表现与真正的或想象中的动物存在的某些联系。

商代图形中多用动物（比植物多得多），那些希望在这一事实中寻找重大意义的人，试图将其与牺牲、图腾崇拜及萨满教相联系。因为这些动物被屠宰后是作为供品用于祭祀仪式的，所以由此也就引出了争论。仪式中所用器具上的纹饰可能暗示着死者造成的食用、杀戮和变形。有人指出，古老的部落或氏族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奇特的动物（图腾）的后裔，并对这些奇特的禽兽加以崇拜。因为在商代青铜器上，人和动物有时是同在的，所以使人怀疑它与萨满教有关。就好像后来亚洲北部和华南地区的情形，萨满们普遍利用动物作中介，帮助他们与神界进行交流。根据这种解释，青铜器上那种动物嘴中噙着人的图形，暗示着萨满们屈从于那些在他们神灵附体时，帮助他们的动物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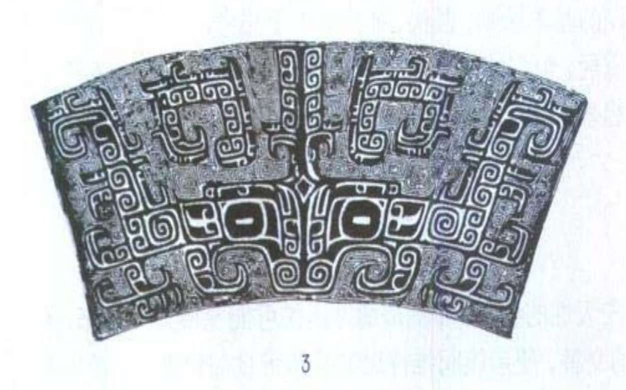
毫无疑问，古代中国与晚近些的中国有颇多不同之处，而且这些解释可以相互并存。在那些图案中，还有相当多细部的差异，都可以表明动物和人的形象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具有不同的意义。甚至在晚商时期，饕餮对于南方的艺术家来说，并不像安阳商人那样对它有特别的兴趣。但是，可辨认的鸟兽图形在南方的激增表明，它们具有安阳地区的饕餮尚未普遍具备的特殊意义。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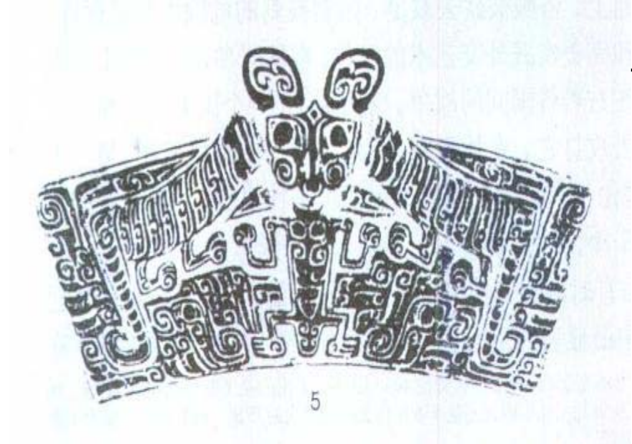
2



3



4



5

左图 商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拓片。

例1至例4是来自商代中部遗址的，按年代排列；例5来自更西面的四川省。正如例1到例4所展示的，饕餮图案逐渐从简单的线和点演化成高高的浮雕和更为突出的眼睛、角和爪，而不是从更像动物的样子向更抽象发展。而最后从四川地区选取的例子，其图案处理与前者形成鲜明对比，这表明两个地区的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异。



上图 在这件13英寸高的商代青铜礼器上，人与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它形似熊或虎，口大张，姿势是吞咽一个人。这人似乎一点也不在乎，紧抱着兽，就像孩子紧抱着他的母亲。在其左右和后面，还装饰着其它动物，有鹿、蛇、牛和龙。

第二章 哲学基础：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中华文明的思想基础是在东周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建立的，那是一个政治上分崩离析、道德上危机重重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前半段一般称之为春秋时期，得名于一部叙述公元前722年到公元前481年的编年史。在这几百年中，周天子统治依旧，但作用逐渐式微。他下面的诸侯相互征伐，忽而结盟，忽而绝交，交换人质，战乱纷起。随着时光流逝，军事冲突日益频繁和激烈。这一时期的后半段通常被称之为战国时期（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①，那时周天子已退居其次，那些小国则被6个最大的诸侯国逐一占领和吞并。

尽管区域性强国之间争夺的残酷性总是令人悲哀，但却有利于社会、科技和经济的发展，这其中便包括了铁器的铸造，步兵、铸币、土地私有制的出现以及社会流动性的增加，新的思想观念也大量涌现。那些为国君就国家大事出谋划策的人，开始分析人类社会和自然秩序的基本原则。很快，那些最善于思考的士人便对业已形成的设想和价值观提出了质疑，他们的说法开始被记录下来，辑录成册，流传于世，这使学术讨论空前热烈起来。

周晚期用作铸铁刀的铁范。在欧洲，锻铁先于铸铁，但在中国一开始就有铸铁。商代的青铜礼器一次铸一件，是主要的艺术品；相反，铁工具的铸造构成了集体生产的一种形式。

大国争霸

西周的分封制存在一种先天性的危险，那就是地方诸侯可能变得强大起来，不再听从周天子的指挥。世代的交替，使亲族间维持忠诚的纽带日益松弛，诸侯坐大的这种危险就变成了现实。公元前771年，西戎与诸侯联手杀死了周天子。周天子的长子被扶上王位后，为了安全起见，把都城从渭河流域东迁到了现在的洛阳，其位置在黄河以南，处在中部平原的心脏地带。中兴的周王室再也没能完全恢复它对其封国的控制，中国也进入了一个长期缺乏中央集权的时期。作为天人之间的媒介，周天子还有仪式方面的功能，但在军事方面，即使是他的封国，也比他这个宗主国的力量强大。到公元前335年，地方诸侯开始自立为王，从根本上否认了周天子的宗主地位。公元前256年，周天子最终被废黜②。

东周是一个充满了暴力的时代：胜利者将敌人的耳朵割下来献到祖庙；战俘的鲜血被涂在典礼所用的鼓面上；盗贼被砍去双足；国君被刺的危险也总是存在。但这同时又是一个认真钻研和完美实践外交艺术的时代。春秋时期，具有骑士风度或谋略家风格的行为模式仍左右着各国间的战争。举例来说，一个国家不会在另一个国家哀悼其新丧国君期间去攻打它；在战争中，如果一方正在排兵布阵，另一方也不会乘机发动攻势。也许是由于害怕遭到战败国国君祖先神灵的谴责，战胜国尽量不把对方王室的成员屠戮干净，至少要留下一个继承者来延续香火。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国君有时能使其他诸侯国承认自己的霸主地位，承认自己是各诸侯国联盟的盟主。其中最显著的是齐桓公（公元前658年－公元前643年在

①关于春秋、战国的分界线，目前史学界尚无定论。作者以公元前403年为界，采用的是《资治通鉴》的划分。国内学者一般采用《史记》的划分，将周元王元年即公元前476年作为战国时代的开始。另有以公元前453年"三家分晋"为分界线的。——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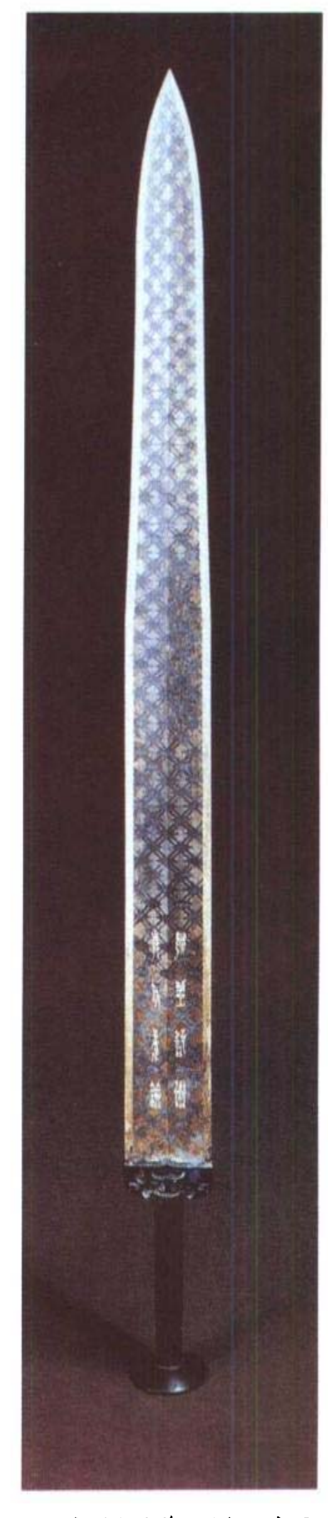
②是年秦灭西周，赧王死，秦取九鼎宝器。至此，东周君主犹存，但不再称王，史家遂以秦王纪年。——译者注

位）。他在贤相管仲的帮助下，通过铸钱、平抑物价、管理盐铁生产，建立起了齐国的经济霸权。他还联合中原各国一起去讨伐长江中游的、处于半蛮夷状态的楚国。在与中原各国订立适当的共同防御盟约的同时，他还组织各国防御北方少数民族的侵袭，并迫使楚国签订盟约，同意向周天子朝贡。

由于建立联盟的需要，各诸侯国国君时常让自己的儿女与其他诸侯国的王室通婚。这种通婚使他们在其他国家的王位继承权的争夺中占有一席之地，这在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当时是稀松平常的事。国君时常通过不断纳妾来显示自己的实力与财富，于是就有了同父异母的许多个儿子。在理论上，继承者首先是嫡长子，其次是嫡次子；如果没有嫡子，再考虑由庶子来继承。然而在实际运作时，一国之君或权臣之族可以根据其喜好，来挑选他们认为合适的庶子做继承人。这使得各王子及其各自的母亲诡计百出，以求恩宠。这也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感受，即妇女不能持一种公正的、更远大的眼光对待国家的政治。而这种继承权的争夺，为讲述这段历史的《左传》提供了翔实的材料。那些未被指定为继承人的子嗣通常被封以偏远地区的采邑和职位，他们在那里有机会建立起自己的势力基础，并且依靠武力去抢夺继承权。即使是那些最安分守己且忠诚于法定继承人的王子，也面临着被诬叛国的危险，他们不得不逃亡他国，以避免杀身之祸。如果可能，他们大多选择与其母、其妻或其姐妹有关的国君，这些庇护国的人经常乐于帮助他们，并对由此可能招致的邻国的挑衅毫不在意。

各国的统治中心都位于有厚厚土墙保护的城市中，这种土墙早在商代以前就在华北出现了。围墙中是王宫及王与臣子的宗庙所在。有时城外还有郭，那是为了保护生活在内城外的工匠、商人和农民而修建的。对这一时期军事对抗的描述，充满了围攻有墙要塞的内容，包括爬城墙、攻城门的场面。随着攻城技术的日益完善，城墙的修筑技术也在稳步提高。大量的文章都描述了围攻技巧、军事艺术和战略的其他方面，而古代文献中的此类记载也是连篇累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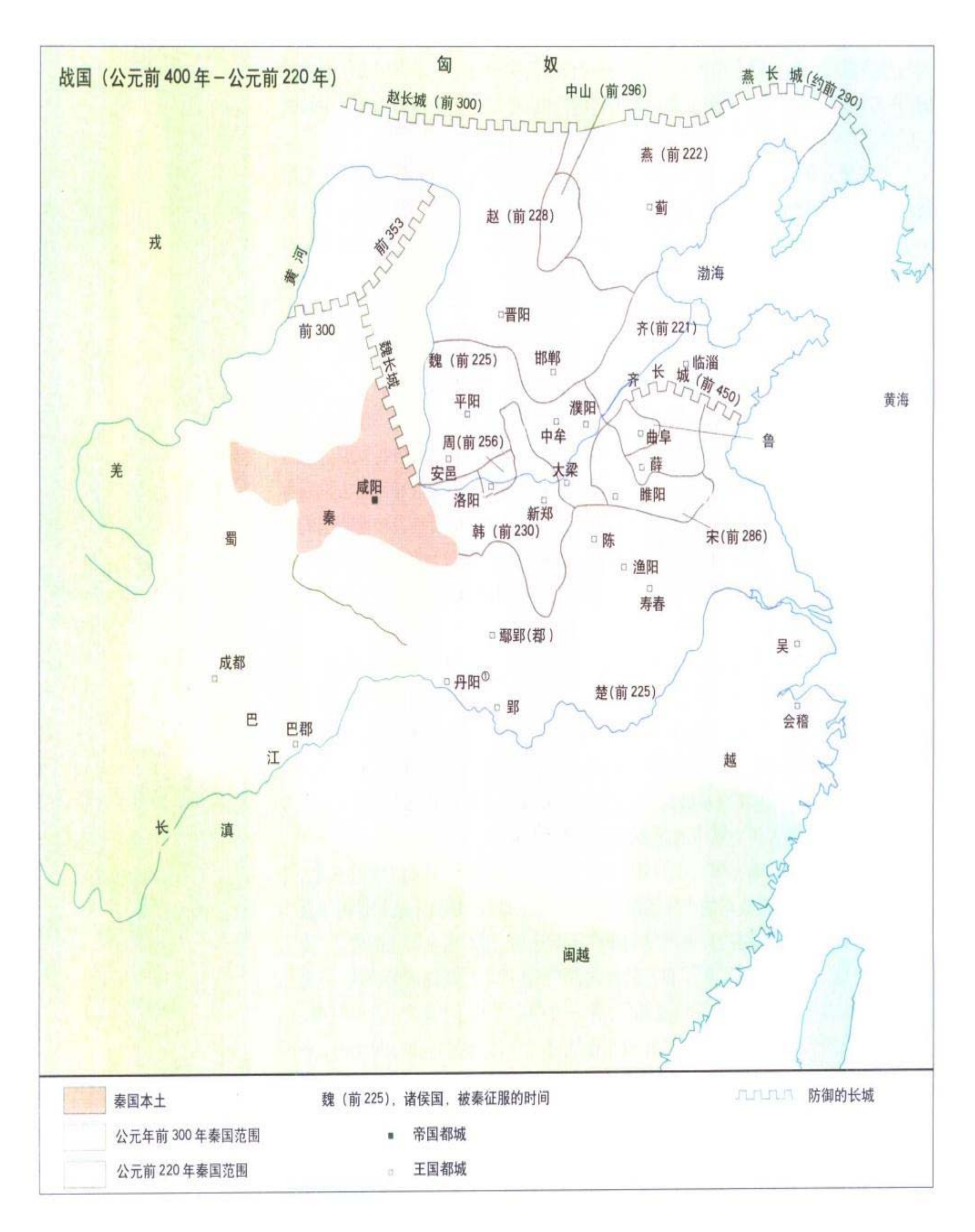
不断的征战刺激着军事技术和各种工艺的进步，这改变了战时的社会关系，并使它日益走向消亡。乘战车的贵族逐渐被骑兵和步兵取代。骑兵术最初是由华夏本土以北的非华夏族来完善的，那时他们正在不断迁移，过着完全游牧的生活。为了自卫，位于北方的晋国发展起了自己的骑兵，并迅速被华夏其他诸国仿效。养马和牧马也开始成为备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一直存在了成百上千年。这一时期，也引进了训练步兵的战术，它被证明比战车作战更具威力。到公元前300年时，各国已拥有数以万计的精选步兵，其中也加入了一些有经验的武士。一旦用强有力的新式武器——弩武装起来，农民也能成为有战斗力的士兵，他们射出的弩比使用轻弓的骑兵射得更远。这种弩的扳机是一种只有熟练的工匠才能造出的青铜构件。



直到公元前7世纪，中国的文字资料才提到双刃剑。在湖北省望山出土的这件样品上的铭文，说明它属于越王勾践（公元前 496年–公元前465年在位）①。勾践是一位著名的宝剑鉴赏家。

由于胜利总是属于那些能够召唤和装备最大规模的军队、动员最大量的劳动力去修筑防御性城墙的统治者，所以那些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们开始为如何增加其人口和赋税而操心了。为了开垦新的土地，人们排干沼泽，建立了灌溉系统。农奴制逐渐衰落了，因为统治者希望奖励通过农耕而直接使用他们的劳动力。统治者热心于贸易，而且开始铸币，这迅速替代了用帛作为交换的单位。冶铁技术的引进也有助于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7世纪，铁矿得到开发，在一二百年内，铁被广泛用于农具和武器。到战国晚期，大炉主可以雇佣200多工人，而铁器商人在那时崭露头

① 越王勾践的在位时间应为公元前497年－前465年。——译者注



上图　在战国时期、周初的各个封国逐渐变成独立的政权。随着强大的诸侯国不断征服和兼并邻国，封国的数量迅速减少。在北方，晋于公元前453年分裂为赵、魏、韩，齐在东方，楚在南方，秦在西方，成为最强大的几个国家。楚在公元前334年灭掉了越，在公元前249年灭了孔丘的老家鲁，但在公元前221年最终统一了各国的是秦国。

1 丹阳疑为夷陵之误。——编者注

角的富贾中名列前茅。

为了加强对人民和土地的控制，统治者也尝试着新的统治技巧。他们越来越多地委任自己的官员，而不是把权力交付给世袭的地位较低的领主。这种向中央集权制发展的趋势，为那些处在旧的贵族体制下层的人的晋身创造了机会。这些人的彼此竞争，使统治者可以不断获得能干和忠顺的下属，而统治者之间对能人的争取，意味着有雄心的人可以被选择来任职。

边境上的各国——北边的晋、东边的齐、南边的楚、西边的秦——在争夺霸主地位的斗争中得天独厚，因为它们可以向外扩张。它们向外拓张之后，转而向内，很快就征服了它们之间的一些中原小国，每个领主都渴望成为大霸主。到公元前300年，只有7个国家幸存下来。显然，只有在一个国家扫除了其它敌对国之时，这场争斗才会结束。

统治者希望寻找生存或优胜之路，甚于希望保护才智之士。由于诸侯国纷纷被灭，旧贵族不得不四处寻求栖身之处，野心勃勃的统治者们或显宦之家就得以把他们招揽在自己的身边，充作幕僚、谋士、助手、师傅或门客。这些人向统治者提出建议，并为各自的主张相互辩难。这一过程，也推进了辩论演讲术、兵法之学和逻辑学的发展。各位大师的教诲被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四处流传。这一发展促成了各种思想流派的出现，因为文本的存在既易于在门生中把观点固定下来，又易于引起其他大师的辩驳。对此时期的传统概括是：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概括适当地捕捉了这个时期丰富的思想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已被证明是晚周最重要的精神遗产。





早期的货币，如这些周代的铜币，被铸成刀形或铲形，便于贯穿的圆形方孔 钱后来成为中国货币的主要形式。

孔丘及其弟子

最早而且重要的自诩为师的就是孔丘（一般认为他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 551年－公元前479年）。他出生于现在山东省的一个小国、周公的封地鲁，而且在鲁国宫廷中待了若干年，但没有什么影响。此后他便带着学生周游列国，寻找能够接受他主张的国君。他发现的情况颇令人沮丧，很多人都是贪婪、不诚实、不负责任、对他人的需要和利益漠不关心。因此，他决心要推动人们去施仁，他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的第一位道德哲学家。他把道德行为与传统的角色和等级相联系，因而成为周朝制度的伟大维护者，而这制度在那时已经衰落。他很同情那些廷臣中的“饱学之士”，他们要帮助国君行使礼仪，比如对祖先的祭礼和对来使的接见之礼。这些饱学之士了解天，可以在制订历法上献计献策；他们可以占卜，并解释占卜的结果；他们会保存文献记录，用一些先例来建言。按孔丘对周初的看法，这些饱学之士和其他人——君与臣、贵族与平民、父母与子女、男与女——都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赋予他们的部分，并把他们自己奉献给了他们对于别人的责任。因此，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行为受惯常制度支配、等级差异导致和谐互助的社会。

按照孔丘的道德观，对他人的意图和行动至少应该同对神和祖先的意图和行动同样重要。他赞美孝道——那是子女对父母的虔诚和尊敬。孝道对他来说既是一种仪式，也是一种态度，约定俗成的行为应该得到激励。此外，孝道向外扩展到家庭以外，因为社会在书面的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一个大家庭。然而在孔丘的语汇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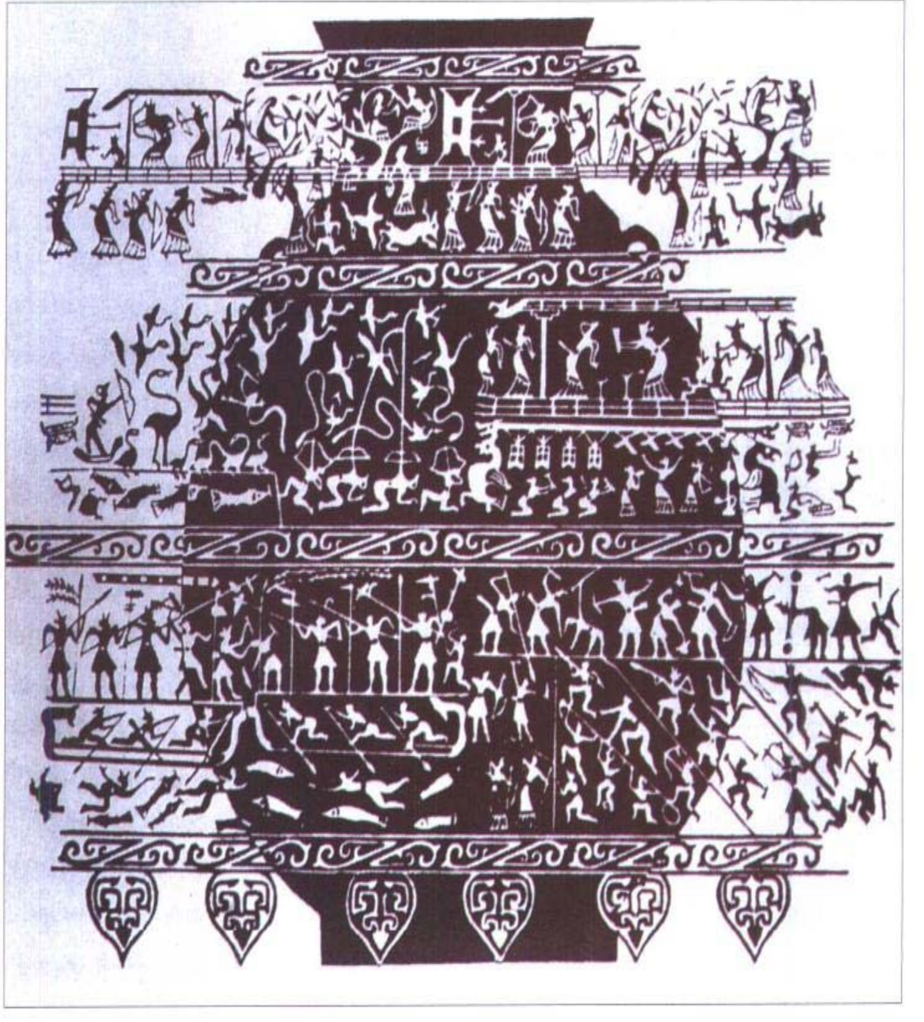
最高的道德还是仁，这个仁字有各种各样的译法，比如至善、仁慈、博爱、互爱、有良心和高尚。它需要深深地关注他人的幸福，是一种使正当行为变得容易的取向。仁可以普施于众人，因此是一种没有孝道之等级尺度的美德。

孔丘显然是个异乎寻常的教师。由于他被尊为饱学之士，所以人们就去向他请教，许多人留下来随他学习古代的传统。然而，他仍然希望在庙堂之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也准备让他的弟子在国务方面一显身手。为了这个目的，他鼓励弟子们掌握令人尊敬的传统文献，特别是《诗经》、《尚书》和“三礼”。的确，传统上人们认为正是孔丘编纂了这些经典。

孔丘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于儒家思想的最后成功是贡献了力量的。名留青史的一个重要的继承者是孟轲（约公元前370年－约公元前300年）[①]，他曾跟随孔丘的孙子学习过。孟轲仿效孔丘，周游列国，向诸侯提供建议。他请国君留心天命，并当面告诉他们：如果统治不当，天会让臣民反对他，将把他赶下王位。他让统治者注意，让百姓丰年餐餐足食，灾年免于饥馑，是他们的责任。

《孟子》的首篇记录了孟轲见梁惠王（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19年）时，梁惠王问他利国之道的问题和他的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在其后的对话中，孟轲告诉梁惠王，如果他能减税轻刑，待民以善，人民就会渴望为他而战，即使手里只有削尖了的棍棒，他们也会击败强楚暴秦

战国时期一件镶嵌在青铜酒器上的装饰性线描，刻画了人们作战、狩猎、划船、祭祀、奏乐、烹调等行为。是周代晚期艺术的一种新风格。



① 孟子的生卒年代不详。除了作者此说外，还有公元前385年—前304年和公元前390年—前305年之说。——译者注

那装备精良的军队。

孟轲不仅关注普通百姓，也比较关心士大夫，他觉得国君应该尊敬后者，按他们的爵位赏俸。他认为，世袭贵族的地位应比那些因军功而被提拔的人高，同时希望这些贵族要与国君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在与他的弟子、信徒们的对话中，孟轲对政府以外的东西颇感兴趣。他就道德哲学中的抽象问题进行争论，比如人之初的本性，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和趋向等。孟轲强烈地持一种积极的态度，强调人性中潜在的善。他认为“性善说”可以在人对他人受难的自发的反应中找到证据：“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自动援之以手，而不考虑个人利益。孟轲的思想对手告子曾争论说，“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孟轲则不同意，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正如水向上流是由形势逼使的一样，人也可以被怂恿干坏事，但这不是它们的自然倾向。在另一次对话中，孟轲使用了另一个本自天然的类推。他说，牛山曾经植被丰茂，但却因农夫放牧和伐木而致使其荒芜，可是某个看到这种情况的人会想，这本来就是荒芜的。这个故事暗示，大多数人的不当行为对他们自身来说，就像光秃对于一座山一样并非自然。

记载孟轲思想的书《孟子》就像记载孔丘思想的《论语》一样，是一部思想家的对话录，并不是按某种特别的次序编写的。他思想中的矛盾留待读者去解决。其次一位最有影响的儒家思想家是荀况（约公元前310年－约公元前220年）①，他的思想以更为连贯有序的形式留存下来，因为《荀子》一书基本上是他所写的一系列论文。

人牲和“陪葬”的衰微导致用婢仆偶像作为替代物置于墓中。对此，孔子曾用赞扬的口气提到。这具彩色的木制女像出土于河南省昌台关的墓葬中，属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4世纪之物。

与孔孟相比，荀况有更多的政治和行政管理经验，考虑到了统治者在试图以礼和德进行统治时面临的困难。同时他又是个大胆的思想家，他把孔孟仅勾画出轮廓的许多思想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拓展。比如说，“子不语怪力乱神”，而荀况却以一种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宇宙观，仔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天是公正的，人事取决于人自己的努力。求天或求神是没用的。他说，为什么祈雨后就会下雨呢？依我之见，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因为你没有祈雨时也会下雨。

荀况还对礼仪的问题兴趣浓厚，因为他在行使礼仪的实践中看到了美和社会利益。他相信，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继续实行传统的礼仪，如做重要决策前要占卜，遇灾的时候要祈祷，即使他们知道他们的行为不能达到那种虚幻的目的，也要如此。他主张，礼仪是宝贵的，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有序的方式，来表达感情、满足愿望，同时还可以维系等级、头衔和荣誉的差别。正如音乐形成了人们的情感，创造了和谐的情绪，仪式和礼节形成了人们对职责的理解，创造了社会的差异。为了为礼仪辩护，荀况大概对下面即将讨论的道家和墨家的攻击进行了回应。

荀况直接抨击孟轲关于性善的观点，认为正相反，人的先天取向是捉摸不定的，是需要雕琢才能成器的，他把生而知之的和学而后知的东西加以区分。“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是人之所生而有也。”大多数值得赞美的言行都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后天受教育而成的。他说，子从父，弟从兄，或子为父、弟为兄服其劳，这些行为都是违反其天性，与其感情相悖的。但这是孝悌之道，是人们

① 荀况的生卒年代不详。一说其生活的年代约为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译者注

《论 语》

我们了解孔丘的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弟子在《论语》中记录下来的他的言行。在这部不长的、结构松散的文献中，孔丘讨论的与其说是神灵的世界，不如说是家庭和国家的世界。因此他思想的要点与其说是理论的、形而上的，不如说是伦理的。他试图讨论具体的状况而非普遍的原则来证实他的思想，而且没有使用古希腊人发展起来的形式逻辑，即用以衡量论断有效性的三段论之类的公式。

《论语》为中国的社会、政治和伦理的主要思想提供了基础。它成为后世的圣书，要求学生必须背诵，因此它的许多段落成为语录，甚至没有文化的农民也会不知不觉地引用。

以下选段保存了最初的格式：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殁，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第1篇 第11段）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第2篇 第3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第2篇 第4段）

子曰："君子不器。"（第2篇 第14段）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第3篇 第17段）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第4篇 第16段）

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第4篇 第17段）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第4篇 第18段）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第7篇 第5段）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第7篇 第19段）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第12篇 第2段）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第12篇 第7段）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第13篇 第2段）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第13篇 第18段）

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第15篇 第1段）

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第15篇 第9段）

子曰："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第15篇 第18段）

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第15篇 第30段）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第16篇 第7段）

应当遵从的礼仪与道德的准则。

在周代晚期数以百计的孔子信徒当中，孟轲和荀况是最有名的两位。有些信徒或成为礼仪方面的专家，或成为古代经典的大师。历史地看，强调道德自我完善的一派是值得特别注意的。《大学》和《中庸》是佚名作者的两篇短文，它们简明而咄咄逼人

地表达了这些看法。如果不首先对人民加以改造的话，就不能达到国家的大治。一个国君只有修身才能齐家，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只有治国才能平天下。换句话说，人只有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他人，改造世界。

道家

孔丘及其信徒都是些积极的人，他们相信政府会有益于民，感到应该应召去做力所能及的事，以使政府好好工作。那些被称之为道家的人却不接受这个基本假设。他们捍卫私生活，希望统治者无为而治。他们试图超越日常的关注，而让他们的心灵在更为虚幻的生活内容中漂浮。他们并不把人类置于宇宙的中心位置，为人类发明将打乱万物的自然秩序而忧心忡忡。他们更愿意提倡"道"，这是一种不可分割的、不可言传的非物质的力量或能量，是现存世间万物的本源。

我们关于早期道家的认识，主要是基于传下来的两部书《老子》和《庄子》。《老子》也叫《道德经》，一般把它归为老聃（公元前6世纪）所作，但也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编成的。这部杰作言简意赅，富有诗意，可以用许多方式加以解释和翻译。其中那个循环往复的主题是对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偏爱。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所有对立物的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是另一个被他们经常反复强调的主题："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这些思想的一层含义是，几乎任何有意的行动都会适得其反，统治者应该让人回到无知而满足的自然状态中：

> 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智，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老子》主张，如果人民知道的事情少，如果他们放弃工具和文字，如果他们不愿旅行或者作战，那就好了，他们就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而不嫉妒自己的邻居。

道家的另一部重要文献就是《庄子》，其中的大部分大概是由哲学家庄周即庄子（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①所撰。庄子的许多思想与《老子》相同，了解无用的有用和普通差异的相对性。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为精神的自由兴高采烈。他讲述了一件与楚王使节见面的事情——楚王答应让他去治理一个地方，他却问那使节，一只被奉为神圣已3000年的乌龟，是愿意死而尸骨得到崇拜呢，还是在泥沼中拖着尾巴活着呢？在得到他预期的答案后，他请那使节离开：他宁愿在泥沼中缓慢地爬行。

庄子是一位能打动人心的作家，他的书中充满了闪烁的幻想、寓言、历史人物的离奇遭遇，包括引人发笑的对孔子及其弟子恶意而滑稽的模仿。老子关心保护每个人的生命，但庄子却构想人在宇宙中位置，这会使人安于死亡。我们如何会相信生好于死呢？人们害怕他们不了解的东西，但却喜欢一个被俘虏的女子被迫成为王的小妾，他们可以学着去热爱曾让他们害怕的东西。一个朋友看到庄子在妻子死

① 另有庄子的生卒年代为公元前365年—前290年一说。——译者注

后不是哭泣而是歌唱，甚为惊讶，庄子却解释道：

> 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慨！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人且偃然寝于巨室，而我嗷嗷然随而哭之，自以为不通乎命，故止也。

庄周的生死观影响到了他的政治观。在一则寓言中， 他让一个车匠自豪地告诉齐桓公，书是没有用的，因为所有书的内容不过都是人们早就丢弃的废物，桓公让他做出解释，否则就去死，车匠答道：

> 臣也以臣之事观之。斫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真正有技术的工匠并不去分析、推理、甚至牢记他曾学过的规矩；他们总是自然而然地对付面对的情况，这种过程是其他人可以一试的。换句话说，在可选择的行为过程之间所做的合理选择，对庄子来说并不只是意味着了解，还是存在于选择之外的理解方式。

老子和庄子都把道当作关键的概念。与那些把这个字作为人类正确的伦理方式、作为圣王之道的儒家相比，道家用这个字意指自然之道，超越了人类全部理解的道，但却是人类一定要试图遵循的道。儒家因其对人类事务的瞩目而被恰当地冠以人文主义哲学之名，而道家眼中，人类社会仅为全部现实的一小部分。为获得自由和力量，人们一定要了解他们与自然世界的连续性。

法 家

在公元前4世纪—公元前3世纪，小国接二连三地被大国征服，幸存的小国也缩小了统治范围，仍然忙于争夺的统治者积极接纳那些自称懂得权术的政治理论家，因为他们宣称这些权术会使统治者加强其对臣民的控制。这些谋臣认为，强有力的政府并不像儒家宣扬的那样，取决于国君与臣子的道德品质，而取决于建立有效的体制结构。他们的出发点并非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是它现在是怎样的。这些持中央集权论的思想家由于强调法律而通常被称为法家。他们对宇宙论、认识论或个人伦理道德不感兴趣，这些谋略家只专注于对无序的状态提出政治解决的办法，推荐积累权力的技巧。

现存的两部较长的法家文献之头一部，传统上被认为是商鞅（公孙鞅，死于公元前338年）所著。他曾担任秦国丞相，而秦是一个最充分接受法家学说的国家。在战国晚期，秦采取了一系列步骤以使自己成为强大的国家。它取消了贵族制，代之以军功爵制度，以战斗中斩获敌首级数为奖励的客观标准。这样，只有国家能决

音乐

在古代中国的宫廷生活中，音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到天子和诸侯宫廷中拜谒的人都渴望欣赏到有乐师伴奏的歌舞表演。《诗经》中的许多诗歌都是在仪式场合表演的"颂"。

早期思想家相信，音乐具有强烈的道德力量。孔丘对不同音乐做出区分，比如古代的韶乐就被视为积极的力量，可使人和谐，而郑音则很危险，可致淫思。"乐"这个字写来与娱乐的"乐"相同，这一事实使荀况假设二者之间存在联系："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以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荀子也强调，音乐会影响社会各等级的人，因此表演中正平和、严肃庄重的音乐是统治者鼓励民众和而不流、齐而不乱的很好方式。而音乐可以数字表示也吸引着宇宙论学者的注意，他们考虑的是定调的意义及其与其它各种关系的关系。声音作为一种自然现象被视为许多自然过程的例证，特别是对物体在一定距离内相互之间产 生遥远而难以知觉的影响的过程。事实上，在古典西方哲学广泛使用视觉"几何"语言的地方，中国传统更多地使用了听觉的"连通"语言。



考古学家发掘出相当多周代用于宫廷表演的成套乐器。主要的乐器有石磬、铜鼓、类似琵琶的弦乐器、竹笛和从外面敲击的编钟。在曾侯乙的墓葬（约公元前433年）中发现过最大宗的乐器。曾侯乙是在楚国北边即今天湖北境内的一个小国之君。在此墓中有124件乐器，包括鼓、笛、竖笛、排箫、琴、一套32件的编磬和一套64件的编钟（上图）。琴有5弦到25弦的，结构在细微处非常不同；它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地方，可以用于演奏不同的地方音乐。钟上刻有铭文，说明它们的音调，并表明这是楚王送的礼物。钟铸造之精密，表明铸钟艺术已达到极高水平。

定其爵级以及与之相连的特权。秦废井田，立郡县，委任官吏管理。秦吸引别国百姓迁移本国，向新的定居者提供土地和房舍。私有奴隶被废，农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这样普通农民得以摆脱地方贵族的束缚，但作为交换，他们要受到秦国政府的直接控制。国家把所有家庭都组成联保的群体，使每个人都要对这个联保群体内任何人的犯罪负有责任。普通居民还要对国家承担沉重的赋役义务，未获允许不能出外，无业游民和罪犯要去服苦役。

在这部归于他名下的著作中，商鞅对尊崇传统的做法大加嘲讽，劝告国君在努力加强国力的过程中，在机构改革上不要犹豫不决，认为夏、商、周三代的开创者并不怕变，因为智者立法而愚者为其所制，君子变礼而小人为其牢牢控制。对他来说，法就是君主的意愿，只不过君主的意愿被精心地法典化和公正地应用。君主通过规则来控制他的臣民，但他本人却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是韩非子（死于公元前233年）的作品。他起初是儒家大师荀况的学生。在作品中，韩非子从统治者的角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由于“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因此了解一个人并信任之，是个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包括臣下，也包括后妃，后者会考虑到她们儿子的利益。“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妇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妇人，事好色之丈夫，则身死见疏贱，而子疑不为后，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由于赋予臣民追求私利的习性，统治者就不能答应公正而温和地对待他们。相反，他应该让他们不敢揣度君主的意图，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竞争来控制他们。

韩非子认为，儒家关于政府行为应该基于德与礼的观念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等级关系是建立在奖惩力量之上的，仅靠情感和榜样是不够的：

> 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父母之亲也。

韩非子劝君主要持之以恒地严明法纪，赏罚分明，如此则臣民易于驾御，“国富兵强，“而霸王之业成矣”。

儒家总爱把国比作家，把贤君比作仁慈的父母，但韩非子却从他对家庭生活的观察中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此外他还认为，百姓对什么是善的理解程度与婴儿是一样的：

> 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刺之，然犹啼哭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韩非子与其他法家都具有一种极端独裁的秩序观。关于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不存在发表私人看法的空间，因为差异会导致虚弱和无序。法律是统治者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发布的东西，如果加以广泛宣传和坚定地推行，它就会使人民去做他们本不情愿做的事，如努力工作和战斗。秩序和可预言的结果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这样，人民的意见而非统治者的意见，在这种体制中就没有存身之处了，古代的特权或是传统习俗正是如此。在法家的思想中，没有哪条法律凌驾于或独立于统治者的意愿，也没有哪条法律像自然法或神判法在希腊思想中那样，给统治者的行动设置界限。

其它思想流派

鉴于儒家、道家和法家在中国文明中的长期影响，把它们挑出来做进一步的讨论是必要的。但这也还不能完全捕捉到晚周时期的思想活力。除了业已讨论过的大师之外，还有一些沉迷于逻辑难题的诡辩家、提倡遁世思想的空想主义者和隐士、主张不耕者不得食的农家，以及提出关于自然力理论的宇宙论者。军事也吸引着思想理论家，这并不奇怪。《孙子兵法》归之于孔丘的同时代人孙武，其中不仅讨论了战略战术，而且也讨论了如何集中智慧、兵不厌诈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办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阴阳家。阴与女性、黑暗、聪慧、柔顺、消极和虚弱有关，阳则在本质上与上述相反的力量有关，如男性、明亮、自信、创造性、积极和强壮。这些互补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被视为产生自然秩序诸过程的组成部分。而日夜寒暑有节奏的运动导致了阴阳的互动。干扰和失调会破坏这一秩序，其方式就如同不正当的饮食或不合适的休息，损坏了身体的健康一样。

在那些不能被归入儒、道、法各家的大师中，墨翟（活跃于约公元前420年）是个特别有意思的人。他比孔丘略晚，出身社会下层。有证据说他是个为攻防战守制造云梯和其它武器的专家。墨翟喜欢争论，在《墨子》中表现出来的争论风格与其它早期文献中反映出来的有所不同。他摆出评价各种行为和体制的标准：它们运作得好吗？它们对人民有益吗？它们在圣人的言论中有权威的根据吗？它们与普通的经验有关吗？在计算有用性的时候，墨翟把全部人口用作准绳。他反对战争，认为获得领土与丧失性命相比是得不偿失的。为了消除战争，他倡导兼爱，而不只是偏爱亲戚邻居。为了避免争论，他主张与尊长保持一致，而到国君那里，就应该遵循上天的意愿：尊长以为错者，大家都以为错。

墨翟对传统礼仪实践比如守制的有用性提出质疑。他说，赞成和反对延长葬期的人都声称延续的是古代圣贤的做法，因此其间做出选择的唯一方式就是分析这种做法的后果。他认为，守制干扰工作，有害健康，耗竭民力，削弱国力。与以孟轲为代表的赞成职位世袭的儒家不同，墨翟强烈主张以人的能力和价值为封授职位的标准，而无论他是农民、工人，还是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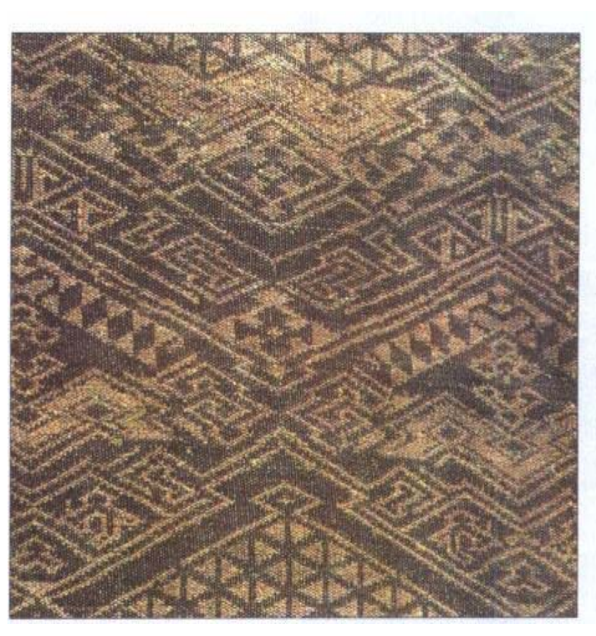
丝 绸

丝绸与中国有特别的关系，到周代晚期，对于中国边境以外的人来说，中国就是一个产丝绸的国度，在所有织品中最有价值的、柔软的、透明的、色彩斑斓、轻而耐久的织品，就是丝绸了。在书面文字具有神圣力量的文化中，丝绸也用于书写。它象征着财富：不仅只有富人身着丝绸，而且从周到千年以后的唐，丝绸还可用做货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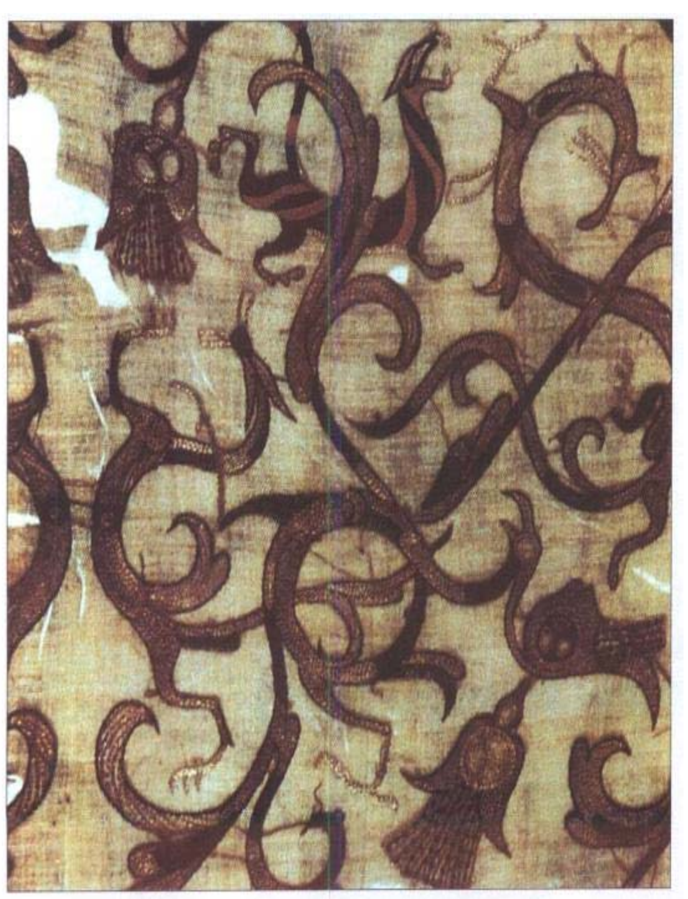
考古遗存表明，中国人在商代就已经织出漂亮的锦缎（图案编织在内的单色织品）和精心制作的丝绸绣品。在华中地区（楚地）的晚周葬中出土了结实的绸布，显示出这一时期丝绸技术已达到极高水平。这些发现中包括多种颜色的织锦，图案漂亮的绣品和镂空的薄纱。图案则包括人物、动物、龙凤和几何图形。

丝绸生产要求种桑养蚕（一种毛虫），蚕是用桑叶喂养的。蚕并不是让它做茧就做茧的，时间和温度都要仔细掌握。在孵化和做茧的那个月中，几个小时就要喂它们一次，夜里也是同样。如果喂养得当，蚕最终会做几天的茧，每个茧可以抽出几千英尺长的一根丝来。大约需要2000多只蚕，才能吐出一磅丝。为了把这些蚕茧做成织品，要把它放在水中煮，再一根根地抽出丝来，然后把若干丝捻在一起，做成较结实的线，这时才可以染色和纺织。

从养蚕到作茧、缫丝，及把蚕茧变成丝织品，蚕丝业的全过程在传统上是与妇女相联系的。"男耕女织"这个词概括的劳动分工，可以追溯到周朝或者更早。



上图是发现于湖北麻山的公元前4世纪墓葬中的三色图案丝绸。这块织品织得很密，每英寸有330根经线和100根纬线。



左图　一块绣花绸纱的细部，取自与上图同一墓葬中的礼服。流畅的曲线构成的图案结合了龙、凤和虎的形象，一排排均匀的圆链状线圈被用来镶边和填充颜色。

国家与民族认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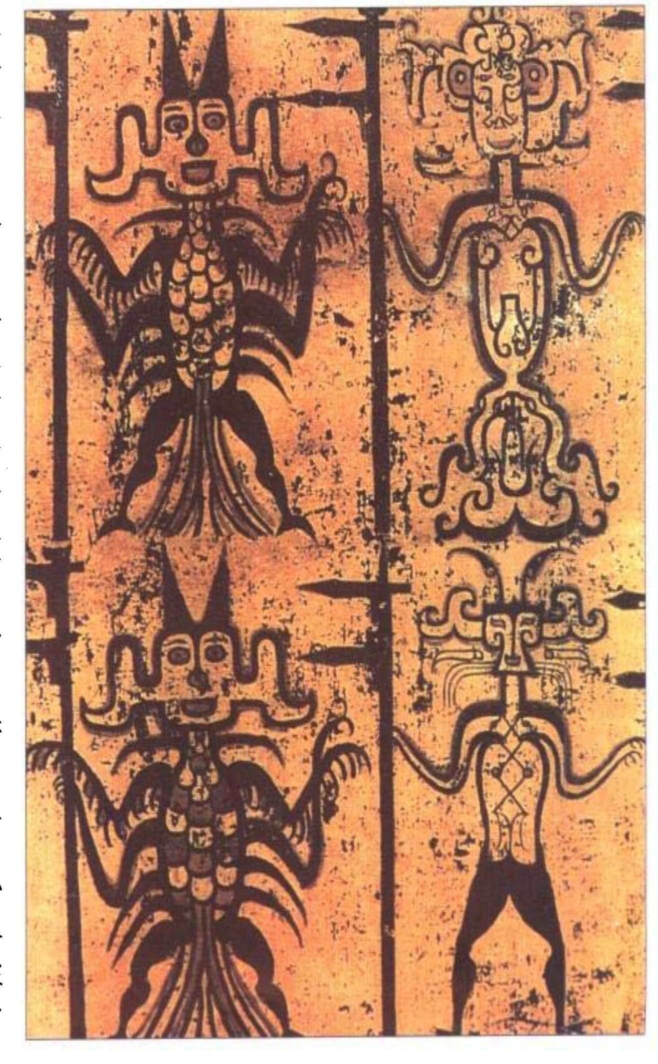
也许因为周代晚期是个分裂的时代,它也就成为文化和民族认同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换句话说，周朝作为统一的已知文明世界的政治力量业已衰落，而这衰落促使人们对一些问题给予更多的思考,如哪些人是一个团体的？谁可以被视为“我们”之中的一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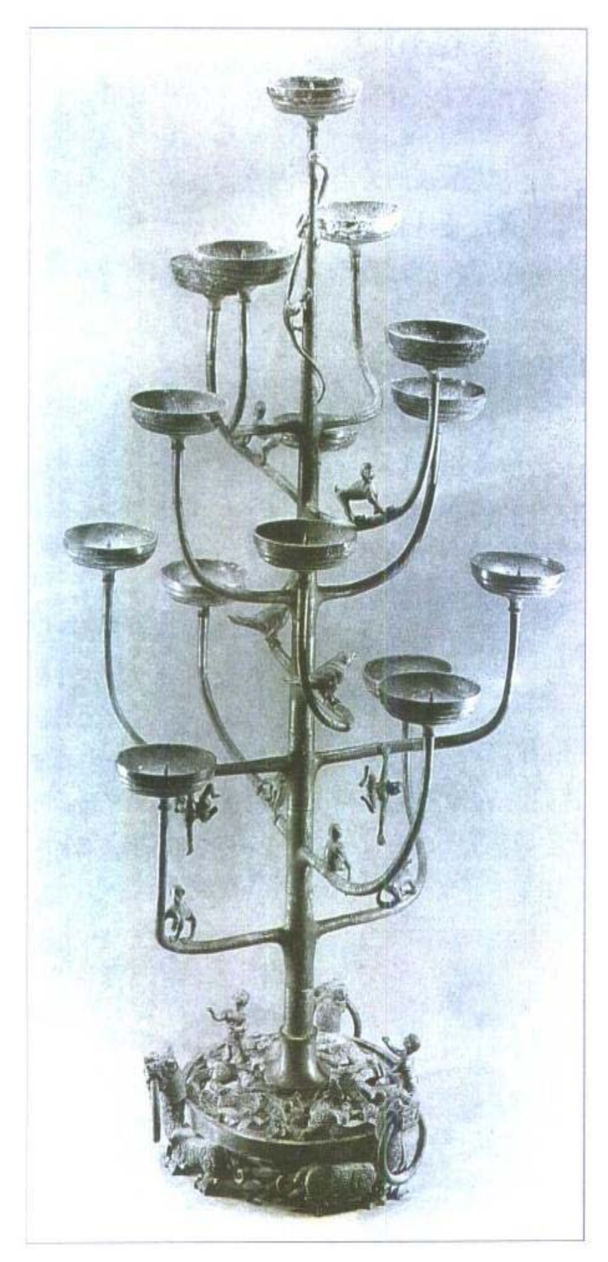
各个主要国家都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认同,这与它本身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特征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不同国家的认同感是强烈的，多数周代晚期的文献资料说明，个人也常被他所来自的国家习惯性地认同。当然忠诚并不狭隘地集中于国家，人们频繁地从一个国家迁移到另一个国家,而且技术创新和艺术母题也不断地从一个地区传播到另一个地区。为了发展外交联盟，各国的王室互相联姻，这样统治者就会经常拥有别国的外祖母、岳母和妻子。

以中央轴心为基础的、地域广阔的王国观与母国认同感是相互平衡的。这个更广泛的地域可以指“天下”，也可以指“中国”。周王作为天子，名正言顺地治理着天下。在周朝晚期，周王实际上已不能继续统治的时候，继续使用的“天下”这个词，则指文明化的世界，指所有的国家和居住在一起的人民。比如说，孟轲曾谈到一个制订好政策的统治者是如何取悦天下的农民、商人和士大夫的，认为只有这样，邻国的人民才会迁到他这里，他才会天下无敌，南面称尊。但天下并不是一个不加区分的空间和人口，其核心在于真正的王——天子。中央的观念这时还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这个词意指黄河流域,这儿是夏、商至东周的中心地带,并以此为标准，判定“中国”以外的人是先天落后的。

就一个连续统一体来说，境外之民在不同程度上被认为是劣等民族。最劣者是那些完全生活在周势力范围之外的民族，这些民族甚至于否定周天子名义上的统治权。周的臣民与拒绝臣服于周的民族之间的区别,基本等同于华或夏民族(当时这个词可以理解为种族意义上的中国人)同蛮族的区别。后者在当时主要指数个泛指的民族(夷、蛮、狄、戎)以及众多名称各异的特定部落和文化。据史料记载,曾与晋国结盟的一位戎族贵族于公元前599年说，戎饮食服饰均不同于华人，互不赠礼，言语不通。蛮族一词与种族差别无关,因为这种差异并不基于身体特征，况且中国人通情达理，认可迥然相异的习俗。例如，为了说明人们在过去所做的一切都言之成理，墨翟列举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习俗：“昔者越之东，有亥沭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墨翟认为这些习俗十分古怪,但他从未明说或暗示这些人行同禽兽。孟轲对文化的相对性也颇有同感：“夫貉，五谷不生，唯黍生之。无城郭宫

在湖北曾侯墓中一个棺材上的彩色装饰（约公元前433年)。这些半人半兽的混合物无疑与楚地当时的宗教信仰有关,图上显示的可能是阴间的卫士，它们手持武器，准备着抵挡恶魔。





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荀况也发表过类似议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如果像孟轲所示，文化是环境的派生物，或如墨翟和荀况所言，文化是由习俗衍生而来，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文化并非先天固有，而是人们后天获得的。实际上，在孔夫子的教诲中，这类议论比比皆是。孔丘相信，野蛮人可以变成文明人。一次，有人问他，为何他愿意迁居蛮荒之地，孔丘答道，“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大量的文字资料和考古发现证明，在周后期，随着中国的疆域不断扩大，曾被称为蛮族或半蛮族的部族不断成为中国国民。在周初，现代中国的南半部被认为是蛮族和半蛮族居住地。在长江流域，楚国势力迅速增长，向北扩张，击败并兼并了50多个小国，达到周的中心地带，向东吞并了吴国和越国。其统辖下的疆域大到了商代与西周鼎盛时期的程度。通过周后期留下的大量位于楚境内的陵墓，可对楚的雄厚财力窥见一斑。在艺术上，楚借鉴北方风格并融汇本地特色，创造出鹿角鹤之类与众不同的形象，这一形象多半与独特的宗教思想有关。

楚国的统治精英肯定精通中原国家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周后期它还对中原文化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例如，楚对官僚政治制度和使用步兵的方法有所创新。庄周在楚住过，很多学者认为道家因此与楚国有关。理想主义的楚辞与周初平实的《诗经》大相径庭。楚辞的代表作是屈原的《悲歌》。屈原是楚国的丞相，他对国君忠心耿耿却不被赏识，最后投江自杀。在诗中，屈原幻想自己在遨游天际之中俯视大地。有些诗描写了追逐捉摸不定的神祇或是飘过灵界的男巫和女巫。

铜油灯，高约32英寸，出自河北平山县公元前4世纪的中山王墓。尽管中山国是狄人所建，但到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其精英已经吸收了许多华夏族的物质和精神文化。这件有15个灯盏的灯具，表明华美的铸造技术和独特的主题，比如吊在树枝上的猴子等。

我们可将楚国的历史同一个东北部小国——中山国——的历史相比。中山国的统治者据说是白狄。这个游牧部落在公元前6世纪被其他部落从陕西驱逐到河北，而当地的中国人无力将其赶走。公元前5世纪初，在魏国的帮助下，这些白狄建立了一座城，统治了一世纪之久，最后被位于其北的燕国打败。对中山国君两个坟墓的挖掘表明，他们接受了中国人的趣味和价值观。墓中的雕像穿着典型的中国人的服饰，随葬的90余件青铜铭文用典型的儒家语言详述历史事件。同时，这些王家陵墓中也葬着在干旷草原上生活的必需品，如搭帐篷的器具。在中山国倾覆前不久，一个邻国的君主派了一个奸细去中山。奸细返回后报告说中山国君勤学，中山人好名，但士兵却胆小如鼠。

周朝末年的社会思想意识根植于特定的地理和空间环境。道家崇尚不问世事，而儒家和墨家的信徒则推崇人类的道德完善，这些思想流派产生于残忍无情的时代。此外，东周后期的思想流派与其产生和发展的特定地域休戚相关。

然而因为这些思想记载在“书”中，或者说是记在竹简或帛上，所以随着时间

的流逝，渐渐地与其产生的历史及地理环境脱离开来。在这种脱离状态下，书帛上的思想就成为中国文明发展的主宰。直至近代，中国教育仍致力于传授这一时期的经典。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熟读典籍的中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佛教的传播就是明证)。对于如何解释和应用从古书中所学的东西，他们总是各执已见。尽管如此，这些书的重要性是不容否认的。对于理解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些书提供了一套公认的学问。当然它们对于文人墨客影响最大，但当教育有所普及，而且当文人以种种方式与不识字的农民接触时，这一思想传统的基本成分便被众人所接受，成为我们称之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形成于公元前的重要哲学思想而言，中国并非绝无仅有。印度的《奥义书》和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同中国的诸子百家一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当文化和宗教权威不再墨守成规，囿于传统，而是开始回顾、反思和质疑的时候，思想的突破就发生了。在所有上述国家内，有创见的思想家提出了新观点和新看法。但在不同的地区，新思想却迥然相异。这种百家争鸣时代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文明在多样化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但当我们将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流派，同印度或希腊的思想流派相比时，中国思想的内部差异便黯然失色，而其共性则变得引人注目。

就其宇宙观而言，中国主要哲学流派的关于祖先和上天的观点大致相同。对这些观点，我们在上一章曾加以讨论。此外，这些思想家都设想宇宙自行产生，他们不信奉西方思想家们认为至关重要的上帝创世说。他们也不声称万物由一原动力所启动。相反，他们认为宇宙的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他们强调物物相关，彼此相依，而不重视原动力。中国思想家们将宇宙视为相依相存的整体，而非彼此排斥的诸如自然和迷信、生和死、灵与肉等对立物。中国思想家们将对立物视为互相补充的两极即日与夜、阴和阳、知与行。此外，他们将事物视为过程和阶段，而非彼此互不相关。在社会和政治秩序层面，中国的思想文化传统与世界上的其它主要文明之间的差异也是引人注目的。尤为重要的是，中国的思想家均认为家是自然实体，并在社会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例如在古希腊。家被认为是私人领域，其作用同城邦的公共政治不能等量齐观。而在中国，一心爱家是公认的美德。老聃的乌托邦并非想将个人从家中解放出来，而是要给家以充分的自由，不受村以上政治实体的压制。中国思想家不但肯定家庭对于社会至关重要，而且认为家庭要建立在父系和父权的原则之上。因此家也为政治制度提供了范例：治国就像治家，在独裁的统治者之下，不同的等级协调合作，就像在家中一样。

所有中国思想家的政治观都颇为一致，都认为秩序对于统治者、对于受命于天的全能君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全能的君主体现政治秩序，有权左右其治理下的社会。中国思想家均不承认法律具有同等的威力。儒家、法家及道家均认为，法律只是手段，而非崇高不可违背之物，法律决不在君主之上。

中国思想中另一广为接受的观点与早期印度思想大相径庭，即现世的生活是可以改善的。除了法家之外的所有主要的思想流派，均认为西周或更早的时代，如尧、舜、禹的时代比现世更为美好。这种对黄金时代的向往也说明，虽然中国思想家惋惜世风日下，但他们仍然不在尘世之外寻求美好与现实的东西。他们认为人们在现世是可能达到完美境界的。

第三章 官僚制帝国的创立：秦汉（公元前256年—公元220年）

随着秦国征服所有对手，中国就成为一个幅员广大的农业帝国。作为以后中国历史特征的政权形式——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起始于秦(公元前221年—公元前206年统治中国)，而在统治时间远为漫长的汉朝(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得到巩固。在这一时期，中国本土的疆域不断扩大，秦汉王朝将其霸权扩展至辽阔的疆域，向南远至越南。中国本土指汉人为主体的地区。新帝国的思想意识融汇了法、道、儒的成分，但治理国家的官吏日益认同儒家学说，这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君主。随着时间的推移，地方精英也接受了儒家学说并为官府效力，而汉朝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就仰仗于地方官吏与地方精英的合作。

秦的统一

秦是周代各诸侯国中最西边的一个国家，最初是一处王家封地，奉命养马及抵御蛮族。在周王室于公元前770年逃到渭水流域并迁都洛阳之后，秦的疆土得以扩充，成为西部地区的霸主。与东部诸国相比，秦在文化上比较落后，城市不多。在东周初年及中期，秦还是一块蛮荒之地，与位于边界外的戎、羌、狄各部落相差不多，并与这些部落战争不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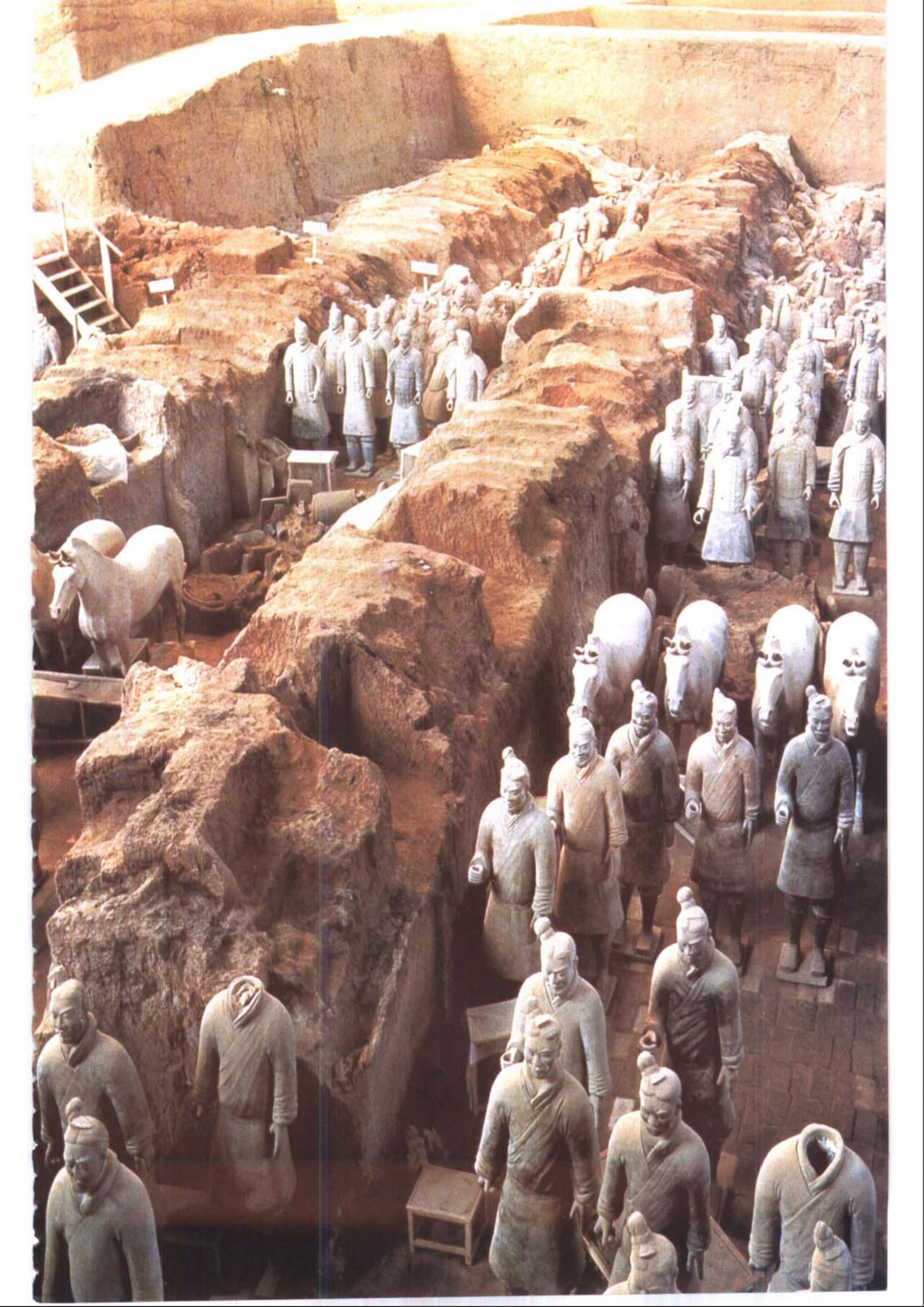
为增强国力，东周后期的秦国国君招贤纳才，谋士、策士和纵横家纷纷前来投奔。商鞅于公元前361年来到秦国，并协助其国君迅速实施了一系列法家政策，以加强王权(见第二章)。到公元前3世纪，秦国人民奉公守法，农作物产量增加，直接税的征收也使国库充盈。约公元前264年，儒家哲学家荀况到过秦国，他赞赏说秦国百姓对官家敬重有加，而官员则办事诚实认真，无结党之嫌。

统一中原的秦王嬴政于公元前247年即位，当时他才9岁。仰仗两位丞相吕不韦和李斯之力，他率领的秦国军队所向披靡。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的10年间，秦先后征服了韩、赵、魏、楚、燕和齐，最后一统天下。嬴政称自己为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他将庄严与君主两字合二而一，创造了“皇帝”这个词。在此之前，“皇帝”（实际上应为“黄帝”——译者注）只是远古传说中一位圣明君主的名号。

后世的中国史家并未对秦始皇交口称颂，把他视为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希腊或罗马史家很可能会如此做)，相反，却将他贬斥为残忍、专横、狂暴、疑心并且迷信的自大狂。秦始皇不仅决心在地理上统一中国，而且还推行整齐划一的各种制度。如果有人坚持使用当地原有货币、度量衡或文字，那就会被认为是叛逆。秦始皇废除了过去的诸侯国及各国豪门贵族的爵位，将全国分为36个郡，郡下设县。政府派官吏掌管郡县，并以连篇累牍的严刑峻法、严密规章控制官吏，官吏必须向中央报告政情。为杜绝地方豪强组织起义，私人不允许持有武器。原中原各诸侯国的名门望族必须迁至都城咸阳(今陕西省西安附近)。由于秦始皇完全彻底的变革，中国先秦时代的传统包括各种地方传统遗失大半。

秦始皇希望政府控制知识，对批判政府者毫不留情。教育是官办的，其目的

右图　在陕西省西安附近距秦始皇陵约半英里处出土的兵马俑，阵容庞大，不仅显示了秦朝的赫赫军威，也表明了秦始皇对其死后的忧虑。这些陶俑有真人大小，涂有12种或13种亮丽颜色。它们先用模具制成相同的肢体，然后用手工完成整体的制作，因此无一雷同。为使形态逼真，陶俑们配备有真正的战车和青铜武器。





青铜秤砣，高6.75英寸，陕西咸阳秦皇宫废墟处出土。上刻制造工匠姓名及重量单位，是秦统一度量衡的证明。

是训练将来的官吏。廷尉李斯对儒生利用历史诋毁始皇的政策并蛊惑民心非常不满，他的进言导致秦始皇命令“焚书坑儒”，结果除农书、医书及求神问卜之类的实用性书籍外，其他文字均付之一炬。顽抗的儒生被镇压。据史料记载，有460人被活埋。此举意在警告那些藐视皇帝命令的人。

老百姓也深受严刑峻法之苦。检举不法者有赏，而犯法者则被处以极刑、肉刑(削去下颚、鼻子或左脚)，或被罚苦役。即使奉公守法者也要服苦役。被征发或判罪的苦力用于修筑宫殿、道路、运河、帝王陵墓及防御工事，如公元前212年，就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被征发去修筑一座巨大的新宫殿，而修筑长城用的人力则更多。此前各诸侯国都沿边界修筑了用于防御的土墙，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其分隔以前各国的部分拆毁，而将位于帝国北部边界的土墙连为一体，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进犯。

秦始皇的胜利大半取决于他对政府事务的事必躬亲。他规定自己每天必须批阅、处理一定数量的文件，不干完不睡觉。他数次巡视帝国，向臣民显示威仪。在神圣灵秀之地他都要立碑，碑文叙述其赫赫功业。他在一块碑上声称，其帝国幅员辽阔，因此“凡有人烟之处，皆听命于我”。

刺客曾三次企图暗杀秦始皇，但均未遂。此后秦始皇一心寻求长生不老之术。他将一批童男童女送到海上去寻找神话中的蓬莱仙境。考古发掘也证实了文献史料上的有关记载，比如说他为自己修筑秘密陵墓并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距秦始皇陵(真正的陵墓尚未发掘)约半英里处，发现了三处疑冢，其中的数千真人大小的排列成队的陶制兵马俑，是用来保护陵墓内的秦始皇的。

汉朝政府

秦朝的体制是将权力集中在君主手中，因此政府的存亡取决于在位君主的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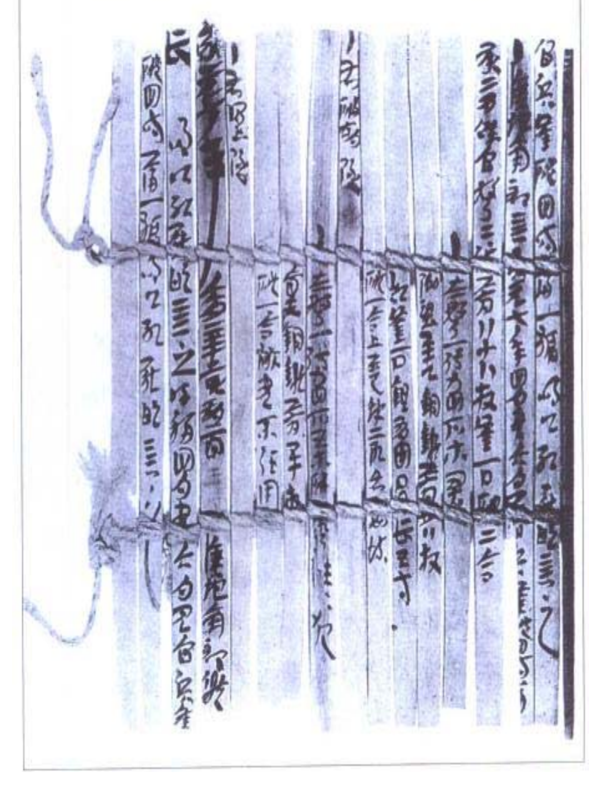
力与品格。秦始皇于公元前210年驾崩后，帝国便分崩离析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不久被他的弟弟谋杀，各地的起义也接踵而至。公元前209年，一批被征用的农民遇雨延误了行期，无法按时到达边境服役。为免于被处死的命运，他们揭竿而起。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得到成千上万人的拥护，对现状不满的人民纷纷加入起义队伍。为逃避劳役、兵役，各地的人们也群起响应。公元前208年，秦二世处死丞相李斯。公元前207年，秦二世被新任丞相暗杀，而暗杀者又被他拥立的皇帝杀死。与此同时，将领们纷纷叛逃，被灭亡的六国贵族们也重新拥兵自重。最后的胜利者是刘邦，史称汉高祖(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95年在位)。刘邦没有显赫的出身，曾任秦朝地方小吏，掌管一小块地方的治安诉讼。公元前206年，他自封为汉王。公元前202年，他击败了主要对手、才华横溢的贵族将军项羽。汉高祖刘邦建都长安，距被秦末农民起义夷为平地的秦朝都城仅数英里之遥。

当秦朝倾覆后，大家都把中央集权制同暴政混为一谈，认为汉朝政府应像周初那样实行分封制。高祖因此将大片领土奖给旧部，分封诸王。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分权证明对皇帝是个威胁。汉初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创立一种集权形式，一方面能够确保秩序和王朝稳定，另一方面又避免不必要的严刑峻法。用更中国化的语言来说，即霸道同崇尚道德的王道并举。

汉朝沿袭秦朝对付旧豪门大族的主要手段，即由朝廷根据才能而非根据出身任用官员，直接统治地方。朝廷有权罢免、调离和惩办官员。汉时郡县长官责重权大，负责审理案件，征收及发送税收，主持国家宗教仪式，统领军队和决定何时及如何从事抗洪防洪之类的公共工程。他们也监督当地的经济和教育，从地方上选用下属。有政绩的地方官可能被提拔到朝廷主掌一部或出任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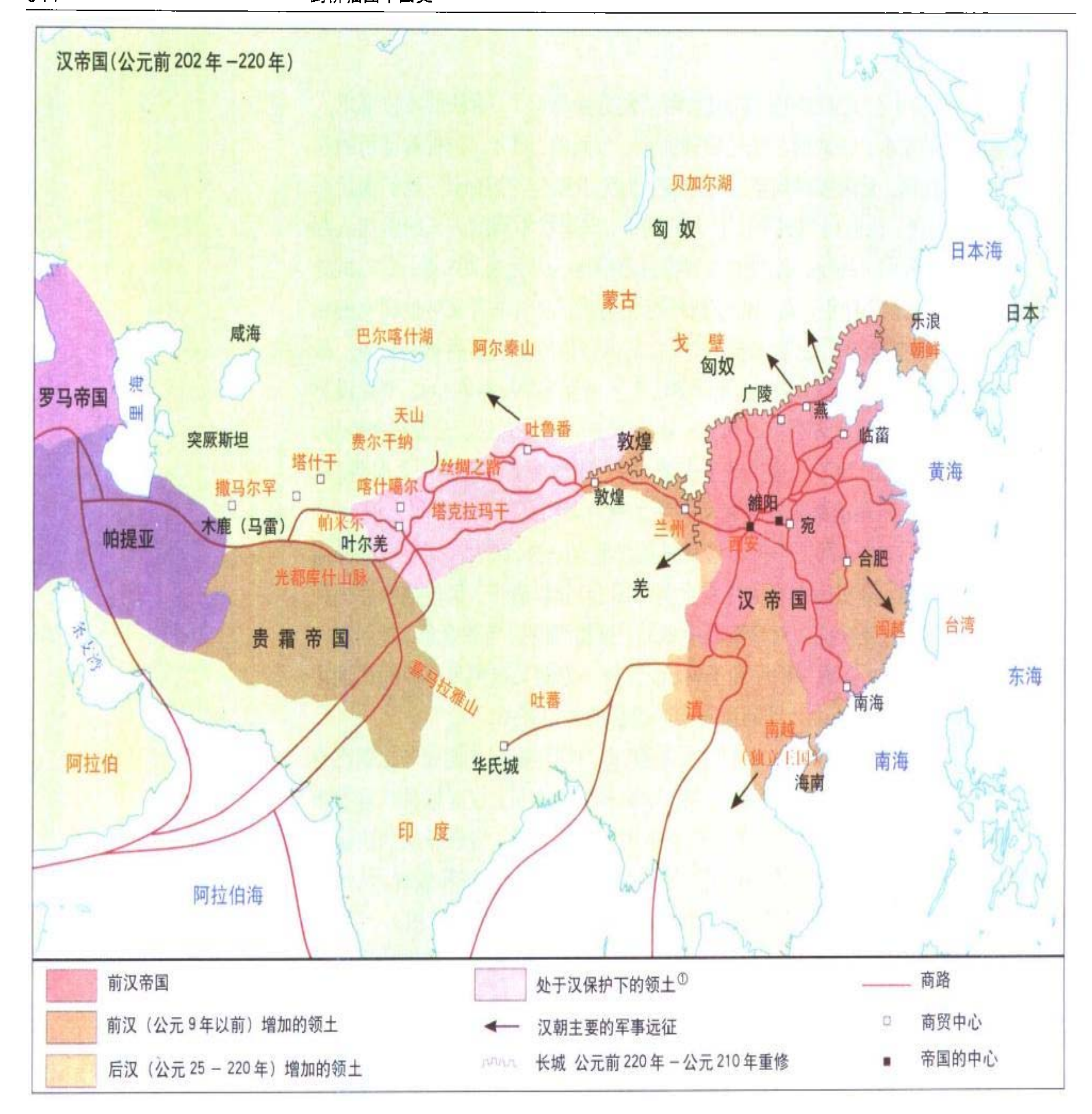
强化汉朝政府机器的关键人物是汉武帝(公元前141年－前87年在位)[①]，他在位50多年。武帝15岁即位，当时是个精力充沛的青年。他着手限制同姓及异姓王的势力，以各种借口将大半王公的封地收回。他还颁布律令，规定王公必须将其封地分给自己的所有子嗣，以使封地代代瓜分。他也削减巨商大贾的势力，通过国家垄断和征收商业税获得新的财源。在对外关系上，他一反过去的安抚怀柔政策，主张武力征服。他也控制文化，制订了规模极其宏大的典礼仪式。他将最杰出的文人墨客，包括那些在刘姓王公郡国中任职的人延聘入宫，同时取缔与之抗衡的其它文化活动。

同秦朝的皇帝一样，武



汉朝官僚政府留下了连篇累牍的刻在竹简或木简上的文书。在西北部原汉朝边境兵营的废墟中发现了大量这类文书。左图所示文书出土于甘肃居延，刻写于公元95年，为两队步兵装备的登记册。

① 汉武帝的即位时间应为公元前140年——译者注。



汉朝统治辽阔的疆域，其版图东至朝鲜、西到中亚、南达越南。一旦士兵安营扎寨，商人便很快接踵而至，他们都广泛传播了中国的物质文化。

帝和其他汉朝皇帝，高居于法律之上，是权力无限的独裁者。秦始皇师从法家，通过制定极其精细具体的规章制度来管束官吏，而汉武帝与其他汉朝皇帝则效法儒家，利用主从关系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进行统治，相信长此以往其臣下终会依忠君尽责的道德原则行事，这样君主便容易达到自己的目的并节省开支。为使官员们接受这一原则，武帝尊崇儒术。

汉武帝未能解决的问题是，年幼或懦弱皇帝即位所导致的政府的不堪一击。为此，皇家子嗣即君主的兄弟儿子，被定期派出京城住在自己的封地，以使他们无法插手宫廷政治。但皇后、皇妃的男性亲属却不在此列，结果又导致外戚往往在宫中翻云覆雨。汉高祖死后，其强悍的皇后吕雉大权在握，不断扩充吕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她干政15年后病逝时，她的亲戚们被处决。一个多世纪之后，王皇后(逝世于公元13年)的外甥王莽登基。王皇后的丈夫、儿子、孙子先后为帝，因此她在宫中居高位达40余年。王莽曾为两个未成年的皇帝摄政。公元9年，他废刘氏西汉王朝，将皇位据为己有，建立了新朝。

①上图把西域划为“处于汉保护下的领土”只代表原作者的观点。西域地区在整个汉代都属于汉朝廷直接管辖的范围。详情请见《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7–18页之“西汉时期全图”和第19–20页之“东汉时期全图”及相关文字说明。另外，此图有些地方用了汉代的名称，而有些地方如“撒马尔罕”、“喀什噶尔”等则用了明、清时期的称谓，山、河、湖、海等又用了现在的名称。——编者注

王莽虽然被后世史家谴责为篡权者，但他却是个饱学的儒生，他诚心希望将经典中记载的政治方案付诸实践。他更改官府名称，坚持国家对森林、沼泽的所有权，兴建祠堂，恢复公共粮仓，并削减宫廷开支。但是王莽的变法、尤其是他一再发行新币并使黄金国有的政策导致了经济混乱。不仅如此，公元11年，黄河改道，由山东半岛南面入海，淹没大量农田，使千百万农民流离失所。无以果腹的农民及深受财政改革之苦的地主、将王莽视为篡权者的儒生，以及西汉刘氏皇族的成员，均加入了倒王大军。胜利最终属于刘秀(光武帝，公元25年–57年在位)。刘秀属汉宗室，为当地大豪强，但并未世代封爵。登基之初，刘秀建都于东部平原的洛阳。以王莽统治为界线，其后按惯例称为后汉或东汉(公元25年–220年)，其前为前汉或西汉(公元前206年至公元9年)。东汉西汉之称缘于都城所在地理位置的不同。



宫女持油灯像（长信宫灯——译者注）。镀金青铜制品，高约19英寸，出土于河北满城窦氏墓。窦氏为武帝庶兄（中山靖王刘胜——译者注）之妻。这座镀金青铜油灯做工精致，设计巧妙，可调节方向和亮度，并可防止油烟外泄。在这座宏大的墓中随葬物品有近3000件，包括青铜、铁、金、银、玉、陶、漆器及帛制品。此灯为其中之一。由此可见皇室贵族生活的骄奢考究。

干旷草原和丝绸之路

统一的官僚政府机器能够运转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军事的需要：自公元前3世纪始，为抵御来自干旷草原的进犯，为处理中国北部的事务，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调度部署人数众多、训练有素的军事力量。

早在汉代以前，中国与外部的联系就主要是凭借通商和军事冲突。中国所产物品如丝绸和漆器等优于其邻国，因此为众邻国所喜爱。有些邻国以物易物，用木材、马匹、绵羊、牛来交换。但抢掠更是家常便饭。蛮族发现用武力可以获得所需物品，于是便不愿再通过贸易而是使用武力获得。而且，当贸易关系突然中断或干旱使其生计无着时，那些原本转而愿意通商的部族也转而依靠劫掠。自商代以来，抵御非华夏族的袭击便成为政府关心的重要问题。但随着周代中期游牧民族在中国本土以北贫瘠的干旷草原上崛起，这个问题便更为严重了。

亚洲内陆干旷草原辽阔无垠，由草地、山峦和沙漠构成，只能维持稀少人烟的生计。即使是最好的草地，诸如那些现在蒙古境内的草原，也因降雨量太小而

司马迁与《史记》

中国人理解历史和自己的方式，深受司马迁（公元前145年至公元前85年）《史记》的影响。此书写于汉朝。在成书之前，司马迁因为一个投降匈奴的将军辩护而获罪，他面临两条选择：引颈受死或入宫为宦官。为了完成他的《史记》，他选择了宫刑和为奴之辱。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解释道，自己忍辱偷生是因为心中所想的尚未得到充分表达。

他所撰写的这部划时代著作长达130篇，用不同的手法讲述历史：用编年体叙述政治事件，分主题说明重要的体制，用传记体记载重要人物。政治编年史从黄帝讲起，接着是夏、商、周各代，止于司马迁时的汉武帝。其次是年表，记有家谱资料和政府职位。然后是专论，讲述涉及政府的问题，如国家仪典、历书、灌溉工程的兴建以及政府财政开支等。30篇讲述周代诸国王室，叙述王位的更迭。70篇为重要人物的传记，既有权臣名将，也有与政府无关的人物，有些闻名于世，有些臭名昭著，包括了哲学家、诗人、商贾、术士、造反者和刺客，甚至涉及边境附近的非汉族人。

司马迁所受的刑罚并未使他阿谀权贵。他用充分的证据表明武帝的残忍和政策错误。他只青睐那些骁勇、侠义、忠诚而又未被当代人认可的人。司马迁认为自己的历史忠于史实，客观公允。他力图区分客观叙事与主观评价。若有文件可稽，他就直接引用原文；如没有，他就按照人物与环境自创对话，使叙事栩栩如生。例如，他记载了汉朝第一个皇帝汉高祖（刘邦）与丞相萧何的一段对话，此事发生在高祖八年：

> 萧丞相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

《史记》成就卓著，为以后历代官方史学提供了范例。其撰写体例——政治叙事、专论和列传——为后世所沿袭。同样重要的是，通过精辟而内容丰富的撰写，司马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于政府、个人成就及国民性的看法。例如，政府机构非常复杂，无法仅仅围绕君主来阐述，机构运作有其繁杂的历史，必须按照它们自己的术语来表述。司马迁撰写列传的体例同样反映并影响人们对一个人的认识。他讲述事件，或表明某人性格坚韧，或显示其优劣成败，而不只着眼于个人经历中的某些转折点。

司马迁对蛮族的描述间接地有助于"中国人"这一概念的形成。司马迁显然认为匈奴是中国人的对立物。匈奴的一切似乎都与中国人截然相反：没有文字和姓氏，不尊敬老人，没有都市，没有农业，居无定所。匈奴的长处是骁勇善战。所有匈奴男子都能骑善射，攻击敌人毫不犹豫："故其见敌则逐利，如鸟之集。"

无法栽种五谷，只可以放牧牲畜。中国附近干旷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饲养绵羊、山羊、骆驼和马匹。他们随季节迁徙，夏日向北，冬天向南。他们骑术高超，善猎，尤其精于策马开弓，因而是一支潜在的劲旅。干旷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基本社会结构是部落，部落之下是氏族和家庭，内部关系靠众人对部落首领的效忠来维系。部落首领因骁勇善战而得其位。当足够的部落实行联手时，这种社会结构将很有利于军事动员。农夫与牧民生活方式的不同，导致社会价值观的尖锐冲突。长期以来，中华帝国的农民将骑马的游牧民族视为灾星，视为一群残忍无行的恶棍，靠劫掠而非工作为生；而游牧民族以善战为荣，将农民贬为无力保护自己的弱者。

亚洲内陆游牧部落的第一次大联盟由匈奴建立，时在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派10万大军抵御匈奴，万里长城也为此而建。汉初皇帝采取怀柔政策，用大量礼品贿赂匈奴首领。礼品包括丝帛、稻米、现金，甚至是皇家公主。有些人对怀柔政策不以为然，担忧这种做法助长敌人的势力。这并非无稽之谈，公元前166年，14万匈奴骑兵袭击中国，一直打到离首都不足160公里处。



匈奴的金属饰物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他们与亚洲更西部的游牧民如斯基泰人有所接触，后者也喜欢有动物图案的挂饰和带扣。这件金的带扣饰品长3英寸，大概是公元前3世纪的制品。

与此相反，汉武帝则是派兵讨伐。公元前133年，他派30万大军远征匈奴，其后又数次出兵，如在公元前124年、公元前123年及公元前119年，派兵多达10万以上。[①]这些军事行动耗资巨大，供给线拉得很长，损失了众多人员马匹。但疆域得到扩展：占领了京城以北以西的地区，切断了匈奴同藏族的前身羌人的联系，后者曾臣服于匈奴；在甘肃设立四郡，并向西北部地区移民100万以上；同时，远征北朝鲜并设郡守，以便从东部边界夹击匈奴。

汉武帝也着眼于中亚，一方面是为了寻找盟友，另一方面则为改善军队的马匹供给。公元前139年，他派官员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寻找盟友共同对付匈奴。张骞被匈奴扣押达10年之久，最后逃脱，经大宛和大月氏于公元前126年回国。公元前115年，张骞二度出使西域。[②]根据他的叙述，中国人初次听说还有其他独立发展的堪与中国相提并论的文明国家。例如，中国正西1万里(约4828公里)的大宛，城市坚固，人烟稠密，种植小麦和用于酿酒的葡萄，出产的良马称汗血马。他关于安息的叙述与此相似，但着重讨论的是其商贾和货币。货币为银制，刻有国王的头像。张骞发现这些地区已在进口中国物品，尤其是丝绸。公元前101年，经过三年的努力，中国军队越过帕米尔高原，打败大宛，掠获大批汗血马，并使之承认中国的霸权。于是中国控制了跨越中亚的贸易通道，大大扩展了汉朝的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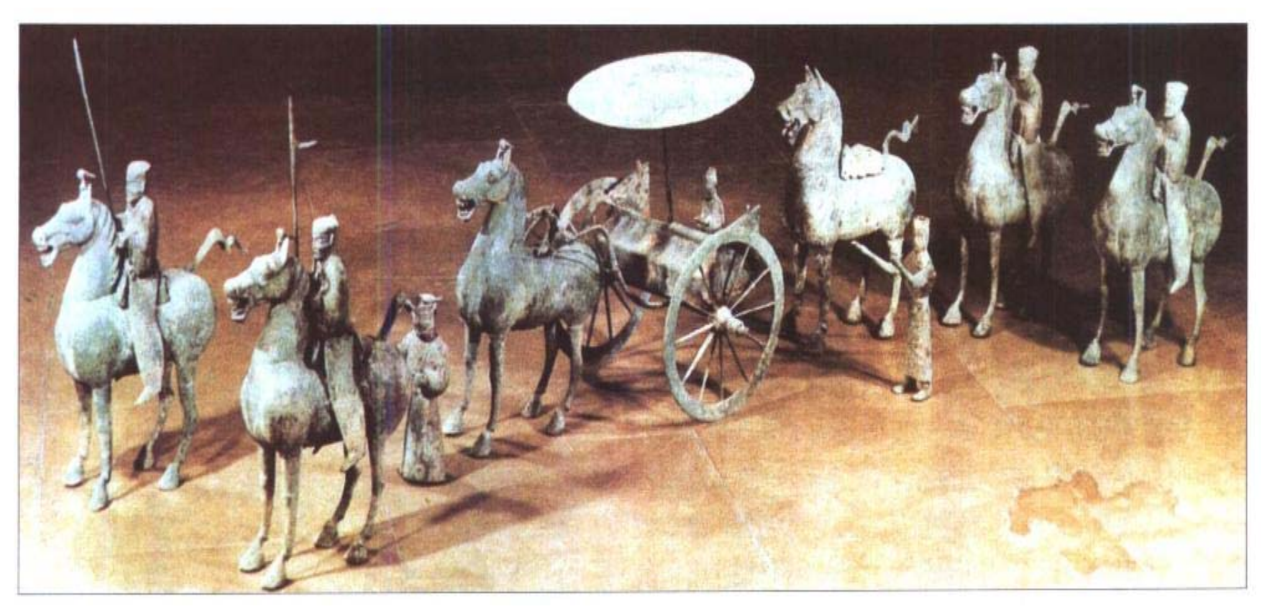
不久，匈奴的威胁开始减弱。公元前55年，匈奴联盟分裂为五部。其中南匈奴单于像居住在中国西部和南部边境的其他部落和国家一样，向汉朝称臣纳贡。向中国称臣的属国必须将一名王子送到京城，接受中国式教育，还必须定期派使臣向汉朝廷纳贡。他们对此颇感兴趣，因为可借此机会同汉朝通商。对于中国人来说，纳贡制度所耗不菲，但因此而避免了战争，并使中国作为文明世界中心的地位得到确立。在此期间，汉朝回赠纳贡国和部落不计其数的丝帛。例如，公元前25年，赠出2万匹帛和2万磅丝棉。据统计，国家岁入的近10%用于赠送这类礼物。

匈奴和其他北方纳贡国得到的丝绸不少，最后被运到遥远的西方。公元44年当尤利乌斯·恺撒过世时，中国丝绸已闻名罗马。而在此之后，进口量增加，但要转手数次，这些丝绸才能最后到达罗马。这里的中间人包括索格底亚人(Sogdian)、安息人和印度商人。运到罗马的既有成捆的丝，也有在中国或叙利亚作坊中织好的绸。返回中国的商队带回黄金、马匹，偶尔还有产自西亚的奢侈品，如玻璃珠和水杯。

王莽在位时以及王莽之后的内乱时期，汉朝政府权力日衰，很多边远的属国脱离中国。但东汉时，中国重建了统治权，将军班超及其儿子班勇重建了汉朝在

① 一般认为，汉武帝对匈奴的三次大的战役分别是公元前127年的河南战役、公元前121年的河西战役及公元前119年的漠北战役。——译者注

② 这里有关张骞出使西域的时间不对。张骞首次出使西域是在公元前138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119年。公元前115年是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的时间。——译者注



官员出行时随行士兵和仆从的多少是官阶的重要标志。很多东汉陵墓的墙上绘有官员的扈从。更引人注目的是这组青铜像，它们出土于甘肃垒台一座公元2世纪的陵墓。整个行列包括17个士兵、28名仆从、39匹马、14辆马车，各高约盈尺。

中亚的霸权。公元97年，班超率军越过帕米尔高原，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国家没有进行必要的抵抗，他们宁愿和中国驻军通商并赖其保护，而不同彼此争斗并袭击中国人的部落往来。

汉朝政府的麻烦是战线拉得过长，供给万里之遥的边境线会使政府破产。甚至于政府设立了规模庞大的马场之后，维持马匹供应仍旧是个问题。汉朝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降低戍边的成本，如让戍卒沿边境线进行屯田，使士兵自给自足，并征用蛮族游牧部落充任辅助部队。南匈奴从汉朝廷得到土地等物，成为汉朝盟友。东汉时，南匈奴成为对付北匈奴的主力。但戍边代价仍旧高昂，维持庞大的军事机器给政府造成很大压力。为使军事机器有效运转，必须增加岁入并改善交通设施，修建道路、桥梁和运河。

神话、魔术和奇迹

汉朝的开国者及其多数旧部的故乡在以前的楚国境内，或许因受楚文化的影响，汉代文学艺术中充斥着神灵、异兆及神话。奇异和力量、对死亡的蔑视和令人炫目之物是文学艺术的主题。《淮南子》是一部道家色彩很浓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2世纪中期，它的编纂得到淮南王的支持。书中载有山神的传说，有些山神是人首龙身。书中也描述了遥远西部昆仑山上的魔国幻境，那里的人们长生不死。汉朝皇帝渴求与神祇沟通，为此他们举行盛大的献祭仪式，由道家方士精心设计主持。尤其是汉武帝，将星象家、炼丹术士、占卜者和巫师一一延请入宫。他陶醉于黄帝的传说，因为黄帝同他所有廷臣、后妃一起升天成仙。在朝野之中，人们希望理解宇宙力量的运作方式和预见未来，因此对卜凶占吉津津乐道。在王莽遇刺前后，预示这次事变的兆头已屡屡出现，例如在石块和其他物体上刻有这类文字。虽然这很可能是王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所为，但也表明当时人们对上天启示的信仰。

汉朝人对死者的命运极其关注。人们认为灵魂有两部分，轻的或超凡的一部分飞升上天，很可能进入神仙居住之境，较世俗的一部分留在墓中或墓的附近，

右图　出土于四川广汉的东汉青铜“钱树”。汉代通用的铜钱(圆形方孔)魔术般地长在这棵近5英尺高的树上。西王母像鸟一样栖息在树上，高踞于龙虎宝座之上。这类钱树只发现于四川。

下图　刻在汉朝这面小青铜镜上的是如下文字：

青龙使这面镜子品质无与伦比；
愿你像东王公一样官运亨通，至高无上；
愿你像西王母一样万寿无疆。

镜上所刻王母有两翼、两名仆从坐在旁边。王公有一名随从站立一旁。或许因为流行的阴阳宇宙观主张男女成双，东汉时西王母往往由东王公相伴。





需要享用墓中的食物和其他物品。因此修建坟墓和供奉死者不仅是对死者的善待，也是生者保护自己的手段，以免触怒心怀不满的鬼魂。关于死后受审一说起始于汉代，这在此后中国历代的宗教中至关重要。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建立后不久，似乎官僚体制在阴间也开始形成。汉墓中有写给阎王的陪葬物品清册。其它文献则提到泰山上的审判。泰山是在山东的圣山，神明在那里审阅生死簿，众人由此得到应受的奖惩。

在汉朝，人们对长生不死的渴望表现在对女神西王母的祭拜上。她居住之处被描绘成充满奇迹的极乐园，生长着不死之树，流淌着长生之河。神话中的鸟兽永远陪伴着她，有三足鸟、跳舞的蟾蜍、九尾狐和产万应灵药的玉兔。所有的人，不论政府要员还是市井小民，都拜西王母。由政府资助设立的寺庙神龛遍布全国，有时对她的供奉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公元前3世纪的《汉书·五行志》[①] 对此作了生动的描述：

> 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递信息："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

这是中国历史上有案可查的第一次救世主至福千年运动。它和预示王朝终结的预言同时发生。王朝终结的预言被王莽登基所验证。

上图　这件6.75英尺长的丝制彩绘棺罩出土于湖南长沙附近马王堆代王妃(公元前168年)的陵墓。上面所绘图案大约是在介绍她灵魂的归宿：顶部是天宫，有龙、豹以及首体相异的动物；角上所绘乌鸦象征太阳、蟾蜍象征月亮：日月同在，代表宇宙阴阳两气。

农业经济

汉代文明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就技术而言，汉代农业有所改进，新技术包括实行农作物轮种和精心计划种植时间。汉代犁以功能先进闻名，犁杖可调节，以控制垄沟的深浅，弯曲的金属犁板可以减少摩擦。牛拉犁的普遍使用，使农民可耕种大片土地。灌溉技术也有所提高。国家资助修建大型水渠，推广了砖砌水井技术。毛驴经匈奴从西方传到中国北部，被广泛用于驮物。同样广为应用的独轮车也在汉朝初次面世。

由于技术进步、相对和平和疆域的扩大，西汉时中国人口迅速增长。根据公元2世纪的人口普查，中国人口达5800万，比当时的罗马帝国人口要多。但根据汉朝留下的史料，人们多考虑经济的脆弱性而非其潜藏的力量。汉代政治经济的重要特征加剧了这种不安全感，这些特征几乎延续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土地占有权和使用权、继承方式和政府财务政策造成了两种现象的并存：一方面是农民土地太少，收成不足果腹；另一方面是豪强占有广袤无垠的大地产。有些人暴富，占有万贯家财，另一些人则骤失土地，沦为赤贫。晁错在公元前178年描述了小

① 此处有误。《汉书》大体上完成于公元89年，而非公元前3世纪。——译者注

农的不安全感，他的叙述也适用于以后的朝代[①]：

> 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闲，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丈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亡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

农民食不果腹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家产由所有儿子均分，这一继承方式确立于汉朝。在周代，爵位、官职以及祭祖的义务传给一位后裔，一般来说传给长子。但当封建占有权衰落，土地自由买卖日盛，分割家庭财产成为惯例后，继承制转而影响到家庭结构和农业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庭仍以父系、父权为特征，女子仍旧嫁入夫家。但就财产继承而言，长子不再享有特权。土地占有权屡屡易手，有钱人(多半为官吏和商贾)买进，而分到家传土地的农民却因入不敷出不得不卖出。对于一家之长而言，只靠一个儿子延续香火是不够的。家族的生存取决于拥有足够的家产，只有如此，家庭中的所有男性继承人才能够娶妻生子，养家糊口。

饱受压榨的小农不得不开垦边远地区的荒地，并尽可能地精耕细作。如果这样还是无法为生，他们就只能投靠一个主人，成为佃户或依附于权大地广的地方豪强。毫无疑问，这往往是农民的迫不得已之举，因为贫苦农民不可能总是依赖官府的保护而不受当地恶霸的欺凌。正如公元前1世纪的朝政抨击者所指出的，当载入税册的农民越来越少时，征税人对纳税人的压榨就越来越狠；当压榨变得无法忍受时，穷苦农民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迁移到有荒地可开垦之处，或依附地方豪强，沦为半奴隶性的依附民。

下图 汉时耕地面积的扩大多半得益于畜力拉犁的广泛应用。这幅刻在石头上的牛拉犁图浮雕发现于陕西米脂。



汉朝同后来的历代王朝一样，不满于税收的减少，因此力图保持独立小农的数量。政府提倡兴修水利，提高产量，限制豪强的土地占有面积。当收成不好时，政府不仅减税，也提供救济。对那些在饥荒年间流离失所的农民，政府免去税收，并贷以种子，以吸引他们返回家园。政府最重要的措施是不再加重田赋。汉代岁入来自人头税和农产品税。后一种税在汉朝大多不超过秋收的1/30。大地主当然同小农一样受益于薄赋。

因为汉朝政府不愿加重农民负担，因此必须另辟蹊径增加岁入。为了支付军事开支，汉武帝控制造币，将豪强贵族的土地没收充公，卖官鬻爵，对私营企业增税。不论从道德方面还是从政治上考虑，众人都对经商疑虑重重，因此轻而易举地对商贾课以重税。船、推车、店铺和其它设施都必须纳财产税。对商贾的灾难性打击是政府决定出售征税所得的物品，因为这是与商家竞争。公元前

① 就引文的内容来看，引文出自晁错的《论贵粟疏》，晁错上此疏的时间应为汉文帝十二年，即公元前168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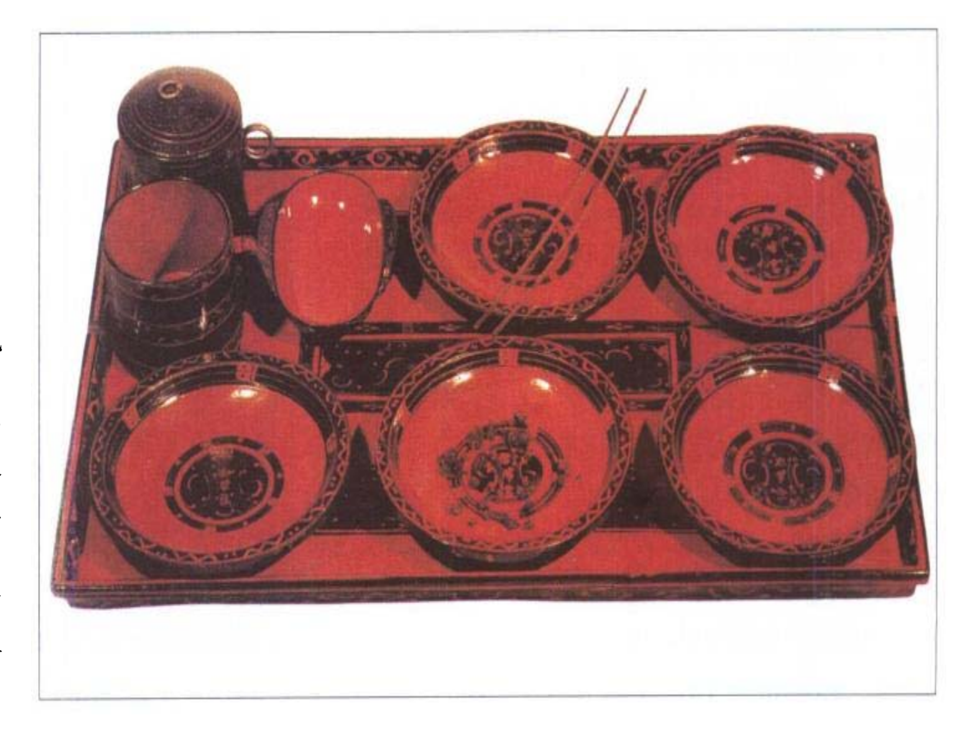
119年，官府开始垄断利润极其丰厚的铁、盐、酒的生产。大宗谷物交易也很有利可图，于是官府以稳定市场为名将其接管。官府在盛产谷物地区低价买粮，然后入仓或运到非产粮区出售。此举目的在杜绝粮食投机，稳定市价，并使政府盈利。

长远来看，这些财政措施制约了私营商业的发展。在汉朝统治的头100年间，私营商业的繁荣使城镇林立，加速了贸易与制造业的专业化。但当官府插手粮食贸易并接管冶铁炉、煮盐井时，这些行业便不再有活力了。东汉时，政府改变措施，但其对工商业的自由放任主要有利于大地主而非商人，中国经济于是完全依赖农业。这一模式延续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当中。

儒学、国家和士绅

在汉朝，儒学理所当然地取得统治地位。秦推崇法家学说，汉却尊崇儒术。但如上所述，占据高位的儒学并未取代其它学说。人们虔信神灵、预兆和奇异之物。而且汉代儒学本身是折衷的，它从先秦时各领风骚的其它哲学流派中吸取了许多思想和哲学观点。因此，汉代儒学的胜利并不排斥其它思想流派。其历史重要性在于儒学影响了精英、社会和国家的关系。

汉高祖对儒学十分公允，竭力避免秦朝的做法。高祖发现当时儒生的主要功用是制定宫廷礼仪，这可使他高居旧友之上，而使后者在朝中循规蹈矩。文帝(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57年在位)欣赏道家学说，认同其与世无争的态度。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文帝之孙武帝治下，儒学在朝中受到尊崇，而武帝却往往被指责为具有法家之风。武帝认为任用饱读儒家经典之士有利于君主，因为他们自律、利他、识礼、循规，而且忠于上司。因此，他建立了一种用儒家经典培养未来官吏的国家教育体系，建太学，聘用博士讲授五经(《易》、《书》、《诗经》、《礼记》和《春秋》)。后来的历代皇帝沿袭了这些政策。到公元1世纪，人们已形成



漆器的杯、碗、筷及托盘，出土于湖南长沙附近的马王堆一号墓。漆是漆树的汁液，漆树产于中国。自新石器时期以来，人们将漆涂在竹器或木器上做防水之用。汉朝时，精工细作的漆器为人们所钟爱，价格可能比青铜器还贵。

房屋

在中国，木材是主要的建筑材料，因此秦汉未能留下宫殿，普通民居更是荡然无存。但是，根据墓中陪葬的陶制房屋模型和墓壁所绘、所刻印的房屋布局草图，我们可以见到房屋建筑的基本特色。从坟墓修建本身我们也能知道很多，因为坟墓被看作是阴间的屋宇。

通用的建材是木、瓦、灰、泥和砖石。不大不小的房屋一般围绕一个或数个庭院而建，房间周边或修几个高于地面的石阶，或建带顶的走道或游廊。人们也修建多层建筑，它们是院落中的主建筑或是院外的瞭望塔。

民居的基本结构：用木材造屋架，用木柱支撑茅屋顶或瓦顶，围绕木制屋架修建四壁。墙壁非预制而成，一般用土或泥垒砖砌成。突出的屋檐用来保护墙壁免遭雨侵。屋檐由木托支撑，木托有时也作装饰之用。屋瓦的两端一般也用模具压出作装饰用图案。



左图 汉墓中往往葬有数个多层房屋或瞭望塔的陶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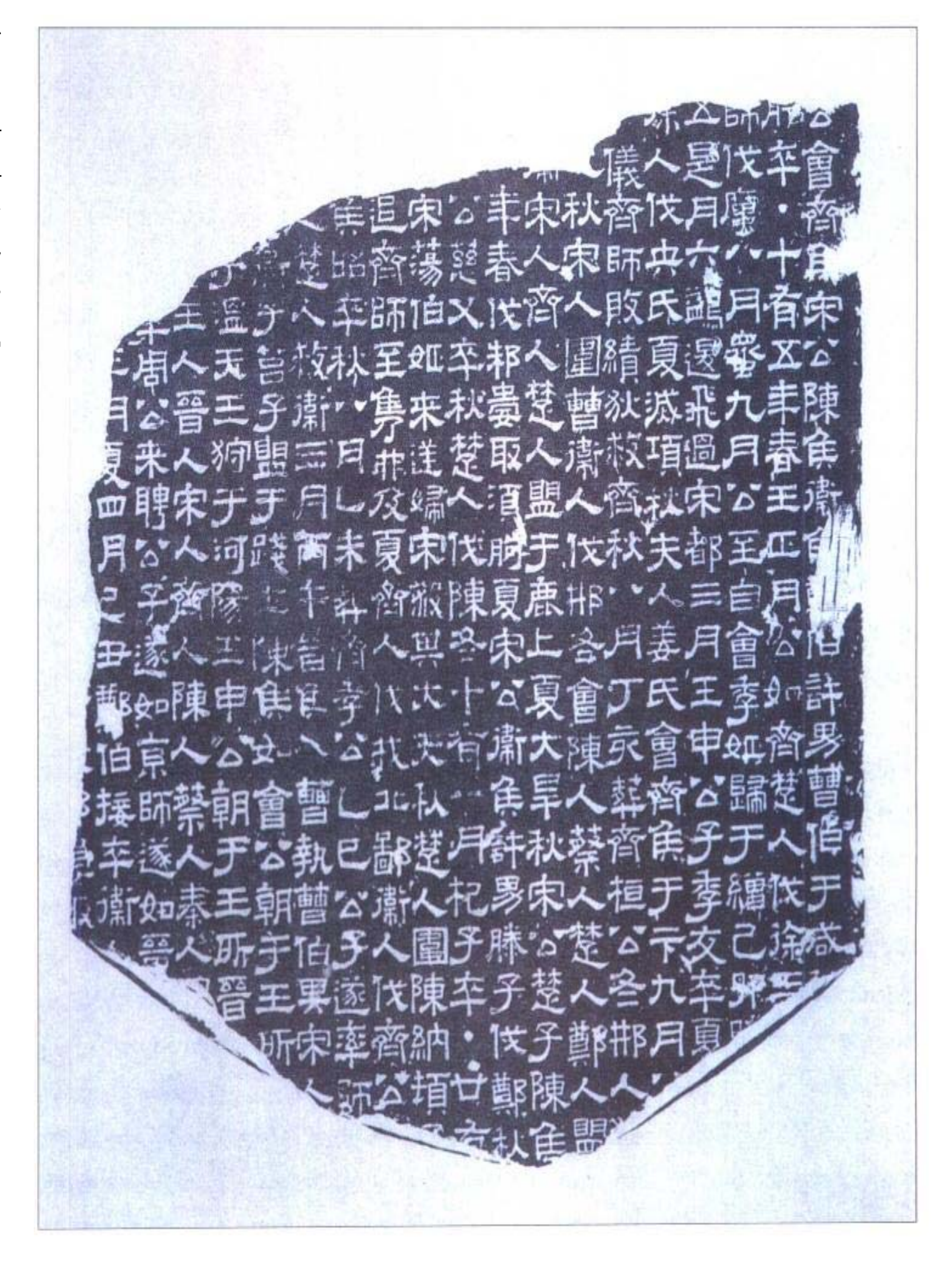
本版版心四角之图案为秦皇宫废墟中的瓦当。

下图 围绕庭院建屋可以保留数个内部和外部空间，因此诸如洗碗、脱谷等室外活动也可在家的范围内完成。这幅庭院房屋图印在一块砖上，用于修饰一座建于公元2世纪的坟墓。此墓位于四川省。









秦朝免于焚毁的汉以前经书尤其是五经，在汉朝被广为推崇。公元175年，政府派人将经典勒石刻碑，置于太学。碑文由著名书法家蔡邕书写。儒生们可以去抄写或摹拓这些碑文，这有利于确立这些经书的版本。此为《春秋》残片，大约有19平方英寸。

一种共识，这就是政府官员必须是饱读儒家经典、品格高尚而受尊敬的人。官员可举荐其儿子或近亲为官，但官宦出身并非当官的先决条件。于是朝廷官员的声望与日俱增，各地有财势地位者为谋取一官半职竞相以学识和孝悌之举示人，选拔和晋升官员对儒学知识和美德的强调，使胸怀大志的年青人乐于去苦读诗书，因为读书可以获得声名权势。全国各地的年青人纷纷拜师求学。到公元2世纪中期，太学生的人数由不足百人增至3万多人。

儒学的政治胜利也归功于一些学者，因为他们发展了儒家学说，使之顺应时尚，迎合了政府的需要。似乎国家的统一要求把来源不一的思想合为一体。汉朝儒生设法将周围的世界解释为自行产生、自行延续的机制，由循环往复但决不重叠的阴阳二气和五行(火、水、土、金、木)所主宰。此种宇宙论与对历史周期、王朝更迭的解释相结合。儒家强调彼此衔接的事物和其它系列范畴(四季、基本方位、味道、气味、颜色、音符、数字、行星、器官、情感等等)在质上的相应相合。假如干扰其一，便会引起连锁反应并且类似变化会在其他各处发生。就像我

们在乐器上弹奏一个音符，就会引起另一个音质相似的乐器的共鸣一样。

这种万物相关的宇宙观被用于论证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和抬高皇帝的作用。在芸芸众生之中，只有君主独一无二，能够联系天宫、尘世和人类。哲学家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公元前104年)有关君主的论点，符合道家和法家之说，他认为君主应无为而治，不问世事，这样才能维持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董仲舒也接受儒学，强调君主的道德行为。他声称，君主如不履行职责，便会直接干扰天地之间的和谐，导致洪水、地震和其它天灾。因此董仲舒复兴并发展了天命论，其思想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关键成份，在以后历代王朝中从未受到公开挑战。

除了使有关宇宙万物的学说更加理论化，汉儒也竭尽全力地重修被秦始皇焚毁的典籍，以便复兴传统的儒家学说。数本复原的儒学书籍开始被奉为经典，视为记载昔日学问的经书。学生们虔诚地学习这些著作及其文字和口头的注释，将其作为主要的道德指南。儒生们往往致力于研习一本经书，由大师逐句向其弟子传授他对这部著作的理解。这些经书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今文经和古文经。今文经是年长儒生们根据记忆背诵的被秦焚毁的典籍，并用汉朝通行的隶书写成；古文经则是根据在孔子后裔宅第墙中发现的原版经典，用周代篆文书写而成，后汉的两位儒学大师马融和郑玄，将两种经学传统融为一体。他们精通所有的经书，并批注经文，见解精辟，但一般来说他们更推崇古文经。不过对于两种经文中的哪一种真实记载了先辈的思想这个问题，直到20世纪学者们仍然争论不休。

苦读儒家经典的官吏，不像依据法律程序行事的现代官僚，他们主要依据道德原则来处理与君主的关系。忠于职守，坚持抨击朝政，拒绝无条件地服从上司、甚至君主制定的政策。在汉朝，很多儒生和官吏反对诸如政府垄断等政策，并根据道德原则及其对人民生计的影响对这些政策提出批评。他们也反对侵略性的对外政策，认为军事讨伐殃及百姓，而怀柔政策能更有效地维持和平。儒生们经常抨击帝王的奢侈浪费，敦促皇帝削减用于后宫妃嫔、娱乐、猎苑、马厩和仪典的费用。在东汉，尤其是公元150年以后，儒生们激烈反对宦官在宫中弄权，往往



汉代艺术比前朝更注重表现著名的历史人物。这个带盖篮子的侧面漆板上，绘着多位有名有姓的人物。人物高约3英寸，出土于一座公元2世纪的墓葬。该墓位于今北朝鲜境内的乐浪，为公元前109年至公元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占领该地后戍兵屯田的遗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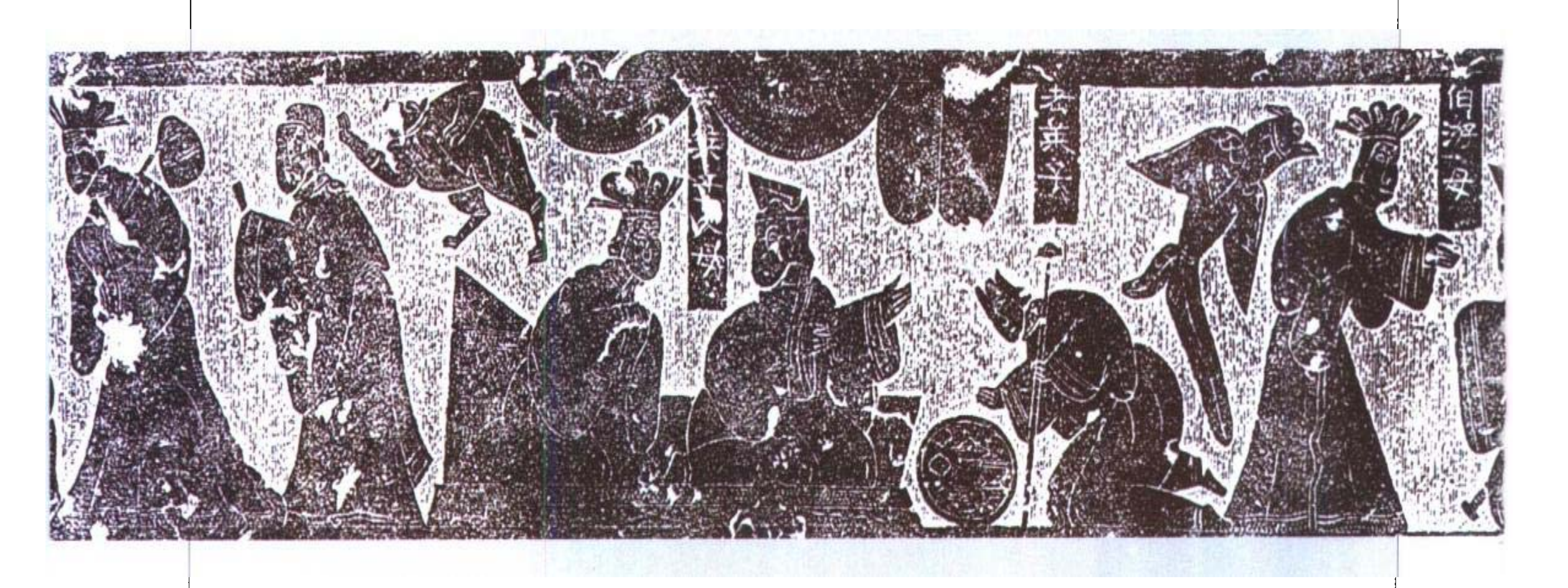
孝子烈女

孔子赞扬孝悌，认为孝悌是指对家中长者尤其是对父母和祖父母要敬爱，要竭力满足其需求和愿望。孝悌在汉代被发扬光大，堪称表率的孝子被任用为官员。为博取孝名，有人便做出耸人听闻之举，例如无休无止地哀悼其逝去的父母。有关孝子的故事广为流传，讲述的是孝子竭力满足其行为乖张的父母的非分要求，而且都得到了物质和超物质的奖励。《孝经》成为基本读物，并以如下格言用来谆谆教诲世世代代的学子："事亲者，居上不骄，居下不乱，在丑不争。"

值得效仿的女子同样受到赞扬。汉以前的哲学家不为女子写作，甚至贵族女子也无书可读，但汉朝就不同了。杰出学者和传记作家刘向（公元前79年–公元前8年）撰写了《列女传》，书中汇编了125位古代女子的侠义之举和无私行为。她们因忠于君主，明智地劝父诫夫，不畏胁迫，保持贞洁而著称。另一部有关女子德行的著作，是由一位名叫班昭（公元45年–116年）的女子撰写的。班昭在丈夫死后任宫中女官，负责教导宫中女子。她所著《女诫》一书也颇为流行。书中宣扬如何培养女子应有的美德，如谦卑、能干、恭顺、洁净、勤勉。她认为在社会上男女有别，因此女子应具有适合其角色的美德：

> 谦让尊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晚宿早作，勿惮夙夜，执务私事，不辞剧易，所作必成，手迹整理，是谓执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静自守，无好戏笑，洁齐酒食，以供祖宗，是谓祭祀也。三者苟备，而患名称之不闻，黜辱之在身，未之见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称之可闻？黜辱之可远哉！

碑刻拓片。石碑位于今山东省嘉祥的武梁祠内，立于公元151年。碑上绘有孝子老莱子。老莱子年已七旬，但像儿童一样手执玩具戏耍，以使父母不到感垂垂老矣。



宁愿丢官丧命，也不屈从于他们的权势。这样，通过儒学与官僚政治的结合，内宫与朝廷的权力得以平衡。皇帝与那些直接依赖他生存的人（后妃家族和宦官）主掌内宫，而儒生官僚把持了宫外的权力。

共同的思想、价值观和历史渊源，有助于官僚的内部一致，也加强了官员与受过教育的数量不断增加的地方精英的联系。由于地方官吏一般鼓励教育，将资质优秀的年轻人送到京城继续学习，所以汉朝的地方精英数目有所增加。造纸术的发明无疑有利于汉代教育的发展，因为它增加了书籍的供应。地方士绅热衷于儒学教育对政府有利，这样可节省政府开支，因为士绅们的所作所为与政府的利



汉朝陵墓中出土的木俑和陶俑，使我们得以想见当时的日常生活，其中包括游戏和娱乐。这对木俑高约11英寸，出土于甘肃省武威磨嘴子一座公元前1世纪的汉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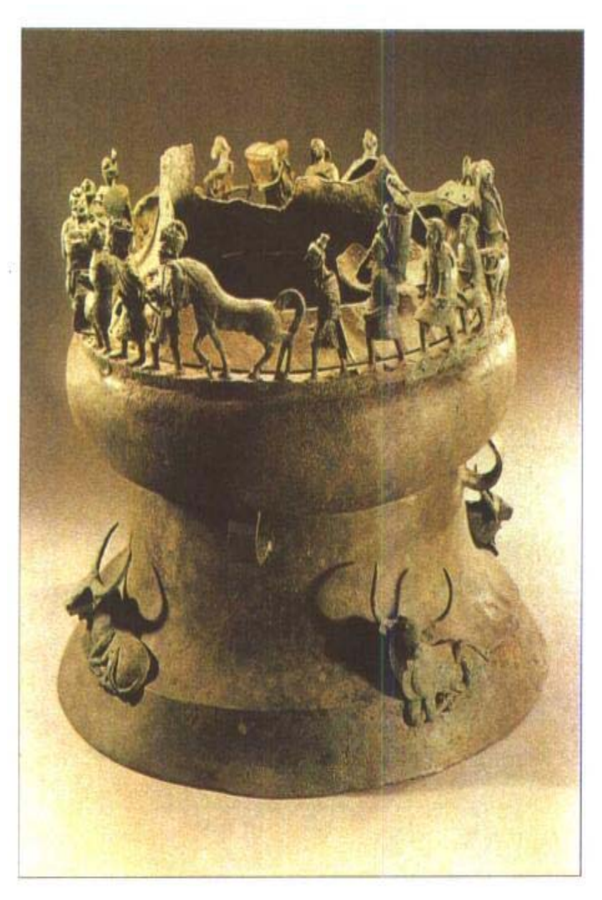
益一致。在汉末，虽然全国各地的士绅远离京城，大多关注于地方事务，但他们不再仅仅以地方领袖自居，而认为自己也是全国性的学术文化及政治事务的参与者，尽管这种参与是边缘性的。在以后的历史时期，士绅的实力和凝聚力、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以及经济一体化，为中国文明的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方的拓展

刻有姓名和职位的印章是权势的有力凭证。汉朝皇帝将这枚饰有龙形的印章授予赵胡—南越王赵佗的继承人。金质，长约1.25英寸，时间为公元前1世纪，出土于广东省广州。

秦汉是中国版图向南大大扩展的时期之一，这是得到国家鼓励的。在4个世纪中，拓居者沿河谷不断向南推进，将当地土著赶到更南边或偏僻的山地。公元1世纪和2世纪，经济混乱、天灾、王莽统治时的大动乱及其以后的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从北面和西北面入侵，农民被迫逃离故土，移民速度大大加快。根据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普查，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初，大约有500万1000万人从北方迁移到长江流域甚至更南边的地方。军队在这一大规模扩张中的作用不容忽视。秦朝曾派兵远征闽粤，甚至打到了现在的越南境内。汉重建了这些地方的驻防军，保护商贾、移民和探险家，从而有助于中国物品打入当地。一定数目的移民定居一地，政府便派去官吏管理并征税，因此南方新建的郡县与日俱增。当中国人在一地逐渐人多势众后，地方官员便改变控制当地土著的方式，如开设学校，用中国课本教授当地人，以完全同化已经半同化了的当地人。对那些反抗朝廷的人则诉诸武力。

赵佗的生平就很好地说明了冒险家们是如何为中国版图的扩展做出贡献



汉帝国向南方的扩张，使中国接触到众多不同的文化。这只15英寸高的鼓状贝壳罐上刻的人和动物栩栩如生，但却异于中原地区的艺术品。它表现了受到汉文化强烈影响之前的滇地制品的典型风格。铜鼓也见于东南亚，说明滇地与其以南地区存在文化交流。这只贝壳罐出土于云南省石寨山，时间约在公元前100年。

的。赵佗生于北方，随秦军远征到南方，不久就娶一越族女子为妻。当其上司去世且秦朝灭亡后，赵佗就控制了粤地，与越族首领结盟。汉朝建立时，赵佗兼并了岭南三郡，自称南越王。汉朝新帝派使臣接洽，赵同意向汉称臣，但仍然自行其是。他攻占并兼并了现越南的北部。吕后掌权时，禁止向赵佗治下地区出口诸如铁制工具和马匹等用品，企图以此遏止他的发展。针对吕后的举措，赵佗攻下了湖南长沙并称帝。汉文帝为安抚赵佗，给他留在北方的兄弟们授爵，并建议重建睦邻关系，条件是赵佗不再称帝。赵佗的成功有赖于当地土著的支持：他自称南越武帝，起用当地勇士任将军和军中武官，鼓励汉蛮通婚，竭力促进当地人吸收中国的物质文化。赵佗死于公元前137年，享年93岁，这时汉武帝已能相对有效地控制他的继承人了。

当然更为常见的是，在边远地区称王者并非汉人出身。位于现云南省的滇国由骑马的贵族统治，他们掠获敌人为奴，靠贸易致富，用中国货币和贝壳交易。滇国的宗教活动以铜鼓为中心，它既象征政治权力，也象征生殖力。虽然滇人没有文字系统，但他们的物质文化十分先进，考古发掘出土的精美的青铜兵器、工具和祭祀用具便是证明。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击败滇国，将其并入汉朝疆土，滇国从此向汉朝纳贡。滇人曾数次反叛(公元前86年、公元前83年、公元14年及42至45年)，但无一成功。

汉朝的倾覆

东汉前70年统治的主要特征是恢复和重建帝王权威。但公元2世纪时宫中争斗不断，身为奴才的宦官与外戚争权，称霸宫廷。由于宦官大多出身寒微，在宫外没有势力基础，能全心听从主子的吩咐，而且在宫中长大的皇帝也比较信任他们，所以长期以来皇帝依靠宦官照看内宫。但是，这种体制很可能使懦弱无能的皇帝面临被宦官摆布的危险。公元124年，一伙宦官发动政变，将一个任其摆布的孩童推上皇位。公元159年，汉桓帝借助宦官之力驱逐外戚，宦官自此大权独揽。抗议的朝廷官员受到迫害。在公元167年和169年的党锢之祸中，数百人或被下狱治罪，或被处死，有的被罢免官职，有的被流放出京城。

农民土地逐年减少，地方豪强势力日大，逃税者越来越多，政府的财源日益枯竭。由于朝纲混乱，政府在灾荒发生时已越来越无力向灾民提供救济。公元143年，因岁入不敷支出，政府不得不削减官俸，并要王公贵族提前一年缴纳田赋。公元153年，蝗灾频仍和黄河泛滥造成的饥荒，迫使千百万人为获取食物而拦路抢劫。但中央政府惟一能做的是允许地方征用30%的私人存粮。

公元184年，大规模的起义爆发。起义由太平道信徒所发动。太平道信奉道家思想，相信神秘的信仰可以治病，并采取了提供社会福利的措施。起义在几处

同时爆发，狂热的起义者袭击当地官府，得逞时便杀掉郡守县令。虽然起义在一年内被平息，但汉帝国政府再也未能恢复元气。全国各地其他起义此起彼伏，有些起义者也宣讲类似的教义并应用相同的组织原则。朝廷派去镇压起义的将军拥兵自重，互相争斗，导致了延续数十年的内战。公元189年，控制京城的军阀豪强袁绍屠杀宦官2000余人并扣押了皇帝。洛阳城遭到焚烧和抢掠，政府的藏书楼、档案馆几乎被夷为平地。汉王朝实际上完结了。

秦朝实行法家政策的目的之一，是由皇帝直接治理国家中的平民百姓。尽管汉朝政府缓和了秦的很多措施，它还是沿袭了直接治理百姓的统一行政体系，根据年龄、性别和朝廷认可的身份直接对臣民征税。豪门大族被定期强制迁居。例如在公元前198年，有10万户家族被迁至新都长安。与秦朝相似，汉朝廷征发成千上万的民工（包括罪犯），修建公共工程，尽管不像秦朝那样频繁。这些工程包括扩建长城，修理黄河大坝，大规模筑路。

然而在汉朝，除了与众不同的官员(当时的用语将他们称为“酷吏”)漠视地方权力结构，企图将理论上认可的国家权力强加于地方外，中央政府并不能完全主宰地方的社会生活，一种更为常见的方式是朝廷派去的官员从当地大族中任用下属，由地方士绅自行决定很多事务，以此换取他们的支持。因此，汉朝行政制度不仅坚持帝王权力无限，而且也开创了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的先河。二者均为汉朝的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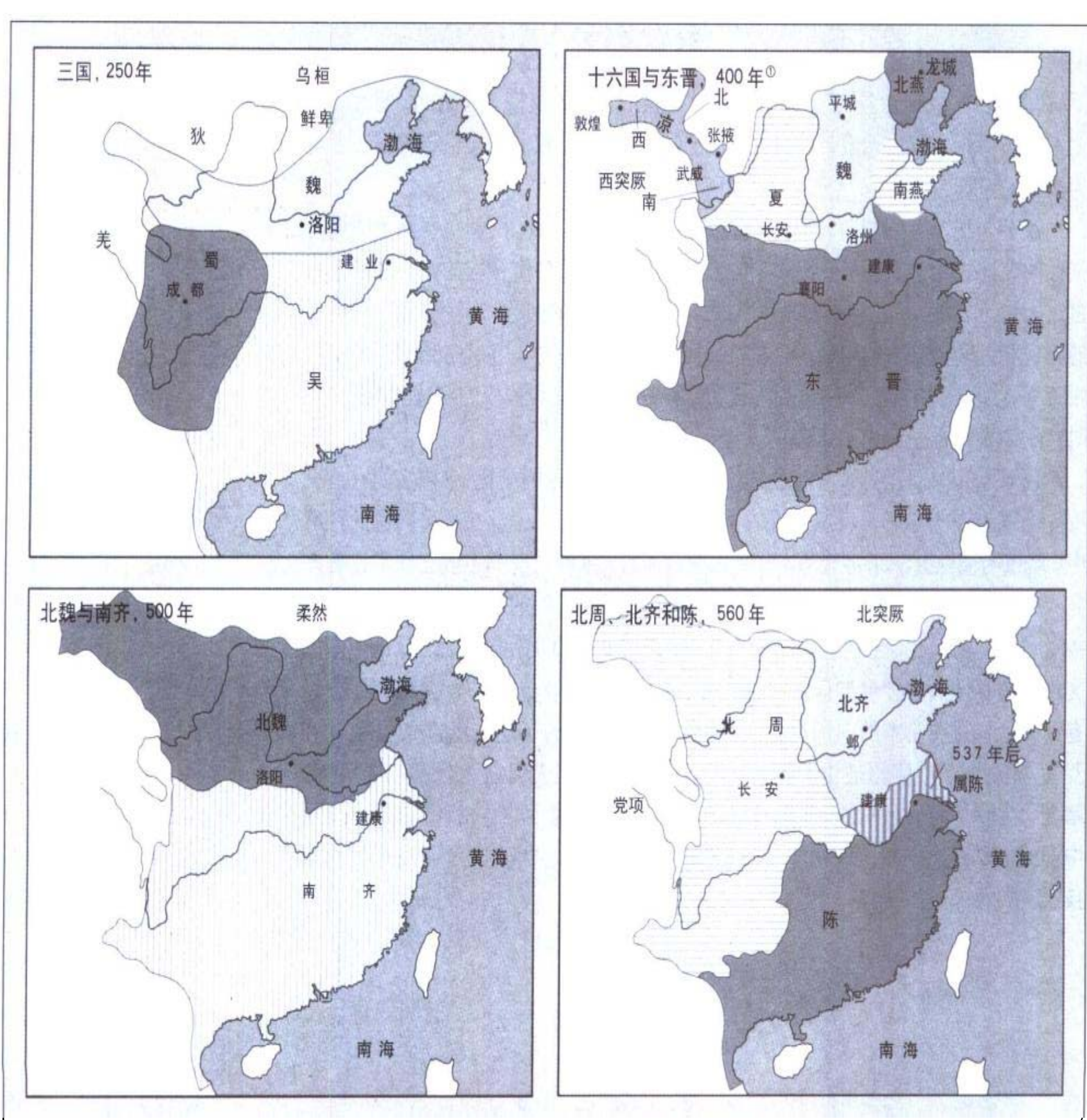
汉朝与罗马帝国同时，所以人们往往将它们加以比较。汉朝与罗马帝国均有强大的政府，均进行地理扩张，均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均使帝国的中心地区在数世纪中稳定发展。二者均设法处理几乎同等纷繁复杂的问题，均治理几乎同样多的人口和几乎同样大的疆域，均发展了官僚体制，由有学识的地主充任官吏，均投资兴建道路、防御工事和水利工程。二者的边境均受到蛮族的骚扰和威胁，均时常利用蛮族部落充当军事盟友。

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差异也同样发人深省。与罗马帝国相比，中国文明在更大程度上以农业为基础，畜牧业在农业中所占比重不大，而且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中，城市与商业并非举足轻重。就文化融合而言，汉朝与罗马帝国之间也存在差异。或许是因为中国文字的缘故，与罗马帝国相比，汉朝的精英们在更大程度上接受了共同的文化。士兵在边境安营扎寨，地方行政官吏便接踵而至，这使中国文化在边疆地区的影响与日俱增。当地土著学习用代表单字的符号阅读汉文，这有助于他们接受基本的中国观念，但不利于表达自己的当地独特的价值观。而在罗马帝国，尽管拉丁语被用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但人们仍然继续使用诸如希腊文、希伯莱文、通俗埃及文等其它文字。这样就有助于非罗马观念的延续。而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在中国，我们对滇、粤、匈奴社会准则的了解几乎完全来自汉文典籍。

第四章　佛教、门阀政治与外族统治者：分裂时代（公元220年—589年）

在汉朝倾覆后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多半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边境线时常移动。南方诸国虽然名义上疆域很大，但其军事实力无法同最强大的北方国家相抗衡。公元6世纪末，来自西北的国家重新统一了中国。

在从公元220年汉亡到公元589年隋朝再度统一中国的几个世纪中，中国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政府无力控制其疆域。汉朝之后的数十年间，三国鼎立(三国时期为公元220年－265年)。其后，西晋(公元265年－316年)短暂地统一了中国。在西晋亡于内讧后，异族部落乘虚而入，中国又进入了一个长期分裂的时期。北方由外来的统治者控制，由贵族把持的南迁朝廷则治理南方。这一时期软弱无力的政府根本无力抑制社会的两极分化，门阀世族扩展势力，高居人上，而在社会底层，人身依附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不再信任儒家关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理论，社会各阶层都寄希望于宗教拯救和超度灵魂。人们不仅信奉道教，也转向新近传入中国的佛教，后者大大发展了中国的思想和宗教观。



① 十六国时期先后有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五凉。地图上的与凉版图相接的“北、西、南”，分别指北凉、西凉、南凉。——编者注

三国与晋朝

在汉唐之间的这一历史时期，朝廷一般短命，而且无力像汉唐鼎盛时那样控制社会。由于社会缺乏强有力政府的扼制，社会组织和文化新趋向得以相对自由的发展，所以其影响有好有坏。

在中国历史上，这三个半世纪的政治历史最为纷繁复杂。最初是汉朝派去镇压黄巾起义的将军们势力日大，挟制朝廷，争霸天下。公元205年，诗人将军曹操成为北方的独裁者。他没有设法抑制地方豪强以增加税收，而是另外设法供应军队。他将因战事荒芜的田地划为大型国有屯田，由无地穷人和俘获的起义军耕种，此举使国家成为最大的地主。他也用世代为武的军人之家屯田，这些人既种田也作战。为建立骑兵，曹操大批征用匈奴部落，使其在山西南部定居。曹操死于公元220年，其子曹丕逼使汉朝最后一个皇帝退位，在昔日汉朝都城建立魏国，正式建立了曹魏的统治。

另两位王位争夺者也颇具实力，他们使曹操和曹丕无法像汉朝那样统一天下。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和更南边，孙策、孙权兄弟建立的吴国，受到定居于这一边陲地区的大族世家的拥戴。这里的主要居民仍是当地土著。汉宗室的旁支刘备靠老谋深算的谋略家诸葛亮扶持，割据西部的四川(刘备建汉国)。魏国人口多于吴或汉的两倍，并拥有最强大的军队，因此魏最终于公元263年战胜蜀汉。但两年之后，掌握实权的司马氏逼魏帝退位，建立晋朝(后称西晋，公元265年－316年)。公元280年，晋用水兵大败南方的吴国，成功地统一了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间，晋朝似有重振汉朝雄风的迹象。



马蹬的引进最初主要是为了使上马更加方便，但以后它却大大便利了马上武士的行动。这只9英寸高的陶器小塑像出土于湖南沙市的一座墓葬中，马上的这个人即未充分利用马蹬。

战乱年间，士族贵族不拘礼法，纵情声色，孔子有关热心公益的思想不再为人们所重视。相反，有学识的富家子弟竞相攀比奢华，支持离经叛道，在哲学上热衷于“玄学”，对《易经》、《老子》、《庄子》等书重新诠释，讨论诸如“无”之含义及其与“有”的关系。被称为“清谈”的巧辩成为时尚，为名士所推崇。很多人不愿介入朝中险恶的党争，憎恶政治生活以及繁文缛节。对“自然”和“自发性”的追求导致了在艺术中、尤其是诗词中强调直抒胸臆。曹操及其继承人曹丕、次



在他们死后的100年间，“竹林七贤”开始被颂扬为自成一派、风格特异的艺术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这张拓片分为两部分，拓于一座公元4世纪陵墓的砖石画像。陵墓发掘于江苏省南京附近。拓片刻画了“竹林七贤”之间的交往。

子曹植都是杰出诗人，为发展抒情的五言诗做出了贡献。在这一时期最负盛名的文人墨客中，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被后人称为竹林七贤。其中之一的阮籍，在邻家一未婚女子死去时嚎啕大哭，但在他母亲的葬礼上却吃肉喝酒。他的举动震惊了世人。当有人指责他同嫂子谈话时，他用一句反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你们认为我应该恪守世俗之礼吗？这种行为激怒了保守的儒生和贵族统治者。公元262年，七贤之一的嵇康因违背公共道德而被处死。

西晋统一了中国，但它从未成功地建立一个独裁的帝国政府，即一个皇帝享有无限权力而又得以杜绝派系权力之争的政府。司马家族的统治受到后妃外戚的威胁，尤其是贾皇后家族。贾皇后很可能派人暗杀了前一位皇后及其一家，而且也暗杀了不止一位皇太子。皇帝也不能完全控制朝官。西晋沿用了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任用官吏，用人很少凭借才学品德，而是根据家庭的社会地位分派职位。西晋将大片土地分给王公贵族，进一部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财源的获得助长了皇子们争夺王位的自相残杀。他们竞相争取支持者，争取的对象包括将军、蛮族首领及其军队。公元291年至305年间，内战在京城和附近地区全面爆发。

南北朝时期

晋朝四分五裂，皇子自相残杀，这些所引起的大战乱，招致了蛮族首领起兵反晋。公元二三世纪，政府将成千上万的匈奴和其他北方蛮族安置在中国政治疆域内，使之不再进攻中国。他们往往应征入伍，或成为辅助部队。这些以前的游牧部落现定居一地，依然从事畜牧业。他们不易管理，也不易同化。公元304年，汉化的匈奴贵族刘渊自称汉王。公元311年，其子劫掠了晋京城洛阳，城中居民惊恐出逃。公元316年，另一匈奴部落首领袭击了长安。其他并未充分汉化的匈奴首领，诸如石勒和苻坚也加入了混战。在一个多世纪中(史称十六国时期，公元304年—439年)，中国北方战乱不绝，这些战乱在很大程度上威胁了中国文明的生存与发展。

土匪和饥荒随战乱而至，北方各地农村都修建了围墙堡垒，组织民军自卫。



权力下移的结果是朝廷无力控制地方，其程度比东汉末年更甚。商业凋零，货币流通量下降，两百多万北方居民打点资产，渡过长江逃到南方。面对劫掠和受异族统治的威胁，甚至有钱有势的士族也长途跋涉，大批逃亡。权臣们在建康(今南京）拥立晋宗室琅邪王为新皇帝，建立流亡政府，史称东晋(公元317年－420年)①。晋之后的四个王朝宋、齐、梁、陈先后建都南京，统称南朝(公元420年－589年)。这四个短命的朝代均为军阀所建，他们在世时能够把持朝政，但却无力传位于儿子。他们渴望建立皇朝，却无法集中权力。

世袭贵族把持朝中高位，在一定程度上为君主建立独裁统治造成了困难。远甚于汉朝的是，这些豪门士族以出身为荣，只与同样显赫的家族通婚。他们甚至将地位最高的家族列入名册，附上家谱。九品中正制使贵族几乎毫无阻碍地获得朝中高位，既确保了他们的俸禄，也免除了他们的赋役。很多世族拥有的大量地产，由来自北方的穷苦难民耕种。后者类似农奴，依附于贵族。在朝中，豪门世族往往与“暴发”的君主作对，尽其所能使皇帝无法任用或晋升他想用的人。但我们不应将世族视为中国文明的破坏者。这些豪门世族自认为体现了中国文明，保持了汉代文化的卓越建树和儒生官吏的传统。有文化素养的豪门世族形成了稳固的势力，代替式微的国家成为文化中心，使中国文化得以发展。

在长江以南建都有利于南方的经济发展。公元311年洛阳失陷，此时南方有晋朝在籍人口的10%(不包括南方土著蛮族，他们不交税)。为支付军饷并体面地供应朝廷和贵族，政府必须安置移民或者使当地土著交税，以此扩大纳税的耕地面积。南方气候适宜，水量充沛，政府具有发展农业的美好前景。

南京朝廷的权威屡屡受到挑战，破坏性最大的一次反叛始于公元548年，发动者是一个后来称王的北方将领侯景。侯景率领一支由不满民众组成的大军围攻南京。四个月后城破，很多世家大族成员饿死在豪宅中。不久另一将领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陈)，但他无力控制边远地区，只能将当地首领封为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

同时，北方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公元4世纪，很多蛮族军事首领彼此争

① 东晋的统治时间应为317年－419年。——译者注



在分裂时期的频繁的战争中、步兵、骑兵和战马均穿戴盔甲。甘肃敦煌莫高窟285号洞的壁画，表现了当时战争的场景，显示了盔甲的应用。

斗，施展浑身解数把对手赶走。鲜卑的拓跋部落采用汉族的定居农业首先强大起来，建立了北魏(公元439年－534年)。鲜卑原居于东北南部，4世纪初占据山西北部，后以此为根据地，不断袭击其他部落和中原的汉族百姓，掳掠俘虏、马匹和牛羊。鲜卑扩张到中原地区以后，他们强制迁移了大量人口去耕种荒芜了的土地，以供应新建的都城。为主宰整个中国，他们向汉族的有识之士学习管理国家的方法。北魏朝廷任用汉人为官并采纳其建议的做法，并没有遇到太大阻力，因为在他们建立的政权内，鲜卑人和其他北方部落的人不及两百万，而鲜卑人企图在军事上控制的汉族人口却超过二三千万。

公元486年，北魏政府采纳汉族官员的建议，彻底检讨财政政策，实施了“均田制”。①这一制度使人联想到汉朝对个体小农收税的制度和曹操的军事屯田。北魏均田制的前提是土地国家所有，政府将土地分给各个农户，每家20亩种桑树和其它树木，土地永久占有，可世代相传。另分配土地耕种谷物，这类土地不可传子，分配的多少根据家中劳力而定。例如，每一强壮的男丁受田40亩，每头牛受田30亩，只有官吏可以占有较多的土地。建议实施均田制主要是为了“确保无土地闲置，无闲人游荡，豪门士族不能垄断肥沃土地，贱民也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一份土地”。㊀即使豪强不依法行事，政府也可以强制性地分配土地并征收土地税。均田制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一个政府奠定了强有力的财政基础。

① 北魏实施“均田制”的时间应为485年，即太和九年十月。——译者注

数年之后，孝文帝(471年－499年在位)决定效法汉朝和晋朝，将国家改为真正的汉化政权。在公元490年左右，他将都城南迁300余英里，在洛阳的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壮丽的城市。①他将鲜卑姓改为汉姓，为皇室取姓元(起源之意)。他命令包括鲜卑人在内的官员，在朝中一律用汉语，着汉服。他也鼓励鲜卑与汉族士族通婚。在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洛阳发展成一座雄伟壮观的城市，宫殿巍峨，屋宇华丽，有人口50万，佛教寺院逾千。众多的鲜卑贵族对中国文化传统烂熟于心，毫无拘束地与最上层的中国士族豪门交往。

但这一以洛阳为中心的汉胡结合的政权却好景不长。为击退干旷草原的新部族——柔然和突厥人的进犯，北魏在其北部边境派出鲜卑士兵驻防。这些士兵仇视汉化的鲜卑贵族，认为他们在洛阳这个汉风极盛的城市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公元524年，他们发动兵变。因奉命前往镇压兵变的将军们也发生了自相残杀，内战接踵而至。洛阳城破后，约两千官员惨遭杀戮。

在持续约十年的战乱之后，形成了两个主要敌手，各自控制着一位自封的魏的继承人。公元552年，东部势力放弃复魏的企图，建立(北)齐(552年－577年)；②公元557年，西部势力效仿齐，建立(北)周(557年－581年)。汉化的鲜卑人、中国士族与未汉化的武士之间矛盾重重，民族冲突削弱了两个朝廷的力量。北周政权征服了受南朝控制的四川。公元575年，通过巧妙的外交活动，北周得南陈之助共同进攻北齐。公元577年，北齐灭亡。北周兼并大片领土，统一了北方。但北周将领杨坚于公元581年篡位，建立隋朝。不久隋灭南陈，统一了中国本土(见第五章)。

统一有赖于实施新的军事体制，它既可以扩充军队，又不致使国库空虚。隋创立了府兵制，即由农夫自愿从军，轮流镇守京城和边境。到公元570年左右，府兵已增至20万。装备士兵需要大量开支，因为骑兵部队不仅需要配备马匹，而且人和马均还要穿戴盔甲以抵御劲弓强弩的攻击。骑兵携轻弓，射程为1000英尺，步兵的弓箭射程为1500英尺，守城或攻城的士兵所用弓箭更为强劲，射程超过3000英尺。府兵中的骑兵必需自备马匹，他们可能来自长期充当府兵的家庭。而步兵则征用家境较好的农民，这些农民也因此免予纳税。在不作战或不作训练时，府兵在家务农，这支军队因此所费不多。比起以前的军队，府兵更容易协调管理，因为以前的军队往往只忠于自己的上司。

客、部曲和奴婢

秦汉政权的岁人主要依靠直接对农民征税，为此政府必须努力保证土地和农民登记在册。汉以后的朝代国力式微，政府无力阻止穷人逃避债务和税收，也无法禁止有财有势者兼并土地和役民为奴，因此在分裂时期，很多人沦为奴隶或半奴隶。依附关系本身并非新奇之物——在东周末期，一般将臣民宽泛地分为普通的良人和贱人，后者包括那些因犯罪而受刑肢残的人，因罪孽深重而被处死的犯人的近亲也受罚为奴。此外，在东周末年和汉朝，被穷困逼得走投无路的人也会将妻子儿女卖为家奴或家仆。然而，根据律典，拐卖良人为奴的人要受严厉的惩处。

① 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年代为493年。——译者注
② 高洋称帝、建齐代魏的年代实为550年。——译者注



牛车比马车更为经济，两者成为当时常见的交通工具。这件陶器模型出土于一座位于山西太原的6世纪中期的陵墓。

或许很少有人将南方的土著视为良人，因在汉朝及其以后的朝代，这些人是被卖为奴隶的主要来源。

东汉以来，随着土地的集中和私人武装的建立，出现了五花八门的人身依附形式。为了求得大地主的保护，很多人宁愿自贬身价，依附于人。当地豪强蓄的客有些平时为主人耕田，战时替主人打仗，有些则纯粹就是部曲私兵。3世纪时，政府部分地承认了这种广泛存在的依附关系，但试图将蓄客仅限于官吏。晋朝政府颁布律令，规定官阶最高的至多可以有徒附40户，徒附可以免除租税和劳役；官阶较低的递减，最少的可以有10户。然而这些限制从未得到有效实施。南朝时类似农奴的依附民增加，因为很多难民定居在大地主的地产上成为徒附。

北方游牧部落的习俗加剧了农奴化和奴隶化的趋势。传统上这些部落即由部落成员和奴隶组成。当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打了胜仗，失败者就沦为胜利者的奴隶。胜利者将奴隶作为战利品在部落中分配，让他们承担大部分的体力劳动。在同南朝交战时，北魏的军队役使了成千上万的俘虏。得到被俘士兵的将领一般将他们编入军队，但收到数十数百俘虏的高官则把他们用作家奴或耕奴。北魏政府鼓励将奴隶用于农业，均田制的条款中规定奴婢也可分得一份土地。有时由战俘变成的奴隶可获自由或被赎买。5世纪中，一位南朝官员的妻子被俘获后沦为宫奴。这位官员用1000匹布将他年逾花甲的妻子赎回。一次一位北朝军官奉旨南去，用1000匹马交换了50名战俘。554年，当北周从梁手里攻克江陵后，10万居民被役使为奴。大将于谨得到1000名奴婢后转赠儿子200名。有些俘虏被亲朋故旧赎回，或在数年后为新主人放出。577年朝廷赦免了所有仍受奴役的人，同时规定那些愿意继续留在主人家的奴婢可以保持其依附地位，但主人应改善他们的处境。后

人对有关奴隶和家奴的生活状况所知甚少，材料大部分来自主人的叙述，主人的叙述中偶尔涉及到他们。在豪门世族之家，有时奴婢稍有冒犯，便被殴打致死，主人毫无所惧，不会被控犯罪。他们往往在奴隶面上刺字，使之不易逃走。女奴有时成为侍妾，其卑贱的出身可能传给子女。男奴所出一概为奴，他们父亲的主人可凭自己的兴趣，或将他们转赠他人，或留着供自己役使，也有放出去获得自由的。

佛教

在这个人们很难对朝廷忠心耿耿的时期，中国又与一种陌生的宗教遭遇。这是一种扩展方式超越了所有已知政府、把其教义传遍整个亚洲的宗教。在这若干世纪中，随着佛教思想渗入中国，中国人见识到一种对生与死、人性和宇宙万物等已有概念全然不同的理解方式。

几乎与孔子同一时代，历史上的佛陀释迦牟尼(佛陀指得道的人)居住在印度。他很自然地接受了印度有关宇宙万物的观念：因果报应和转世投胎。根据这一理论，生灵万物、男人、女人、牲畜、天堂之神、地狱之鬼和其它有知觉的生物，均根据因果关系即根据他(它)的善行或恶行升迁或沉沦，无休无止地转世再生。释迦牟尼自己灵魂的轮回使他认为，自己发现了关于人类状况的要义。他开始教导人们要放弃欲望，因为欲望是人类的苦难之源。当人们陷入欲望之网时，他们便连连失望，焦虑重重。释迦牟尼教导说，为脱离苦海，人们应该清心寡欲，一心向善(例如不杀生)，专注于灵魂，锻炼定力与悟力。虽然很多人必须终其一生的努力才能达到这一目的，但遵从此道的人终将脱离无穷的转世之苦，进入极乐世界。释迦牟尼最虔诚的早期弟子离开家庭，终日期望得救。释迦牟尼死后，弟子们口头传诵他的训诫。几世纪之后，他的训诫被记录成书，成为一部名为箴言的长篇佛学经典的基础。

从北印度，经中亚的佛教王国如天竺、库车，佛教沿商道随商货来到中国。最初只有外国人信奉它。中国人在2、3、4世纪所面对的并非单一的教义，而是各种各样的思想和实践，包括诸如寺院戒规、巫术、偶像、圣迹崇拜和坐禅入定之术。佛教传入中国时，大乘教义正处于发展之中，中国人同时接受了大乘教义和小乘教义。大乘佛教的信徒认为，仅以到达极乐世界为目标是自私的，应首先成为普度众生的观音菩萨。

西晋末年，中国上层社会开始接受佛教。削发为僧的人必须更改姓氏，立誓不婚，这样就放弃了对祖先的义务，割断了与家中死者、生者和后代的联系。但即使如此还是有很多人遁入空门，佛学教义在世族豪门中广为流传。北方的外族统治者也欣赏佛教。来自中亚的虔诚的高僧们有心利用巫术使这些君王们相信，佛教比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道行更高。但对于外族统治者，佛教另有功用。佛教声称世界大同，不像儒学那样，视蛮族比汉人低劣，这就为建立一个民族融合的统一国家提供了理论基础。

很多中国人最初认为佛教是道教的变异，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早期译者是用道教词汇来阐释佛教思想的。例如，大乘佛教四大皆空的思想被等同于道家的无。中亚名僧鸠摩罗什(350年-413年)[①]定居长安，指导数千僧侣译经300余卷，使中国人对佛学有了较准确的理解。这一时期，中国人也长途跋涉，前往印度学习梵文

① 关于鸠摩罗什的生卒年代有两种说法：一为344-413年，一为350-409年。——译者注



青铜祭坛饰物，描绘坐在莲座上的阿弥陀佛由弟子侍从相伴。上面的铭文表明，这件饰物于593年由八位老年妇女所捐(她们列出其子的姓名，称自己为他们的母亲)，以为家人赢得功德。

经典。首位将取经过程记录下来的是勇敢的法显。他于399年由陆路经天竺、和阗到达印度。414年由海路经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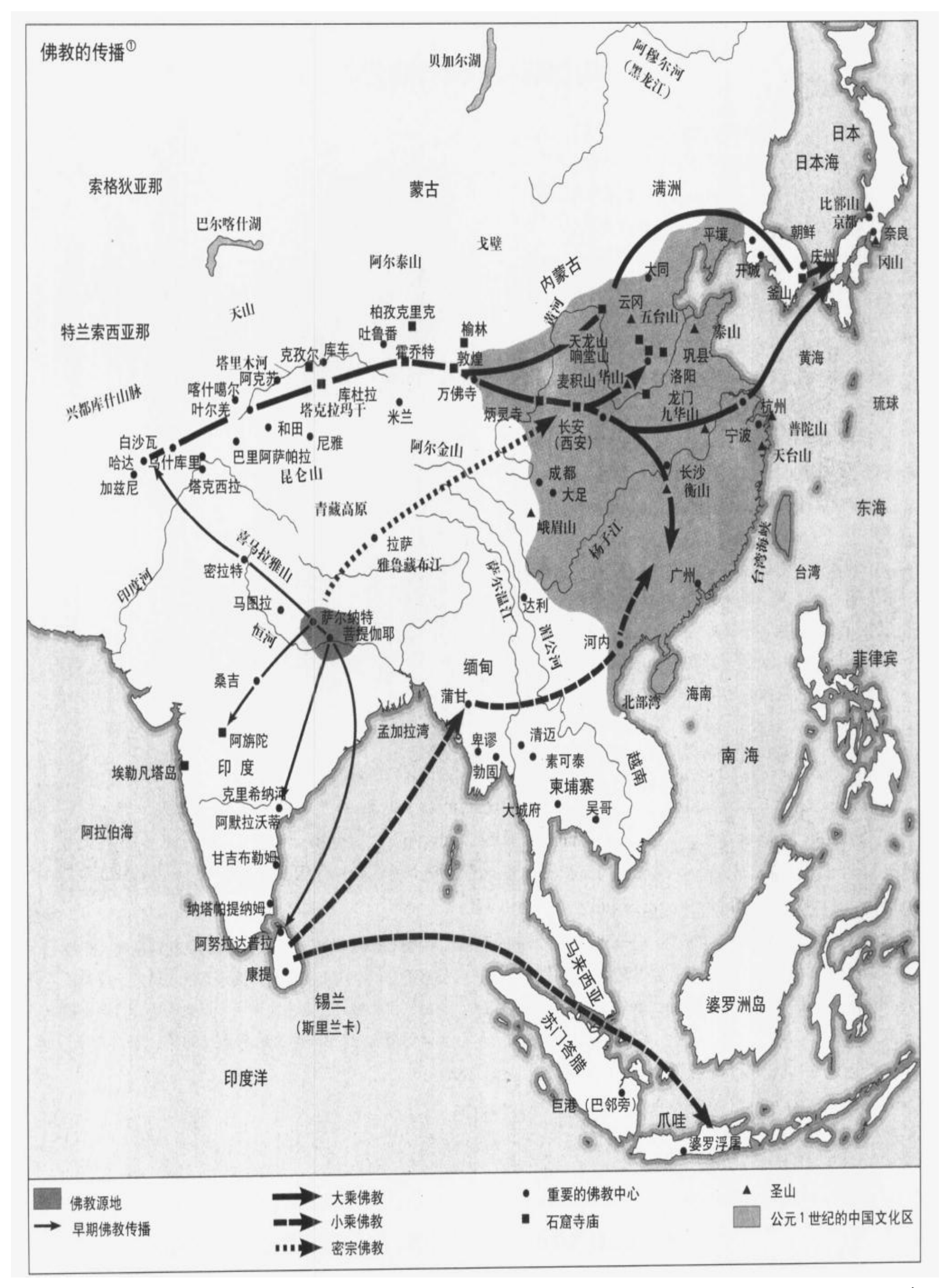
高僧慧远(334年–417年)[1]的经历可以说明佛教在中国逐步适应和发展的过程。慧远生于北方最战乱的年代，但他仍设法初步学习了儒家和道家学说。但在聆听了一位中国僧侣(天竺高僧的弟子)的讲经之后，他决定出家。他迁居南方，并在江西的庐山建了一所寺院。他就高深的经学问题同鸠摩罗什通信，也同俗家信徒来往，教他们坐禅入定之术，招来佛陀显灵。402年，他约集僧侣和俗人信徒到阿弥陀佛像前，许愿死后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说明佛教越来越吸引信徒，成为普济众生的宗教。两年之后即公元404年，慧远写了题为《沙门不敬王者论》一文，坚持佛教寺院在政治上独立于国家。他也努力向君主保证，佛教不仅不会蓄意颠覆国家，相反，由于世俗佛教徒相信因果轮回，渴望在西方极乐世界得到再生，所以他们会谨小慎微，成为顺从的臣民：信佛者无他，唯先孝敬父母，尔后服从君主。

在隋重新统一中国之前，佛教已在中国广为流传，胜过了所有传统的中国学说。佛教直接阐述了苦难与死亡，为人们详尽描述了来世和超生的远景，宣扬所有生灵总有一天会摆脱苦海，到达极乐世界。佛教的行为准则，包括禁止杀生，对很多人来说是将同情怜悯的原则合乎逻辑地发展到了极致。遁入空门削发为僧尼，为厌世者指出了新的出路，对上层阶级的寡妇尤具吸引力。事实上，佛教对妇女更具吸引力——虽然转世为女不如转世为男，但生为女身只是暂时的，它鼓励妇女像男人一样争取灵魂得救。此外，与中国本土所有传统思想不同，佛教为妇女提供了一些中性象征，如观世音既非男身又非女身，不仅超越了阶级和种族的差异，也超越了性别差异。

当都市和偏远的山间都修起了庙宇寺院时，佛教也改造了中国的景观。到477年，据悉北方有寺院6478座，僧尼77258人。数十年之后的南方，据说有2846座寺院，82700个僧尼。所有文人墨客都为佛教艺术及其建筑的华美所倾倒。佛教有助于抹杀阶级差别，如佛教塑像上和庙宇中的题记显示，汉族及非汉族官吏、当地士族、百姓和僧侣往往齐心合力，共同为修筑佛教工程出资出力。对寺庙施舍的规模大得惊人。虔诚的世俗信徒都相信将他们的财富施舍给寺院庙宇是一种博得美名和对父母行孝的捷径，为此他们甚至向寺院捐赠土地和奴仆。最慷慨的皇家施主是梁武帝(502年–549年在位)。他要求宫中长斋素食，广建寺庙，批注佛经典籍，并召集盛大的法会讲经，僧俗两界参加者甚众，有一次多达5万人。为了筹钱建寺，梁武帝甚至“舍身”出家，直到宫中筹集巨款将他赎回。

并非所有的人都为佛教的大举成功而兴高采烈，敌对的道家和儒生将佛学思想及其所作所为，贬斥为不道德或不适应中国国情的东西，他们指责僧侣削发和将死

① 慧远的卒年应为416年（义熙十二年八月）——译者注。



佛教的传播。佛教在从一国传到另一国的过程中，吸取了各国的思想和艺术，并以一种变化后的形式继续传播。发展于阿富汗的佛教艺术包含了希腊的艺术风格，它后来随佛教传到中国。与此相似，为超度父母亡灵所做的功德、典礼等仪式，使中国有关孝悌和敬祖的思想融入了佛教，并作为汉化佛教的组成部分被传到了日本。

① 佛教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传入中国，经三国两晋南北朝到隋唐鼎盛，前后历经八九百年，因此地名多有变化。上图大部分采用了近现代的地名称谓。——编者注

陶渊明和中国诗歌艺术

由于不同的声韵和丰富的格律，古汉语很适于写格律诗。中国文字也同样利于诗歌写作，因为它与拼音文字不同，能够激起视觉联想。或许因为上述原因，诗歌自古便在文学中占有中心地位。在孔子时代，使臣与哲学家为了显示其博学，也为了使自己的论点更有说服力，大多在演讲和文章中引用《诗经》。汉朝时，研究《诗经》的学者强调诗与表达感情之间的关联。评论家指出，诗要有感而发，敏感的读者可以通过诗窥见诗人的情感。在分裂时期，士族崇尚词藻的华丽，使诗歌艺术达到高峰。诗开始发挥独特的文化作用，将性格复杂的诗人那强烈而又矛盾重重的情绪表现出来。

以陶渊明之名著称于世的陶潜(365年－427年)，是首批这类诗人之一。他生于南方(现江西省)，居官不甚得意，从未长期任一职。据说有一次，他因不愿款待一位来访的显贵而辞职：我岂能为五斗米向这个乡里小儿折腰。他有时表现得野心勃勃，有时却又愿意随心所欲，归隐田园。他40岁时辞去官职，靠务农为生。现存的陶渊明文集存诗100余首，很多富有哲理，道家色彩浓厚，如"甚念伤吾生"，"任真无所先"等等。陶渊明虽然赞美乡居生活，但他并非不见亲朋好友的隐士。他在诗中流露出对书、音乐和酒的喜爱："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陶渊明也把田园生活理想化了，将其描述得充满乐趣，胜于做官。在《归园田居》的诗中，他将自己表现为一个心满意足的农夫：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



数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画家们从陶渊明的人生经历感悟到，个人是可以脱离政治生活、满足于质朴乐趣的，因此他们经常画陶渊明，以此表达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这幅绢画由陈洪绶(1598年－1652 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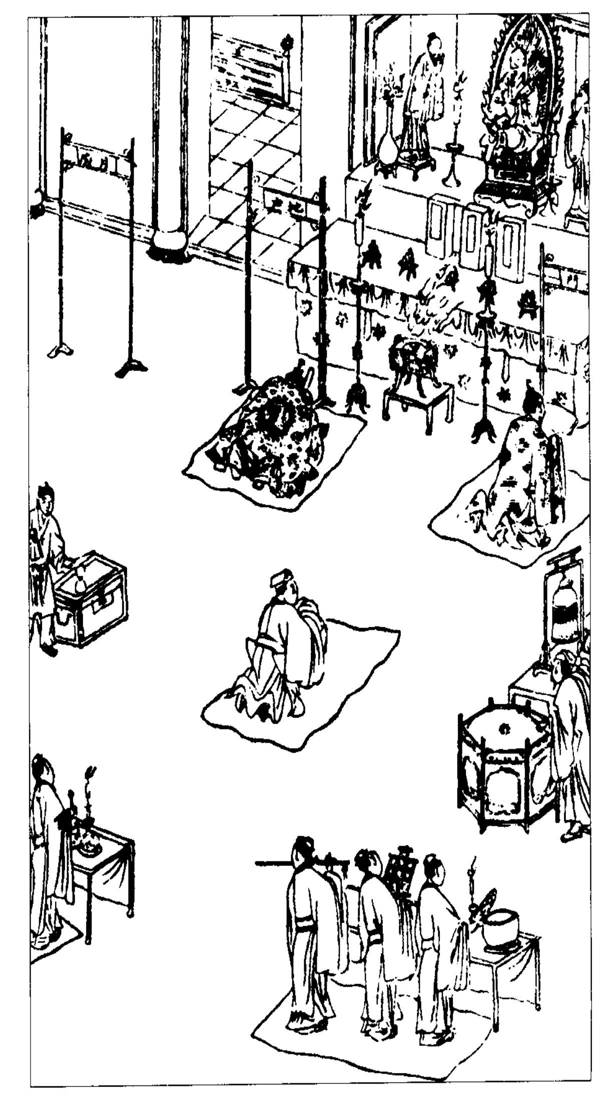
者火化是自残身体，为儒学所不容。最不可原谅的是独身，因为按照孟子所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们也谴责僧人不服从君主，不交纳租税，认为这不利于国泰民安。他们声称耗巨资修寺庙、建塑像、行仪典，对经济极为不利，造成民贫国穷。为驳斥这些指责，使更多的民众皈依佛教，佛学家们声称，佛教基本上合乎中国伦理道德，以父母的名义行善，诱使他们脱离炼狱之苦，实在是最大的孝行；僧侣们为君主和民众念佛是助国而非害国。

甚至接受佛学家这些看法的君主也认识到，庙宇寺院广占田亩而不纳租税对国家财政不利，需要给它们定些规矩。君主们一般同意寺院地产不可侵犯，不纳租税，僧人免服劳役，但他们也要求僧人必须博学虔诚，并非只为逃租逃税。北朝君主在强烈反佛言论的鼓动下，两次灭佛。446年—452年间和574年—579年间，君主颁布律令强制关闭寺院，命令僧尼还俗，但不干预私人拜佛。国家从未调查私人信仰，也从未要求官吏谴责佛教。而且，这两次灭佛都仅仅延续到这些君主统治的末期，继位的君主则完全改弦易辙。

道教

佛教作为上层宗教，具有自成体系的经典和僧侣群体，它在中国的传播恰与道教作为上层宗教在中国的崛起同时，并促进了后者的发展。道教从周代清静无为的道家哲学中吸取灵感，但并非是对后者简单的扩充。它也融合民间宗教的成分(崇拜地方神祇及驱鬼通灵之术)及长生不老和成仙之术等贵族传统。作为一种有组织的集体宗教运动，道教起源于公元2世纪。由于汉朝政府无力控制广大农村，黄巾军首领张角和首位天师张道陵这两位宗教领袖得以将人民对美好时代的渴望，转化为浩大的宗教运动。二人在不同的地区活动，以法术为人治病、吸引信徒，并组织属下管理徒众。184年起义后，张角及其拥护者被镇压，但张道陵在四川所创教派却生存下来。

在以后的朝代中，道教继续发展，道士们经常主持盛大的仪式。这幅插图选自一本1618年版的小说。画上一位道士在坛前作道场，坛上置塑像和香烛。画中也有乐师，请道士作道场的男子跪在地中央。



到汉末，道教有关成仙之术的传统已十分悠久。秦始皇和汉武帝均延请方士习长生不死之术。道家的长生之术建立在强化身体中的阳气以逆转自然死亡进程的理论之上。靠运用特殊技巧(诸如控制呼吸、限制饮食、使用房中术、以及服仙丹、草药和符咒)，一个人可以积聚和提炼身体中的阳气，将沉重的必死之身变成轻灵的不死之躯。

在分裂时期，道教有了自己的一套经典与佛经抗衡。在364年—370年间，有父子两人为住在太清天宫的众神仙们编造了一系列故事，这个太清天宫高于任何通灵之境。他们从神仙处得知，魔力将清除地上的恶人，以等待新世界的统治者自天宫降临。其中有些学说显示出他们对一些佛学思想如宿命论和转世投胎等烂熟于心，书中也有炼丹的传说。数十年之后出现了《灵宝经》，该经记载的祭典仪式是经过精心编排的。415年，北方的天师道道士寇谦之以老子本人为宗，宣称老子命他改革道教，清除房中术和其他冒犯神祇的仪典活动。这样道教便拥有了连篇累牍的经文。但与广为流传的佛经不同，只有道教信徒们才能一睹道经。

在南朝统治下，道观与佛教寺院一样比比皆是。在分裂时代的末期，道与佛在城乡各处竞相争取民众。道士们声称他们有更灵验的符咒、更有效的养生之术以求长生不老，能更好地控制邪恶的地方神灵。佛僧们则声称他们的原

则更为崇高，能更好地使灵魂得救，帮死去的亲人转世投胎。道教和佛教均力图迎合民间信仰，愿意把当地神灵吸纳为自身系统中地位较低的神，但均拒绝向神供奉肉食。在当时和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皈依佛教的中国人比成为道教信徒的多，修建的佛教寺院也比道观多，但二者都是通过相互竞争及与中国政权和世俗社会的互动而发展起来的。

各地区的不同发展

到6世纪中叶的时候，中国在政治上分为南北两部分已有两个多世纪，这就默许了各地区社会文化的独立发展。

北方和南方的豪门世族有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北方的世家大族一般盘踞在累世而居的乡村老宅，他们重视儒学，对儒家的家族伦理和礼仪传统身体力行。出于儒家所谓的责任感，也由于做官可带来威望权势，并利于同国内其它地区世家的交往，因此他们极力谋求政府中的高官要职。他们大部分时间做地方官，一般是先在家乡任较低的职位，然后升至郡守一类掌握兵权的要职。在朝中，北方士族必须通经典历史，很多人博学多识。例如东北豪门后裔魏收所著《魏书》，全书114篇[①]，不仅全面叙述魏的鲜卑族和汉族统治者，也精辟地阐述了佛教和道教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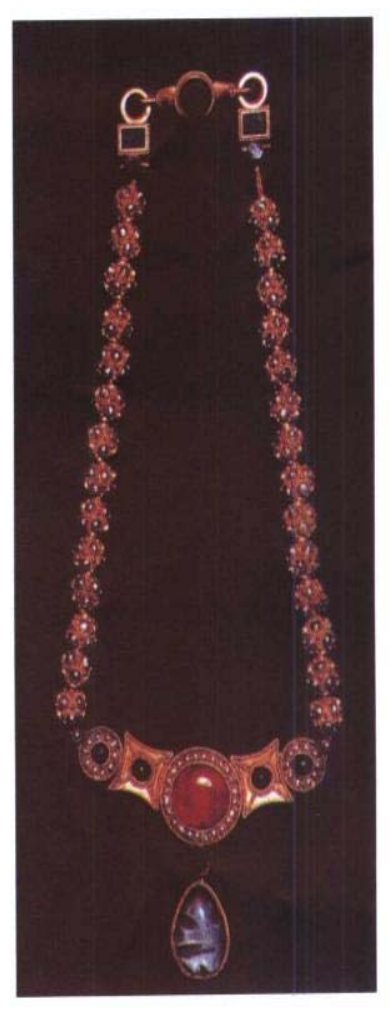
对于有意立国的北方统治者来说，这些豪门的实际经验是真正的财富。相反，那些南迁士族却恋乡怀旧，对魏晋文化生活满怀追忆之情。朝廷保证了他们的俸禄，使他们有闲暇从事艺术创作。南京士族文化生活的标志是巧辩、美酒和辞赋。“清谈”最初着眼于分析个人品格，后来逐渐推广到探讨有关文学、艺术和哲学著作的基本特色。在推崇品味的氛围中，文学批评繁荣发展。约530年，梁太子编纂《文选》，其中收入30余类精挑细选的诗文。书法和绘画艺术也得益于对表现个性和追求华美的推崇。王羲之被很多人称为历代最伟大的书法家，他从道家对自然和本性的强调中受益匪浅。人物画大家顾恺之比王羲之稍后。人们对山中神仙的兴趣以及道家对自然的喜好，孕育了山水画。6世纪初，谢赫阐述了评价绘画的标准，例如运笔的力量和蕴含的活力。由此，人们将绘画与书法同陶瓷、漆器或布帛所制的饰物加以区分，确定前者具有精神内涵。

北方士族认为南朝的惟美之风是萎靡不振的，甚至有些南方士族也认为追求雕琢之美会堕落为空洞地讲求形式。颜之推抱怨说，很多豪门世家的青年只知涂脂抹粉和熏衣香，却不会为宫廷宴会赋诗一首。他认为闭塞的生活导致他们精神空虚贫乏；他们靠官俸为生，全然不知如何耕种五谷。他对南京士族的描绘使人联想起《源氏物语》中有关中世纪日本讲求华美的贵族的故事。因此，政治上的南北分裂并非不利于文化的发展，相反，也许更有利于佛教的成熟。北方的佛学中心与中亚的联系更为密切，并明白佛教是外来宗教，只有通过佛学家积极认真地翻译佛经，才能保持其活力。南方与中亚没有直接的陆路交往，学者致力于佛教的中国化，因此，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和宗教的框架内解释、阐述佛学思想。在隋唐统一中国之后，这两种风格流派得以相辅相成，促成了佛教在中国社会中扎根。

与此相似，政治分裂也促进了中国政治理论的发展，因为不同政权的拥护者

① 此说不确。《魏书》原分为131卷，北宋时亡佚30卷，后人补人。现存124卷。——译者注

都力图在理论上证明其天子地位的合法性，证明其作为汉朝继承人的正统性。北朝的论据是地理位置，它统治着周代与汉朝都城的所在地，统治着所有中国历史上的圣地和古迹所在地，包括以前历代君主的陵墓。另一主要论据是对周汉两朝政治传统的继承。北方一个政权自名为周，并根据古时《周礼》中所列的名称对其政府机构重新命名。南朝的中国人无法以其地理位置为荣，但他们着眼于君主的民族性，因为南朝君主是不折不扣的汉人。他们也根据皇位继承的礼法，根据君主彼此禅让以维系天子帝统不绝的传统，精心阐述了自己的理论。因此，由于汉将帝印传于魏，魏传于晋，晋传于宋，所以南方的流亡君主们才是合法的天子。



在整个大分裂时期，中国与中亚的贸易从未中断，北方贵族尤其愿意进口远方的奢侈品。这只项链由黄金、珍珠和天青石制成，可能于6世纪后期制于波斯或阿富汗，是一个9岁贵族女孩随葬品中的一件。

当然南朝和北朝并未独立发展，二者既彼此联系而又互相竞争。南北两地的中国士子识同样的文字，读同样的书籍，两地之间商旅不绝。有些是不得不为之，有些则是自愿成行。交流与隔绝同样有利于二者独特的认同。

对后世的中国史家而言，在大分裂时期，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发挥了天子的中心作用，即未能在普天之下建立一个天人相应的和谐秩序。因此这一时期主要被视为重要的反面例证：诸如混乱无序、民族敌对、血腥的宫廷争斗、暴虐的君主和被奴役的俘虏，所有的一切都证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一统天下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正因为国家无力严密地控制社会，中国文化才有机会变得多姿多彩、繁荣昌盛，普通百姓和社会精英才能够认同在某种程度上是非官方控制的思想体系。

西方人和熟悉西方历史进程的中国人，往往将大分裂时期称为“中世纪”，因为它类似于欧洲罗马帝国覆灭后的时期。不论在中国还是在欧洲，当时的大帝国纷纷土崩瓦解，曾辅助作战的蛮族部落取得胜利，发达的城市经济凋零下来。不论在中国还是欧洲，宣称宇宙大同的异国宗教长驱直入，宗教狂热导致修建庙宇塑像，耗资甚巨。尽管这些相似之处十分引人入胜，我们却无法不注意到中国与欧洲历史之间存在着同样重要的差异。虽然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有一个多世纪之久的混乱，但到5世纪中，国家已处于建设之中。在周代，诸侯效忠天子的局面，最终为各国各行其政的形势所取代，也许是因为中国政治家们熟知周代因诸侯分封而导致政治分裂的历史，因此立国者们力图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制度，而不愿出现一个分封多元的政体。

蛮族大举入侵对中国文化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在中国北方，人们继续说汉语，鲜卑语最终消失不见了。查理曼大帝无法否认或淡化其日耳曼传统，因此也就无力像罗马帝国皇帝那样行事。与此相反，隋朝和唐朝皇帝说自己及其祖先是古代中国人的后裔，却一点儿困难也没有。这样中国人就从未像西方人那样在道德和感情上都有一种强烈的与上古历史的隔绝感。

同样重要的是，在中国，教育和学术从未被忽略。南北方的士族均博学多识。南方的精神氛围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创新，著名的文士决不逊于数世纪之前的汉朝文士。与印度文明的接触在中国思想界激发了对外国文化的探索欲和对本国文化的反思，因为与中国以前接触的文明不同，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几乎同样的灿烂悠久。例如，千方百计设法表达梵文的声调使学者们开始分析中文的四声。在中国，分裂对商业的打击也不像西方那样沉重。当然在4世纪时，贸易中断了，货币也不太流通。但到5世纪后期，商业经济开始恢复，南北方之间的贸易也上升到可观的水平。

早期佛教艺术

佛教对中国的视觉艺术尤其是雕塑和绘画，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将佛教传入中国的商人和高僧，也带来修建装饰庙宇的方法和绘制佛陀观音的技巧。希腊和印度艺术的影响也传到中国，它们经佛教王国天竺(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沿丝绸之路上的佛教中心到敦煌，然后到达中原大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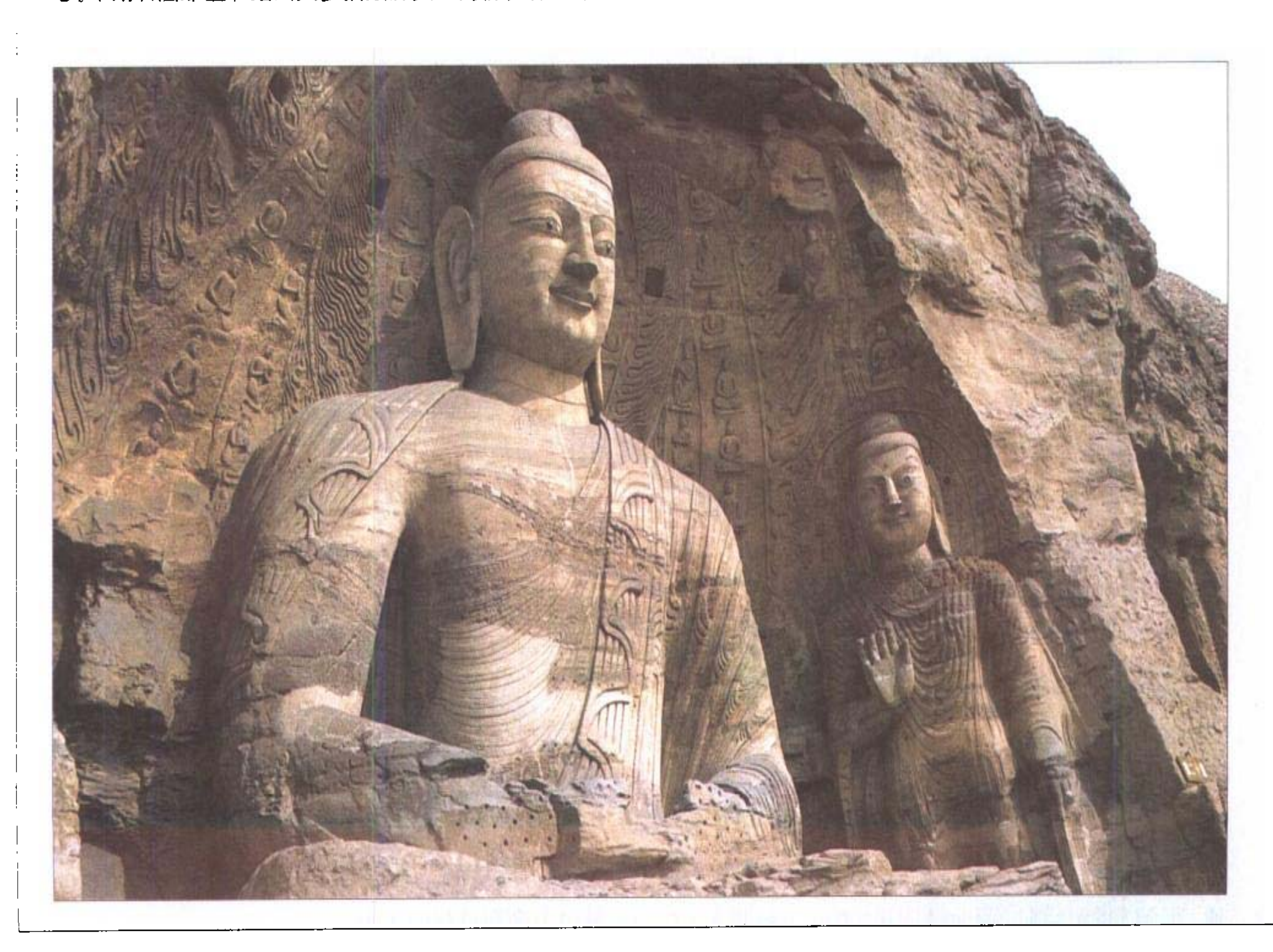
在敦煌和云冈的石窟保留着中国早期佛教艺术最丰富的遗迹。当都市中的庙宇毁于对佛教徒的政治迫害之时，这些石窟寺庙免遭浩劫。位于甘肃西部敦煌的石窟寺庙多半于公元400年开始修建，工程最初由当地僧侣发动，前后持续了数世纪之久。当时的多半敦煌居民可能不是汉人，因此早期的石窟装饰表现出强烈的异族风格，与流行于西方其它沙漠城镇如库车、和阗的佛教艺术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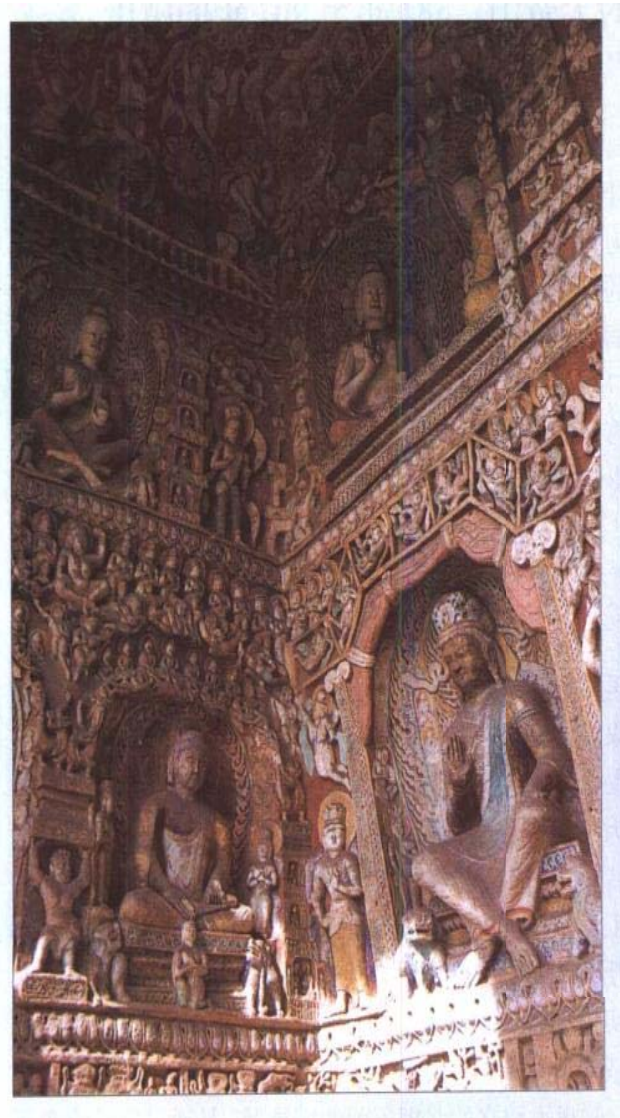
公元460年，北魏朝廷着人在云冈修建石窟寺庙，云冈距北魏在山西北部的早期京城不远。在494年北魏南迁京城于洛阳之前，53个洞窟的大部已凿成。5个最早的洞窟中有巨大的石刻佛像，最高的一座立佛达21米。

在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寺庙内并无神祇的塑像或画像，但佛教徒既用佛像传播佛学教义，也以此作为朝拜的中心。早期石窟雕塑和绘画大多描绘历史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的生活经历。佛像一般表现他正在面无表情地坐禅。它们有鲜明的印度人特征，尤其是长耳垂和隆起的头盖骨。与此相反，一旁的观音却貌如凡人，佩带臂环耳环，站姿不同。公元6世纪，中国艺术家表现佛祖观音的手法日臻完善，其体态更苗条，造型更生动，反映了中国世俗绘画所崇尚的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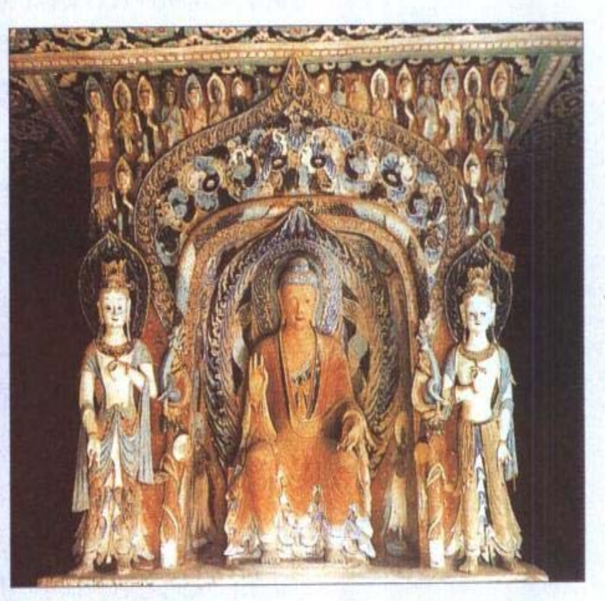
虽然敦煌、云冈以及稍后建于洛阳附近龙门的石窟庙宇拥有大量遗存至今的五六世纪的佛像艺术，但它们只是当时大量佛教建筑中的一小部分。城镇和山间众多的庙宇殿堂，提供了各式各样的感官刺激：除了缭绕的香烟和不绝的念经声外，还有诸如雄伟殿堂和高耸宝塔的美景，建筑物上绘有表现天堂、佛祖及其主要门徒生活的壁画。始于524年的战乱摧毁了洛阳城中的寺庙殿堂，这使杨衒之十分懊丧，他为此撰文描述了这些寺庙的辉煌。根据他的说法，景明寺最为宏大，每年四月初七，城中所有佛像共1000余座都移到寺中，皇帝亲自来向佛像上散花，举行盛

这尊云冈大佛(490年建造)高约14米，可能是模仿阿富汗的巴米安佛石窟，为51000座凿在峭壁上的佛像中的最大的一座。这些刻有佛像的石窟绵延0.8公里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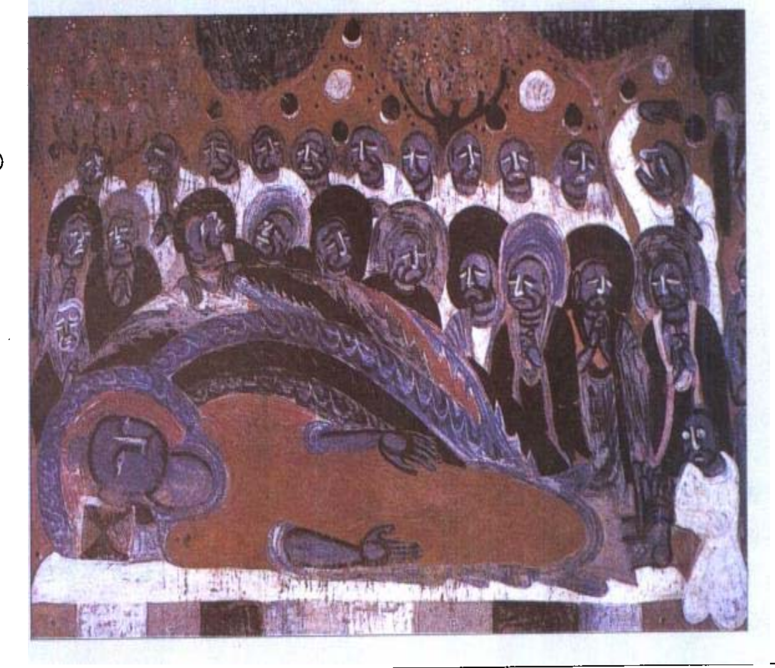


左图　云冈9号窟壁上绘有站姿或坐姿的佛像，佛为观音环绕，伴有神仙、乐师和飞天。最下部为一系列浮雕，说明释迦牟尼的生平。



上图　敦煌432号窟的中央祭坛，建于西魏时期。彩绘的瓷土佛像由一对观音相伴，观音像各高约4英尺。

大祷告。"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没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㊂



右图　敦煌428号窟西墙上的壁画，描绘了佛祖圆寂时众弟子哀伤的场面。绘于6世纪初。

第五章　世界性的大帝国：581年至907年的隋唐

隋朝(581年－617年)于6世纪末统一了中国，但却很短命；其后的唐朝(618年－907年)则将中国扩展为一个充满活力的世界性帝国。国家的统一、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两座宏伟京城的修建和国内国际贸易的扩大，均刺激了经济发展。唐朝京城长安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有居民百万，吸引着来自亚洲各地的商贾、留学生和朝拜者。安禄山(755年－763年)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使这一发展时期告一段落。在此之前，唐朝的中国人眼界格外开阔，对其他文化广采博收，音乐和艺术尤其受到异国影响，来自中国本土之外的学说与仪式继续丰富着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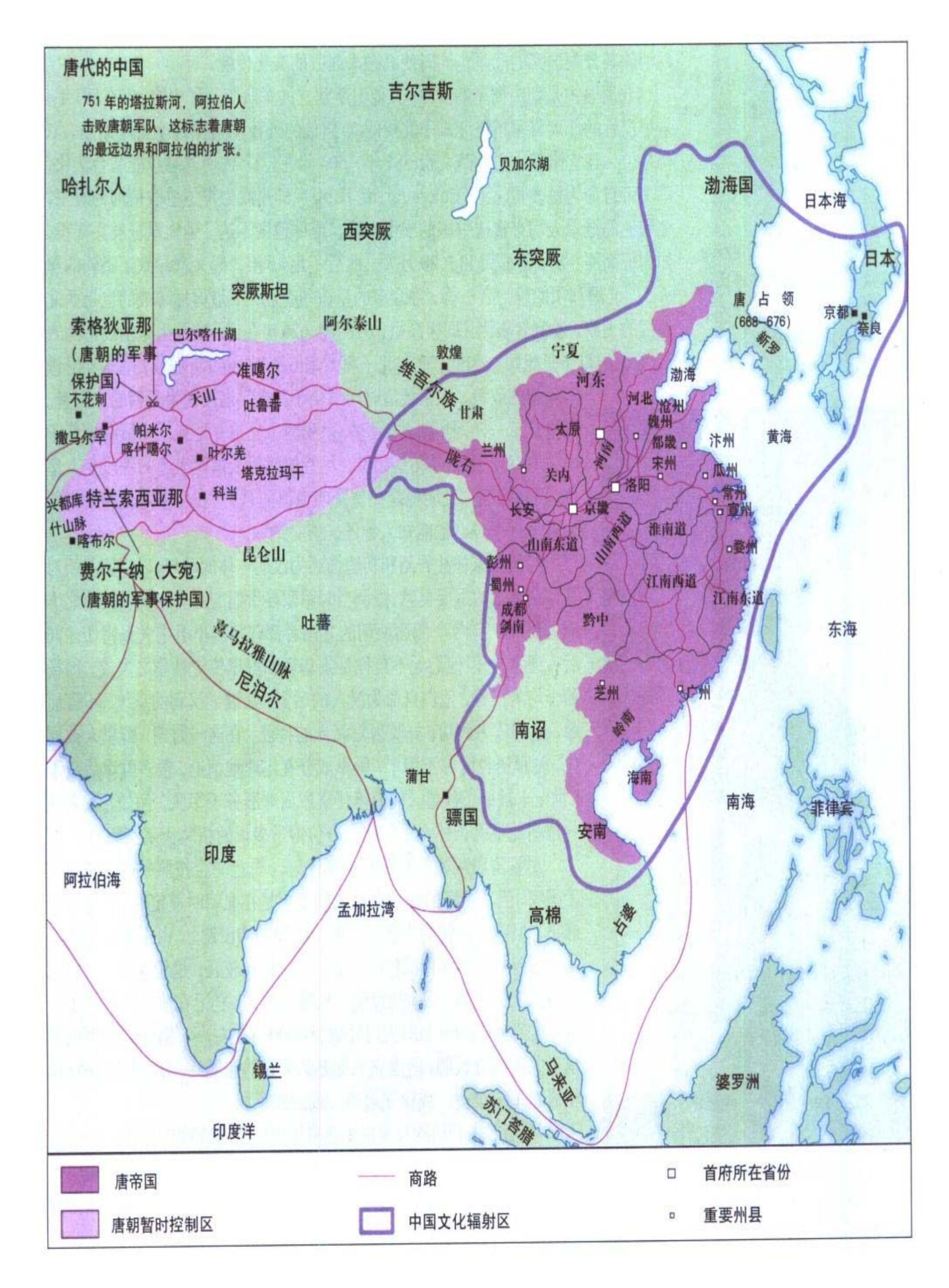
帝国的建立

中华帝国在6世纪末再度成为一统天下并非必然。当时中国分裂为南北两部分已有两个多世纪之久，双方均自称是周朝和汉朝的真正继承人。考虑到南北中国的地理差异，这一局面很可能永久持续，如同西方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南方和北方可能发展为不同特色的中国文明。但南北方确实实现了统一，这对中国文明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与汉代相比，唐朝的中央集权官僚君主政体建立在更牢固的基础之上。统一与随之而来的和平导致了延续三个世纪的文化繁荣。从此之后，以中国历史为鉴的人除了以古代(夏、商、周三代)，也引“近世”(汉、唐两朝)为例来证实中国统一的正确性。似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诸国分立的局面，不是自然合理或众望所归的。

统一中国靠武力完成。鲜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的继承者，是通过宫廷政变而先后建立起西魏、北周和隋的。这些后来的朝代于553年攻入四川，577年占领东北，589年攻克南方。攻克南方靠水陆夹击，双方均动用数千艘战船争夺长江。隋朝征服者将南朝首都南京夷为平地，将城中的士族官吏强制迁往隋朝新都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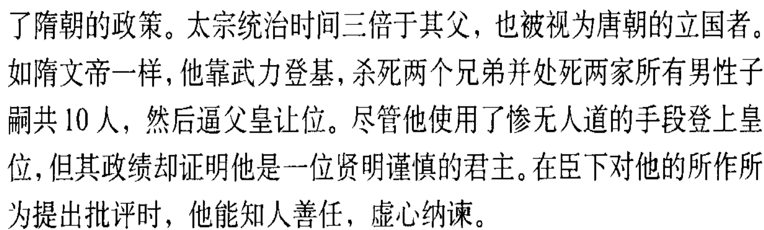
饮茶在唐代成为时尚。这个镀金的银茶碾是用来把做成茶饼的块茶碾碎的。869年，它与其它器皿一起被皇族捐给陕西西安附近扶风的法门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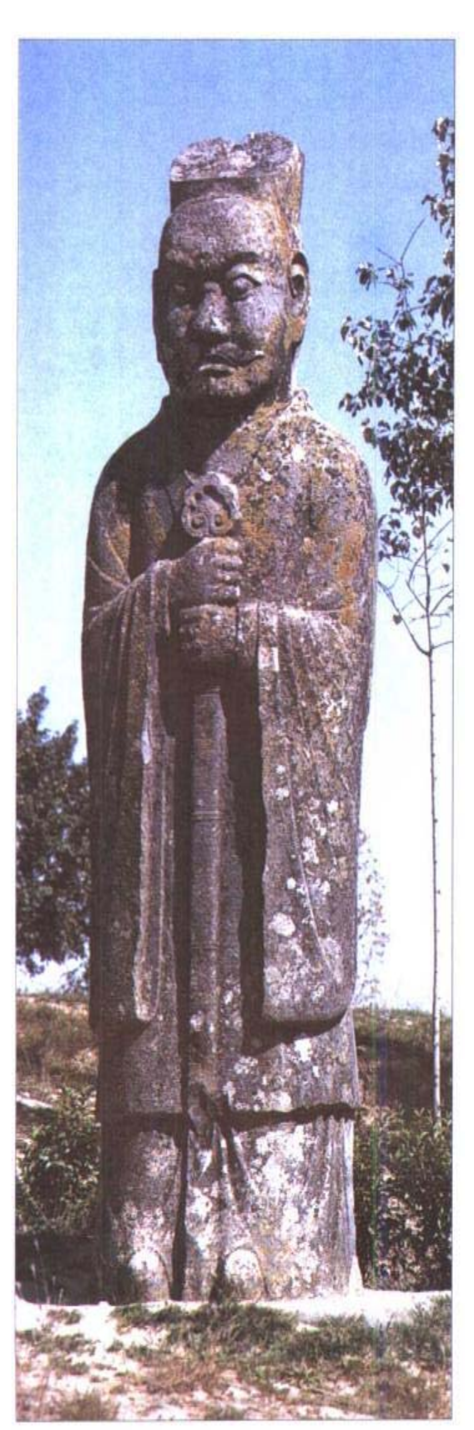
上图　唐朝时，中国一些邻国学习了中国的治国之道，如东北面的新罗、渤海，东面的奈良时期的日本，西面的南诏和吐蕃。在中国文化的渗透不太深入的辽阔的中亚地区，中国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威望。

以消除其分裂国家的危险，同时使其融入北方的文化传统。

北周君主是彻头彻尾的鲜卑人，他们所建立的军队统一了中国。但在581年，采用汉姓的北周将军杨坚废黜了北周的太子(他的外孙)，杀掉59名北周宗室，取得皇位，建立隋朝，史称隋文帝(581年－604年在位)。为使其篡位登基合法化，隋文帝自命为佛教转轮王(Cakravartin King)，即用武力捍卫佛教信仰的君主。他和他的继承人均有重建中国的宏图大略，但欲速则不达。他大量征发兵徭役，如为征高丽，612年征兵113.28万人。此后不足40年，起义就导致了隋朝的覆灭。同北周和隋的统治者一样，在众多的皇位争夺者中，最勇猛善战的也是西北地区的士族。胜利者李渊（即唐高祖，618年－626年在位）实际上是隋炀帝的表亲(他们的母亲是姐妹)。因此，他和儿子唐太宗(626年－649年在位）基本上沿续了隋朝的政策。太宗统治时间三倍于其父，也被视为唐朝的立国者。如隋文帝一样，他靠武力登基，杀死两个兄弟并处死两家所有男性子嗣共10人，然后逼父皇让位。尽管他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登上皇位，但其政绩却证明他是一位贤明谨慎的君主。在臣下对他的所作所为提出批评时，他能知人善任，虚心纳谏。



这尊石像为排列在通往唐高宗陵墓小径上的许多尊文武官员石像中的一尊，它意在表现高官重臣应有的品行：冷静、恭顺、坚定。



当代史家往往将隋和初唐描述为汉胡一体的政权，以强调北朝对其体制基础的重要贡献，强调当时军政显贵们的鲜卑血统及其他北方胡人血统。 确实，隋唐两朝的立国者都曾与鲜卑君主关系密切并同后者通婚。 但他们无不自称是集华夏和鲜卑传统精华之大成。因杨和李均为汉姓，他们自命为汉人的后裔，延续了汉朝的皇统。不言而喻，他们认为武功、好骑射是汉人的特征。在这一时期，鲜卑人被同化，鲜卑语也废弃不用了，鲜卑成分在迅速地消逝。很多鲜卑后裔于5世纪末被赐予汉姓，他们担任文职而非服务于军队。例如，太宗的一位朝廷重臣长孙无忌，就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拓跋氏宗室后裔。

尽管隋唐两朝的开国君主都认为，自己完全按照中国传统建立了国家，但其国家的基石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朝时奠定的。虽然有所修正，但隋唐两朝均沿袭了首创于北魏的均田制。 由于采取了统一的征派谷物、布匹和徭役的形式，使得捐税较轻，逃税者减少，登记在税册上的户数有所增加。统一后数年之内，登记在册的户数翻了一番，达到900万户(当时人口总数为5000万左右)①。隋朝和初唐也继承了北周的府兵制，即建立一支亦兵亦农的志愿兵。分到田亩的农民轮流在军中服役，或镇守边陲，或卫戍京城。

隋唐君主利用这只军队迅速将势力扩展到当时的中国本土之外。在亚洲内陆，强大的突厥人不断骚扰边境。为使突厥人就范，隋唐君主沿袭旧制：在边境修筑工事，将公主下嫁突厥王公，对突厥可汗进行封赏，与突厥通商及让突厥向中国朝廷遣使纳贡，以及挑唆突厥部落自相残杀。例如，605年契丹从东北面进攻中国，朝廷派一位中国将领率两万突厥骑兵阻击。 打败契丹人后，朝廷将俘获的契丹女人和牲畜赏赐给突厥人。但630年，唐转而使用武力征服突厥人，使鄂尔多斯和西南蒙古摆脱突厥控制，为太宗赢得天可汗之称。 这使

① 隋平陈后，户口由开皇初年的450万户增至700多万户。至大业二年(606年)，户口已达到890万户。——译者注

唐的势力扩展至中亚丝绸之路沿途的城市。640年—650年间，中国在这一地区重建了统治权。

在内部，隋和初唐时积极建国，强化、统一了政治体制，编纂法典律令。隋朝颁布的刑律融汇了南北方的司法传统，而唐律以隋律为基础。遗留至今的最早的律典是653年的唐律。其中对被判有罪者根据情节轻重规定了500种不同的惩罚。例如有轻杖十下，重杖一百下，服一至三年徭役，终身发配边远地区服徭役及受监禁，直至死刑。与以前的律典相同，这些条款按照尊卑长幼关系量刑，有

书法艺术

在中国，或许比任何其它地方更甚，书法被视为美术的一种。书法家一般博学而地位显赫。各种字体，诸如隶书、行书和草书，各有不同的用途，视书法家的情绪和需要而定。每种字体又涉及各种不同的风格。人们认为书法作品反映作者的性格和情感。书法家用柔软的毛笔书写，据认为，运笔的力度、均匀度和流畅感表现了书法家的道德和心理素质以及他瞬间的情绪。众所公认，书法体现人品，因此唐朝时书法成为任命官吏的重要依据。为练好书法，必须注意训练和尊重传统。希望掌握书法艺术的人，必须先勤奋地临摹名家的作品，然后才能发展自己的风格。因此人们珍爱名家书法，对这些书法作品的尊重，深刻地影响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作品无疑是王羲之写于353年的《兰亭集序》。在一定程度上，它的名气来自一个约300年之后唐太宗如何得到它的故事。唐太宗曾三次派使者去见南方寺院中的一个老僧辨才，因为《兰亭集序》据说在他手中。但每次都为辨才所拒绝，借口是《兰亭集序》毁于战火。然后太宗派南朝末代国君之孙萧翼再次前往。萧翼装扮成一个儒生去拜访辨才，两人饮酒、对弈、赋诗，相谈甚欢。几天之后，萧翼给辨才看一幅画，并随口提起他有王羲之的书法作品。辨才要他第二天把书法带来。萧翼照办了。辨才评论说，"这些虽是真迹，但并非上乘之作。我正好有一件真的杰作——《兰亭集序》的真迹。"萧翼假装不信，所以次日辨才将其珍宝从藏匿处拿出，给萧翼看。后者指出瑕疵，说这是赝品。二人争执不下。辨才激动万分，未及将作品收好就赶去寺中作佛事。萧翼抓起珍宝逃之夭夭。得到《兰亭集序》使唐太宗大为高兴，他授萧翼五品官职，赏他金银珍宝和城中一座豪宅，乡间良田一区，还从宫廷马厩中挑了两匹骏马赏赐给他。太宗本想惩罚辨才的吝啬，但后来改变了主意，反赠他丝帛谷物。辨才用这些东西修建了一座佛塔。据说太宗对《兰亭集序》至爱无比，多次派人临摹，并将它作为陪葬品埋在自己的墓中。

不论这件轶事细节是否属实，但它的确发生于唐朝。这说明当时人们对收藏古董已达到如醉如痴的程度。

为临摹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太宗着人仔细地描下他的字，然后刻在碑石上，这样就可以拓制它们。这件碑拓作于唐朝或者宋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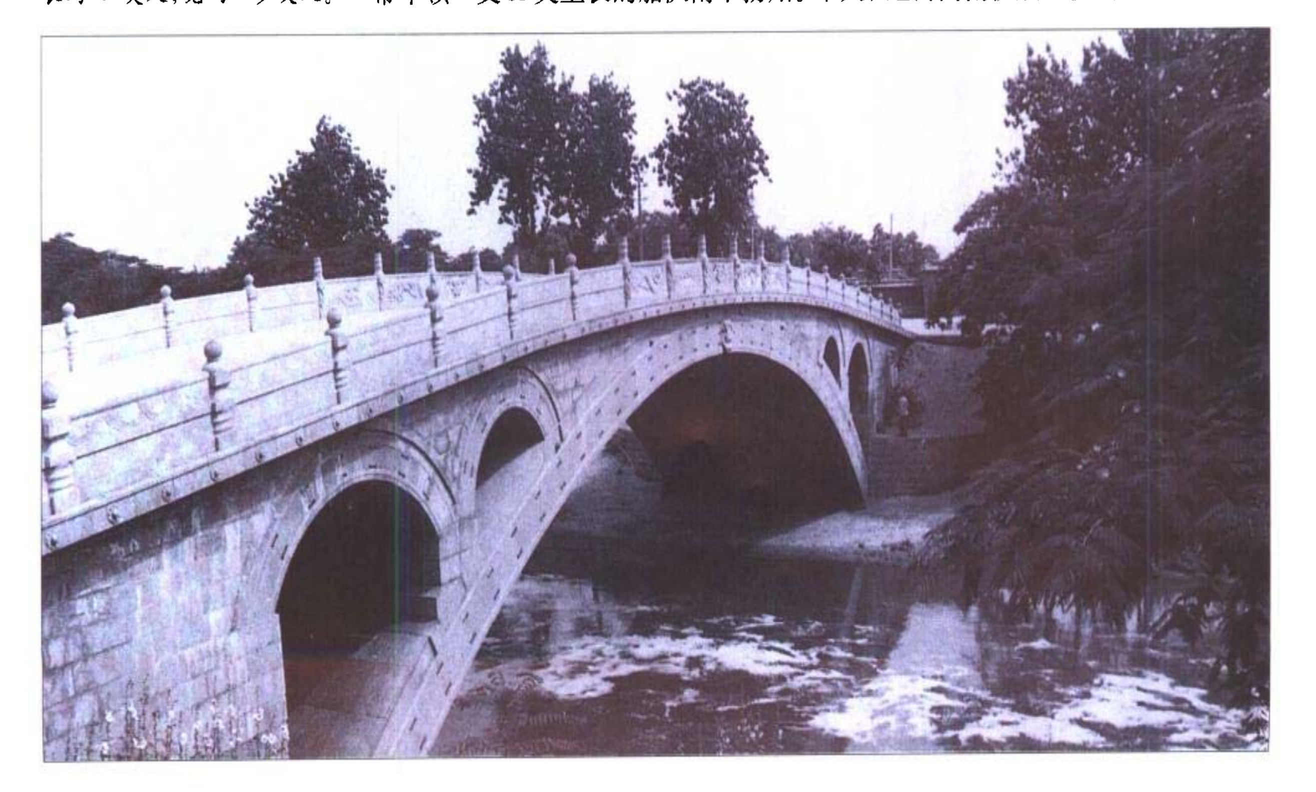
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等级制度。例如，如果一个仆役或侄子殴打或杀死了他的主人或叔父，比起主人或叔父打死仆人或侄子来，惩处要重得多。唐律中所体现的司法原则对中国以后历代司法制度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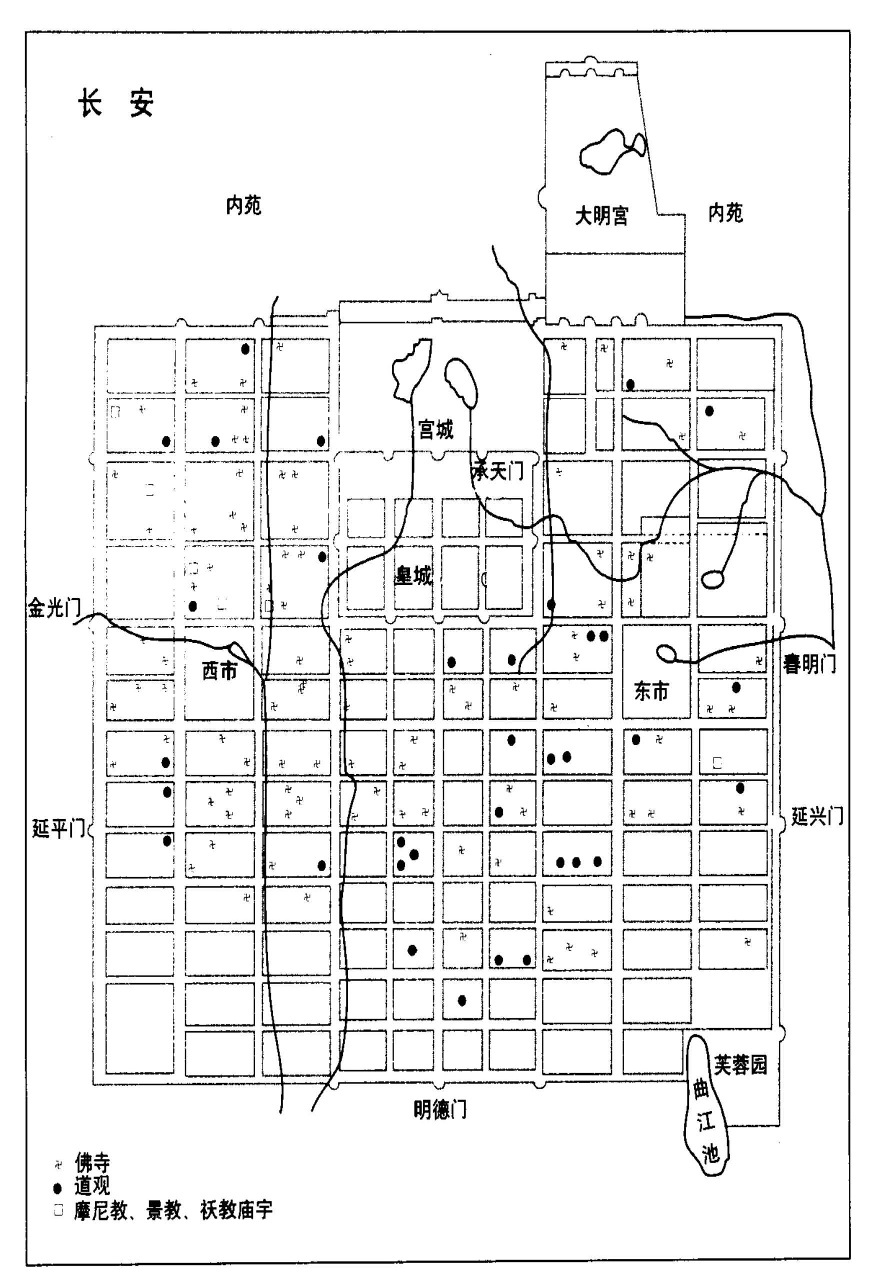
在这一时期，朝廷对地方的行政控制是令人关注的焦点。在南北朝时期，郡县数目剧增，郡县官吏大多为地方士族所充任。为重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隋朝削减郡县的数量，规定甚至最小的地方官也要由吏部任命，官吏不得在本地任职，任期仅限一届。隋朝新制有助于限制地方豪强的势力，使中央任用的官吏不能与其结为朋党。

与汉朝相同，强化朝廷力量的另一手段是任用奉行儒家忠君为民原则的官僚，因为用政府所信任的人为官比监管官吏的一言一行远为廉价。为选拔有真才实学的儒生，隋朝政府引进考试制度，检验候选者的文字能力和儒学知识。唐发展了这种科举取士制度，并采取其它措施促进儒学教育，例如兴建各种学校，颁行官方认可的五经正义等。在唐朝虽然每年平均只有二三十人通过考试，但这种取士制度还是逐渐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手段。他们主要任职于朝廷，升迁很快。这一新制为天资聪颖却非士族豪门出身的人提供了机会。中唐初年，有一个广东人通过考试，历任朝中要职，而广东距离任何士族集聚之地都远隔千里。但豪门出身者仍遍布朝廷，占据最高职位。由于世家子弟考试成绩越来越出色，因此新的取士制度并未终止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但也迫使他们更加专注于儒学，以适应政府的需要。自唐朝以来，上层阶级的教育越来越重视伏案攻读，骑射剑术一类武功在士族生活中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考试制度有利于统一，有利于消除西北、东北和南部士族之间的差异。政治经济上的融合也得益于大运河工程的修建。605年－609年间，隋朝皇帝征发大批徭役挖掘运河。自秦朝开始，人们就为方便交通修建运河，但规模远逊于此。大运河的第一段连接东都洛阳和位于长江流域的扬州(今天的扬州)。竣工后，隋炀帝率领一支65英里长的船队南下扬州。不久，运河向南扩展至杭州，向北连接到

隋对中国交通运输的贡献并不限于大运河，它还在华北平原上修建了道路，以达北部边陲。河北省的这座赵州桥建于605年－616年间，使用了上千块重达一吨的石头。桥长约130英尺，宽约30多英尺。





长安始建于隋初，唐时发展成一座宏伟的都市。整座城被划分成有围墙环绕的坊，夜间坊门关闭。为便于管理，人们必须在特定的市场区进行买卖。但宗教设施遍布城中。

北京地区。沿运河修筑了朝廷驿道，驿道上设有驿站。全长1200英里的运河，使政府可以把长江流域日益增长的财富供给京城的朝廷和东北边陲的驻兵。新开通的大运河是一条长途供给线。政府可以由此南粮北调，东北边陲的士兵从此不必再过自给自足的生活。

7世纪末，当武则天主理朝政时，立国大业仍迅速前进。她性格刚毅，像隋文帝或唐太宗一样残忍无情，善弄权术。她的当政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她起初并非皇后，而是高宗的妃子。她有力地左右着高宗(650年－683年在位)，进宫数年之后，高宗便不顾权臣的极力反对，将当时的皇后废黜，由她取而代之。成为皇后之后，她迅速地剪除异己。660年，高宗中风，武后开始大权独揽。683年高宗驾崩，武后的两个儿子先后即位，但不久也被她废黜。在此期间武后独揽朝政，并于690年称帝，建立新的王朝周，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自立为帝的女性。武后颁发《大云经》，预言女皇是弥勒佛转世，在女皇治下，世上会无病无灾、无忧无虑。这样，佛经便成为她继承皇位的合法依据。则天皇帝将京城东迁

爱情故事

毫无疑问，唐代两位最有名的女性是武则天皇帝和杨贵妃。有关女人如何支配男人的一般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得自关于这两个相差甚多的女人的故事。然而，在唐朝末期，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发挥了几乎同等重要的作用，影响了人们对男女关系的看法。著名文人用文言文撰写的短篇故事，构思巧妙，行文流畅，改变了人们的文化预期，如男女该如何互相吸引、如何示爱，以及一方忠贞不贰而另一方易于变心等。

唐代爱情故事往往围绕年青书生与青楼女子相恋的主题。白行简描写了一个年轻举子对美丽的名妓李娃一见钟情。李娃和她的养母榨尽了他的钱财，然后失踪了。年青人沦为赤贫，只好以替出殡人家号丧为生。当他父亲发现他在从事如此下贱的行当后，把他打得奄奄一息。后来年轻人只好靠乞讨为生，直到又遇见李娃。出于内疚和同情，李娃先为自己赎了身，然后让他搬进自己家。她服侍他养好伤，并劝他埋头攻读。最后他金榜题名，得到官职，同父亲言归于好，后者也承认李娃为自己的儿媳。另一个流传更广的故事是写一个应试的举子与一个良家女子相恋，后者是他的远房表亲。作者是有名文人元稹。故事说莺莺的寡母感谢官家之子张生相助，介绍莺莺与张生相识，张生爱上了莺莺。经莺莺的丫环相劝，张生向莺莺赠诗，力图以文才赢得她的芳心。张生与莺莺皆能文能诗且多愁善感，莺莺尤甚：

> 大略崔之出人者，艺必穷极，而貌若不知；言则敏辩，而寡于酬对；待张之意甚厚，然未尝以词继之。时愁艳忧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张窃听之；求之，则终不复鼓矣。是愈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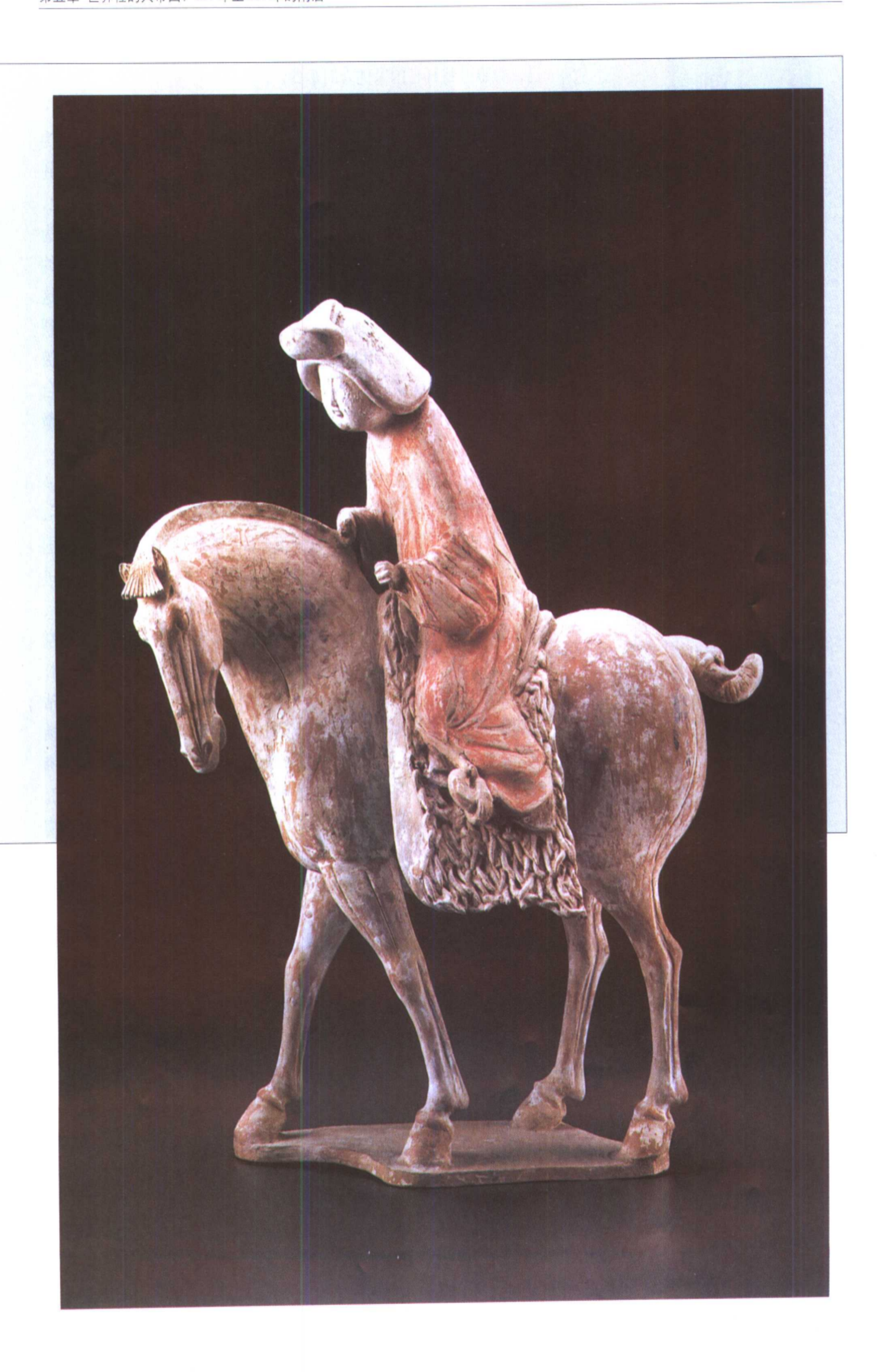
未经正式定亲，也未得双方长辈首肯，张生与莺莺相恋。但当张生进京赶考时，关系中断。张生长久未归，莺莺修长书一封，责备他薄情。他最终与她分手，并对友人说，美丽的女人易给男人招灾惹祸。后来两人均依父母之言，另结姻缘。

右图 在中国历史上，人们对何为美女的看法并非一成不变。从唐墓中发掘出的这件塑像说明，当时的人们认为活跃的甚至于打马球的女性是迷人的。丰满和圆脸是当时美人的标志。

至洛阳，并从东部地区选用官吏，目的也许是利用他们制衡西北士族的力量，而后者与李唐宗室具有休戚相关的联系。则天皇帝被后世史家诋毁为邪恶的篡位者。毫无疑问，她用铁腕控制国家，她独断专行，镇压了李唐王公的反叛，推行了极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直到705年，当她80多岁高龄且已病重时，她才被废黜。

世界中心的生活

在中国历史上，女人称帝，成为上天与凡人的中介，是不合常理但又非唐代绝无仅有的事情。与20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它时代相比(除了20世纪)，初唐和中唐时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或许是因为来自异邦的世界性宗教使中国同波斯以东的所有其它亚洲国家建立了联系，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很多世族豪门为胡人后裔，或许是因为中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镇守丝绸之路，保证了商旅畅通无阻……总之，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





唐朝时，丝绸始终是运往中亚的主要商品，最昂贵的丝绸通常用于为妇女制作服装，正如这件彩色木雕所示。该像出土于一个中国官吏的墓葬，该官吏曾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的西部边陲任职。

己，希望得到其它国家优秀的东西。

宏伟的都城长安对世界各国也极具吸引力。像以前北方的京城一样，长安规划整齐划一，格局四方，但它比以前所有的京城规模更为宏大。外城墙由夯土筑成，厚约10—15英尺，高约35英尺。从北到南超过5英里，从东到西近6英里。宫殿在北部，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皇帝向南面对臣民。居民们住在城墙围绕的108个坊内。一些坊划为市场，每日定时开放。高大的南城门外是一条极宽的通衢大道，宽约500英尺。前来朝见皇帝的外国使臣畅通无阻，顺大道直达皇宫。这条大道和其它主要街道两边挖有沟渠，树木成行。当长安初建于隋朝时，朝廷鼓励官吏豪门在城中修建宅第寺庙，在南朝都城于589年被攻陷后，南方士族被迫迁入长安。但鼓励和强制很快就显得多余，自初唐以来，达官贵人们都愿意住在长安或东都洛阳（洛阳也重建于隋朝）。

长安和洛阳的文化极富国际色彩。唐太宗被高僧玄奘（602年－664年）的传奇经历深深吸引，因为后者曾经中亚到印度，历时15年，于645年回国。回国后他向人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从中亚属国以及诸如日本、高丽和吐蕃这类邻国来的使臣、商贾和香客，也促进了人们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的了解。来自这些遥远地区的物品——马匹、珠宝、乐器和织物——激起了宫廷和京城贵族无穷的兴趣。人们常常模仿异国发式、着装。诸如马球类的外国娱乐成为有钱人喜好的消遣。人们非常欢迎来自中亚的商队，人们一般用来陪葬的器物中，也包括有陶制骆驼和非汉族马夫。住在长安的外国商贾信奉各种宗教，包括伊斯兰教、犹太教、摩尼教、祆教和景教，但无一像数世纪以前的佛教那样为中国民众所接受。外来影响对中国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银制品臻于完美，就设计和做工而言，银制杯、盘、水罐和其它小物品颇有波斯之风。从印度、伊朗和中亚传入的新乐器和新曲调，使中国音乐发生了重大变化。室内陈设也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不再使用座垫，而是像外国人那样坐在凳子和椅子上。

唐朝的经济繁荣无疑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中亚丝绸之路对国际贸易的促进和经海路运来的越来越多的货物，都刺激了经济发展。在南方，因河流众多，水路交通极为便利，经济发展尤为瞩目。河运量极大，据说721年和751年扬州的两次暴风雨都使1000余艘船只被毁。产自南方的茶叶不再被视为药材，而主要用于提神。全国各地的人都开始饮茶，从此茶叶成为主要商品。随着中国沿海及东南亚一带的海上贸易剧增，广州、泉州和福州等南方港口城市发展起来。此类海上贸易主要被阿拉伯商人操纵。根据742年的人口普查，南方登记在册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已从7世纪初的四分之一左右增加到接近一半。

经济发展和商埠的繁荣，均未使高官显贵的社会构成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唐代中国仍是一个士族社会。在上层社会，家谱世系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大家仍以家世显赫为荣耀。豪门世族仍只同门第相当者联姻，这使得最显赫的士族与众

不同，自成一体。初唐的君主们曾试图削弱豪门世族的声望，宣称高官显位远比显赫的家世更令人尊敬。但一旦君主的近亲成为众所公认的显贵，君主则一般对豪门世族的权势听之任之。

唐代的世族和文士从事各门艺术，钻研各种学问。各类儒学蓬勃发展，尤其是撰述历史和注释经典引人注目。在这一时期，人们并不认为学习儒家经典、献身于孔子为官之道与信仰佛教或道教相互抵触，很多人学习一种以上的传统学问。文人墨客对艺术甚感兴趣，他们很多人因书法作品受人敬重。几乎所有文人都写应景诗，赋诗被列为科举制度的最高级考试——进士科中的一项。或许这有助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因为唐代涌现出许多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如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和李商隐等。2200位唐代诗人遗留下48900首诗，其常见的主题是友人的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26英寸高，出土于西安的一座建造于723年的陵墓。根据一些乐工的衣饰、胡须和面部轮廓，可断定他们来自中亚。唐朝的陵墓常用陶俑陪葬。陶俑多为中亚男人，包括乐工和照管马或骆驼的人。这些陶俑说明了唐代士族对中亚音乐和商队的喜爱，因为商队运来了西方的物品。

离情别意，这或许是因为官吏常被调至外省，而帝国疆域辽阔，旅途艰险，一旦分手便再难相见，所以每次离别都显得难解难分。诗人们也时常光顾城中的教坊，召来歌舞乐伎。晚唐时，名妓经常将名诗人的抒情诗谱曲演唱，她们因此普及了一种新的诗歌形式。8世纪上半叶，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712年－756年在位)统治时，唐文化达到了顶峰。他的朝廷成为上层文化的中心。他举行盛大的国家仪式，下令将国家礼仪编纂成典。他的宫廷也欢迎佛教和道教僧侣，如他曾邀请刚传入的佛教密宗高僧，726年又曾请爪哇僧人结坛祈雨，742年玄宗手持香烛，听锡兰僧人诵转世投胎魔经，为唐朝军队大败敌军祈祷。玄宗为了在宫廷中提倡吟诗作赋和诗人能在他同嫔妃出游时赋诗助兴，他给诗人们建立了新的翰林院。诗人李白任翰林院供奉数年，写作艳体诗颂扬皇家园林及园中宫娥妃嫔之美。玄宗也喜好音律和良马，甚至养了一队会舞蹈的马。善于画马的画家韩幹，曾供职于朝廷。

玄宗在位初期，并未因享乐而荒废朝政。他采取果断措施限制了皇亲国戚和佛教寺院的权势，二者在则天皇帝治下均势力大增。因农民为避税而潜逃，为增加税收，他进行人口统计，并改革均田制度。因突厥、回纥和吐蕃诸族威胁边陲，他重建防卫设施，并从四川到东北沿边境设置多个边镇，授予各镇节度使以极大权力。

玄宗妃嫔众多，有儿子30个，女儿29个，但有个女人曾集“三千宠爱于一

五台山南禅寺大殿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建筑物之一。大约建于854年后不久，当时刚刚停止灭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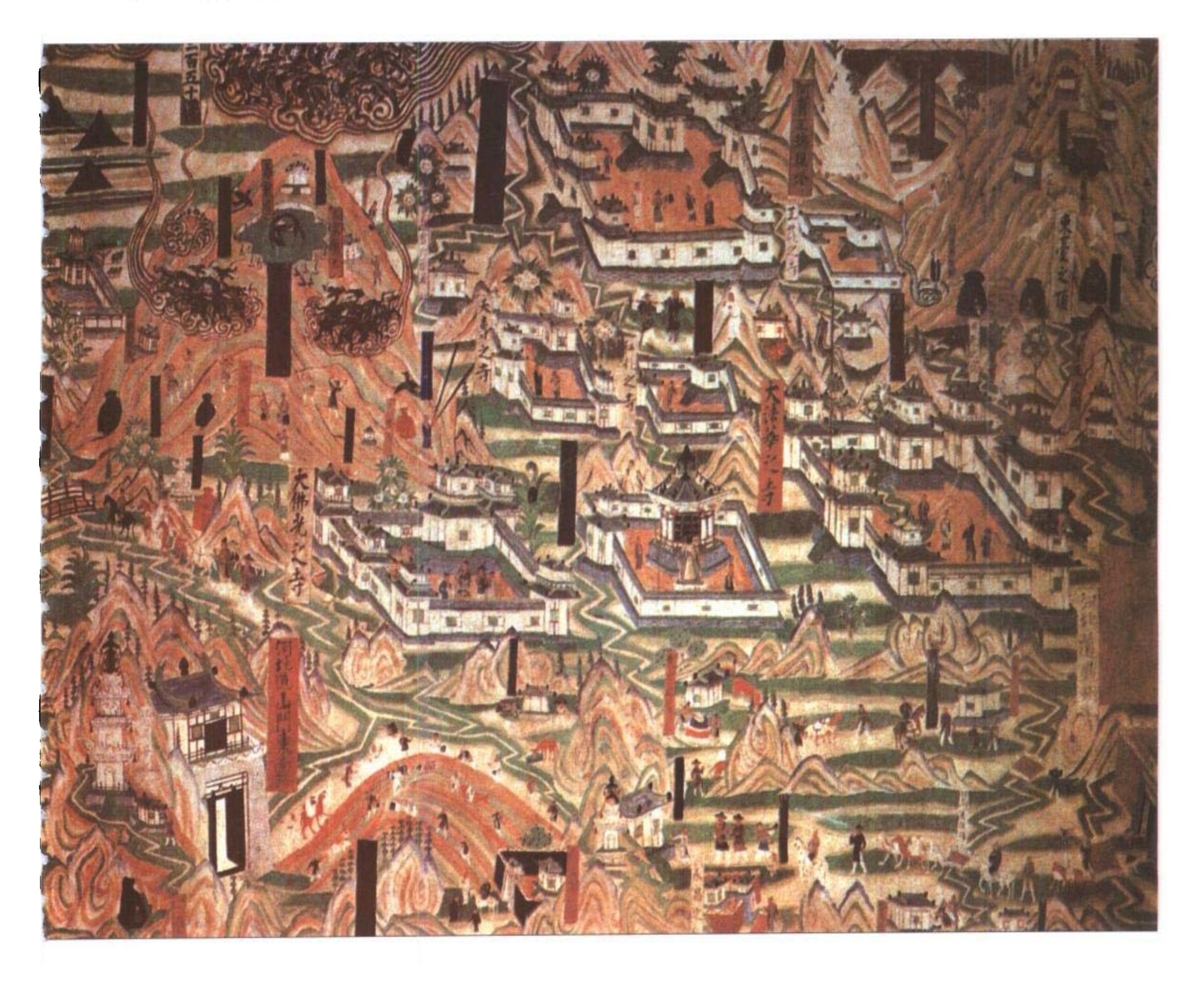


身”，在他的一生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在大众文化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玄宗在年近六旬时爱上了年轻的杨贵妃。杨贵妃像玄宗一样喜爱歌舞音乐，但这位美人没有政治头脑，她宠爱一个新任命的胡人节度使安禄山。昏聩的玄宗对安禄山恩宠有加，任其在北部和西北部边境集结军队达16万人。755年，安禄山起兵造反，进攻洛阳和长安，迫使玄宗西逃。护卫玄宗的军队发生兵变，逼迫玄宗赐死杨贵妃。年过七旬的玄宗因一连串事变而抑郁寡欢，遂让位于太子。宫廷文化最灿烂夺目的时代终告结束。

佛教对中国生活方式的影响

隋唐时代外向的、面向世界的风气，使佛教得以成为中国人生活的内在组成部分。佛教寺院附设学校教育儿童，在偏远地区为过往旅人提供食宿；在城市中，佛寺是文人墨客聚会之所，常举办送别宴会一类活动。佛寺也在经济中起重要作用，它拥有为其提供财源的广阔的田产和为数众多的农奴，还兴办工场和榨油作

在建于远离都市、位居深山的寺庙中，或许以山西五台山的香火最盛。五台山的佛寺声名远播，以至于在千万里之遥的甘肃敦煌61号窟的一幅壁画也描绘了它。





根据《莲华经》，观音菩萨可以使向她乞求子嗣的妇人受孕，这无疑使观音香火更盛，也使中国人越发将她视为女性。所附插图本《莲华经》流传于9世纪或10世纪。右页表现一对夫妇向观音乞子，而左页是接生婆在为这个妇人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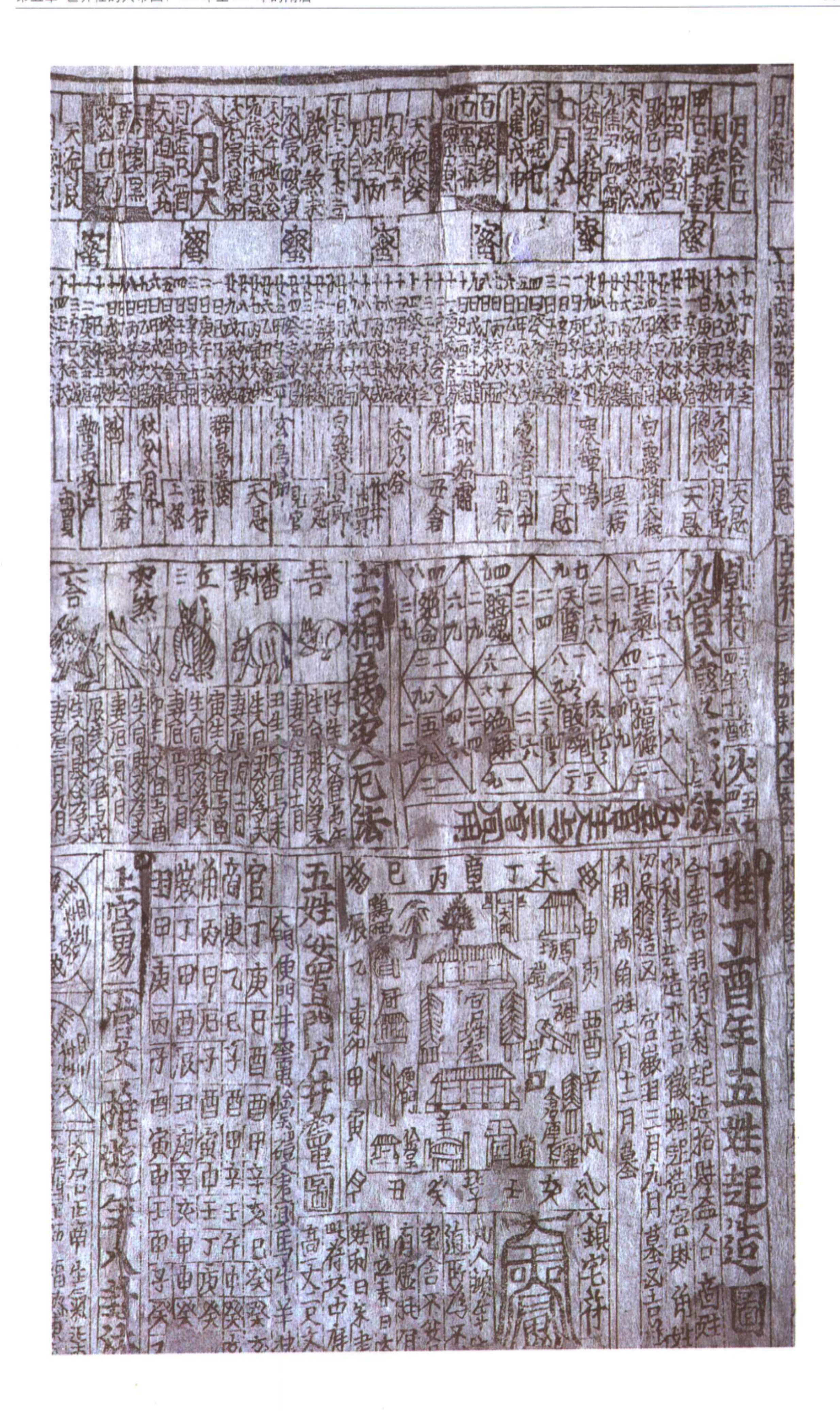
坊。经营上述产业所得收益，再拿去放债并经营当铺，因而成为地方上重要的经济力量，促进了经济的货币化和商业化。在改变中国人的想像力方面，佛教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唐代佛经故事流传极广，脍炙人口。为了传教，僧侣向不识字的俗家听众出示图画，讲述故事。中国民俗文化中最重要的节日之一阴历七月十五的鬼节，源自目连到阴间救母的故事。据说目连的母亲曾在阴间受着惨不忍睹的折磨。鬼节那天，不论是否是佛教徒，不论是学识渊博的僧侣，还是一字不识的普通村民，均摆出食物为在阴间受苦的饿鬼充饥。据在838年至847年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僧人圆仁所记，扬州的40余所寺庙在鬼节那天竞相制作不同寻常的蜡烛、糕饼和假花供奉在佛寺前。“在这个最隆重的节日里，城中每个人都到寺庙中去祭拜。”

到中唐时，彻底中国化了的佛教宗派流传最广。净土宗的信徒虔诚地膜拜阿弥陀佛和他主要的帮手、大慈大悲的观世音，以便在阿弥陀佛的极乐园——净土——得到再生。在有学识的士大夫中，禅宗同样盛行。禅宗否认佛经的权威，声称通过一代代祖师，将佛学要义心心相传更好。禅宗最重要的人物是一祖菩提达摩。他是一个南天竺僧人，6世纪初来到中国。六祖慧能也很重要，他是一个中国僧人，死于8世纪初。慧能在大彻大悟时不识文字，禅宗以此来证明人是能够通过发自本性的内省幡然省悟的。

右图　这是为877年印制的历书，发现于西北边陲的敦煌。在留存至今的、年代最久远的印刷品中，是历书告诉人们哪天宜于做何事或不宜于做何事。这一点并不让人感到奇怪。

唐代的佛教史并非就是蓬勃发展、深入人心的历史。晚唐时，因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削弱，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遭到攻击。由于朝廷财政困难，佛教因加重了人民的经济负担再度遭到仇视。841年，朝廷颁布律令大规模取缔佛教和其它

① 武宗李炎下诏大举灭佛是在会昌五年即公元845年。——译者注



外来宗教。845年，当律令废止之后，约四分之一的僧人尼姑已被迫还俗，15万依附民被没收，4600座寺院和4万座佛堂被拆毁或改作他用。[1] 对于中国佛教徒而言，灭佛的打击犹如雪上加霜，因为在这一时期，伊斯兰教在中亚的扩张和佛教在印度的衰落，使中国佛教徒无法与中亚及印度的佛教中心交流，因此他们失去了来自异域的精神上的支持。由于这两大打击，虽然净土宗和禅宗继续发展，但其它更富哲理的、更偏重于解释佛经的宗派未能流传后世。

远离中心的生活

敦煌佛窟地处中国的西北边陲，是穿越沙漠的丝绸之路的出发点，在那里发现了很多封存的文书。根据这些文书，我们可对那些远离京城的唐朝下层臣民的生活窥见一斑。遗留的文书包括买卖土地、房屋和奴婢的契约，均田制中所使用的户籍登记册、蒙学读物，关于离婚、领养和分家安排的表格，各种正式信件的范本、俗家宗教会社的通告、地方史、当地豪门的名册，以及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政府文书。

虽然敦煌农民远离京城，但朝廷制定的制度尤其是均田制，仍旧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敦煌发现的文件证明，根据均田制，人民确实分到了土地，而当土地使用者死后，他们确实将土地归还了国家。但也有证据证明租佃制的存在，不仅政府土地由各种佃户耕种，而且也有人感到耕种按均田制分给他们的土地十分不便。他们将分到的土地租给佃户，自己又向他人租地耕种。寺院也是广占田亩的地主，其佃户为徒附，不得自由迁移，不准与其他社会等级通婚。可是敦煌文书表明，寺院徒附有权拥有财产，可雇佣他人耕种土地，有些甚至还自己占有奴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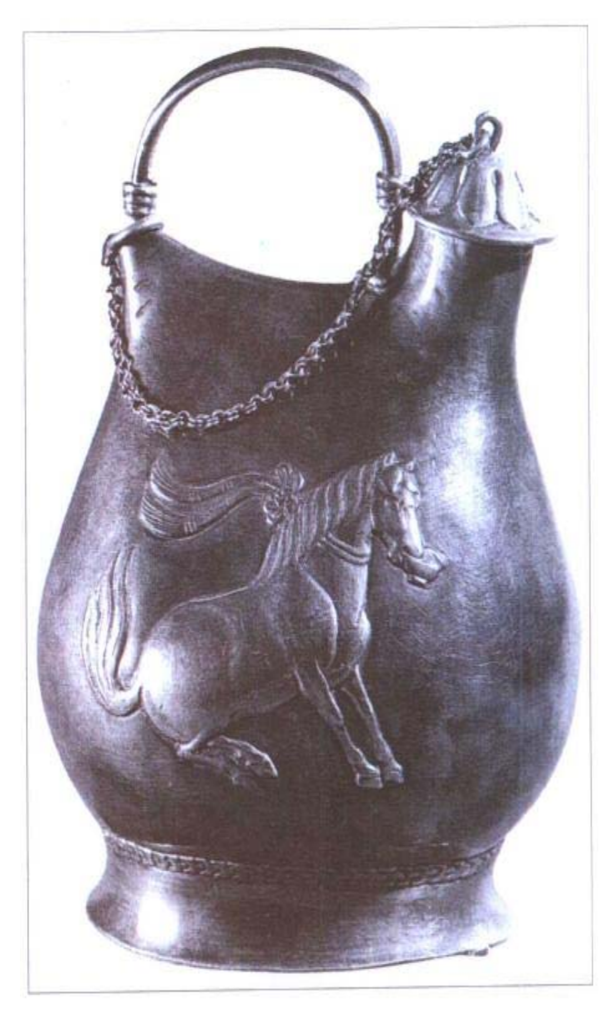
国家也在很大程度上干预商品的买卖，所发现的约90份官方价目表残片表明，政府将在其管理的市场上出售的不同商品分为三等，每月为其定价，这些商品包括食物和纺织品。国家对其它事务的干预较为间接，例如修复灌溉渠，看来就主要靠那些最直接受益的农民组成的小型互助团体进行，修复工作由服徭役的农民来管理。

这并不意味着在敦煌不存在私人的、非政府的集体活动。佛教俗家会社的存在表明，甚至普通农人也会组织起来，传递通告，召集聚会。敦煌留存的教育课本为数众多，五花八门，这表明政府对教育的发展几乎毫不理会，寺院附设的学堂在蒙学课本中教授儒家社会伦理，在敦煌所发现的42本《祖训》中，载有简明的诗句教导年轻人循规蹈矩：

父前行，子踵后。
路遇长者，敛足拱手。
尊长在前，不可口唾。

书中也陈述了为妇之道的道德依据：

新妇侍夫，如侍其父。
不闻其声，不见身影。
其夫之父兄，不与交谈。



敦煌文书也包括很多为水平稍高的学生准备的书籍，例如乘法表、算术练习、词汇表和礼仪大全，书中列举繁文缛节，教导如何言语斯文，如何对地位极高、稍高、平等及下属使用不同的言词，如何写吊唁信或亲去吊慰某人，如何办红白喜事，等等。

根据敦煌文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印刷术的起源。当地人对儿童启蒙读物、示吉日凶日的历书、记载避邪咒语的手册以及科举指南的需求量显然很大。此外，就宗教而言，复制和分发佛经是一种功德，因此也需要大量复制的印刷品。由于中国人早已懂得使用金属、石料和黏土制成的印章将字印在纸上，因此在木板上刻字印刷以节约复制书本的时间也就成为可能。中国人已能够通过摹拓碑文来复制书本。有些证据可以证明，早在8世纪时中国人已使用了雕版印刷术，9世纪时此技术已臻完善。现今保留的最古老的印刷书籍是敦煌所藏于868年成书的宝石经。敦煌发现的唐代其它印刷物还有辞书和历书。大约在这一时期，书页折叠的薄本开始取代卷轴，对于长篇著作，这种折叠本更便于保存。在一两个世纪之内，书籍印刷术的发明使思想交流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革命。

在唐朝，金银类金属制品极为精致。这只镀金银瓶出土于陕西省西安附近，其形状使人想起游牧民族在马上所用的皮袋，而做工则显示出波斯的影响。瓶上马儿戏耍的蚀刻画模仿了玄宗皇帝的马，他的经过训练的马，可以衔酒杯起舞。

政治经济上的分化改组

唐朝政府从未完全摆脱安禄山反叛的阴影。在八年的战乱之后，玄宗的继承人为谋求和平只好妥协。为了恢复秩序，他赦免了叛乱首领，且任命他们为受安抚地区的节度使。自此之后，在几个重要地区，节度使自行其是，不纳贡赋，擅自任命下属，并将权柄移交后代子孙。在这些藩镇中，胡人或半汉化的军人占据了大部分政府职位。甚至在由文职节度使掌权的各方镇，他们也扩充了权限，不太听命于朝廷，也削弱了郡县的权威。

有鉴于此，朝廷最终废除了沿袭北朝的均田制。取代的办法是，自780年开始依据现有的土地占有情况，每年夏秋两次征收赋税。从此之后，各地区须交纳一定数额的租税，至于如何筹足此数，各地在相当程度上可自行其是。政府对土地占有放任自流，意味着恢复了土地的自由买卖，造成了土地集中。当债台高筑者不得不出卖土地时，有钱人便可以积累越来越多的土地。

新田赋制度颇见成效，但朝廷发现控制盐的生产和买卖能够更有效地增加财政收入。通过对领有执照的盐商征收一笔附加税，朝廷能够对所有商人间接征税，甚至可以对其势力影响不到的地区征税。到779年，朝廷半数以上的岁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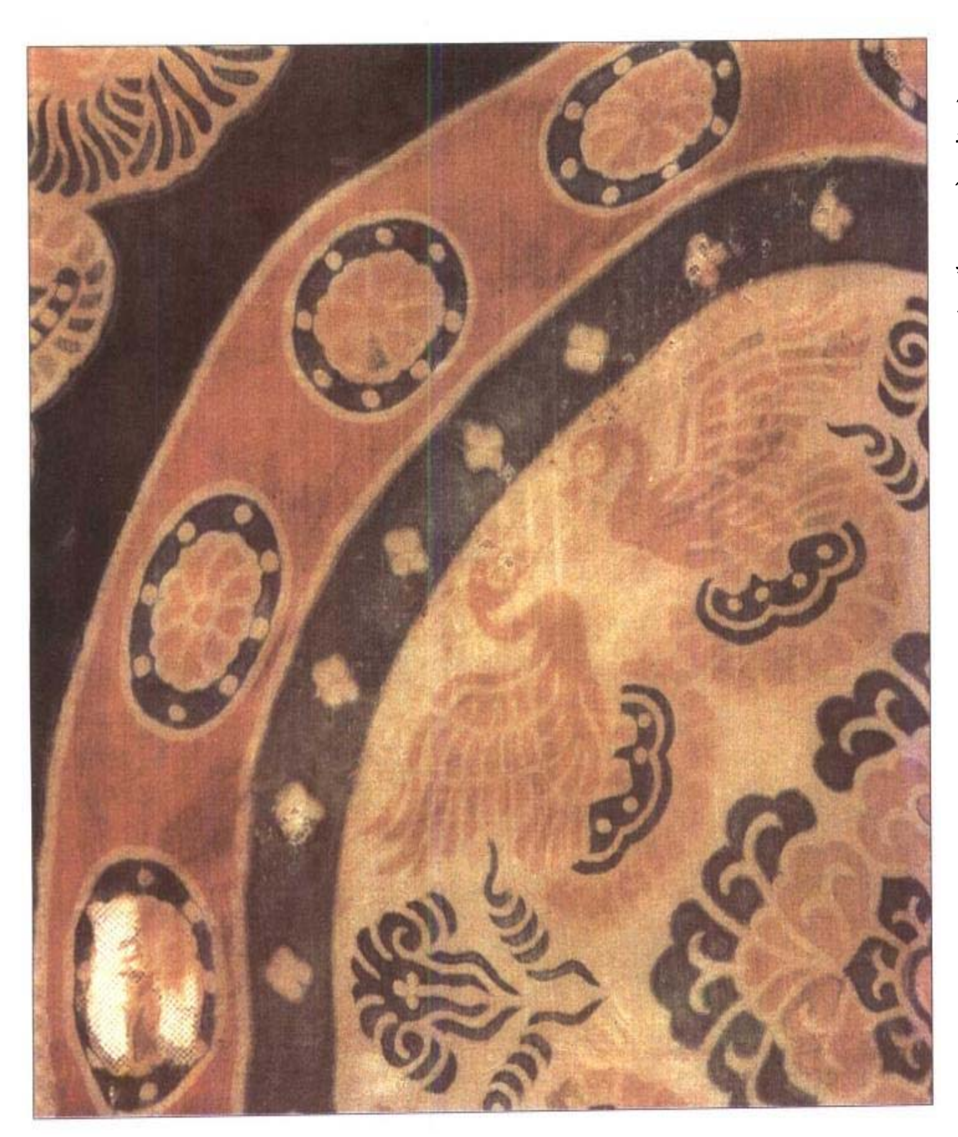
自盐的官营。在对盐成功地实行专营后，政府对包括酒和茶在内的其它商品也实施了类似政策。盐院独立于政府原有的度支部，权力很大，由善理财政的官员主管。

除了对土地流动听之任之以外，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政府，基本上也不再对集市进行管理。政府不再干预经济的做法，意想不到地刺激了贸易的发展，货品流通量有所增加，越来越多的市镇开设了市场，这促进了以新设省城为中心的区域贸易的发展。不再受到严密控制的商贾，靠使用银锭和纸币解决了长期存在的钱荒问题。9世纪时，在按大小依序排列的国家行政中心周围，一个新的市镇网络开始崛起。因北方尤其是河北省饱受战乱及其后患的影响，人们争相移民南方，这也推动了整个南方的发展，因为农作物在南方产量较高，人口南移有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繁荣。长江下游地区的城市，诸如扬州、苏州和杭州欣欣向荣，使许多来自北方的豪门世族永远地留在了那里。

安史之乱后，都城长安继续发展，然而朝廷却命运不济。干练而果决的君主和朝中官员想方设法加强中央集权，可是收效甚微。为抗衡藩镇节度使的威胁，朝廷建立了神策军，由皇帝的奴仆宦官调度支配。但不久就证明宦官像桀骜不驯的地方大吏一样是祸患之源，他们在宫中大权独揽，朝廷高官不得不屈尊俯就，同这伙或那伙宦官结为朋党。820年以后的唐朝宫廷政治，充斥着无穷无尽的阴谋与反叛。宦官及其朋党拥立起一个又一个的国君，然后又胁迫谋杀他们。835年，唐文宗和一伙朝官企图诛灭宦官，但阴谋败露，宦官随即屠杀了1000多名朝官进行报复。为显示其权势，宦官将三位主谋的宰相及其全家在长安西市斩首示众。

外患与内忧联袂而至。沿中国边境，从东北的渤海到西面的吐蕃，再到西南面的南诏，敌对的国家日益强盛。突厥与回纥虽为唐朝盟军，但也是朝廷的负担。他们帮助朝廷平定了安禄山叛乱，但在他们帮忙夺回洛阳之后，朝廷为了阻止他们烧杀抢掠，不得不支付他们大量丝帛。从此之后，朝廷为了阻止其劫掠，不得不按极为苛刻的条件，用丝帛同他们交换马匹。与此同时，吐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当中国军队因安禄山叛乱不得不撤离西部去协助保卫京城时，吐蕃趁虚而入，切断了中亚同中国城市地区的联系。842年，吐蕃帝国土崩瓦解，不久回纥帝国也覆灭了，但唐朝已无力重建它在中亚的霸权。

860年之后，地方节度使大权独揽，虚弱的朝廷确实无力维持哪怕是表面上的秩序。匪患蜂拥而起，有些人数众多，犹如小型的军队。他们不仅洗劫村庄，甚至袭击城墙环绕的都市。他们抢劫商贾和运送税银进京的队伍，偷贩私盐，有时甚至远离山寨行动。其中黄巢领导的一伙声势最大。黄巢曾为盐商，在科举考试时名落孙山。他的军队迅速袭扰全国，先从北到南，然后又回到北方。879年黄巢攻占广州，杀掉很多外商。881年占领长安，并建立朝廷。882年，有人写诗嘲笑黄巢政权，并将诗张贴在他的政府所在地。黄巢下令杀掉所有能诗善文的人，3000文人因此而丧生。然而，唐朝此后仍苟延残喘了约20年，直到(短命的)后梁宣布成立。由此，中国开始了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的时期(907年－960年)。



印刷术不仅用于复制课本，同时也用于印染织物。这块8至9世纪的丝质旗帜残片存于敦煌17号窟；上面的基本图形源于波斯(圆状物模拟波斯金属制品)，杂以中国本地花纹，如上面的一对飞鸟。

对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再评价

在古代，当中国人初次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进行思考时，思想家们很自然地将中国视为沙漠中的文化绿洲，世界上惟一有文字、城市和先进制造技术的地方。唐朝时，这一观点已不再令人信服。因为在几个世纪中，香客和僧侣经常往来于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使中国人了解到印度的书写传统足以同中国相匹敌。此外，中国的近邻也不再是原始部落：高丽、渤海(位于东北)、南诏(位于云南)、吐蕃和日本都建立了国家。它们都有统一的宗教，有书写文字(有的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建立了城市并进行长途贸易。在很多方面，中国可以自认为优于其它国家，但不能再以惟一的文明之邦自居。初唐时，各国均承认中国在政治、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实际上，朝鲜和日本的君主往往照搬中国文化和政治体制，以求建立其本国强大的政治中心。然而在晚唐时，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中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此种危机感使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基本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反思。在此过程中，儒学得到了复兴。杜佑(735年－812年)和韩愈(768年－824年)这两位著名文人的观点，可以作为这一思潮的代表。

杜佑出身于名门望族，曾在地方和朝廷担任要职。801年他将《通典》一书



正如这幅表现宴饮的壁画所表现的，唐朝时人们开始坐在加高的台子上。坐者的衣衫为典型的士大夫休闲便服。蓝或褐色长袍、黑靴、黑帽。这幅宽70英寸、长92英寸的壁画画在长安附近一座建于8世纪的墓葬的墙壁上。

上呈君主。《通典》为一部长篇典章制度史，共200卷(今版约5000余页)。当时，地方政府各行其事，危及朝廷的权威，杜佑编纂《通典》是为了寻求扶危解困之道，目的是为了改革朝政，加强朝廷的权威，使君主能够干预地方事务。当然，绝大部分朝官相信君主为国中第一人，是一切的中心。但是，杜佑认为，官吏们有关朝廷体制的观点已陈腐过时。他们强调君主受命于天，主持礼仪庆典，但忽略了政府运作之道。就体例而言，《通典》一反传统的写法，不始于宫廷礼仪，却以食货、人民生计、政府财源为首要。在讨论赋税时，杜佑对隋朝官员高颎称赞备至，高颎根据均田制实行输籍法。在北朝时，战乱不断、暴君庸吏、重税徭役迫使百姓寻求地方豪强的庇护。但在隋朝建立后，百姓发现政府租税大大少于豪强所夺，于是他们纷纷向政府登记户籍。因此杜佑认为，赖高颎之力，隋朝才能在全国建立财税制度，百姓才能安居乐业。正如事后我们所看到的，晚唐政府对

经济的不干预政策有其积极意义，但依杜佑之见，计划严密的政府控制要比对百姓放任不管好得多。

杜佑尤其反对那些咬文嚼字的儒生，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效法经典中所叙述的古制。杜佑驳斥说，在远古时期，中国同现在边境附近的一些蛮族一样落后。他认为在汉唐时臻于完善的郡县行政制度优于周代的分封制，因为郡县制有利于长治久安，人口增长。为《通典》作序的学者说，杜佑认为位尊者应该认识到，其主张目的在于使国家有序，而使国家有序则在于行事有成，行事有成又在于能学习过去，学习过去又必须根据时势的需要因时而变[四]。

杜佑的同代人韩愈比杜佑年青，他更多地从文化方面来审视中国的问题。韩愈极力推崇儒学，力主儒学经典为教育和写好文章的根基。根据简明实用的古训，韩愈赞成朴素的文风。像杜佑一样，韩愈也关注软弱无力的朝廷，但他相信复兴儒学可以使国家强盛。他上疏皇帝，反对皇帝参拜佛祖的遗骨。在上疏中他将佛教称为蛮族的信仰，说佛骨是污秽不祥之物，不应触摸。他争论说，皇帝尊佛是鼓励百姓信奉佛教而不务正业、不尽社会义务，这样便减少了税收，对国家不利。在另一篇几乎同样有名的文章中，韩愈讨论了道的起源。韩愈认为，一脉相承的正统儒学，从周公传到孔孟，然后这一传统就中断了。在某种意义上，韩愈主张为复兴"圣人之道"必须读《论语》和《孟子》，以发掘真正的儒学。像杜佑一样，韩愈用非常宽泛的概念对中国文明进行了综述，但叙述简明扼要：中国文明始于圣人，圣人救百姓于危难，教他们获衣食，退野兽，习礼乐，教他们创立政治制度来抵御敌人，肃清罪恶，但是道教和佛教的兴起却使中国文明堕落了。最后，韩愈主张让佛僧道士还俗，焚毁佛经道经，将庙宇改建成家庭宅院。

当然，杜佑和韩愈的看法在很多方面相左。杜佑坚持应了解变化，了解具体实践的细枝末节。而韩愈更强调一成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认为在政策层面上应重视德行，君主应掌握"圣人之道"。杜佑主张循序渐进地追溯历史的发展，而韩愈则以为可以将中间的几个世纪一笔抹煞而一下跃回到遥远的古代。然而，二者确乎在某些问题上颇为一致。例如，他们都对自汉朝以来广为流行的君主受命于天的理论不感兴趣。而且，他们分享一种基本的乐观主义精神，认为只要好人在世上有所行动，一切就会变得更好。他们的这一观点为很多同代人所赞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当时思想界的论争。

根据中国人的历史观，统一与扩张远比分裂与收缩对中国人有利。因此，唐朝上半叶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之一，而下半叶则被认为是它不幸的余晖。按照中国传统史学家的看法，朝代的进步基于可以预料的道德原动力，因此唐朝的由盛而衰也就并不出人意料。像唐朝这样辉煌的朝代是由精力充沛、意志坚定的君主建立的，他们因为民谋利益而受命于天。他们创立了高效率的政府，租税既低且公平，他们清除了很多前朝的积弊：诸如地方割据和贪污腐败。但他们的皇位继承者并非都是过人之辈，很多继承者不能避免宫廷中的权力之争，不能限制防卫开支和地方行政开支的增长，不能保障或增加岁入来源，不能凭借其毅力和操守而使臣下忠心耿耿。依据这一历史观，干练正直的君主或宰相可以延缓衰落的进程，甚至可以暂时起死回生，但一个朝代必然会由盛到衰，最终灭亡。

传统的中国史学家认为，并无类似的道德逻辑可以代代相传，使各朝各代永



像这把三英尺长的四弦琵琶是源于伊朗的弦乐器，由唐朝政府作为礼品赠给于7世纪末或8世纪初访问中国的日本使节。反面镶嵌的细木绘有花卉、鸟雀、蝴蝶和山峦。

远照此行事。所以，当中国史学家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次接触到欧洲的历史直线发展理论即从古代到古典、经中世纪到现代文明之时，他们也开始设想中国历史的宏大分期。正如前文所述，他们注意到汉朝与罗马的相似之处，大分裂时期与欧洲中世纪的类似之点。但是隋唐时代的一统天下却无与伦比。在西方，不论是6世纪时君士坦丁堡的查士丁尼，还是9世纪时的查理曼大帝，都未能重建一个如此辽阔而又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中国，唐朝更优于汉朝——唐朝能够抵御更强大的外来威胁，能够治理一个更加多样化的社会，而且建立了更为发达的经济。

目前，接受中国历史循环发展这一观点的史学家，已经为数不多了。这一观点贬低了中国社会的长期变化，而按照西方模式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或四个阶段的史学家也不多见。一般来说，在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时候，史学家们更关注晚唐，并将其看作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点，认为这一可悲的衰落时期也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令人振奋的发展阶段：知识分子为朝廷无法控制国家而忧心忡忡，因而产生了一直延续到宋朝的声势浩大的儒学复兴思潮；中央政府无力对经济严加管理，影响了财政收入，但却使经济活动更加活跃。由于出现了这么多混乱而且令人头痛的问题，国家政治和军事体制的集权化程度比以前降低了，但中国社会承受政治危机的能力得到加强。

第六章 重心南移：宋朝（907年-1276年）①

晚唐时，中国社会开始加速变化。宋朝(960年-1276年)初年，工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人口南移的频率和速度加快，长江流域像北方的黄河流域一样，终于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科举制度开始主宰士族的生活，儒学得到了复兴。尽管种种迹象显示出勃勃生气，但宋朝再未能像汉唐那样称霸东亚。对于强大的邻邦，中国必须平等对待，不能将其视为藩臣。但如何阻止它们的入侵，却成为国家和士大夫最关心的重要问题。

严阵以待的国家

唐朝四分五裂之后，在860年至960年的一个世纪中，战乱不断，政治和军事权力下移，任何能够组织防卫力量打退叛军和土匪的地方豪强都能自立为王。这一时期很多君主出身卑微，有一个曾是商人的奴仆。在南方，这类自封的王所占的地盘没有一处大于今天的一省或两省。史学家们一般将南方的这类区域性国家称为“十国”。南方的政治分裂并未阻碍经济发展，相反，由于区域性政权的君主急于增加税收，因此分裂又成功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在北方，分裂造成很坏的影响。很多占地为王者不是汉人，而是以前戍边的突厥人。晚唐时，长安和洛阳都毁于战火，这使得位于大运河河口的河南开封成为中国北方的中心都市。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的迅速更迭说明，每位自立为王者只能占据京城很短的时间，然后就被对手击败。937年，一位皇位争夺者求助于蒙古草原上的新兴的契丹政权，并在其帮助下夺取京城开封。作为回报，他对契丹称臣并将现在的北京一带赠与契丹人。当他的继承人企图中止协议时，在946年至947年间，契丹人袭击了开封。

最终能够武力统一中国的将领是赵匡胤，他成为宋朝的第一位皇帝，庙号太祖(960年-976年在位)。太祖原是后周的殿前禁军统领，禁军不愿听命于7岁的皇帝，遂拥立他为帝。16年后太祖去世时，南方绝大部分小国都臣服于宋。太祖的丰功伟业结束了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藩镇割据局面。为巩固对所有军事力量的控制，他让禁军将领告老辞职，而酬以优厚的养老金，用文官逐渐取代节度使。他从镇兵中挑选最好的精兵入禁军，并将禁军发展成一只强大的、机动灵活的专业化军队。他将禁军置于他本人的统领之下，用于保卫京师。为杜绝地方割据，太祖用文官执掌军队，并且定期轮换军官。太祖的胞弟完成了对军事力量的重组(他于976年继承皇位)，废除了藩镇，任命朝官执掌司法、财政、军事和交通，并监督协调涉及不同府州的事务。

与汉或唐不同，宋朝在统一中国之后并未开始一个对外大举军事扩张的新纪元。宋朝不仅无望重建在中亚的霸权，而且无法将契丹从北京一带驱逐出去。不仅如此，与吐蕃沾亲的党项族在以今天甘肃为中心的西北部建立了一个政权。正如五

① 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此后进入我国“五代十国”的分裂时期。一直到979年宋太宗灭北汉，分裂时期才告结束。宋朝始建于960年。——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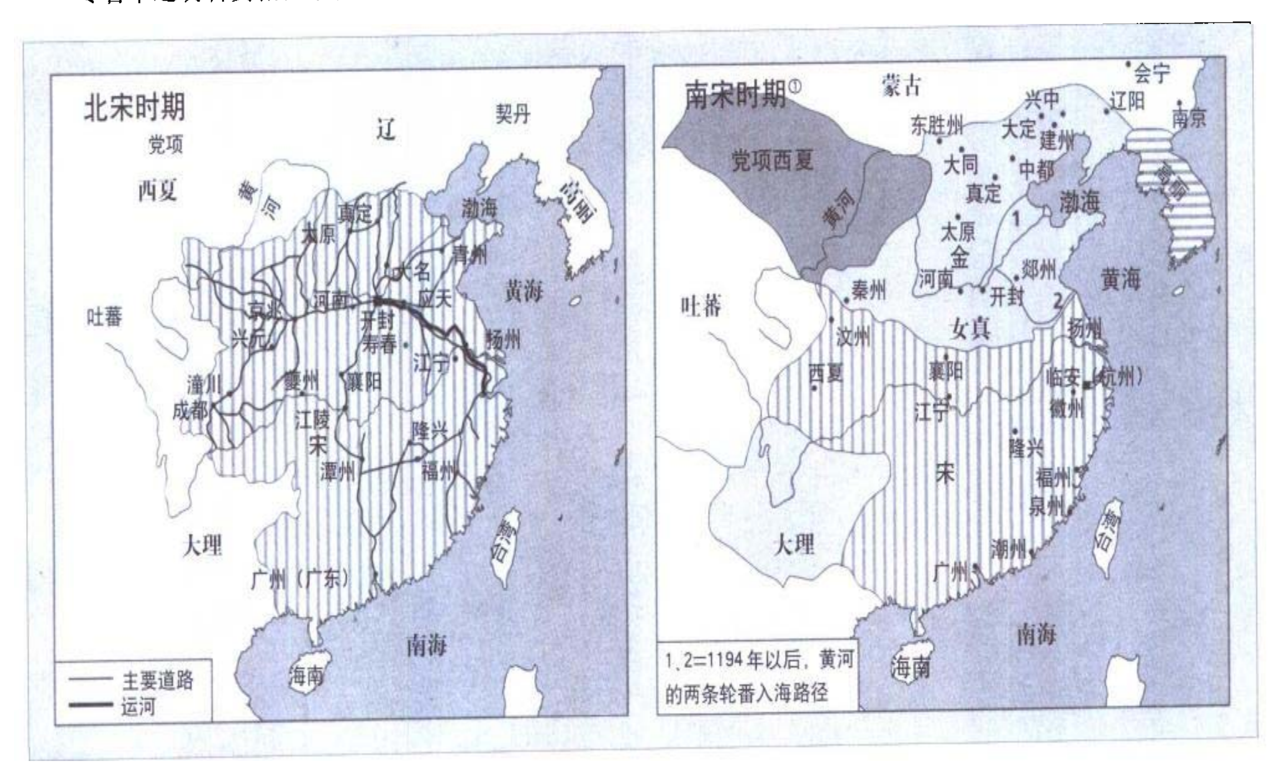
六世纪时的北朝诸国一样，契丹人所建立的辽国和党项人的西夏国均由本族人统治，但任命汉人为官吏，用汉法治国，国内民族杂处，有很多汉族农民、商贾和手艺人(见第七章)。依据1004年和1044年所签订的和约，宋朝同意每年支付辽和西夏大笔款项，以求得和平。但国防问题始终令人担忧。从979年—1041年间，宋朝的军队增加了三倍多，有125万余人，政府每年要生产大批武器，包括数以亿万计的箭头和数以千万计的盔甲。军费开支大约消耗掉四分之三的政府岁入。

抵御强敌所需刺激了军事技术的改良。1040年，在对党项族的作战中，仁宗皇帝派人编纂了长达40卷的兵书，其中包括制造和使用多种武器和攻城器具的方法，还首次提到了如何制造火药。当时火药主要用于由弹射器发射的炸弹，后来也是在宋代，兵器匠人发现可将火药用作发射燃料，从而发明了真正的火炮。但在作战时，宋朝先进的兵器一般只能使其占有暂时的优势，因为敌军可以俘获宋朝工匠，也能很快生产类似的兵器和工具。军事危机有利于朝廷集权。中国帝制政府总是力图在中央与地方官吏之间平衡权力，即在集权于一身的君主与依君主命令行事的文武官员之间保持一种权力平衡。宋朝时这种权力平衡有向中央政府和文官倾斜的趋势，而且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宋朝政治的各方面都较符合儒家的设想。宋朝皇帝中没有暴君，皇后个个心地善良，也没有宦官策划宫廷政变。

不仅如此，宋朝君主一般都不独断专行。在作出决策之前，他们通常听取各种见解，经常依宰相之见行事。太祖发誓决不因意见相左而处死任何人，并责成继位者照此规矩行事。朝官们一般也以朝政为重，支持强化中央的权力。很多官吏非常杰出，他们献身于廉洁的政府，敢于直抒己见。例如，范仲淹科举及第为官后，在1043年和1044年间努力改革用人制度和地方行政。他认为士大夫官吏的职责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尽管不乏明君贤相，宋朝还是存在两大弱点：党争与官僚政治。也许是因为

宋朝，中国文明在缩小的疆域内繁荣发展，尤其是在1127年之后，女真族占据了北方，原来的疆土一分为二，北方由金统治，宋朝(南宋)则偏安南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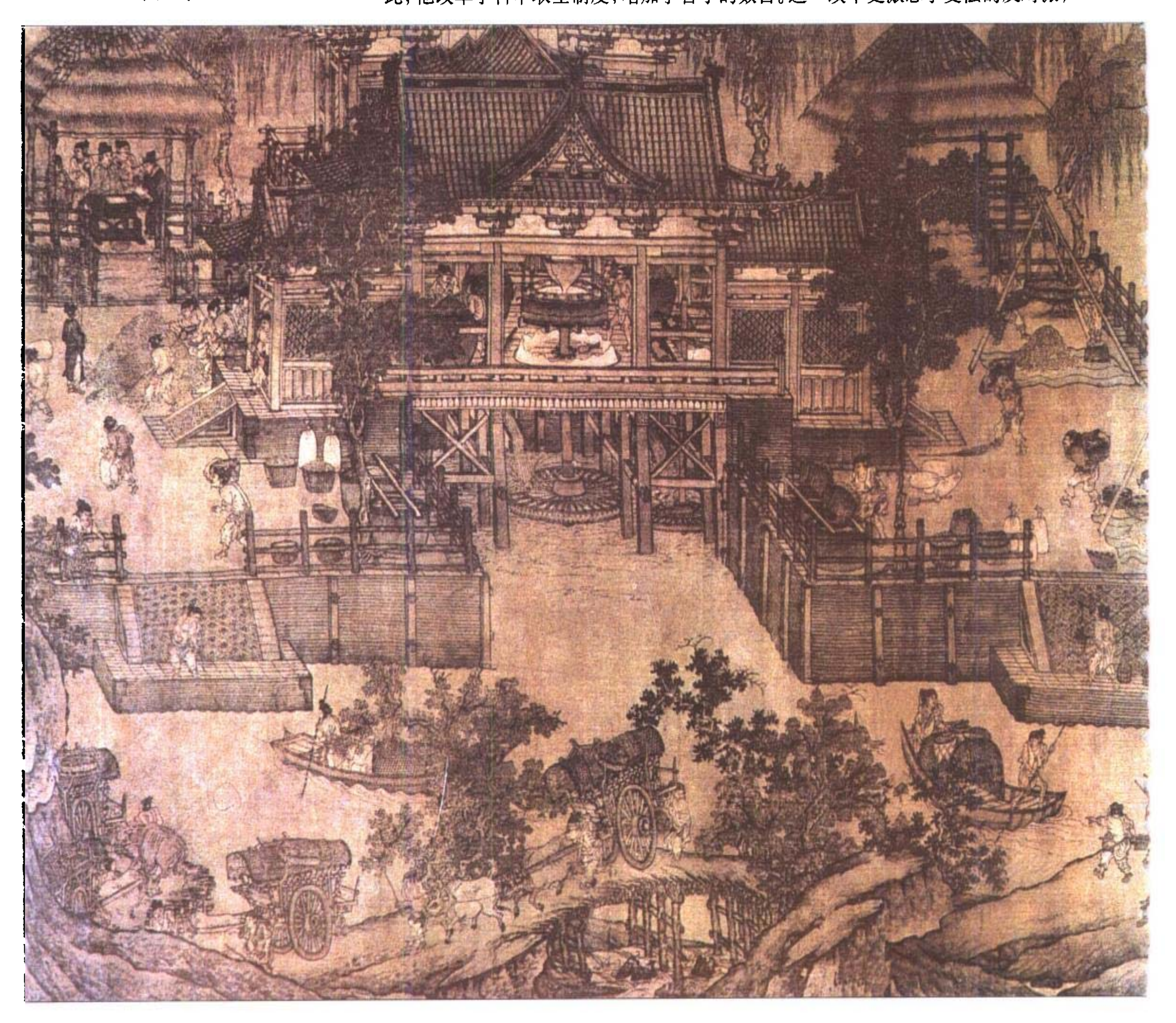
① 此图关于金的疆域范围与史实不符。实际情况请参见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之《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3-54页的"金、南宋时期全图（一）"及其文字说明，第55-56页的"金、南宋时期全图（二）"及其文字说明。——编者注

印刷术造成的便利条件，宋朝颁布了连篇累牍的官僚条规，如有关举行朝仪之所的规章多达1200条，而关于如何接待高丽使节的条文也有1500条之多。改变规章或程序要经过繁多手续，以至于很多官员因怕麻烦而干脆反对任何改革。

事实证明，解决党争同样是一大难题。由于没有合法渠道解决政治纠纷，官员们均想方设法去左右君主，他们之间的争斗往往升级，双方网罗党羽，千方百计地剪除对手。分裂性最强的党争始于20岁的神宗皇帝(1067年－1085年在位)继位并任用王安石彻底改革政府之时。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为国库增加收入。在彻底重建财政制度的过程中，他改变了核查田赋的方式，用新办法征集和运送特殊的贡税，并向农民发放有息贷款使其不再依赖于地主；将徭役改为交纳税银；整顿地方衙役；开设官办当铺；建立地方武装协助国防等。

在水路运输、水磨坊和粮食生产之间的联系，在这幅无名氏所画的帛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因为太急于求成，王安石很快就成为官僚们的众矢之的。由于达官显贵如史学家司马光和诗人苏轼攻击他的变法不符合儒家思想，王安石只得任用自己人。为此，他改革了科举取士制度，增加了官学的数目。这一改革更激怒了变法的反对派，



种种因素——诸如个人怨恨、不同的地区利益和阶级利益、对立的行政理论——使支持王安石的变法派与其反对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王安石免除了很多反对派的职务，但当他的对手占上风后，他们也以牙还牙。在王安石及其最初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死后，党争仍持续不绝，影响士大夫之间的关系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发展中的经济

如前章所述，虽然政治思想家们对晚唐的政治分裂扼腕叹息，但这一局面似

苏东坡

数百年来，说自己是中国人就意味着自己是以过去的那些著名文人为荣的。在宋代的名人中，也许苏轼（1037年–1101年）最为人景仰，他的别号东坡更为世人所知。苏东坡不仅是中国传统上最杰出的词作者之一，还深深地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从他去世时直到现在，人们到处搜集他的书法作品，寻找以他为主人公的绘画和记载着他的行踪的碑文，并祭拜他的庙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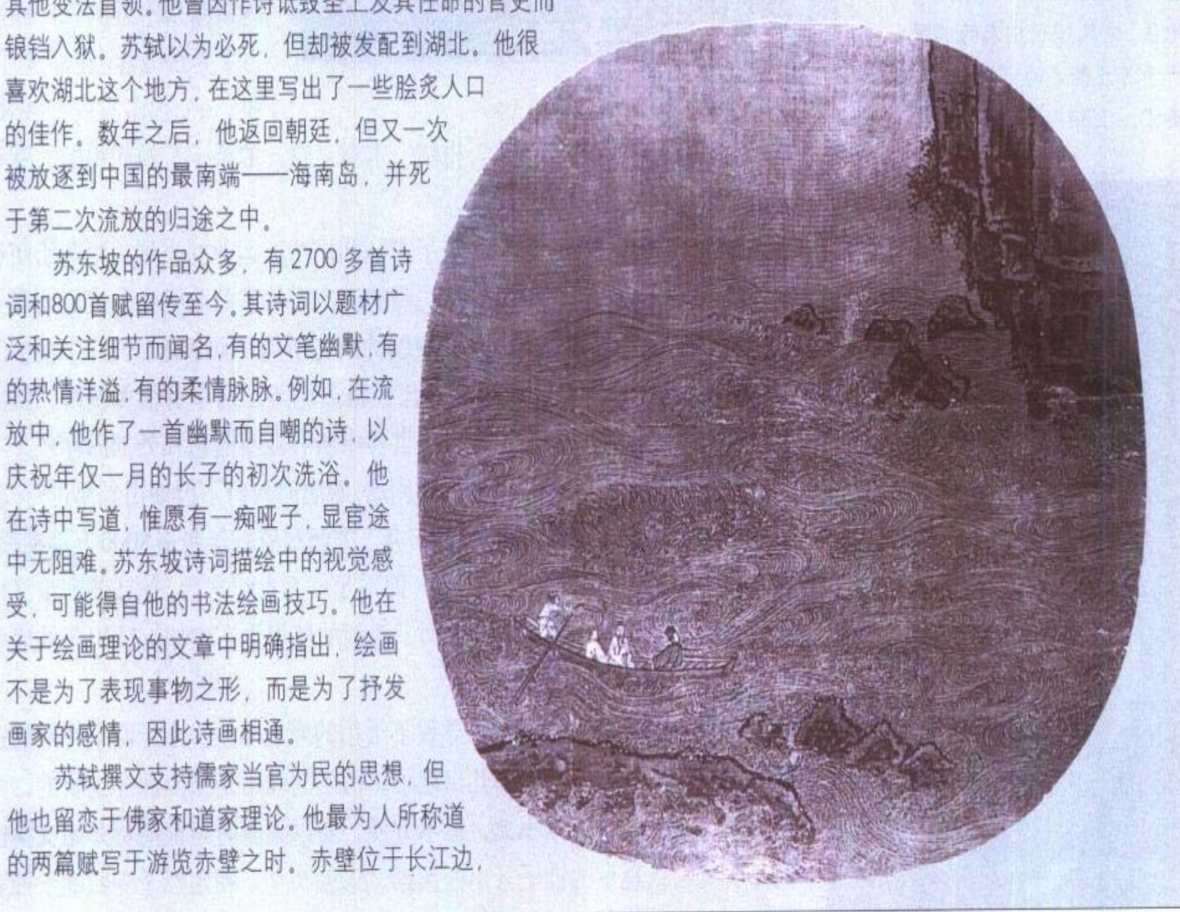
苏东坡生于四川西部，在1056年–1057年间的科举考试中榜上有名，并很快成为著名文人之一。在漫长的仕途生涯中，他直言不讳地抨击朝政，反对王安石和其他变法首领。他曾因作诗诋毁圣上及其任命的官吏而锒铛入狱。苏轼以为必死，但却被发配到湖北。他很喜欢湖北这个地方，在这里写出了一些脍炙人口的佳作。数年之后，他返回朝廷，但又一次被放逐到中国的最南端——海南岛，并死于第二次流放的归途之中。

苏东坡的作品众多，有2700多首诗词和800首赋留传至今。其诗词以题材广泛和关注细节而闻名，有的文笔幽默，有的热情洋溢，有的柔情脉脉。例如，在流放中，他作了一首幽默而自嘲的诗，以庆祝年仅一月的长子的初次洗浴。他在诗中写道，惟愿有一痴哑子，显宦途中无阻难。苏东坡诗词描绘中的视觉感受，可能得自他的书法绘画技巧。他在关于绘画理论的文章中明确指出，绘画不是为了表现事物之形，而是为了抒发画家的感情，因此诗画相通。

苏轼撰文支持儒家当官为民的思想，但他也留恋于佛家和道家理论。他最为人所称道的两篇赋写于游览赤壁之时。赤壁位于长江边，公元208年曾在此爆发过一场激战。在第一篇赋中，他和友人探讨生命的短暂，以及沐浴在江边轻风中的欢愉之情。第二篇则写他和友人在岩石中漫步，并在江中泛舟、随波逐流的情形。

在他死后25年间，因反对变法，苏轼的作品被禁。但当禁令一开，出版商、私人收藏家和佛寺均刊印他的作品。在宋朝，他的作品至少有9种不同的版本问世。

苏东坡泛舟于赤壁。李嵩（1190年–1225年）[①] 作。



① 李嵩生卒年代不详，但曾为南宋的光宗、宁宗、理宗（1190–1264）做过画院待诏，故其生年不可能是1190年。一说他的生卒年代为1166–1234年。——译者注



这张纸币在南宋时发行于杭州，面值1000文，携带它当然比携带一串千文铜钱更为便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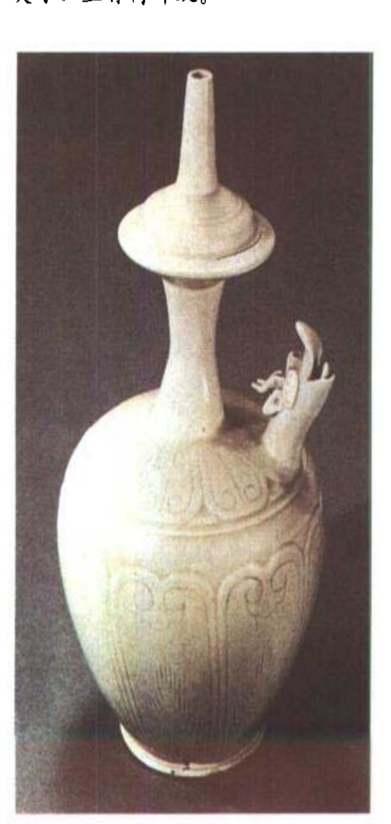
乎促进了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最明显例证是在750年至1100年间，人口翻了一番。在742年，中国人口仍然只有5000万，与公元2世纪相同。在其后的三个世纪中，由于中部和南部水稻种植面积扩大，粮食供应稳步增长，人口相应增加。在1100年，人口达到一亿。繁荣的农业和密集的居住模式有助于商业发展。在人口稠密地区居住的农民，在更大程度上卷入商业活动之中，出售余粮，买进木炭、茶、油和酒。主要种植粮食的农户，也常常进行小规模的副业生产如酿酒、烧炭、造纸和织布，并通过中间商出售产品。有些农民甚至发现专业化生产是有利可图，例如苏州附近的农户经常致力于养蚕缫丝。在福建、四川和广东，很多农民专种甘蔗。其它经济作物包括茶、蔬菜、柑桔、木材、竹、油茶子、纺织用的大麻和苧麻，以及宋朝后期出现的棉花。

区域之间的贸易运输，促进了内陆和沿海航运业的发展，为造船商和水手提供了就业机会，也为有资金买船的富户提供了商业机会。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13世纪末撰写了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他惊讶于长江中繁忙的航运业："我告诉你，这条江很长，流经很多地区，两岸有很多城市。就河运总量和总值来说，长江超过基督教世界中所有江河的总和外加海洋[21]。"

贸易的发展促使对货币的需求剧增。晚唐时政府不再使用丝帛进行交易，对铜钱的需求量因此而大增。到997年，宋朝政府每年制造8000万贯铜钱，为唐朝最多时的两倍半。到1085年，即不足一个世纪之后，铜钱的产量又增加近8倍，每年为60亿贯。与此同时，银两的使用也在增加，1120年政府就征收了1800万两白银的赋税。

对货币的需求量的加大，导致了纸币的应运而生。由于四川特殊的造币制度，最初的纸币首先在那儿出现了。四川的硬币是铁质而非铜质的，大量货币易手时分量重，体积大，很不方便，所以晚唐时当地商贾开始交换由他们存有货物或现金的铺子开出的票据。宋朝初年，朝廷授予少数铺子拥有出具这种票据的垄断权。12世纪20年代后，政府接手了这项工作，发行了世界

最优质的瓷器和粗陶器并非产自京城，而是产自不同地区的陶都，那里的大批量生产技术已经很完善。商人们将陶瓷器皿运销全国和亚洲大部分地区。这只10世纪末的水罐生产于河北著名的定州窑，高10英寸，上有荷叶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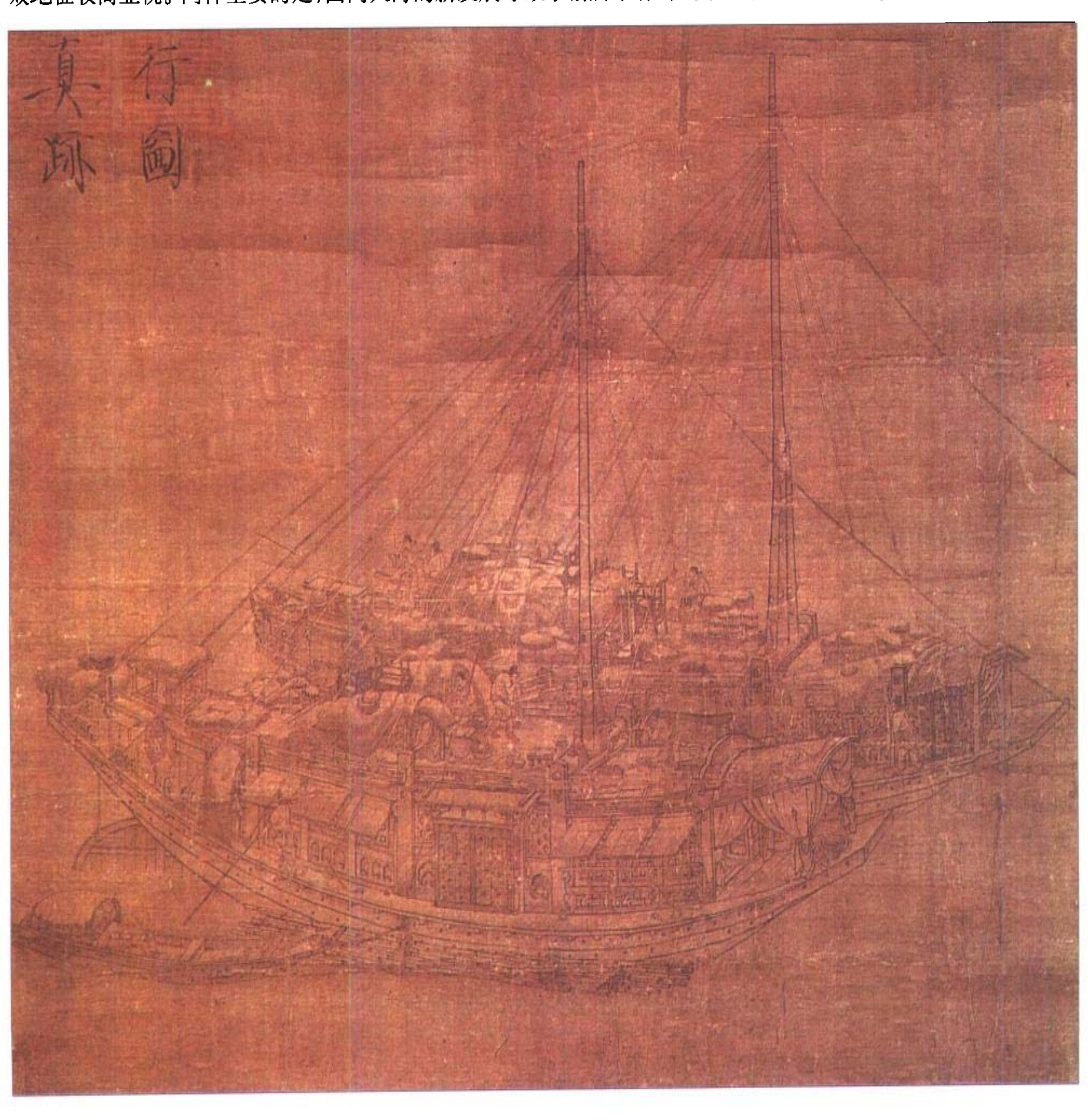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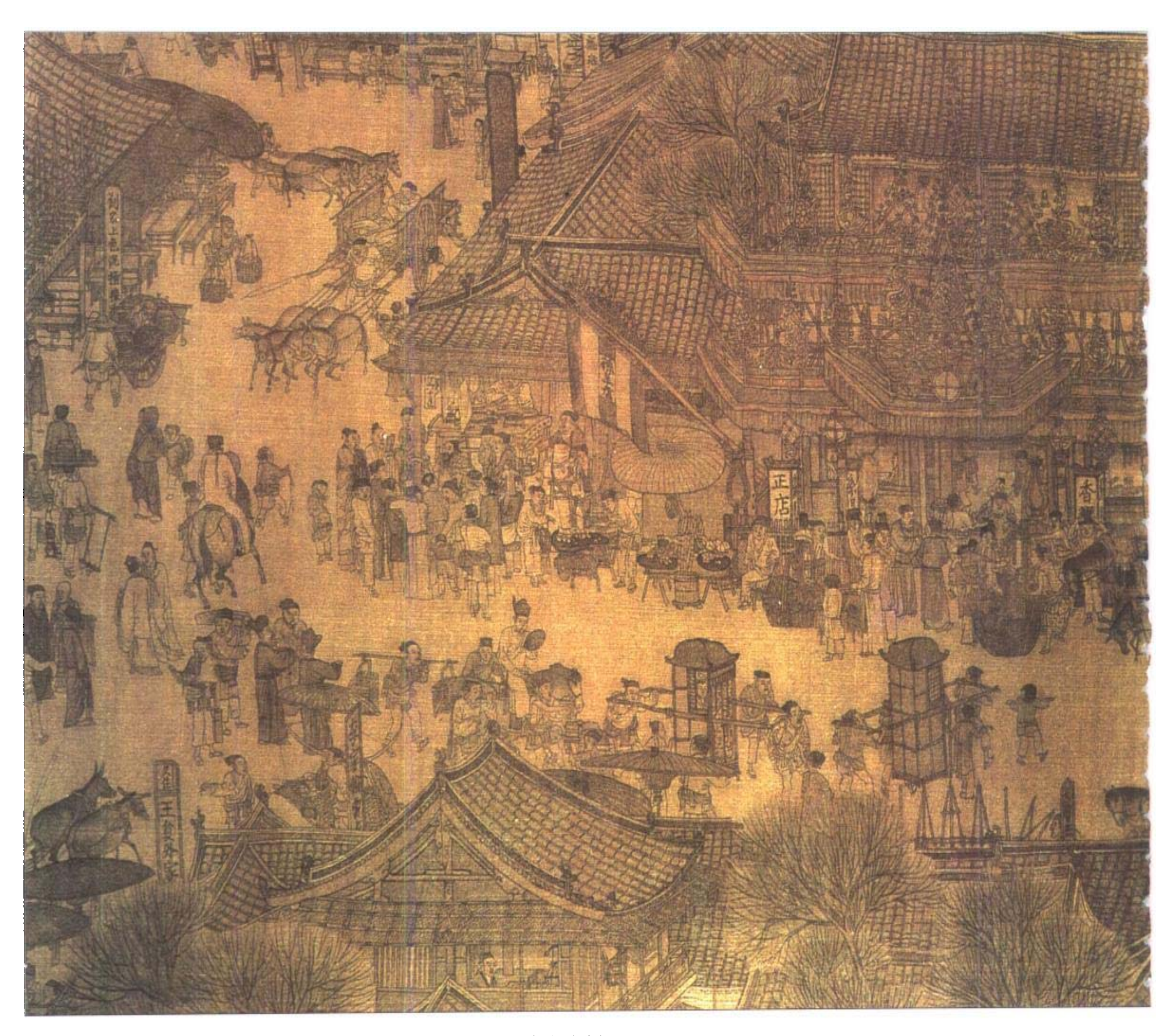
上最早的政府纸币。事实证明，宋朝政府有能力控制纸币的发行量，基本上避免了过量发行，没有很快导致通货膨胀。

由于区域间贸易的加强，商人们经营活动的专门化与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合资很常见，商业活动有时由合股公司组织，公司的所有权(持股人)与经营权相分离。人们可以从多处借钱，不仅通过放债人，也通过掮客、批发商和货仓主借贷。在大都市中，商贾们组织成行会如稻业行会等，安排诸如批发商将米批发给米铺老板这类事宜，并定期规定价格。行会领袖代表所有商贾，同政府交涉纳税和征用等问题。

商业活动不仅限于国内市场。宋朝自成立之初，就鼓励对外贸易，尤其是海外贸易。朝廷官员出使东南亚国家，怂恿他们的商人来中国；中国商贾也主动出击。在宋朝，载着中国商人航行在南海上的中国船只，取代了南亚和西南亚的商船。造船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海外贸易，运用桨和帆的巨大船只可载数百人。同样对航海至关重要的是罗盘的发明，1119年中国史料中初次有了关于罗盘的记载。海外贸易的扩大有助于充实国库，尤其是南宋时期，当时的政府已经知道如何卓有成效地征收商业税。同样重要的是，面向大海的新发展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创举，即宋

商业革命取决于发展完善的运输体系。这两只货船见于一幅宋代帛画的局部，这类船只在密布的河流和运河上运输货物。





《清明上河图》描写的是北宋京城开封一带的社会生活。它的这一局部所表现的众多人物中有货运马车夫、挑夫、小贩、店主、说书先生、算命先生、代书人、轿中的妇人、士大夫和交谈的儒生等。此图由张择端作于12世纪，整幅画全长17余英尺，高9.75英寸。

朝建立了强大的海上水师。

在宋朝，手工业的发展同样引人注目。传统的手工业如丝织、漆器和制瓷业，在技术上达到最高水平，趋于完美。很多最上乘的丝帛仍产于官办作坊，但小型的家庭作坊也十分常见。很多农户植桑养蚕，将缫好的丝卖给城中的织户。制瓷业也蓬勃发展，瓷窑很多。各地的瓷都以生产优质器皿而著称。对书本、文献、纸币和包装用纸需求的增加，导致了造纸业的空前兴盛。重工业尤其是制铁业，发展更是惊人。冶金术的发展使铁的年产量在1078年增加到12.5万吨，比800年增加了6倍。最初人们用木炭冶铁，这使北方地区的森林被大面积砍伐。但到11世纪末，烟煤取代了木炭。其它有助于冶铁业发展的重要新技术还有用水压机带动风箱和用炸药开矿。铁锭用于其它手工业生产(例如制盐和制铜)以及制造工具、兵器、造船的铁钉、吊桥用的铁链，甚至还用于铸造佛像。

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城市的兴起。很多城市中的人口增长迅速，半数以上的居民不得不住在城墙之外。在1126年以前，宋朝的京城一直是开封，它和

唐朝的都城长安一样，人口众多。但开封是个更加商业化的城市，主宰居民生活的是昼夜开放的市场，而不是宫廷和政府机构。多层房屋矗立街头，并无墙环绕，这些房屋多用于出租。宋朝南迁之后，新都城杭州的人口和经济发展很快就赶上甚至超过了开封。马可·波罗说杭州无疑是世界上最无与伦比、最光彩夺目的城市：“任何人看到如此众多的居民，都会认为不可能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但每逢墟市，商人们便用车船运来大量食品。所有的集市上都人流如潮[3]。”

各省城市的增长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有十多个城市人口已达5万或者更多。福建北部的建康[1]是个内陆城市，居民可能有20万之多。福建南部的沿海城市泉州更大，其知州在1120年声称，该市加上乡村有50万居民。此外，市镇也在各处兴起。很多这类市镇最初是定期举行的集市，人们在一定的日子如每5天或每10天来此进行交易。不久，这些集市就吸引很多茶馆开设起来，出售日用必需品的店铺也开张了，然后新的居民便搬来了。最终政府会注意到这些新兴城镇，于是便在城中设立了税务机构。

经济机会和人口增长使南方大部分地区逐渐“繁荣”起来。福建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一个很好例证。初唐时的一位官员曾声称，漳州的居民半数不是汉人，而是“衣左衽，发脏而乱”的蛮子。晚唐时，有人提到福建本地人时，说他们不会说汉话，或居于洞穴，或以木排为家。但到宋朝中期，随着福建人口压力的不断加大，人们不得不将山坡垦为梯田，很多人甚至移居广东等发展缓慢的地区。一位旁观者曾说，广东某府的当铺老板十有八九来自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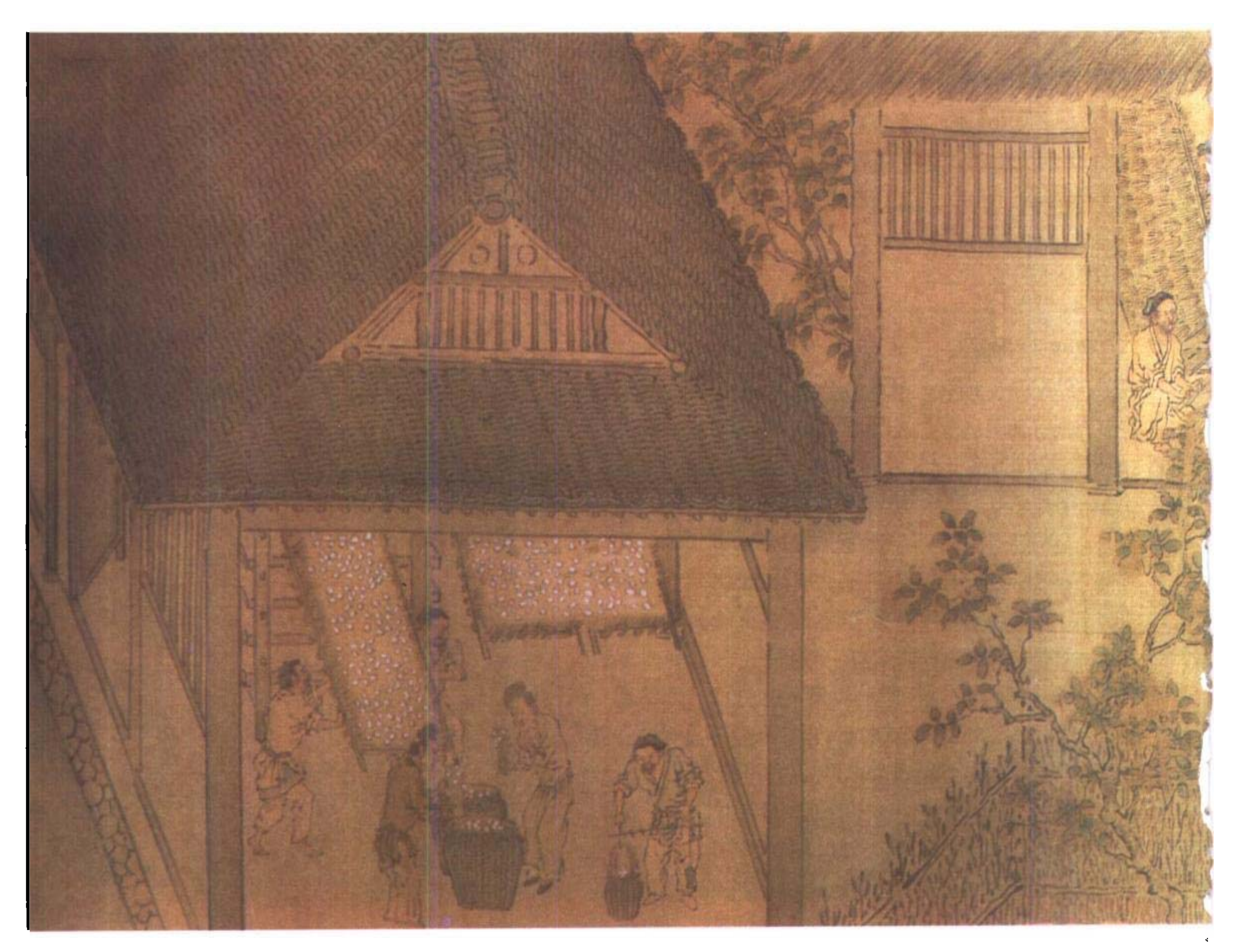
只有数名工人的小作坊也可以进行印刷。在雕板工将文本刻在木板上之后，另一位工人把墨汁刷在木板上，然后将一张纸覆盖上，再用干刷子在纸上刷。应用这一方法，一个人一天最多可印刷1000张。因为可以保存雕版，每版平均共印2万张，所以每份的成本不高。这幅介绍印刷作坊的插图取自一本清代书籍，它描述了程氏兄弟的父亲在印一本进行道德教育的作品。

士大夫

在经济发展和政治变化的同时，应科举取士制度而生的士大夫官僚阶层崛起。这一社会统治集团是中国文明独一无二的现象，不存在于其它任何主要文明国家。这一统治集团的成员自称为士或士大夫。虽然这一称呼始于古代，意为“士绅”或“士人－官僚”，但在宋朝，它在关键的几个方面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种种因素——士族豪门习俗与观念的衰落、财富的增加、因儒学复兴而活跃了的知识界，以及科举制度几乎成为进入仕途的惟一门径——造就了一个精英集团，它比自己的前身人才更多、学识更丰富。

科举制度在隋唐时并不太重要，但在宋朝，它对造就这一新兴统治集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朝初年，君主们最耿耿于怀的是如何防止武将专权，为此大大发展了科举以及太学制度。中进士的平均人数很快就达到唐朝的四至五倍。朝廷不遗余力地完善取士制度，使之能够择优录取，发现人才。为确保考试不受考官对举子个人成见的影响(在唐朝这事时有发生)，书吏将考卷誊写一遍，凭号码识别考卷。

① 原文为Jiankang，怀疑是建阳之误。——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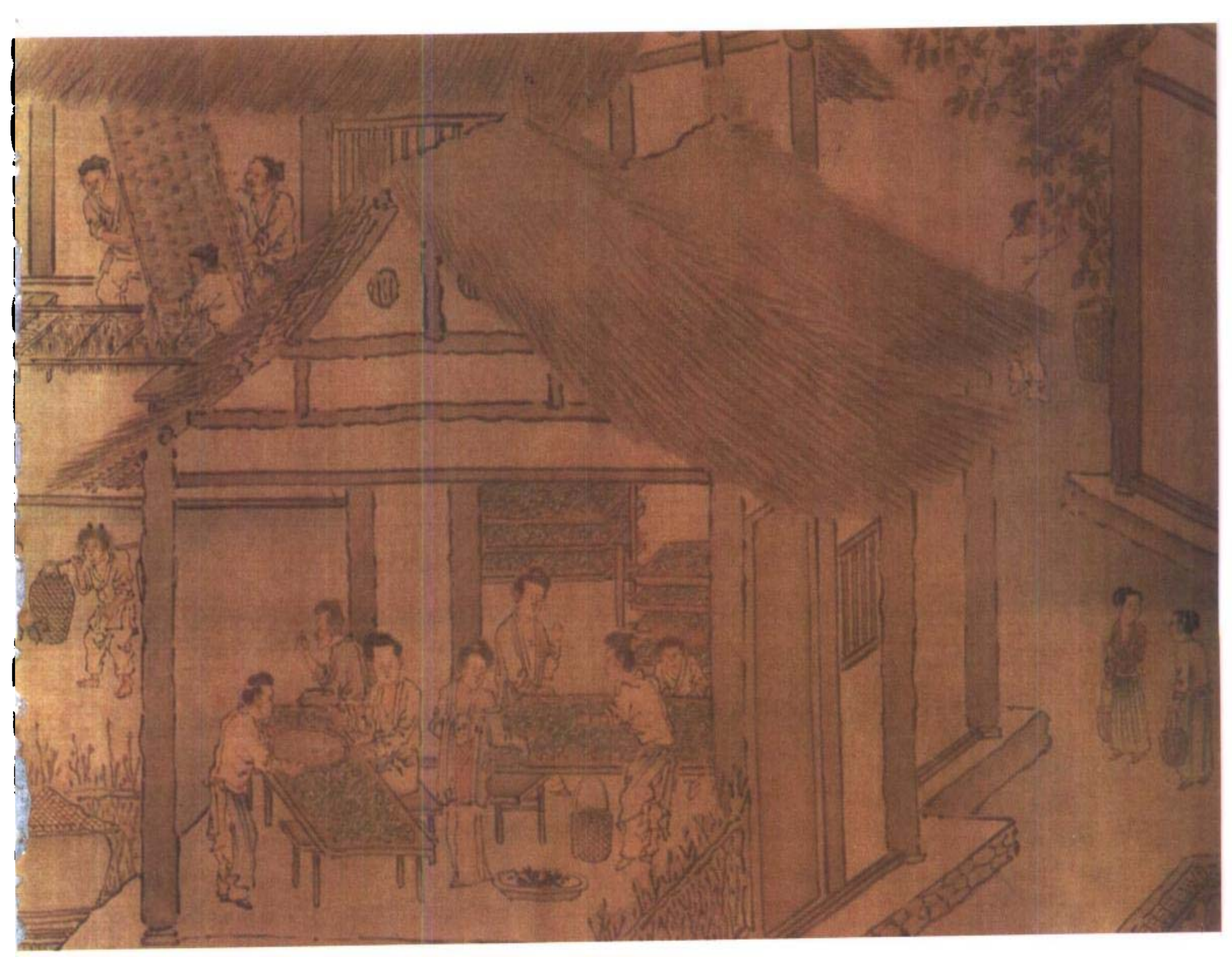


制丝要经过很多道工序。这是一幅绘于13世纪的丝帛画轴局部。此画描绘了采桑叶、摘桑叶喂蚕、移动蚕作蛹的木架、将蚕蛹放入筐中以及称蚕蛹等各道工序。

由于采取了这一新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任用的很多官吏首次来自中部和南部，从而结束了北方人垄断官职的局面。一朝金榜题名，便满门荣耀。甚至那些凭借特权谋得职位的高官的子孙，往往也走科举之途，因为一旦成功，便极容易跃居高位，主理朝政。但是没有通过最高一级考试的人，通常不得不到遥远的边地开始仕途，从末品官做起，很可能终身只能当县官，永远升不到知州以上。

面对这诱人的辉煌前景，越来越多的文人走上科举之途。11世纪初，每年只有不足3万人考举人，但到11世纪末，这一数字上升至近8万人，宋朝末年可能达到40万人。因为录取人数并未增加，考中的概率大大下降，有些州平均333人中只有一人能考中。为准备竞争如此激烈的考试，文人们需要将儒学经典背得滚瓜烂熟，甚至连最模糊不清的段落也能记得。他们也需要掌握特定的作文方法，包括吟诗作赋。幸运的是，印刷术的传播使书籍远比过去普及，书香门第和立志仕途者能比过去更为方便地买到或借阅儒学经典、各代历史、诗赋全集，以及各种参考书籍。很多豪富之家开始拥有藏书几千卷的私人藏书楼。

新兴士大夫官僚阶层的佼佼者往往学富五车。如欧阳修，除了在朝中担任最显赫的要职外，还能诗善赋，编辑了两部重要史书，撰写了一部评论性的金石拓谱。金石拓谱一书是金石学和考古学领域的开拓性著作。苏轼的兴趣同样广泛，在艺术



领域卓有建树。司马光曾位居丞相，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人物，他也撰写了一部史书，叙述了从东周到960年宋朝开国期间1300年的中国历史。或许学识最为广博的当数沈括，他在职期间曾设计了排水系统和防护堤，使大片的荒地变为良田。他曾管理财政，专门核算货币政策的影响。也曾执掌天文历法机构，监督军事防卫的筹备工作。他甚至曾出使辽国，与之谈判签约。他一生著书立说，讨论地理、历史、考古、礼仪、音乐、算术、战略战术、绘画、医学、地质学、诗歌、印刷术以及农业技术等问题。沈括虽以自然科学家著称，但有时也评点儒学经典，而且对占卜和佛学也颇感兴趣。

士大夫阶层由很多家族构成。在这些家族中，只有一部分男性成员活跃在国家社会政治舞台上。一般来说，地主才有能力教育其后裔。他们在家乡是当地豪绅，只要一家之中有一人在朝廷任职，其他成员就很容易步其后尘，因为官吏不仅在经济上使其家族获利，而且也会使他的子孙享有各种权益，如较容易科举及第，或者可以被直接任命为下层官吏。对于中层或高级官吏，有时甚至连更远的亲戚也能享有这些权益。因此，从地方而非国家的角度来看，历史悠久的家族比新进之士更为引人瞩目。在一个人口约10万的县里，当地一两百年间的所有名人显贵，几乎都来自十余个豪绅之家。但是这些家族并不能安享荣华富贵，他们非常清楚，如果后



富有而趣味高雅之士常常在家中大摆宴席,有时甚至从妓院召来歌妓舞女款待宾客。雅致的陈设、画屏和细瓷酒具更增添了奢华的氛围。带背坐椅已有使用。此为10世纪顾闳中所作画卷拓片的细部。

辈不图进取，当家财平分给他们之后，家运便可能衰落。有人撰文警告说，如果家长不希望败落，就必须学会如何管理佃户和指挥管家，如何买卖土地，如何放债，以及如何投资于商业，否则家产便会不保，甚至沦为贫困之家。

到宋朝末年,士大夫官僚统治集团在社会、政治和文化诸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中国与欧亚其它主要文明国家截然不同。就中央政府来说，大部分重要职位由择优选用的文人执掌；就阶级和地方权力结构而言,虽然统治阶级与教育和科举制度的关系日益密切,但他们的主要经济来源仍是地租收入；就广泛的文化内涵而言,宋朝与北方游牧和半游牧军事强国的争斗,较大程度上强化了中国文明中文人士大夫的意识形态。

北方的沦陷

最才华横溢的宋代皇帝是徽宗(1100年－1126年在位)。他是一位天分很高的画家和书法家，不仅用内库开支搜集画作(他的目录上列有6000多幅画)，而且他本人也开创了新的书法流派,首创了花鸟画,还常常教导宫廷画家如何作画。徽宗也对道教深感兴趣，在宫里举行过盛大的道教仪式。按流行的观点，由于徽宗埋头于书画和宗教事务，他不仅失去了皇位，而且使宋朝失去了北方。

1115年，半农半牧和以狩猎为生的女真族崛起，自立金国。女真族居住在满洲东部、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以北。它曾对契丹宣战(见第七章)，因此宋朝将女真视为盟友，很快与要求瓜分契丹领土的金国结盟。但不足三年，同盟瓦解，女真进攻开封。围城不到两月，开封城破并被洗劫一空。那时徽宗已让位于太子，父子二人和3000名宗室遂被掳到遥远的东北。赎回徽宗的谈判失败后，他于1135年死在被囚禁的北方。北方失陷前的宋朝一般被称为北宋，其后称为南宋，它们是因京城所在的不同的地理位置而得名的。

宋朝的忠臣在南方汇聚，拥立徽宗的次子为新皇帝。但南宋朝廷的地位极为屈辱，不得不向扣押着皇帝之父母、妻子、兄长和众多其他亲属的侵略者乞和。但到1138年局势稳定下来，南宋朝廷定都杭州，统治着淮河以南的绝大部分地区。

在12世纪其余的时间里，宋朝官吏和士大夫的最大愿望就是收复中原地区，那儿曾是所有主要朝代的建都之地，也是所有宋朝先皇安葬之所。因此，后来的历史学家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和谈为乞降，将岳飞视为英雄。岳飞是南宋将领，他致力于收复失地，并一度打到洛阳地区，但却被朝廷召回，陷害致死。1142年双方订立了和约，宋朝同意每年向金朝纳贡，从而像以前对辽国那样，赎买到了和平。不时这一方或那一方小动干戈，力图击败对手，但直至13世纪初蒙古人崛起，宋金战局没有太大的变化(见第七章)。

北方的沦陷并未摧毁宋朝的经济。实际上，迁都南方似乎进一步刺激了这一地区的发展。从南方运食物到北方的首都一直占贸易总额的相当大部分， 但首都南移之后运输费大大降低。货物可以通过星罗棋布的江湖运河，很便利地用船只运到杭州。而且，宋朝与金国之间的政治边界也没有妨碍彼此间的商业活动，北方继续从南方进口大量的茶叶、稻米、糖和书籍。

守内

在其它方面卓有建树的宋朝，却无法像全盛时的汉唐那样建立军事霸权，这使宋朝的文人墨客和官吏分外耿耿于怀。由于强烈地感觉到北方邻国的威胁，他们不愿借鉴异国时尚，而是更寄希望于输出中国文化去同化异国。文人们因其产地的缘故而排斥外来之物。像晚唐时的韩愈一样，他们有时也排斥已传入中国近千年的佛教，仅仅因为它不是本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孙复声称，让“蛮夷之说”干扰“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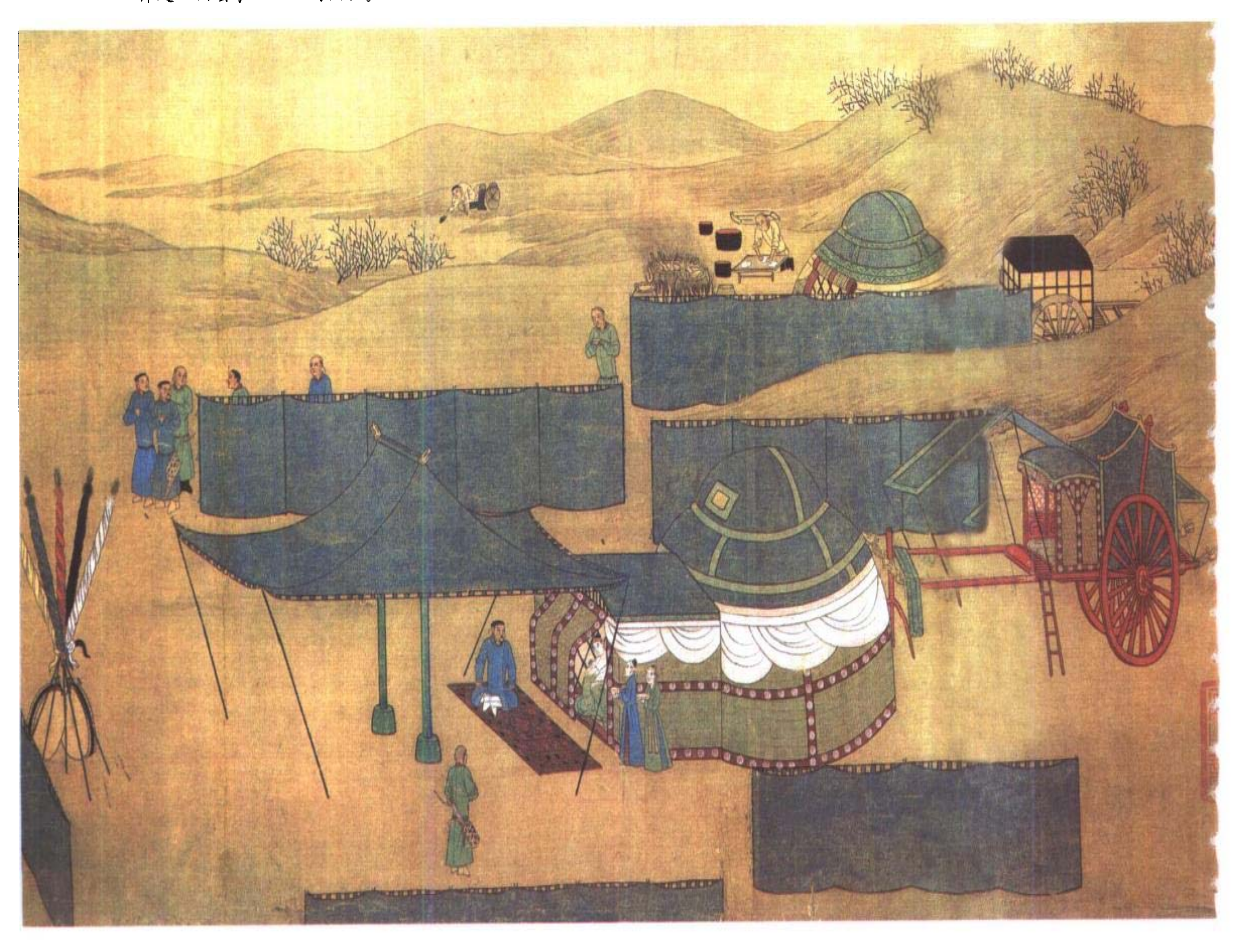
徽宗(1100年—1126年在位)对道教、绘画和书法极感兴趣。在这幅帛画中，徽宗描绘了发生于1112年的一件事，当时一群白鹤飞至一座宫殿，为纪念这一吉兆，他赋诗一首。人们一般认为徽宗也是这幅画的作者，但也可能是他命宫廷画家代他画的。

贤之论”是中国士大夫的羞辱。石介撰文说，中国人忘祖不祭却敬蛮夷之鬼，大悖人之常情。唐朝时佛教在整个亚洲深入人心，增加了它的魅力。但到宋朝时，国际政治局势变化了，对文化整合的认识也与以前不同了，党项、契丹和女真成为虔诚的佛教徒，但这似乎只突出了佛教的外来性，而不是进一步证实它是众所公认的宗教。

宋代画家和诗人们通过描绘或刻画被迫生活在外族之中汉族女子们那脍炙人口的故事，探讨了有关忠于中国文化这一复杂的问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王昭君的，她是个汉代宫女，被迫嫁与一个匈奴王公。在一首咏王昭君的诗中，欧阳修描写了异族土地上冷酷无情的风沙，并嘲弄说，在数世纪之后，宫女们却急于学会弹奏王昭君曾用于吟唱思乡之曲的胡人乐器。另一个故事是关于蔡文姬的，她的父是个著名文人，而她被匈奴掳去，被迫嫁与一个王公。她生下了他的后代，因此在数年之后被赎回中原时肝肠寸断。徽宗之子，也就是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在协商为其母缴付赎金时，还特地找人绘制了蔡文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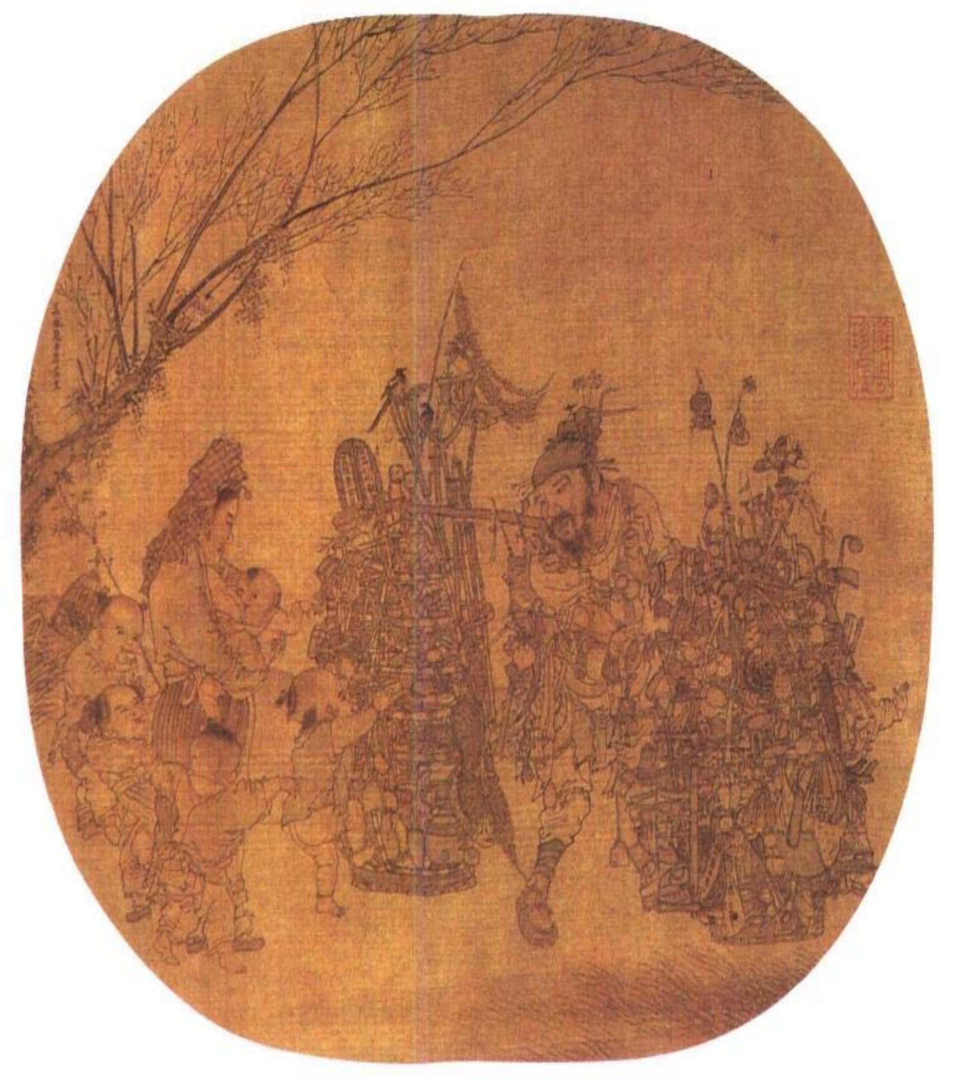
很多宋朝思想家认为，复兴儒学是强化中国文化精髓的最佳方法。尽管儒学教授的绝大部分学生是为准备科举考试而进行学习的，但最富启发性的老师则更经常地督促学生注意个人道德和学识的增长。老师和弟子既辩论科举制度的优劣之处，

南宋朝廷着人绘制的《文姬归汉图》着重表现了胡人与汉人不同的物质文明：旷野中的帐蓬与文姬家乡精致的房舍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一幅15世纪复制品的细部，原件是一幅绘于12世纪的画轴。



也讨论如何运用儒学思想解决现实问题。有些儒学思想家致力于阐释关于世界观的哲学范畴，以便同佛教的理论相抗衡。程颐和程颢两兄弟依据理(原则、模式)和气(生命力、物质力量、生理学元素)发展了关于宇宙运行的玄学理论。依据不同的对象，理可以是道德原则，也可以是物质概念，例如，就父权而言，理基本上是道德；就山峰而言，它就是物质。但上述二者的存在也有赖于气。气是构成父权和山峰的生命力和本质。根据理和气的理论，宋朝哲学家能够接受孟子人性善的观点，同时，也可以解释人类行为经常违背常情的原因。就理而言，人是好的，但他们的气或多或少并不纯粹，因此人有私欲。圣贤的气清澈无比，但是常人的气是浑浊的，因此人必须努力完善自己。

南宋儒家越来越关注于社会基层民众的所作所为。他们对朝廷无力收复失地很感失望，同时也很明了北宋朝廷大兴变法的弊端。因此，他们主张从基层着手，变革家族和村社，通过兴办学校和制作出版物来普及知识，建立一个更理想的社会。宋朝最负盛名的理学家是朱熹。他熟知儒学经典、经典评注、历史和前辈的教诲，做过数任官吏，并写、编、校了总共近100部书。他同时与十几位学者保持通信联系，定期面授数组弟子。其中很多弟子追随其左右达数年之久。朱熹自认为得到了程氏兄弟的真传，并发展了他们的玄学理论。他特别强调“格物致知”，认为这种精细的研究可以使学习者就近发现万物之理。朱熹兴趣广泛，与弟子的谈话记录涉



李嵩(1190年—1225年以后)的这幅画表明，消费品不仅在城市出售。这个喂奶的妇人为四个幼儿环绕，其中最小的一个未穿裤子。妇人在伫足观看游乡货郎出示的货物。

及到很多问题，如如何分析评价所读之物，如何理解鬼的故事，如何打坐，以及如何摈除私心。朱熹还协助兴办了书院，作为教授和弟子们的私人聚会之所，为复兴儒学的体制基础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有些书院建在城市，但大多数建在寂静的山间，类似庙宇寺院。当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时，他既传授学识，也提出道德规劝，希望弟子既博学多识又遵礼守法。

由于朱熹坚持只有他的阐述是正确无误的，所以很多人认为他自命不凡。在他的教学生涯接近尾声的数年间，其学说被朝廷指责为“伪学”，要求士子们必须摒弃朱熹学说，否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然而在他死后的几十年间，朱熹的理学在政治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1241年，皇帝赞扬朱熹“明道”，并命令太学生们必须学习朱熹批注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朝廷态度的变化，可能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此时，蒙古人已征服了中国北部，南宋王朝岌岌可危。为了得到广泛的支持，朝廷不得不努力向世人表明，尽管它没有统治中原大地，但它仍是中国文化的保护者，仍是儒生们最大的支持者。在以后的历朝历代，君主们均认识到，承认朱熹儒学为正统对他们有利。

地方社会

年复一年，农民生活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犁田栽种，交租纳税，育小养老，订婚招亲，抵御匪寇，到当地庙宇烧香，去当地集市买卖。农民们祖祖辈辈就这样生活着。但到了宋朝，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甚至使普通农民也意识到其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

各式各样的新的土地占有形式和租佃关系当然影响了农民的生活。有很多人迁移到诸如四川和湖南这样的边远地区，在那里开垦荒地，当地豪富则往往修建起庄园，由几乎毫无人身自由的佣客耕种。与此相反，在长期种植水稻的最发达地区，有钱人虽投资于土地，但并不力图建立巩固的、集中控制的大地产。大庄园并不利于水稻种植，集中管理对于水稻种植也并不适用。因此地主由佃户自行其是，只是规定好实物地租或货币地租，这样佃户为了物质利益会努力提高生产效率。在发达地区，除了这类佃户，还有一些小土地所有者以及一些租种部分土地以补其不足的农户。在经济落后地区如远离商道、不宜栽种水稻的山区，几乎不存在大地主，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自耕农。

即使在最发达的地区，乡村生活似乎也远非平安无事。地方官吏频频抱怨肃清土匪之难；司法案例表明，衙门里充斥着邻里亲友互相诉讼、争夺土地和其它财产权的案子。袁采专为家长们写了本手册，在册子中他直截了当地警告有钱人不要让孩子们单独外出，以免被绑票及被勒索钱财。他也劝诫富家大户在夜间要由佣人们看守门户，巡视财产，以防盗贼并屡次告诫大家谨防被告到衙门。

经济发展很可能加剧了中心和周边地区的分化，但其它发展趋势却将边远地区紧紧地连在一起。在宋朝，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的改善，使习俗和观念的传播比以往更快了。例如，在宋代末年，国内所有的城市均有城隍庙，很多城市也有文昌庙。“文昌”最初是四川地方的一个狰狞的恶鬼，但到宋朝时却成为赶考士子的守护神。在国内广大地区，也建立起联系更为密切的地方血缘组织。著名文人墨客促成了这

些家族组织的诞生：欧阳修开风气之先，解释如何编纂合乎体例的家谱，范仲淹首创族产之说，朱熹则最先提出设立祭祖祠堂。到宋代末年，在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和其它一些省份，家族在当地社会政治生活中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印刷术的普及有助于思想与实践的传播和统一，但它对地方社会结构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此。在宋朝末年，印刷的书籍不仅有历史、儒学经典和话本，还包括有关农业、生育、药学、占卜和道家仪典的手册。这样，以前主要靠口头流传的传统知识被诉诸文字，有利于人们进行批评或付诸实践。有学问的人现在可以指出文字的前后矛盾之处或无法核实的“迷信”内容，从而否定了这些传统的权威。与此同时，当时的老百姓也可以读到以前只有专家掌握的知识，他们可以更有把握地自行举办葬礼、占卜，或为自己的家人开方抓药。

妇女的生活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宋朝遗留至今的书籍比以往的朝代多得多。大量史料的存在，使我们有可能比以往更清晰地了解妇女在社会中的作用。根据宋朝遗留的资料，我们了解到很多有关妇女的故事，如有寡妇经营客栈，有婢女逃离虐待她的主人，有70多岁高龄的接生婆仍旧为产妇接生，女尼来往于富家豪门中，对其女眷讲经说佛，有歌女艺伎在城中娱乐宾客，有巫婆擅长与神鬼通灵，有著名文人的女儿酷爱写诗作赋，也有年长的寡妇指责外甥偷窃财产，等等，等等，举不胜举。

这些妇女肯定不会永远足不出户，但她们在家门外的作用也十分有限。在有关乡村和城镇生活、商业和政府活动及有关大族豪门的社会文化交往的记载中，大量的篇幅论及男人，提到妇女之处寥寥无几。但在家庭之中，妇女的作用则举足轻重。她们担当养育子女的重任，在为子女挑选配偶时要听取她们的意见（她们往往喜欢同亲戚家联姻），她们在儿子长大成人、娶妻生子之后，仍同其关系密切，因为儿子一般不另立门户。

宋朝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对妇女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刷业的发展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大使更多的妇女粗通文墨。在文人墨客的家庭之中，主妇往往能识文断字，可以帮助子女念书识字。词人李清照甚至极负文名。由于经济繁荣，女子的陪嫁物品增加了，而买卖妇女为仆佣、姬妾和妓女的市场也扩大了。富家豪门为女儿置办丰厚的嫁妆，希望招来前程远大的乘龙快婿。为女儿陪嫁了大宗嫁妆的家庭指望它们能够为其带来利益，可能正由于此，宋朝妇女的财产权得到一定保护。衙门将家庭遗产甚至地产，断给父母双亡的女儿一份作为陪嫁。而且，社会一般承认妻子或寡妇对其陪嫁财产拥有使用权。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变化都对妇女有利，使她们有了更多的机会，也有更大的财力影响家庭内外的事务。但是宋朝发生的另一些变化却对妇女极其不利，尤其是缠足和更为苛刻的女性道德标准。在唐朝，宫廷生活偶尔由武则天和杨贵妃这类有权势的女人来主宰，宫娥妃嫔们的体育活动都很时髦，有的甚至玩马球。但到宋代，美女标准变为文雅与自我克制。人们更严格地要求妇女举止端庄得体，她们更经常地用盖头遮面，在穿街过市时坐在密不透风的轿子里。到12世纪，据来自医学界的说法，医生到豪门大户家给贵妇看病时，对其既不能面视也不能问话，只能

稻米

直到宋朝，稻米才成为中国人的主要食物。野生稻子长于沼泽，最适合栽种在死水之中。新石器时代以来，稻子就在长江流域种植，甚至在公元前5000年就开始种植了。当南方人口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时，稻子便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因为稻米几乎是最理想的食物，所以其产量与日俱增。稻米食之可口，极易消化，如与豆类同食，营养则更为丰富。脱壳后，它还适于储藏。烹饪稻米简易经济，在所有谷类中，只有稻米煮粥简单，且不易糊。但或许最重要的它被人们广为种植的原因，是在所有农作物中只有稻米每单位土地所产的热量最高：在最适宜的气候中，一块地可种两季至三季，还可与其它作物轮种。

中国南方的气候和雨量最适宜栽种水稻，但是大部分地区或过于崎岖不平，或过于潮湿泥泞，无法直接耕种。在宋朝，因为发现和优选了新稻种，例如来自东南

下图　脚踏水车效率很高，可将水从水渠抽到插好秧的稻田里。宋朝政府为推广农业新技术，在12世纪时派人绘制了一套12幅图画，解释了种稻的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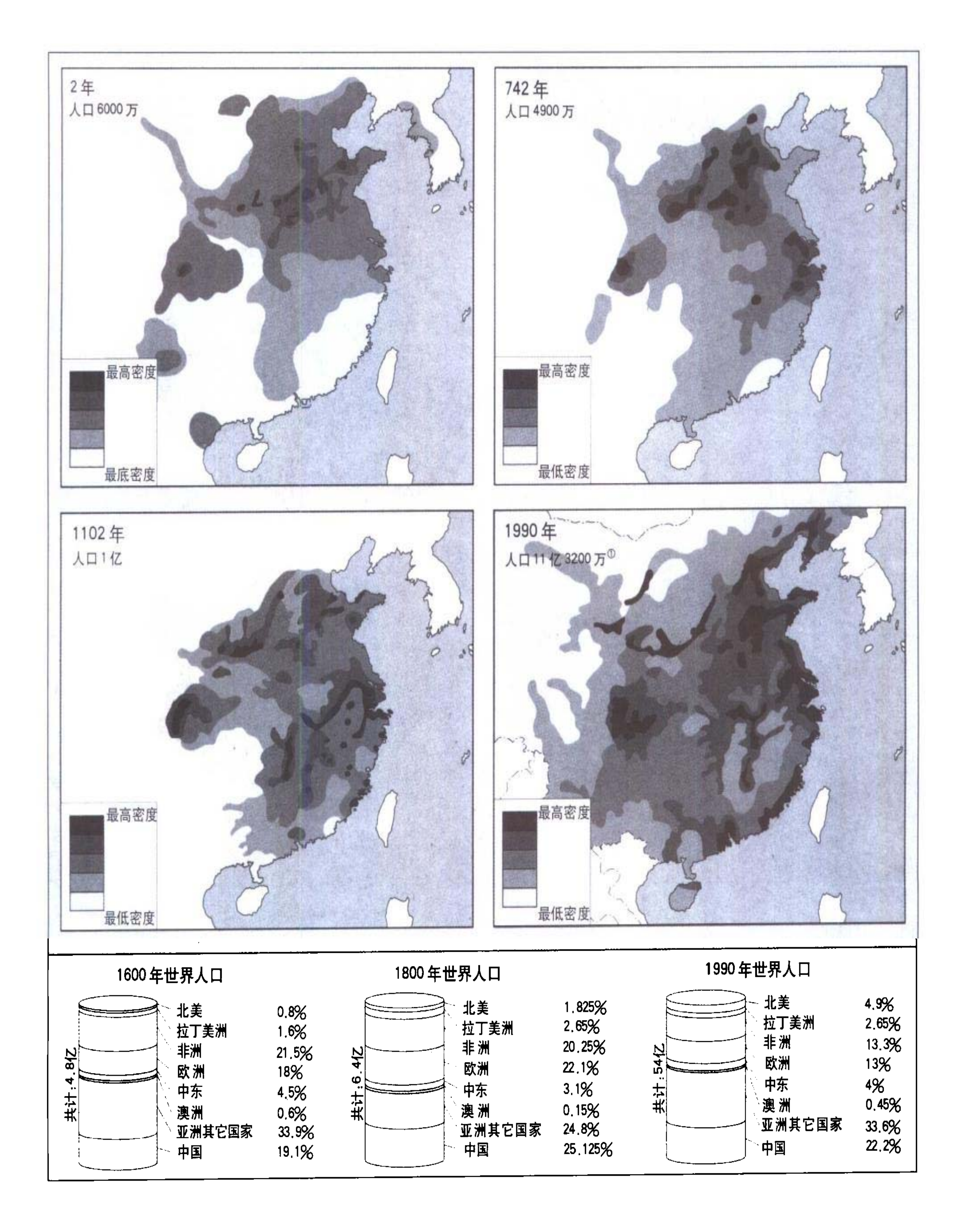




亚的早熟稻和抗旱稻，以前不宜种稻的地区现在也可以种植了。像筑堤、抽水等新技术有助于改良环境，使人们可以在湖边、沼泽、海边造田，并在山坡开垦梯田。另外宋朝政府还通过刺激性税法鼓励开荒。如在福建南部，一直到晚唐时，不能有效地开垦沿海平原，因为土地过于潮湿泥泞。然而自从晚唐以来，农民们着手改良环境，修建排水渠、防护堤和水库。到13世纪，山坡也被开垦成了由灌渠浇灌的梯田，梯田里可以栽种稻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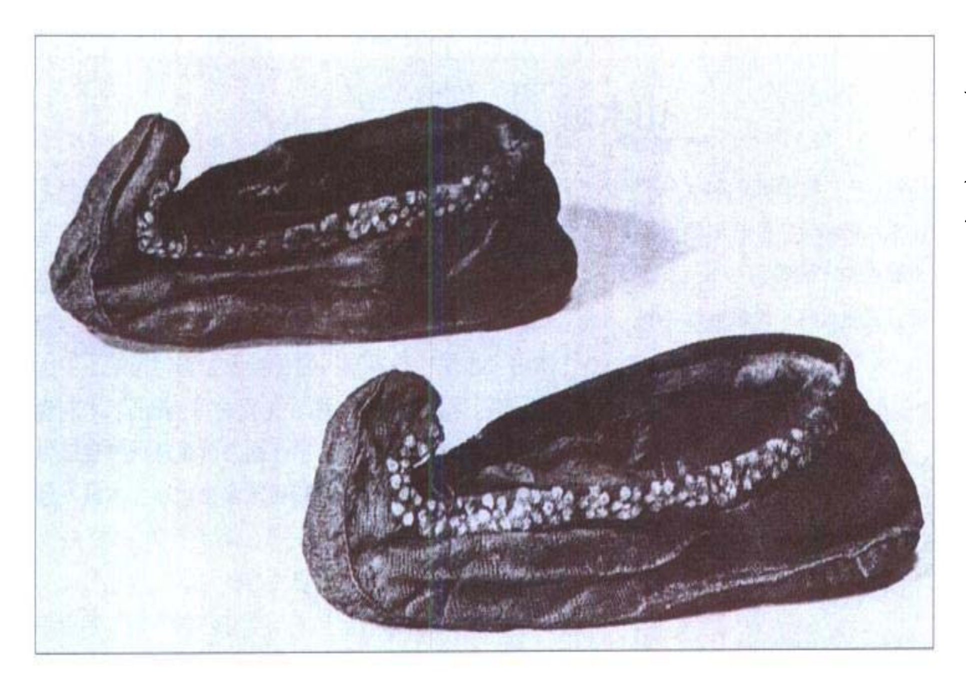
稻子种植的普及，不仅影响了中国的食物供应，也改变了劳动的节奏。在平整了田畴并调整了灌渠之后，种水稻仍旧很费时费力。种稻必须犁田耙田，此类工作多数是由水牛提供畜力。如果连年不断地种植，则要在地里施沤制的粪便并杂以堆肥，以保持土地的肥力。在秧田里育秧一个月后，所有的人都到秧田拔秧，然后插到大田里。一排排插秧的人脚踏泥水，弯着腰向后移动。此后的工序是锄草，使田里有足够的水，最后是将田里的水排干，收获稻谷。

上图　为了种植双季稻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量，一般先在秧田里育秧，然后再将秧插在稻田里，这个工作既脏且累。以上和左页所示的插图选自十三四世纪出版的一套多卷本图画。



人口密度的变化状况。由于大量移民和外来文化传入，数世纪以来中国的定居模式发生了变化。从公元2世纪到742年，人口最密集的地区是黄河流域，但到宋朝，人口布局已与近代非常相似，大量人口定居在长江流域和更南部地区。即使国内存在大规模的人口迁徙时，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仍很高。如果有数据供参考，我们会发现，在110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可能比近代还要高。

① 此图表似未把中国台湾省的人口统计在内。——编者注



缠足妇人的小鞋，出土于一个宗室成员的年轻妻子黄氏之墓。墓内共有数双小鞋，各为5至5.5英寸长。墓葬位于福建省福州市。

在她伸过床帐的手腕上号脉诊断。

何谓美女、何谓举止得体等观念的变化，与宋朝时广为流行的缠足现象有密切关系。缠足始于10世纪或11世纪时的舞伎，然后为上流社会的家庭所接受。到南宋时，母亲们不顾五六岁的女儿们的痛苦，将她们的脚缠得很紧，使之无法正常发育。人们认为，纤纤小脚使人走起路来更袅娜娉婷，增加了女性美。

儒学的发展也限制了妇女的活动范围。所有新儒学大师都是道学家，坚信社会和谐有赖于个人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举止。当论及家庭伦理时，他们强调男女的需要必须服从家族的利益。就女子而言，这意味着服从丈夫和儿子家的利益。女子不应希望支配自己的财产，不应嫉妒自己的丈夫纳妾，不应对妾之子女怀有偏见，在丈夫死后应留在夫家侍奉公婆，照料子女。粗通文墨是件好事，但女子不应沉迷于诸如写诗作赋之类无聊的消遣。儒生们很赞成社会上日益加强的限制妇女的趋势，大力强调男女有别，鼓励在家内将男女不同的活动范围清楚地一分为二。他们用最清晰明了的言语重申寡妇再嫁为失节，程颐甚至认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在11、12、13世纪，中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国家。在11世纪，欧洲当然已经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阴影，但是其经济复兴远远无法同中国相比。在13世纪末，当马可·波罗游经亚洲时，就农业生产率、手工业技术、商业组织的复杂性、城市化程度或生活水平而言，马可·波罗的故乡威尼斯和他经过的任何欧亚国家都无法同中国相比。但与此后欧洲发生的事情不同，中国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崛起，并未引起政治和思想上的巨变。中国的城市并非标榜个人自由之地。它们不是由商贾主宰、同盘据农村的地主相抗衡的根据地。中国商人的势力虽深入农村，可不论城市还是农村，都处于政府官吏的政治势力之下。

亚洲其它国家的城市可能与中国的城市十分类似，但没有哪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可与宋朝及其以后的士大夫官吏阶层相匹敌。这一阶层的重要特征，特别是其儒学思想和忠于朝廷的观念，产生于汉朝以至于更早的朝代，但在宋朝，所有这些重要特征都得到复兴和强化。与其它绝大部分前现代社会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华帝国后期的统治阶级既非武将，也非世袭贵族或僧侣。统治阶级的位置取决于其为国尽忠的理想及其成员们貌似公正的加官晋爵之途。

山水画

中国画分为两大类：壁画和绘于可携带的纸和帛上的画。发现于墓墙和硕果仅存的庙宇中的壁画，使我们得以想见昔日的宫廷和庙宇是何等的金碧辉煌，但遗留至今的纸画和帛画数量远胜于前者。这些可以移动的画，包括悬挂于墙壁上的立轴，置于案头慢慢展开的横幅，可用于扇面或准备汇集成册的圆形或方形的小画。不论形式如何，画画是用写字的毛笔和墨汁来完成的，虽不总是但也经常用毛笔敷上水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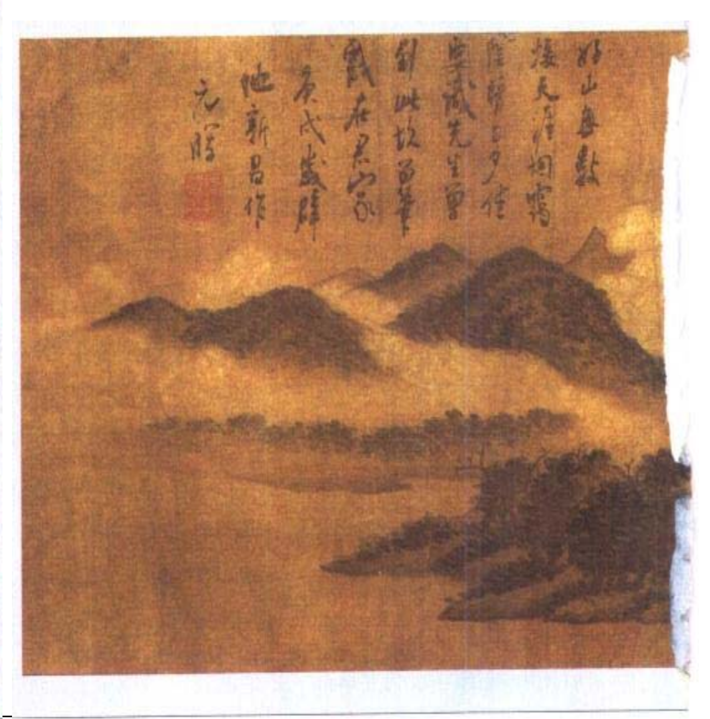
下图　就尺寸和题材而言，范宽所绘山溪旅人图可谓不朽之作。



本书中再现了很多幅人物画，因为它们描绘了中国的社会风情。但是据中国艺术评论家之见，国画艺术的瑰宝不是人物画，而是山水画。早在西方画家意识到自然风光不仅是种陪衬的数世纪之前，中国画家已将山水画发展成一门伟大的艺术。人们早已将崇山峻岭视为圣地，视为邻近天宫的仙人居住之所。对自然界的哲学兴趣也可能有助于山水画的兴起，如道家强调人类在广阔无垠的宇宙中的渺小，新儒家热衷于研究所有现象的模式或理论，包括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

这里图示三幅宋代山水名画。最早的一幅描绘巍巍高山，这是范宽（活跃于990年－1020年）所作的一幅近七尺长的挂轴。前景高及双目，笔触明快，不拖泥带水。耸立的大石、健壮的老树、山路上的骡队，以及峭壁丛林中的庙宇都栩栩如生。前景与作为背景处理的巍巍主峰之间有细微的差别。背景部分高踞前景之上，两者融为一体。画面上也有人物，但显而易见，他们被宏大而神秘的景物所吞没。

除了他所热爱的北方故乡的群山之外，我们对范宽一无所知。在北宋后期，著名文士如米芾（1051年－1107年）以书法和绘画两方面的成就著称。米芾与其子米友仁



(1086—1165年)[①]官运亨通，与其他名士过从甚密，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欣赏彼此的艺术作品。米氏父子发展了独具一格的运笔和构图风格，他们大量运用水墨，层层上色，在重重山峦之间添上雾霭以增加画面的层次感。

我们可以将这两幅北宋作品，同一幅篇幅小，反映身边景物的南宋绘画加以比较。由于北宋的头面士大夫着意于"指点江山"，力图解决国家与社会组织这类有关宏旨的要事，北宋画家也就经常描绘气势宏大的场景。在南宋，儒生们则主张从身边事物着手，忙于一些容易使人获得成功的事情。如自我完善或改革家庭及村庄等小单位。南宋画家更喜爱描绘小的、自己熟悉的景物，以表明他们在思索身边之物。宫廷画院的画师们也不例外，当时很多最负盛名的画家在宫廷作画。宫廷画师夏圭所绘的这幅扇面，使人回想起当时流行的"一角"形式。欣赏者的目光并非凝聚在前景上，而是为空旷的、虚幻的背景所吸引。这类小幅作品一般收在画册中，配上诗或两句类似诗的对联，由此，诗人和画家们在表现形式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将景物，季节和人类活动同等看待。



上图中夏圭(活跃于1180年—1224年)的签名藏在这幅人们熟悉的扇面帛画的右下角。

下图　这幅帛画轴为米友仁于1130年所作。画面上是典型的南方山水，大河的后面是连绵不断、起伏不平的山丘。



① 米友仁的生卒年应为1074—1153年。——译者注

第七章 外族统治：辽、金和元朝（907年－1368年）①

1276年，蒙古人迫使南宋王朝投降，并将全中国并入自己的帝国。在此前后的4个世纪之中，中国本土逐渐地落入亚洲内陆部落民族之手。辽（907年－1125年）、金（1125年－1234年）和元（1215年/1276年－1368年）②这三个由征服者建立的朝代，都继承了前者的业绩，并逐步加强了对中国的统治。契丹人的辽国并不是仅仅掠夺物质财富（就像唐代末年的回纥那样），他们也控制着中国本土的北部边境地区，那里的居民主要为汉人。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在打败辽之后，占领了整个中国北方。蒙古人的元朝打败了金，为征服全中国建立了必要的机构。当外族征服者学会了越来越有效地控制和剥削中国之后，汉人在其统治之下就越来越难生存。在蒙古人征服了宋朝之后，社会各个阶层都很难有机会在朝中任职、抵抗或逃亡。但是中国文明不仅没有灭绝，反而颇有创造性地应付了外族挑战，发展了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应战模式，中国的文化遗产反而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干旷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和亚洲的内陆国家

自秦汉以来，匈奴就成为汉族帝国的主要威胁，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国本土和亚洲内陆之间关系的基本格局。虽然面积同中国本土一样大，但亚洲内陆人烟极为稀少，因为那里不适于种植农作物。在宋朝初年，中国本土的人口大约为8000万，但只有500万人居住在从吐蕃到今天的蒙古和东北这片广阔的亚洲内陆上。亚洲内陆的部落如果不是与中国的定居农业社会有所接触，能够在那里生存下来的人口会更少。牧民们用牲畜和畜产品同中国的汉人交换谷物、纺织品、陶器和金属用具，如果遇到干旱或疫病使他们入不敷出，或者汉人拒绝接受他们的交换条件，能征善战的游牧民族便袭击汉人，掠夺他们的所需之物。因此牧民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友好，二者并不互相体谅：农民们将游牧部落视为靠劫掠他人为生的暴徒，而游牧部落将汉族农民看成是弱者。

尽管干旷草原上人烟稀少，而且众多民族的部落归属关系变换不定，但部落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却引人注目地稳定。所有男人学习骑射，能征善战，家庭关系为父系社会，依家族安营扎寨。部落之下是家族，骁勇善战者被选为部落首领。劫掠他人被视为常事，家族和部落通常彼此为敌，互相抢掠牛马和女人，部落之间仇杀不绝，俘虏成为胜利一方家族的奴隶或农奴。彼此不交战的部落便结为同盟。有时一个部落首领可以靠军事征服和结盟，建立庞大的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靠武士对酋长、酋长对首领、首领对盟主的个人效忠来维系。但是首领和盟主并不是独裁者，重要的决策一般由军事首领们参加的议事会来制定。打败或收服了其他部落的首领，能够集合庞大的军队，并靠分发战利品保证军队听命于他。但扩张不可能不停，后裔或继位者之间的争权夺利必定会使部落联盟在一两代之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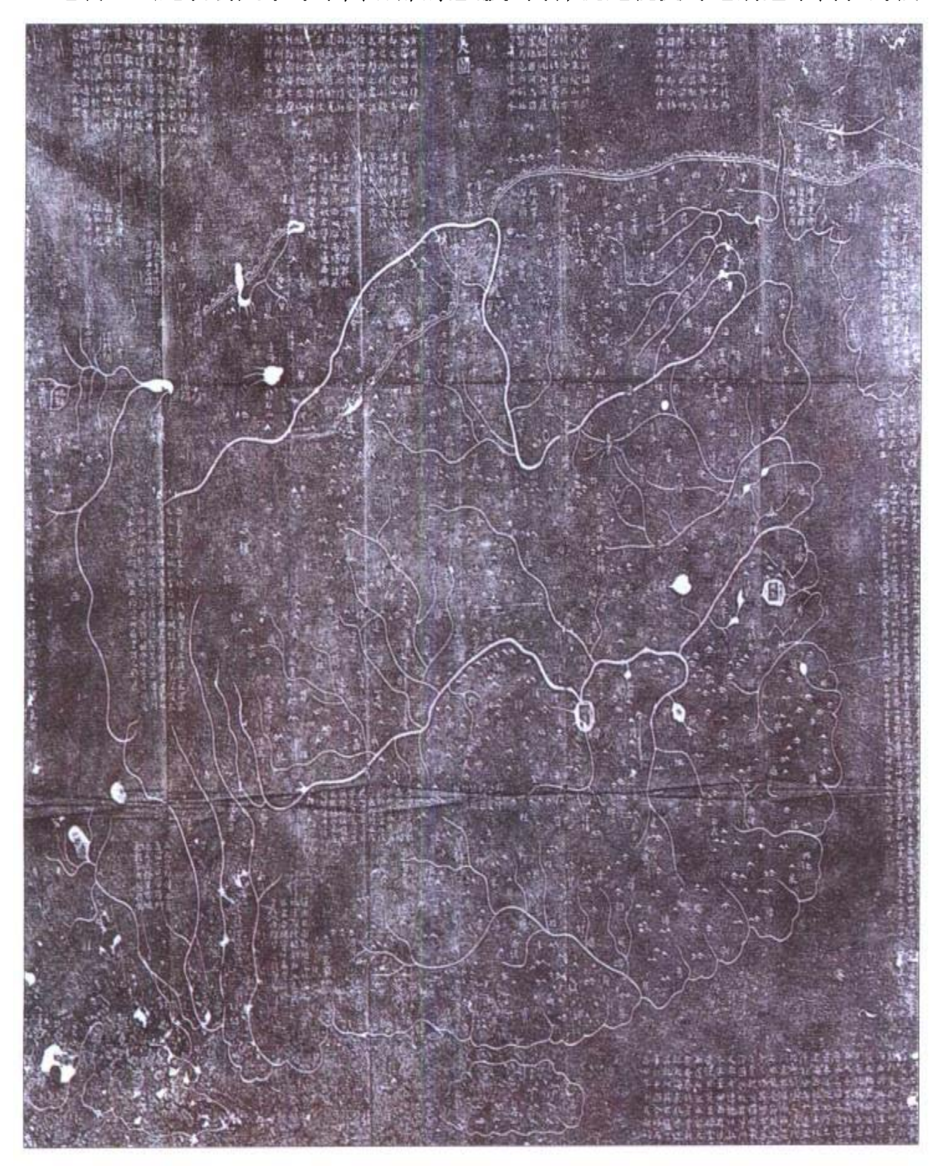
① 耶律阿保机建辽称帝是在916年。——译者注

② 如前所述，辽建国于916年；金建国于1115年；蒙古建国于1206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是在1271年，元灭宋统一中国是在1276年。——译者注

就土崩瓦解。

除了生活在干旷草原上的纯游牧民族和经常受到前者攻击的汉族农民外，在二者之间还有一片边界不定的辽阔地带，半农半牧的各族人民杂居在那儿。自东汉以来，这里就存在汉人和胡人杂居一处的广阔地域：有些胡人转向务农为生，其他人则仍放牧牛羊或在军中服役；有些胡人仍生活在部落之中，听命于部落酋长，而其他人则成为中国汉族朝廷的臣民，甚至于被其同化。生活在边塞地带的汉人一般靠为胡人效力为生。他们可能务农，可能经商，可能从事手工业，也可能是政府官吏，其中一些人与异族通婚，被胡人同化。

在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外族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建立政权，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连年内战、四分五裂。契丹人、女真人和蒙古人建立的国家与此不同，他们击败了强大的宋朝，尽管宋朝也主战，而且在防卫上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边塞地区的活力使这些外族朝廷在中国历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蒙古人的前身契丹族首开先河。他们原本在满洲从事农业、畜牧业或狩猎、向唐朝纳贡，也遣使臣到长安，但只要有机会，他们就袭击劫掠。当唐朝分裂、中国北部不堪一击时，耶律部的阿保机同八至十个契丹部族组成部落联盟，控制了干旷草原。他宣布建立辽朝、以此表明其争夺中国北部的意愿。阿保机无视契丹定期选举酋长的惯



这是1137年刻于石头上的《华夷图》的拓本，约2.5平方英尺。此图画出了中国的重要河流与城市，还有长城，说明了居住在边地各族的来龙去脉，其中包括契丹、党项和许多较小的部落和城邦国家。



亚洲内陆的物质文明常常同中国的迥然相异。在亚洲内陆的艺术品中，金属制品至关重要，这可能是因为金银等贵金属容易得到。这件8英寸高的契丹镀金银冠上雕刻的龙显示出中国的影响，但冠的样式却与中国影响无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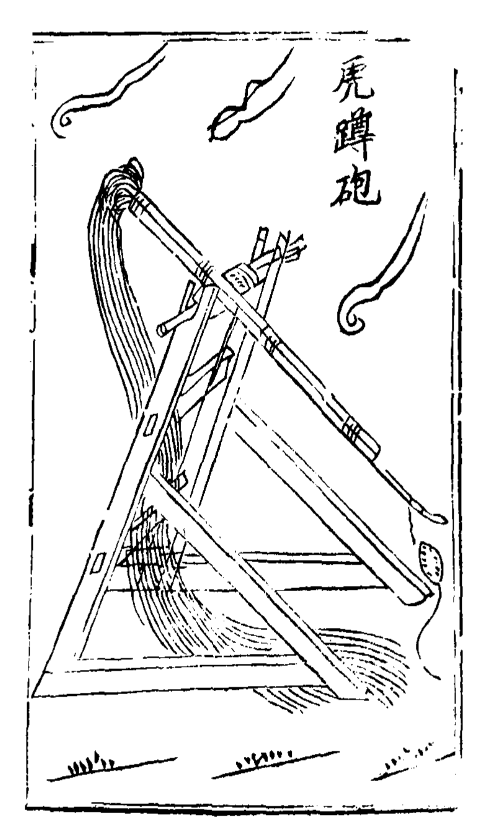
例，统治部落联盟直到926年他死去。不仅如此，他依据中国模式开创了子承父位的制度，以确保其儿子成为酋长。他所确立的王族只同萧氏通婚，耶律氏和萧氏两族主宰着辽朝的政府事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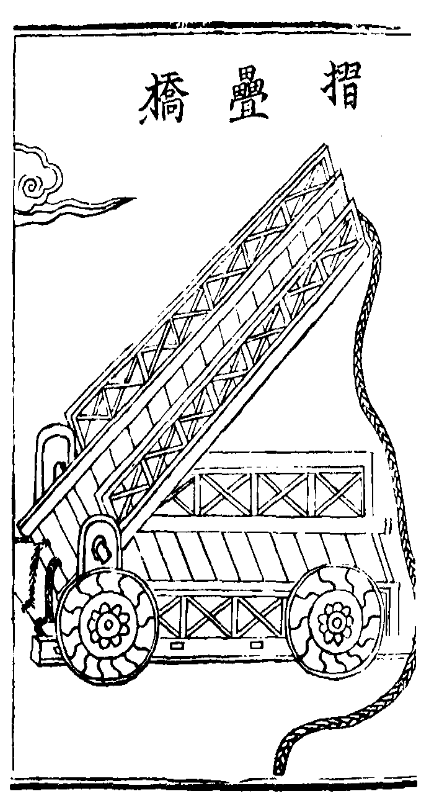
在其极盛时期，契丹人口达75万，并统治着两三百万汉人。其国家一分为二，有汉人区域和契丹人区域。南部区域包括中国北方的16个州（而宋朝治下有300个州），名义上由沿袭唐朝的文职官僚政府所掌管，但各县有时甚至是州都由契丹皇族和上层官僚所控制，他们在其辖区有绝对的统辖权，并免纳租税。这一区域的主要都市是南京即今天的北京，而此前的南京不过是一个边陲要塞。在辽阔而人烟稀少的北部区域，契丹政府机构建立起来了，但北区的朝廷是个流动的组织，皇帝及其重臣随季节迁移，从一地迁往另一地。契丹还创造了自己的书写形式，契丹语的文献因此得到保存。按宋朝的标准，尽管辽所统治的人口为数不多，但其军队的战斗力却极为惊人，宋朝因此认为贿买他们远比打败他们容易。辽国也使其它邻国闻风丧胆，有时高丽和位于现甘肃省境内的党项人的西夏国也有这种感觉。也许是由于辽在北部区域保持了契丹人的一切制度和习俗，所以它才卓有成效地抵制了汉化。契丹贵族接受二元文化，既按契丹方式行事，也熟悉汉族风俗，但众多的契丹百姓却恪守契丹传统。

未等中原军队摧毁契丹人建立的辽，女真族所建立的另一北方部落联盟便将辽灭亡了。女真族崛起于满洲东部的群山之中，位于契丹人的东方。在12世纪初，完颜部的阿骨打建立了女真族部落联盟，自立为金朝，并对辽发起攻击。为了灭辽，它很快同宋朝结为盟友。阿骨打死于1123年，其继承人在1125年击败辽，此后便转而攻击宋朝。

女真族之所以能够攻破宋朝防卫森严的城池，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学会运用汉人的攻城术。为了攻克中型城市太原，他们用30架弹射器连珠炮般地发射石块，他们还造了50辆用生牛皮和铁皮覆盖的车，将军队运到壕沟。围攻开封更是一场攻坚战。守开封的军队有48000人，装备着强弓硬弩和喷火器。女真人运用了攻城器具，包括可移动的、高过城墙的楼车，楼车用于向城中发射燃烧弹。女真人大获全胜，开封陷落。女真人俘获了宋朝皇室，用以勒索赎金。未被俘虏的朝中官吏和军队则渡过长江南逃。

据上所述，在不足四分之一的世纪之中，女真族由据守亚洲内陆东端的部落联盟一跃而成为中国北方的统治者。这里人烟稠密，有四千多万人口，辽、宋两国的都城也都在这儿。女真人突飞猛进地强大起来，他们最初沿袭了契丹的二元化政府，任用前辽国官吏，包括契丹人和汉人。1153年，金把都城从满洲中部迁至北京，1161年又迁至开封。在此过程中，它循序渐进地采纳了中原的政治体制，任用了更多的汉族官吏。同以前的辽朝统治者（以及更早的北朝统治者）相似，金朝皇帝发现，中原政治制度是制约女真贵族势力的有力工具，世袭君主制和忠于皇帝的官僚加强了君主的权威。但是女真皇帝并没有完全照搬唐宋体制，





攻城战需要先进的军事技术，左图所示的云梯和弹射器引自北宋出版的一本手册《武经总要》，它成书于1040年。契丹和女真很快就掌握了这些技术，将攻城战术用于他们所擅长的骑兵作战之中。

尤其是没有遵循中原文化对文官礼遇有加的传统。金朝皇帝在朝中当众鞭打高官，这一野蛮行为违背了孔夫子“刑不上大夫”的名言。宋朝从未实行这种令人屈辱的刑罚，此前的朝代也仅仅是偶尔为之。

金朝使大部分女真人定居中国北方，以利于控制汉人。女真人不像契丹人，由于同汉人朝夕相处，他们很快就采纳了中国习俗，包括语言、服饰和仪典。反对汉化的女真将领在1161年谋杀了金朝皇帝，继位的君主力图弘扬女真的文化传统。他鼓励使用女真文字书写，着人将儒学经典译成女真语，命令女真人进入专为他们设立的学校学习，为女真族士子设立科举取士制度，以考核他们的女真文，并且威胁恐吓接受汉族习俗的女真人。但是汉化的趋势仍旧没有被阻止，后来皇帝也不得不改变策略。1191年，皇帝禁止将女真族称为“边塞”民族，这表明他不愿人们将其视为化外之民。在金朝末期，绝大多数女真人说汉话，着汉服，用汉人姓氏，同当地人通婚。一个世纪之后，除了在女真人的故乡满洲，中国本土内几乎无人自称为女真族了。

成吉思汗和蒙古人

契丹和女真均未完全控制干旷的蒙古草原，但有时他们能迫使当地众多的突厥和说蒙语的部落承认他们的霸主地位。12世纪末，由于年平均气温下降，没有足够的牧场放牧牲畜，这一地区面临生存危机。在此情况下，成吉思汗（1162年－1227年）率领蒙古人来到富饶的农业地区，从而使其民族转危为安。

成吉思汗是个才华横溢的军事天才。当他是个少年时，其做部落酋长的父亲被人谋杀。为报父仇，他开始了军事首领的生涯。他先后征服了塔塔儿、克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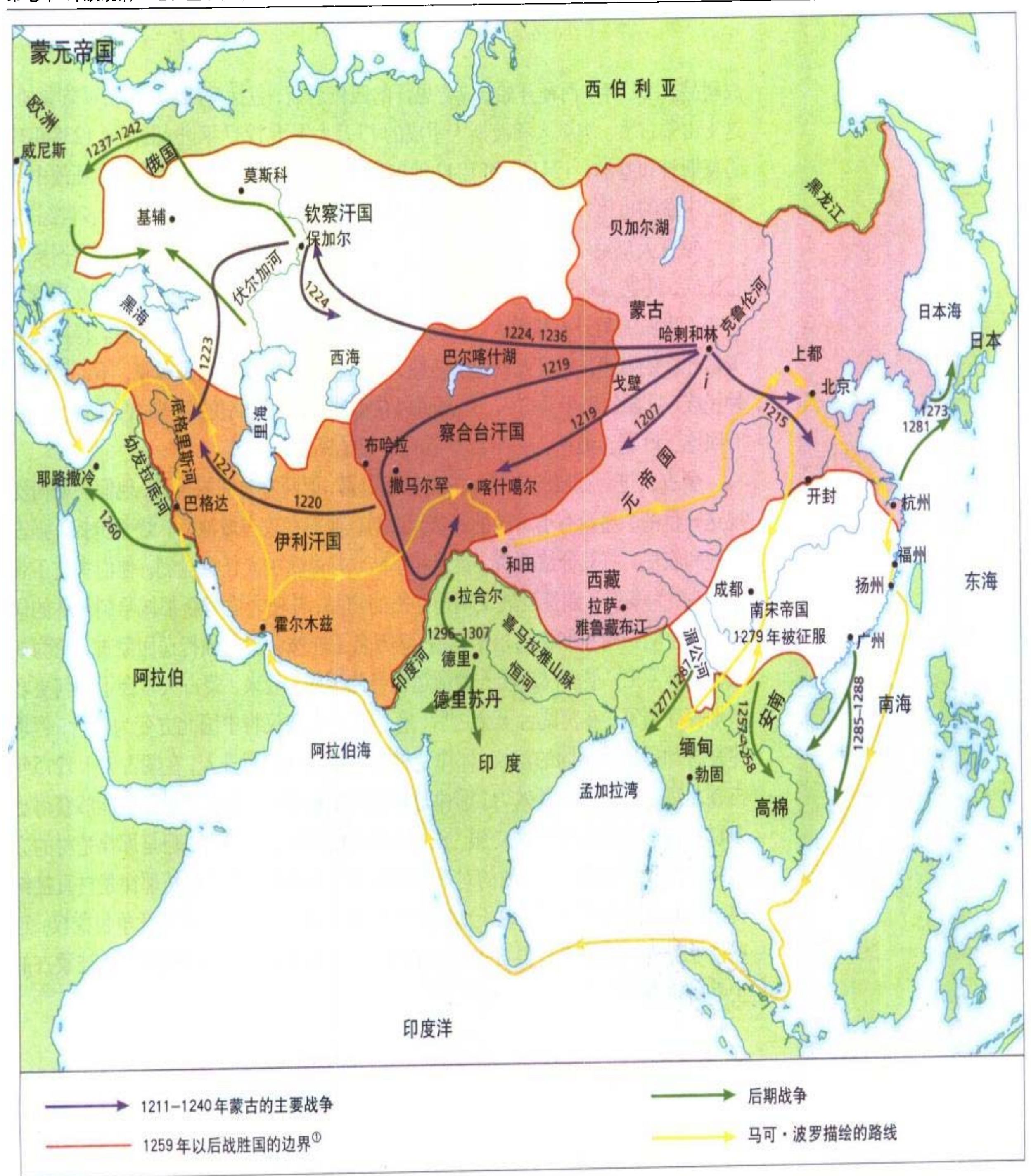
乃蛮、蔑里乞以及其它蒙古和突厥部落，建立起一支忠于他的军队。1206年，在蒙古显贵参加的贵族会议上，他被推立为大汗。然后他无视传统的部落附属关系，将蒙古社会全盘军事化。他根据十进位的等级制建军，这支军队的每个基层单位有一千名骑兵。忠于成吉思汗的将领们成为新的军事贵族，这些将领可以传位于儿子，但是大汗能够随意剥夺他们的兵权。成吉思汗也创立了一支由万人组成的护卫军，它的成员均为将领们的兄弟子侄，直接听命于大汗。为减少内部混乱，他颁布了简单明了但却残酷异常的律令，如抢劫和通奸者要处以极刑。他虽然不识字，但却明白书面文献的用途，命令用回纥文字撰写蒙语。

和对中国一样，成吉思汗的征服同样影响了西亚。这幅波斯人所绘的插图，是表现成吉思汗追杀敌人的。插图选自一部由波斯人拉施都丁(1247年－1318年)撰写的手稿。他是一位波斯官吏，曾任职于伊朗的蒙古伊儿汗国。

完成了国家建设之后，成吉思汗开始了世界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行动。他从邻国着手，一般先派使臣前去劝降，威胁要灭掉这个国家。不战而降的国家被视为盟友，仍保留主权，而抵抗的国家则面临彻底被消灭的命运。城市居民尤其招致他的仇视，往往遭到集体屠杀，或在下次战斗中被用作掩护。蒙古大军在1212年－1213年间首次横扫中国北方平原，将九十多座城池夷为废墟。1215年，他们洗劫了女真人的中都北京后，将它付之一炬，大火燃烧了一个多月。

成吉思汗饱经战火锤炼的队伍极能吃苦耐劳，行进极为迅速。1219年，他率





大军20万进入中亚，次年他们洗劫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于1227年去世之前，成吉思汗征服了蒙古和满洲，使高丽称臣，将女真赶到黄河以南，击溃了中国西北部的党项政权，蹂躏了中亚，劫掠了乌克兰的基辅大公国。他统治着东至太平洋、西到里海的广阔领土。

由于蒙古人的传统是首领由选举产生而非世袭，所以成吉思汗之死便造成了危机。最后，帝国被一分为四，分别由其后裔统治。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统治了蒙古。1234年，窝阔台灭金，将中国北方收入版图。1236年，他击败宋军，占领了四川58个行政区中的54个，并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成都。他下令屠杀了包括成都居民在内的一百多万人。幸存的居民也常常被掠，同粮食和牲畜一道成为

蒙古人的征服加强了欧亚大陆的联系。这一方面使致命的瘟疫广为流行，但同时也传播了科学技术知识。如像马可·波罗式的旅行家，向欧洲报道了中国城市的富有和光彩夺目以及中国发明的火药和印刷术。

① 此图为原作者所画1259年的元帝国疆域，它只是一幅大致的边界图，准确详备的元朝疆域图仍参见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的《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55-56页“金、南宋时期全图（二）”、第57-58页“元时期全图（一）”、第59-60页“元时期全图（二）”及有关的文字说明。另外，此图的山川、湖泊、海洋及部分地名采用了现代的称谓。——编者注

战利品。1237年，西征开始。成吉思汗的四位后裔，包括窝阔台，均派军队参加。这支由蒙古人、突厥人和波斯人组成的15万大军于1237年进入欧洲，1238年攻陷莫斯科和基辅，1241年和1242年攻入波兰和匈牙利。[1]虽然他们在征战中劫掠了中欧的市镇，但蒙古人很快就撤退到莫斯科，统治莫斯科达一个多世纪。

蒙古人口绝不超过150万，他们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之于他们愿意网罗其它民族，使之为其军队和政府效力。在对女真人作战时，他们征用了对女真统治者并不忠诚的契丹人和汉人；在汉族制造弹射器的高手的帮助下，他们得以狂轰围墙环绕的城市；靠汉人制造的帆船，他们得以同宋朝的水师较量。不论属于何种民族，只要效忠于蒙古人，就都可以获得奖赏、升居高位。在蒙古人的朝廷中，有回纥、吐蕃、波斯，甚至俄罗斯的高官显贵。

蒙古人进行征服的主要目的是掠夺财富，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对如何实现这一目的，逐渐有了不同的想法。最初，他们在攻占城池后，烧杀抢掠，强占土地和农民，将其分给部将、贵族和军队，并由新主人任意盘剥。他们将技工带回蒙古，为蒙古人制造发展文明所必需的物品，并使之成为新都城哈剌和林的居民。在攻陷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之后，3万名工匠被蒙古人强行送回蒙古，沦为奴隶，罚作苦工，很多汉族匠人的命运也与此相同。后来，蒙古人学会了如何更巧妙地掠夺财富。在窝阔台灭金之后，有些蒙古人建议将中国北方变为牧场，但耶律楚材却提出了不同的建议。耶律楚材是一位汉化的契丹人，在蒙古人于1215年占领北京之后开始为其效力。耶律楚材使窝阔台相信，靠对农民征税能够获得更多财富，岁入将是50万两白银、8万匹丝帛和两万多吨谷物。但是耶律楚材的方案却未能长久实施，不久他的对手们就说动了窝阔台，使之相信耶律楚材直接纳税的计划并非生财之道，说不如叫中亚穆斯林商人们投标，互相竞争包税权。这些中亚包税人很快就获得贪得无厌的骂名，不仅受被压迫的中国人，也被蒙古的士兵所仇视。

蒙古人灭宋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1260年-1294年在位）登基之后，灭宋大计得到全力实施。在成为大汗之前，忽必烈曾统辖河北自己的封地，对中国生活方式略知一二。他任用汉人、回纥人和中亚人为谋士，甚至会说一点汉话。1264年，他将国都从蒙古的哈剌和林迁至北京，定名为大都。1271年，他又为其治下的王朝起了一个中国名字——元，并举行中国的宫廷仪典。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地纵横交错的河流沟渠，有效地挡住了来自干旷草原的蛮族，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因此从未落在蛮族手中。但在一位宋朝降将的建议下，蒙古人开始建立水师。1268年，他们开始围攻襄阳。襄阳位于湖北省汉水之上，宋元双方都认为它是控制长江流域的要冲，双方都决心取胜。围城长达5年之久。双方都有数千船只，数万军队参战。在水战和攻城战中，蒙古人用了汉、高丽、女真、回纥和波斯等民族的专门人才。穆斯林匠人设计了一次可发射百磅石块的大炮。南宋军队最初储备了足够的食物，但后来为了得到食盐和其它必需品的供应，不得不渡水越过封锁线，因此水上交战不断。

① 此次蒙古人西征实始于窝阔台汗七年（1235年），至十二年（1240年）占领基辅等地。——译者注

宋朝不乏决心抗蒙的文官武将，但他们不能齐心协力。当时的宋朝皇帝是个孩子，权臣高官们彼此争斗。1275年，在蒙古军队打过长江之后，谢太后发布诏书，呼吁民众起来抵抗外族，两个月内就有20万人应征入伍。但这支兵力无法与蒙古人令人丧胆的战术相抗衡，在进军杭州的途中，蒙古人下令屠城。为了使京城中的百姓不致遭受屠戮的命运，谢太后投降了蒙古人。三年之后，也就是1279年，在广东沿海的海战中，蒙古人打败了忠于宋朝的残部，宋朝剩余的宗室人员投水而死。

当蒙古人灭宋时，泛亚的蒙古帝国已不复存在，亚洲大部由蒙古皇族后裔所统治，但他们之间也彼此仇视。忽必烈就经常同中亚汗国交战。中亚汗国后来由忽必烈的堂兄弟海都治理，海都同地处南俄罗斯的钦察汗国也几乎不相往来。在其它地区，蒙古人一般同当地的突厥人融合，并像他们那样皈依伊斯兰教。因此，自忽必烈时代起，中国本土就同蒙古、满洲、吐蕃交好，但同波斯、伊拉克或者俄国的关系却并不太好。

像契丹人一样，蒙古人不愿被同化。尽管蒙古统治者养成了对中国物质文明的偏好，但他们还是有意识地拒绝接受很多中国的社会政治习俗。君主们用蒙古语处理政事，回到蒙古度夏。忽必烈反对蒙古人同汉人通婚，他宫中的宫娥妃嫔全是蒙古人。有些蒙古王公宁愿住在宫殿外面搭起的帐篷中，也不愿住进北京城的宏伟宫殿里。蒙古人的君主也常常产生于血腥的争斗之中。正如中国人关于元朝的史书所载，忽必烈以后的皇位继承是一段令人作呕的历史，通篇是暗杀、宫廷政变、拥立年轻软弱无能者为帝、兄弟之间的自相残杀和贵族干政。

辽、金、元统治下的中国社会生活

在蒙古人统治之下，无人强迫汉人接受征服者的习俗。正像在北朝时，中国的文化生活仍旧延续着。汉族士大夫继续读书作文，汉族老百姓仍然以自己的方式拜自己喜欢的神明。虽然辽、金和元朝初期的中国传统的文化生活只局限于地方社会，但这并没有使之具有非汉族化的色彩。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外族统治之下，汉族老百姓的生活与以前在汉族皇帝统治时一般无二：很多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奴隶或农奴；有时他们被迫远离故土。尤其是在蒙古人统治下，租税高得使许多人倾家荡产。中国北方的经济因此而凋蔽，数个世纪之后才得以恢复。除此之外，在法律上被视为下等阶层是令人屈辱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生活了20年（1275年－1295年），他在这里发现了强烈的民族仇恨："所有汉人都讨厌大汗的统治，因为大汗使鞑靼（即蒙古人），乃至撒拉逊人（即穆斯林）高居于汉人之上，视汉人为奴隶，令汉人无法忍受。[①]"

由于辽、金、元三朝的征服者均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加岁人，因此他们均未有意破坏经济的发展。三朝均鼓励对外贸易，在官方认可的领域内，金与南宋之间维持了广泛的贸易往还。蒙古人也鼓励在整个欧亚大陆进行贸易。女真人允许契丹和宋朝的货币流通，并发行了自己的包括纸币在内的货币。但1190年之后，纸币大量贬值。蒙古人同样设法维持现存的纸币体系，甚至同意把宋朝纸币兑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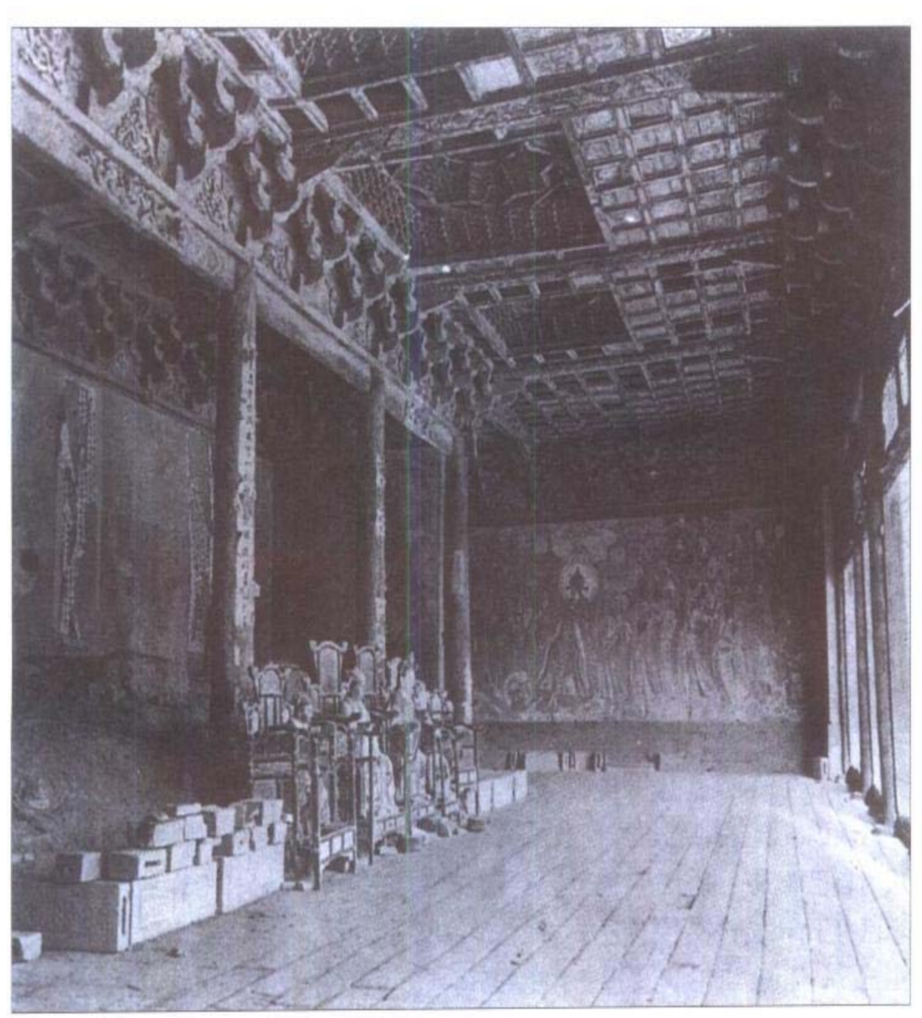


1280年，忽必烈让中国宫廷画家刘贯道绘制了一幅游猎图，图中的他骑在马上。这是一幅帛画轴的细部，画上忽必烈外穿蒙古皮裘，内着色彩鲜艳的中国锦缎。

元朝纸币。但是他们并不比女真人高明，到14世纪时，通货膨胀已无法控制。不过，蒙古人对中国的统一，促进了中国南北方间的贸易。不仅如此，他们还修复了自北宋以来已无法通航的大运河北段，并将其一直延伸到建于北京的大都。

这三个朝代均不想建立一个像宋朝那样开放、富于流动性的社会，而宁愿让人民生活在一个按职业和民族划分的等级社会之中。为维护征服者的特权，朝廷明文规定了民族差异。有时统治者最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本民族被中国文化所同化，有时又热衷于防范汉人学习他们的语言，认同他们的文化。不同民族间的通婚虽时有发生，但一般不受鼓励。政府有时鼓励汉人学习征服者的语言（因为这体现征服者的主宰地位），有时却又反对（因为这可能不利于征服者维护其特权）。元朝社会按民族划分为不同的等级：蒙古人位于社会的最上层；其次是原中国境外的各民族（回纥人、突厥人、吐蕃人、党项人、波斯人和中亚人，统称为色目人），他们是蒙古人的盟友；再次是金以前的臣民（汉人、汉化的契丹人和女真人，统称为汉人）；以前宋朝的臣民（称为“南人”）。征税方式、司法程序和任命官职均依据社会的等级制度。例如，北方的汉人按户纳税，这沿袭了金朝的先例，而南方的汉人则遵循宋朝惯例按占有的土地缴纳租税；在审判和定罪时，不同的民族根据自己的司法传统，例如只有汉人因偷窃罪才被处以刺字。

在所有的臣民中，蒙古人最害怕汉人造反，其制造的民族隔阂显而易见基于这一考虑。例如，禁止汉人当众聚会和持有武器。忽必烈甚至不允许汉人接触竹子，因为竹子可用来制造弓箭。当受到蒙古人欺负时，汉人不能还手，否则便会面临严刑峻法；与此相反，杀了汉人的蒙古人只要交纳罚金，便可轻易脱身。或许是因为汉人在数量上大大超过蒙古人，朝廷特别注意不让汉人鱼目混珠，冒充蒙古人，也不许他们取蒙古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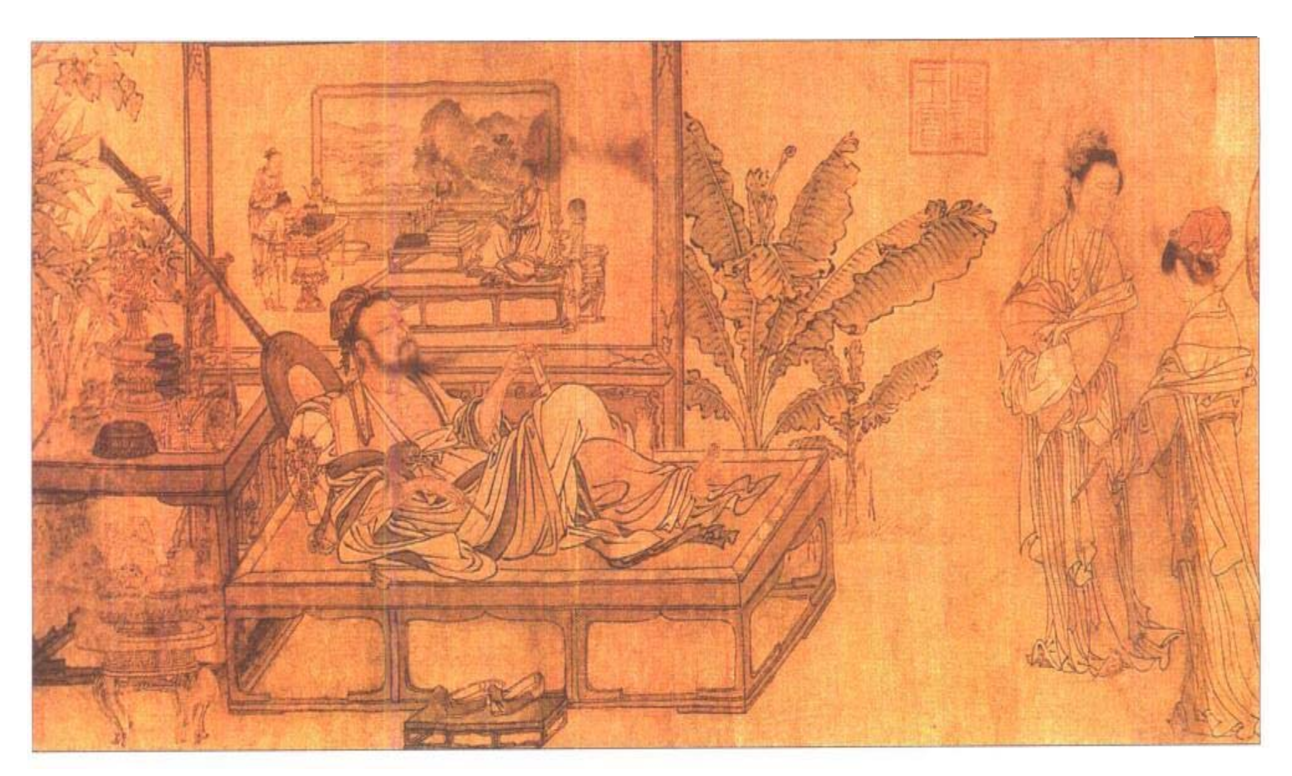
坐落在山西省的永乐宫建于1212年（元朝初年），是保留至今的中国最古老的道教寺庙之一。如图所示，其主殿的墙上装饰着绘画，绘有道教神谱中的神祇。

社会身份代代相袭在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中是正常的。为加强社会的稳定性，外族统治者强化了这一传统，但对汉人来说这却是社会的倒退。蒙古人将这个传统发挥到极致，使人口按职业登记，职业分为普通农民、儒士、医生、卜者、士兵、屯田的农工、工匠、盐工和矿工等。从事专门化职业的人必须按国家需要轮流提供无偿劳役，余下的时间才可工作谋生。森严的劳役制度，使无力完成摊派劳役的人家大量逃亡。

尽管汉人不喜欢异族统治，但所有社会阶层都在卓有创见地设法适应新的生活。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均需要文牍工作，否则中央集权的官僚政府就无法运作。为此，被后者贬为“小吏”的文牍人员同熟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一样重要。不过士大夫们也有机会施展才华，虽然他们要等得久些，而且所得到的职位比希望的要低。元朝时，北方的儒生比南方的更愿意为蒙古人效



这箱陶碗证明，在蒙古人统治之下，海上贸易仍在继续。这箱陶碗来自1976年在朝鲜新安州沿海打捞起的一艘沉船。轮船沉于从宁波开往日本的途中，时为1323年。在船上发现的1.7万多件陶器主要产自浙江、江西和福建的大窑。



上图　在蒙古人统治下，不在朝为官的儒生仍有可能过着安逸的生活，俊男美妇随侍左右，体现文明生活的物品环绕四周。刘贯道（活跃于1279年—1300年）用画中画强调了艺术在这种生活方式中的作用。在他的画中，一位儒生靠在一扇画屏前，画屏上也画着一位儒生坐在书籍古玩旁。

力。他们已经习惯了在非汉族人统治下生活，并认识到如果由汉族儒生出任朝臣，蒙古人的统治会有所改善。而且，他们预言，蒙古人会像女真族那样被逐渐汉化，认为自己能够使中国社会免受蒙古统治者最残酷无情的凌辱。像许衡之类的儒生就献身于向蒙古统治者传授中国政治道德原则的事业。在南方，因为士大夫曾力主抗元，他们没有立刻妥协。不过，当南方文人墨客们认识到蒙古人的统治并非转瞬即逝时，越来越多的人便入朝为官，特别是在政府资助的学校中充任教习，以便学以致用。

在文人看来，异族统治者只有坚持科举取士制度并任用饱学之士担当要职，才能最有效地证明其英明。契丹人仿照唐例，实行小规模的取士制度，女真人先是照此办理，后又大大扩充了这一制度。蒙古人比较谨小慎微，直到1315年才恢复科举制度①，但他们同时又进行名额限制，以首先确保蒙古人和其它非汉族人（例如中亚人）占录取者名额的半数，另外四分之一归以前金朝的臣民，最后的四分之一才属于以前宋朝的臣民（前宋臣民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不仅如此，还有地区名额限制各省的应试人数，以削弱文化发达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影响力。但事实上，只有2%的官吏经科举任用，元朝官吏的大部分还是从小吏中提拔起来的。

无法谋得职位或不愿为蒙古人效力的南方文人，则靠当医生、为人算命、当道士、教学馆或写剧本为生。博学多才又无路可走的文人，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颇有裨益，元代戏曲因此而呈现出勃勃生机。外族统治者对朝政的控制并未削弱文人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汉族老百姓仍旧认为他们是地方上的天然领袖，他们仍活跃在当地自卫组织和宗族组织中，也未忘其文化方面的责任，仍以儒家传统的捍卫者自居。尤其在元朝，他们兴建了很多书院，这些书院成为国家政治范围之外的可选择的文化中心。在书院中，儒生们力图扬文抑武，以维持其对道德和精神独立性的自信。

① 元朝下诏科举取士是在皇庆二年即1313年。——译者注

鬼和打鬼者

中国的宗教想像为各种不同的、好的、坏的神灵鬼怪留下了空间。在令人恐惧的鬼怪中，有复仇的恶鬼，有对没有好好祭拜他们的人残酷无情、敲榨勒索的神灵，有执行神灵之命的恶魔。较为仁慈的神灵如祖先、佛教和道教的神仙，可以保护人们免受恶鬼之害。也有以驱鬼降魔为业的巫师和道士。

毫无疑问，中国有关妖魔鬼怪的传说的确包含着令人恐惧的成分，但应该说幽默滑稽的东西更多。正由于此，关于最著名的打鬼者钟馗的传说才极为流行。据说在杭州，商贾们向顾客赠送钟馗像作为新年礼物。此像一般贴在门上，这在日后成为流行的习俗。

钟馗的传说可追溯到有关唐玄宗的一个故事。玄宗皇帝先遇到一个小鬼，小鬼偷走了他宠妃的绣花香囊和他的玉笛。后来他又遇到了一个大鬼，大鬼前来相助，不仅抓住了小鬼，还挖出他的眼睛，并把他吃掉了。玄宗询问大鬼的来历，大鬼说他叫钟馗，数十年前因没有通过殿试碰死在宫殿的台阶上。为了回报玄宗后来追赠他的荣誉，钟馗发誓灭掉世上所有的恶鬼。

随着岁月的流逝，围绕钟馗的传说又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故事。画中的钟馗有时面目狰狞，特立独行；有时被一些他降服的小鬼所环绕；有时他和妹妹在一起，但他总是黑面长须，相貌丑陋，身着儒生袍，头带儒生帽，足蹬朝靴 。

下图　这幅龚平（1222年—约1304年）所绘的钟馗图的细部，描绘了被钟馗降服的小鬼们抬着他和他的妹妹走在又去打鬼的路上。



民族性、忠和儒家的万物一体说

儒学总是提出普世性的主张：君王是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确实，在文明世界的边缘生活着“蛮夷”，他们不臣服于天子。但这是因为他们尚未接受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不是其种族天生如此。换言之，中国确实优于其邻国，但这是因为汉文化优于其它文化，而不是作为一个民族的汉人，在身体上或生物学上优于其它民族。只要外族人认同中国的生活方式如衣饰、行为举止、家族制度、伦理等等，他们终会变为中国人。同时，中国文化不乏其民族固有的、特殊的成份。祭拜祖先的根深蒂固的习俗要求对祖先承担义务，因此如果汉化的匈奴人、突厥人或契丹人伪造族谱，声称自己是汉人后裔，这便有违孝悌伦常。忠君思想同样加强了民族归属意识。当国君受到异族敌人的威胁，如像宋朝屡次发生的那样，人们就仇视这些敌人，因为他们是与自己文化不同的异族人。

当中国为世界或区域主宰时，儒学中有关中国文化改造性力量的理论是令人信服的。在整个南方，一度被认为非汉人的当地土著后来与汉人融为一体。即使在北方，非汉人最终被汉人同化的例子也屡见不鲜，北朝时的鲜卑人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10—14世纪期间征服中国的各个异族政权，使儒学的改造理论经受了十分严峻的考验。尽管很多蛮族个人汉化了，但接触中国文化和儒家伦理道德并未使契丹族或蒙古族全盘汉化。当然接触中国文化也确实使女真人和蒙古人将中国人万物一体的政治理论为己所用。到13世纪时，金朝皇帝们自己也已赞同中国臣民和异族征服者在一个大帝国内和睦相处，繁荣昌盛。金朝末代有一个皇帝曾以提倡儒术而著称，他支持了汉族儒生的文化复兴。忽必烈同样强调其统治的包罗万象。当他为其所建立的王朝命名为元时，他引用了《易经》的内容，指出是他的祖父成吉思汗将帝国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的。

为了保持其外族身分，外族皇帝不能举行所有传统上与天子和汉族文明相关的中国仪典。他们建立了长期以来与王朝原则和帝制皇统休戚相关的太庙，但这样做并不意味着认同汉人，因为他们祭拜的祖先是自己的异族祖先。汉人谋士们力图说服他们的异族君主，模仿或采纳中国帝王葬礼和婚礼中的某些仪式，并对他们解释了汉族儒生们所赋予这些仪式的传统的道德含义。但为了保持其异族身分，没有一个君主将这些仪式全盘照搬。

虽然这些外族君主开始发挥中国文化礼仪中心的作用，但很多汉族儒生并不承认他们是中国的合法君主。他们发展了崇尚民族主义的概念，即不仅忠君，还要忠于民族和文化。如第6章所论，在南宋初年，能否收复北方被看作是是否保全了中国。在13世纪，很多人拼死抵抗蒙古人入侵，力图拯救中国文明。文天祥是最著名的投笔从戎的士子，为了救中国他献出了一切。在驱逐蒙古人早已毫无希望之后，他仍继续抗争，向南方不断撤退，以避免大宋臣民们所效忠的两位皇子落入蒙古人之手。甚至在被俘三年之后，文天祥仍拒绝了所有劝诱，誓死不做元朝的臣僚，最后被忽必烈所杀。

蒙古人认为其它民族优于汉人的政策，进一步激发了汉人的民族意识。使前大宋臣民们尤为愤愤不平的是，一个名为朗烈坚嘉的吐蕃僧侣竟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致将前宋朝在杭州的宫殿改建成佛寺，并挖掘了宋朝皇帝的陵墓，用陵墓中的

珍宝去修建更多的寺庙。仍对宋朝忠心耿耿的人们偷偷地搜寻到皇帝的遗骸，并将其葬于他处。

千真万确的是，随着武功渐渐让位于文治，每一朝代的征服者及其臣民都能在两三代之内彼此妥协。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二者之间持续不变的紧张关系。虽然在所有征服者中，女真人是当时汉化程度最高的，但金朝的契丹族和汉族臣民出于对女真人的仇视，很快就投降了蒙古人。在金朝覆灭之后，据说汉族老百姓杀死了大批女真人。至于蒙古人，直到14世纪，他们和汉族臣民之间还是互不信任。1328年至1340年间，把持朝政的宰相伯颜就千方百计地防止汉人出任朝廷、各省和其他地方政府的要职。由于害怕汉人行刺，伯颜重申了律令，禁止汉人配带武器，禁止汉人在遭到蒙古人和中亚人攻击后进行复仇。汉族人同样对伯颜心怀恐惧，当时谣言四播，说朝廷打算将国中所有未婚的年轻人都抓起来，还说伯颜要把所有姓张、王、刘、李、赵这类最常见姓氏的人杀掉。伯颜害怕汉人谋反，而汉人恐惧蒙古人残忍无情的政策。当中国南部声势浩大的起义使元朝濒于覆灭时（见第8章），蒙古人没有像女真人和鲜卑人那样同汉人融合，而是能逃的都逃回了干旷草原。元朝以后的蒙古人恢复了他们的游牧部落生活，在那里充满自豪地回顾其征服中国的时代。失败和蒙古人的征服无疑强化了汉人的民族认同意识，但是这些情绪不同于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对很多人来说，忠君仍是最为人称道的美德。很多的儒学家诚心诚意尽其所能地使元朝中央和地方政府提高效率。在汉人建立的新王朝消灭元朝后，仍有相当部分这类儒生效忠于元朝，拒绝为明朝效力。

在唐朝末年至明朝初年之间的4个半世纪中，中国北方与南方的经历截然不同。只有在北宋统治下的一个半世纪中（即使在当时，契丹人仍控制着北部边陲一带），北方处于和平，在汉族君主统治之下，是统一中国的一部分。而在余下的3个世纪中，中国北方先后由几个外族部落建立的政权主宰着，北方社会经济极为混乱。在经历了女真人侵和金宋交战的毁灭性打击之后，蒙古大军又扫荡了遍体鳞伤的北方，然后整个社会被军事化。强征土地、军人专权，以及不断变化的科举取士政策，颠覆了原有的权力结构，所以到明朝时声威显赫的北宋豪门已经寥寥无几。

南方却与此不同，外族统治仅仅延续了不到一个世纪，而且在这一个世纪中，也不是彻头彻尾地崇尚武力，也没有完全破坏原有的社会经济制度。外族统治没有长到让人感觉它不可改变，南方人也没有像北方人那样接受这一统治。对于蒙古人来说，北方人和南方人是如此的截然不同，以至于他们将二者划归不同的民族范畴，分而治之。

人们在讲述征服朝代的历史时，通常以征服者的立场为依据，以表明他们如何成功地巩固和扩展了其统治。西方史学家们对蒙古人的战争机器极感兴趣，努力研究世界史上著名的征服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传统的中国史学家强调政治史，着眼于断代史，因此他们也有理由以统治者为研究中心。而且，现代政治也需要新一代中国史学家将女真人和蒙古人视为中国的少数民族，而不是异族征服者。这样做，可以使当代中国人以蒙古帝国的辽阔疆域而自豪，但此举却曲解了历史。从中国文明史和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异族征服者与其十分不同。正如中国文化在

赵孟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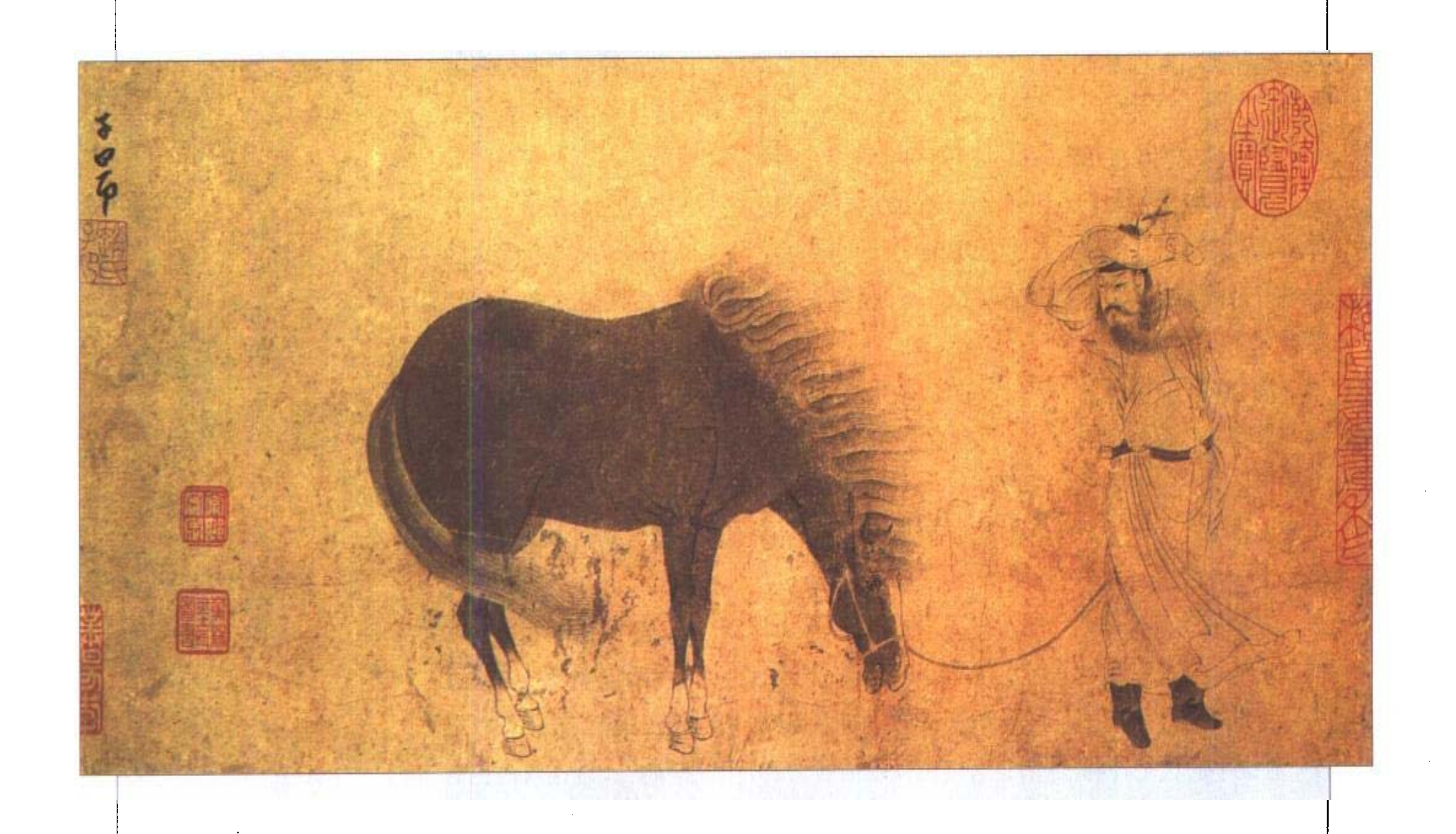
对于宋朝臣民来说，在蒙古人手下做官并非是件容易抉择的事。宋朝宗室赵孟頫（1254年－1322年，开国皇帝的十一世孙）的经历可以解释他们所经受的双重压力。赵孟頫没有在宋朝做官，因为他太年轻，但他曾为杭州的太学生。杭州失陷后的10年之中，赵孟頫闭门不出，只同一些对诗画和书法有兴趣的朋友交往，他们以"吴兴八才子"闻名。其中有几位在战乱中家产尽失，靠庇护人捐赠和授课为生。他们认为仿古的绘画表达了对过去的向往和对今日的否定。

1286年，为了赢得南方文人的支持，忽必烈将手下的一个南方人派回去网罗著名士人。包括赵孟頫在内，有二十余位南方文人同意北上。但当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之后，有些朋友拒绝同他讲话，有些宋朝宗室成员不再认他为一家人。

赵孟頫很快就得到忽必烈的器重，使他有机会在朝中推崇儒家道德规范。他大胆地建议币制改革，并尽其所能，协助除掉了因腐败而臭名昭著的色目丞相桑哥，他建议让文人士子免受体罚。1316年，他出任要职，执掌翰林院。对于像赵孟頫这样的文人墨客，得以来到北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中原大地、中国文化的心脏地区——稍稍补偿了为征服者效力的屈辱。在他做官的头10年间，他借公务之便游历了大部分北方山水，并搜集了大批唐朝和北宋名家的画作，在此之前这些画还没有哪个南方人有机会见到过。这样的经历使他能够脱离南宋画风，并从年代久远的杰作中汲取灵感。当他回杭州拜望旧友时，他对友人讲述了在北方的所见所闻，并为其中一位绘出了他在山东的祖宅。

顺便提一句，赵孟頫的第二位妻子管道昇是中国首位以画家著称的妇女。她以画竹、兰、杏花和佛家人物而闻名。在为她所作的墓志铭中，赵孟頫提到蒙古皇帝曾有一次向她求赠书法作品。

下图 正像他的大部分其它作品，赵孟頫的这幅画表现出唐代画风。蒙古人即使对它的艺术背景和源流一无所知，也会很容易就喜欢上这幅画着逆风而立的马和马夫的作品。



19世纪和20世纪时不得不面对西方的威胁那样，当时它必须应付游牧民族征服的挑战，而它的应战对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具有深远的影响。

尽管这三个外族朝代均尊崇佛教，但在其治下，中国并未成为一个更加佛教化的社会。由于佛教是一种世界性宗教，与中国没有特别的关系，因此，它对征服者或许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但异族统治者的保护并没有给中国佛教徒带来精神上的复兴，也没有加强他们同其它国家佛教徒的交流。例如汉族和尚们对于吐蕃喇嘛在宫廷中日益增长的权势并不感到高兴。虽然说异族统治者尊崇佛教反而使广大汉人反感佛教是言过其实，但事实上他们也没有使佛教更为流行。

在蒙古人占领时期，中国被并入一个欧亚帝国，从西亚和欧洲来中国的旅游人数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字。这种跨文化的交流使欧洲人渴望加强同遥远国度的联系，但是它对中国人的影响却恰恰相反。中国的发明——诸如印刷术和火药——传入西方，西方对亚洲物品的需求最终也在欧洲大探险和大扩张的时代达到顶峰，与此相反，在中国，保持中国特色变得比引进外来之物以丰富或发展中国文明更为重要。在唐朝时，大量外来音乐和异国情调的服饰、艺术和室内陈设与中国文明融为一体，而在宋元时却大不相同。就此而言，中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相似，蒙

对于中国人，竹是在逆境中生存的象征：它亦刚亦柔，能够经受暴风雨而不折断。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在蒙古人统治时期，竹成为汉族文人画家的心爱之物。这张17英寸高的水墨画是以算命为生的士大夫吴镇在1350年所作。



戏曲与表演艺术

中国表演艺术历史悠久。早在战国时期，艺人们就靠表演杂耍和舞蹈取悦宫廷。宋朝时，滑稽戏和木偶戏艺人、卖唱的和说书人的表演，取材于大量滑稽有趣的、道德说教的、男女情爱的故事和历史传说。他们活跃了城市生活。

戏曲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确立于金元时期。金朝的戏曲有600多种留存至今，但完整的剧本只保留下一个，而元代有160余个剧本保留下来。这些戏大多有四出，剧本中唱腔和唱段交替出现。蒙古统治者支持戏曲演出，因为不懂汉语的人也能欣赏戏曲。但作为一种文学艺术，戏曲的发展或许同样是由于文人士子前程的改变所致。有才华的文人不愿或不能为征服者效力，只好靠给戏班写剧本赚钱为生，而这是以前饱读诗书的文人墨客不屑于做的。

关汉卿是最负盛名的戏剧家之一，他有60多部作品。他的名剧《窦娥冤》叙述了年轻的寡妇窦娥为使婆母免受折磨、承认了她并未犯下的谋杀罪的故事。在被处死之前，她声称天公会在夏日降雪，大旱三年，以证明她的无辜。后来真相大白，而负责重审此案的司法大吏正是窦娥的父亲。多年以前他为了进京赶考，将窦娥卖了筹措银两。他无法使窦娥起死回生，最后是将真凶绳之以法。这

下图　金代的戏曲表演是如此流行，以至演员和乐师的表现也被用来装饰墓壁。这件砖雕取自山西稷山的一座12世纪的墓中，刻画了前排演员轮换的角色，及在后面为他们表演伴奏的乐师。每件人像有12到15英寸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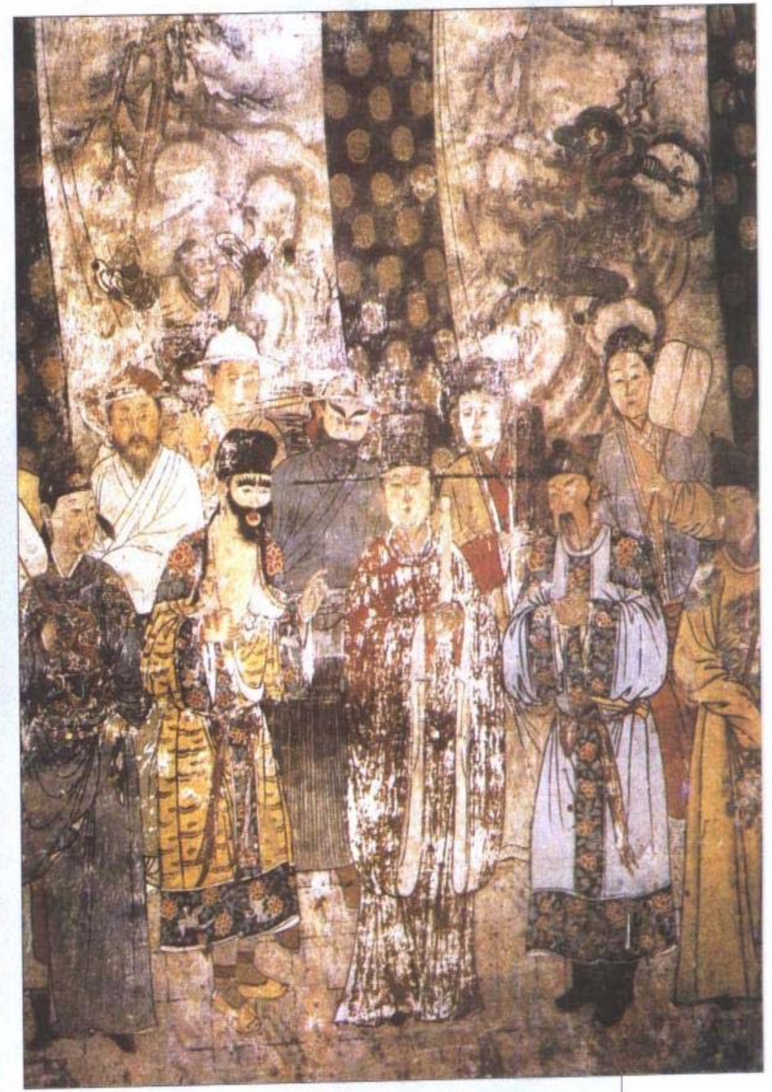
类戏曲不仅情节感人，而且唱词优美。例如，在窦娥赴刑场途中，她喊冤道：

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
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
天也，你错勘贤愚枉作天！
哎，只落得两泪涟涟。

有些人认为《窦娥冤》这类戏剧巧妙地表达了对蒙古人统治的抗议，但是在汉人王朝统治之下，这种冤案也一样屡见不鲜。

尽管中国人喜爱戏曲，但戏子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卖唱的戏子被归入妓女一类，身份卑微，不能与一般百姓通婚，其男性后裔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公开登台的女艺人被视为与妓女相差无几。由于这种歧视，出现了男扮女角的惯例。但是人们往往将扮女角的男戏子看作同性恋者，并认为梨园中人不守道德规范。有些人进入戏班是由于生在梨园世家，其他人则是由戏班从其父母手中买来，自儿时就开始训练演戏的。





上左图 这幅《窦娥冤》的插图取材于明朝的版本。表现窦娥受辱时，带有色情成分。

上右图 这是位于山西洪洞县广胜寺大殿上的一幅大型元代壁画的一部分。画上的戏剧角色穿着精心制作的服装，并进行了很规范的面部化妆。



这是14世纪的一幅绘于纸上的彩色水墨画的局部。画中的说书者、演木偶戏的人用几乎同样的故事娱乐市民。那些故事是剧作家们精心编写的剧本。

古人的征服和军事威胁导致了伊斯兰世界趋向保守，而不是促使其对远方的国度发生兴趣。

毫无疑问，女真人和蒙古人的征服对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对于北宋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冶铁业，此后再也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人口不再增加，反而有所下降。到1100年，北宋人口为一亿上下。女真的入侵使北方人口流失，到1207年，女真统治下的北方人口为5300万，加上南宋统治下的6500万，总共为近1.2亿。到1290年，中国登记在册的人口下降至6000万；一个世纪之后，人口数量仍保持同样水平。这部分是由于蒙古军队不分青红皂白的滥杀所造成的。大片地区，如四川和河北遭到洗劫，经济恢复和人口回升用了数个世纪之久。亚洲大陆联系的加强也导致了可怕的瘟疫流行。1232年，在解除了第一次对开封的围困后不久，瘟疫流行，在三个月里有近100万人死亡。在元朝末年，内战引起的动乱也无疑造成了人口下降。

女真人和蒙古人也因为建立了更为专制独裁的政府形式而受到指责，但以后的汉族朝代却延续、甚至赞许了这种政府形式。外族君臣没有耐心遵循成文法，更习惯用武力和恐怖达到目的。他们的朝廷未必比宋朝的更强有力或更集权，事实上他们的政府在很多方面分权程度更高，是一种分封世袭的统治形式的遗存。但是在外族朝廷统治之下，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很少被先例所束缚，可在更多的情况下滥用武力。

尽管存在这些消极因素——或许正是由于其存在——在外族主宰的数世纪之中，中国文明也有收益：中国自信能够生存下去，它可以作出必要的妥协以避免最致命的打击，它仅仅凭借持久力就打败了侵略者。中国文明的延续不是靠改变蒙古人，而是靠强化文化认同中独立于天子的方方面面。对于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忽必烈的保护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东西存在于远离宫廷之外——在传授儒学的书院中，在设法对其文化传统保持信心的文人墨客圈子里，在负责自卫和举行纯中国仪典的地方大家族中。征服者对于武力的崇尚，也许正好促使汉族人更注重以它的反面——维护和平与秩序的艺术——来强化中国文明。

第八章　独裁的局限：明朝（1368年－1644年）

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和元朝的覆灭，中国从少数民族统治下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一个贫苦的农民，后来成为造反的将军，建立了明朝（1368年－1644年），他不仅控制了全部汉族地区，而且向西南地区扩展了自己的势力。明初诸帝努力奋斗，常用恐怖手段使官员们循规蹈矩，以努力建立其个人对一个巨大而复杂的帝国的控制。尽管统治者极为专制，但争相跻身官僚集团的竞争程度，还是很快达到并超过了宋朝的水平。在长江下游地区，文人文化很有活力，那里的城市化程度很高，出版业也在飞速发展。这个地区繁荣的原因之一是贸易发展，这包括沿海的对外贸易。尽管明朝统治者对商业没有什么兴趣，并且试图把对外贸易纳人朝贡体制之内，但明政府却无法使中国置身于飞速发展的国际贸易体系之外，这是因为国外对中国丝绸和瓷器具有旺盛的需求。其结果是，白银流入，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而且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其中有些影响有助于解释17世纪的社会秩序。

明太祖与专制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很少有像明朝那样深受其建立者个人个性影响的王朝，这位明朝的建立者就是朱元璋（1328年－1398年），庙号称太祖，年号称洪武。1500年的中国历史上，他是第一个从普通人成长为皇帝的，也被证明是精明强干、事必躬亲和冷酷无情的。他亲身经历过贫穷。他一贫如洗的父母不得不经常迁徙以谋生，或逃避税收，甚至把几个孩子送给别人，因为自己无力抚养。朱元璋16岁的时候，黄河改道导致了洪水和饥荒，并在他的家乡造成瘟疫，夺去了他父母的生命。朱元璋连埋葬父母的棺材都没有，只好投身于寺院，但寺院也承担不起僧多粥少的压力，不久就把那些新入寺的人送出去化缘。朱元璋在中国的东部、中部游历了几年，又回到寺里待了三四年，直到元朝军队试图镇压愈演愈烈的地方反叛。1352年，再次无家可归的朱元璋加入了一支隶属于红巾军的造反队伍，而红巾军又是白莲教的一个分支。后者的教义借用了佛教中的摩尼教和弥勒崇拜，也吸收了儒家和道家的价值观和象征物。在红巾军中，朱元璋迅速成长起来，并与该军指挥官的义女结婚。1355年，那位指挥官死后，朱元璋接掌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次年就夺取了重镇南京。在这些年里，他把一小批能干的、出身农家的士兵和几个充当谋士的知识分子招集于自己的麾下。

朱元璋以南京为基地，与其他地方强手展开竞争，逐渐在东南地区独占鳌头。即使如此，他仍在名义上奉红巾军领袖为正朔。1367年，这位领袖死了（因为他当时正是朱元璋的客人，因此此事多少有些可疑），朱元璋公开了自己的称帝企图，派军队北伐大都，即今天的北京。蒙古统治者既未被擒也未退位，他和他的朝廷退往蒙古。明朝以后击败蒙古人的努力也未成功，所以明朝的疆域从没有扩展到亚洲内陆。1368年，在夺取了北京之后，朱元璋毁坏了元朝宫殿，宣布建立

明朝。朱元璋以南京为首都，使明成为第一个以长江以南的城市为中心对一个统一王朝实施统治的朝代。南京的人口从大约10万迅速膨胀到近百万。朱元璋沿城市外围修建了巨大的约有30英里长的城墙，修建了宫室和其它政府建筑。

似乎受到道家乾纲独断观念的影响，太祖尽一切努力来提高皇帝的地位。他把自己的工作视为营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民服从他们的尊长，而做了坏事的人应该立即得到惩罚，换句话说，这是一个与他所知道的充满暴力和不道德的世界全然不同的世界。他要求官员们跪着对他讲话，而且毫不犹豫地揍他们。为了减轻政府对穷人的重压，他下令进行全面的人口和耕地登记，作为更公正地征收赋税和徭役的第一步。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尽可能地削减了政府的开支。通过向士兵的家庭分配土地，两百余万强大的军队大多可以自给自足。国内官僚机构的开销由于保留了元朝的匠户制度而得到控制，这些匠户可以满足宫廷和政府的需要。类似的原则也应用于地方政府，家境较好的农村家庭被指定负责基层的司法、治安和税收，但没有任何报酬。这种乡村服务政策也为太祖所欣赏，因为它允许地方村社保护自己免受贪婪的收税人之害，他们自己负责估算、征集和运送税粮。太祖也认为，如果人民遵守传统的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体制、和谐共处，就可以防止政府的干涉。他还就此问题发布教民榜文，让村落领袖大声读给他的邻里，劝他们要孝顺父母，与邻里和谐相处，各安其业，抑制邪恶之心。

贬低太祖皇帝的画家把他描绘为一个丑陋的、脸上长麻子、下巴向外突出的人。尽管有些宫廷收藏的肖像显示，太祖和其他皇帝一样英俊，但只有几幅反映他真实面貌的英俊画像保留了下来。



太祖的同情心并没有惠及大商人或者学者精英。在江苏苏州一带经济、文化发达的东南地区，政府实行了混乱而不合理的高额税率，强迫该地成千上万的富庶之家迁居他处，特别是迁居新的首都南京。1371年，太祖对科举考试中选拔出来的120名进士抱怨说，朝廷诚心寻求才能之士，但得到只是空话连篇的人。他不仅停止了科举考试达十几年之久，而且重编了《孟子》，删去了其中暗示抑制君权的内容85条。在恢复科举考试之后，太祖又因考中进士的仅是南方籍考生而将主考官处死。

当太祖被他所处理的一些重大问题困扰的时候，他开始怀疑有人企图谋反或在暗中讥笑他。于是，他把禁卫军锦衣卫改造成秘密警察，由其负责刺探官员，调查政治罪。1380年，他把宰相处死了，与宰相有极远关系的人，也作为可能的同谋被逮捕和处死，在进行的长达14年的调查中，3万多人因此丧命。另外两件大案则处死了7万人左右。汉人对中国统治的恢复变为士大夫们的一场噩梦。

这些大清洗并不仅仅是显示皇权的强大；太祖还多次对各种各样的胥吏、差役、门子、仆从开展打击活动，这些人按照官员的命令行事，限制普通百姓接近官员。在他发布一道敕谕中，使人感到是环境迫使他不得不去消除这个恶人的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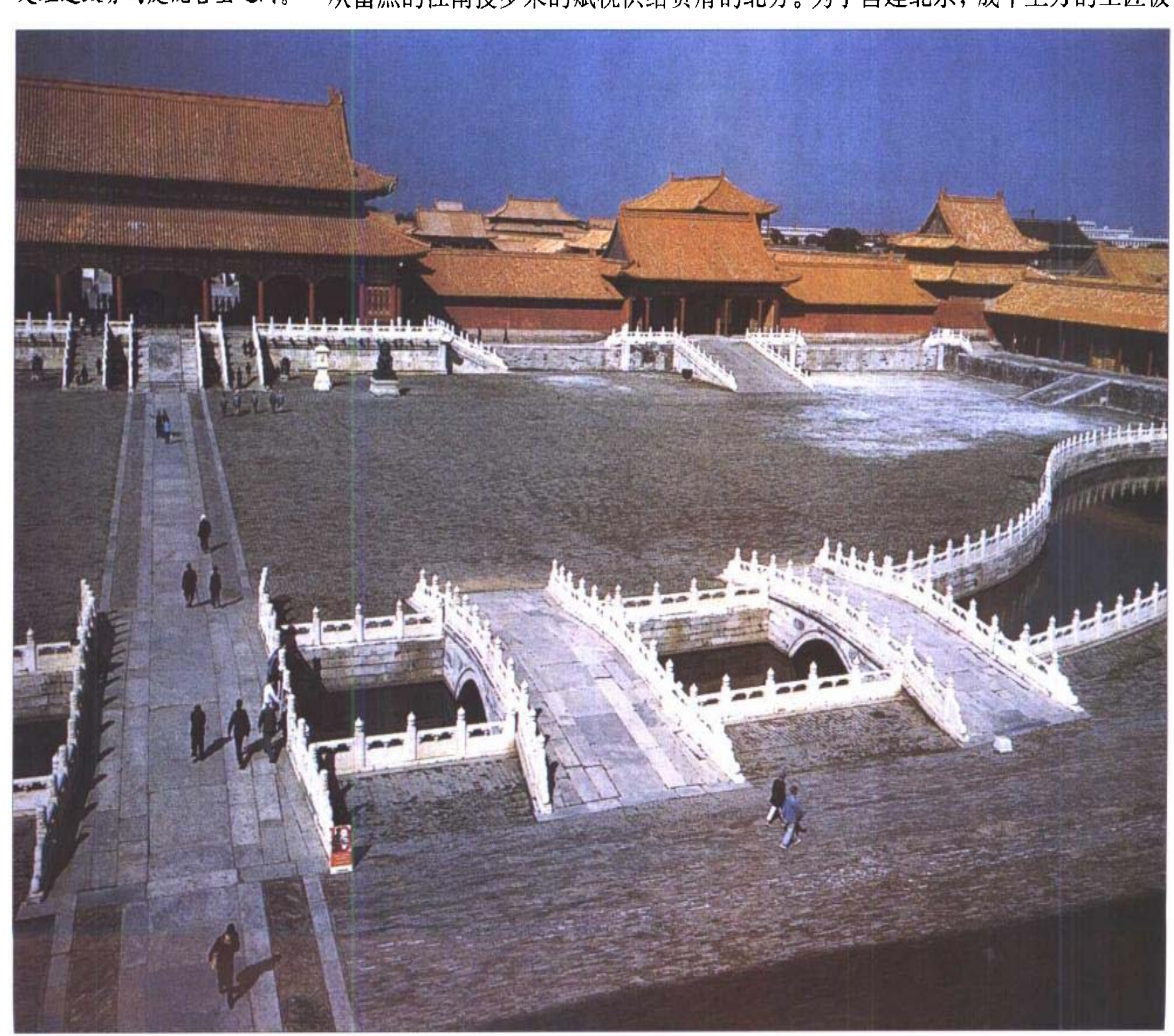
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同罪者；今晚方罚此处过犯，次晨彼处又有犯者。前尸尚且未移，而后继者又接踵而至。罚之愈重，犯者愈众。朕昼夜无暇休息，局面已然无望，若轻罚之，此类人依旧作奸犯科。如此非公，门中人如何得致太平？如此局面甚为艰难！若处罚此类人等，朕会被视为暴君；若朕宽待于彼，则法失其效，纲纪荡然，而百姓视朕为无能之主矣。⑳

由于太祖对其宰相已失去信任，他只得自己行使最高行政权，事无巨细地与官员们直接打交道。太祖就像秦始皇一样，由自己批阅所有奏章，把精力耗费在所有事务的决策上。

管理问题

太祖指示他的子孙不要妄改他所创立的制度，但子孙们并不总是那么听话。比如说，连100年都不到，南京就不再是首都了。太祖的合法继承人是其已死长子的15岁的儿子，但在三年之内，这个小皇帝的叔叔、太祖的第四子，发动内战，夺取了皇位，成为明成祖。成祖把首都搬到了他的老根据地北京，而把南京降为陪都。此后，北京便成为宫廷和军事权力所在地，而南京负责监督财政事务，把从富庶的江南搜罗来的赋税供给贫瘠的北方。为了营建北京，成千上万的工匠被

北京明朝宫殿群的设计和规划绝大部分被后来的清朝统治者所保留。今天到北京的观光者可以漫步在这层叠有序的、曾有24位皇帝生活和处理过政务的庭院宫室之间。



征发来修建宫殿城池。这个城市被设计成一套盒子的样子：主要的宫殿在宫殿区（称作紫禁城）的中央，紫禁城又在行政区（称作皇城）的中央，接下来皇城又在北京的中央。出入这些盒子只能通过在城墙上开着的城门。1553年，又在南面增加了外城，它也有自己的城墙和城门，从而使北京城的面积达到4乘4.5英里。为了给北京供粮，从山东西部修浚了宏伟的运河工程，其中包括15座闸。运输部队由1.5万艘船和16万人组成，一旦需要，士兵就得去拉纤。总之，运河已成为首都的生命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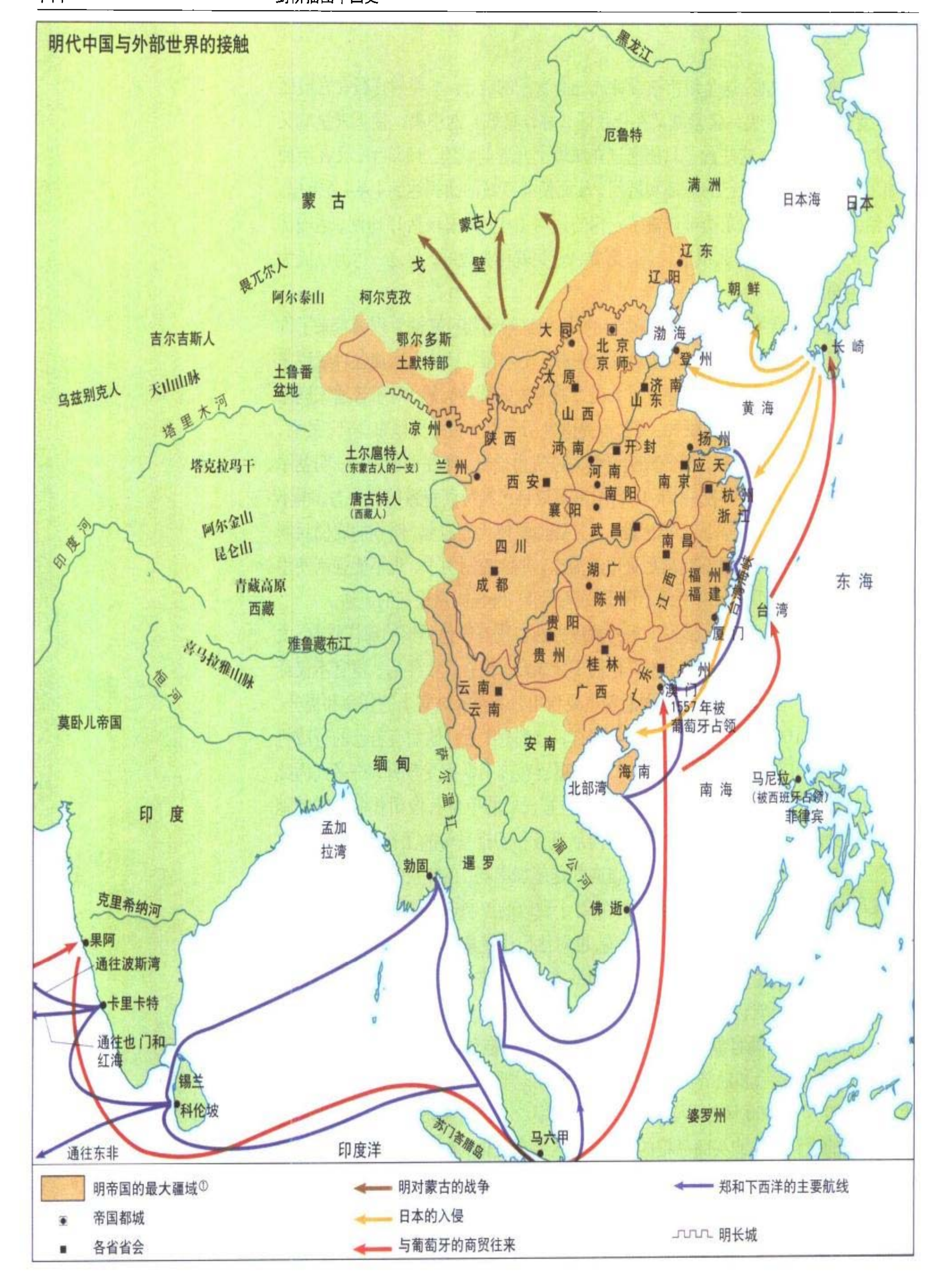
太祖组织政府的努力是以省钱为目的的，但这给明朝后来的管理者带来了许多头痛的问题。地方官发现，合法的税收来源十分有限，只能靠增加各种赋税来维持基本的行政需要，但这又导致了太祖力图避免的那种弊端。对于普通家庭来说，他们常常因不断增加的赋税、为公差提供食宿等重重负担而倾家荡产。最后，明朝政府不得不进行改革，把多数赋税改为按货币征收。像在前朝那样，明朝军队由世袭军户组成，不得随意调动，自给自足或自己维持其有效的战斗力。得不到饷银的士兵们开了小差或卖掉土地，于是雇佣军便代之而起。明朝的雇佣兵制从未有效实行，因为政府不能满足货币的需求，不能控制伪币，也不能强制使用缺乏财力支持的纸币。政府最终不得不放弃纸币，勉强同意银锭的流通。

对于长期存在的宦官问题，太祖的解决办法也没有像他预期的那样收效。太祖曾规定，不许宦官读书识字，不许他们干涉朝政。但在几十年后，宦官不仅经营巨大的皇庄，而且也在军事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甚至操纵官员的任命和提升。在明朝的最后100年里，全国有7万名宦官，首都有1万。他们有自己的行政机构，与朝廷机构平行，却不受后者的管辖。宦官在内书堂接受教育，许多人因此而成为官僚程序和文书形式方面的专家。宦官任职的单位有像司礼监这样的地方，其首领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处理宫廷内部事务和安排皇帝的工作生活，如果皇帝答应，他的这种领袖地位就可能使他向朝廷施加影响。在神宗的长期统治过程中（即万历朝，1572年－1620年），宦官对于朝政的控制造成了特别的危害。这位皇帝既对大学士之间的争斗感到厌倦，也对他们违逆其亲自指挥军队的意愿甚感不快，为此他干脆停止朝会，停止批阅奏章，停止缺官的补充，并放纵宦官到各地去征税，而不管他们如何荼毒富家。

当然，由于明朝官僚们尽心尽责、全神贯注地推动这个千疮百孔的制度运转，因此明朝的社会和经济仍在继续增长。明朝时期，中国的人口增加了一倍有余，从6000万到8000万之间增加到1.5亿至2亿。小市镇遍布全国，当许多地区利用便利的水路运输购买商品粮的时候，地区性专业化的经济得到发展。到17世纪，长江三角洲地区变成棉纺业和丝织业的中心，沿海的福建则以烟草和蔗糖生产闻名，江西景德镇的瓷器出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尽管政府对那些逐利的商人和超出政府计划的经济增长始终心存疑忌，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

西南边疆

直到明代，西南省份如云南、贵州才完全并入中原王朝的版图。1253年，蒙古人摧毁了大理国，将其并入自己的帝国，在那里安置了5万多名士兵及其家



在明代，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海上联系变得重要起来。明初，中国就派出了远洋使团到远方异域。明末，遥远之地的商人和探险者也由海路纷至沓来。这样，明朝政府不仅要在北方边境上防备骑马的游牧民族，还要防备南部沿海边疆的海盗和走私者。

① 此图所示“明帝国的最大疆域”与中国方面的说法差距甚大。当时的西藏、青海地区及现在中国的东北，俄罗斯的东西伯利亚地区，都应在明政府的管辖之内。详情参见中国社科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之《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0月版) 第61—62页“明时期全图 (一)”、第63—64页“明时期全图 (二)”及相关文字说明。另外此图之山川湖海均采用了现在名称。特此说明。——编者注

属，其中包括许多来自西北的穆斯林。这种在战争之后临时将士兵放归的模式，到1381年明朝征服各地之后仍继续沿用。到该世纪末，大约20万名军屯士兵留在了贵州和云南，他们至少开垦了200万亩（大约35万英亩）土地。在15、16世纪，军户不断在该地定居，并至少招引来了另外50万受政府资助的拓荒者，他们来自山西、山东、江苏和福建等遥远之地。明初云南和贵州的人口大约只有300万人左右，而且一半以上是少数民族，上述移民对该地的族群融合无疑具有重要影响。在靠近少数民族住地的地方，拓荒者一般都开垦荒地，这导致了族群之间的摩擦，但也带来了双向的融合。

在西南这样的边疆地区，明政府继承了前朝的政策，实行双重管理。在汉族人口稠密的地方，实行州县体制，官员须推行全国性的法规和税收条例，而在少数民族人口居多的地方，则认可部落首领为世袭的土司，对其实行“羁縻”统治。土司有权力维持秩序，如果邻近其他部落给朝廷制造麻烦，他们得帮助朝廷。他们能收到大量交流物资，但作为回报，他们也要向朝廷纳贡。明朝廷扮演着遥远的最高君主的角色，虽对发生的多数事情无力控制，但同样不必为此而耗费大量的资源。

尽管这种类似封建的制度对于当地酋长和明政府都具有潜在的利益，但拓荒移民和土著人之间的激烈冲突还是相当常见的。正如美国西部早期的种族冲突，彼此间的寻衅闹事，使个别汉人会像对待奴隶那样剥削或欺负当地部落民，而那些有武装的部落民则抢掠汉人，或以其它方式对擅自闯入其领地的汉族移民和商人实行恐怖统治。1464年至1466年间，大规模的起义爆发。广西、广东、四川、湖南和贵州的苗、瑶部落，离开他们偏远的边疆地区，进攻人口稠密的城市。兵部尚书认为，以前的安抚政策激化了矛盾，于是决定军事解决。包括1000名蒙古骑兵在内的3万名士兵在南京集结，从那里开往广西，在广西又补充了16万名地方军队。坐落在密林覆盖大山环绕着的峡谷中的瑶族据点遭到攻击，其头领和800名部众被俘，然后被押往北京斩首。此后，大军又被派去平定其它省份。

有些官员反对谋求对非汉族部落的军事统治。1479年时有位官员认为，与四川南部土著发生冲突的原因，主要是政府决定将流官派驻该地，这些流官对当地民族不熟悉，也不会讲他们的语言。他报告说，最近的一次战役打死了270个少数民族首领，这进一步激起了当地人对汉人的愤恨，以至他们感到除了劫掠以外别无选择。“得汉人，缚之于树，乱射之，曰：‘尔害我亦已久矣’。”[九]其他官员则在允许部落民族自治和迫使其彻底归顺之间寻找一种中间立场。哲学家兼官员王阳明曾在广西镇压过苗民起义，他建议实行当地首领和汉族官员的联合管理，以使其逐渐汉化。他认为，对于那些未汉化的部落民族来说，创立汉官直接管理的体制，就像先把鹿赶到一座大厅中然后再驯服它们一样，结果只能是它们撞你的祭台，踢你的桌子，狂怒惊恐地乱跑。但让他们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同样解决不了问题，因为这就像把鹿放到旷野之中，不设篱笆，让它们去践踏刚刚长出来的庄稼一样。[十]

文化人乃至普通农民的某种长距离的迁移，充实了西南之地，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种跨越地域的汉族认同。移民来自于中国的四面八方，他们注意到了方言和习俗的差异使彼此之间存在隔阂，但他们也逐渐认识到什么是他们所共有的，

什么把他们区分为汉人和当地部落民。就西南的情况而言，由于汉族移民和少数民族接触日益频繁，出现了充分的文化交流，造就了新的方言和对汉族的认同，汉文化逐渐占据了支配地位，但其中也吸纳了当地土著民族的许多特殊习惯。

文人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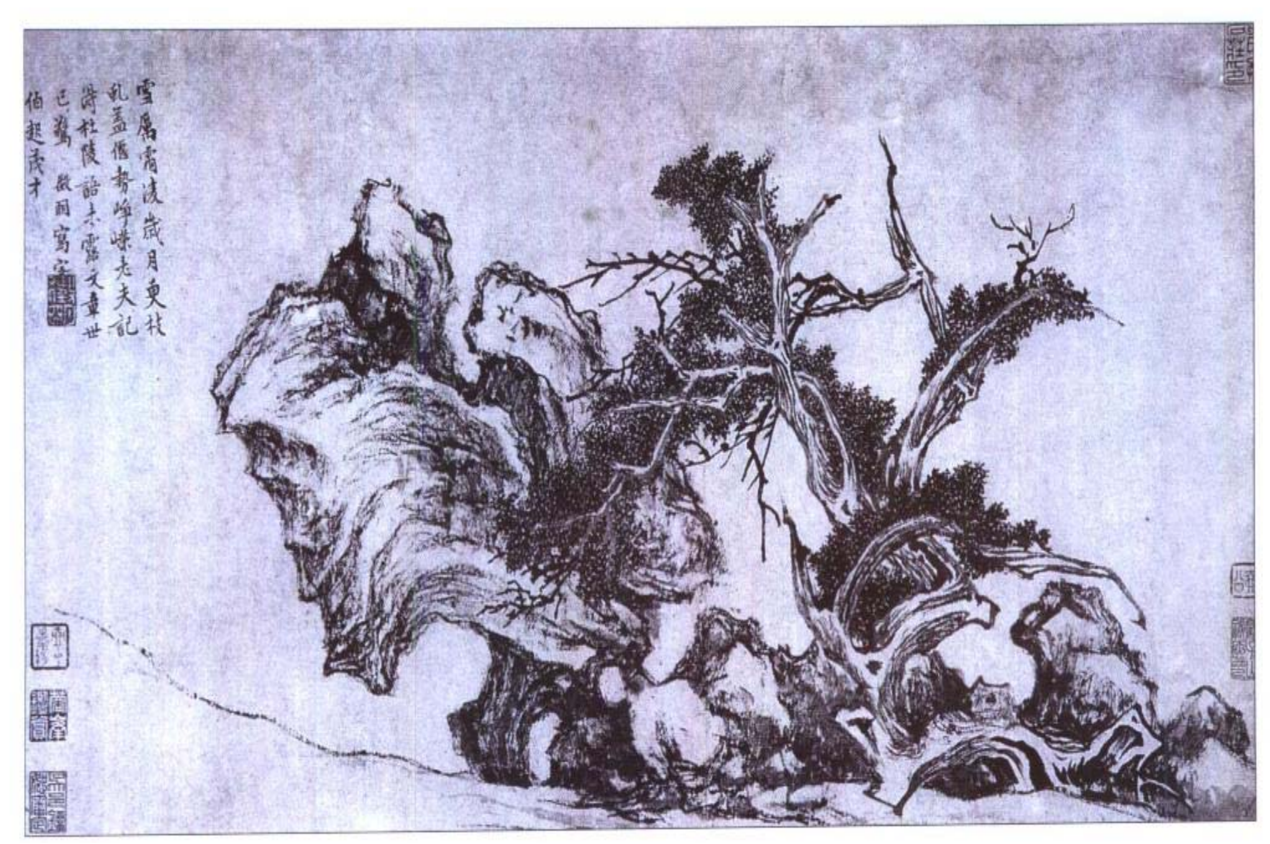
明政府早已存在严重的问题，并且迅速走向全面的危机，但受过教育的渴望出仕的人却源源不断。所以在文人生活中，科举考试继续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

就考试的思想和文学内容而言，明朝的考试是以狭隘著称的。考试的全部内容只能出自宋儒朱熹注释的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和《大学》）。这种对某一个学者的解释的强调，使学习和打分都变得简单明确，但却把儒生们的备考与精神生活分离开来，其程度比宋代更为严重。备考也与文学发展日益分离，特别是在1487年以后，所有的文章都要按照八股文的格式来写。但就它们提供的进身的机会而言，明朝的考试在地理范围和社会集团的广泛性上，是引人注目的。为了避免文官的位置被来自经济最繁荣、教育最发达地区的人所垄断，保证最落后地区的考生跻身其中，政府按省规定了录取名额。明朝还在功名等级中新增了较低的一级生员，他们是地方考试的合格者，这就极大地扩大了拥有功名者的规模。

到16世纪，大概有10万以上的官学学生（即大约三四百个中就有一个）。这些人戴着特殊的冠带，亨有免除徭役的特权，有时候还能获得津贴。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头衔使他们得以成为一方领袖，进入到有教养者的圈子中。如果陷入贫困，他们可以利用这些头衔找到工作，比如在富人家里做家庭教师。其中有10%或更少的人能够成功地通过乡试，获得举人头衔。即便他们后来没有通过在首都



增加考取机会的方法之一是作弊，比如说，偷偷穿着用蝇头小字写满经典内容的内衣。这件“夹带衫”大概是19世纪的，但这种做法在此之前早就出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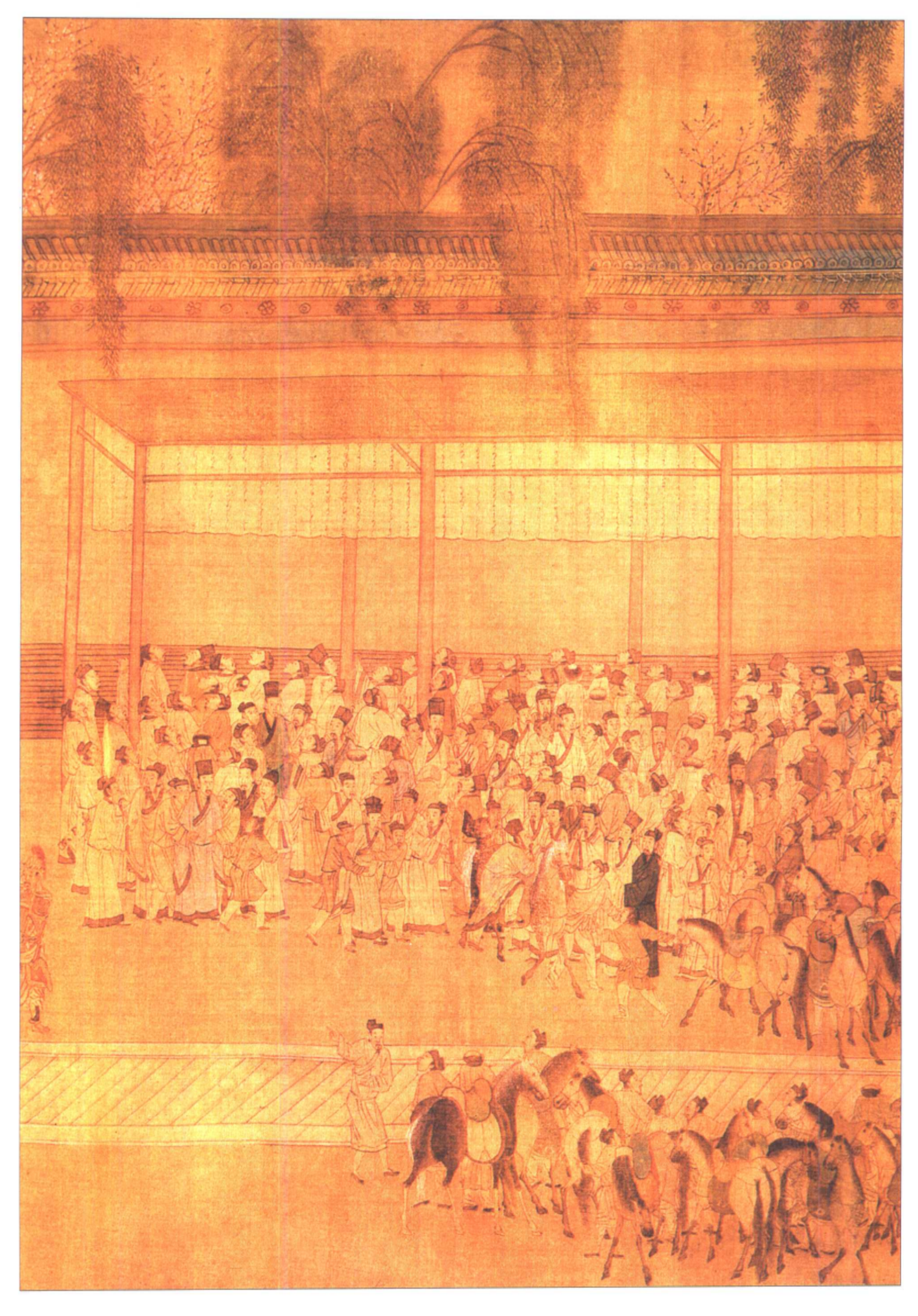
儒官文徵明在80岁的时候，仅用纸墨描画了一棵多瘤扭曲的柏树和一块坚固的岩石，便给这些长存而耐久的象征以新鲜的解释。在左上角，他用诗句表达了他的思想："雪厉霜凌岁月更，枝乱盖偃势峥嵘。老夫记得杜陵语，未露文章世已惊。"

进行的、最受尊敬的会试，他们也会被给予更大的特权，包括作为政府基层官吏的人选。每一次仅录取2000到4000名进士，为全部成年男子的万分之一。

科举考试制度在士绅生活中的关键作用并没有影响到财富的重要性。由于职权可以被用来增加家庭财产，而财产又可以世代相传，因此，官宦家庭依然要比普通家庭富裕。就像在宋代，户等制度是以县或府来考虑的，在某些地方一小批占有土地的家庭，可以通过一代又一代的积累，令人吃惊地进入中上层社会。比如，明代安徽的一个县的85位进士中的19位，只出自3个家庭。

此外，富家也有本钱去追求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文人生活方式，把文学艺术的实践和鉴赏同偶尔出仕结合起来。1570年，苏州的"四大家"就邀请了当地文人去欣赏他们收藏的古代彝鼎和其它古董。像这样的苏州富家，经常居住在围墙环绕的、典雅的园林式住宅中。与欧洲同类的城乡寓所极为不同，这些城市的隐居之地，不是为了从外观上引人注目。只有那些进入高墙之内的人才能发现，他们的主人是如何在这个小庭院中创造其理想世界的。沿着蜿蜒曲折的回廊，透过可以向外看的彩饰窗户，人们可以瞥见一个更深远的世界。在这些由组合建筑构成的小园林里，可以发现竹林、李树和联想为山脉的岩石。

在这种环境里，在唐宋时期就已表现出来的业余艺术家们的理想得以开花结果。像沈周、文徵明和董其昌这样的大文人画家，是一些精通经典、诗作和前代诗人及书法家风格的人，他们也试图在他们所画的风景、园林、树木、岩石或其它景色中渗透某种意境。他们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这其中既有从事其它职业而以绘画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业余艺术家，也有把自己的毕生精力奉献于绘画的人。谋求一种画家式的生活方式是可行的，因为著名画家的艺术作品可以卖高价。有个富翁为庆祝他母亲的80寿辰，曾付给大约100两白银让仇英画幅长卷。其它古旧画作也价值不菲，曾有人用一块地产去交换早期的名画家沈周的四卷组画。



参加科举考试并有望考中的举子们群集在张榜的墙前。取自仇英（活跃于1530年－1552年）彩绘帛画手卷的局部。

大众文化



明代制造的硬木家具之典雅，至今未有超越者。这把"官"椅的构造是由纤细、微曲的黄花梨木组合而成的，这种木纹漂亮的硬木主要产于位于热带的广东以南的海南岛。在下方的护板和椅背条板上装饰着云龙母题的浅浮雕。类似这把椅子这样的好硬木家具是不用木钉的，而是通过精巧的榫卯将各部分拼接在一起。

文人努力使其高雅的生活更加完美，这可以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企图，即维持文人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但这种界限被市民文化和白话文学的兴起一点一点地打破了。在17世纪早期，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评论说"数不胜数的书籍堆积于此，其售出的价格也低得惊人"。[七]刻书家毛晋雇佣了20个工匠，印了不少于600部书，用了10万多块木版。越来越多的书被印出来服务于社会底层。插图丰富的家庭用书包罗万象，从多用桌的制作及丧礼规则到买牛契约中的注意事项，应有尽有。大众宗教礼仪书中有功过格，通过它人们可以积累善行、反对恶行并决定自己的选择。对于学龄儿童，这里有介绍基本词汇的初级读本；对于举子们，这里有很便宜的儒家经典以及科举考试的答案汇编等。

在16、17世纪，越来越多的书是用白话文印的，只有那些能常年读书的人才能流利地阅读文言文，文言文这种书面语言是文人和官府以及经典中用的。对于用百姓日常口语语法和词汇编写的小说和戏曲，有一大批潜在的读者，他们包括书香门第家庭的妇女、商人、店伙计以及任何一个受过最基本教育的人。比如，颇有魅力的作家兼编者冯梦龙就发现，白话短篇小说吸引着一大批热心读者，因为这些小说描写了一大群小吏、强盗、国王、和尚、妓女和鬼怪，文笔很幽默。

戏曲剧本也找到了业已存在的市场。汤显祖的爱情故事和社会讽刺作品特别流行。《邯郸梦》说的是一个年轻男子在煮黄粱米饭时睡着了，他梦见了自己的一生：先是考中状元，做官有成，却遭到诽谤，被处死刑，最后得以洗冤，被提升高位，及至临终，突然梦醒，看到他的黄粱米饭将熟，意识到生命就像梦一样飞速流逝。《牡丹亭》是汤显祖最流行的戏曲，讲述的是杜丽娘的故事——她是一位高官之女，梦中遇到一位年轻书生，因对他日夜思念而日见憔悴。在去世之前，她把自己的一幅肖像埋在了花园里。后来那位年轻人再次造访她家，发现了这幅画，就爱上了她。于是，她便在梦里与他相会，重续他们的梦中爱情。他打开杜丽娘的棺材，她躺在那里，栩栩如生，像生时一样美丽。他的爱情使她重回人间。经过一番磨难之后，有情人终成眷属，年轻人科举高中，女方的家庭也就接纳了他。

明代也开始出现长篇小说。这些早期小说的情节结构极大地受惠于由口头说唱者发展起来的故事系统，而这些说唱艺人在城市中心的表演已有了几百年的历史。在最伟大的、作者难以确定的明代小说中，《水浒传》讲的是宋朝一群非法匪徒的故事；《三国演义》讲的是汉末的敌对者相互争夺统治权的故事；《西游记》是关于唐僧取经的传奇，陪同唐僧取经的有一个神通广大的猴子；而《金瓶梅》则是一个好色的商人与其妻妾的色情故事。

晚明白话文学的普遍流行，广泛地影响着文化的敏感性。知识男女都经常模仿小说角色的行为，按照他们期望的文学角色所应有的感情纯洁度来评判自己和他人。许多男女都很理想化，他们总是顽固而浪漫地比附于人、事或原因。张岱竟然主张，人不可与无惑者交友，因为这种人缺乏深情。在此环境下，妓女文化繁荣起来，晚明时期妓女的大量诗作被保存下来。晚明文人们津津乐道于名妓和著名文人如陈子龙、吴伟业、侯方域、钱谦益之间的往还。作家们怀着高度的热望和失望与妓女们交往，困境中的他们把自己视为可与那些有才却无助的女人们一样同病相怜，而妓女们则等待着那些欣赏她们的情人把自己拯救出那卑贱的境地。

哲学思潮

《牡丹亭》和妓女的传奇故事中体现出来的对情欲的肯定，与明代儒学思想的重要发展趋势有一定关系。在明朝前期，朱熹对儒学的集大成被国家和多数学者视为正统。但在明朝中期，王阳明（王守仁，1472年－1529年）对朱熹的宇宙观及自修过程的阐释提出挑战，由此开辟了一个广泛的思想争论的时代。

王阳明是个有点特别的官员，他18岁中进士，陆续担任过许多职务。有一次，他大胆地向皇帝上疏，对掌权宦官的腐败行径提出抗议，结果他遭到廷杖并被流放到偏远的贵州。就是在这次流放期间，他提出了关于道德直觉认知的思想，并突然向正统儒学发出了最有意义的挑战。

在朱熹的学说中，王阳明所反对的是他对道德准则的理解。朱熹认为道德准则，就是只要通过“格物”即对事件和事物进行仔细合理的研究，就可以理解和认识到的某种东西，认为一般要花费许多年去学习经典和其他的书的过程。但王阳明认为，道德的普遍原则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人们可以通过清除心中诸如物欲之类的蒙蔽，使与生俱来的良知再现这个做法来理解认识道德的普遍原则。他还认为，道德行为是认知发展的自然结果，真正的认知不是抽象的赋予理智的过程，而是与经验不可分的。人没有行过孝就不懂孝，没有经历过痛苦就不会懂得痛苦。人只有犯了错误，才能了解什么是正确，进而导致正确的行为，因为人是按照他所真正明白的原则来行事的。

由于他相信道德知识是人心中所固有的，对王阳明来说，这就意味着人人心中都有圣人的性质，并不是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做圣人。况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进行自修。有个官员告诉他，他忙于公务而无暇学习，王阳明则说，没有必要放弃工作，因为真实的学问可以在工作的各个方面觅得。王阳明希望人们多关注一下即使文盲也能明白的根本道德真理。他曾主张，真正的异端邪说不是佛道，而是普通人所不能理解的思想观念。

王阳明的思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在他死后的一个世纪里，王学后人把儒家思想引向许多新的方向，有些人转而对佛教和道教发生兴趣，而其他人则对传统的社会等级结构，如士大夫地位高于普通人提出质疑。王阳明的一个最热情的弟子王艮激烈地主张，人的社会地位并不限制道德完善的可能性。他对大群普通人做演讲，宣传他的幸福即消除私欲的理论。另一个鼓吹破除偶像的何心隐则宣称，

商人的社会地位应该高于农民，他批评家庭是一个封闭的、自私的、排他的体制。稍晚的李贽着力于对感情、情欲的哲学基础和本我进行反思，而这些都是与文学的发展趋势明确相关的。他对伪善的言行进行了激烈抨击，认为遵守传统的行为模式毫无价值可言。何心隐和李贽都四处树敌，最后都因传播危险思想而遭逮捕并死在监狱里。

地方社会

宋代即已明显存在打破地方社会隔绝状态的趋势，这一趋势在明代得到继续发展。不仅有像王艮这样的人向百姓鼓吹，而且市镇之间的距离也缩短了，乡村更加紧密地与全国市场体系连在一起。此外，像书院、宗族、香社、“乡约”这类非官方的地方性组织的数量大大增加，也为文化人和地方村民之间的接触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

从宋代起，宗族零星地和不均衡地被组织或复兴起来，父系原则、儒家对亲族关系稳定的尊崇、土地所有制经济，以及地方联盟的政治价值，都为族人结盟提供了刺激。鉴于强大的血缘群体可以提供有效的地方保障，因此社会动荡对这些行为的刺激就更为经常了。文化人的表现也一样，他们经常编纂家谱或修建宗祠。但血缘群体还是容易分裂，因为它们要求领导地位的连续以维持稳定性和族产。广义地说，宗族在南方更普遍，因为数百年前的移民经常定居在那些有大量无主荒地的地方，以便后代子孙留在附近，也便于附近族人的相互帮助。到12世纪，福建已存在实质性的宗族，而13世纪，浙江的某些地方也有这样的宗族。在安徽的徽州，宗族在明中叶十分发达，这无疑是当地许多富商家庭捐款支持的结果。在长江北岸的安徽桐城，宗族在明朝后期组织起来，但比起成功的官员来，这里商人的作用就不太大了，那些成功的官员会把族产和宗学纳入其家族生存和发展战略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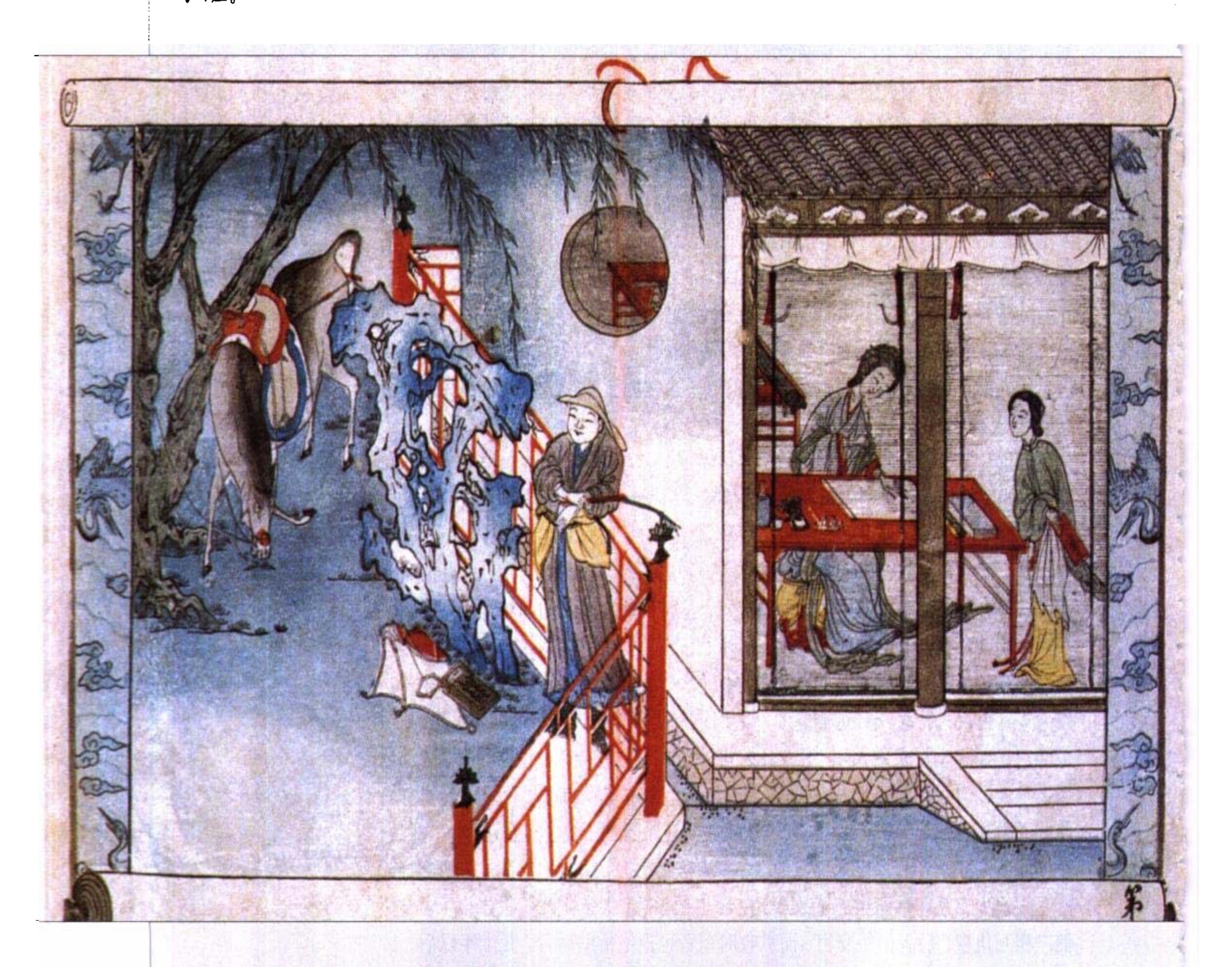
到明中期，全国某些地区的宗族制订出了很多详细的制度，来控制和规矩族众。比如在江西某地，宗族制订了一套族规，给族长极大权威以解决争端、强迫依顺。这一趋势出现在此时，表明它是受到社会上同时存在的更新“乡约”思想的影响，而乡约是宋代一些文化人倡导的一种地方联合体形式，目的是为了更新道德。乡约的成员得同意改正各自的缺点，及时为解决彼此的困难提供帮助，用开除来制裁不合作者。在明中期，王阳明又用了“约”这个字来指称他要建立的、作为他平定叛乱计划一部分的社会基层组织。他的弟子将此字用得更广，把“约”作为集合村民进行大众宣讲的基地，他们用口语力劝村民做出行善的承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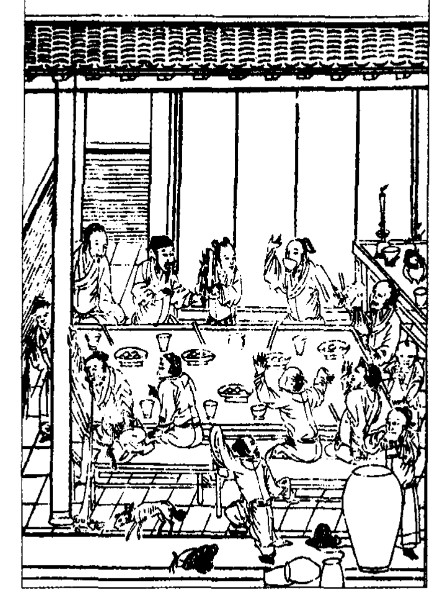
对于儒家学者来说，他们有充分的哲学理由努力进行这种道德教育，这就是如果圣人之道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每个人都有潜力对正确与谬误获得比较明白的理解，那么，就值得做出这样的努力，去达到这个目的。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自利性也促使儒家学者们进行这种努力。许多人认为，社会的道德构造日益恶化，贫富之间缺少相互尊重而增加了敌意。在16世纪中叶，大学士徐阶报告说，地主和佃户相互仇视，后者拒绝交租，而歉收时前者也拒绝帮助后者。几十年以后，吕坤观察到，当佃户向地主请求帮助的时候，地主却向佃户追求更大的利益。[7]因此

书籍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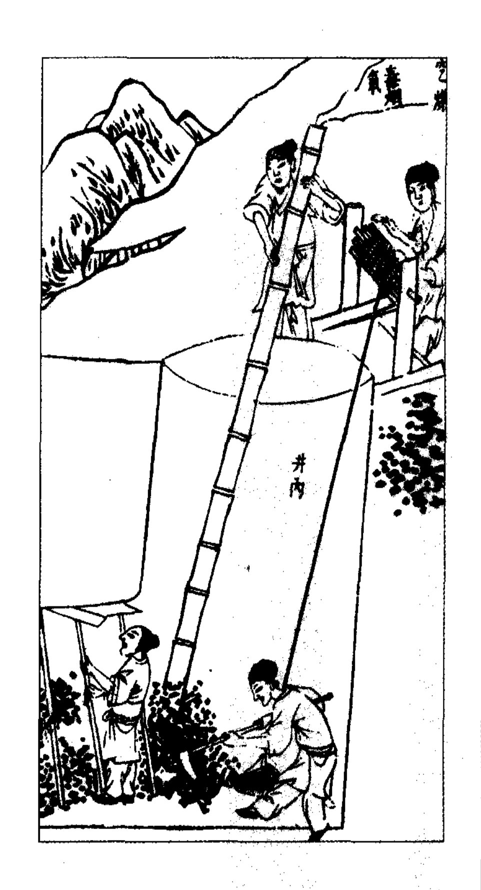
书籍插图艺术受益于明代刻书业的迅速发展，由于没有类似版权保护的东西，刻书家都相信别的刻书家也在卖同样的书籍。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上，为了使自己的书更具吸引力，书坊日益频繁地聘请艺术家画插图，先将它们刻在木版上，然后印在书的空余地方。由于书坊为这些插图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插图艺术进步神速。到17世纪，印出的书甚至偶尔有彩色插图。这样的彩色印刷非常昂贵，因为需要为每种颜色刻一块不同的版，而且在分着印出不同颜色的时候，还要把纸张和版非常仔细地对好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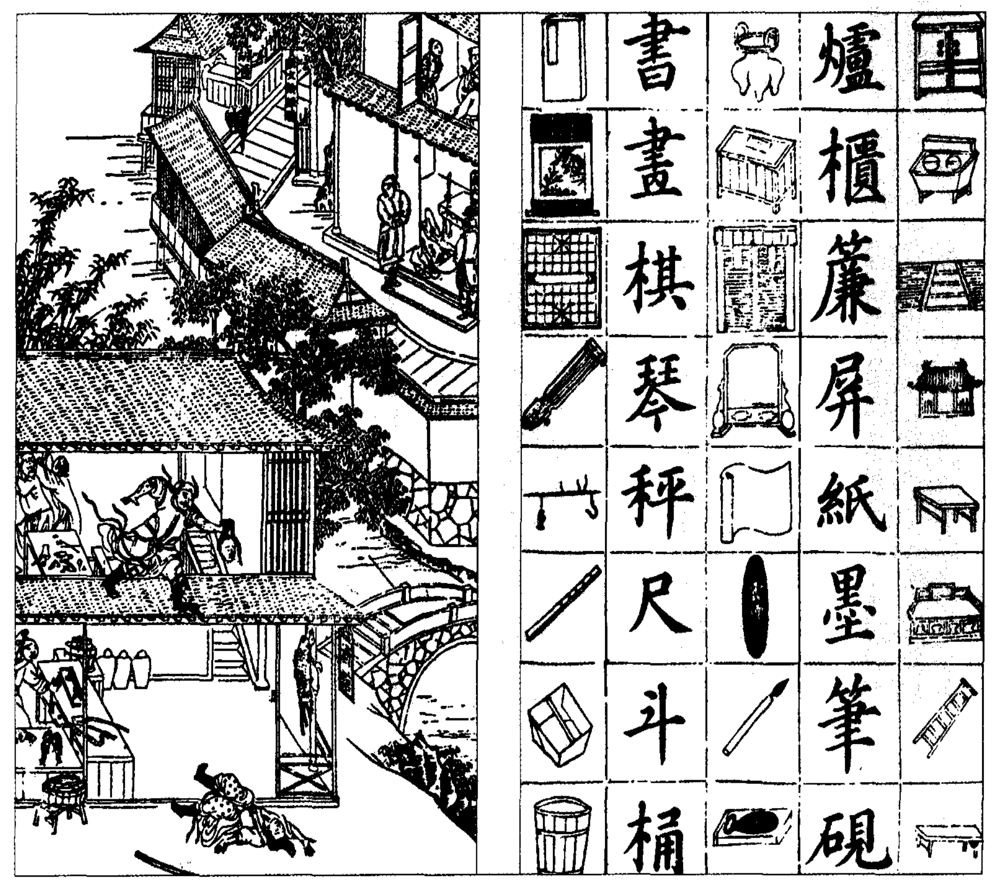
1640年版的《西厢记》中的插图，表现崔莺莺正在写让丫鬟带给张生的信，以其作为对他千方百计赢得她欢心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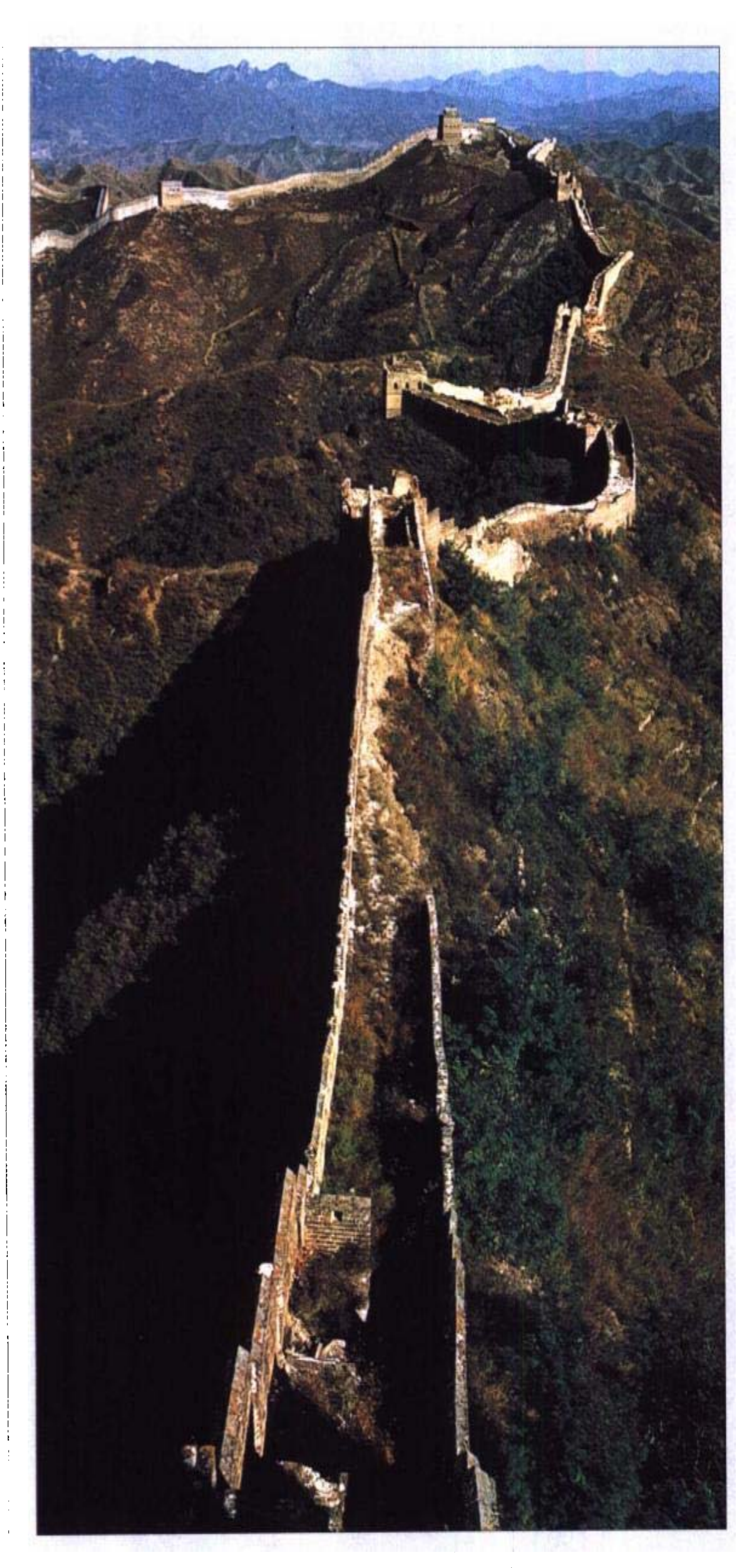


插图被用来吸引读者对各种书籍的兴趣。《本草纲目》是一部关于农业、医药、烹调及其它实用事务的手册，出版于1593年。为了使书生动，就有了描绘农家庆祝丰收场面的图画（上左图）。描绘采煤技术的图，取自1637年出版的《天工开物》（上右图）。这个犯罪场面取自流行小说《水浒传》的晚明版（下左图）。而那个有图的识字课本则取自一部16页的蒙学读本、1436年出版的《新编四体语汇》（下右图）





长城



在严密设防的这段城墙上的塔楼是用作烽火台的[1]，它可以在像蒙古人这样的流动性敌人到来时迅速报警。

在中国的历史古迹当中，没有比长城更有震撼力的了。它由砖石建筑，高和宽平均7.62米，西起今天甘肃省嘉峪关，最东端到北京附近的山海关，绵延6700公里。它是为抵御侵略者而修建的，点缀着一连串瞭望塔。首次见到它的欧洲人回去后都要写到它，称赞它的宏伟。17世纪的观察者菲迪南·弗比斯特记录道："把世界七大奇迹合在一起，也无法与之相比，在欧洲出版的关于它的所有传闻都与我所目睹的相距甚远。"[注] 20世纪的中国人熟悉了这些思想，把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意志的象征。

对历史的更仔细的解读揭示，正是明政府的围城心态造就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长城。从汉朝前后开始，历代政府一直从事于构筑防卫性的城墙，最有名的就是秦始皇，他那耗费巨大的建城举动被认为是祸害中国人的罪行之一。但后来的王朝并没有对其不断修缮以保持它的坚固，因为这些城墙甚至是最结实的部分，都没能有效地阻挡住袭击者和入侵者，它还没有别的防御战略更合算。由于明王朝没有发现更好的办法来防御蒙古人，于是重修了长城。在明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人们倾向于采取一种把军事进攻和控制性朝贡贸易结合起来以控制蒙古人的政策。但这种战略的效果有限，1449年蒙古人在土木堡战役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俘虏了明英宗。明朝廷干脆另立一位新皇帝，而不是在赎金问题上与蒙古人讨价还价。在如何对付蒙古人威胁的问题上，内部也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一些官员拒绝与蒙古人有任何的接触，另一些官员则把与蒙古人日益增加的贸易视为最佳解决办法。官员们之间的分歧持续数十年之久，一直阻碍着有效的决策，致使蒙古人进一步坐大。政府的财政状况使其不再能采取进攻行动，于是只好求助于重修长城。

[1] 实际上，城墙上的塔楼并非烽火台，烽火台设在长城边的沿线。——译者注

除了教诲之外，文化人们应转而做些实际的慈善工作，以缓和社会的紧张关系。例如，在16世纪末，有人建立了同善会，其成员按月交钱，组成基金，以支持修桥修路这样的社区工程，或向那些无力应付婚丧开支的家庭提供帮助。

乡约和宗族使文化人和普通人走到一起，弥补了双方的差异，使之能跨越阶级界限而共享观念、价值观、假设和参照系。在某种程度上，百姓在被某种东西约束着，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必然被别人利用或被推入损害其利益的境地。尤其是宗族对于普通族众有着真正的切身利益，因此所有成员都支持它。一个普通贫农能够从他所属的有影响的群体中得到很多；如果知道族人在后面给你撑腰，邻居就不会因为你的牛跑到他的田里而对你大动干戈。甚至因为增加了地方居民与士绅的接触，乡约也对本地居民有了实际意义。

与外部世界的关系

明朝的第二个世纪正是欧洲伟大的探险时代及其对外扩张的第一个阶段。但在明初，欧洲在亚洲还毫无势力，中国还可以按照传统的眼光审视外部世界。明初的皇帝无意回到宋代那种多国的政治格局，他们的目标是按照汉唐模式重申中国在东亚的中央地位。他们根据接受贡品和慷慨赏赐的中国皇帝在道德上的中心性质，重建了朝贡体制。明太祖禁止私人对外贸易，希望所有的贸易都在朝贡制度的框架下进行。第三代皇帝成祖派遣了一系列使团去访问那些潜在的朝贡国，其中最宏大的海外航行是在1405年到1433年间，率队者是他的忠仆之一、穆斯林宦官郑和。第一次远航时，巨大的船队集结了2.7万人，分乘62艘大船和225艘小船，其中最大的一艘长度达440英尺。前三次航行最远到达印度，第四次远达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后三次则到了非洲的东岸。与后来欧洲人在15世纪的航行不同，这些航行的主要动机不是贸易和探险，而是要把遥远的国度纳入明朝的朝贡体系之中。后来，官员们上奏皇帝指出此举太劳民伤财，远航才告停止。

在指导与小邦和远夷的关系方面，朝贡制度运转的趋势还是很好的，但北部边疆地区却很难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北部边疆是相互渗透的，汉人定居在蒙古地区，蒙古人（有许多在明军中当兵）也定居在汉地，甚至有些明朝驻军与对手进行秘密的交易和走私。在军事上，明朝政府也没有在此地区取得支配地位。1449年，皇帝愚蠢地率军向蒙古地区进发，结果自己被俘，许多朝臣被杀。一个世纪以后，明朝仍无法成功地抵御俺达汗的袭击，比如1542年，俺达汗在一个月中就俘获或杀死20万人，掠得100万头牛马，将数千间房屋焚为灰烬。由于这类事件的发生，在15、16世纪，明政府遂大量投资重修长城。

朝贡制度暗示着中国有一种家长式的义务——援助忠诚的诸侯国，明政府接受了这种义务，有时就得为此付出代价。1407年，明政府派军队到越南，以支持将要垮台的陈氏王朝。但形势迅速恶化，明企图彻底将其并入版图，只是因为面临广泛的武装反抗而作罢。明亡前，中国同样在朝鲜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战役（1592年－1598年），帮助朝鲜抵御丰臣秀吉指挥的日本军队的侵略。这些战斗是中国第一次参加的、步枪发挥重要作用的战斗，因为日本人已经使用了从葡萄牙仿制来的火绳枪。



沿海居民不得不经常自己驾船与侵扰他们的海盗作战。

尽管郑和的远航显示了水师的实力，但明代中国的海疆还是逐渐发生了与北部边疆几乎一样的防卫问题。到16世纪，官方封禁海上外贸之际正是由日本、葡萄牙、荷兰、中国的商人与探险家构成的东亚海上共同体兴起之时。比如，在理论上，与日本的官方关系被限定在浙江沿海的宁波港进行，与菲律宾的交往限于福州，与印度尼西亚的往来则限于广州。此外在贡使的频率和规模方面还有限制，比如日本使团每10年不得超过一次，共两艘船，每船不超过300人。但实际上，中国沿海的公开和秘密的贸易一直存在，特别是在官方封禁了他们对利益的追求时，商人常常转变为走私者。但满载货物的船只招来了海盗。在16世纪中叶，沿岸的中国和日本海盗变成一种灾难，从山东北部到广东西部，他们随心所欲地在沿岸劫掠。明朝反海盗的努力没有取得太大成功，后来不得不采取更强有力的军事措施，并放宽了对海上贸易的限制。在新政策下，葡萄牙人于1577年被允许在澳门建立贸易基地，欧洲势力渗入的时代由此开始了（第9章对此将作更全面的讨论）。

在海上贸易萌芽的过程中，中国出口的主要是丝绸和瓷器。丝绸中包括薄纱、绉绸、天鹅绒、平纹绉丝织品、缎子和织锦，既有缎匹，也有成衣。例如，一艘驶往新大陆上西班牙殖民地的明朝的大型帆船携带了五万余双长丝袜。反过来，中国从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进口了大量银子并经马尼拉运来。在这些商业冒险中，中国商人非常活跃，许多人还移居到菲律宾和婆罗洲等地，以取得新的商业机会。

除了对中国经济的刺激以外，海上贸易的扩展还带来了新事物和新观念。新大陆的植物如红薯、玉米和花生等进入中国，这些食品有利于人口的增长，因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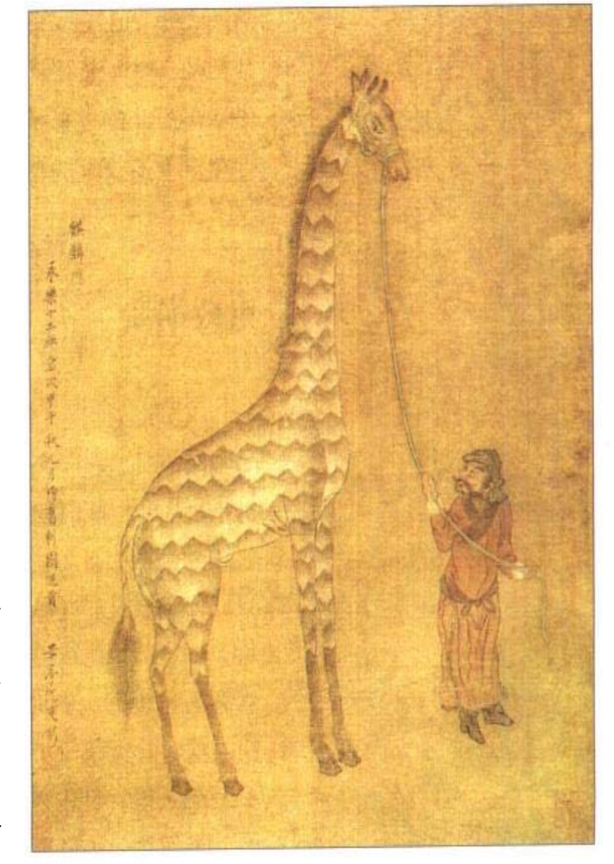
它们可以在以前的不毛之地像山地和沙质土壤上生长。欧洲的思想包括科学思想通过传教士渗入进来。对中国产生较大影响的头一个教士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他在1583年到达澳门。他的看法是，欧洲教士如果把自己表现为一个学问家而非僧侣，可能更容易被中国人接受。所以他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会了汉字和汉语，这些技巧使他在北京赢得了许多有影响的朋友。他自1601年就住在北京，直到1610年去世。在晚明的朝廷圈子里，利玛窦及其他耶稣会士被视为西儒，被视为在天文历法、数学、水利学和地理学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到明末，在大多数沿海省份甚至是内地，都有耶稣会士、多明我会士和方济各会士。尽管只有极个别的晚明士大夫对西方思想与知识感兴趣，但理解西方哲学、科学和宗教的障碍，就像千年之前理解印度佛教的障碍一样大。许多有教养的中国人完全敌示基督教，他们被传教士改变老百姓信仰的活动搞得方寸大乱，他们认为，传教士往百姓头脑中灌输的是粗野的、虚妄的思想。即使那些比较开放的中国人，也发现有些思想是难以忍受的，比如这样的教义：宇宙是由于造物主的行动而产生的。基督教的社会学说也受到抵制，许多学者不能接受这样的要求——皈依基督教必须出妾，认为这样的做法对于其妾及其子女来说，都太冷酷无情了。

党派之争与政治抗议

在明代，对儒学的讨论一般是围绕王阳明及其后人的哲学思想开展的，上述说法通常被看作是思想界对非儒学起源的思想、对非文人背景的人、对脾气古怪、不循规蹈矩的人日益开放的表现之一。在明代儒学中，还有在历史上很重要的另外一派，但它颇具政治性和批判性。在整个明朝，许多官员渗透着儒家忠君和尽职的观念，他们要根据原则说话，勇敢地反对昏官和有害的政策。1376年，太祖让人们对他的统治提出批评，叶伯巨遂上疏指责以小过而对官员治重罪，致使许多文人庆幸自己没有做官。太祖勃然大怒，把叶伯巨锁拿至京，使其饿死在狱中。几十年后，一些官员抗议成祖的篡位，在那些因此获罪的人中有知名学者方孝孺，因他而牵连致死的还有他的数百名亲朋好友、邻里学生。1519年，当武宗宣布到南方巡幸的计划后，官员们反对的奏章如雪片飞来，上百名官员跪在宫前

1405年—1433年间郑和下西洋时在非洲得到的一只长颈鹿，引起了朝廷上下的莫大的兴趣。它在禁苑中活了几年，宫廷画家沈度在1414年的画中描绘了它的形象，画上的文字把此兽说成是麒麟。在古代文献中，麒麟的出现被解释为天降祥瑞。



以示反对。皇帝深感侮辱，于是命令他们跪在那里达5天之久以示惩罚。此后，他还命人鞭笞他们，结果11人被打死。仅仅几年之后的1524年，数百名官员再次集聚宫门，这次是抗议新皇帝拒绝认已故皇帝为其养父，而称其已故生父为父。皇帝不能使群臣信服他对儒家家礼的解释，只好把134人投进监狱，其中16人受杖刑而死。

明朝最后一次大规模的抗议运动，既是一种信念的表达，也是一次党派斗争。它具有体制上的基础，此基础就是江苏无锡附近的东林书院和作为政府部门的都察院，那里的官员有权弹劾渎职和滥用权力的官员。在1604年书院重建后，它就成为失势官员们议论国事的中心。他们呼吁复兴正统的儒家伦理，拒绝王阳明和李贽那种过于自由的观点。比如顾宪成声称，那种自然地遵循天生的道德知识的观念，是那些无行文人贪婪追求个人利益的遮羞布。这些师长的热情，激励了都察院中那些激进的年轻御史，后者自我标榜正直，是"善类"、"清流"，并称其敌人为"小人"、"邪官"、"党人"。双方官员相互弹劾，频繁交替地指控和反指控。大臣的内争使皇帝感到厌烦。

斗争最具戏剧性的阶段是御史杨涟上疏谴责宦官魏忠贤的二十四条"大罪"。杨涟上疏的中心论点是，年仅18岁的青年皇帝把正当的权力让给了残酷而极富权力欲的宦官。尽管皇帝平淡地拒绝了这项指责，其他言官却频上奏章支持杨涟，公然蔑视朝廷禁止此举的警告。最终，杨涟和另外五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捕，群众夹道围观，为他们被押赴北京送行。所有这几人都被拷问致死。其它一轮轮的逮捕、拷打、死亡和抗议，很快又接踵而至。

在这样的抗议活动中，儒家官员是以道德原则为标准判断王朝弊病的。儒家传统把这些政治抗议活动赞美为英雄行为——有责任感的个人采取了反对滥用权力的立场。但这些行动也有负面作用。英雄主义和党派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清清楚楚的，因为官员中如此之多的斗争是为了谴责其敌人的性格和动机。由于是凭借结果而非动机来判断彼此的行为，明朝官员冒着生命危险去宣称其动机的纯洁性和对手道德上的卑鄙，这就使其难以理智地互相讨论，以便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财政崩溃

当明政府既无能力济贫，又无能力有效地对付起义者和侵略者时，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一些战争就在17世纪初期和中叶发生了。尽管16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了，但政府变得日益穷困潦倒，到17世纪初已接近破产。维持皇室的费用已经入不敷出。万历朝（1572年－1620年）时，有23000名宗室需要支取俸禄，仅此一项就花掉了山西与河南省的半数税收。军事战役是另一个无底洞，比如抗倭援朝之战，耗费了国库中的2600万两白银。明朝财政衰落的原因，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传统的王朝周期所致。在人口不断增长而官僚机构的效率日益降低的情况下，政府开支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加。由于农民渐渐失去土地，富裕的地主想方设法逃避交税，日久天长，税收也难以维持。政府缺乏税收，也就不能对自然灾害有效地做出反应，如17世纪初因"小冰期"带来的灾害，平均气温的下降，导致

历史记录上前所未有的湖水结冰，庄稼生长期缩短，从而导致歉收。1627年－1628年间，陕北的饥荒非常严重，逃跑和被开除的士兵很快就结帮成伙，蹂躏乡间。1632年，他们东赴山西和河北，向南则进入河南与安徽。官军对此无可奈何，而后者则吸收了更多的参加者。到1636年，出现了两个领袖李自成和张献忠。李自成以前是个牧羊人，也做过驿卒，他在北方极为重要；张献忠以前当过兵，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非常重要。二人虽都没有控制长江下游地区，但那里的情形也不甚妙。1639年加派税收，随后是水、旱、蝗灾和疫病流行，以至成群结队的乞丐成了司空见惯的景象。佃农起来反抗地主，城市手工业者暴动，当时的民歌就抱怨老天失职：

> 老天爷，你快点吧，你的耳聋啦，眼瞎啦，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 杀人放火的，你夸；吃斋念经的，饿煞。
> 塌了吧，老天爷！你如何高高在上？
> 你如何高高在上？下来吧！[十四]

到明末，部分的财政问题是前所未有的，原因在于白银的流通而非王朝的周期性突然停顿。1639年，日本当局拒绝让来自澳门的商人进入长崎开展贸易，切断了中国白银的一个来源。几个月以后，中国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贸易实际上也终止了，原因是中国人和西班牙人在马尼拉的紧张关系演变成流血事件，造成2万多华人死亡，这切断了中国白银的另一个来源。这些对中国国内经济的影响是迅速的通货紧缩，先是储藏剩余的白银，然后是储藏粮食，结果造成了人为的饥荒。拖欠赋税变得日益普遍，抗租也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可能正常收税，税收所得大大少于战争的开支。

随着反叛的蔓延和政府面临破产，明王朝的丧钟在不断敲响。1642年，一群反叛者掘开了黄河的堤坝，使数十万人在洪水和随之而来的饥荒中丧生。疫病、特别是天花也造成人口锐减——在这几十年间，中国人口减少了数千万人。好像社会被拆成了碎片一样，李自成占据了湖北、河南和陕西，1644年他又从山西、河北进入北京，明朝的末代皇帝在万般无奈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其时，张献忠进军四川，在他进攻重庆和成都时造成大量人口死亡。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宣布建立自己的王朝，建立自己的政府、科举制度和币制，但他们都未能迅速恢复井然有序的社会生活，到处都还是劫掠与暴力，难以吸引民众的信任，到头来还是一支来自长城外的军队恢复了社会秩序。

对明代的评价总是相当苛刻，因为从1126年北宋灭亡到1911年清朝灭亡，它是惟一一个汉族对全中国长期施行统治的时期，历史学家总是希望能把更多的成就或进步归之于它，或至少发现几个英雄人物。

但从传统儒家治国的方略来看，明政府未能做好一个中国国家所应做的事，即以最小的力量，管理天下之事。政府对蒙古、倭寇、宦官和税收问题都束手无策。但更糟的是，在明朝统治下，中国官僚君主制所固有的在专制权力和有序执行的规则之间、在绝对君主与其顾问和代表之间的张力，周而复始地达到了僵化的地步。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偶然有几个皇帝凭借完美的技巧使帝国

体制正常运转，使官员按照君主设定的标准行事，既不激怒他们，也不打击他们，更不让他们为所欲为。但明朝没有这样模范的皇帝。太祖因为未能使制度像他希望的那样运转而受挫，因而反回去全面使用他的专制权力。别的皇帝则把治国方面的琐事交给官员或宦官去代理，后果则又极端不同。有几个皇帝选择外出，拒绝让官僚集团控制他们，但他们自己也没有真正地控制局势。

如果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时绝对的标准是欧洲，而明王朝没有更好地做到这一点。这里暗含的责怪并不是说明政府太虚弱，而是说它已变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在真正的国际竞争开始出现的时候，它却拖了中国的技术创新和建立企业制度的后腿。准确地说，在西方海上诸国的船只进入亚洲时，中国却从海上撤退；正当欧洲人学习利用中国的技术进步如印刷术、火药和罗盘之时，中国却让它在科学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下滑，从而放弃了把握正在开始改变欧洲知识生活的科学进步的机会。

大概相对肯定地看待明朝的惟一方式，就是自下而上地观察它。皇帝的专断行为，贬低了显贵们的身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很少影响到那些自行其是的村民和市镇居民。中国的人口在增长，商业化的发展、印刷业的发展、精英们日益提高的领袖地位和对地方社区生活的干预，又都强化了民众之间的联系，给人们以更强烈的认同感。今天的云南和贵州这些西南地区，以从未真正有过的程度被纳入到中国的范围。政府不能控制一切，未必全是坏事。的确，相对而言，明政府在处理疆域问题上的成功的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两个多世纪以来，它在一个辽阔次大陆上的众多人口中维持了高度的和平，利用了像科举制度和《大诰》这样省钱的动员形式，使政府开支减少。这个成就，看来并不像在王朝崩溃时被用来对付非法现象的那些举措一样毫无意义。

景德镇瓷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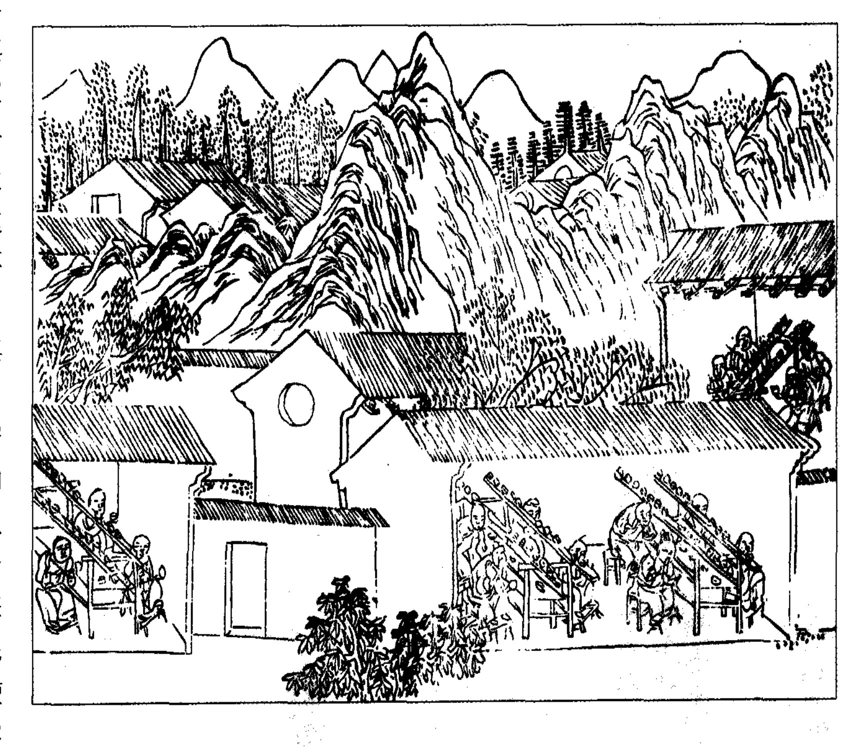
明朝留下来的人造物品中，没有比产于江西北部景德镇的精美瓷器更让人欣赏的了。在明代，这些瓷窑生产了大量瓷器，不仅足以供应全国，还能供应世界上的许多国家。

与其它陶瓷制品相比，瓷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白、滑、近乎透明。制作它需要特殊的瓷土和烧制温度（1280℃—1400℃或2336°F—2552°F）。在景德镇附近发现有特别纯粹的瓷土，那里也有取作燃料的山林和进行廉价水运的河流。

皇家的支持导致了景德镇优质瓷器生产的飞速发展，宫廷下令制作特殊的器件：1551年要了8400件小型瓷器和2300件大型瓷器；1577年是个高峰年，要了96500件小的、56600件大的，及21600件用于祭礼的瓷器。其中许多主要用于宫廷，其它的则作为礼物送人，如在诸王返回其"封地"时就送他们一些。皇家对产品质量的检查是非常严格的，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大堆大堆的宫瓷碎片。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瓷器在色彩、形制或设计上不合皇家标准，但因有皇家标记，不能拿到市场上去卖，只好将其全部打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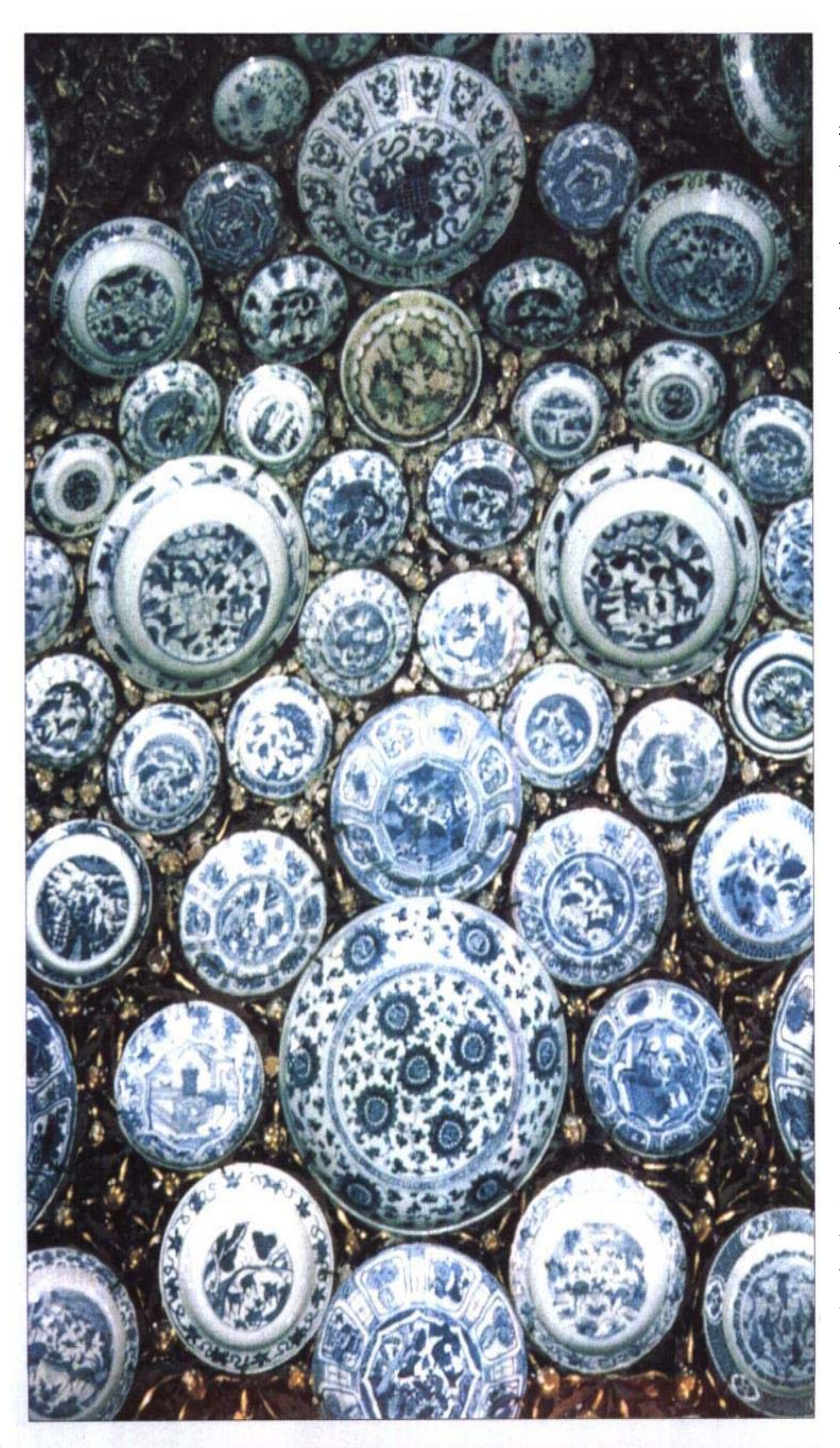
在明初，满足这些皇家需求，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些劳动力由世袭的匠户提供，没有报酬，但不交税。后来在官窑中干活的也有报酬了。但大批订货来时，许多工作需要转让给一些民窑去做。在民窑和官窑中，都使用集体生产技术。换句话说，窑工是看不到一个物品从调制瓷土到烧制和包装的全过程的，每个不同作坊负责不同的工序，工人迅速而反复在一连串物品上做单一的工作。例如，那些在上釉前画图案的人，需要在一个非常干净的地方工作，远离那些搬运湿瓷土或一点点砍凿干瓷土的人。18世纪初，一个法国传教士参观了瓷窑。他报道说，他看见一个杯子经过了十几道工序：一个工人在转轮上在几秒钟之内做它的初步造型，另一人将其固定，第三人把它放进一个模子里，确定它的大小统一，第四人则用凿子把它打磨光滑，等等。他报道说，总起来为生产这样一件东西，要牵涉70人之多。除了高技术工匠以外，在夏天的忙季还要雇佣数千技术水平低的工匠，他们都来自邻近各县。1601年，1万余工匠起来抗议太监增加宫瓷生产的要求；1604年，起事者又向控制此行业的窑商提出提高工资的要求。

景德镇生产的瓷器有很多造型和图案，但它更以它的蓝色底和彩釉装饰而著名。中国以外的日本、东南亚、西亚以至欧洲，对这些装饰精美的物品需求极大。这样，在17世纪，由于宫廷不得不把它的税收用于对付紧要大事，致使皇家订单减少，但制瓷业还是可以因满足外国市场的偏爱而未遭大的损失。日本对茶叶的热衷，导致对各种杯盘碗盏的巨大市场需求；欧洲人喜欢餐具，特别是在1604年以后，当两艘葡萄牙船只被荷兰人捕获，装载其



1743年，官窑监督唐英为一组说明瓷器生产步骤的画写了解释文字。这些画没留下来，但他的描述大多配在了稍晚的木刻画中。关于对一大组餐具进行装饰所进行的劳动分工，他描述说，"如果各件绘饰不尽相同，工序则无规则而易乱。因勾轮廓者不习着色，着色者不习勾轮廓；其手已获专门之技巧，其心则不移。为得保一致，勾轮廓者与着色者虽分工不同而同处一舍"。[13]

中的20多万件中国瓷器被投入市场，吸引来了欧洲各国的商人，包括法王亨利四世、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捷克）图斯察尼大公的代理商。在其后的两个世纪中，中国瓷器向欧洲的出口量巨大。1602–1682年间，荷兰的东印度公司进口了大约1200万件中国彩釉瓷器（不包括更常见的青花瓷）。到18世纪，欧洲商人经常委托绘制特别的图案，甚至送来瓷器样品让中国瓷窑为其仿制。



左图　在欧洲，中国瓷器用作餐具和摆设。这里所展示的是里斯本桑托斯宫中的"瓷室"之天花板。在17世纪末，那里覆盖着260件1500年以来的中国盘子和碗，说明从那时起葡萄牙国王就开始收集中国瓷器。

右页下图　景德镇产的瓷器上的漂亮装饰在图形和主题方面，表现了异乎寻常的创造性。这些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器物上绘制了包括龙、鸟、鱼、嬉耍的儿童等图画。

右图　在景德镇的瓷器上，常有描绘性的场景。这件器物上画的是李寡妇保持贞节的历史：一个男店主在店中捉了她的手，却不想让正在服丧的她和她的儿子在他的店中居住，于是她将被男店主摸过的手砍掉了。



第九章 满族与帝国主义：1644年至1900年的清朝

明亡后，新朝的建立者并非军阀，也非起义领袖，而是居住在中国东北部的山林与平原之上的满族首领。尽管全国各地的汉族精英与百姓决心抵抗满族统治，但没超过一代人，他们就与统治者合作了。有三位满族人物统治了18世纪——康熙、雍正和乾隆——证明他们是不错的管理者，通过许多举措，使这一世纪成为传统中国文明的高峰。但在19世纪，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落千丈，到这个世纪末，中国被外国嘲笑为病夫，它的巨大变成包袱，它的政体形式似乎不幸地被证明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1840年－1842年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尽管被英国打败了，但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或被瓜分。不过，西方列强作为政治组织也好，作为文明也好，对中国造成的威胁态势变得日益严重——西方商人大量倾销工业品与中国的工业竞争，传教士在乡村与中国文人争夺道德和宗教的领袖地位，西方的陆军和海军则被反复证明强大于中国军队。由此，人们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应该从这些外国侵略者身上学习些什么？

满族的统治

满人不是蒙古人那样的骑马民族。蒙古人住在开阔的干旷草原上，几乎长年作战，以保护和扩大他们的牧群，而满人则住在蒙古以东、长城东端之东北的满洲中部（黑龙江和吉林省），以渔猎和农业为生。他们相信自己是女真人的后裔，而后者曾与南宋同时、以金朝为名统治过中国的华北。在明代，几个不同的满族部落集团加入了明朝的朝贡体系。许多满人向南迁居，住在辽东半岛上。他们在那里混杂于汉族村民和市镇居民之间，有些充当明军的士兵，其他人则是农夫或贩卖毛皮、马匹及其它货物的商人。

满族政权是努尔哈赤（1559年－1626年）历经三十多年的时间建立起来的。他统治下的全体人口被纳入4个军事单位，每个单位以不同颜色的旗帜加以识别，最后，满洲“旗”的数量达到8个。此外，另建了8个蒙军旗和8个汉军旗。满文的创制（基于蒙文字）有助于满族从部落向官僚组织转化，而把明朝法典和基本汉籍翻译成满文，则有助于它进一步按汉人的经验进行行政实践。1616年，明朝的状况恶化，努尔哈赤终止了对明的效忠。两年后，他攻下了明在辽东的领土。他答应给那些投降的明朝的文官武将在其朝中任职的机会，但他没有给那些军队中的工匠——特别是那些懂得制造大炮的人，及那些被迫为军队生产粮食的农民以选择的机会。在他征服地区的所有人，都必须按满族习俗剃发，即要把前额部分的头发剃光，其余头发则梳成一条大辫子。当辽东的汉人于1622年造反并在1625年再起时，满人便杀了许多被怀疑为煽动不满情绪的文人，并制定了更严格的满汉隔离政策。自此以后，满人被要求待在自己的驻地，随时携带武器，尽管汉人拥有武器已被宣布为非法。

努尔哈赤的继承人、其第八子皇太极（1626年－1643年在位）在采用汉制和



维护黄河堤坝要求周期性地征发徭役。视察护黄工程也给康熙皇帝的数次南巡提供了借口。

更多地使用汉人官员方面走得更远。明朝将领开始率部背叛，蒙古人也大量加入到满族政权阵营里来。经过10年成功的扩张，皇太极宣布建立清（“纯洁”）朝，明确提出了对全中国的统治权。

清朝把中国的版图扩展到了最大、那些主要是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是高度自治的。对于清政府来说，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里镇压反叛是很吃力的，特别是在19世纪反叛此伏彼起时。

满族与汉族反叛者如李自成相比，其重要优势在于他们有能力在明政府与明军鞭长莫及的长城以外建立国家结构。到满族跨越长城、逐鹿中原的时候，他们已比中国的任何敌手有了更为强大的军事机器和行政机器。1644年明帝在北京自杀，李自成军洗劫了京城，与李自成相比，满人似乎更有希望重新恢复社会秩序，至少对于吴三桂来说是这样的，当时吴氏正负责防守长城最东的关口要塞。满人在吴三桂和其他明朝将领的协助下，击败了造反者，镇压了华北的民变。明朝将领们曾希望满族扮演的是古来就有的蛮夷勤王的角色，但满人却迅速表示他们要建立自己的统治。在北京，他们迫使汉人移往南城，驱除了大部分宦官，把原来由宦官做的许多差事，交给在辽东时沦为奴婢的汉人去做。像他们之前的蒙古人



一样，满人没收了北方的大量耕地，以支持其庞大的军队，其中有些是明朝的皇家庄园，但多数是汉人的私有土地。这些土地有的被分配给满洲贵族和皇族，其余的则作为补给来源分给八旗军队。所有人，无论其爵位和地位如何，都要以头发的样式来表示降顺：1645年，清政府宣布10天内不剃头留辫者即处死刑。这个剃发令可以使统治者一眼便能分辨出谁是顺民，而谁是抵抗分子。汉人因此而感到耻辱，多数人走上抵抗的道路。

不久，汉人反抗的目标集中于把清军阻挡在长江以北，但南明朝廷没有北京的朝廷更有能力。满人向南方士绅允诺和平与稳定，并要挟要像在扬州的屠杀那样对付抵抗者，清军在扬州曾屠杀了数千名抵抗者和平民。但即使有像吴三桂那样的前明将领的协助，满洲人仍花了15年时间才平定了南方。最后，1662年，吴三桂在缅甸抓获了南明君主。此外，吴三桂还在1673年发动了一次企图把清统治者驱逐出去的反叛。但作为一个投降清朝的明朝将军他未能获得明朝遗民的全部支持，经过几年的浴血奋战，最终被镇压，满族对中国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康熙、雍正和乾隆

从1669年康熙（1662年－1722年在位）15岁亲政[①]，到1799年乾隆（1736年－1795年在位）辞世，中国只有3个皇帝在位。在欧洲人看来，这一时期中国的稳定大概是由于康熙和他的孙子乾隆格外长寿，他们二人各统治了至少60年。但按明朝的标准，所有这三人都是英主，都努力以统治艺术工作，努力对专制权力的行使进行调节，采取了常规的、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日常的增赋、吏治和社会安定的问题。在他们统治期间，满族通过恢复社会秩序、重新肯定士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等措施，把汉族士绅争取了过来。看看这些皇帝的成就，人们可以认为，只是由于引进了新的领导层，这个领导层也是按照汉人的政府形式进行运作，但能实施较严格的管束并能废除掉那些不起作用的部分，中国的政治体制就从明朝的危机中解脱出来了。这些统治者不是汉族，这就使他们更容易打破长期存在的却常常瘫痪的宫廷政治的模式。

这三位满族统治者都把自己表现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同时又是满族的军事领袖。康熙是个活跃人物，喜好打猎，巡游地方（表面上是去视察护河工程）。清朝沿着它同俄罗斯、蒙古和西藏边界的军事扩张，使康熙兴奋不已。他资助汉族文人，努力吸纳杰出的学者加入政府。但他也注意满洲旗人对朝廷的控制，六部既有汉尚书，也有满尚书，半数大学士是满人，省级官员一般是汉人，但地位较高的总督则由满人充任。

康熙不仅对汉族文人文化很熟悉，而且对西洋数学、科学和机械设计也很有兴趣。他在宫廷中对耶稣会士殷勤招待，在证明他们的预见比中国人的计算更准确以后，他任命他们做钦天监的指导。1692年，他发布上谕，只要皈依后还依旧祭祖，便容忍基督教，这个立场与利玛窦的看法一致，后者认为祭祖是一种纪念，而不是一种崇拜。但在梵蒂冈派来使节迈拉尔·德·图尔农之后，他改变了立场。后者曾几次谒见康熙，反对允许中国教徒祭祖，并和天主教其他牧师一起反对耶稣会的其它指令。此外，德·图尔农还坚持确立教廷对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的权

①康熙亲政是在康熙六年即1667年，时年仅14岁；1669年正式清除了鳌拜集团，真正掌握了权力。——译者注



上图 满族人把自己的形象刻画为强悍的武士。乾隆皇帝的100名侍卫像中，包括这幅绘于1760年的挂轴帛画，它装点着举行国宴的大殿。

威，此权威由教廷驻扎北京的使节行使。但康熙的回应是驱逐那些不支持他态度的传教士。

康熙的继承人雍正（1722年-1736年在位）在继承皇位时已经45岁了。他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能够控制满洲贵族的军事力量和加强对文官集团的中央集权。他特别致力于使财政处于健康的状态，废除了承自明代的税费征收办法，代之以新办法。另一个朝向统一和理性化的步骤是他下令取消贱籍，使各地贱民合法地得到解放。

乾隆是雍正的第四子，得益于他父亲的财政改革，在他长时期的统治过程中，政府财政不断有大量赢余。乾隆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使人相信他将是历史上的圣明天子和满汉理想的英主方面。从早至晚他都在处理政务，然后他读书作画或写字。他多次展示其对母亲的孝心，天天省视，注意她是否开心。他虽不是一个出色的诗人，但还是以个人名义创作了42000多首诗，并在皇宫收藏的数百幅书画杰作上题写自己的诗。他也注意保持对满族文化的认同，不断资助标榜满族历史文化的项目，比如编纂字典、史书和族谱。

但乾隆的统治也有阴暗面，任何反满的迹象都会招致他迅速有力的镇压。1768年，他听有谣传说巫师通过剪辫梢来"盗魂"，便立刻怀疑这是煽动性的阴谋，为找到越来越多的证据，他命令官员审讯拷打甚至指称数省民众是这一莫须有阴谋的同犯。几年后，乾隆大搞文字狱，为编纂《四库全书》搜集的数以千计的图书，均遭到严格检查，凡涉及满族或前代外族征服者的微小之处均被删除，所有禁书均被销毁。这次禁毁进行得如此彻底，以至至少有2000种以上的古书从此失传。

乾隆65岁时，政治判断力已开始不敏锐了，他信任一个25岁的漂亮机敏的侍卫和珅，很快就把他提升到一般是由最资深的官员担任的职位，如户部和吏部的尚书。臣僚们开始怀疑他年纪太大，因为他毫不阻止和珅的贪污腐化。乾隆之死结束了和珅弄权，继立的皇帝赐和珅死罪，其被查抄的家产估计有白银8亿两之多①。

版图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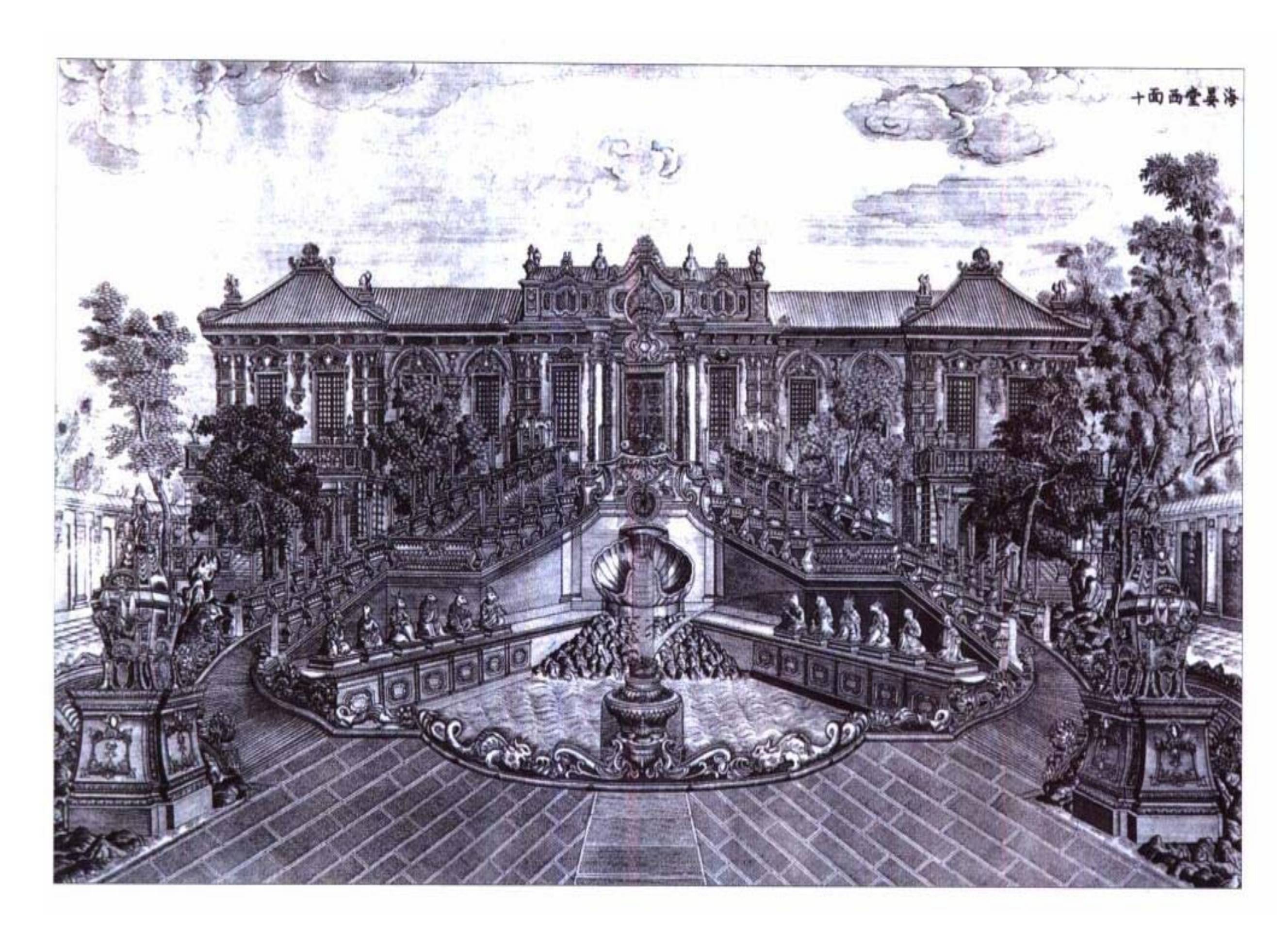
右页图 乾隆是一个很讲排场的人，他6次南巡就花了2000万两白银（1751年、1757年、1762年、1765年、1780年和1784年）。对于许多臣民来说，他的南巡是可以看到皇家周围绚丽光环的一个难得的机会。本图选自宫廷画家徐扬所绘由26部分组成的一幅彩绘手卷。它长500英尺，是为了纪念乾隆在1751年对河北、山东、江苏和浙江进行的长达4个月的巡视而作。

正是在康熙、雍正和乾隆统治的一个半世纪里，大中国——今天中国所辖多民族的疆域——固定了下来。台湾、中国的中亚部分、蒙古和西藏都内附于中国，形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

台湾主岛归附于1683年，那里的土著民族所用的语言与印度尼西亚很南端的语言有关。自从17世纪初，台湾就吸引了葡萄牙和荷兰的商人，到17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这里又吸引着明朝遗民。1662年，承接了复明大业的海盗兼商人郑成功（西方人称之为国姓爷）进攻台湾，并驱逐了荷兰人。在以后的20年间，台湾在其子孙统治下，有10万以上的大陆人移居此地，创造了一个急速发展的边陲社区。最后，清政府派出军队打败了这些力量，将台湾划为福建省的一个府。

①有学者考证这个数字有过分夸大之嫌。——译者注





乾隆皇帝很欣赏西洋绘画和钟表。他决定也考验一下欧洲建筑，于是便让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1688年－1768年）为他设计一个新的夏宫。乾隆把新的宫殿用来存放他越来越多的欧洲收藏品，并在1783年让人制作了一套园内建筑和景观的铜版画，这里表现的就是其中一张。1860年，此园被英法联军所烧，但其废墟至今还向游人开放。

由于满族对蒙古的征服，中国腹地的领土也增加了。清军装备了大炮和其它现代武器，对用弓箭武装起来的游牧民具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使他们能够方便而有效地统治大草原，结束了2000年之久的北疆防御问题。17世纪30年代，清朝征服了东蒙古，1696年，又使西蒙古（准噶尔）归顺。但这些准噶尔蒙古依旧控制着现新疆的伊斯兰城市，并试图把疆域扩大到西藏。1717年，准噶尔开始入侵西藏。于是，清政府也进军西藏，并于1720年攻占拉萨。西藏遂成为清政府的保护地，清军永久性地驻扎在那里。此前西藏（像朝鲜和其它邻国一样）也勉强接受一种朝贡地位，但没有中国的军队和总督驻扎在那里。不过清政府对西藏事务也不太干预，多数情况下允许其地方领袖进行实际统治。

中国的中亚部分（今新疆）在汉唐时期就有中国军队驻扎，但宋明时期没有。清军在18世纪50年代的一连串战役中击败了准噶尔蒙古和维吾尔人后，统治了这一地区。像在西藏一样，在这些大部分是穆斯林居民的地区，清政府很少直接统治，也承认当地的饮食习俗，允许不留长辫。清朝向中亚的扩展使中国与俄国有了接触，因为后者的势力同样伸入到这一地区。对于中国人来说，俄国人是另一个中亚联邦，需要谨慎相处，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北部和西部也建立了许多强大的国家。因此，与俄国在1689年和1728年签订的条约，就不理那些朝贡体系的约定了，此点在第8章中已经有过讨论。

19世纪，俄国人不断获得更多的中国的中亚领土。在1865年－1868年间，夺走了撒马尔罕、塔什干和布哈拉，这引起了英国人的恐惧，害怕俄国会威胁它在印度的利益。一时间，似乎中国有失去它在这一地区主权的危险。1870年，当地领袖阿古柏在喀什噶尔宣布建立独立的国家，并得到英国支持；1871年，俄国

人夺取了伊犁河谷。但中国人最终重新获得了在这一地区的军事统治权，这主要是因为俄国和英国都感到，它们的扩张所造成的相互之间的威胁比中国的还要大。1884年，这一地区被清政府确定为中国的一个省，称作“新疆”。

文化与社会

在清朝统治时期，中国文化趋向保守，这一复杂的现象有着哲学的、政治的、社会的甚至可能是经济上的根源。晚明社会秩序的崩解和满族征服似乎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在晚明出现的更为开放和更具流动性的社会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由于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资源的增长（不仅是在农民的层次上，而且也在文化精英的层次上，因为科举的名额是固定的），社会变得更具竞争性。那些感到其地位受到危害的人，就倾向于采取强硬措施迫使民众接受那些旧的、以等级结构为核心的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这种向保守转向的推动力来自中国社会的内部，但满族统治者并不反对这一点，因为他们自身也倾向于塑造一种更富训诫性的社会风貌，很乐于看到人们把明朝谴责为一个衰世或认为没有它世界将会更美好。

这个保守的转变以许多方式得到证明。针对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如同性恋的法律变得更严酷了。许多文人转而反对戏曲小说，认为它们具有社会颠覆性，

清代旌表节妇的牌坊在全国比比皆是，本图展示的是某些至今还矗立在安徽歙县的贞节牌坊。



红楼梦

中国传统小说中的最伟大杰作是由曹雪芹(1715年－1764年)构思，并撰写主要部分的120回的《红楼梦》。作为文学著作，这部小说适合各个阶层的读者阅读：它可以看作是有关宗教启蒙和宗教皈依主题的一个神秘故事，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心理描写的自传性小说，还可以看作是记述18世纪中国上层社会和满族社会生活习惯的风俗小说。

曹雪芹出身于一个汉人家庭，在17世纪做了满人包衣之后获得了极大的权力和财富，但到18世纪却失宠，经济上也破了产。《红楼梦》描绘了世受皇恩、比较富裕的贾家生活的重要细节，主角是三个青年亲戚：贾宝玉和他的两个表妹：病弱的林黛玉和能干愉悦的薛宝钗，后两人都住在贾家。在一段田园牧歌式的时期，他们三人住在一个富丽堂皇的园子里，以诗文相娱。但当宝玉被骗娶了宝钗、而黛玉闻知此讯死去以后，这个时期便结束了。小说的结尾说宝玉按他父亲的希望在科举中高中，然后又离开了新婚的妻子和破碎的家庭，出家为僧。

《红楼梦》1791年首次印行以来，便以其丰富的情节和来自生活各个角落的小角色吸引着读者。政治生活的丑恶一面则通过司法败坏的例子得到刻画。而家庭政治的诡计通过几件家庭成员争风吃醋的事情，得到生动的揭示。《红楼梦》特别因其对女性角色的情感描写而大受喝彩，她们不仅是两个女主角，还有宝玉的祖母、母亲、姐妹、嫂子及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许多丫头。

下面是才华横溢而又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独自在花园里的情节：

这里林黛玉见宝玉去了，又听见众姊妹也不在房，自己闷闷的，正欲回房，刚走到梨香院墙角上，只见墙内笛韵悠扬，歌声婉转。林黛玉便知是那十二个女孩子演习戏文呢。只是林黛玉素习不大喜看戏文，便不留心，只管往前走。偶然两句吹到耳内，明





明白白，一字不落，唱道是："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林黛玉听了，倒也十分感慨缠绵，便止住步侧耳细听，又听唱道是："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听了这两句，不觉点头自叹，心下自思道："原来戏上也有好文章。可惜世人只知看戏，未必能领略这其中的趣味。"想毕，又后悔不该胡想，耽误了听曲子。又侧耳时，只听唱道："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林黛玉听了这两句，不觉心动神摇。又听道："你在幽闺自怜"等句，益发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便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细嚼"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忽又想起前日见古人诗中有"水流花谢两无情"之句，词中有"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之句，又兼方才所见《西厢记》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之句，都一时想起来，凑聚在一处。仔细忖度，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正没个开交，忽觉背上击了一下……[十六]



《红楼梦》塑造了一种理想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即善解人意、聪慧的心灵和文弱的模样。这些《红楼梦》人物画为女画家徐芑（生于1810年）所作。



画家朱耷（亦称八大山人，约1616年－1705年）是明宗室，他拒绝与清合作，发展了一种具有高度表现力的绘画风格，运用了大量稀疏而湿润的笔触。本页插图取自1694年他为朋友画的一本22张的画册。画上题道："竟作一日谈，胸怀若雄雌。黄金并白日，都负五坊儿。"

太放肆了。官方频发命令，禁止创作小说戏曲并让戏院关门。很有名的钱大昕竟然谴责本国的小说是儒学正统的主要威胁。对妇女贞节的关注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有案可稽的、其拒绝再嫁之节妇的数量令人惊愕地上升，订了婚的少女即使其未婚夫在与他见面之前就死了，她也将作为"寡妇"度过余生。比如说，江南某府的地方志中记录的节妇，宋代有4人，明代有95人，在清代中叶则达到203人。为节妇建造旌表牌坊的活动已经失去控制，以至1827年政府不得不下令只能修建集体的牌坊。1843年，又规定只有那些走极端自杀的寡妇才应以牌坊旌表。文人竞相关注女人在家庭和社区中的美德，而且也采取实际措施鼓励寡妇守节，比如为那些贫穷的寡妇建立公室（男子是严格限制去那里的）。

这些严格苛刻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行为，与思想界的发展趋势有关。许多儒家学者总结说，明亡是道德松弛的结果。他们认为，王阳明及其信徒由于倡导自发性道德和情感，破坏了对责任的承诺；又因为文人放弃了指导伦理的责任，所以百姓失去了对权威的尊敬。这些学者重申朱熹的学说，强调存在于个人之外的客

观标准，认为这是对付道德松弛的办法。

随着清朝社会的发展，对规范和确定性的寻求使某些学者转而注意起那些早而又早的文献。许多儒生转向汉代的注本，认为这些文献能使他们对经典的理解免受佛教和道教思想的污染。有些人则全神贯注于对古代文献的文本分析，试图区分哪些是真正的古代文献，哪些是后来的添加。比如阎若璩编了一部四书地名的索引，以此证明古文《尚书》是伪造的。这样的“证据”研究，要求进入大藏书楼，因此这项研究成为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学者的专长，因为这里重视书院和私人藏书楼的建设。即使在艺术世界里，重新获得和收藏过去的佳作也成为大画家和大书法家最关心的事，收集碑拓也成为热门，为此清代学者辛勤复制了汉代碑拓上的书法。

清代文化变得全面保守并未阻滞许多杰出个人的创造性发明。在明清鼎革之际，一些最敏锐的心灵仍为中国的危机寻找体制基础。一位很投入的明朝遗民黄宗羲重新考虑了政治秩序的许多基本原则，得出结论说，有些问题是小的，像对宦官的监督不够等，但更多的都是大问题，像皇帝的权力太大。同样敏锐的还有顾炎武对问题的政治分析和历史分析，顾氏遍历华北，对诸如金融业、矿业和农业等经济问题进行过调查和研究。即使是那些非常保守的文人圈子里的人，也以个人的身份向非传统观念开放，比如18世纪的诗人袁枚与当时的大古典学者和文献学者有共同语言，但仍情愿冒被责难的危险，收学他作诗的女学生。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说明，中华文明的成长不是非常刚性的，因为创造性的成长是世界文学杰作之一、小说《红楼梦》于18世纪末的出现。

也许正是在告别传统的、甚至是培养怪癖的绘画世界里，才存在着最大的繁荣空间。在明清易代之际，均为明远房宗室的朱耷和石涛都以佛僧的面目了其一生，以避免与新朝发生关系。在满人夺取了皇位之后，朱耷决心不再说话，他的有关鸟、鱼、岩石、山峰的画，给人一种疯狂的感觉，另外他还把创作能量明显地传送给那些在他游历全国时与他相遇的人。石涛好交际，但在他的画中并不缺少表现力。在18世纪，石涛的风格激励了许多最好的个人主义画家，这些人通常被称之为“扬州八怪”。

海上贸易及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8世纪，当世界力量的平衡慢慢移动时，没有任何中国人给予足够的关注。直到1700年，中国的物质文化还是无与伦比的，中国的物质生活还是世界上最好的。从东方流向西方的各种发明要比从西方流向东方的更为常见。但到了19世纪，中国人发现它在物质资源和技术资源方面已被西方国家超过。自从晚明以来，欧洲人一直到华南各港进行贸易。16世纪，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曾是来中国的主要的欧洲商人，到17世纪他们被荷兰人取代了，到18世纪则是英国人取代了荷兰人。在18世纪，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被政府认可的垄断机构所把持，英国方面是一家合股公司东印度公司，中国一方则是广州的官方商业行会十三行，而广州是1759年后允许欧洲人进行贸易的惟一城市。为了避免外国人在此城市中扰乱中国社会，他们得居住在一个特定的城区，停留的时间取决于生意的要



18世纪，欧洲风格的建筑开始出现在广州的一个严格限制的区里，外商获准在那里装卸船上的货物。

求。在他们的“工厂”（办公室和货仓）中停留几星期之后，欧洲人就要去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有些人永久定居在那里，另一些人则等待风向的变化，以便返航印度或者欧洲。

欧洲对中国丝绸与瓷器的需求量依旧很大，同时又发展起了对茶叶的新需求。在整个18世纪中，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从1684年的5箱增至1720年的40万磅，到1800年则又增长50倍，达到2300万磅。到此时，英国从中国购买的茶叶是中国出售茶叶的大约七分之一，而茶叶进口税则占到英国税收的十分之一。流入中国的白银从18世纪60年代的每年300万两，增至18世纪80年代的每年1600万两。

与此同时，欧洲人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评估逐渐降低。17世纪耶稣会士寄回赞美中国法律和风俗的报告，无疑强调了积极的一面，以鼓励对其传教事业的经济支持。后来伏尔泰从他们的作品中取材，把中国描绘为一个基于伦理而非宗教、因此免于教会统治的引人注目的文明。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别的欧洲人，包括哲学家孟德斯鸠、卢梭和黑格尔都把中国描述成次欧洲一等的国家，认为中国的价值标准既非自由也非进步。显然，他们是把中国的古代性与欧洲的近代性作了比较之后，得出上述看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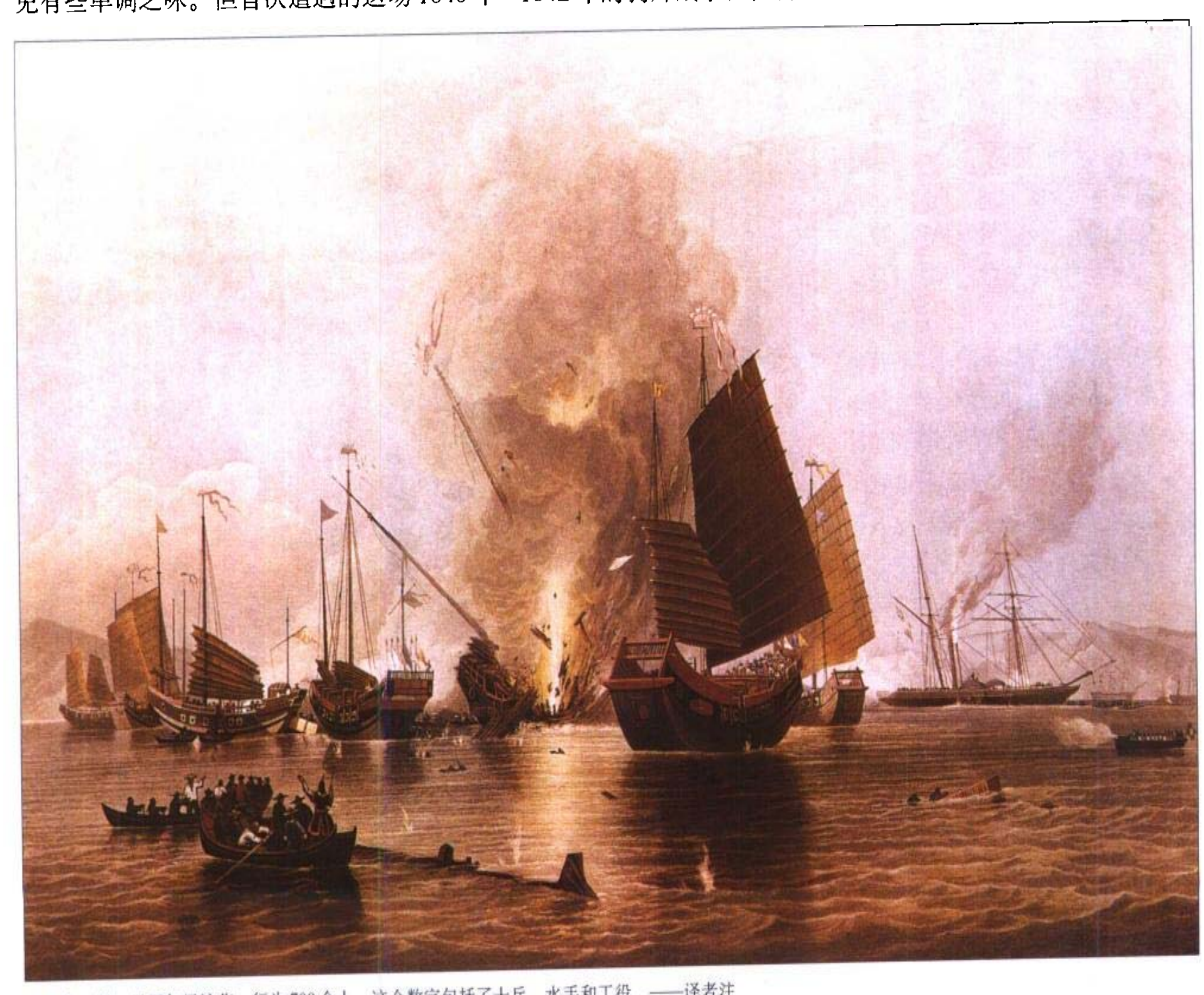
欧洲人这种对华态度上的变化与英国作为头号强国的同时出现，促使英国商人和英国政府要求对华贸易方式的改变。为了增加利润和保持进出口平衡，英国人希望他们的货物在中国打开市场，通过在靠近茶叶产地的长江流域各省进行贸

易，降低买茶的费用。他们还希望中国放弃朝贡贸易，通过特使、大使、商约和已经印行发布的关税率处理与他国的关系，采用欧洲各国之间处理相互关系的方式。1793年，著名的马戛尔尼勋爵、英王的表兄弟、前任驻俄大使和马德拉斯总督，被派来谒见乾隆，负责向这个目标努力。他带了84名随行人员①，包括科学家、音乐家、艺术家和汉语教师，还有600件行李，装着科学仪器、地毯、羊毛、刀子、盘子、杯子和别的礼物，意欲吸引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兴趣。由于马戛尔尼拒绝行跪拜之礼（一种正式的俯首礼，要跪在地上，以前额触地），而在接见问题上遇到了麻烦，但最后他还是被允许在热河避暑山庄谒见乾隆。马戛尔尼对中国人的评价比乾隆对英国人的评价要准确。马戛尔尼的报告说，中国人根本没有准备与欧洲列强打仗，因为它到处充斥着贫穷，文人对物质进步兴趣索然，士兵还在使用弓箭。乾隆看不到英国要求在北京建立永久性公使对他有什么好处，只注意到若同意了英国的要求，欧洲许多国家会跟着要求设立同样的公使，此外，即使政府从海外贸易中获得重要的税收，乾隆也不认为对外贸易真有什么用处。他在给英王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㉗

鸦片与鸦片战争

如果把中国与西方列强在19世纪的军事遭遇和中国赔款的结果尽述一遍，未免有些单调乏味。但首次遭遇的这场1840年－1842年的鸦片战争，值得我们重

英国人得意洋洋地纪念鸦片战争的胜利。在此版画中，中国的木船被一艘可用帆或蒸汽推动的明轮铁舰尼米西斯号击毁。



①另有一说，马戛尔尼访华一行为700余人，这个数字包括了士兵、水手和工役。——译者注

述，因为它为后来的战争定下了调子，而且逐渐给中国带来了重大的象征意义。在中国人的眼里，一直没有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国际上的以强凌弱和把不同的道德取向强加给那些试图做正义事业的人。这种道德尺度反过来使中国人很难看清自己应从西方文明中吸收什么。

英国作为一个海军强国的兴起有赖于外贸，这大概使它与中国的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不愿意按照欧洲模式组织贸易，而英国有力量迫使它接受自己的条款。但这场冲突的特殊背景是与毒品鸦片的贸易绑在一起的。鸦片是从罂粟中提取出来的，在中国长期用于医疗目的，比如控制腹泻。17世纪抽鸦片与抽烟草一起从东南亚传播开来，18世纪又发现了一种用烟斗抽纯鸦片汁的方法。很快，抽

罪与罚

像所有政府一样，中国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也是通过防止和惩治罪行来维持秩序。安宁的、努力工作的人民需要保护，不受恶霸和贼的侵害；强奸犯和杀人犯需要抓获和处罚，这样，尽管因为法律与法家和秦朝有关而沦落到不那么光彩的地步，但每个重要王朝还都是按照以前法律的模式起草和发布法典。

到清朝，法律中有436条主要的律令，还有1900条补充的或可替换的律条。处罚要根据情况适当裁断；对杀人和伤害罪的处罚要根据行为是否有意、是否偶然事故、是否为了反抗抢劫等等而不同。为了符合儒家而非法家的原则，处罚也根据党派间的社会关系而分等。哪怕是明显的偶然事故或误伤，使父母致死也是死罪，而殴打儿子致死则被认为是较小的罪。通常由地方官来解释和应用法典，开始是县令和知府，他们负责调查罪行、捉拿罪犯、主持审理和宣判处罚。如果官员没有做好这些事情，地方官在执行判决之前，要编好一个卷宗，在行政等级结构中传递，等待批准。在大多数案子的安排中，招供被认为是必要的，在有招之后，审理就典型地开始了。为不致出现政府过于严厉的印象，皇帝定期举行特赦，因此就宽恕了许多等待处罚的犯人，以示皇恩浩荡。

17世纪的西方观察者对中国的法律制度说了许多好话。但到18世纪末，西欧的标准就变了。在华的欧洲人担心他们会被置于他们认为是缺乏合法程序的状态，或是关心被告的权利，因为中国的法律制度中司法没有独立，没有辩护律师，没有假定无罪。关于合法程序的中西观念的潜在冲突已在18世纪晚期的广州明显存在，因为那时欧洲人已在那里做生意了。1773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逮捕了一个英国人，指控他杀了一个中国人，在发现他无罪之后，就把他释放了。中国官员认为，因为受害者是自己的同胞，所以坚持要由他们审判，于是又把那英国人抓起来，发现有罪并处决了他。此事发生11年后，一艘英国船向广州附近的仪仗队开火，炸死两名中国旁观者。当船长声称不知谁该为此错误负责时，该船的商业经理被逮捕，地方当局还威胁要断绝与洋船的一切贸易。船长最终让步，把炮手交出，不久此人被处死。由于有这样的冲突，当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19世纪占了上风的时候，他们就要求给予他们按本国法律和程序处理本国人的权利。

为榨出口供，审讯者可以使用法律允许的刑具，比如夹手指、腿和踝的拶子。在这幅明代短篇小说的插图中，衙役使用了拶子迫使那妇人招供。

鸦片的人只是为了它那麻醉效果——它舒缓了身体和精神上的痛苦，使乏味而繁重的体力劳动看来比较轻松。但抽鸦片容易上瘾，上瘾时不抽的症状包括严重的腹痛、肌肉痉挛、发冷、恶心。

英国在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之后，又大量投资于制造和传售鸦片，把销售鸦片视为取得他们与中国贸易平衡的一种手段。东印度公司控制着鸦片的销售，并发给商人执照，运鸦片到中国。中国进口的鸦片在1729年只有200箱，到1767年超过1000箱，1800年则超过4500箱。在18世纪的下25年，进口成倍增加，达到1万箱，而到1838年又增加4倍，达到4万箱。 中国当局完全清楚抽鸦片所带来的坏处，19世纪初的上瘾者包括政府的书吏、驿卒、宗室成员和宦官。为了与烟毒的蔓延做斗争，1800年既禁止它的进口，也禁止了国内生产。1813年，抽鸦片被视为非法，违者鞭一百，枷示一月。于是公开的贸易不见了，但英国人及其他国家的鸦片贩子，把船泊在广东海岸以外，把毒品卖给中国的走私犯，后者再通过一系列中间商，把鸦片分销下去，这使清政府很难抓住主要的烟贩子。政府的限制也因其巨大的利润而受阻，犯罪团伙插手进来，找到了买通官吏的办法，此办法是现代世界再熟悉不过的了。

很快，因鸦片贸易引起的白银外流使解决鸦片问题变得更为迫切起来。到19世纪20年代，每年有200万两白银流出中国，而到19世纪30年代初，这个数字上升到每年900万两。1839年，为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鸦片走私，清政府否决了使其合法化的建议，并派有经验且有气节的官员林则徐前往广州，迫使外商不再将鸦片运入中国，并强迫中国人不再吸食鸦片。他没收烟枪、查封烟馆，逮捕了大约1600个中国人。洋人被证明是难对付的。林则徐用威胁与贿赂使洋人把他们的鸦片烟交出来，以大约是五比一的比例用茶叶换鸦片。他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说："设若他国之人携鸦片赴英吉利售卖，诱尔民购食之，陛下定深恨之且大惊。"[十八] 他甚至在外国人的工厂外面设置路障，逼迫其交出鸦片。

到此时，英国撤消了东印度公司，任命了一个商务监督代表英国在广州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个僵局，英国的这个监督义律从商人那里收来鸦片交给林则徐，后者当着英国人的面迅速将其销毁。林则徐规定，只有那些具结不做鸦片生意的商人，以后才可以继续在广州经商，他还给葡萄牙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把在澳门的英国人赶走，结果这些英国人只好迁居香港这个小荒岛上。在此期间，在英国，商业利益正驱使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主要进行鸦片贸易的查顿－马地臣怡和洋行的威廉·查顿回到伦敦，游说议员发动战争。决议通过后，他又提供援助，租船给英国舰队，借给他们领航员和翻译。1840年，一支由16艘军舰和31艘其它船只组成的英国远征军自印度起航。为了准备武装对峙，林则徐为炮台购置了新的火炮，并在通往广州的江口铺设了巨大的铁链。但这没有给英国远征军造成任何麻烦，因为他们没有进攻广州，而是准备进攻宁波、天津等主要港口，并很快将其拿下。中国人不再拒绝谈判，于是在广州签订了一个条约，割让香港，支付英国所花军费（赔偿600万墨西哥银圆）并允许两国官员之间直接交往。

在获悉了条约的条款之后，两国公众均一片哗然。林则徐已因开启战衅而被流放，签订条约的官员则被锁拿至京。英国则组成了新的远征军，这次有1万人，是上次的两倍多，并在1841年占据了几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沿海城市，包括上海。

战败之时，数十名中国官员自杀。最后，当英国人在南京城下拉开攻城架势时，中国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南京条约》在枪口下缔结，把对英赔款提高到2100万两，割让九龙，开放五口（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关税定在5%。通过“治外法权”条款，英国臣民在中国只需服从英国法律，即使是与中国人发生纠纷也是如此。“最惠国”条款提供的是，如果第三国从中国那里获得新的特权，那么此特权将为英国自动享有。

在19世纪，中国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但基本的条款早已确立。中国不能制定自己的关税，最终不得不任命欧洲官员来征收。当中国人不按欧洲商人希望的数量购买其羊毛、刀子和钢琴的时候，他们并不认为是自己期望过高，反而认为是中国官员有意阻挠。他们要求开放更多的口岸和对贸易再少些限制。1860年，英法远征军占领北京一个月，逼迫其接受新的条约，这项条约将通商口岸增至14个。到19世纪末，西方列强在中国增加了更多的通商口岸，永久性地租借了其中一些较大的区域。在这些租借地，外国人可以不服从中国的法律，因此颇像附着在中国大陆上的国际都市。外国获得了在中国建立公使馆和领事馆的权利，外交官的待遇则依据欧洲人确定的国际法。同样，作为炮舰政策的结果，基督教传教士获得了在全中国传教的权利。到本世纪末，外商甚至获得了在中国开办工厂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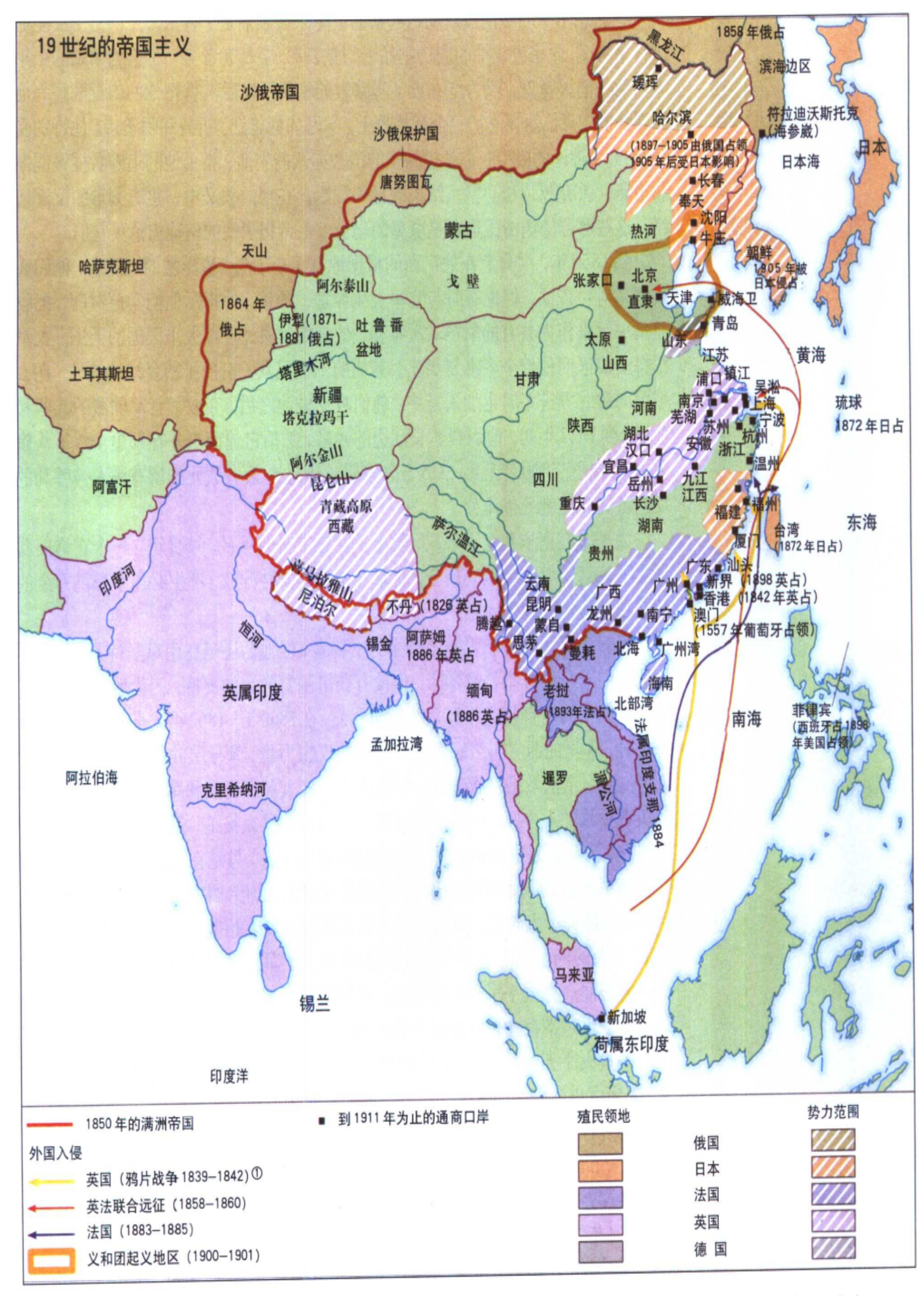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的另一个结果是鸦片烟瘾的继续泛滥。1860年的条约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直到19世纪末，鸦片一直是中外贸易中的大宗，尽管自1880年以后随着国内鸦片生产的增加，鸦片进口逐年递减。到19世纪末，西方观察家估计，有10%的中国人吸食鸦片，其中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有瘾，这意味着有1500万大烟鬼，另有3000万人偶尔吸食。最高的上瘾率大概出现于宗室和旗人中间，因为这些人靠微薄的薪金生活而又几乎无所事事。

内 患

在1860年之前，高官显贵们中没有人认为沿海的外敌是清朝中兴的主要威胁，认为他们所造成的麻烦与内部敌人的危险相比不过是癣疥之疾。

平叛极其艰难。从1796年到1804年，花了8年时间，才打败了白莲教的起义，当时在湖北、四川和陕西的山区前线挖了层层堑壕，构筑了数百个碉堡，征募当地人做乡勇，消耗的费用相当于5年的赋税。1813年，10万八卦教徒在京城附近起义，攻下华北平原上的几座城池，甚至渗入了紫禁城。在起义被平定下来之前，大约有7万人死去。最难的是镇压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1850年-1864年）运动，它最终扩展到16个省，导致600个城市被毁，2000万人丧生。

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中，太平天国是个最好的证明。它起源于华南，这里是秘密会社、宗族械斗、土著与客家冲突之地（客家是使用独特方言、具有独特风俗习惯、后到这一地区的移民，比如说，他们的妇女不缠足，干农活）。此外，这一地区在鸦片战争中受害最重。吸食鸦片上瘾的人在此地区很多，抵制洋人住在广州的人也颇众。另外，因为穿越华南山区将茶叶运至广州港的劳动力需求没有了，大量的搬运工在新口岸开通之后失业。



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扩张到亚洲，引起了中国人的恐慌，害怕中国被瓜分。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东南亚被帝国主义列强开发的地区，也是中国移民最愿意移居的地方，特别是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

① 鸦片战争爆发于1840年。——编者注

把忿忿不平的华南民众动员起来的天降宗教领袖是个客家人。洪秀全没能通过科举考试，做宗教领袖的履历则始于幻觉，即一金髯老者与一称其为弟弟的中年人叫他去消灭魔鬼。洪秀全在读了基督教的小册子以后，就把他的幻觉解释为他即耶稣的弟弟。他皈依了一个基督教士，学习如何施洗、祈祷和唱圣诗。他特别受《旧约》一神论的吸引，主张过朴素的清教徒式的生活，指示他的追随者摧毁偶像和祖庙，丢弃鸦片和酒精，结束缠足和嫖娼。在他的教义中，也有刻毒的反满情绪：这些邪恶的满清压迫者是魔鬼的化身，上帝指引他的信徒去消灭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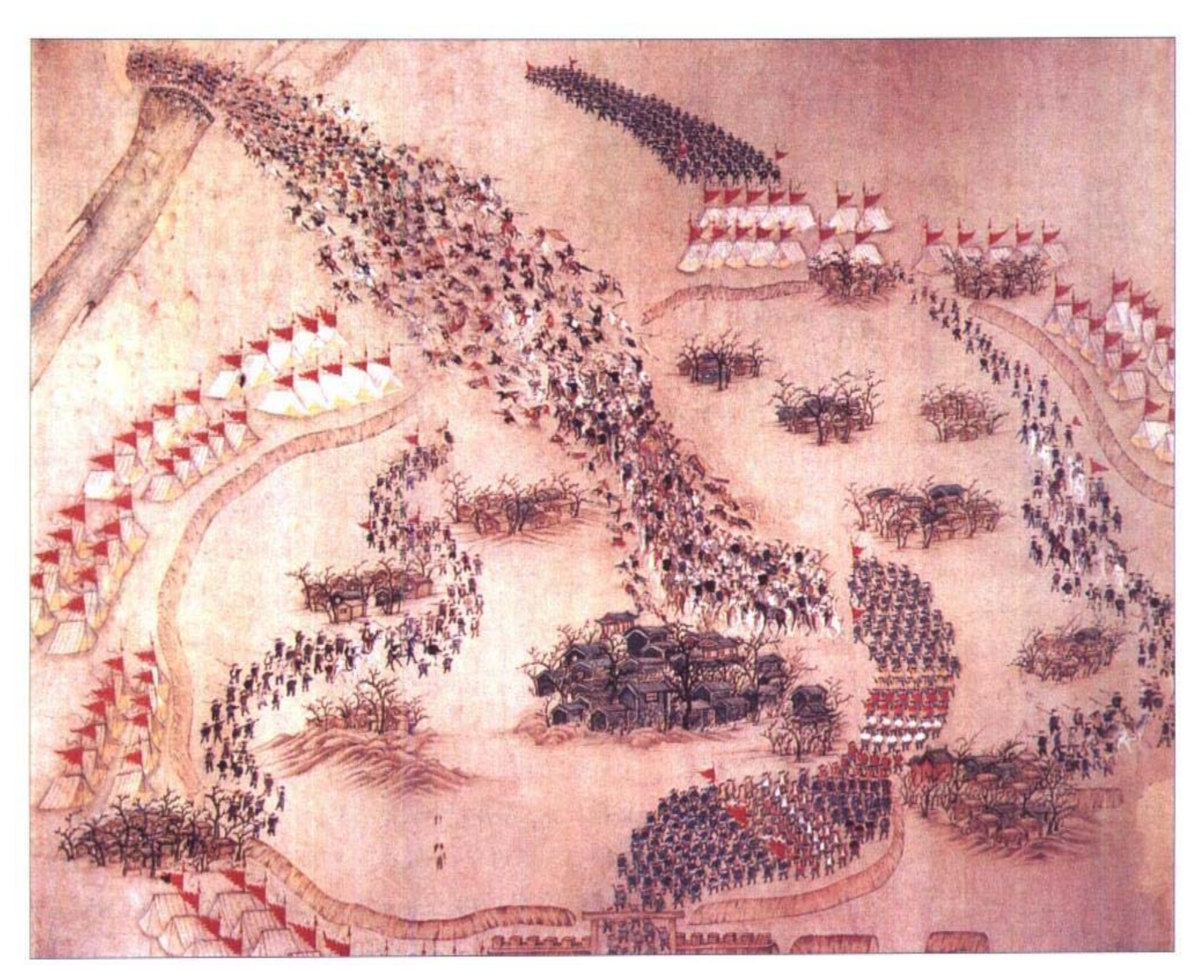
到1850年，洪秀全在他广西的根据地有了2万名热情洋溢的追随者，他们武装起来对付盗匪，但也有时与官军发生摩擦。那年，他指示他们卖掉财产，把收益集中起来作为共有的财产。次年初，他开始起义，自称太平天国的天王。太平军将士被证明他们个个都是勇士。其他的不满民众，包括秘密会社的成员，在太平军向东北方进军时也加入其中。他们攻克城池之后，夺取了官军储藏的武器和金钱。到1853年初，他们到达长江边的武昌，然后进逼南京并在那里击败了八旗主力（其中有5000名士兵，3.5万名家属或仆从）。没有战死的所有满人被胜利的反叛者烧死、刺死或淹死。

太平军在南京建立了政权，发出了空想主义的号召，号召建立一个在均田和男女平等基础上的新型的社会。科举考试也向女性开放，考生必须掌握洪秀全的教义和《圣经》的中译本。

尽管太平军没有获得较多的士绅支持者，但他们还是在南京坚持了10年。尽管他们主动与西方基督教攀亲，但没有获得基督教会的支持，因为后者认定太平天国学说中的基督教成分都是些异端邪说。在1860年－1862年太平军试图攻下上海之时，那里的西方人组织了一支凶猛的反击力量。领导层的问题也困扰着太平天国：洪秀全依然是宗教领袖，但他让另一些人负责行政和军队，有时他也被这些负责军政的人操纵。纠纷最终导致几个最高领导人被杀。但无论太平天国有什么弱点，清廷还是发现他们并不能轻易被镇压下去。只是在汉族士大夫曾国藩组建了湘军之后，局面才开始扭转。曾国藩对太平天国给儒家秩序造成的威胁感到恐惧，他征募士人做官，而这些士人又从他们的乡族招募农民。结果曾国藩和他的12万人的湘军，用了10年的时间击败了太平军。南京最后失陷时，丧钟长鸣——曾国藩声称太平军是如此狂热，以致他们全都自杀了，但湘军进城后的系统屠杀至少也是幸存者较少的另一种解释。

一旦太平天国被打败，清廷就得组织新的军队去对付全国各地爆发的其他起义，因为中央政府的明显虚弱招致各地的不满之人希望夺权在手。在华北平原上，特别是沿着运河的沿线，驱民为盗变成灾难，捻子抢了村民的庄稼，抢劫商人，绑架富裕的地主以勒索赎金。在西南和西北，苗族和穆斯林的起义星火燎原，揭示了民族分离主义的潜力，使边陲各省脱离了中央控制。曾国藩和他的门生李鸿章花了4年多的时间去镇压捻军，而直到1873年云南和甘肃的回民起义才被其它省的将军镇压下去。1879年，左宗棠率军从甘肃进入新疆，击败了那里的穆斯林。

清廷成功地镇压这些起义，证明汉族的士绅完全站在了它一边。历史上像太平天国这样规模的反叛曾颠覆了许多王朝：黄巾军灭亡了汉，白莲教灭亡了元，李自成使明朝走到尽头。在所有这些例子中，那些有能力击败这些反叛者的朝廷



为了打败太平军，忠于清廷的军队得常常包围太平军的据点。

的将军，很快又都互相残杀，以便建立自己的新朝。太平天国以后的晚清有点像晚唐，后者在安史之乱后延续了下来，靠的是地方创建的军队，但这反过来会威胁中央控制。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有如官军，驻扎在家乡以外。但由于太平天国之后各省获得了财政上的自治，能够为自己的目的截留较多的赋税，中央权力的安全多少受到些威胁。此外，满族对军事建制的支配权也宣告结束。汉族士大夫李鸿章比曾国藩多活了将近30年，逐渐掌握了朝中满人所掌握的大权。

自 强

1860年，太平天国控制了南京，俄国人在蚕食中亚，英法联军进入北京，而且英法联军因为中国不同意新条约的条款而毁掉和劫掠了圆明园。朝廷如果再不紧急行动，就有崩溃的危险，这种担心已不是杞人忧天了。

有心改革的官员不得不试图重振朝纲，首要目标是要重建对地方的控制，并通过削减政府开支、修复运输基础设施、劝农民回到土地上去等等来恢复经济。他们在估定赋税、治水、粮食运输、国防和平叛等类似的国家大政方面起草了大量文件，但他们也认识到有必要按西方方式重组军事力量、根据西方外交协议处理与西方各国关系，因为没有比对付洋人更重要的问题能够吸引清廷的注意力了。

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像曾国藩和李鸿章这类人的支持下，朝廷授权一些地方政府建立工厂、船坞，制造枪炮和舰船。这些生产显然是不足的，但即

使如此，仍引起了激烈的抵制，成为派系斗争的对象。有位受尊敬的理学家、大学士倭仁，反对建立同文馆，理由是“从古至今，从未有用数学使国家由弱变强者。”[十九] 从农民到满汉官员的所有社会层面，大多数人一直希望西方人离开中国，并认为模仿西方的社会政治实践是杂糅的失败，这些现代化冒险所带来的回报也不会立竿见影。1884年-1885年，中国又同法国陷入在越南的冲突。只用了一个小时，法国就摧毁了福州造船厂制造的军舰。没有几个中国人明白西方科学带来的技术的进步，他们也不明白，军队没有现代化的训练和指挥，仅有自己制造的现代化的武器是不够的。

但关于西方的知识也的确是在逐渐增进，西方书籍得到翻译，外语得到学习。现代的覆盖世界事务的报纸开始在上海和香港出现。可获得外界信息的出洋也开始了。1868年，退休的美国部长安森·伯林格姆随同一个满人公使和一个汉人公使，代表中国访问了一些主要的外国首都。到1880年，中国在伦敦、巴黎、柏林、马德里、华盛顿、东京和圣彼得堡，设立了公使馆。去英国的大臣郭嵩焘在1877年就已写报告给国内，说明铁路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即使郭嵩焘在他回国后不得不退出政治生活——反动的“清流”批评者对他的攻击是如此凶猛——那些掌权者的确开始把注意力从严肃的外交和军事问题上转移到经济发展上来了。

李鸿章特别相信，枪炮和舰船只是西方列强经济实力的表面反映，因此，为了竞争，中国必须使经济现代化。在开创中国商人的蒸汽航运公司（1872年）、开平煤矿（1877年）、电报网络（1879年）、棉纱厂（1882年）和棉纺织厂（1890年）方面，李鸿章起了积极的作用。他铺设了第一条连接开平煤矿和天津码头的铁轨，目的是把天津发展成一个制造业城市。几位其他的省级大员也推进了类似的项目，比如张之洞在1890年于武汉开办了汉阳铁厂。在这些官商合办的投资冒险中，商人提供资金，官员提供创制权和政治关系。技术转让的第一步就是这样进行的，但工业并未随之起飞，因为官僚的控制阻碍了企业利润的再投资，而这种投资可使这些企业自身获得可持续发展。

还有人认为，中国在19世纪后期的几十年里没能像日本那样，使自己迅速地变为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是因为不平等条约、低关税使中国无法保护它那羽毛未丰的工业避免与完善的外国企业竞争。一种现代的运输通讯的基础设施难于建立，是因为那些认为铁路和电报线路会造成失业和骚乱的人的抵制（到1894年，只铺设了195英里长的铁轨）。地方对于新工程的抵抗也来自穷人，穷人怀疑他们要为这些工程交税，但享受利益的不是他们，而是一小撮改革派精英。

人口增长与民众生计

自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中国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别国无法与之匹敌。的确，中国人通常比欧洲人口的总数还多。直到1700年，世界各地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在任何一个长时期内，年增长率不会超过0.5%。此后，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在18世纪增长了50%以上，这大概是全球气候变暖延长了生长季、新的作物增加了粮食供应、因全球交往增多导致的新疾病传播的减少，以及国家组织改善了救灾物资发放等方面的综合结果。在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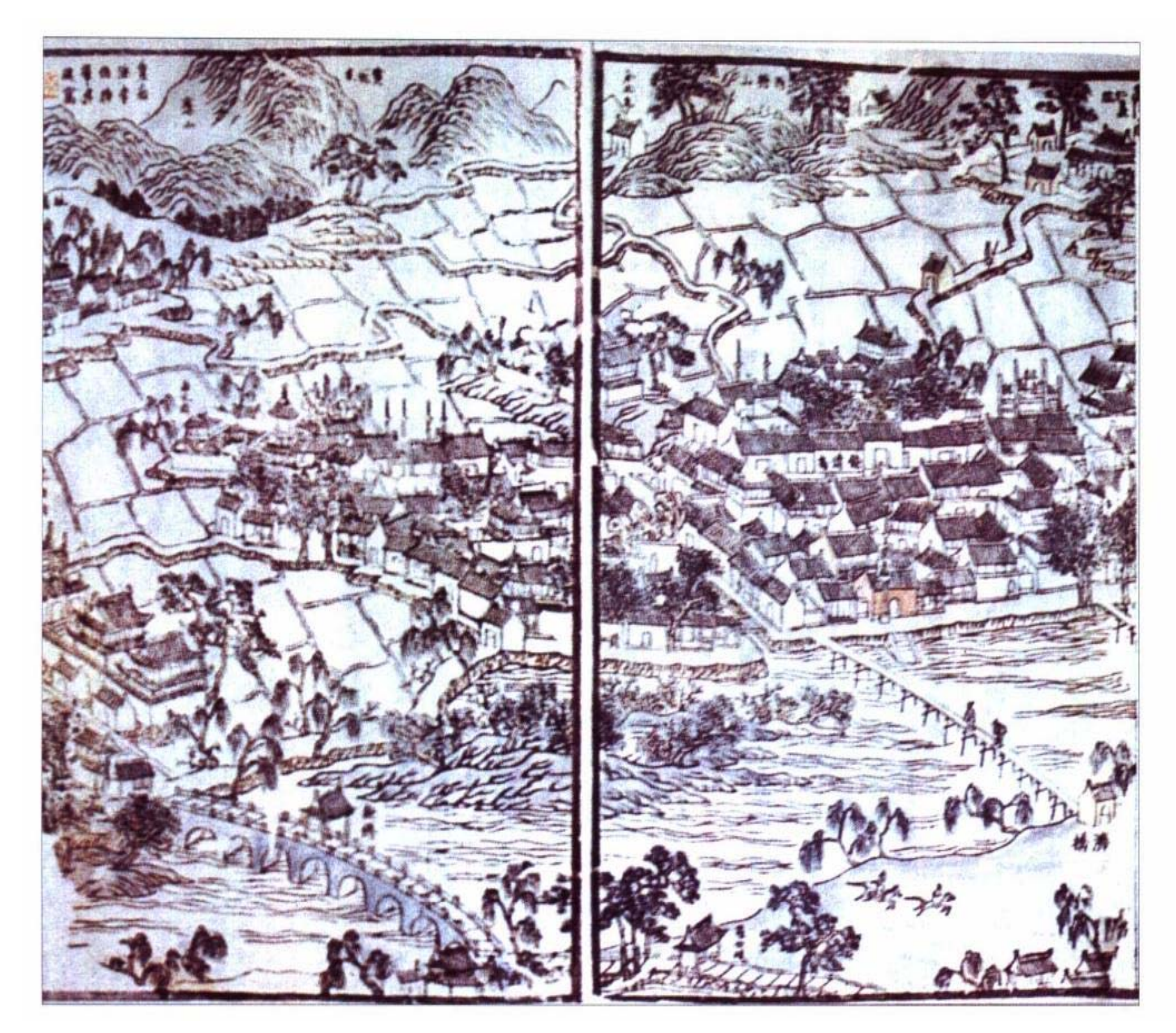


随着西方在中国事务中日益凸显，中国人开始显示出对西方风俗的好奇，这与几个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风俗的好奇没有什么不同。19世纪一份流行杂志上的这幅图的文字开始就说："域异方殊礼"，注意到像握手和亲吻这样的西俗应该像中国的磕头和鞠躬。如此处所绘，法国的儿媳妇可以吻别公公和大伯小叔，这是法国上流社会的家庭礼仪，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做法无异于恬不知耻。

的一个小部分——西欧——增长率的提高很快为家庭实践所缓和，主要是晚婚和日益增长的独身率。在英国和荷兰甚至更为有限的地区，18世纪的人口增加与工业革命同步，使得生活标准与人口增长同时提高。其它地方的人口增长可就没有什么实惠了。1800年，中国人口大约有3亿，俄国有4000万，日本3000万，英国1100万。从1800年到1850年，中国至少增加了1亿人，达到4亿。

中国的人口爆炸对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活在1650年的中国人是1个，到1850年就变成了3个，城市和乡村都变得更拥挤了，土地变得更小了，森林遭到砍伐后被开垦为农田，到处是剩余劳动力，工资收入降低，日常生活中的竞争加剧。直到18世纪末，这些过程的正面效果与负面效果一样大，因为它们促进了区域发展和商业化。但到19世纪初，负面作用受到注意。19世纪中叶的大规模造反、改革派与企业家在发展近代工业中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口增加趋势的经济后果所致。

随着人口压力加大，农民扩大了对灌溉和肥料的利用，把以前认为是边荒的不毛之地开垦出来（有时种植了新大陆的作物，如红薯和玉米）。但一旦所有可利用传统方法开发的土地被开垦完毕，食品供应的任何增长都只得来自报酬递减的劳动附加或边荒之地。这不仅降低了农业生产率，而且也对各地生态具有长期影响。砍掉山上的森林种植新作物，对河流的下游地区造成危害，因为森林砍伐加剧了土壤的侵蚀，导致河流淤塞，洪水泛滥。当可垦殖的土地因围湖造田和修筑堤坝而扩展的时候，湖泊也消失或缩小了，其蓄水流域缩小得如此厉害，以致它没有了蓄洪能力。



在清前期，随着人口的成倍增长，村落经常变为人口密集的市镇。这幅图描绘的是安徽南部歙县的一个村子。选自1757年的《古歙图》一书。

人口的持续增长也使制造工业复杂化了。随着农业规模缩小，农家的劳动力就出现了剩余，守着无钱可赚的土地的农家走到了穷途末路，只好让男人出去打工，或是在家中从事副业生产。副业生产多数是由妇女和女孩做一些纺纱织布类的工作。但这些副业又为纺织工厂的建立制造了障碍，因为农民的妻女会为一定的报酬纺纱织布，而这点报酬对于一个全日制工人来说又是不够的，城里的工厂因此就失去了竞争力。

太多的人要靠太少的资源生活，这也自然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关系。由于人满为患和膏腴之地尽皆有主，在控制水的权力和租佃权方面，冲突的可能性就增大了。农民在族群、宗族和村落之间的不和变得日益普遍，困难时期的溺女婴现象增加，因为他们无力抚养两三个以上的孩子，但却认为男孩是必需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婚龄女性相对不足，年轻男子因此也就不大愿意呆在自己的家庭附近按老辈人教他们的去从事某种职业。那些不愿意加入土匪或远徙的流入城市，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船夫、脚夫、轿夫这样的工作，到这个世纪末，还可以做黄包车夫。

19世纪，中国被迫加入的国际新秩序，并没有为缓和这些经济紧张做什么贡献，通商口岸的某些商人和企业家财源滚滚，但没有哪个地方真正繁荣起来。随着鸦片进口的猛增，中国的对外贸易平衡被打破，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长期的通货



在19世纪，特别是在华南，宗族组织依然强大。在某些地方，子孙们有祖先图用于过年时的祭祖。这是一张大图的局部，为福建连城县吴氏家族所有。其十八世祖的两肘为他的两个夫人遮挡，下面是他的三个儿子。尽管这些人物在生活中都是普通人，但在画中却身穿官服，反映了对他们在天国中能够获得这样地位的希望。

紧缩和经济萧条。从1815年到1850年，物价降了一半，但由于白银和铜钱纳税比例的变化，在1800年要交100个铜钱的税款，到1850年就要交200个铜钱了。

以机器为动力的制造业的缓慢引进也导致了错位。迟至1875年，中国地方上所用的棉纱几乎都是本地手纺的，但到1905年，只有一半是这样了。机纺肯定比手纺的效率高，长期来讲有助于中国经济，但直到机纺在中国应用的时候（这在1925年比较普遍了），并且直到那些靠手纺挣外快的人找到其它工作的时候（比如用机纺的纱织布），数以万计的农村家庭的经济状况因此而受损。

华侨

在19世纪，当数百万欧洲人向美洲和澳洲移民的时候，数百万华人也向东南亚移民，但也有一些向更远的地方迁移。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向外移民既来自推力也来自拉力。推力是由于人口膨胀，向地旷人稀地区的国内迁移的机会几乎没有了。1842年以后，由于茶叶贸易的地方性衰落导致的广州一带的经济衰退，使那里需要找活糊口的青年男子出现了剩余。

拉力是海外的新机遇。自明代以来，来自福建、广东等南部沿海地区的华人就在整个东南亚组成了商业社区。在泰国和越南这类佛教国家，华人常常被当地

人同化，与其通婚，接受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但他们很少同化于穆斯林地区（如爪哇）、基督教地区（如菲律宾）或原始部落地区（如北婆罗洲）。在这些地区，华人社区依然独立，其中许多人的口音完全是相同的。自愿的结社如三一教，通常是这些华人社区的主要组织力量，地方当局也愿意让他们自我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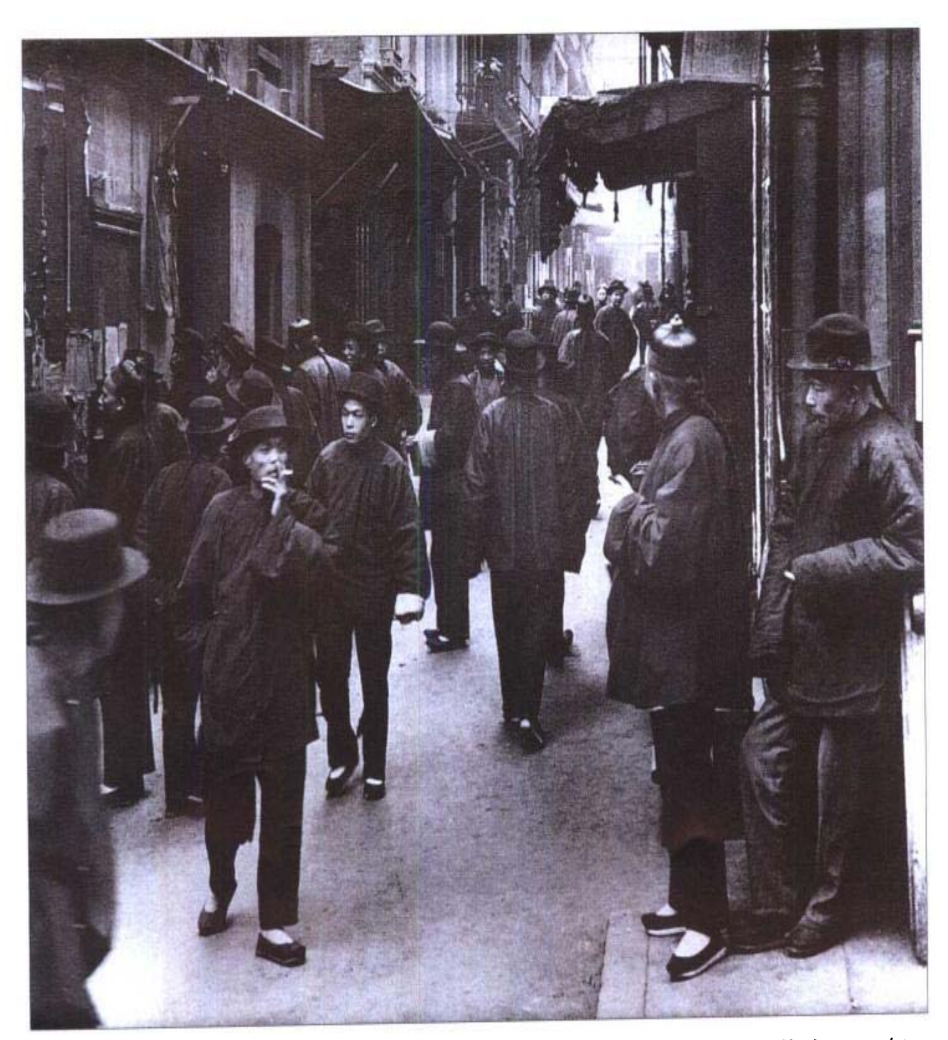
欧洲帝国主义势力扩张到东南亚，为开办企业的中国人创造了新的机会。1819年，新加坡创建于一个荒岛之上。随后，中国人便涌了进来。广州附近的地区很快地送来了数千男子到马来西亚附近的几个锡矿去干活。1850年马六甲城有1万华人，而在附近的科伦坡和新加坡，华人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族群。进一步，在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和沙巴，广东的客家人也大批到来，而英国人因为当地劳动力短缺而鼓励这样的移民。

在某些地方，华人比其他人过得要好些。英属马来西亚的锡的生意是有大钱可赚的，那里的中国社区包括已居住在马六甲很久、讲马来语的老华侨，也包括更大量的多数是讲粤语的新移民。但在西班牙控制的菲律宾和荷兰控制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则经常受迫害。早在19世纪，荷兰人夺取了华人世代在那里工作的婆罗洲的矿藏，华人居民与荷兰人的敌对一直延续到1854年，此后，中国向那里的移民基本停止了。但始于1864年，荷兰人对苏门答腊南部的征服，导致了华人向那里大批移民，到那里去从事甘蔗和烟草的种植。在爪哇，华人的商业社区也建立了起来，荷兰人把华商用作包税人，某些华人因此而暴富。到1900年，有50多万华人住在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度尼西亚）。

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由于世界范围的反奴隶制运动基本上终止了非洲奴隶的贸易，劳动承包人便开始到中国来招募工人。不道德的外国承包人和同样令人讨厌的中国中间商，买卖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到古巴、秘鲁、夏威夷、苏门答腊和其它地方的种植园和矿山去工作。在转运过程中，在种植园和矿山中，这些

住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海峡附近地区的华人，接受了某种综合了不同特点的衣服的式样，如这张1918年的合家欢所示。





由于美国政府使中国妇女进入美国十分困难，所以在20世纪初年旧金山的唐人街简直就是男人的世界。

"苦力"的待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在秘鲁的华工受的虐待最厉害。截止1875年，到秘鲁的华人有10万，他们起初被招工者诱骗说，他们到那里很容易致富，但此时却发现，如果想逃跑，就要被迫带着铁链干活。在夏威夷，制糖的承包商在1852年带来第一批华工，签约3年或5年，每月给他们3美元，外加食宿，每天工作12小时，每星期工作6天。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契约期满后选择留在夏威夷，做点小生意，最终构成了夏威夷商业社区的一个重要部分。到1900年，夏威夷的华人达到2.5万人左右。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1851年在澳洲、1858年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金矿的发现，导致向这些人烟依然稀少的区域的自愿的大量移民。在加利福尼亚，很少有人迅速到达，以进行有利的罢工，这些人且转到其它工作上去了。数千人找到了铺设铁路的工作，另一些人则在怀俄明和爱达荷挖矿。1880年，10多万中国人居住在美国西部，但只有3000名妇女。华人与白人拓居者之间时起摩擦，种族主义的流言蜚语——把中国人描绘为堕落的、无法无天的鸦片烟鬼——也刺激了这种情绪。1882年，中国劳工被禁止获得美国公民权，中国向美国的劳工移民也终止了。1888年，克利弗兰总统宣布，中国人"不可能同化于我们的民族，他们对于我们的和平和福利都是危险的"。对于中国男子来说，他们几乎不大可能把妻子、甚至儿子带到美国，要带孩子到美国则通常不得不撒谎，比如去找一个商人让对方说某男孩是自己的儿子。

华人在这些分散的社区中保留了对中国所发生事情的兴趣，多数人在中国还

有亲戚。尽管离开中国的大多数人大概都是文盲，但一旦他们发达了，他们还是希望他们的子女认读中文，在所有重要的华人聚居区都流通着中文报纸。即使在移民中找不到几个说官话的人，所操的口语也不能把他们全部联结在一起，但书面语言和对中国的共同纽带，又使海外华人分散的社区可以相互认同。到19世纪末，他们在中国的政治中起了作用（见第10章）。

奇耻大辱：1894年-1900年

19世纪末，日本加强国力的努力使它濒于全盘西化，这在1894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被派去谈判的中国官员和日本官员的不同服饰上得到明显反映。在画中，年老的李鸿章坐在前面。日本的一个狂热分子曾向他射击，使他脸部受伤，这事发生之后，日本人不得不调整他们对中方的要求。

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对中国来说似乎一切都不顺。首先是羞辱地发现，日本占有了中国失去的地方，并对中国造成威胁。从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日本就开始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并能够捍卫自己不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已取得很大的成就：它实行了君主立宪制，旧的统治阶级的特权被大部分取消，新的工业建立起来，普遍的学校制度使年轻人准备在现代陆军和海军中谋取位置。日本因此感到它已做好了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准备。

19世纪70年代，日本宣称对琉球拥有主权，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向中国朝贡。接着日本就把注意力转向朝鲜，后者曾是清代中国最忠诚的藩属之一，每年朝贡



四次。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开放”，就像20年前美国迫使日本“开放”一样。1894年，朝鲜爆发起义，中国和日本都向朝鲜迅速派出军队。日本正希望引发与中国的战争，于是击沉了中国的运兵船。在随之而来的战争中，中国海军遭遇极惨，日本人登陆，从背后攻克中国的海港城市威海卫，然后调转中国的大炮轰击港湾里的中国舰队，给中国海军造成最大损失。这不是一次中国制造的武器的失败（大多数实际上是从外国购买的），而是中国领导和战略的失败。



要在过去的女性中找到一个起正面作用的楷模，慈禧太后则不在其中之列。她曾在1861年—1908年两个小皇帝的统治时期垂帘听政。1875年，她的18岁的儿子同治皇帝薨，她便立其3岁的侄子为帝，目的是确保她自己可以继续摄政。在中国需要一个大胆而冒险的领袖时，她的自私和无知使她扮演了一个反对变法的反动派的角色。她似乎也支持了一些现代化建设项目，但同时又鼓励批评者去攻击这些项目。

中国要求和平，并把它最有名的老政治家李鸿章派去谈判。中国答应割让辽东和台湾，赔款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在中国开办工厂。根据最惠国条款，这些要求又自动延伸到其他列强。欧洲列强对此结果感到不悦，逼迫日本归还了辽东，但又增加了5000万两白银的赔款。

这是一个非洲和东南亚被列强瓜分的时代，而列强又都害怕别人会抢得最肥的肉。由于看到中国如此轻易地被日本击败，西方列强开始在中国争夺领地。德国人夺得山东的胶州，俄国得到辽东，英国人租借了山东的威海卫和紧挨香港的新界，法国则租借了靠近海南岛的广州湾，只有意大利的领土要求被成功地拒绝了。

当中国将要被瓜分的关键时刻，在北京的一批参加会试的年轻举人向皇帝上了一道长长的奏疏，建议进行彻底的改革。他们提出，中国需要提高税收、发展国家银行、修建铁路网、建立商业船队和现代的邮政制度。政府应该号召那些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上述和其它的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帮助。这群举子的领袖是37岁的康有为和22岁的梁启超，他们都来自广东。在所有努力从中国传统内部寻找现代化的合法性的儒生之中，康有为是最出色的了，他从一种新的角度，把孔子展示为一个革新者。1898年，慈禧太后允许他的侄子、23岁的光绪皇帝亲政，光绪便召来康有为，帮助他进行变法。康有为上了几个条陈，其中一个谈到波兰的命运（18世纪欧洲列强将其瓜分），另一个则谈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皇帝很快发布一连串上谕，下令在教育、商业、政治和军事方面进行改革。三个月后，慈禧太后认为这些改革过分了，害怕变法会削弱满人的地位，于是软禁了光绪，逮捕并杀掉了被抓住的变法派。当时的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安地从北京逃往日本，但



1896年，李鸿章在74岁的时候环游了世界，代表中国参加了俄国沙皇的加冕仪式，并拜访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的国家首脑。这里是他与退休的英国首相威廉·格拉斯通并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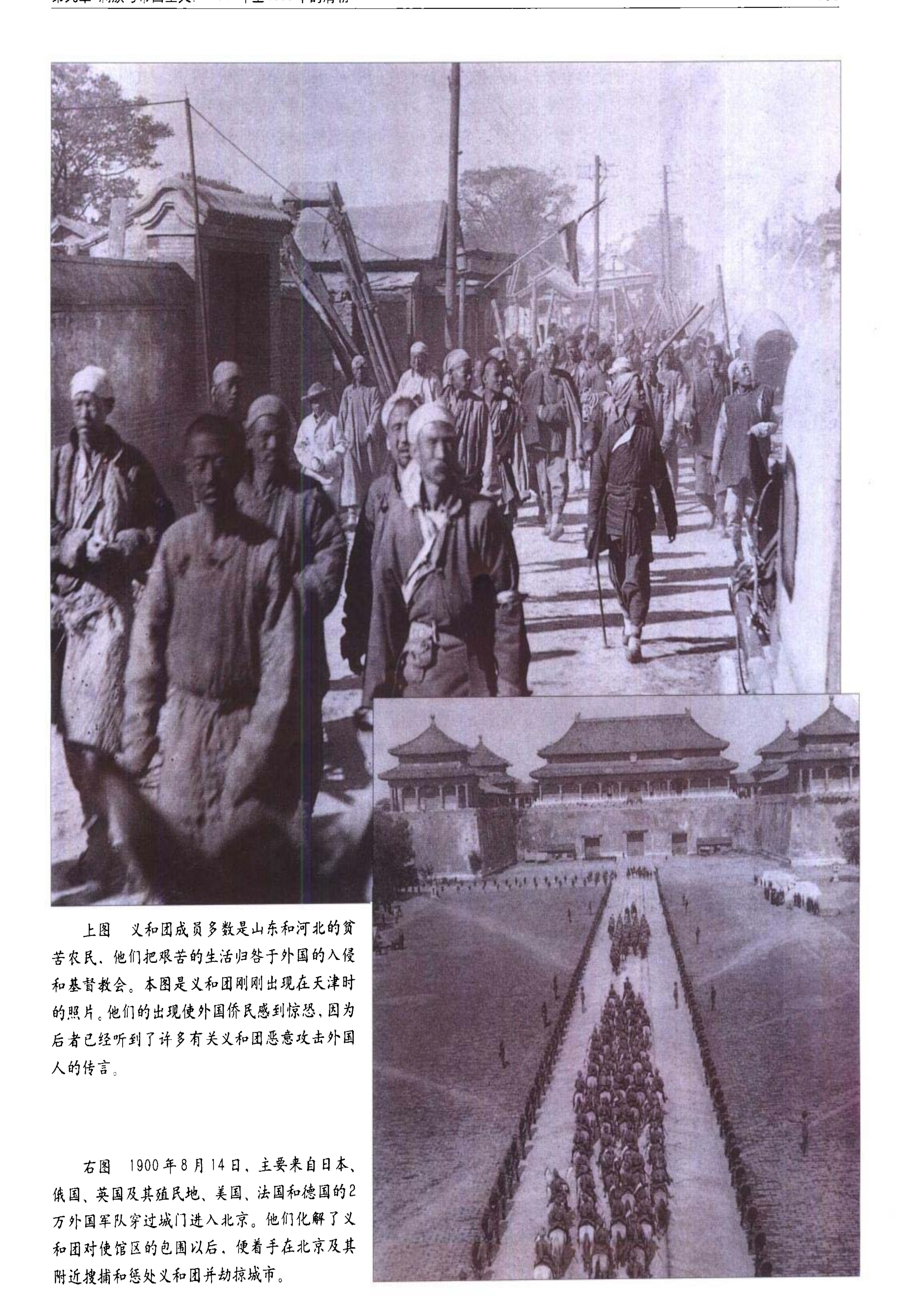
自上而下进行改革的希望破灭了。

清朝更大的耻辱发生在两年后，当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次起义的组织中心是秘密会社，自称"义和拳"。像许多早期的秘密会社一样，义和团把传统武术与崇信特别力量的萨满教结合起来，另外把中国的贫弱归咎于洋人的邪恶，特别是那些从通商口岸进入内地、宣传中国人的信仰与实践是错误的和落后的传教士。1898年，义和团在贫穷的山东西北部出现，他们夺取和毁坏了外国教士和中国教民的财产，越来越多的在社会边缘苟活的年轻人，包括农民、被除名的士兵、漕运纤夫和私盐贩子被吸引并加入到义和团运动中来。当山东的官府对他们采取行动时，义和团转移他处。小股的义和团在1900年6月开始出现在北京和天津，骚扰有时甚至杀害外国人和中国教民。西方列强提出抗议，并准备发动战争，慈禧太后犹豫不决，最后决定支持义和团，自认为他们会为她解决让她头痛的洋人的问题。当义和团包围使馆区的时候，慈禧太后宣战说："洋人侵略我中华，破坏我领土完整，践踏我人民……百姓深受其害，人人复仇心切。"[七]义和团还扩展到其它省份，他们在那里攻击教会。到8月，由12个国家抽调的2万人的军队从天津进军北京，他们解除了使馆区的包围并劫掠了城市。其时，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出逃，李鸿章再次受命出面谈判，他接受了全部惩罚，包括在排外暴力发生的地方停止五年的科举考试（这是对士绅合作的惩罚），赔款是令人惊愕的4.5亿两白银，这几乎是政府岁入的两倍。赔款须在40年内付清，还要加上利息。普通人起事是认为他们能使中国摆脱其敌人，但结果却发现他们使中国陷入了更糟的境地。

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在清代得到了扩展，但作为一种文明，中国却遭受了一连串打击。首先是满族的外族入侵。中国再次屈服于北邻的军事力量，汉人不得不改变他们的发式作为顺从的标志，所有这些都对中国的伟大提出了质疑。有使命感的儒生只好在儒家普世主义的观念中寻求慰藉，并且通过集中关注满族统治的汉族性，以便证明中国道德的至高无上。比如，满族采纳了汉族的体制，履行天子的职责，以美德治理天下，毕竟康熙、雍正和乾隆证明他们治理中国的能力比明朝皇帝要强。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仍不断引发事变，甚至在满族统治了两个世纪之后，普通百姓仍认为他们的统治者是外族征服者，证据是太平天国起义仍利用了反满的口号。

中国在19世纪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遭遇的结局不佳，至少对中国人的自信心是个沉重的打击。西欧在明中叶到清中叶之间经历了戏剧性的变化——从文艺复兴和哥伦布时代，经宗教改革、西班牙帝国的兴衰到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无论在物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组织上，中国都发现自己落后了。她陷入了一种国际经济秩序，而这种秩序是不利于后来者的，其规则也是中国没有能力想象出来的。

即使我们认识到，中国声望的急剧下降，既与欧洲发展有关，也与中国自身



上图 义和团成员多数是山东和河北的贫苦农民，他们把艰苦的生活归咎于外国的入侵和基督教会。本图是义和团刚刚出现在天津时的照片。他们的出现使外国侨民感到惊恐，因为后者已经听到了许多有关义和团恶意攻击外国人的传言。

右图 1900年8月14日，主要来自日本、俄国、英国及其殖民地、美国、法国和德国的2万外国军队穿过城门进入北京。他们化解了义和团对使馆区的包围以后，便着手在北京及其附近搜捕和惩处义和团并劫掠城市。

的衰落有关，但是我们对19世纪的中国历史还是很难乐观起来，我们看到人们对这段历史批评多、赞扬少。抵制学习西方的满汉官员似乎是些不负责任的反启蒙主义者，他们对正在形成的导致中国落伍的破坏性因素视而不见。有些中国官员提倡有限制地学习西方科学或军事技术，而不管西方文化的其它方面。但即使是这些人，也会因为短视和无能或用不管用的半吊子办法浪费时间而遭免职。同样，那些想通过政府设计和投资计划发展工业的官员，可以被指责为没能认识到资本主义扩张的关键性的推动因素，因而浪费了本来稀少的资源。在士大夫阶级之外，好像就很难找到什么英雄了。19世纪中叶造反的领袖没有显示出有见识的领导才能，而这样的领导才能恰恰是统一和引导中国前进所需要的。义和团解决外国威胁的办法很难说是于事有补。的确，通商口岸的中国商人找到了致富之道，但他们却不能把自己正在获取的利益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人群。

事情有可能不是这样发展吗？如果清初的文化没有向保守转化，中国会过得好些吗？这种转化是否阻止了学者们继续探究他们对耶稣会士带来的科学知识的初始兴趣？如果乾隆被马戛尔尼所吸引，接受了他的允诺，采纳了他的建议，中国是否会像日本一样迅速现代化？如果中国领导人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没有被其内部敌人所困扰或者太平天国成功地推翻了清朝，中国会做得更好些？如果像曾国藩或李鸿章这样的人建立新朝、实行铁腕统治会怎样？如果掌权的王朝不是外族会怎样？那会使中国的现代化更容易些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可以无穷无尽地问下去。我想，关于中国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碰撞，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的：整个一连串的偶然事件导致了后来的结果。

人们是否会把中国在19世纪衰落的结论依赖于他们对中国在20世纪的评价。那些为中国在20世纪彻底斩断了与过去的联系、变成了一个现代的向前看的社会而欢欣鼓舞的人，会把中国在19世纪地位的持续衰落视为一个伪装的幸事：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父系家庭和士大夫精英，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和社会，以至用了100年的噩耗才撼动了他们对自己的信念，迫使他们认识到，变化不仅可能而且必需。另一方面，那些把20世纪看得如同19世纪一样是悲剧的人有理由感到，如果中国曾试图胡乱对付着度过它与西方遭遇的阶段而未如此蒙羞的话，中国人民也许会谅解这些痛苦，因为中国以后的革命性变化对于许多好思考的中国人来说，可能就不那么绝对必要了。

为了生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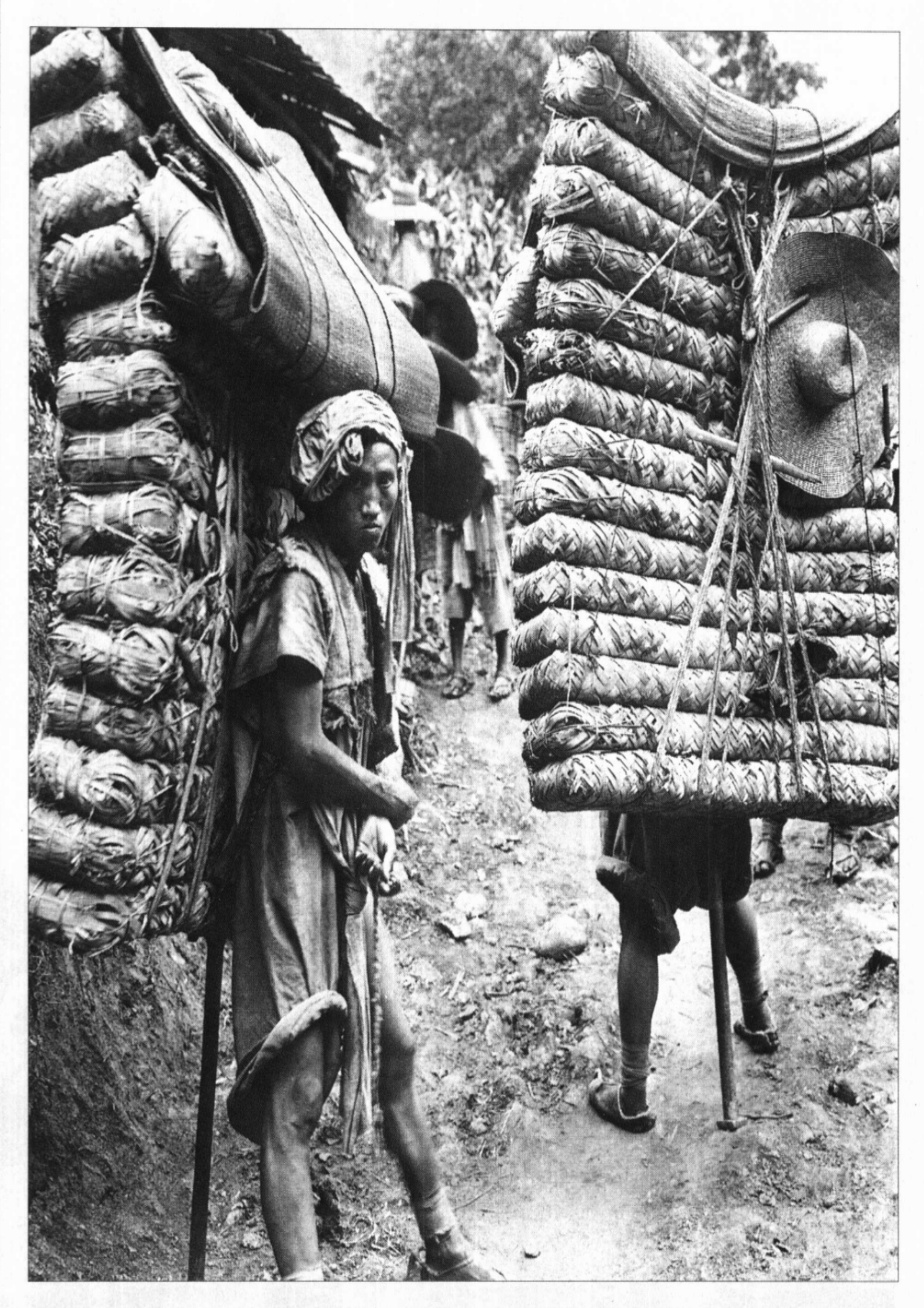
在19世纪，工业化对大多数中国人的生存方式影响甚小，但新的照相技术给我们提供了当时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新视角。那些正在工作的男女老少的形象，被1860年以来的西方访问者所捕捉，特别是在1880年照相机变得更便于携带和使用以后。对中国生活的印象像在较早的时期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归诸艺术家所创造的形象，他们通常有意无意地美化了中国人的生活。在更近的时代就没有这样的过滤器可以阻止我们看到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一面了。



左图 那些受过四书五经训练却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人，其命运是在乡村私塾教书。甚至在19世纪末，大多数学生仍按传统方式接受教育。其中最常见的情景是学生死记硬背一些段落，然后对着老师背诵。

下图 没有能力养活牲口的农民，只得凭自己的力气耕种土地。





直到20世纪，许多地方主要还在靠人力运输。这幅1908年的照片中记录的是背着136公斤茶砖的挑夫，正穿越在由四川通往西藏的山路上。



左图　缠足妇女也可以在上海的许多作坊中找到工作，这些妇女（为方便摄影而排成一列）正在给茶叶分类。

下图　在只有手工工具的时候，锯木头的活计，既要求技巧，又要求力量。

第十章　行动起来：20世纪前期（1900年－1949年）

对不同的精英人物来说，1900年－1949年这半个世纪，是一个为中国的强盛和现代化而努力奋斗的时期。一群精力旺盛的男女活跃在历史舞台的中央，他们感受到了紧迫的形势并付诸行动：提出新理论、建立新制度，组织被压迫人民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打败侵略者。爱国志士想要重建一个属于中国人民的强大的中国，使之足以同一切外来威胁做斗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则希望建构起中国的现代的新文化。

1911年，革命党人成功地颠覆了清王朝，然而他们创建共和国的最初的努力却付诸东流。1916年－1927年，地方军阀为扩大其统治展开了夺取霸权、皇权的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四分五裂。即便在国民党大体结束这种分裂状态之后，国共之间的剧烈冲突和日军的加紧侵略，也使国民党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并因此偏离了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成功地发动了贫苦农民，组建起一支纪律严明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最终在内战中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

颠覆清王朝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清王朝的各个方面都被暗中破坏了。其正常的统治权威在19世纪末发生的几个重大事件中被削弱，这些事件包括：中国被日本战败，皇太后发动了针对皇帝的政变，以及帝国主义插手义和团运动。在国家的各个地区，一个更加积极的地方精英阶层正在形成，他们渴望参与政治秩序的重建，但绝非出自空想的或利己的动机。

推翻中国两千年帝制传统的过程，大体上可以称作是革命党人为外来思想所激励的过程。在清朝统治的最后10年里，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于欧洲列强和日本如何攫取本国财富和权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严复是最早的留英学生之一，他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亚当·斯密的《原富》（1900年）、J·S·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903年）和《名学》（1905年）、赫尔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903年）以及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著作。他论证说：同中国阻碍个人才能发挥的"圣人之道"比起来，西方的政权组织形式更能够发挥个人才能，并将其导向集体的目标。严复一度认为，中国的困境只有30%是由洋人引起的，大部分都是由自己的毛病造成的，故而可以通过中国自己的努力得到补救。

1900年－1910年的10年间，最具名望的革新派大概仍要数康有为和梁启超。逃离了皇太后的镇压（译者注：指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开始周游于海外华人社会。梁启超则在日本居留下来。到1906年为止，赴日留学生已超过1万人。旅居国外的经历使他们对祖国的孱弱、落后而倍感屈辱，同时也激起了他们强烈的民族感情。梁启超为留学生们出版杂志，分析日益恶化的中国局势并介绍西方的思想。他提出通过"民主"使中国强盛的观点。然而民主对于梁启超而言意味的

只是一个能够吸取民力的政府，而非一个代议制的或保护个人权利的政府。1903年，梁启超完成了在美国的为期5个月的旅行，此后便不再热衷美国式的平民民主，而把景仰的目光投向集权制以及德、日的君主立宪政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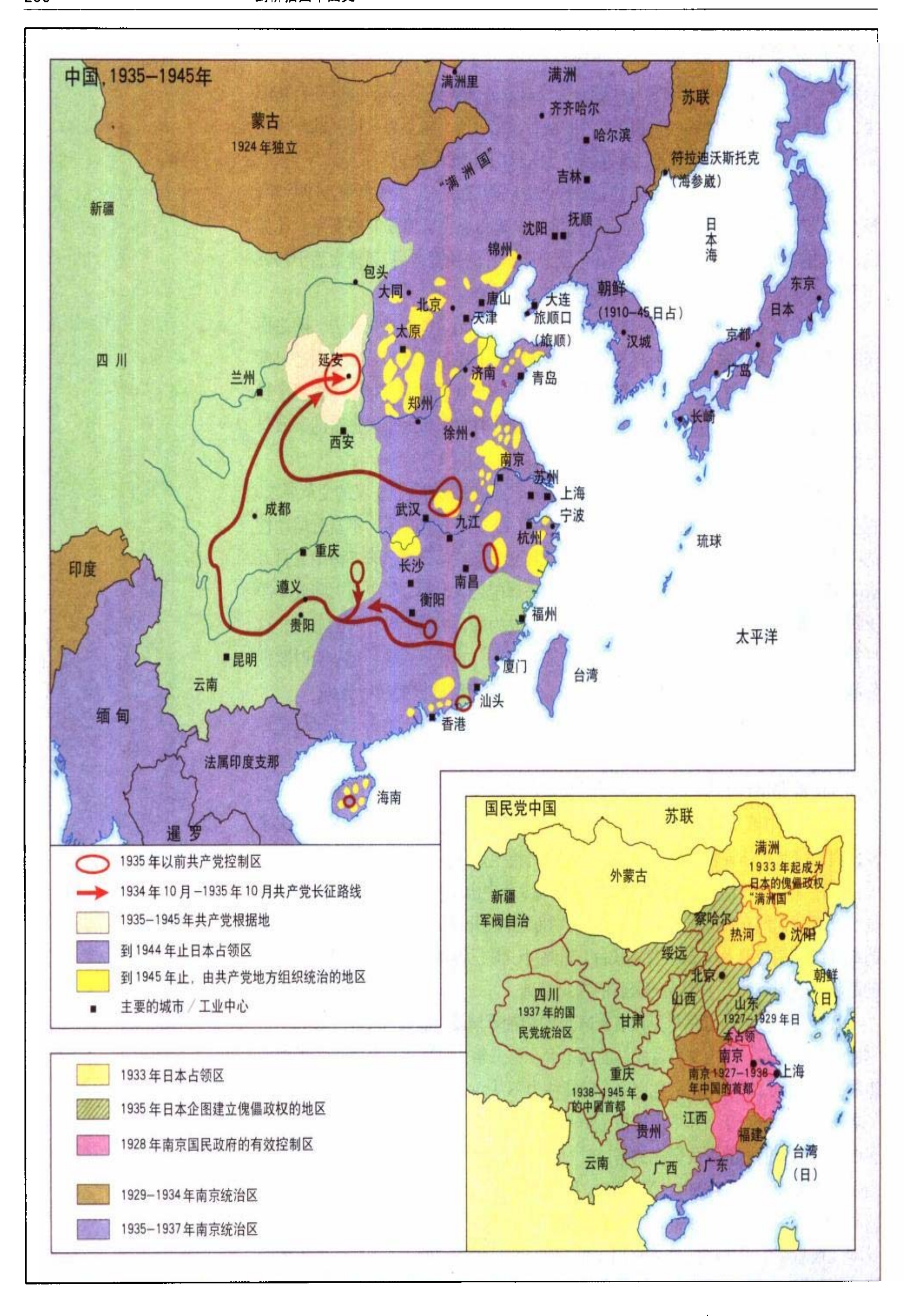
观诸国内，清廷本身也在通往宪政和议会政制的方向上缓慢移动。1905年，科举考试被废除，中国踏上了建立现代学校系统和现代官僚政制的道路。比如说，现代的警察体制被介绍进来了。在广泛总结国外的经验之后，慈禧太后于1908年公布了通过9年训导期来逐步实现宪政的计划。

据说是在73岁的皇太后薨毙的前一天，33岁的光绪皇帝神秘死去。随之而来的便是中国再度拥有一位娃娃皇帝，建立日式君主立宪政体的希望也因之日渐渺茫。1909年，各省的谘议局依然召集了会议并选出代表赴京议政。尽管获准投票选举的代表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甚微，但议会的影响却因令人振奋的参政思想的诞生而扩大。

这种自上而下的改良既不能满足精英阶层中正在成长的改良主义的变革要求，也不意味着真正意义上的革命。1903年，年仅19岁的邹容写了一本富有煽动性的小册子（译者注：指《革命军》）。他号召建立一支"革命军"来"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三] 他指明"皇汉之种，黄帝子孙"已与他人为奴，正面临着灭种的危险。这些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词句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尽管是从当时欧洲修辞学中转引来的，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却是对当时危机的精辟分析。

孙中山（孙逸仙，1866年－1925年）作为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在排满革命中得到众人的崇敬。他同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一样都是广东人。然而不同的是孙中山既非出自书香门第，又未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训。他的两个叔叔是"淘金热"时移民美国的。另外一个叔叔和哥哥则去了夏威夷。1897年，孙中山也去了夏威夷。在他对基督教产生兴趣之后，他哥哥把他送回了国内。然而此刻的他已无法适应家乡的生活，只好远走香港。在香港，孙中山受洗为基督徒并学习西医。他与友人就他们在西式学校中了解到的共和政体展开讨论。他们一致认为，反满的最佳途径是与遍及南方的会党联合，如此可一举三得：既能排满又能获得大批的追随者，同时还有了现成的跨省的组织基础。

1894年，孙中山进京求见改良派官员的领袖李鸿章。遭到李拒绝后，孙中山返回夏威夷组建了拥有100名成员的兴中会。第二年，他又在香港建立了类似的组织。兴中会致力于煽动会党起义，但往往力不从心。其间孙中山也在继续向国外寻求支持。1896年，孙中山剪掉了辫子并开始着西装。在英国，他发现已有许多西方人认为他们的宪政存在缺陷，并一直倡导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对他加以弥补。当别人还热衷于踩着他的足迹前进时，孙中山已在开始考虑直接建立一种更先进的政治模式，以便超越西方，使中国走上一条新路。赴日考察期间，孙中山发现日本人很希望参与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成立了革命同盟会，把学生革命者中的激进分子引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尽管社会背景不同，出身中上层的学生还是为孙中山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允诺深深吸引。在此后的几年里，同盟会发动了七八次起义。孙本人则继续为筹集资金和寻求赞助而奔走于世界各地。



国民党及其政府一开始便对军事问题十分关注，因为即使在1926年－1927年的北伐之后，中国的大片土地还是处在军阀、日本人和共产党的控制之下。1934年，国民党军曾成功的把共产党从中国的中心赶了出来（他们开始了著名的长征，最终走到了陕西的延安），但在1937年抵抗日本入侵的时候，却极少有成功之举。



孙中山的许多时光都是在国外度过的，在国外他尽量为其事业寻求资金上的支持。这张照片摄于1916年的日本，孙中山处于前排中间的位置。

孙中山还在丹佛的时候，一次突发事件——武昌革命党总部的一枚炸弹突然爆炸——最终导致了中华帝国统治的瓦解。为防止暴露革命组织，军官仓促发动政变。占领武昌不到一天，革命党就通电各省，请各省宣布独立。六周内，全国就有15个省脱离了清政府。绝望之下，清廷只好请其军队的最高统帅袁世凯（1859年－1916年）出面解决统治危机。袁世凯先礼后兵，同革命党开始进行谈判。后者由于害怕政变会引起国际干预，也乐于妥协。双方最终达成协议：清帝退位；袁世凯就任共和国总统；退位后的清帝及其随员得到优待并继续拥有其财产的所有权。1912年2月，清王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宣布退位。同年3月，孙中山返回国内组织临时政府。

清王朝的迅速灭亡，证明了太平天国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发生了何等巨大的变化：一个受过教育的阶层已在皇权的背后聚集起来。地方精英们发现，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他们已越来越处于政府的对立面。商人们建立起商业会馆，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城市的运行之中。在本世纪初，城乡精英们都充满了革命的热忱。他们希望变革，渴望中国的现代化。尽管动机不一，但他们看起来似乎提供了维持地方秩序的最佳方法。

尽管新的共和国未曾在中国建立起来，但袁世凯及其军队的复辟企图也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国会选举如期举行了。然而当国民党（其前身为同盟会）成功地获得一半以上的议席后，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国民党总理宋教仁。这一举动证明，袁世凯从来都不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地方精英们对袁世凯的集权行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很快就有六个省宣布独立。



袁世凯，清王朝的大元帅，于1912年当了新共和国的总统，随后又很快地进行了独裁统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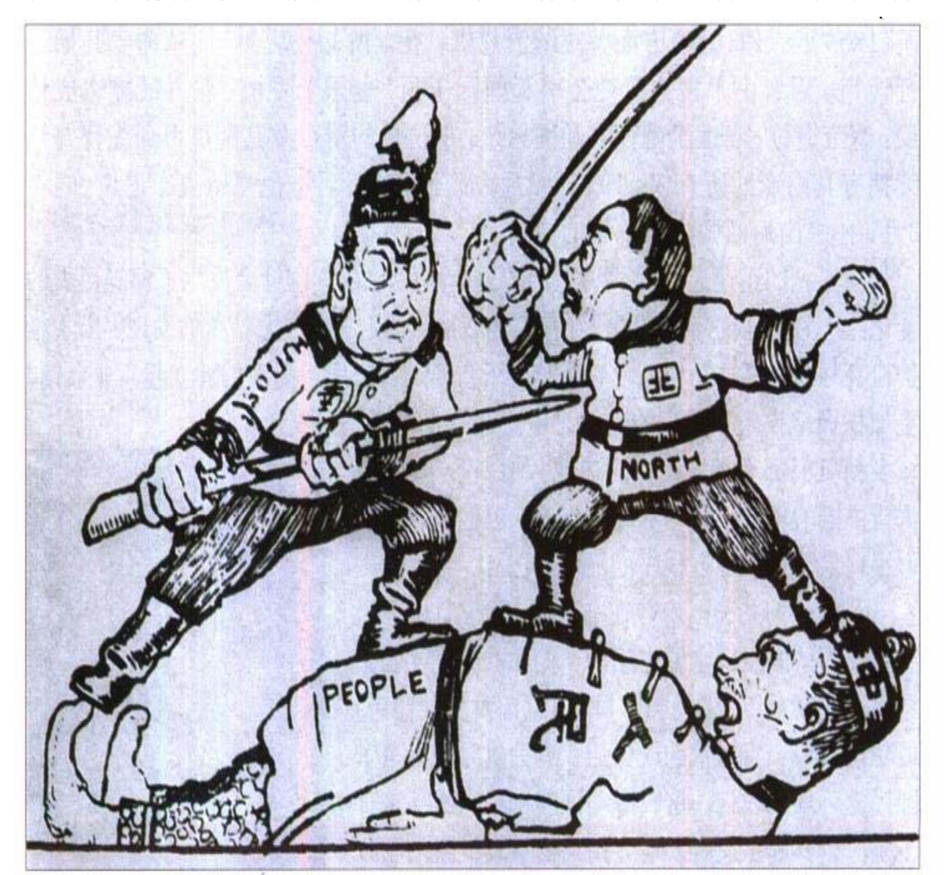
袁世凯对其进行了武力镇压，建立了军事独裁。1915年的下半年，袁世凯甚至宣布将于1916年1月1日称帝。此举引起了大范围的抗议活动，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意外死去，该运动才告结束。

权力的偏离

自袁世凯死到1928年国民政府成立的12年间，通常被称作中国的军阀混战时期。由于强大的中央权力不复存在，袁世凯旧部的指挥官、各省的行政长官、地方强权人物以及土匪，全都忙于营造自己的势力范围；一些曾被清朝占领但未融入汉文化的地区，如西藏①、蒙古，也趁机宣布独立；孙中山及其同志努力在遥远的南方建立起国民革命的军事基地；与此同时，北京政坛更迭频繁，共有六位总统、25届内阁相继上台。曾有一度，斗争的关键是能否控制北方。最具实力的军阀们在华北大地上展开了破坏性极强的战争。由于无人负管理之责，土匪遍地皆是，而他们给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造成的损害，比起军阀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各个村落被迫组织武装以保卫自己的家园。

与此同时，青年知识分子们反对陈腐思想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些受过现代教育的文人，觉得自己肩负着劝诫当局的责任，确信现代的教育已使他们成为当然的中国的拯救者。这一认识在重新组建的北京大学内体现得尤为明显。《新青年》杂志的创办者陈独秀，曾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他曾在日本留学，充满热忱地倡导个人自由。他在1915年《新青年》的创刊号上赞美青年，并借此向长久以来的复古尊孔思潮发起挑战。他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

右图　政治漫画于本世纪初开始见诸报纸和杂志。创作于1918年的这幅漫画，反映了南北军阀战争对人民的蹂躏。



① 中华民国承袭了清朝领土的疆域。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7年），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等地方，均维持原状。1914年7月，英、藏代表签署了所谓《西拉姆条约》，中国政府声明不承认该条约。——编者注

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他正告其读者，不要把“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浪费在与前辈的争论上。㊀他期望青年能重新塑造自己，获得新生。他认为，青年人应该独立思想，不为旧观念束缚。在别的文章里，陈独秀指出，当前的中国必须抛弃儒家的三纲五常来获得平等和人权，他强调：“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㊁

胡适是陈独秀首批延聘的北大教授之一，当时他刚刚结束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期7年的哲学学业。胡适的反传统不像陈独秀那样要推翻一切。他在《新青年》中写道，提倡新思想的目的不是要取缔一切旧观念代之以西方观念，而是要培养一种批判精神：对于祖先的智慧要进行重新评价，评价的标准就是其原则是否依然适应今天的需要。

胡适在美国时，就开始号召人们抛弃许多世纪以来被视为文人标志的文言文。他指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中国文明又是如此紧密地同文言文联系在一起，所以胡适的主张已十分危险地接近于宣告中国文明的死亡了。胡适的确认识到，在使用晦涩难懂的方言的人中，文言文可以使彼此沟通，因此它成为一种统一性资源，但他又认为，一旦民族文学产生于一种汉语方言，那么标准语也就确立起来了（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译者注），欧洲的标准语也是这样确立起来的。陈独秀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不久《新青年》就全采用白话文体了。陈独秀认为，这种改良了语言的文学能更加强烈地影响它的受众，它的应用将使文化向民众敞开，帮助他们从旧的思维定势的荒谬影响中解脱出来。

鲁迅（1881年－1936年）是最早的能很好运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之一。他曾在日本留学，并研读过欧洲特别是俄国的文学作品。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猛烈谴责了中国传统文化：小说的主人公发现，被前辈们视为崇高的仁义道德不过是一种人吃人的价值观念，这之后他发了疯（或者说被当作疯子）。鲁迅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阿Q正传》（《阿Q正传》应为中篇小说——编者注）也是一则黑色幽默：男主角阿Q是一个身处下层，但又总想提高自己地位的人。他禀性怯懦、自欺欺人而又从未成功过。然而无论如何丢脸，他总能保持精神上的胜利。关于1911年革命的传言给了他莫大的鼓舞，但很快他就发现，旧式的受传统教育的精英们同新派的受外国教育的精英们是一丘之貉。他们利用革命谋求私利，不想受阿Q的阻挠。于是阿Q就走向了一个悲惨的结局——以抢劫罪被革命政权判处死刑，而他只不过是意图抢劫，并未付诸行动。在许多诸如此类的小说里，鲁迅喊出了那些为中国的前景和旧秩序的孱弱所困扰的人们的心声，但他也只能勉强地寄希望于一种简单的解决方式。

1919年，也就是《新青年》掀起新文化运动的第四个年头，青年们被巴黎和会关于处置德国在山东权益的意向激怒了。为阻止中国的衰落，他们走上街头。1914年，日本作为英法的同盟国接管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1917年，中国也加入了协约国一方，尽管未直接派军队参战，但向法国输送了17万名劳工。他们被用于卸货船、挖战壕、甚至直接为战争需求提供人力。因此，中国希望能从协约国的胜利中有所收获，特别是威尔逊刚刚发表了关于民族自决的演说之后。然而不幸的是，日本已经同英法在《凡尔赛和约》中签订了秘密协定，意大利也支持日本对德国在中国权利的接管，同时，日本外交官也取得了北京军阀政府关于

鲁迅论中国人的民族性

20年代初期，作家和评论家鲁迅（1881年－1936年）是最引人注目的人。正如他在其小说集的序言中所阐述的那样，“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他对旧式中国文人、普通中国农民和市民的无情批判，或多或少同他在一个没落家庭里度过的童年有关——他的祖父是一个官员，因行贿入狱；他的父亲是一个大烟鬼。鲁迅在孩提时代就经常出入当铺，以便使他的家庭能够继续支撑下去而不至于跌落到社会的底层。综观鲁迅的写作生涯，他一直都在对那种号召保存“中国本色”的观点回以毫不留情的讥讽。他不仅批判那些本应高兴地看到被清除掉却依然存在的特色，而且还认为那种尽力区分何谓中国、何谓非中国的做法是愚蠢的。比如，在有些人看来他那属于日本式的胡子，就真的让他不那么像中国人了吗？倘若日本人的胡子仿自德国那又当如何？若是唐宋时期中国男人们也像他那样在唇上留胡子又会怎样？如果自来水笔比旧式的中国笔砚更便于学生在课堂上记笔记，就不要再指责它不是中国的了，像日本那样生产自来水笔岂不更好？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庞大的古董，除了能让外国游客找到一些仅仅懂得古书和古玩的文人之外，那对我们每个人又有什么好处呢？1926年，在北京的一次非武装的和平游行中，有47位示威者被杀害，其中有一些是鲁迅的学生。自那年起，鲁迅的评论文章更多地从政治的角度出发了。翌年，国民党把矛头转向了共产党，并继而对其展开屠杀，这更加震撼了鲁迅。在随后出版的文集（1928年4月）里，既收进了他早期的那种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文章，也包括了他的后期作品中的那种左翼文章。

铲共大观[24]

仍是四月六日的《申报》上，又有一段《长沙通信》，叙湘省破获共产党省委会，“处死刑者三十余人，黄花节斩决八名”。其中有几处文笔做得极好，抄一点在下面：

……是日执行之后，因马（淑纯，十六岁；志纯，十四岁）傅（凤君，二十四岁）三犯，系属女性，全城男女往观者，终日人山人海，拥挤不通。加以共魁郭亮之首级又悬之司门口示众，往观者更众。司门口八角亭一带，交通为之断绝。计南门一带民众，则看郭亮首级后，又赴教育会看女尸。北门一带民众，则在教育会看女尸后，又往司门口看郭首级。全城扰攘，铲共空气，为之骤张；直至晚间，观者始不似日间之拥挤。

抄完之后，觉得颇不妥。因为我就想发一点议论，然而立刻又想到恐怕一面有人疑心我在冷嘲（有人说，我是只喜欢冷嘲的），一面又有人责罚我传播黑暗，因此咒我灭亡，自己带着一切黑暗到地底里去。但我熬不住，——别的议论就少发一点罢，单从“为艺术的艺术”说起来，你看这不过一百五六十字的文章，就多么有力。我一读，就仿佛看见司门口挂着一颗头，教育会前列着三具不连头的女尸。而且至少是赤膊的，——但这也许我猜得不对，是我自己太黑暗之故。而许多“民众”，一批是由北往南，一批是由南往北，挤着，嚷着……再添一点蛇足，是脸上都表现着或正在神往，或者已经满足的神情。在我所见的“革命文学”或“写实文学”中还没有遇到过这么强有力的文学……

我临末还要揭出一点黑暗，是我们中国现在（现在！不是超时代的）的民众，其实还不很管什么党，只要看“头”和“女尸”。只要有，无论谁的都有人看，拳匪之乱，清末党狱，民二，去年和今年，在这短短的二十年中，我已经目睹或耳闻了好几次了。

上图　鲁迅在他那一代人里也许是最著名的作家，常常应邀在当时的出版物上发表主张。此图展现了1923年1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面前发表演讲的情景。



右图　鲁迅观念和文字语言的现代性，都由其作品的封面设计精妙地展现了出来。他非常推崇欧洲的绘画艺术和先进的印刷技术。此处展示的是1926年出版的鲁迅短篇小说集《彷徨》的封面。



当国际社会对1920年－1921年的2000万华北水灾的受害者实施救助时，中国饥民的状况才被外界有所了解。

获得德国在华权益的许可。

1919年5月4日，和会即将做出有利于日本的决议的消息传来，北平的3000名学生在故宫的天安门前集会。他们打出爱国标语，号召围观者也加入进来。一些学生冲破军警的防线，把一个亲日官员打成重伤，并放火烧了一位内阁次长的宅邸。当局镇压了示威的学生并逮捕了运动的领导者。这一举动激起了全国范围的支援学生的抗议热潮。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无论是教师、工人、记者、商人、孙中山还是军阀，全都站到了学生一边。很快就有200座城市罢工、罢课。北京军阀政府最终逮捕了1150名学生，并把北大的一部分校舍变成监狱用于关押学生。但是声援爱国学生的罢工，特别是上海工人的罢工，很快就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继而内阁下台，中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示威者道义上取得的胜利，为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政治定下了基调。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知识分子个人的奋斗目标与五四运动追求的民族力量的奋斗目标，时而重合，时而互相竞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民主、进步、自由都是他们奋斗的目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主义、独裁、父权制和对传统的盲从都是他们斗争的对象。知识分子致力于使中国人成为富强的、现代的、自豪的国民，致力于使中国在竞争的国际社会中保存其政治实体的地位。有些人致力于通过白话文建立一种新文明，还有一些人在研究西方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著名的西方学者被请到中国讲学。1919－1921年，教育改革家约翰·杜威访问中国，中国青年的开放和批判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青年像中国青年这样一致地、迫切地关注何为现代化、何为观念更新，并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的问题；也没有哪里能像这里一样，在涉及秩序的建立和地位的改变的讨论时，几乎没有任何禁忌。[33] 同时访华的学者还有伯特兰· 罗素（1920年－1921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1922年），玛格丽特·桑格（1922年）和萧伯纳（1933年）。

自由主义西方文化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然而其传播也不是没有遇到任何挑战。有些一度被西方文化吸引的人，感到西方文明太过实用主义。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为害怕中国文化失去自己的民族基础，一些忧虑的学者转而去研究古史和民俗，希望从中找到本民族的文化基础。 随着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关注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为世人奏响了一幅物质极大丰富、没有剥削压迫的美好乐章，极具反西方、反帝国主义的吸引力，而且还证明了革命可以在落后国家中发生。尽管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信条所描绘的各取所需的乌托邦，同中国某些相信大同世界即将到来的造反者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某些共鸣，但它强调的阶级斗争、武装推翻当局与儒家强调协调、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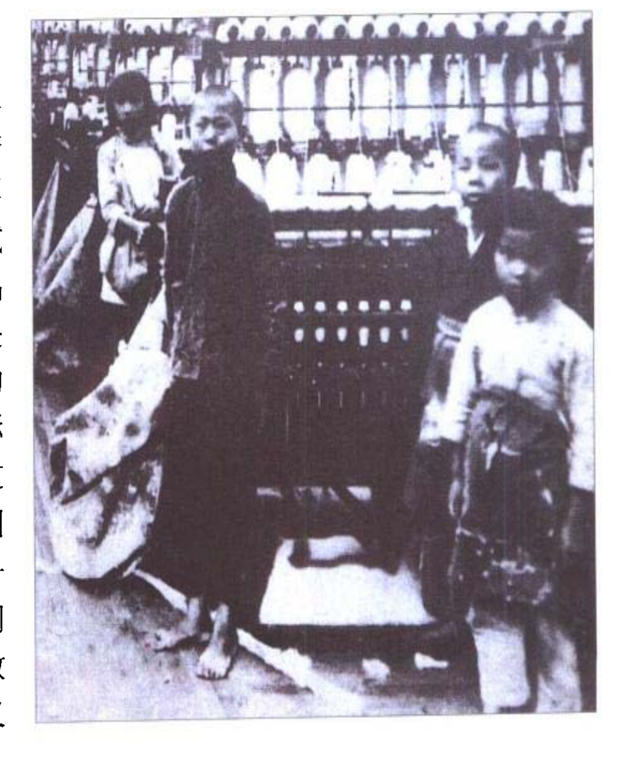
尚等级制度是截然相反的，因而比起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民主代议制政府等，更让传统的中国人感到光怪陆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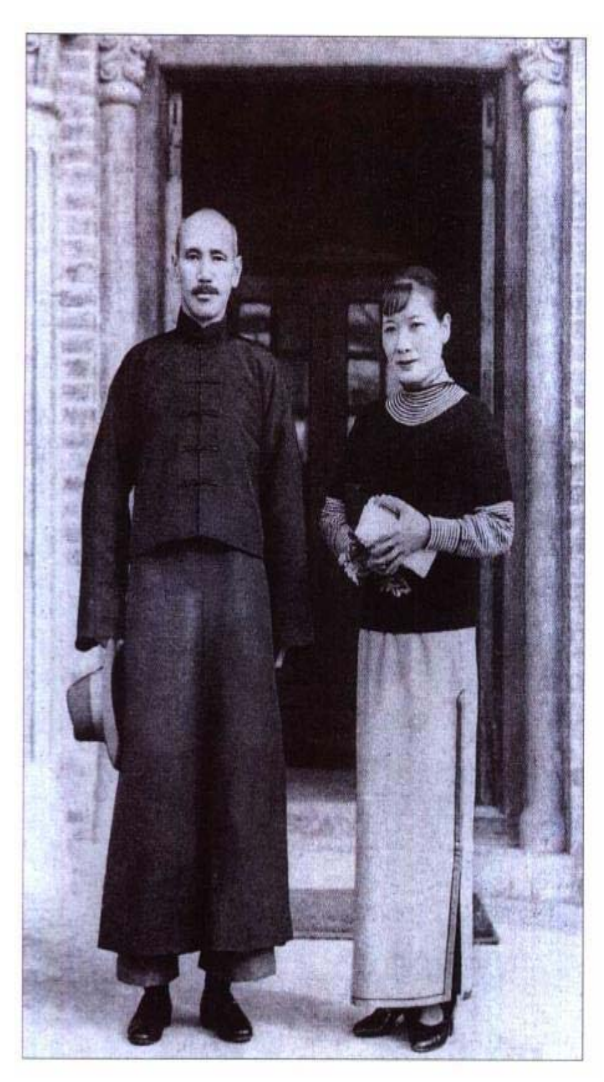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为1919年5月的《新青年》杂志写了一篇介绍马克思理论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解释了该理论关于阶级斗争和资本剥削的内容。很快地，知识分子们就不仅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也阅读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论著了，他们呼唤一场即将到来的国际革命，震荡并彻底颠覆帝国主义的大厦。尽管中国不存在作为革命先锋的城市无产阶级，但李大钊认为，中华民族整体上可以视为被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剥削的对象。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吸引了一些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包括由湖南来到北京的毛泽东。几乎同时，陈独秀也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他结束了因五四运动所受的牢狱之灾后，就不再介绍西方、宣讲民主了。他辞去北大的职务来到上海，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倘若没有第三国际（俄国领导的致力于向全世界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组织）的介入，这些早期建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也许就不那么意义深远了。第三国际得知中国存在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不久，就派代表到中国帮助这些小组转变为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基础。这些第三国际代表教会了中国组织者如何通过“民主集中制”来确立党的纪律；每一个地方组织都向上级组织选派自己的代表，依次类推，直到选出全党会议的代表，再由该会议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名誉委员会；决议可以在小组范围内讨论，然而一旦做出决定，所有党员必须遵守，下级服从上级。列宁主义组织形式强调纪律和集权的程度，是超过中国现存的一切组织形式的。听从第三国际的建议后，1921年7月，在一个由57名党的组织成员选举出的13名代表参加的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这是一个秘密的、集权的、以执政为目的的政党。它与无政府主义者划清了界线，以社会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阶级斗争为首要的斗争形式。

建立党国

20年代初到1949年间，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主要剧目，是建立一个新型的政治中心。袁世凯曾轻而易举地把革命者排挤出政权，这教训革命者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从20年代初开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尝试建立党的国家和党的军队，这二者都是列宁主义所提倡的。国民党和共产党曾两度建立统一战线，但双方毕竟是对手，他们都希望控制拥有全国版图的政府。国共两党的相似之处，主要是受第三国际的影响。1921年，第三国际代表向孙中山提供了援助。此前，孙中山几乎没有得到过列强的支持。外国列强往往认为，谁入主北京谁就是中国的合法政府。新建立的苏联则不同，它的兴趣在于建立一个革命的中国，如此一来，不但可以向世界传播革命，同时又可以去掉他在东方的一块心病，即孱弱的中国会招致日本的觊觎，并助长其扩张的野心。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

纺织厂里普遍地使用童工，不仅是因为童工的工资低，而且因为童工的手指细小，能够更好地照看纺织机。





1927年，蒋介石同宋美龄结为伉俪。宋美龄是一位信奉基督教的富有实业家的女儿，也是孙中山遗孀的妹妹，她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能讲非常流利的英语，并为赢得美援而努力工作，(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在外交方面的作用尤为明显。

的理论，社会革命要分阶段进行。中国还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所以对于中国而言，以推翻帝国主义为目的的国民革命似乎是下个阶段的任务，只有在将来条件成熟以后，社会革命才会在中国取得成功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

为使国民党的组织严密化，第三国际派顾问到中国把民主集中制介绍给国民党。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把他所阐释的“三民主义”确立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所谓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和民生主义（现已同社会革命并称）。第三国际首先考虑的是帮助孙中山建立党的军队，以便通过军队取得政权。到1925年为止，第三国际向中国派出了约1000名苏联军事顾问。同时中国也派军官赴苏联考察。蒋介石（1888年－1975年）在赴苏联进行了为期4个月的军事培训后被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刚从法国归来的共产党人周恩来(1898年－1976年)被任命为该校政治部主任。

第三国际代表在帮助国民党建立权力基础的同时，还继续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引导。不久以后，也就是在20或30年代，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与国民党几乎同样多的成员和支持者。1922年，在第三国际的督促下，中国共产党做出了与国民党联合的决议。结果共产党员一方面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另一方面又继续参与共产党的组织活动。

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业的向前发展，为劳工成长和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提供了土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产品出口能力的急剧下降为中国工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契机。1914年－1922年间，中资纺织厂内的织机数目增长了3倍，由4800台增至19万台。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工厂的条件糟糕得像100年前的英国工厂那样，纺织厂的工人实行每周七天工作制，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20个小时，而且普遍地使用童工。包工头从农村招来工人，以债务奴隶的形式控制他们，仅供给他们最低水平的食宿。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办厂（日本工厂越来越多）加剧了工人与工厂主之间的矛盾，工人们在组织者的鼓动下经常进行罢工。1921年全国有55起大罢工，1922年达到91起。随着罢工的增多，镇压工会组织的暴力事件屡有发生。仅在1923年河南的一次镇压行动中，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就杀害了65名罢工的铁路工人。

在通商口岸地区，工人反对帝国主义工厂主的斗争，与反对不平等条约、反对外国人在华特权的斗争逐渐交织在一起。1925年5月30日爆发了一次最大的骚动。英国巡捕向在上海国际租界示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11人。这几乎立刻就激起了全国性的罢工、抵制洋货和示威游行。6月，英军又在广州枪杀了52名示威者，一场规模浩大的罢工和抵制同香港贸易的运动随即爆发。此种情形证明，共产党和国民党苦心营建的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已大获成功。看起来，在全国范围内动员爱国志士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这对“孪生魔鬼”，取消不平等条约，将国家重新统一在一个强大而有决断力的政府之下，结束通商口岸的半殖民地状态

的时机已经成熟。

1925年，在北伐统一全国的前夕，孙中山因癌症去逝。此后，尽管有几位来自左派或右派的领导人先后继任他的领袖职位，但刚刚改组过的国民党依然保持了团结。1926年7月1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誓师北伐。在共产党组织的沿途工农群众的帮助下，北伐胜利进军。1926年底，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国民党左翼开始掌握政权。

在北伐胜利进军的时候，统一战线内部已经隐藏着深刻的分歧。统一战线对于国共双方而言都不过是权宜之计。许多国民党的支持者感到了来自阶级斗争宣传的严重威胁，国民党军队内部也存在着许多坚决的反共分子。1927年4月，国民党军进驻上海，蒋介石组织上海黑社会中专事敲诈的青帮分子，对上海的工会成员和共产党员进行屠杀，几天内就有数以千计的人惨遭杀害。蒋介石借此牢牢地把国民党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尽管形势如此危急，武汉的第三国际代表和共产党领导人还是听从莫斯科的指示，试图通过做国民党左派的工作来挽回局势。1927年8月，共产党军队终于开始反击，例如毛泽东发起的"秋收起义"。但这一起义同其它地区类似的起义一样，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从1927年到1930年，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肃清共产党人——在某些地方，军队判定一个青年妇女是否是共产党员的惟一证据竟然是她是否留着短发。保留下来的共产党组织，都被迫转入地下或者进入农村活动。

在白色恐怖弥漫的同时，国民党武力统一全国的进程仍在继续。1928年，国民党赢得了三派主要军阀的拥护，进而统一全国。国际承认也接踵而至。中国的

1927年，国民党占领上海后把矛头转向了共产党人，他们制造了"白色恐怖"，搜捕、杀害工会会员和共产党的组织者。





1923年，共产国际派遣有经验的组织者米哈伊尔·鲍罗廷来到中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鲍氏运用严格的纪律和中央控制将其改造为列宁主义政党。图中所表现的是1927年北伐期间，鲍罗廷在武汉的一次集会上的情景。

前途看起来比过去几十年要光明得多，许多归国的留学生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国民政府似乎也日渐接近外国列强。此后的几年里，列强答应削减他们在华特权。中国恢复了关税自主权，列强控制下的海关、盐政、邮政也相继回到国民政府手中，外国特许权由33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的治外法权也被取消。

自1928年起，蒋介石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他出身于宁波附近的一个地主商人家庭，曾一度热衷于科举。科举考试废除后，蒋介石赴日本学习军事，在那里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组织。出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对蒋介石地位的上升，意义十分重大。这一任命使他得以与党军中的青年军官打得火热。此外，蒋介石还是一位颇有技巧的政治家，在处理党务和政府事务的过程中，他充分显示了制衡不同派系、建立与主要实力派人物私人关系的卓越才能。

由于新政府担负着控制军阀残余、镇压共产党、抵御日本侵略图谋的重任，所以蒋介石在国家建设方面的主要工作仍集中在军队建设上。纳粹在动员全国和全民军事化方面的成功深深地吸引了蒋介石，因而他把军队现代化的希望寄托在学习德国上。德国军事顾问帮助蒋介石建立了一支精英兵团，帮他谋划对江西共产党根据地的战争，同时为其输入德国军火做了安排。除开军队现代化之外，国民政府也筹划着经济的复兴和现代化。以往的军阀利用对铁路的控制权等达到私人目的，此类的破坏性活动，使中国经济遭到沉重打击。在经济问题上，国民党主要是寻求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的指导。受过西方教育的经济学家和工程师担起了这一重任，开始着手银行、货币、税收、交通运输及通讯设施的现代化。

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蒋介石在清除军阀反对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在国家建设方面则要逊色一些。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蒋介石对体制的疑心，他并不愿在权力中心内部出现反对派。为了清除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倾向，建立起支持政府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受当时欧洲法西斯运动的启发，蒋介石于1934年发起了一场以思想教化为目的的“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宣称该运动的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全体国民生活军事化，以增进其勇气和敏捷，增强其对艰巨工作和痛苦的耐受力，特别是养成人们联合行动的习惯和能力，以便将来为民族牺牲”。[53] 蒋介石的另一个法西斯行动，就是创建黄埔军校毕业生组织——蓝衣社，其成员要宣誓以一种节俭、清廉的方式生活并绝对效忠于领袖蒋介石。“蓝衣社”后来在国民党的秘密警察队伍中充当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30年代初期的中国看起来正迅速走向现代化。尽管时值世界范围的经济大萧条，中国的主要城市还是呈现了一派西方景象：城市中产阶级通常穿西装上班或上学；矗立在主要街道上的银行、交易所和俱乐部都是大型欧式建筑而非传统的四合院；外国人及其财产遍及各沿海通商口岸。这种情况与该时期东亚、东南

亚等欧洲殖民地的情形毫无二致。但其它城市的情况则显然不同，例如北京就依然保存着高大的城墙，然而诸如电力一类的进步设施，还是在逐渐地改变着这些大城市的运行方式。随着高等教育、公众评论的出现，中国人甚至连思维都采用了西方模式。不仅是知识分子（旧文化精英的承继者），就是科学家、工程师、建筑师、经济学家、物理学家及其他具有专业技能的专业人士，通常也因赴国外留学而接受着西方的影响。而在中国受教育的人也在逐渐习惯于西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他们阅读西方书籍、受教于外国教师，特别是在他们进入许多教会大学学习之后，就更是如此。当然，谁都会想到，城市里除了中产阶级的繁荣景象之外，还存在着一个更庞大的劳动者世界，而这些城市贫民的生活，似乎是根本不可能有所改观的。1937年，老舍就曾发表过一部反映北京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优秀小说——《骆驼祥子》。毕竟，即便西方也存在无产阶级，对那些希望看到中国迈向美好前景的人们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是会让他们感到兴奋的。

国民党为把中国建设成富强、现代的国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也颇有一些可称道之处，但他们的努力始终集中在城市而非乡村。英国的经济学家R·H·托尼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访问过中国，他发现中国的农民已经陷入了生态危机：森林被砍伐、土地遭侵蚀以及地力衰竭、洪水泛滥，而原始的耕作技术、薄弱的信托系统、落后的交通运输、剥削性的租赁制度，又使这些危机雪上加霜。他在报告中写道，“在某些地区，农民们的处境就像是长期站在及颈深的水中那样，甚至一阵涟漪微波都会将他们冲倒”。[3]大部分农民的生活自清代以来就没有什么提高。持续的人口增长——到1930年，全国人口已超过5亿——日益对土地供应增加着压力。现代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如便宜的铁路运输和廉价消费品都猛烈冲击了农村经济。由于日本和印度的竞争及大萧条带来的国际需求的下降，中国的丝、茶出口也陷入了困境。此外，农民还受到地方流氓、军阀和视自己的生存高于一切的地方精英的侵害。国民党中央政府在农村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方面少有建树。由于北伐是因为得到那些乐于投资国民党的人物的支持才成功的，而这些形形色色的地方强人又合而为一，所以中央政府就给了省政府极大的自主权。国民政府以及非官方的慈善机构都赞助过一些乡村重建项目，例如，提高农村教育水平，建立信托便利社、鼓励现代企业和组织农民协会等。但这些也只是在小范围内收到一些短期效果。而等到清共之后，甚至像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这样的基本改革，看起来也有共产主义的嫌疑，故而难以为继。

妇女解放

在20世纪初叶的诸多社会变革中，最基本的一项就是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的转变。女子几千年来不容置疑的社会地位，在20世纪初叶的几十年里遭到了抨击。妇女们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社会活动中来，这在以往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20世纪初的政治革命家和文化革命者——从康有为、梁启超到孙中山、陈

独秀、鲁迅和毛泽东——全都指出，必须重新认识女性，必须改变对其社会角色的传统界定。本世纪初，妇女问题的焦点在缠足和女子教育方面。一时间，曾被人们标榜为中国文化优越性的基础，并引以为骄傲的一些行为规范，如妇女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和缠足，变成了令人羞愧、难堪的行为。外国人认为缠足是中华文明野蛮一面的体现，这种观念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人，增强了他们取消缠足的决心。反对缠足者把缠足描绘成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习俗，它使大部分的中国妇女变成残疾，已经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块绊脚石。1890年，中国最早的反缠足会成立。该会由男子组成，他们一致同意不为女儿缠足，而且不为儿子娶缠足的妻子。20世纪早期，中国天足妇女的比例稳步上升。当然，中国还有一些缠足的老年妇女，但毕竟让一个10或12岁的女孩把脚缠小是极痛苦、极困难的事，所以1930年以后，只有在一些人口分散的边远地区，年轻的女孩才缠足。

在这时，妇女政治活动家也开始出现，秋瑾就是其中一个。她亲眼目睹了义和团运动和帝国主义占领北京的情形，此后就变成了一位热烈的民族主义者。由

到了本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市民对女学生上街抗议政府的行动已司空见惯了。这张摄于1949年的照片再现了女学生对黑市行为的抗议。



于婚姻不幸，秋瑾于1904年离开丈夫赴日留学，进入一家女子职业学校学习，但她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学习革命政论上，甚至还学会了制造炸药。同时，她也发表女权主义言论。在演讲和文章中，她强烈反对杀害女婴、妇女缠足、包办婚姻、殴打妻子和寡妇守节，号召妇女不要在压迫面前屈服，不要再试图取悦男性。1906年，秋瑾回到上海创办了《中华女报》，并在一所女子中学任教。但无论如何，排满革命始终都是秋瑾的目标所在。1907年，秋瑾因参与一次功败垂成的反满起义而被处死，但她却因此成为许多青年人心目中的女英雄。

在这一时期，秋瑾任教的那类女子学校越来越多。1907年，清政府批准建立女子教育系统。到1910年为止，全国有女子学校4万多所，学生160万人。到1919年，女子学校的数目增至13.4万所，共有学生450万人。尽管入校读书的女子人数仅为男子的七分之一，但这标志着女子在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方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1920年以后，女子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有增加，到1935年全国已有招收女生的专科院校、综合大学及师范院校6000所。这为大城市提供了充足的女教师、女护士和女服务员。当然，农村的变化要缓慢得多。20世纪30年代对农村家庭的一次普查表明，受过教育的女子所占比例尚不足农村妇女总数的2%，而男子则为30%。中学和高校中的女性同她们的男同胞一样，受到了新观念的冲击，也同样热衷于现代派的新事物。《新青年》的一期专号曾全文翻译了易卜生的剧作《玩偶之家》，女主人公娜拉在剧终的时候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去寻求属于自己的命运。此后，中国无论男女都开始沉迷于新女性。这部戏很快就在全国各地公演，人们也逐渐理解了其中一些句子的含义，例如“不要做男性的玩物”，“张扬个性”及“要求自由”等等。在人们的心目中，恋爱自由是正当的行为，听从长辈之命是懦弱的体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也认为这些新目标是轻而易举就能达到的。1931年，巴金出版了一部相当流行的小说——《家》。在这本书中，他描绘了一群生长在富有的旧式学者家庭里的年轻人，他们努力同家庭中的传统道德和传统权威抗争，以免自己在其重压下粉身碎骨。儿子和女儿、主人和仆人全都陷入了重重罗网，然而女性拯救自己所面临的阻碍，比起男性来要强大得多。

为改变人们对家长权威和妇女社会角色的传统观念，活动家们不断地进行尝试。此外，他们也努力地去改变妇女的法律地位。尽管对妇女选举权的要求并未成功，但在本世纪20年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组建了妇女部，都通过决议给妇女以平等权利和结婚、离婚的自由。离婚是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正如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所说，如果不答应妇女的离婚要求，她们就会失去对妇联和我们所倡导的妇女自由的信任。[57] 但要是认同离婚，又会同农民联合会发生矛盾，因为农民娶妻是很不容易的，他们大多已经给了不愿意嫁给他们的女孩许多彩礼。国民党一上台就制定并于1930年颁布了新法规：女子有权拒绝履行儿时父母为其订下的婚约，自己选择丈夫；女子与其兄弟享有同等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妻子与丈夫拥有平等的离婚权。翌年又颁布了新劳动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

对于非受教育阶层的妇女来说，这些法律变化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在农村，国家既没做宣传普及婚姻法的工作，也没给农村守法者以任何形式的优待。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对农村的调查结果表明，不仅包办婚姻和儿子继承仍在继续，甚至连法律的改变都很少有人知道。关于女工生活的那些变动，与其说推广了男



女平权的新思想，还不如说促进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兴起的工业城市为妇女提供了许多的就业机会，但几乎没几样工作是有吸引力的。1930年，上海有17万妇女在工厂里做工，但差不多有一半是在棉纺厂，此外还有5万妓女和几乎同样多的女佣。典型的妓女或纺织女工都是包工头从农村招募来的未婚的文盲女孩。包工头一般是预先付给女孩的父母少量的报酬，然后在城市里给这些女孩安排工作和食宿。她们往往处于债务奴隶的境地，几乎没人能通过某种途径获得解放。一些工厂的女工加入工会并参与了罢工斗争，其余的则寄希望于嫁人，但嫁人又使她们重新回到了父权家长制结构之中，而这一结构恰恰是被知识女性视为践踏女权而大加谴责的。

左图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上海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城市，新事物与旧事物、富人与穷人擦肩而过，并行不悖。图中两位以缝补为业的妇女正坐在一家洋帽店前缝补衣服。

抵抗日本侵略

自1919年五四运动时起，中国的爱国者就已经把日本视为中国主权的最大威胁。1895年，日本占据台湾；1905年，日本在战胜俄国之后，取得了了在南满的统治地位；1915年，日本通过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又向中国攫取了广泛的经济特权。驻扎在满洲的日军，名义上是在保护铁路和其它的经济利益，实际上一直都在致力于扩张日本人的权限，以使日本军队踏遍中国国土，是彻底的军国主义者。1928年，日本军官暗杀了满洲军阀张作霖，他们希望通过制造危机来扩大日本在满洲的权力基础。1931年，日本士兵引爆了南满铁路的一枚炸弹，然后以自卫为借口占领了沈阳城。中国方面没有进行军事抵抗，只请求国联干预。而国联除了确认日本侵略之外，并没有给日本以任何实质的制裁。1932年1月，日本为报复中国的抗日活动而进攻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一个国际性的城市，所以日本的进攻，特别是对平民居住区的轰炸，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谴责。四个月后，日军撤离上海。但日本在满洲建立了一个傀儡政权，由逊清皇帝出任“满洲国”的首脑。

日本的侵略燃起了全国人民的怒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起来。各种以挽救民族危亡为目的的组织纷纷成立，抵制日货运动也蓬勃发展。面对日军的优势火力，蒋介石同当时大多数军官的想法一样，认为中国根本就不能同日本作战。基于团结就是力量的传统观念，蒋介石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应聚集在一个领导之下，抗击日本这个人口仅为中国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侵略。所以，蒋介石的政策一直是攘外必先安内。直到1936年，一场政变爆发才迫使蒋介石改变了他的既定政策。是年，被日军赶出满洲的中国军队（即东北军——译者注）扣押了赴西安视察的蒋介石，他们提出除非蒋介石答应建立国共统一战线、一致抗日，才肯放人。

1937年，日本再度制造借口，扩大占领区，于是蒋介石决定开战。蒋介石最初似乎是希望通过一次迅速的胜利来向日本证明，南京政府是一个不容小视的力量，日本要做的应该是与国民政府谈判，而非继续扩大侵华战争。但事与愿违，日军向南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攻势。蒋介石被迫放弃北京和天津，但他还是利用手中最精锐的部队在上海把日军拖了三个月。蒋介石要求他的部队全力以赴，奋勇抵抗，这一战役使中方伤亡达25万人。上海沦陷后，国民党军顺势撤往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1937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犯下累累罪行，残杀了数十万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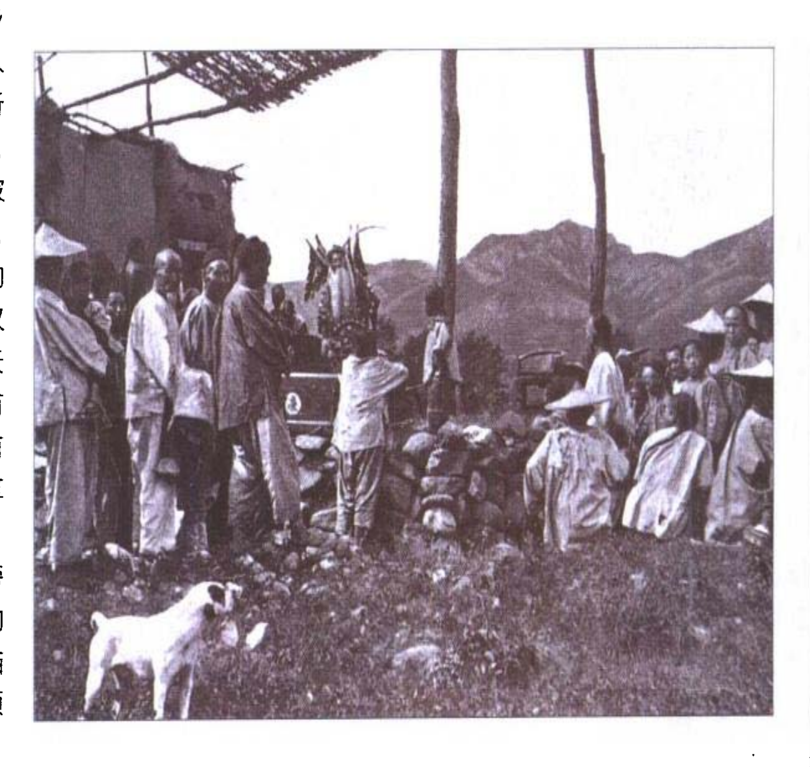
农村的集市

尽管新观念、新技术有其轰动的效应，但对于存在着80%－90%的人口的广大中国农村而言，文化变革的速度是缓慢的。到1920年底为止，大部分的村民都不再缠足，而且也愿意让他们的子女去现代的学校里读书。然而，甚至到了40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依然更多地集中于集市、节庆和例行的仪式上，而非阅读报纸和杂志，至于听收音机和留声机的就更少了。

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还是有一些特定的文化方式在全中国普遍流行。比如春节、春节以后两周举行的灯节、春天扫墓的清明节，还有一些别的季节性节日，都是一些全国性的庆祝节日。这些庆祝活动为人们提供了娱乐、交际和享用特定食品的机会。另外一种民众普遍关注的乡村文化就是庙会。在不同地区，庙会举办的日期也有所不同，日期往往根据大的村庙里供奉的神的生日而定。这些庙会是乡村中的一种重要的社区活动。首先要成立一个会来筹集资金，做一些筹备工作，举办庙会的那天，成百上千的临时商店和摊点一下子冒了出来，把穷乡僻壤变成人如潮涌的商贸中心，农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必要的贸易，既表示了对神的崇敬，又从中获得了乐趣。一些流行的文化形式也使庙会活跃了起来，其中包括舞狮、踩高跷等艺术赛会以及充满了鼓、钹和喇叭的音乐演奏。

20年代晚期有关河北的一个调查数据表明，在那里一年要举行50次庙会，其中35次在乡村，其余的在城市。某村共有326户人家，庙会是为一个有关荞麦的神举行的。庙会的第一天，人们要到庙里去，许多人整日整夜地烧香、磕头。神像被披上了新袍子，专门有人为其扇扇子，神像前还供奉了许多美食。接下来的三天都用来从事商贸和娱乐活动。仅商店和摊点就占了25亩地，那里一天之内就吸引了上万人。骡马市上约有2400 头牲畜在交易。众多的摊点中有80家做衣服的、20家剃头的、10家算命的以及30家卖珠宝的。看西洋景的、说书的和艺术赛会的专家们则在一旁随时提供附加的娱乐项目。赌博在别的场合是不被认可的，但在大多数的庙会上，它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一个项目。戏班的自由演出——大家也视其为奉神的方式——也是乡村庙会的一个普遍特点。文盲和半文盲的农民，都是被当地戏剧爱好者和流动专业剧团培养起来的大戏迷。同样是在河北农村，业余剧团一般由15－16个男人组成，其中一些人饰演旦角。唱得最好的人往往收一些男孩子做徒弟，教会他们扮演一些角色，教会他们必须记住的。演出的剧目都倾向于传统剧，有孝道故事、贤淑故事和战场上英雄的故事，神灵往往也会进来插一脚，但为其安排的情节常常是引人发笑的幽默。乡村妇女是最热衷于赶庙会的，她们不仅参加自己村里的庙会，还到邻村去赶庙会。妇女和孩子们都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离开家庭参与娱乐、走亲访友。有些妇女会在庙会上出卖她们的手工制品，但大多数是去享受逛摊点和看戏的乐趣的。

下图 村民们经常是站着或是坐在地上看戏的。这张1910年以前拍摄于山东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一点。



和逃亡的士兵，强奸了至少2万名妇女，把南京城变成一片废墟。外国新闻界广泛报道了这灾难性的七周，他们称之为——南京大屠杀。

在接下来的一年中，日军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华东地区。他们在这些地区建立起傀儡政权，由汉奸出任政府首脑。国民党军从开封撤离时，蒋介石命令其工程人员炸毁了黄河大堤，洪水把4000个村庄变成了一片汪洋，阻挡了日本人三个月。国民政府的首都先是迁到武汉，随后又迁抵四川腹地重庆。中方撤至重庆后，战争陷入僵局。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4年日本再度发动攻势。中方占领区以全国5%的工业产品养活着60%的人口。在建立新的工业基础方面，中国工程师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日本不时的轰炸、1939年苏联援助的中止以及1942年中缅铁路的封锁，都使建立现代化军队、把日本赶出中国去的目标变得遥不可及。1941年以后，在美国顾问和穿越封锁线由缅甸运来的美援的帮助下，蒋介石得以组建起一些现代化的独立部队（军或师——译者注），但号称500万的中国军队中，大部分是训练不佳、士气低落的士兵。

在日本侵略的最初几年里，国民党与共产党确实进行过名副其实的合作。但在1941年的1月，共产党的新四军因为没有迅速地按命令撤到长江以北而招致国民党军的攻击。仅战死的就有大约3000人，此外还有许多人在被捕或解往监狱后遭到枪杀。这一事件爆发后，国共合作大体上宣告终结。国民党对共产党在延安的根据地实行封锁，导致这一时期根据地的武器和食物都极度匮乏。

当时国际上盟国的情况也是瞬息万变。在1941年－1942年间，英国已经无力对香港、新加坡和缅甸施加保护，以使其免于日军铁蹄的践踏。很显然，大西洋的权力中心已经转移到美国。蒋介石的夫人——受过完全美国教育的宋美龄开始频频在美国的新闻媒体上露面，为中国的利益进行卓有成效的游说。罗斯福未雨绸缪，计划在战败日本后，促使中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他说服了其同盟者接纳蒋介石为开罗、雅尔塔等盟国重大会议的成员（尽管邱吉尔认为让中国跻身四大国完全是"一场绝对的闹剧"）。这种地缘政治的结果是：虽然中国一直因孱弱和落后而被轻视，但它还是成了战后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

共产党人的胜利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共产党的兴起是最受研究者集中关注的课题之一。学者们越是去发掘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历史，就越能发现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比比皆是的政府腐败，不断上扬的通货膨胀，难于解决的贫困问题，被离间疏远的教育精英，存而不废的军阀主义等等。把这些事实汇集到一处，使人觉得共产党人的胜利似乎是偶然的，他们不过是在国民党失去大众支持的时候，恰逢其时地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罢了。但如果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共产党的地方政策还是给研究者以巨大的震动。共产党把令人忧虑的农村贫困和外国入侵看作是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利用这些使农民相信目前急需进行彻底的变革，而共产党则是实行此项变革的最佳人选。按照这一思路，共产党人的胜利似乎又是注定的，这是在正确战略思想和组织方法的指导下的结果。若是深入研究共产党的内部政治，还会发现毛泽东（1893年－1976年）作为一位熟练的战术家，他在把共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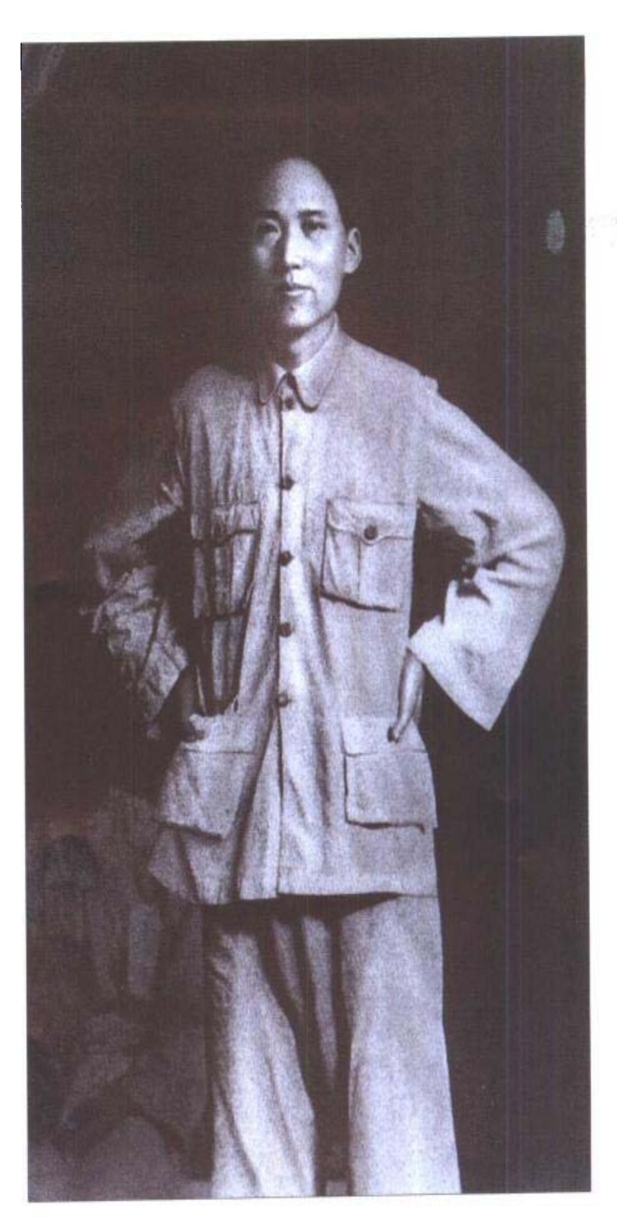
党改造为强有力的革命力量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一切似乎是毛泽东按照其意志一手完成的。也许，上述三种判断方法都是正确的。如果国民党能更成功一些，那么无论共产党有怎样的内部组织和外部战略，都不可能使中国发生革命；而中国革命能如此迅猛地发展，同毛泽东个人的思想、经验和性格是密不可分的，同他成功地制定了关于培训干部和发动农民的政策息息相关。

毛泽东出生在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母亲并不识字，父亲是一个勤劳吃苦的农民。他的父亲逐渐积攒起一份家业，按照成分划分可以算是富农。毛泽东是在现代教育系统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在湖南省的省会长沙读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后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在北京期间，毛泽东参加了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后来，他响应李大钊关于受过教育的青年到农村去组织农民的号召又回到了湖南。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毛泽东作为湖南省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在整个20年代，毛泽东都在做农村的工作。

在国民党1927年－1928年的清共之后，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一部分在主要城市做地下工作，其余的就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乡村建立根据地。面对当时的形势，共产党必须纠正以往的错误并制定出下一步的行动纲领。尽管陈独秀实际上是在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还是做了替罪羊，他以“机会主义”的罪名被解除了领导职务。毛泽东率领数千人深入湖南和江西交界的山区，在那里把其他共产党人联合起来，成立了江西苏维埃。通过诸如分田地、家庭革命之类的社会政策，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支持。1932年的秋天，苏维埃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合并，后者被迫于同年底撤离上海前往苏区。在这些年份里，共产党真正面临的危险是对间谍和叛变的恐惧。这种恐惧在共产国际代表带来的思维模式的影响下被扩大了，这种思维模式也最终导致了斯大林的派系斗争和肃反行动。1928年－1935年间，中国共产党在肃反中杀掉了成千上万的人，其中既有他们自己的拥护者，也有国民党的反对者。

共产党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进行了几年的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共产党战败，不得不放弃江西的苏维埃。1934年10月，8万共产党的士兵、干部、搬运工和追随者冲破国民党的包围，开始了充满神话色彩的长征，他们要努力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大部分人的妻子、孩子以及2万多名伤病员不得不留下来。在此后的一年中，红军及共产党掌握的军队不断地撤退和战斗，遭到巨大的伤亡。当转向北方到达了陕西，找到新根据地时，他们已经完成行程约9656公里，穿越了中国的南部和西南地区。尽管有一些新成员和其他根据地的共产党人加入进来，使总人数达到2万，但长征开始时的红军中仅有约8000人走完了全程。在此后的10年里，共产党在陕西中部（应为陕北——译者注）的城市延安建立了根据地。在那里，人们以在黄土崖壁上挖出的窑洞为家。从此，死里逃生的这支队伍开始视自己肩负着近乎神圣的改造中国的使命。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延安。在他眼中，长征存留下来的是一群朴实的、有责任感的爱国者，是创造平等社会的改革家，他们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充满了决心和毅力。他们住在窑洞里，吃得很简单，对被他们号召起来抗日的农民也不存丝毫的鄙视。延安的共产党军队在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无私和忠于集体目标的精神，给外来观察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延安领导人的形象



上图 毛泽东在江西苏维埃根据地积极地推进土地改革。图中反映的是他在1933年的一次会议上向农民发表演说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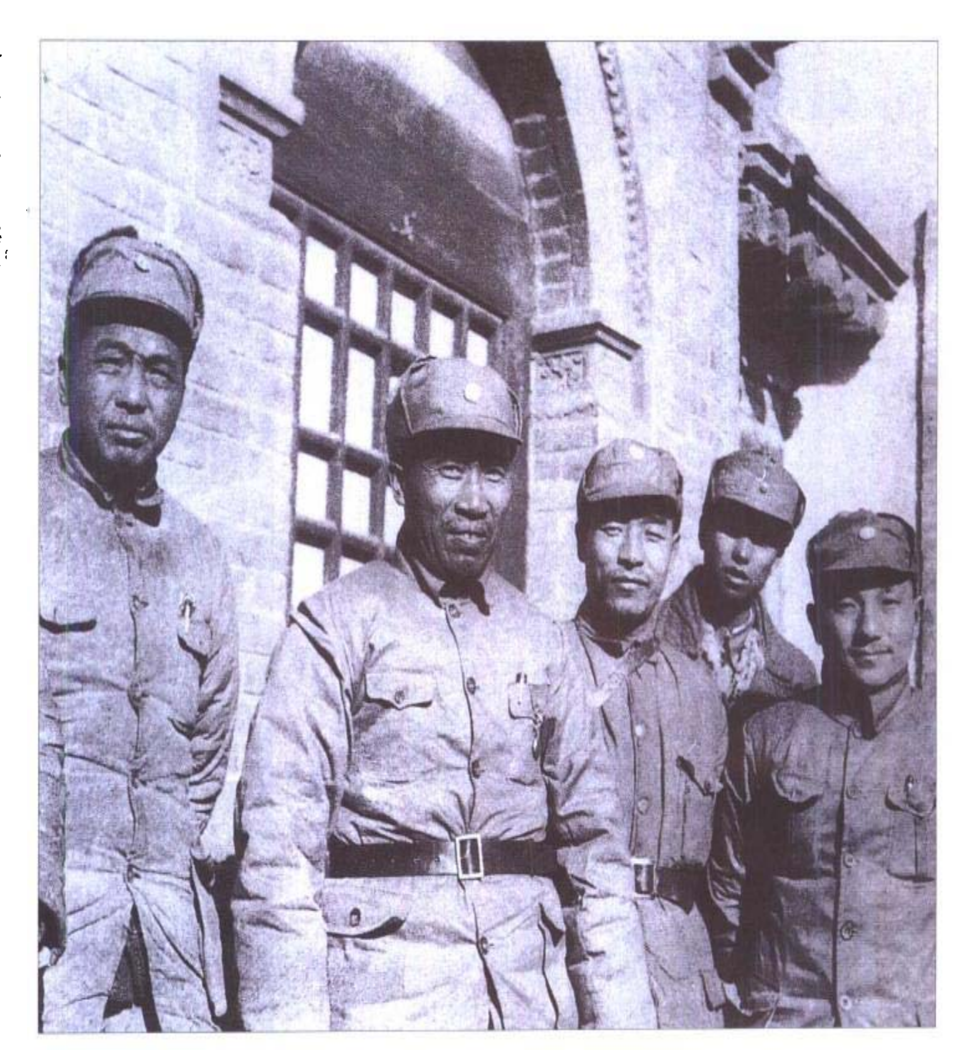
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的洗礼使他们变成一个坚韧而又团结的集体，同时他们又都是充满热忱、颇有思想的革命家。这种形象同样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对于年轻人献身革命这也是一种鼓舞。

毛泽东的经典著作大都完成于延安时期，这无疑为延安增添了光彩。在延安的最初几年里，毛泽东有暇阅读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他在党校进行演讲，阐发他对中国历史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无论是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潜在的革命性，他们认为，农民所体现的是小资本主义的思想观念。在俄国，共产党通过城市革命夺取了政权，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斗争却是失败的，所以毛泽东就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重新解释，他必须通过某种途径把农民视为革命的先锋。在实践中，毛泽东赞誉农民为真正的群众，他创立了一套“群众路线”理论：党的干部要做农民的老师，就必须先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以农民群众为师。延安的每一个人都要以学习小组为单位，研读毛泽东的著作。通过这种形式，共产党就有了一定的语汇和思想架构，由此把人们团结在一起，坚定了大家的决心。

自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后，延安时期党史的另一面开始被披露出来：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并不是通过与其他长征幸存者思想的自由竞争取得的，无情的权力斗争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是一位娴熟的战术家，在斗争中，他让中央委员会把对手划分为偏离政治方向的左派或右派，即冒险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清除掉。当时，越来越多的学生和积极分子汇集到延安。这不仅得益于对毛泽东著作的研究，还与1942年－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完善起来的、用于端正思想作风的一套特别强有力的方法有关。在延安整风中，每个识字的人都被洗脑。这场戏的序幕是对某些固定篇章进行讨论，然后是进行自我批评和群众斗争。包括受批判的王明和王实味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观看了对主要斗争对象的戏剧性的公开羞辱，人们学会了把任何偏离毛泽东路线的思想视为错误，并在他们的头脑中将其归于主观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特征。例如，一个人要是在做自我批评时说他对党内精英的特权（比如别人走路而他骑马）表示不满，就会有人教育他，说这种思想的背后隐藏的是把个人置于集体之上的自由主义观念。许多被要求改正错误的人真的增强了一种新的集体主义意识，也增加了对党的贡献，但从另一方面看，别的人则只是学会了在发言时更加谨慎罢了。

民众的支持对共产党的胜利是至关重要的。从这一角度来说，日本的侵略为中国共产党创造了赢得支持的大好时机。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华北等地区，日军抓妇女去卖淫，强迫男子做劳工，为报复中国人的抵抗而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的种种暴行已经燃起了农民的怒火，广大农民都在准备着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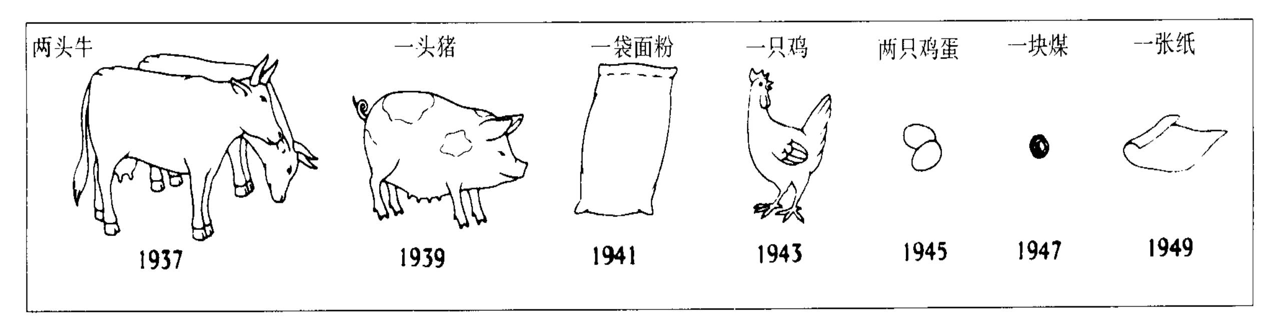
长征中的8000名幸存者在此后的几十年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力量。这张照片摄于1938年的陕西，照片中的人物（由左至右）为彭德怀、朱德、彭雪枫、肖克和邓小平。



起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由于战线的拉长而显得兵力不足，日军只占据了主要城镇，也在铁路沿线布置了防务。这些都为抵抗力量的隐藏和游击队员的活动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抵抗力量不仅包括共产党人，爱国学生也在争夺相对不甚激烈的农村地区从事抗日活动。他们既帮助国民党的抵抗力量，又帮助共产党的抵抗力量。无论如何，共产党对农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控制是特别成功的，他们给了农民最想要的东西——一支友好的部队，他们不偷农民的庄稼，还帮助农民秋收。共产党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他们逐步推行农村的经济改革。在抗日时期，共产党不再讲没收土地，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土地已告完成，取而代之的是按等交租。这一办法实行后，大地主们也愿意出卖不再那么有利可图的土地了。在这一时期，共产党也不再强调阶级斗争，他们欢迎大地主在建军和军队供给方面提供帮助，一些出身于良好家庭并受过教育的青年也被吸纳为共产党员。共产党的宣传员也教农民唱一些歌曲，用以激励大家的爱国主义情绪及歌颂苏联。此外他们也通过开会来对农民进行教育，河北有一个民谣俏皮地说："国民党领导下，税多；共产党领导下，会多。"㉓人们被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努力奋斗，就会创造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人人平等的未来。

对日战争的结束为国共的最后决战提供了舞台。1945年8月，日本的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日本宣布投降。此时日军在中国内地有100多万人，在满洲



20世纪40年代随着国民党对通货膨胀失去控制力，城市居民越发对它失去信心。这幅政治漫画以图表的形式展示了100元法币购买力的下降。

有近100万人，此外还有约175万日侨。单是解除日军武装和遣返侨民就用去了几个月的时间。在这期间，国共两党、美国人、俄国人甚至连一些军阀都在抢占地盘。美国帮助国民党空运了11万军队到上海、广州等主要港口城市，还出动美军帮助占领北平和天津。俄军于8月初进驻满洲，兑现了他们对英美的秘密承诺，即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加入东方战场。他们尽其所能地拆卸日本的工业设备运回苏联，同时也帮助中共武装，使日军大量的武器装备落到了中共手中。到1947年1月为止，美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斡旋，劝蒋介石建立一个反对党可以参与的政府，但所有努力最终付诸东流，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的不得民心很快就显示出来了，无限制的通货膨胀使市民与国民政府离心离德，市民希望国民政府早日垮台。人们普遍认为国民党官兵只会攫取自己的利益，全不为民众的利益着想。因此战争就有了一个令大多数人惊讶的结局：不到两年就以共产党胜利宣告结束。国民党军尽管拥有更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数倍于共产党的士兵，但在战场上还是失败了。蒋介石及其大部分部队撤往台湾，在那里重建了他们的政府。

中国在20世纪上半期所经历的一切几乎没什么是别具特色的。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部分亚洲社会中，受教育阶层都在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的矛盾中挣扎，他们试图建立一种新文化，使其既融合现代科学和西方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诸多因素，又增强而非破坏他们因民族认同而生出的自豪感。中国的经历同印度、越南、印度尼西亚等西方的殖民地颇有相似之处，西方人的特权地位都引起了他们强烈的愤怒和不平。还有几个老牌帝国在20世纪早期的社会革命中分崩离析，俄国的命运无疑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中国甚至与包括德国、奥地利在内的欧洲经济强国也有共同之处，他们都目睹了一度异常强大的皇权的废止，而另有许多君主则安然度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打击。

这些相似不能简单地称之为巧合，反而证明了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真实融入世界历史。19世纪中国历史的进程可以用何为本土的何为外来的加以分析，也可以对外国激发的与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东西进行类比；可到了20世纪早期，这些区分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了。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只不过是中国人在某种环境中创造的而已。在这种环境中，国家的界线是可以渗透的，物质、人民、观念等都在互相渗透，都在以它们原有的方式互相作用着。中国没有哪个领域能够真正避免国共政治斗争或者对日战争这类源于中国外部的影响，但也确实有些人在努力抗争，尽量使他们生活中的某些领域从外来事物的影响和束缚下解脱出来，例如，一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就在全力保存京剧、水墨画等有中国特色的艺术。这些文化爱国者抵御外国影响的行动，恰恰从更深的层面证明了强大的全球化趋势对中国人的生活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现代中国画

在那个年代里，当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通过增强与西方相应领域的联系以改头换面的时候，中国的画家们却创造了一种极为成功的现代艺术形式，他们较少受外国的影响，更多的是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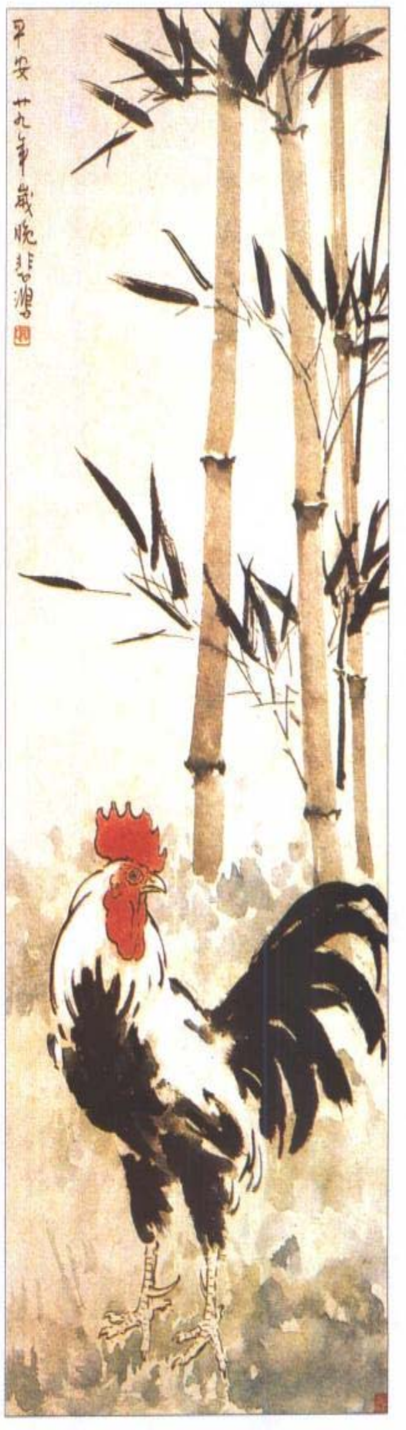
19世纪下半期，当上海成长为中国最大、最朝气蓬勃的城市时，艺术家们云集此地，努力完善一种大胆的缤纷多彩的艺术形式，为之吸引的既包括受过传统教育的学者，也有正在形成的广告精英。上海艺专里的绘画是现代的，迎合了时代的口味，但也并非背叛了传统。他们在努力寻求同时继承新旧两种绘画形式的可能性，保留风景画与反对传统花鸟画在当时同样流行。艺术家们运用西方的阴影技术来达到人物照片效果的同时，也在其中融入了过时了的书法形式。

20世纪初期，绘画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在当时运用新的印刷技术可以印出质量较高的作品，由于新的印刷技术迅速被欣欣向荣的出版工业所采用，所以大量的绘画书籍和杂志得到出版。同时，艺术学校的建立也改变了画家学习绘画的途径。他们可以从学校里学到不止一家的绘画技巧，甚至还包括西方的绘画艺术。1925年，故宫博物院向公众开放，此举将长期被清帝封藏起来的杰作展现在公众面前。通过在画廊举办画展，卖画于此时流行起来，这不仅使公众走近了艺术，而且还使艺术家们获得了谋生的途径。

中国绘画的风格继续朝着19世纪确定下来的方向发展。在20世纪最初的25年里，出身知识分子背景的吴昌硕（1844年－1927年）是一位出类拔萃的画家，早在学画之前，他就已经在诗歌、书法和篆刻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他在以梅、花、竹为题材的作品里运用了上海艺专的绘画形式，但中国的鉴赏家们还是能从他的绘画中发现其早期书法实践所赋予他的力量和自信。

成长于20世纪的下一代画家，已不可能像吴昌硕那样自然而然地选择传统的绘画技法了，但即便是那些出国学





左图　书法对吴昌硕绘画的影响可以从画里大量纠缠的梅枝中显现出来。这幅挂轴绘于1915年，是年吴昌硕70岁，住在上海。

右图　徐悲鸿的这幅公鸡图作于他自欧洲回国四年后的1940年。

习美术的人，也不是对中国的素材、技法和审美尽持反对态度。徐悲鸿（1895年－1953年）曾赴欧洲学习写实的专业绘画技法，从中他发现了根治中国画之重复、模仿的方法。然而，在巴黎和柏林学习了八年之后，他又重新回到运用中国艺术载体、注重吸收中国传统画法以完善绘画风格的老路上来。

民族自豪感在傅抱石（1904年－1965年）为发展有特色的中国现代绘画所做的努力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傅抱石是一个伞匠的儿子，当徐悲鸿发现他的才华并帮助他赴日本东京帝国艺术大学留学的时候，他还是一个奋发向上的学生。在日本，他的老师告诉他，一个中国人到日本来学习中国画是荒谬的，"中国的水墨画从世界上来说都是最伟大、最高明的一种绘画形式，它是你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令人羡慕的珍宝"。[51] 随后，傅抱石转而研究中国美术史，1935年回国后执教于南京国立中央大学艺术系。后来，他一直在徐悲鸿的带领下从事创作。傅抱石在他受到高度赞誉的四五十年代的风景人物画中，对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术和艺术传统进行了赞扬。

20世纪初的重要画家们也不是全像吴昌硕、徐悲鸿、傅抱石那样，走着一条接近旧式学者画家理想的绘画道路。在那些如吴昌硕一样成功地运用上海艺专的绘画风格从事创作的画家中，就有这样的一批人物：蒲华（1834年－1911年），是一个住在上海妓院里的没有显赫血统的画家；齐白石（1863年－1957年），最初只是个木匠，但他的那些富于创造性和戏剧性的家庭题材的绘画作品，如老鼠、虾、蟹、水果却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观众，而王震（1867年－1938年）则是一位成功的上海商人和居士，绘画只是他的爱好而已。



右图　齐白石异想天开、近乎无拘无束的绘画在中国和日本都受到极大欢迎。这幅画作于1935年，据说是绘于烛光之下：一天夜里，画家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家人都已入睡了，只有老鼠还在"读书"。



下图　40年代，傅抱石经常取材于中国诗歌作画，该图就是一例，它描绘了唐代诗人白居易要酒的情景。

第十一章　彻底的重新统一：1949年以来的中国

随着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中国再度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为了建立一种更为平等的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毛泽东及中共其他领导人决定建立一个新中国。在新中国里，由工农掌握权力，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和外国人的作用受到限制。人民被灌输了一种新的价值观：斗争、革命和变化是好的，妥协、顺从和传统则是坏的。财富和权力在很大范围内被重新分配。许多现代化的项目纷纷上马，新的工厂、铁路、学校、医院和水库迅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日常生活也以前所未有的强度政治化了：农民种什么，孩子去哪里上学，读什么书，看什么报，在哪里居住，到哪里旅游，所有这些都被逐渐纳入到政治控制之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共产党开始越发彻底地改造中国。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中国进入了更加现代化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减轻，人民有了更多按照自己方式生活的自由。政府不但允许搞商品经济和个体经营，还开始引进外资、派学生出国留学。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国经济都在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向前发展，对于政府来说，要切断中国与世界文明潮流的联系是越来越困难了。

强化控制

共产党能通过内战上台执政，几乎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那里苦心经营了10年的北方民众的支持，共产党才能够在那里摆开主战场并通过不到两年的实战，打败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1949年10月，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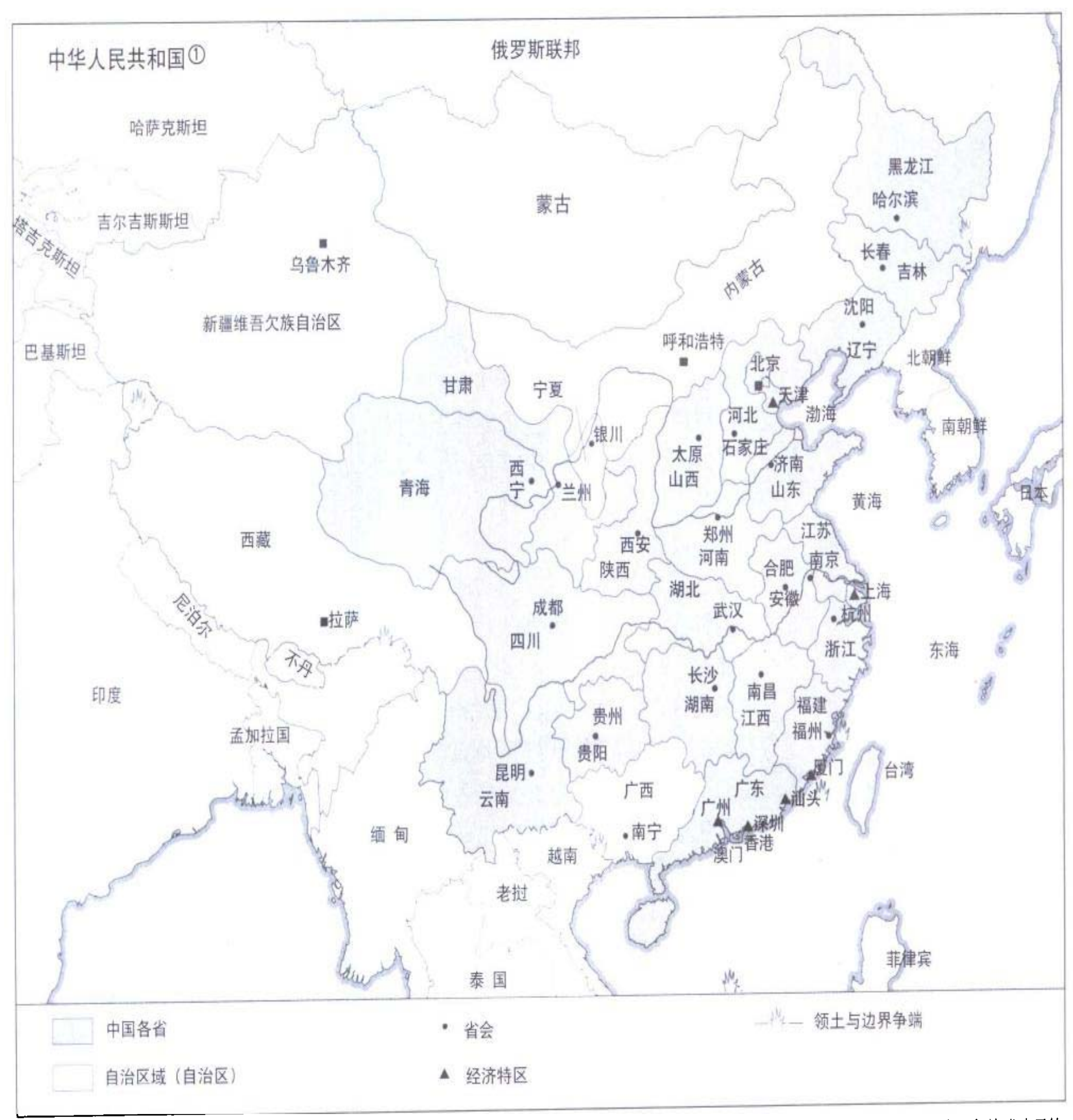
到1949年，共产党对控制农村已经驾轻就熟了，但如何控制城市对他们还是一个新的挑战。解放军一进入城市就严禁趁火打劫，他们彻底清除了城市中的乞丐、妓女、大烟鬼和小偷小摸，通过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从事正当的职业。解放军通过街道委员会来清除被他们视为颓废的东西，如艳丽惹眼的服饰、充满诱惑力的发型等等。但是对于城市设施，如工厂、铁路、报社、法庭、税务局等，则不可能简单地关闭了事，也不可能轻而易举地就由农民出身的士兵来接管。既然共产党希望按照苏联的模式来重建中国，那么这些现代化设施就必须继续运作，也只有如此，转变才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尽管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但其政权的组织形式仍是仿自苏联。这个"人民"中包括富农、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统一战线成员，政府中也有非共产党人出任高职，这样做主要是为了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政府成员总体上是由从乡村到城市的不同等级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但无论如何，最终掌握权力的还是中国共产党。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中共在乡村、工厂、学校、部队及其它组织中，共建立了100多万个党的支部委员会。每一个

支部委员会都要向党的省委、中央委员会等上级单位选送代表，然后选举三个高级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大约由100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大约由12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1949年的政治局常委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候补常委中有邓小平。在常务委员会内部，毛泽东被视为最高领导人，他的设想就意味着实现，他的讲话几乎同圣旨一样必须遵照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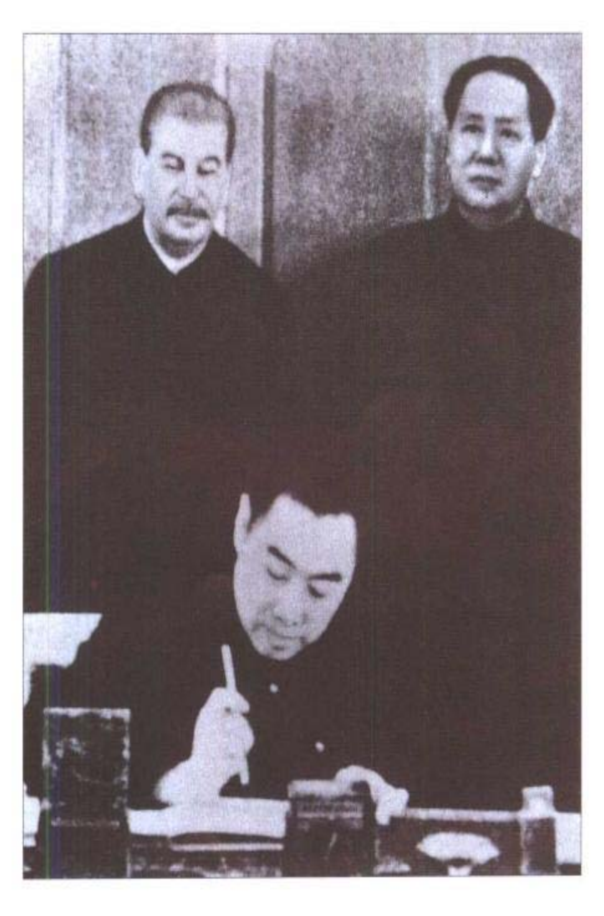
共产党的经济目标是实现经济的恢复和重构。新政府果断地接管银行，控制货币和信贷，不到一年就取得了成果，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同时，在国民党战时经济管制的基础上，新政府还对包括铁路和对外贸易在内的主要工业部门实行控制。1951年2月，政府发动了“五反”运动，以此来清除少数仍在控制私营企业的不合作的资本家。他们动员群众起来指控制造厂商的下述违法行为：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材、偷工减料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仅1951年4月的一个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共由22个省、5个自治区（分别由藏、维吾尔、蒙古、回、壮等民族组成）和3个直辖市（北京、上海、天津）构成。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袭了中华民国时期的疆域。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国陆续和相邻的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签订了边界条约或边界协定、确定了边界的划分和准确走向。发生领土争端的地区一般是在尚未勘定的边界。此图是1988年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1988年之前的中国以《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谭其骧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2页上的为准。——编者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周恩来访问了苏联。此图是他们正在同斯大林签订一个友好和经济合作条约。尽管条约签订了，但毛泽东觉得斯大林并没有向他表示应有的礼貌。



里，上海就有7万名商人被调查或被指控，他们的亲人和朋友也被引导到攻击他们的行列中来，使被指控税漏税、盗窃国家资材、偷工减料及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其所有来返还财物，于是共产党就掌握了更多的工厂，而原工厂主则变为由政府付工资的经理。许多小的工厂、商店和餐馆仍掌握在私人手里，但政府也在通过控制原料和劳动力的办法，逐渐将其纳入政府控制之下。

发展重工业被视为使中国摆脱贫困的重要一步。1950年的上半年，毛泽东赴莫斯科访问，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与苏联签订了关于苏联帮助中国工业化的贷款和技术援助条约。不久以后，中国派出两万多人赴苏联进修，苏联也派出约一万名技术人员到中国援建142个苏联设计的重工业项目。为支付这些项目的所需资金，农业被课以重税。实现工业化的步骤也是仿照苏联模式进行的。按1953年－1957年五年计划所做的规划：钢产量翻两番，电力和水泥翻一番，而与之相比较，消费品虽然也有增长，但比率要小得多——棉制品低于50%，粮食则不足20%。

新政府成立不到一年，还没来得及将其新结构、新政策贯彻到位，中国就卷入了朝鲜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北纬38°线为界，朝鲜被一分为二，三八线以北在苏联的控制下，以南在美国的控制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于是美军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开赴南朝鲜的防线。10月上旬，美军越过三八线，一直打到中国与北朝鲜的边界鸭绿江畔。面对打到家门口的敌人，中国政府打消了原定的军队复员计划。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中国军队秘密渡过鸭绿江。中国共派出了250万军队、几乎全部的坦克和半数以上的飞机、大炮赴朝鲜作战。11月下旬，他们突袭了美军并将其压迫到汉城以南。此后战争就陷入了僵持状态，直到1953年双方才开始和谈。

朝鲜战争巩固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它表明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中国挫败了帝国主义的进攻。但中国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了惨重的战争伤亡之外，中国还因此失去了许多同国内外不同政治力量逐渐和解的机会。美国自朝鲜战争以后，把中国当作冷战的对象，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并派出第七舰队在中国和台湾之间的水域游弋。美国的保护有效地保证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土的对立并存。中国开始诋毁美国，把美国当成自己最大的敌人。为了免于间

谍活动的侵害，中国驱逐了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和商人。

还悲惨的命运还降临到了那些曾经为国民党政府工作或是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过兵役的人头上。当时，他们被怀疑是敌方特务。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爆发。在这场运动中，几万人被处死，还有几乎同样多的人被送去进行劳动改造。同时，这场运动也解除了公民私人持有的武器，仅广东一省就从民间收缴了50万支步枪。

农业集体化

在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中国农民。逐步的农业集体化和农村干部这种新的地方精英的出现，很快就使上亿农民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每当共产党控制一个新的地区，就会教育农民以一种新的方式去看待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就像图片展示的那样，贫困的农民甚至妇女都被动员起来控诉曾经剥削过他们的地主。



旧秩序：社会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都不是天然的，这些都是由财产的私人所有制造成的扭曲的结果；旧的知识精英也不再是一些以更高的道德标准行事的学者，而是一群残酷的剥削者，他们不把人民压榨到卖儿鬻女的地步决不罢休。为了取代过时的"封建"秩序，共产党描绘了一幅共产主义秩序下的新景象——人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公无私地集体性地进行工作。

农业集体化和劳动力的动员，使比以往多得多的妇女投入到农业劳动中来。到拍摄这张照片的1965年止，许多地区的妇女都承担了将近一半的低技术的农业劳动。到了本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男人脱离农业生产的机会增多，农业生产中的重体力活，有一半以上由妇女承担。

将近20年的时间，共产党一直在他们的根据地做重新分配土地的工作。根据政治形势紧急的不同程度，他们采取不同的思路，更换不同的运作方式。有时对抗性是比较弱的，而有的时候，则故意鼓动贫农的敌对情绪来增进他们的革命热情。典型的做法是首先由党派出干部和学生组成的工作组，到农村去和贫农建立联系，组建农会，并在贫农中指定有潜力的领导人。然后，汇集人们的不满情绪，发动对那些人们最不满的人的斗争。最后，在工作组的监督下划分住户的阶级成分。阶级成分主要有以下几种：地主（依靠地租收入为生的人）、富农（出租部分土地，但大部分由自己耕种的人）、中农（自己耕种土地，不雇佣佃户和帮工的



人)、贫农（佃农或小块土地所有者，也受他人雇佣领取工钱的人)、雇农（没有自己的土地，为别人做工的人)。这种阶级划分看似科学，可执行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许多人都认为这种划分方法不太合适，比如说一些寡妇被划为剥削者，可实际上她们只是由于无力独自耕种，才将微薄的土地租给别人。而一些被划为雇工的人，则是出身于一些稍显没落的富家大户，他们只是因赌博或者吸食鸦片败光了家产，所以只好屈尊降贵，为他人劳动来维持生活。然而一旦在阶级划分过程中掺加道德因素，就会出现变通行为，这又为帮助亲朋、攻伐异己创造了可能。在一些村子里并没有多少余财可分，而在另外一些村子里，蓄积起来的夙怨及其对土地所有者的憎恨，使政策的执行变得更加复杂。有的时候，特别是在迫使地主、富农交出偷埋起来的金子时，通常采用的是恐怖手段。地主和富农面临的不只是失去土地，还有对其以往罪行的清算。阶级划分在执行过程中的标准也是不确定的，财产由几万到几十万不等。土地改革中阶级斗争的又一结果，是在农村中形成了一种类似社会等级的体系，最底层包括地主的后代，而以往的贫下中农子弟则成为特权阶层。

重新分配土地只是朝着农村改革目标迈出的第一步，接下来的农业集体化是分阶段进行的。首先，鼓励农民结成互助组；然后，成立合作社，合作社成员的生产资料是合并在一起的，人们按照所投入的土地、农具、牲畜和劳动力获得不同程度的补偿。早在40年代，北方的“老解放区”就已经完成了这一阶段；1950年－1953年开始在南方实行；1954年－1956年，进入第三个阶段，即高度集体化的联合合作社，除了劳动力以外，不再对其它的投入进行补偿。大部分的高级合作社（在1958年－1978年被称为“生产队”）就是原来的村子或是大村子的一部分。一旦高级合作社建成了，农村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就消除了。

在农业集体化的同时，中国政府对粮食市场也实行了控制。每个单位都要上缴收获量的5%-10%作为农业税，个人在留下微薄的口粮之后，要将其部分“余粮”以既定价格卖给国家。1951年－1952年间，作为“五反”运动的副产品，农村本区域内的贸易作为投机买卖（一种极度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遭到取缔。贸易操纵在国家手中，农村市场凋零了。许多农民，特别是一些依靠开办榨油、造纸、制绳等小型企业维持生存的贫困地区的农民，因此而失去了极为重要的农副业收入。木匠和工匠被束缚在土地上，过去他们可以到很远、很广泛的地区工作，而现在只能在本社区内做生意。

农村的重组造就了农村干部这一新的地方精英阶层。政策的制定是由党的高层按照毛泽东的意图，或通过不同路线、不同派系的斗争来完成的，但其变通执行则是普通人民群众依靠党的基层领导人的个人素质实现的。这些基层领导人在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权力。在村子里，队长通常是本村的居民，他们由于具备某种素质而被选举为领导。有的村子里，能读会写、家里有一些书籍、懂得较多农业知识的中农上升为领导人；另外一些村子里，出身赤贫家庭的人则因为在斗争地主、富农的过程中表现突出而得到提升。队长们要想当上先进，一方面必须生产出充足的产品来满足革命的需要，另一方面还得保持队员的生产积极性，要让队员们相信他们被拿走的并不多。要做得成功，他必须有技巧地讨好双方，并在必要的时候让事实出来说话。随着生产单位的合并扩大，农村干部不

得不花大量的时间来发动队员和平息他们之间的纷争。生产队长及其他的地方积极分子，都有机会在党内得到提升。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封建时代的社会流动方式。中国共产党稳步地发展壮大，党员人数由1947年的270万增至1953年的610万。到1961年时，党员人数已达到1700万，其中许多都是参加过红军的贫苦农民，或大型政治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

新中国

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对社会生产结构进行改组，他们还渴望彻底改变中国文化和国家体制。中国新的领导人称他们在内战中取得的胜利为“解放”，中国人民已经从过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他们要建立的是一个崭新的、现代的、高瞻远瞩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中国不再被世界历史拒之门外，她将赢得属于自己的中心地位。中国将对全世界展示社会主义的巨大潜力，使广大中国人民摆脱贫困，建设起更加美好的人类共同体形式。

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和宣传队迅速接管了出版业，他们的任务就是普及上述观念。大、中学校也纳入了党的监督之下，由苏联式的教育部直接颁发相关的指令，如选择中国历史教科书、推广普通话作为标准语言等。此外还建立了大量的群众组织：城市的街道委员会、青年团、妇女联合会以及工会。党务工作者在组织这些团体开会的同时，兼有向群众学习、关心群众、使群众拥护新政策的任务。他们把会议厅和其它建筑物，全都用宣传共产党口号的海报和旗帜装饰起来。这些做法在50年代早期相当成功地动员了人民，宣传了党的思想和政策。人们开始用能表明他们爱国主义思想的字眼来为孩子取名字，比如“建国”或者“兴国”。

新中国需要一些新的东西来象征她的诞生。于是老北京换上了新装以符合其新中国首都的身份。50年代后期，北京周围高大的城墙因为阻碍交通而被拆除。与此同时，古老的皇宫南部的建筑也被清理掉，腾出的地方建成了世界最大的广场——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建成后不久，就在那里举行了盛大的劳动节和国庆节集会。在广场的两侧建起了两座巨大的俄式建筑——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广场的正中心耸立的是一座高达30.48米[①]的雄伟的石制纪念碑，用以纪

天安门广场既保留了一些清代建筑的精华，又新建了许多苏联风格的宏伟建筑和空地。



① 人民英雄纪念碑实际高度为37.94米。——译者注

念人民的英雄。纪念碑的底座饰有描绘一个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的浮雕。无论是纪念碑还是广场，都不是旧中国城市的组成部分，只有这种国际社会的建筑形式和城市规划，才更符合中国当时的面貌。同时，推广这些建筑也把西方的艺术特质介绍到了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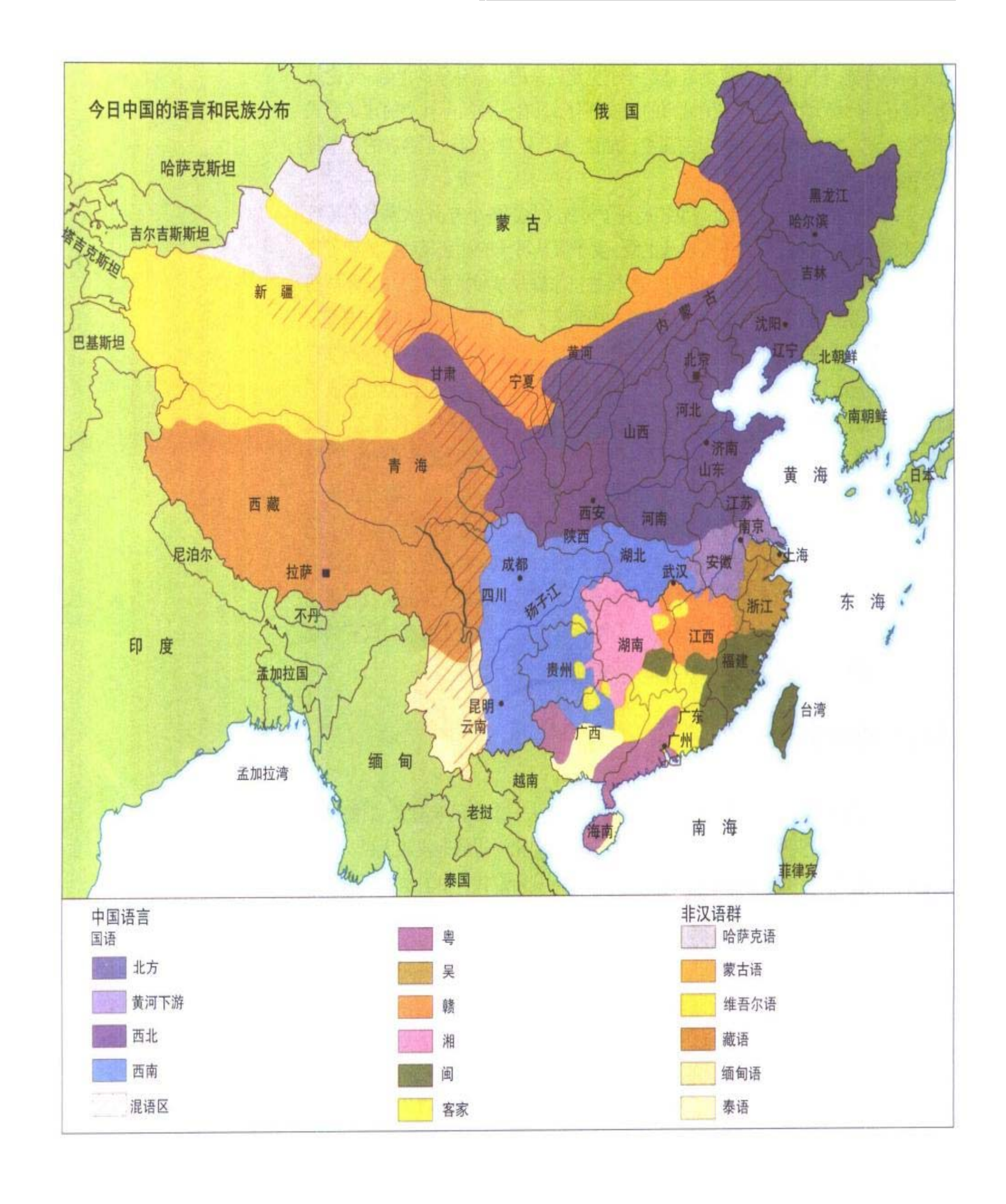
无所不在的对旧事物的批判也扩展到了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大部分的传统宗教被当作封建迷信，讲究下级服从上级、女子服从男子的社会风尚也遭到了攻击。政府赞同妇女对平等权利的追求，积极推进家庭改革和婚姻实践（就像早期在江西苏维埃和延安苏维埃所做的那样）。1950年，改革后的中国婚姻法规定：年轻人有选择其配偶的权利；妻子有权提出离婚；妻子和女儿对家庭财产享有继承权。这些法律条款并不比1930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民法走得更远，但却形成了强大得多的冲击力。这主要是因为政府发动了许多运动来将这些条款公之于众，使妇女在拒绝父母包办的婚姻或离开难以忍受的丈夫、婆婆时获得了党的支持。在新婚姻法颁布的最初五年里，全国有几百万桩婚姻解体，其中大多数是由妻子率先提出离婚的。当然，仅仅这些运动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家庭体系，还有许多其它力量在埋葬旧家庭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例如，财产公有化及最终的土地集体所有，商业资本挪为他用，更多的孩子入校读书、加入少先队及青年团等群众组织，大量妇女被动员起来走上工作岗位，以及大量妇女参与政权的现象，如从街道委员会到大学和党内高级职务都有妇女的参与。

多民族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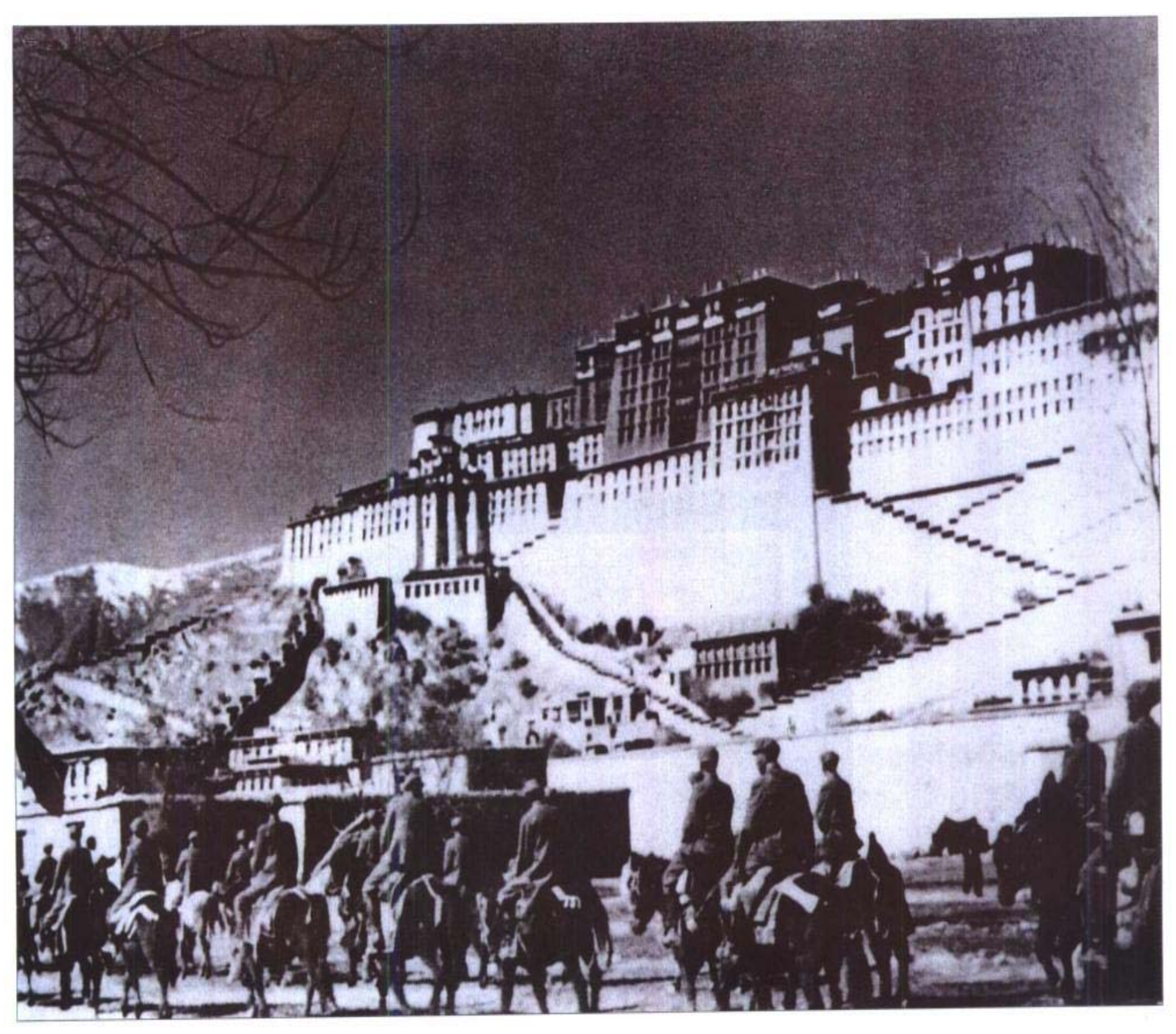
旧中国曾经是一个帝国，新中国则宣称她将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旧的民族观念认为，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她在不断地吸纳、同化周边的非汉族人民。在新中国，这种观念至少是在官方语言中被另一种民族观所取代：中国是一个由各种既互相区别又互相平等的民族共同体联合组成的国家，“汉”只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名称，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范围之内，“中国人”的概念是涵盖了所有这些民族共同体的。

多民族的政策可以视为中国模仿苏联的又一证据。这种政策是在18、19世纪由俄国沙皇发明的，在那个强调民族主义的时代，多民族政策为沙皇保有其想要的土地提供了最有力的辩护。对于中国而言，这种近似的模式也有利于其坚持对西藏、新疆的控制权。

在50年代，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少数民族的识别和划分。斯大林在阐发其民族政策时曾指出，某一群体成为“民族”要具备以下四个标志：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从共同文化特征中显示出来的共同的心理构成。根据这些标志，中国的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对400个需要识别的群体进行了调查。他们除去了一些大民族共同体的地方分支，最终确认了50多个少数民族。有的民族之间有着鲜明的差别，比如藏族和维吾尔族，他们操不同的语言，居住在不同的地域，但也有许多民族差别比较模糊，如回族指的就是一些散居在全国各地的穆斯林，他们讲汉语；广西的壮族长期以来非常汉化，苗族则分散在许多省份。还有一些民族是居住在西南山区里仅有几千人的小部落共同体。一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们操着不同的语言。约占人口94%的10亿人说汉语，然而，由于多种方言的存在，说汉语的人彼此之间也不都能听懂对方说的话，这些中国"方言"的差别比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差别还大，甚至很容易被当作彼此独立的语言。几个世纪以来，这些方言在读音上就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例如"难"字，在北京读nan，在兖州读le，在苏州读作ne，而在长沙则读作lan。所有的汉语都有音调，北方的官话有四声，而粤语却有十二声之多。由于中国的表意文字可以用任何一种方言来读，所以自古以来克服方言分歧的主要方法就是书写。而受过教育的人也学着说一种"官话"来同其他地区的人进行交流。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支持者曾倡导把这种官话作为国语。人民共和国推进了这一进程，要求在学校或是在广播电视上都要讲"普通话"。



图中表现的是1951年人民解放军进入拉萨的情景。

由特定的民族共同体来统治的地区（规模由乡到省不等）被称为“自治地区”，政府赋予这些地区在学校和政府机构中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西藏、新疆、宁夏、广西以及内蒙古都成立了“自治区”（自治区内分别居住着藏族、维吾尔族、回族、壮族和蒙古族）；四川、云南和贵州的许多地区则被划为壮族、苗族、彝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自治地区。按照官方的观点，所有这些地区都乐意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一员，而且到1957年为止，共有40万名少数民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处在从属地位的知识分子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像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丁玲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是最为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支持者，他们把社会主义视为一条使中国摆脱贫困和不平等的康庄大道。30年代和40年代后期，大量的知名作家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延安。但到那里不久，他们就发现自己的工作就是为共产党服务，而不是对其进行批评。

1949年以后，共产党不得不制定其对知识分子的新战略。因为有许多知识分子过去并不是公开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他们留在城市里，从事着一些以这样或那样方式与国民党有联系的工作。50年代初期，小城市的文化人大都为中国的新



从中国纸币的图案设计可以看出，中国的民族多样性已成为中国官方着力表现的主题。

气象激动不已，中国终于有了一个这样的政府：完全抑制了通货膨胀、剔除贪污腐败、普及文化教育、推进男女平权、清洁大街小巷等等，而且还使每个人都有了工作。许多人都充满激情地志愿为新政府贡献其所有的力量，也有数以千计的海外留学生匆匆回国，希望能对国家建设提供某种帮助。从共产党这方面来讲，建设国家也非常需要有经验的监督者、行政人员、教师、新闻记者、科学家、作家和基层公务员。因此，尽管毛泽东强调“红比专更重要”，但还是有大量的知识分子被保留原职，并没有顾忌其阶级背景如何。但是，新政府也发明了一些新办法来限制传统上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影响。政府重组了中学、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及其它组织，并对在这些机构中任职的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通常情况下，进行“思想改造”时，有关人员必须坦白自己以前屈从资本家掠夺、背叛中国人民的罪行，同时还要对毛主席指出自己的缺点错误表示感谢。许多通过了思想改造的知识分子，被鼓励去为社会主义理想贡献力量。知识分子被剥夺了选择谋生方式的权利之后，也就没有所谓的独立了。私立的出版业、私立的大学也成为过眼云烟，社会也不容许那些投资取利并借此赏玩艺术品和古董的人存在。

一些脑力劳动的分支学科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最受青睐的大概要数考古学了。1950年，为了协调全国的考古挖掘和研究工作，成立了考古学会。该学会很快就在安阳、西安、洛阳等主要地区建立了永久性的田野基地，同时也派出了受过训练的专业队伍去考察那些在修公路、建工厂、造水库时被挖出来的各

个时代的古墓和古遗址。考古研究是一条了解历史的途径，故而颇具科学的吸引力。此外，政府也希望依据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历史建构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部族到奴隶社会再到封建社会。而且考古学还意味着一种较少以文本为中心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颂扬的是制造出大量出土文物的劳动人民，而不是那些留下许多文献著作的精英们。

到了1956年，毛泽东号召知识分子来帮助认识党内存在的问题，例如党员脱离群众、行为简单粗暴等等。尽管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刚刚听到毛泽东关于"百花齐放"的号召时都很谨慎，但当他们看到一些提出意见的人被慷慨赞许之后就丧失了戒心。随之汹涌而至的批评浪潮显然让毛泽东吃惊，他迅速掉转矛头，愤怒地指责这些批评者，他认为这些批评者的心里隐藏着反党动机和右倾意识。

在随后的大规模反右运动中，有半数或半数以上的中国小知识分子精英被划为右派。表面上看，划为右派是由于他们在"双百"时期发表了一些反党言论，但实际上是单位领导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右派名额，不得不这样做罢了。全国总共有300万人被划为右派，这就意味着他们即便能够继续从事目前的工作，也不会真正发挥作用了。其中的50万人被送到农村，通过与农民一起从事体力劳动来克服他们"脱离群众"的缺点。此次运动的受害者既有年轻人，又有老年人，他们的立场和观点都是在边缘上的。曾经有30个通讯员写了一些故事，来表达他们对专为官员服务的内部商店的憎恶之情，结果他们被送进劳改队。此外，还有一些这样的例子：有一个铁路工程师在读到"百花齐放"期间的一篇批评党的文章时，曾说过一句"真大胆"，事后被人揭发，因此而被降职并做了20年的苦力。通过把大量这样的人从领导岗位上拉下来，新的党员骨干——他们大部分来自工人或农民家庭，通常情况下既仇外又反对知识分子阶层——对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受过良好教育并接受西方影响的城市专业精英们进行了迫害。旧中国是由一些接受过长期教育的精英们统治的，这些精英保持了文化上的独立性，毛泽东不允许这种状况在新中国发生，因此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被安排了这样一种位置：他们是政府的雇员，是被政府雇来教育劳动人民子弟和提供技术帮助的，他们不能有脱离共产党的思想观念，也不该过与广大人民群众有所不同的文化生活。

大跃进

到了1957年，至少是毛泽东感到苏联的模式不够好了。他认为中国按照苏联的模式发展速度太慢，过于依靠技术专家，中国资本的不够发达束缚了她的发展速度。中国必须凭借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寻求一条更快捷的现代化道路。毛泽东开始谈及大跃进，要通过几亿中国人民集体的艰苦奋斗，使中国从贫困走向富强。中国人民在此之前受到国内外剥削阶级压制的潜在创造力，将由此获得解放，15年内中国的工业产量将超过英国。加速工业化的构想很快就同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结合起来，在1958年短短的几个月内，全国所有的农业集体化组织就都合并成了规模非常大的公社。这些公社将完成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彻底地同产品的所有权分离，并提供学校、医院之类的现代城市生活的福利设施。

丁 玲

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特别热衷于用自己的才华帮助建成一个更好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20世纪是一段并不好过的日子。丁玲（1904年－1985年）作为她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女作家，就非常典型地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与不同当局的冲突和矛盾之中。

丁玲在湖南长大，是在妇女教育先驱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她寡居的母亲在30岁时进学校读书，随后又在女子学校执教。丁玲也很早就证明了她就是那种准备打破社会习俗的女人。1919年，她进入一所由专收男生变为男女同校的高中学习。第二年，也就是她16岁的那年，为了逃避叔叔为她定下的婚姻，丁玲离开湖南，投身到五四运动那个激情澎湃的世界中。在南京、上海和北京，她开始了一种自由的生活：学习、写作、时常参与运动，并不断地追寻能最终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她加入了无政府党派，阅读有关苏联自由妇女的文章。在这段时间里，她遇到了青年诗人胡也频并与之相爱。

丁玲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于1927年，1928年出版了第一部文集，很快获得了成功。丁玲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一些现代女性：她们勇敢、热情、渴望独立，但又不能获得情感上的满足，也不能发展真正的独立人格。她的非常著名的一部小说中的主人公苏菲小姐，就是一位孤独、焦虑和患有结核病的青年女性，在日记里，苏菲表示了自己对周围生活的不满，对一个并不值得她爱的男人的性的渴望，以及所有这些情感给她造成的困惑。

1930年，胡也频因教授无产阶级文学面临被捕的危险，于是，丁玲和胡也频不得不离开了当时胡也频任教的山东。在上海，他们生下了一个孩子，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两个都成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翌年，胡也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处以死刑。这给丁玲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自此她献身革命。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开始从事无产阶级的文学创作。丁玲曾在一群学生面前宣布她将不再写有关爱情的作品。1933年，丁玲遭国民党特务绑架，坐了一段时间的牢，随后又在南京被软禁了三年。

丁玲设法逃离软禁之后，冲破重重阻碍来到延安。到延安后，丁玲结识了许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她在那里写书、教书、做政治工作并同另一位作家结了婚。同延安的许多作家一样，丁玲发现强迫自己去写那些令党的领导人满意的东西是很困难的。她的小说中包含了一些对所有的革命生活场景感到不适的人物。例如，一个女党员就开始感到“党的需要”已经变成了她脖子上的铁圈，因为党需要她去做一名护士，她就被命令放弃去做一名医生。1942年，毛泽东召集了文化艺术界的座谈会，对作家加以限制。他一再重申作家的工作就是为革命需要服务这一原则。丁玲是众多的被批判的目标之一，她被迫做了自我批评，在中央党校学了两年政治以后，被调出延安去写有关战士和农民的文章。

内战期间，丁玲被派去观察华北土改的情况。在基于自身经验所写的小说里，她描绘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共产党干部，他们总是非常精明，能够克服重重困难生存下来，对农民和青年党员又非常的和蔼可亲。丁玲已经学会了写作反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品：这种小说使她获得了有名的斯大林奖金，并有机会远赴苏联。在此后的几年当中，丁玲因其政治上的优势出任了各种高职，还发表了题目如《访欧观感》和《五年计划的颂歌》之类的文章。1958年作家、编辑胡风在反自由主义作家的运动中遭到了批判[①]，杰出的作家茅盾也在运动中指责丁玲，说她依然保留着苏菲小姐的意识形态。丁玲在做自我批评时也承认五四时代深刻影响了其思想观念的形成，就其性格而言，她时常感到孤独和无助。

尽管曾两度成为批判的对象，丁玲在百花齐放运动中

中国的领导人宣称，如果农民能够明智地增加种子的播种密度，就会使农作物的产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同时，国家还开办了一些利用农村原材料进行生产的小规模工厂。无论是党的干部，还是普通的劳动群众，都绝对信任毛泽东，正是由于这种信任的存在，全国才能掀起一次主观主义的热潮。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同其他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一样，也在前年的“反右”斗争中遭到降职或革职的命运，因而大跃进中的计划并没有经过专家论证，而只是一些地方干部出于政治热忱做出的。1958年的夏末和秋季，公社、工厂、学校及其它单位都纷纷建起了“后院钢铁厂”，他们将小规模的土法炼钢与大规模的外国炼钢方法

①批胡风运动开始于1955年——译者注。

还是站出来说话了，她呼吁把文化从政府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随后的反右斗争中，丁玲及其早期作品都成了无数批斗会的主题。专业上的冲突、长期的自我矛盾以及对官场上官僚作风的反对，都构成了丁玲的重要罪行，她所遭到的指控还不只是这些政治上的错误，30年代她在南京被软禁时的所谓"不纯洁"行为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因素。丁玲拒绝承认自己有反党罪行，于是被解除职务、开除党籍，并被下放到靠近西伯利亚边界的一个农场里进行"劳动改造"。她在那里的生活不是很糟，老朋友和一些相助者给丁玲带来纸张和计划外的食品，她也能够同家人保持联络。然而在后来的"文化革命"中，附近两个对抗的生产队联合起来对她进行了批斗，她遭到殴打、羞辱并被单独监禁。1970年－1975年，她又被关进了一个很大的国家监狱。

1978年，邓小平对"文化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丁玲再度出现在北京。从那时起直到1985年逝世，丁玲一直享有文化名人的地位，可以出国旅行、与外国人会见、交流，可以对重大事件进行评论等等。许多青年人希望她能就男女平权或是党对文化事业的控制发表一些意见，但她最终使他们失望了。但对于较为年轻的一代人来说，丁玲几乎可以被视作最终接受了党的路线的作家。



右图　延安是一个小地方，它让丁玲结识了许多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尽管如此，她仍然因在小说中表现了女权主义的情调而受到严厉的批判。

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力图使中国的钢产量翻一番。农村的男子都加入了公共劳动的建设大军，农田则留给妇女管理。但无论他们从事的是何种工作，"多、快、好、省"的口号，以及"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就是登天梯；如果天梯搭得好，我们就能上天堂"㊂之类的歌曲，激励着他们去努力劳动。因为农民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炼钢上，几乎没什么时间待在家里或是做一般的农活了。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政府动员各单位建起免费就餐的大食堂。当时的评论员对此大加赞扬，认为这是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过程中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当时的数字表明，农作物产量增长了1000%乃至10000%。从当时拍摄的一些有关农田高产的照片上，我



大跃进期间，大规模的劳动力动员，使许多有价值的公共工程的建设成为可能，该图所示之黄河沿岸的治水工程即其中一例。然而让如此众多的男性脱离农业生产，也加剧了其它计划性错误所造成的破坏，致使此后几年粮食严重短缺，并于1960年－1962年爆发了饥荒。

们可以看到，麦子的植株健壮得连小孩子站在上面都不会发生倒伏。中央委员会对外夸耀说，仅仅一年的时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就几乎翻了一番。

有些大跃进的项目是成功的，如在全国各地修建的桥梁、铁路、隧道、水库、电站、矿山以及灌溉引水工程，其中许多被证明是有长久价值的。然而，这些项目都操之过急，匆匆上马又缺乏技术指导，因而造成了严重的失误。比如，犁地过深致使土壤盐碱化的问题。在大跃进进行了一年之后，连毛泽东都开始号召大家采取较为理性的跃进步伐，制定更为实际的奋斗目标。

1959年夏天，老一辈的革命家、当时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党的一次会议上对大跃进的政策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激烈地批驳了彭德怀的意见，并迫使其交出领导权。随着大跃进的再度被强化，当时的问题已经变成了对彭德怀及所有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提出反对意见者的批判。他们认为，这种反对意见产生的思想根源在于不够忠诚。

由于毛泽东控制着党的决策，而党的机构又操纵着中国经济的各个方面，所以毛泽东错误的经济思想最终造成了一场大规模的饥荒。1958年农业的丰收被极度夸大，而男人们又到别处去开展会战了，于是许多庄稼因无人收获而烂在了地里。随后的两年，农业一直歉收，一些干部却为了显示其革命热忱而继续谎报产量。由于中央政府是按照上报的数量来征收粮食的，所以本属于农民应该保留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口粮从农村运走，许多地方只给农民留下了不及生存所需的一半的粮食。因此，粮食短缺所造成的影响由于谎报而越发扩大，政府被迫在全国范



围内普遍实行粮食配给制。为避免有人饿死，还建立了一些提供少量燕麦的赈济处。从后来的人口普查结果来看，在“三年困难”时期（1959年－1962年），有3000万人①因缺乏食物而“非正常”死亡。

大跃进使中苏关系变得紧张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斯大林逝世以后，毛泽东认为自己当然地要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大哥、带头人，而这一点是赫鲁晓夫无法忍受的。又因为中国在整个大跃进期间都在强化其反对帝国主义的夸张言辞，并对福建海岸线附近的一些仍在台湾国民党控制下的岛屿实施炮击，所以俄国人也开始害怕中国将其拖入对美国的战争。1958年和1959年，赫鲁晓夫两度访问中国。赫鲁晓夫认定毛泽东是一个罗曼蒂克式的异端分子，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毛泽东所做的建立人民公社的错误决策上（毛泽东宣称建成人民公社会使中国比苏联更快地进入共产主义，实际上毫无助益）。赫鲁晓夫违背承诺，不再供给中国原子武器。当1960年的饥荒袭击中国时，他命令在华的苏联技术顾问全部撤离回国。1963年，毛泽东开始公开指责赫鲁晓夫为修正主义分子和走资派，并对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发起了挑战。全世界的共产党很快组成了亲苏与亲华的两大阵营。由于害怕苏联入侵，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防空设施，在既远离海岸线又远离苏联边界的内陆山区修建了防御设施。

大跃进给农村造成的长远的影响基本上也是消极的。为生存而奋斗使社会上

①此数字与官方公布的不尽一致。据《中国统计年鉴(1983)》第103－104页公布的资料，1956－1957年的年平均死亡率为11.1‰，1959年上升到14.6‰，1960年为25.4‰，1961年下降为14.2‰。死亡率上升的部分原因是婴儿死亡率的剧增和婴儿出生率的下降。——编者注

弥漫着追求个人私利的氛围，随之产生了愤世嫉俗者，政府的基层（至少是下层）失去了他们的忠诚。人们看到有权力的少数人不但强迫大家执行自上而下的不合理政策，还不时地为他们的家人、朋友、邻里谋取利益。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民的流动也进行了深层次的破坏。自1955年起实行的人口登记体系，把农村人口束缚在他们出生的农村，已婚妇女则被束缚在她们丈夫的村子里。曾一度急剧膨胀的国民工业计划被取消以后，上亿的失业工人被迫离开城市回到农村。为了防止这些人重新返回城市，在城市居民中也开始建立起一种同粮食配给制挂钩的登记系统，只有那些国家允许住在城里的人，才能领取购买配给粮所需的优待券。这些有关居住的规定造成了未曾预料到的后果——导致乡村社区中的人地比例失调，使农村陷入阴暗的贫困之中。与农村的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是安全的，特别是那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人，不但有丰厚的工资收入，还可以享受低价住房、退休金、公费医疗保健以及各种各样的补助，他们不必担心食品的供给是否充足，孩子们也能够在学校里读完中学，最幸运的（或关系最多的）还可以继续升学。而在乡下，只有比例极小的个别公社才有能力提供这些福利。至于那些居住在最贫困地区的农民，则被迫一心一意地种粮食，若要改变境遇，除了更多地投入劳动力以外，别无他法。于是他们更加频繁地清除杂草、平整土地、修建梯田及扩展灌溉系统等等。然而，他们所付出的并不总能带来相应的回报，因此就导致了全国农业产量的降低。

文化大革命

在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伟大构想中，其自发革命观体现得非常明显：它强调人民群众的潜力，认为人民群众一旦被动员起来，凭借其主观意志就能够改变他们自身和整个世界。这种革命观名义上是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它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历史变革观是迥然不同的。马克思毕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不主张对历史作理想主义的阐释，他确信思想观念只是对生产方式－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的反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可以通过改变经济体系达到转换观念、变革文化的目的。除了声望卓著的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之外，大多数共产党员本身也倾向于对历史进行唯物主义的解释。对他们而言，政治动员并不能取代党对经济基础的管理。在大跃进失败的余波之中，毛泽东从积极决策的角色上退了下来。刘少奇、陈云、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的领导人开始着手恢复重工业和市场行为。邓小平用一种同毛泽东一样精辟的语言表示："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①]于是，保持意识形态的立场就变得不那么必要了。此时的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一个拥有1700万党员的庞大组织。在上层，彭德怀的命运并没有被遗忘，再也没有人试图在毛泽东面前对党的政策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了，这种情况导致了宗派主义和幕后策划的抬头。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背景，毛泽东号召进行一场建设无产阶级文化的伟大革命——或简称文化革命，这场革命几乎毁掉了他领导了30年的共产党。但同时毛泽东也开始考虑意识形态问题，他也许是真的害怕中国会

① 此处有误。邓小平正式发表"猫论"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而不是在大跃进之后。——译者注



1966年的春夏两季，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毛泽东通过接见的方式，对他们表示鼓励。

像苏联那样滑向非共产主义的目标，他也决不能坐视新的精英掌握共产党进而颠覆革命。按照毛泽东的思想，革命会继续进行下去直到取得最后胜利；革命是一个持久的过程，往往存在于无止境的阶级斗争之中。如同斯大林一样，毛泽东也确信党内存在着暗藏的敌人和知识分子圈，这些人有待于识别和清除。

1966年的春天，北京市副市长允许了一出戏剧的上演。①有人对此进行揭发，认为这可以视作对毛泽东的批评。以此为开端，文化革命开始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1914年－1991年）在新成立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中担任了一个重要角色。在此之前，她没有在政坛上担任过任何职务，而此刻她却被广泛地视为年已七旬的毛泽东的代表。北京大学激进的学生很快就展开了对党内“走资派”的批判。刘少奇曾试图对北大发生的事件加以控制，但毛泽东批准北大的学生组织变为红卫兵，并把刘少奇降到了中央委员会一个并不重要的职位上。

文化革命迅速升级，已远非毛泽东、江青或是其他任何人所能控制和引导的了。在新中国长大的青年们敏锐地、充满激情地响应了造反的号召，他们非常乐于帮助毛泽东清除修正主义分子。1966年6月，从大都市到小城镇的全国各地大中学校的学生都全力投入到红卫兵运动当中。最初能取得红卫兵资格的仅限于“阶级背景良好”的学生——农民、工人、干部以及革命烈士的子弟。那些鼓吹自己“自来红”的高干子弟当上了红卫兵的领导人，他们蔑视阶级背景普通或是不好的同学，尤其是那些在考试中总能取得好成绩的知识分子的孩子。在此过程

① 此处指吴晗编剧的《海瑞罢官》，但说法不确。《海瑞罢官》还是吴晗响应毛泽东学习海瑞的倡议，于1960年底写成的。——译者注



文化革命期间，反映革命的电影、戏剧、歌剧得到了江青的大力推动。向观众灌输的是军人的精神、原则及热忱。

中，毛泽东等人也希望尽量避免在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新的特权阶层。于是，在红卫兵动员的第一阶段，颇受委屈的，阶级背景普通或是不好的学生，也逐渐组织起了他们自己的红卫兵组织。为了抵消不好的阶级背景，他们强调把个人对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当做评判革命与否的标准。从1966年8月到11月，八支庞大的红卫兵串联队伍汇集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这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五百多万青年。这些红卫兵的手里都挥舞着红色的小册子《毛主席语录》，它最早是由林彪（1908年－1971年）编辑用以向士兵灌输思想的，其中充满了诸如此类的智慧："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

当红卫兵们获得了报复和泄愤的机会时，暗藏在强大的社会控制背后的猜忌、敌对情绪也就冲破了重重束缚，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了。红卫兵批洋反古的战斗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在街上游荡，然后冲进那些阶级背景不好或是与外国人有联系的教师、干部家里，搜寻古书、家谱或者艺术品，然后将其查抄或损毁。他们还组织了难以计数的揭发检举会，在会上，被揭发的干部、教师或者作家被强迫低头站在那里，胳膊向后举起，做所谓"飞机式"，同时还要听他们以往的同事和朋友的讥讽与咒骂。用1966年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一段话来说，就是"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红卫兵已经将"多少年来剥削阶级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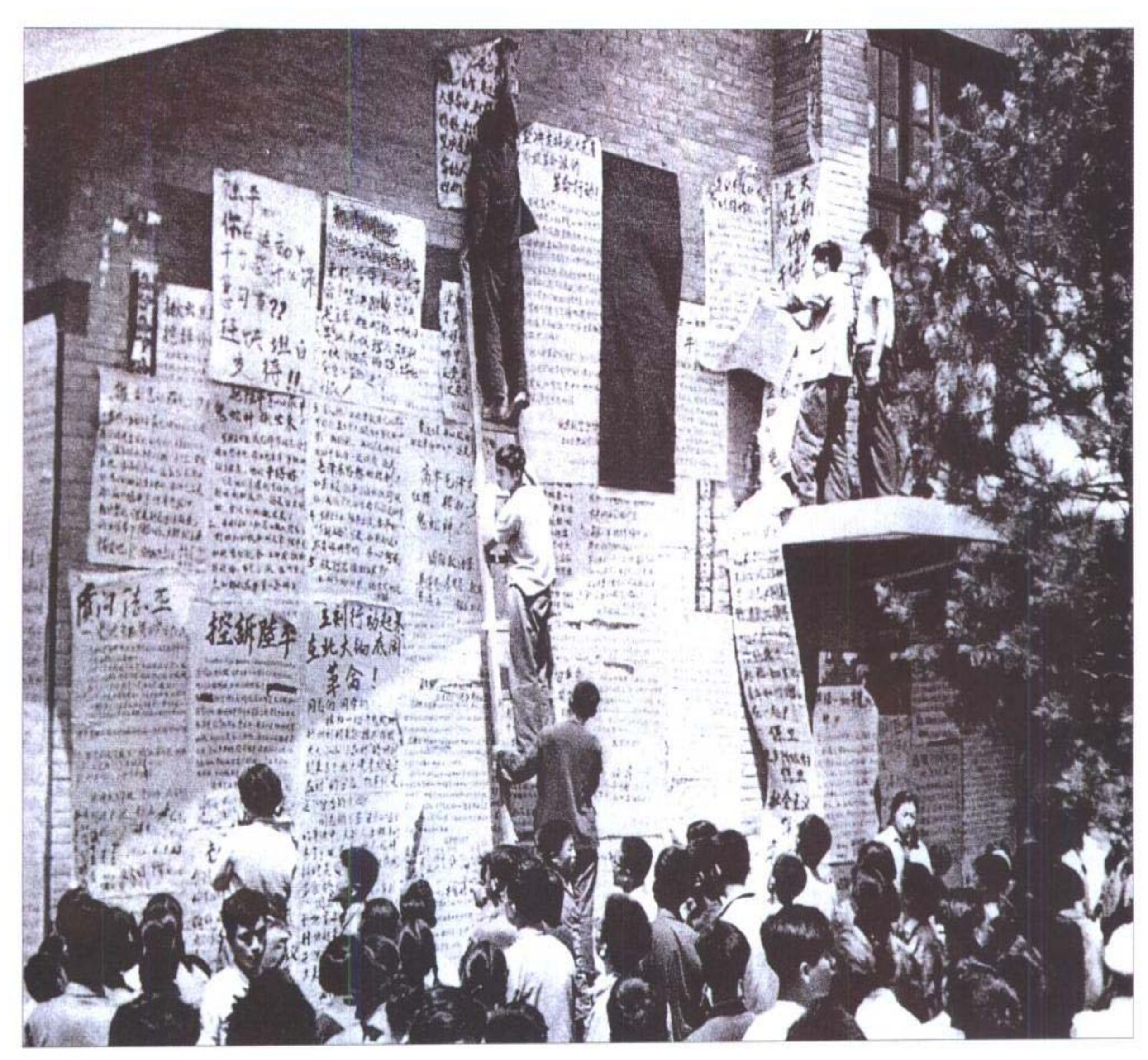
一些文化名人也成了斗争的靶子，比如作家巴金，他的小说《家》曾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俘获了一代青年的心灵。1966年，巴金在上海遭到公开的“批斗”，在愤怒的群众面前，他被强迫跪在碎玻璃上。他的妻子也被迫去清扫街道，并因此身染重病。由于被划成了“人民公敌”，没有谁为她提供医疗，她终于舍巴金而去。为此，巴金一直深深自责。在毛泽东思想的鼓舞下，红卫兵甚至同国家的元首刘少奇展开了较量，刘少奇当时被划定为“最大的走资派”。1967年夏，红卫兵袭击了保卫严密的党内高层领导人的住所中南海，并逮捕了刘少奇。两年后，刘少奇因滥施于他的诽谤与迫害而死去。他的另外四位家人也由于遭到殴打和虐待而死于狱中。在监狱里，审讯人员用尽一切办法来迫使他们提供证明刘少奇及其夫人是间谍的证据。

1966年11月，工人们也被动员起来投入到“文化革命”的激流当中。造反的学生到工厂里去“学工”，而实际的目的却是煽动工人起来反对上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者曾尝试用提工资、发奖金的办法来平息工人们的不满情绪。对于这种“经济挂帅”的行为，毛泽东的反应是命令学生和工人把权力从腐败的、修正主义了的党的领导者手中夺回来。可以想见，其结果必然是导致混乱的权力斗争。一旦某一派掌权，立刻就会招致另一派的攻击，他们会称前一派的夺权行为是“伪夺权”，然后再试图“反夺权”。 谈到军队同文化革命的关系，两者的联系其实是很小的。然而当武斗展开以后，毛泽东开始把人民解放军当作惟一有能力恢复秩序的组织，军队也被赋予了斗争任务：帮助左派夺权并确保工农业生产的继续进行。一般说来，军队所做的工作是支持庞大的保守组织，以“反革命”的名义解散造反组织。1967年7月，武汉的保守派绑架了来自北京的激进派领导人，文革小组针对这一事件做出的反应是，号召红卫兵组织起来夺取掌握在“走资派”手中的军队，此举揭开了文化革命中最为暴力的一幕。在这一阶段，红卫兵和工人不仅在其组织内部进行派系武斗，而且还发展到向地方及国家的军队发起了进攻。交通通讯开始中断，城市的消费品也发生了短缺。

面对日益恶化的局势，毛泽东别无选择，只有尽量缓和整个运动以免爆发全面内战。1968年7月，毛泽东解散了红卫兵，其成员很快被派往农村进行劳动。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号召组建革命委员会来取代党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要包括来自大的组织、革命干部以及军队等各个部门的代表。有些地区，军队迅速地成为统治力量。然而，实行军管并不意味着暴力的结束。军队在知识分子和党员中搜寻特务和敌对分子，由此又把文化革命拖入了全国动员的恐怖之中。军队对可能只是虚构的“五一六”组织的秘密调查中，对成千上万的人动刑甚至处决。

此刻，文化革命也冲击了农村。如同大跃进一样，那些阶级成分不好的人再一次变成替罪羊，农村中的极度集体化仍在向前推进。所有的边缘行为，甚至连养鸡、养猪都被划为资本主义萌芽从而遭到取缔。由于农民们并不是自发地支持这些政策，所以在贯彻这些政策的过程中，通常要采取很重的高压手段。于是，尽管意识形态强调推进政治过程要有大多数人的参与，但实际上农村干部总是要比普通农民获得更多的权利。

1971年，在国防部长林彪奇怪地毁灭之后，军队的支配地位下降了。对于公众而言，林彪是忠于毛泽东的楷模，而且中国的新闻界通常指称林彪是毛泽东的



1967年，北京大学的学生们不得不架起梯子来张贴新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都是揭发学校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中的“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的。

亲密战友和最好的学生。然而，按照官方的说法，林彪因为害怕毛泽东对他进行反击而决定刺杀毛泽东。当阴谋计划被女儿泄露之后，他又决定逃往苏联，他乘坐的飞机因燃料用尽坠毁于蒙古境内。

林彪的垮台使江青成为激进派的主要领导者。在那些年里，江青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推进京剧和其它“无产阶级艺术”的革命上。她一直在警惕着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是修正主义对文化艺术领域的侵扰。温和派的领袖是周恩来，他仍然主要负责外交工作。文化革命期间的对外方面，中国最担心的是苏联入侵。林彪倒台之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周恩来开始寻求某种渠道来增进中国与美国的联系，以便使美国成为制衡苏联的力量。1972年，应周恩来的邀请，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访华。1973年，周恩来因身患癌症而病倒，但他还是尽力使许多遭到凌辱的领导人重返政坛，重新担任重要职务，这些领导人里就包括邓小平。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北京的居民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表示对周恩来的敬仰之情。江青一派则把这一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并再次把邓小平从领导岗位上整肃下来。随着同年9月毛泽东的去世，江青等“四人帮”遭到逮捕。在1980年－1981年的公审法庭上，江青等人因在文化革命中的大量非法行为被判刑。

1978年，邓小平第二次掌握政权后，全国大约有300万受害者得以平反昭雪。但只要没受到实质性的虐待，似乎每个以某种形式卷入其中的人，都不再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了。他们觉得自己的经历只是一种短期的变动，是被某些人操纵的。那些曾兴奋地响应过毛泽东关于打倒当权派的号召的城市青年很快就发现，他们被下放到连那些农民都难以糊口的农村以后，已经到达了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弟弟妹妹的教育也被严重地中断了。中学的校门长期关闭，即便是后来重开，也在淡化课程教育。作为主要斗争对象的干部、教师和知识分子遭受了肉体上可怕的迫害，但伤人最深的往往还是那种被出卖的感觉。当他们不得不同那些曾经殴打、羞辱过他们或是把他们投入监狱的人继续工作在一起的时候，那道伤口仍在化脓，久久难以愈合。即便是那些承认在党内和教育机构里充斥着特权和官僚习气的人，也很难从文化革命对既定思想、秩序的巨大破坏所造成的后果里找到值得肯定的东西。实际上，国内外的大多数人，都把中国历史上的这一段插曲，看作是人对人的极度残忍的体现。

对毛泽东的历史评价并不像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那么糟糕，但似乎有随其去世日久而日渐降低的趋势。1981年，共产党对毛泽东进行评价时，还对他在战争年代在领导和思想上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同时也就其1956年以来的每一个错误进行了批评。随着人们对本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初的毛泽东领导模式的作用提出质疑，其地位也就遭到了损害。甚至有一些批评者把毛泽东描绘成了一个自大狂，认为他一直沉浸在按照自己的意愿重塑中国的构想中难以自拔，全然不去理会别人的想法。而另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担心这种把毛泽东当作一位怪人的做法，会导致其他人推卸他们对“文革”应负的责任并且削弱这样的论点——必

1976年4月，即周恩来逝世三个月之后，人们将花圈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旁，自发地进行了一场悼念他的活动。这场运动最后以武力对抗而告终，成百上千的示威者被逮捕。



须进行体制的变革，才能防止类似悲剧的再度发生。

促进经济增长

在中国长期延续的历史当中，人口的减少总是与动荡时期联系在一起的。蒙古人和满族人的入主中原，14、16、19世纪的起义，全都造成了人口上千万乃至

中国食品



按照传统，男女即便在家中用餐也要分开来坐，但是到了20世纪后期，全家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吃饭则成为一种风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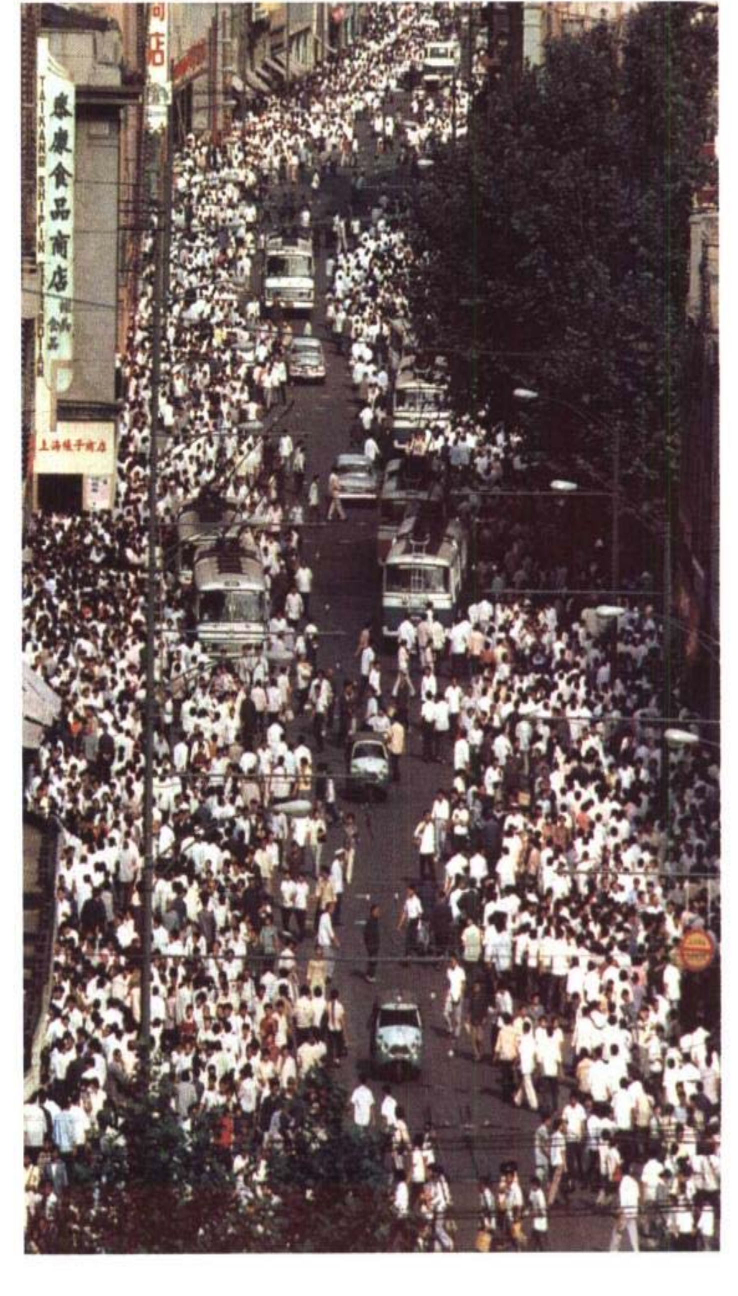
20世纪的中国，即便是最边远的村庄里的农民，也都适应了难以计数的典型的西方物质文化，这不仅是指那些确有优势的科技领域的东西（铁路、电扇、热水瓶、公共汽车、圆珠笔等），还包括那些非科技优势的东西（比如男人衬衫上的领子，横排写字而非竖排写）。但中国人的烹调方法却在努力抗拒着不知不觉的西化。中国人从未抛下筷子去拿叉子、舍弃酱油改用奶油。他们也不像日本那样以自己的方式吃西方食品。即便是城市精英中最西化的人物，也总以中国食品为自豪，他们深信世界上没有任何其它的烹调方法能与之媲美。

确切地说，虽然中国人所吃的蔬菜、肉类和粮食在各地都有所不同，但烹调的基本原则却是都可以融入"中国"方式的。谷物往往是主食，大部分地区吃米饭，麦子被制成面条、馒头和饼，位居主食之次。配菜由蔬菜、肉类和鱼类合并而成。它们都被切得很小，仅用极少的燃料就能迅速做好。姜、蒜、醋和由黄豆发酵制成的调料被广泛地用来调味。肉从来不被作为大部分卡路里的来源食用，但也不有意避免吃肉。中国人最常吃的是猪肉，切成薄片或是剁碎，用肉来给豆腐或是圆白菜、竹笋之类的蔬菜调味。即便是家常的饭菜也通常包括一个汤和一二种蔬菜。逢有请客和大摆宴席，则很容易就做出十个乃至更多的菜，重点在于成分和配制方法的多样化：成分有鱼、肉、家禽和蔬菜；烹制方法有炒、炖、炸。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吃几乎同其它事物一样，有其政治性的一面。城市的粮食供应是由政府控制的。整个60年代只有那些有粮票的人才能买到粮食或从小餐馆买上一碗米饭或面条。其它的食品也总是时不时地处于配给状态，其中包括烹调用的油和肉。自80年代初国家放松对经济的控制以来，自由市场给家庭扩展烹制食品的种类和质量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自由经营的餐馆也繁荣起来，从街头卖面条、包子的小摊到许多新的豪华旅店里的优雅餐厅，应有尽有。食品这时与政治发生联系是因为它同人际交往及谋利有关。干部们曾被指责说，他们变胖了就是因为接受那些寻求好处的人宴请的缘故。在90年代，富有的企业家们也非常乐意在豪华饭店里款待自己的生意伙伴。

更多的减少。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的话，大跃进和文化革命所制造的混乱简直不值一提。自1950年到1970年，中国人口由6亿3000万增至8亿8000万。本世纪50年代所施行的公共健康措施，在降低人口死亡率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使中国人的寿命引人注目地由1953年的40岁延长到1968年的60岁，1984年又进而增至64岁。其结果就是中国人口的加速增长，即便是1959年－1962年那场可怕的饥荒，也仅仅是在人口增长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短暂的停顿而已。毛泽东从不认为中国的人口太多，可实际上他逝世时中国的人口已接近10亿。毛泽东的继任者认识到，如果继续奉行那些只注重平均、不注重经济增长的政策，中国将难以支撑下去。

邓小平在1978年掌权以后，把解决贫穷问题排在了他行政日程的前面，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则退居其次。邓小平有着与毛泽东一样令人敬仰的革命经历。本世纪20年代初期，邓小平在法国时就开始同周恩来一起进行革命活动，随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他经历了长征，参加了抗日游击战争。1956年，52岁的邓小平成为政治局的一名常委，并担任了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文化革命期间，邓小平曾两度被排挤出政权。他认为文化革命所奉行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提法是荒谬的，并坚持代之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点。邓小平还提出，把四个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和国防现代化）作为与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行的指导性口号。



本世纪80年代初期，走在上海主要商业街——南京路上的人都会认为：中国的人口实在太多了。

邓小平的政策使经济繁荣成为现实，到本世纪的90年代，中国的人均收入增至原来的三倍并继续保持增长势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表明，共有1亿7000万农民摆脱了极度贫困的状态。贫困一直是农村最难解决的问题。为了同贫困做斗争，邓小平拆散了集体农业，建立了一种“责任制”。在这种责任制下，每户农民都分到土地和其它资产，这些都可以视作他们自己的财产。每个生产队都要与队员一家签订合同，每家向生产队上缴指定的粮食收成以换取对土地的使用权。除了上缴生产队的以外，各家的产品都可以自己保存或出卖。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队出租土地而不再直接耕种。各家各户既是土地所有者（作为生产队的成员），又是土地的耕种者

(在因签合同而获得的土地上耕作)。种植蔬菜、养猪、养鸡之类的边缘经济，以及养鱼、修理设备乃至生产出口消费品的小作坊，都得到了政府的鼓励。随着沿海省份进行商业贸易的机会增多，农民的收入迅速增加。即便是最贫困的地区，也能够从国家的新政策中受益，尤其是国家放松了对旅行和居住权的限制以后，数以百万计的青年人得以自由地流动到工作地，然后再把赚到的钱寄回家里。

邓小平也在推进教育的改革，他认为“四人帮”的影响已经造成了“整整一代人的智力残疾”。在当时，党内特别缺乏适应现代化事业的领导管理人才。最老的一批党员干部队伍组成于1949年以前，他们大部分人的教育水平极低；年轻的一批则是在“文化革命”期间提拔起来的，他们的提拔更多的是因为其反知识分子的热忱而非学术成就的突出。所以在80年代前期，全国的4000万党员当中，只有14%的人修完了高中课程，受过高等教育的仅为4%。而那些拥有高等学历的人中，又有许多是在70年代也就是那个反知识分子的年代读的大学，这使他们所受的教育大打折扣。1977年，国家恢复了大学入学考试。有机会留学欧洲、美国、日本的崭新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他们努力充实自己，甚至还因此迅速地掀起了一场学习英语的热潮。

为了加快经济发展的速度，邓小平也抛开了毛泽东所坚持的自力更生政策，开始考虑引进外资，他甚至还鼓励中国政府代理机构尝试着与外国公司合作。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吸引下，外国生产商纷纷来到中国办厂，他们既生产供应中国市场的产品（如交通工具），也生产供应西方市场的消费品（如服装、填充式玩具、手表和自行车）。在新的环境中，广东因为有邻近香港的优势，发展得尤为出色。1982年－1992年，香港的3200家玩具厂中的97%都在广东设有分厂。其中也有许多迁往深圳（这是一个建立在内地与香港交界处的经济特区，它正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向前发展）。到1991年底，广东南部大约有30万人拥有传呼机，而且还有3万人用上了香港生意人的法宝——手机。这是个令人难以想象的显著变化，



中国的良田极度缺乏，因而必须尽量有效地利用每一寸土地。在江苏土地肥沃的地区，房屋是沿河道挤在一起的，这样做是为了充分地利用土地。

仅仅10年前，中国城市间的电话通讯还是严重困扰人们的一个大问题。

即便在城市里，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从改革中获得等量的好处。那些曾为国家工作的人发现，改革就意味着他们将要失业，而且他们的工资也因为通货膨胀而无法一直保值。一些在以往那种高度集中的经济控制下根本无需担忧的事情也开始成为问题。知识分子们看到新产生的自主经营的企业家们，甚至连街头的小商小贩都能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那些以前根本不可能享用的摩托车等消费品，这一切使他们感到自己被遗忘了。然而在所有的现象当中，最让人们感到不平的还是那些高干子弟利用人际关系来获取赚钱的合同，并因此而致富。在改革中，违法贸易迅速增多，其中不仅是买卖毒品，还有盗窃古墓艺术品的行径，环境污染以及其他的环境问题也在加重。父母让女儿辍学去工作，致使许多妇女丧失了工作和教育上的优势，雇主们也往往不公平地解雇女工。管理松弛的市场甚至使拐卖妇女的现象再度出现，仅1989年－1990年就有6.5万人因拐卖妇女儿童被逮捕。沿海省份和内地省份的差异造成了新的不平等。国家对移民的内部控制放松以后，寻找工作的人涌向东部沿海地区。为了分享市场经济给这些幸运地区带来的富裕，内地移民乐意住在贫民区，或是12个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广东的内地移民，特别是那些不会说广东话的人，被雇来做条件最恶劣的工作，每周工作7天，每天持续工作10－12个小时。如果他们不想



20世纪的80、90年代，鼓励妇女装扮自己，已经变成了流行杂志所倡导的时尚。



对日本久久难以忘怀的仇恨，并没有减弱中国人对日产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和电冰箱等消费品的热情。

失去工作，就不能对此表示抗议。

政府在毛泽东以后为减缓人口增长所做的努力也导致了强烈的反弹。毛泽东反对限制生育的马尔萨斯理论，所以他在世时，仅零星地采取过一些诸如鼓励晚婚之类的人口控制措施。毛泽东逝世以后，政府做了大量工作来推行独生子女家庭。每个地方生育人口的数目都有定额，然后再把定额分配到更小的单位。年轻人结婚要得到工作单位的许可，而且得到允许后才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妇女计划外怀孕，又不想办法遮掩的话，那就要面临来自计生干部和地方领导的堕胎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人们已经可能通过超声波来测定胎儿的性别，于是如果怀孕妇女从超声波扫描中得知胎儿为女性的话，往往会屈服于这种压力去堕胎。另外一些人则明目张胆地杀死女婴或隐瞒其出生。所以，上报的二胎或多胎的性别比例，常因想要男孩而失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化倾向

“文化革命”的10年并没有使文化繁荣起来。在这10年当中，知识分子学会了缄默不语，普通民众所能欣赏到的也都是一些老套重复、极具政治色彩的故事、戏剧和电影。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人们被禁锢的对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化、鲜活感的渴望，很快就显露出来。那些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们发现，政治氛围的改变已经允许他们写一些东西来反映他们的遭遇了，因此一种“伤痕文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兴起。政府给文化工作的松绑也使新闻媒体活跃起来，这一点可以由新闻调查的内容显现出来，比如记者所写的关于干部腐败的报道。哲学家们



股票市场一经引入，人们那种迅速致富的渴望就导致了抢购股票的狂潮。这张抢购股票的照片摄于1992年的深圳。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审查制度有所松动的情况下，电影迅速成为一种探寻中国近期历史意义的主要媒体。电影创作可以是批判性的，但不可以批过头：上图是电影《蓝风筝》的剧照，它讲述了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期间的一个家庭的痛苦经历，政府批准了这部影片的拍摄，但当它拍摄完成后没有允许它在国内公映。这部影片在国外公映并获成功，但在1994年的中国，它依然是禁映影片。

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前提；小说家、诗人和电影摄制人员也开始探索反映性爱的作品，这在以前是个禁区。电视机逐渐成为日用消费品，丰富多彩的电视节目吸引着人们的视线。电视变成了一种急剧增强的文化力量，它告诉人们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一些怎样的变化。数以万计的中国人出国留学，又有几乎同样多的外国人来华做生意、学习或是旅游。这些现象都加深了中国人对外界的了解。此外，中国人也开始注意政府控制之外的信息，其获得的渠道有外国的中文出版物、香港的华语电视广播以及BBC和美国之音的中英文短波广播。中国人开始明白，同那些老牌的资本主义强国及新兴的发达国家和地区如韩国、台湾比起来，发展中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

政府容许放松信息管制，但却决不会放弃对敏感出版物和谴责派作家的控制。大学生、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城市青年开始为西方的流行文化，特别是音乐、色情、发型和明显的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所吸引。党内批评家也相应地定期举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精神污染”的斗争。

给共产党精英造成更大威胁的还是人们正在增长的对于西方政治思想的兴趣。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以西方观点为武器，来批评而不是彻底反对政府的弊端，但他们所采用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四小龙”的经济腾飞迷住了许多中国人，所谓的“四小龙”是指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在这些国家或地区里弥漫着儒家价值观念的专制政府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它们的成功似乎在暗示着中国应当复兴其古老文化的某些成分。1988年春夏两季，中国播出了一部六集的文献纪录片《河殇》，其中宣传着一种与上述看法截然相反的观点，它把中国的许多问题都归罪于古老的文化传统，特别是其坚持内向、对外界缺乏兴趣的一面。《河殇》对国家保留下来的大部分象征物加以攻击，并对黄河、长城和龙的内涵重新界定，认为它们是落后、消极的象征，并非是什么伟大的杰作。

1989年，苏联总统米哈依尔·戈尔巴乔夫公开表示要结束中苏关系的裂缝，在这一世界性新闻的影响下，这年春季对中国政治文化模式的争论开始走上街头。4月，学生们以悼念胡耀邦的名义举行了一些游行抗议活动。在正反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学生领袖后来决定将运动升级并扩大集体的呼声。1989年5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天安门广场上都有学生活动。为了证明对信念的忠诚和决心，数千学生开始进行绝食。6月3日－4日夜间，军队进入北京，成功地结束了抗议活动和天安门广场上的静坐。

六四事件的余波并没有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的衰退。90年代初期，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失败更加坚定了邓小平实施其经济改革的决心。中国的领导人推断，苏联的解体、戈尔巴乔夫的下台，其根源就在于中央计划无法促使经济繁荣。为了明确表示对市场改革和发展经济的继续支持，1992年邓小平进行了南巡，此行他参观了经济特区，并告诉人们不要担心政策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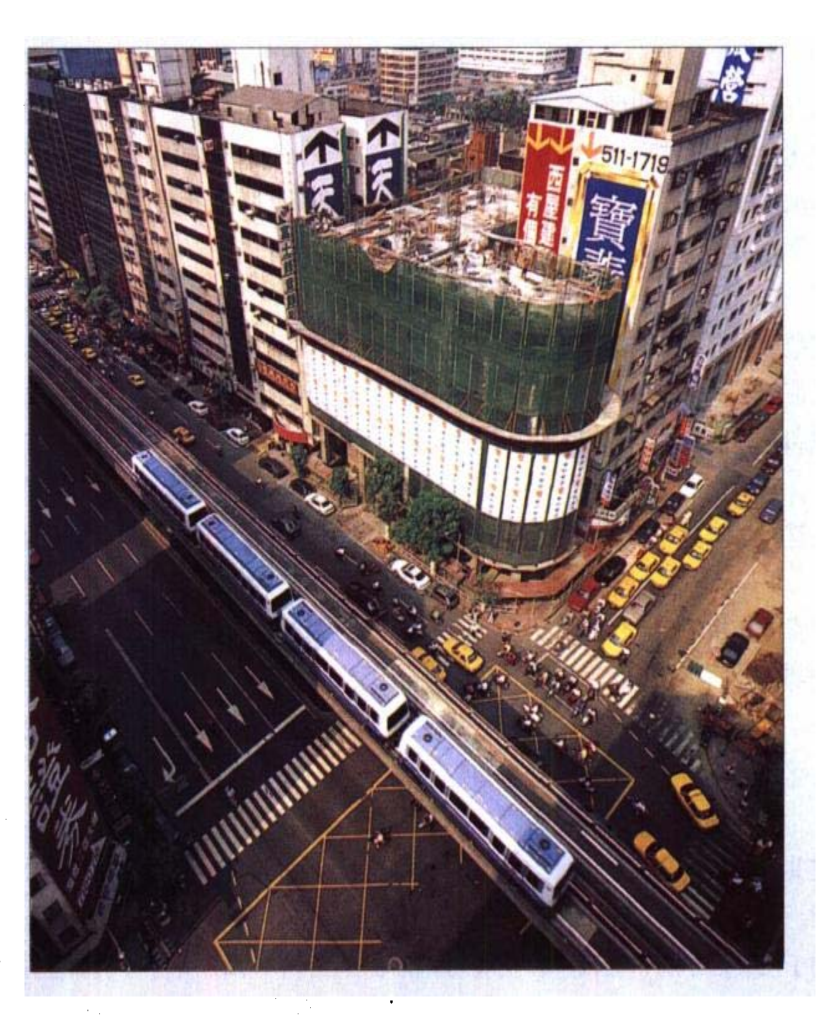
台湾的经济奇迹

在共产党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大部分组织和军队撤到了台湾。台湾距福建省的海岸线有100英里，自1895年到1945年，它一直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此时刚刚被中国收回。台湾地方土著居民与国民政府的初次遭遇是很可怕的——1947年国民党政府镇压了当地的反对政府腐败的抗议活动，向示威者开了枪，逮捕了有嫌疑的领导者并将其杀掉。在那次镇压行动中，国民党政府共杀掉了8000－10000人，其中包括许多土著领袖。美国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给予了支持，随着冷战在亚洲的升级，国民党迅速稳定了其政府的地位，并得以全力发展经济。

1992年，在亚洲，台湾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次于日本，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台湾的经济之所以会以如此突出的速度发展，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努力工作和周详计划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也是值得肯定的。台湾政府赋予了科技培训以真正的权威。经济学家和工程师，包括许多留学过海外的人，当上了政府各部的部长。在整个50年代，经济发展的重点都放在出口项目上，特别是建立了一些生产消费品的轻工业部门。60年代，重点转向出口工业，尤其是电子工业。当时的台湾开始仿照日本模式转产立体声系统和电视机，这同日本转向汽车生产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吸引外国的资金和技术，1966年台湾成立了第一个免税区。80年代的台湾已经非常富足，具备了发展钢铁、石油化工等资金密集型工业的能力。到了90年代初，台湾积累的资金已非常雄厚，并开始寻找有利的投资机会，大量的资金因此流入了大陆，特别是流入了工资仅为台湾十分之一的福建及其周围地区。

今天，台湾每个40岁以上的人都亲眼目睹了这些显著的变化。台湾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不可思议的提高，文化上是一派活跃的、国际化的景象，政治上也更为开放。1975年蒋介石去世后，他的儿子蒋经国继任。蒋经国解除了戒严令，允许台湾人赴大陆访问，同时也开始了政治民主化进程：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湾成功地完成了由一党统治向议会民主制的转变，反对党（1986年合法化）也确实通过选举赢得了成功。台湾在1971年失去了它在联合国的席位，许多国家都不再承认其为中国政府（美国也不再坚持台湾的政治地位，于1979年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其经济上的成功奠定了它在国际上的地位。

20世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建筑业的繁荣，把台北变成了一座摩天大楼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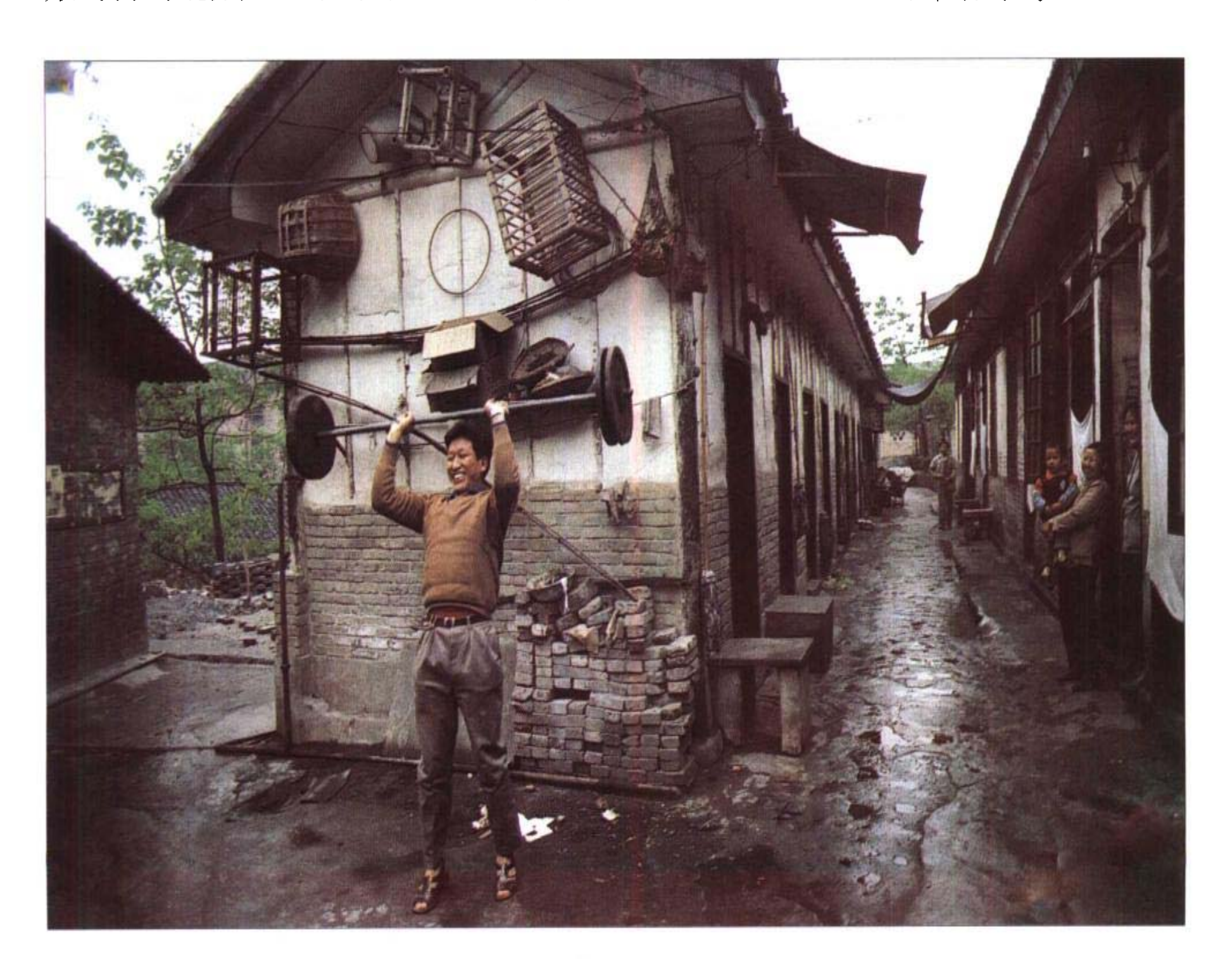


只要能使中国更加繁荣富强就行。此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的党章就进行了修改，新党章把中国经济表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宣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年轻的中国人以他们的父辈响应毛泽东号召进行革命的同等热忱，响应邓小平的号召去赚钱。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以史无前例的人数投入到开办私人工厂的洪流之中。其生意的规模，小到在夜市上摆个食品摊，大到开办工厂为俄国市场提供秋装、为日本生产礼佛用的神坛，或是为美国制造填充式玩具。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因此有了足够的财力去购买进口汽车、修建豪华别墅和给与其有联系的官员准备厚礼。在1978年，中国连一辆私车都没有，可到了1993年，私车的数量已超过100万辆，而且还在以每年12%的比率持续增长。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不只一次地发生变革。一些变化可以说是向现代化进步的，完全可以同世界上其他的国家，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国家相提并论。这些变化包括：公共卫生、身体保健和食物配给的进步，使人民的寿命大幅度增加；基础教育和现代通讯手段的推行，扩大了文化普及的范围，使更多的人掌握了文化；高水平的工业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消费商品，从最初的保温瓶、电风扇发展到手表、自行车，随后是电视机和洗衣机，到了20世纪90年代，则是汽车和空调。政治组织方面的变革也是有迹可寻的。毛泽东去世后，中国政治走上了一条如此截然相反的道路，以致某些观察者以为，中国正在抛弃和遗忘那些在本世纪50-60年代以新中国的名义实现的变化。

在较大的城市，大量资金用于建筑高层楼房，但在20世纪80年代还是有大量的城市人口住在小巷子两侧的低矮狭窄的住房里。



然而历史的车轮是很难逆转的。毛泽东执政期间确立下来的许多东西还在影响着当代中国。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中国同20世纪30年代及40年代的中国比起来，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了。几十年来，国家强化了对出版物、广播和学校教育的控制。这促进了中国文化标准化、扩大了跨领域、跨阶级的共同语汇。在最后的几十年里，对政治运动的共同参与也强化了人们一致的认同感。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边远地区的农民，他们所经历的事件都要通过大规模的运动，都要通过诸如宣传动员、召集政治会议、进行政治学习和依靠基层干部组织实施这些阶段来完成。 此外，大众认同也在以一种无法比拟的程度与中国政府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就成功地营造了中国人的自豪感。中国在朝鲜的表现使美国吃了一惊。中国从长期的封锁中生存了下来，并成功地从与苏联的不平等关系中摆脱了出来。

此外，无论是在最激进的还是在最强调改革的年代，中国都值得骄傲地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榜样。 创造新的现代化的中国这一目标，在20世纪90年代仍然具有生命力。在毛泽东时代，新中国既排斥中国过去的传统文明，又排斥大部分的西方文明，特别是那些被认定是资本主义或资本家的东西。若要实现现代化，就要放弃封建主义的过去：放弃阶级剥削，放弃对妇女和青年的压迫，放弃封建迷信。但同时现代化也意味着国家要强大，要足以抵抗外来的奴役和剥削，足以抗击来自现代化地区的威胁——在20世纪，这种威胁首先来自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尔后是日本、美国，再后来则是苏联。毛泽东深信，中国无需外界来告诉自己该做些什么。在他的思想中，中国得走自己的道路，用自己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目标。

毛泽东以后的中国并不像以前那么排斥外界，也不致力于切断同资本家和西方的所有联系，甚至对旧文化也不再那么坚决予以排除了。年轻人总是乐于寻求某种可能性，得以既从西方的摇滚乐和时尚潮流里吸取东西，又从林林总总的传统文化中有所收获，比如说算命和演练武术。他们甚至还从最近的历史里找到了可以吸取的东西。1990年，毛泽东崇拜再度出现，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在他们的车窗玻璃前悬挂了毛泽东的塑料照片，许多的商店和办公室里也挂起了毛泽东像。对一些人来说，毛泽东是一个保护神，而对另一些人来说，毛泽东则代表着一段美好的时光，在那段日子里，领导干部们都在为普通民众谋福利，而不是为自己的升官发财去钻营。有的人喜欢这样说：毛泽东至少还曾净化过当时的领导干部队伍。对于这些人而言，敬仰毛泽东是一种温和的政治批评的方式。

跋

若从欧亚大陆的西缘观察历史，不同文明和帝国的此兴彼衰似乎是自然的模式。到公元前2000年，埃及的辉煌使苏美尔黯然失色；到了公元前1000年，埃及衰落下去，巴比伦则成为一支令人瞩目的力量。然后巴比伦又被波斯抛在了后面，波斯之后是古希腊、古罗马。一些文明遭到彻底的破坏，就此从历史上消失，而另一些文明则在新的、更充满活力的更为强盛的文明的荫庇下生存了下来。即使在更晚近的时期，那些从欧亚大陆西缘观察历史的人们，还是谈论意大利城市国家、西班牙帝国、哈布斯堡帝国和大英帝国的兴衰。如今的美国人当然也能想到，他们的国际统治地位似乎也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下去，于是，有关未来太平洋世纪的图书总是畅销。如果要探究这种观点的成因，很可能就是把某一文明和某个个人（或许只是一些具有竞争力的个别的英雄强人）的一生之间做了某种难以言表的类比。每个文明都有其形成、进取的阶段，然后是强大、成熟的时期，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失去活力、变得僵化，直到最终败落于战争或被岁月的沧桑所淘汰。在一个既定的年代里，只有一个文明能够登上至尊的历史宝座。

但当人们从欧亚大陆的东缘来看人类历史的时候，一种全然不同的模式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人们在这里看不到新旧文明的更替，所看到的只是文明在以一连串像阴阳那样的一正一反的方式向前发展，由乱到治，然后又由治到乱。因此，文明在经历了初创时期的无序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政治秩序的强化，有时这种强化甚至到了残暴的地步。但秩序最终还是要被再次代之以混乱无序，然后这一模式便又重新开始。虽然这种文明进程与个人的人生相比有些勉强，但它却同家族世系的兴衰颇为相似。中国文明是由一个一个的实体相互连接，其方式与家庭中的父子相袭一样，而且讨论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时总要使用那些合法代御的词语，这些隐喻中的不同之处形成了对历史变迁的期望。在中国，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都被视为是可能无限期延续的，并携带着全部的文明遗产。孩子们会从他们父辈那里得到许多物质上或是文化上的遗产，尽管这些遗产会因天灾、战乱而几乎损失殆尽，但靠着辛勤的工作和对家庭生存的责任，只要时机一到，他们就能重建以至恢复这份家业。同样道理，某个王朝的衰败也不可能阻止新王朝的兴起。而且，一个家族世系的未来与其他家族世系的兴衰无关，因此外国的兴衰也同样不能改变中国的未来，如日本的兴起并不意味着中国走向衰败。

这两种历史进程观显然有其不同之处，所以当欧洲人刚开始研究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总是不知不觉地按照西方文明兴衰的模式来寻找中国文明的兴衰变化。大多数人感到，他们所研究的中国正处于衰败之中，他们的分歧只是确定何时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期望中国诞生一个新的辉煌的时代是毫无道理的。他们深信这是一个欧洲慑服世界的时代，中国只能从西方文明的成果中受益，创造力只能来自西方而非中国。

这样的概念框架并不总是让西方人消极地描写中国人或者中国史，中国时常被作为一个相对于西方的完美的“另外”，是一个所有事情都颠倒过来的世界的另

一面。那些试图批评西方的人，总是通过颂扬中国，来证明西方文明的不尽合理和不具普遍意义。因此，在伏尔泰看来，中国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奉行理性哲学的国家；20 世纪 50 年代的西方女权主义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妇女能顶半边天、实现了男女平等的国家；60年代的西方激进主义者则肯定，中国是一个成功地灌输了共同体精神的国家，连街道都被和睦相处的街道居民打扫得干净净；而80年代的西方保守主义者则发现，中国是个几乎没有犯罪的国家，中国人几乎都有自我克制的美德。

我在跋里提出这些，是希望能够促使读者反思我们过去理解异质文明的做法。由于没有办法直接接触中国文化，所以本书的读者在理解中国文化这一问题上是没有转圜的余地的。因为本书用英文写成，面对的是西方读者，所以在分析和描述问题时所使用的观念、方法对于英语世界的读者而言是熟悉的合理的。我所写的这部中国历史，毫无疑问是一部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历史，是受了近几十年欧美史学潮流影响的。例如，我在书中不止一次地把妇女引入我的叙述当中，就是当前西方史学的一个普遍做法，而且我也没有在政权高层的政治阴谋上花费太多的笔墨。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中国人如何诠释世界，来丰富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但如果否认西方的观念、假设和理论对这部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这也恐怕是自欺欺人。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相对于为弥合东西方观念鸿沟所遇到的困难，我在架设现代与前现代之间联系的桥梁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具挑战性。有两个相互重叠但略有自相矛盾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解决：其一，带有偏见的原始材料使我们极易对较早的历史时期加以赞扬；其二，如果我们不把某一时期的历史同其后的发展情况结合起来考察，就很难将这一时期的历史看清楚。中国同其它地方一样，时代越近，证据留下来的就越多。因此我们对20世纪社会生活细节的了解，比起清朝就多得多；而我们对清朝的了解，大概与对清以前全部历史的了解一样多。此外，时代越近，史学家们对史料所做的整理工作也就越少。自公元前1世纪的司马迁开始，大部分的中国史家就充当了某种社会批评家的角色。他们在记述自己时代的历史时，通常会看到许多需要谴责的东西；而在表述远离自己的时代时，他们通常也要对当代的现实做些微妙的评论，但使用歌功颂德的做法好像更为有效，因此他们批评现实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描绘一个较之现在更为美好的过去的时代——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更乐于描绘一个遥远得连相反的证据都难找到的社会。

总之，由于各种因素对史料的影响，要想利用现存史料给近代一个较为乐观的表述是困难的。我曾倾向于一种看法：宋代的中国比19世纪的中国更值得称道——宋代中国不仅比同时代的其它国家美好，而且从很多角度看，宋代中国各阶层人民的生活要比19世纪更好。然而我又怎能确定，宋代那些可以反驳我的史料没有被宋代之后的史学家剔除呢？很久以前的暴虐总是不及近代的鲜明：我们可能知道，中国的许多皇帝都有暴戾的性格，但我们却不能像考察毛泽东的失误那样，去从目击者那里获得有关这些皇帝的第一手的资料。较之近现代，宋代的史料少而又少，甚至连物质证据——绘画、瓷器、丝制品也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了。所以，从11世纪的史料里，我们已很难找到在某种程度上令人不悦的东西，

而19世纪以来平庸的或令人不悦的历史遗存却浩如烟海。

按年代顺序讲述历史，也就是人们习惯的那种从古讲到今的方式上的困难更加剧了这些史料上的麻烦。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故事来表现一个时代，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下一个时代的看法。20世纪的60、70年代，当许多西方人都倾向于给毛泽东和人民共和国以积极评价时，对中国20、30年代的表述就开始做这方面的铺垫了，几乎每一历史事件都是在为中国共产党的兴起说话：五四运动是思想上告别过去的第一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这个运动中的经历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同样，对工业化也要描述一番，因为没有工业化，就无法表述在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分道扬镳之前，城市劳工组织在早期中国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等等。我们也许会认为自己比上一代史学家要强，但我们能确定自己站得最高而不总是变化不定吗？近年来，许多反映共产党内幕的材料被披露出来，但我们是否就应该因此而重写中国这最后几十年的历史呢？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又将怎样才能了解人们在对这些内幕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毛泽东、长征或大跃进对于他们的含义呢？

在涉及中国的早期历史时，这些问题显得尤为尖锐。历史学家们总是关注那些已经被证明是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情，这无形中使人们觉得历史好像永远充满着必然性。在本书中，我恐怕不能不提及商代的祖先观念、东周的孔子思想以及秦汉的中央集权统治。然而我还是不大乐意表达这样一种感觉：中国未来的方向早在古代就已确定下来了。这种看法似乎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忽视了他们回应新情况新形势的创造力。对于祖先的遗产，他们在继承利用的同时，也有否定和扬弃。

把中国固有的文明同现代中国的问题放在一起考虑是会遇到困难的。因为对于前者，我们能以一种乐观乃至颂扬的方式来表述，而对于后者则难免要使用一些蒙冤受屈之类的文字。但毫无疑问，我并不是惟一一个同这一困难作斗争的史学家。那些对现代中国持悲观态度的人，有时要塑造一个前现代中国的历史，因此而使得20世纪所发生的一切，变成历史的必然。例如，中国历史可以根据国家制度来表述，这个国家制度容许专制权力的运用和变得太内视的儒家价值观的发展。而那些对前现代中国持积极评价的人，则用另一种观点看问题，他们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遭受的苦难，都归罪于不平等的世界体系，而与中国文明毫无干系。

除了这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之外，我坚持把最古老和最新近的历史联系起来，因为我坚信历史是一个前后连续的过程。今天的中国并不只是简单地继承了唐、宋、明这些朝代遗留下来的疆土；对于他们是谁、他们的国家是什么等问题的思考，仍然还会受到过去几百年里形成的观念和制度的影响，即使在这些岁月中，这些观念和制度已经改变了许多。无论如何，为了减少历史必然性的影响，我尽可能地把历史遗产塑造成一种资源而非桎梏。中国人在每一时代都运用了他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去确定目标，回应挑战，保卫自己，增强力量。因为一代人的行为对下一代人继承的资源将会产生影响，所以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些变化又是同过去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都确信无疑。

年 表

公元前 10 万年	中国的旧石器文化期
公元前 1 万年	新石器文化早期
公元前 3000 年 – 公元前 2000 年	新石器文化晚期
公元前 1600 年 – 公元前 1050 年	商王朝
公元前 1050 年 – 公元前 256 年	周王朝
公元前 1050 年 – 公元前 771 年	西周王朝
公元前 770 年 – 公元前 256 年	东周王朝
公元前 770 年 – 公元前 481 年	春秋时期
约公元前 479 年	孔丘逝世
公元前 403 年 – 公元前 221 年	战国时期
公元前 286 年	庄子逝世（生于公元前 396 年）
公元前 221 年 – 公元前 210 年	秦统一六国。中国出现第一个集权统治的皇帝
公元前 213 年	焚书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220 年	汉王朝
公元前 206 年 – 公元 9 年以前	前汉或西汉王朝
公元前 141 年 – 公元前 87 年	汉武帝的成功统治时期
公元前 133 年 – 公元前 119 年	西汉发动对匈奴的战争
公元前 126 年	张骞自西域返回汉朝
约公元前 85 年	司马迁完成《史记》
公元 9–25 年	王莽篡位，建立新朝。
25–220 年	后汉或东汉王朝
105 年	首次提及纸张
184 年	黄巾起义
220–589 年	分裂时期
220–265 年	三国时代
265–316 年	西晋王朝

280年	西晋再度统一中国
304–439年	十六国时期。没有汉人角逐对北方的控制权。
317–420年	东晋王朝于南方建立，自此开始了317–589年的南北朝并立时期。
404年	慧远著《沙门不敬王者论》
427年	陶渊明逝世（生于365年）
589–618年	隋王朝又一次统一中国
609年	大运河竣工
618–907年	唐王朝
653年	颁布现存最早的法典
690–705年	武后篡夺其儿子的皇位建立周朝
713年	禅宗六世祖惠能圆寂
755–763年	安禄山叛乱
843–845年	灭佛
868年	最早的印刷品出版
907–960年	五代时期
907–1126年	契丹人建立辽朝
960–1276年	宋王朝
1069–1085年	王安石实行新政
1126年	女真族控制中国北方，扩大了金朝(1115–1234年)的统治。
1127–1276年	南方的南宋王朝时期
1200年	朱熹逝世（生于1130年）
1215年	蒙古族控制了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
1227年	成吉思汗逝世
1276年	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控制了中国南方
1368–1644年	明王朝

1405–1433 年	郑和进行海上探险
1528 年	王阳明逝世（生于 1472 年）
1583–1610 年	利玛窦到达中国
1592–1598 年	明朝军队赴朝鲜作战
1598 年	汤显祖写成《牡丹亭》
1624–1627 年	东林党学者同阉党首领魏忠贤展开斗争
1644 年	起义军占领北京。明朝皇帝（崇祯）自杀。
1644–1911 年	满族建立的清王朝时期
1645 年	满清要求汉人剃发
1673–1681 年	平定三藩之乱
1720 年	清军进入拉萨，西藏成为清朝的藩属。
1792 年	小说《红楼梦》付梓
1796–1804 年	白莲教起义
1840 年	鸦片战争爆发，并最终于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英国获得香港。
1850–1864 年	太平天国起义
1860 年	英法远征军占领北京，烧毁圆明园。
1862–1878 年	左宗棠平定西北穆斯林的叛乱，取得对中亚的控制权。
1884–1885 年	中法战争
1894–1895 年	中日战争
1894 年	孙中山成立兴中会
1898 年	试图进行变法的光绪帝被慈禧太后软禁
1900 年	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解使馆之围。
1901 年	李鸿章逝世（生于 1823 年）
1905 年	废除科举考试
1911 年	清王朝被革命颠覆
1915 年	《新青年》杂志创刊出版
1919 年	反对凡尔赛条约的五四运动

	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
1925年	孙中山逝世（生于1866年）
1926–1927年	国共两党联合北伐
1927–1930年	国民党转而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
1927–1949年	蒋介石为领袖的国民党统治时期
1930年	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建立江西苏维埃
1930年	新的民法典给妇女以婚姻自主权和财产权
1931年	日本控制满洲
1934–1935年	红军脱离国民党的包围圈开始长征
1936年	鲁迅逝世（生于1881年）
1937–1945年	中日战争，其间发生南京大屠杀。
1947–1949年	国共内战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担任最高领导人。
1950–1953年	土地改革及农业集体化
1957–1958年	大跃进，建立农村人民公社。
1959–1962年	三年困难时期
1959年	平定西藏反叛，达赖喇嘛逃亡。
1960年	中苏关系破裂
1966–1969年	文化大革命
1976年	毛泽东逝世（生于1893年），“四人帮”被捕。
1978年	邓小平恢复权力，大字报出现在北京的民主墙上。
1979年	创建经济特区
1989年	六四事件

对图片提供者的感谢

作者、出版者与卡尔曼及金公司要感谢同意在本书中使用他们藏品的下列博物馆、画廊、收藏家和其他的图片拥有者。我们用尽一切努力去寻找图片的版权所有者，但仍难免有所遗漏。对任何无意的遗漏、我们在此表示歉意。我们将乐于在以后的版本中加入对他们的谢意。

以下是缩略语的指代。BL：大英博物馆，伦敦　CHM：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　FGA：史密斯逊机构的弗里尔画廊、华盛顿特区　NA：纳尔逊－阿特金森艺术博物馆，密苏里，堪萨斯城　NPM：国立故宫博物院，台湾　PE：皮波底·埃塞克斯博物馆，萨拉姆，马萨诸塞　RH：罗伯特·哈定图片馆　XNA：新华社，伦敦（以下各图片的所有者附英文原版书原文，页码为英文原版书的页码，不另译——译者注）

Page 14 top China Tourism photo library. 14 bottom RH .15 palace Museum, Beijing. 16 bottom XNA. 17 Shanghai Museum. 19 bottom China Tourism Photo library. 21 CHM .22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23 Academia Sinica,Taiwan. 24 Academia Sinica, Taiwan. 26 top Wang Yang(artwork).26 bottom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Beijing. 29 Sichuan provincial Antiquities Committee .31 Capital Museum, Beijing .32 Shaanxi Provincial Museum .36 Shandong Museum. 37 left Shanghai Museum. 37 right SenOku Hakko Kan (Sumitomo Collection).39 XNA. 41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42 American Numismatic Society. 43 Shanghai Museum .50 Hubei Provincial Museum (XNA-Photo:Li Jilu).54 left Jingzhou Museum. 54 Right Jingzhou Museum.55 Hubei Provincial Museum.61 Shaanxi Provincial Museum.62 RH.64 BL. 66 Hebei Provincial Museum. 68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Gift of J. Pierpont Morgan, 1917. 72 left Chinese Cultural Center,San Francisco. 72 right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Rogers Fund, 1917. 76 top Christie's Colour Images.76 corners XNA. 78 National History Museum,Taiwan.80 Werner Forman Archive. 82 top Gansu Provincial Museum.82 bottom Royal Tomb Museum,Taiwan.83 Yunnan Provincial Museum. 88 bottom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88-9 Nanjing Museum. 94 CHM. 97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Gift of Mrs Scott Fitz(22.407).Gift of Edward Jackson Holmes in memory of his mother, mrs W. Scott Fitz(47.1407-12).101 Patricia Buckley Ebrey. 105 CHM. 106 Ingrid Morejohn. 107 top left Ingrid Morejohn 109 China Cultural Relics magazine. 112 RH(Photo:G,P.Corrigan).113 Kyoto National Museum. 115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Gift of Mrs Pauline PalmerWood,1970.1073.116XNA.117David Kemp(artwork). 119 CHM. 122 Ann Paludan. 124 BL 125 BL. 127 Shaanxi Privincial Museum 130 British Museum London. 134 Shôsô-in Treasure House.139 Shanghai Museum. 140 NA(Purchase:Nelson Trust),49-79,142 Dingzhou museum.143 NPM. 145 Palace Museum Beijing. 146-7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John l.Severance Fund,77.5 148 Palace Museum Beijing. 149 Ying chih wen Thu Chu. 151 Liaoning Museum. 152-3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Gift of the Dillon Fund 1973.154 NPM.156 FGA. 162 NPM.163 top NPM.162-3 bottom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Purchase from the J.H. Wade Fund, 33.220.165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166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William

Sturgis Bigelow Collection by exchange. 170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Paris. 174 NPM. 176 Orientations magazine.177 NA (Purchase:Nelson Trust), 48–5. 178 FGA.181 NPM. 184 NPM.188–9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191 NPM. 193 RH. 198 Yurinkan Museum, kyoto. 199 NA(Purchace: Nelson Trust),46–48 200 NPM.204 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cologne. Inv. No. R62 1(18)(photo: Rheinisches Bildarchiv cologne).208 Michael Nichols/ Magnum Photos. 210–11 Historiographical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Tokyo. 211 bottom 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Given by JohN T. Dorrance. 217 BL. 218 M. Medley. 219 top Henan Provincial Museum. 219 bottom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222 musée Guimet, Paris (ET Archive). 225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purchase, the Dillon Fund Gift, 1986 (1986.206). 226 CHM. 228 Bibliothèque Nationale,Paris. 230 XNA. 231 Sen–Oku Hakko Kan (Sumitomo Collection). 234 PE (photo: mark Sexton). 237 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ET Archive). 244 Private collection (ET Archive). 251 Peter Wee, Katong Antique House,Singapore. 252 library of Congress. 254 FGA. 255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 ltd. 256 top library of Congress. 256 bottom library of Congress. 259 top BL. 259 bottom PE. 260 Photographic Archives of the Arnold Arboretum. ©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hoto:E.H wilson). 261 top PE. 261 bottom PE. 266 top XNA. 266 bottom Hulton Deutsch Collection ltd. 267 BL. 269 top XNA. 269 bottom BL. 274 bottom Museum of Revolutionary History, Beijing. 275 Popperfoto. 276 Ringart Collection. 277 Range/ Bettmamm/UPI.280 Henri Cartier–bresson/Magnum Photos. 283 Sam Tata/Batsford Publishing. 284 BL. 288 XNA. 289 XNA. 292 left Patricia Buckley Ebrey. 292 right Christie's colour Images. 293 top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Gift of Madam Fan Tchum–pi and her sons. 293 bottom Sotheby's Hong Kong. 296 XNA. 299 XNA. 300 Rene Burri/Magnum Photos. (Paris). 309 Lois Wheeler Snow. 310–11 XNA. 314 XNA 315 Camera Press London. 317 Harry Redi/Black Star. 318 Sally and Richard Greenhill. 319 kubota/Magnum Photos. 320 Camera Press, London. 322 top Dr G. Gerster,© 1995, Comstock. 322 bottom BL. 323 T.S. Lam/World &1. 324 Popperfoto. 325 British Film Institute. 326 left Popperfoto. 326 right Associated Press Photos. 327 Chris Stowers/Panos Pictures. 330 Cary Sol Wolinsky/Trillium Stock, Nowell, Mass.

引文注释

这些引文出自其他学者的著作和对中文原始资料的翻译。未说明出处的翻译资料、出自作者所编图书；有的出自作者此前编辑出版的《中华文明史资料》修订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3年，Chinese Civilization：A Sourcebook，rev.ed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3）。

第一章

㊀第10页 "祖先"："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艺，能事鬼神。" 詹姆斯·哈特译，载于作者所编《中华文明史资料》修订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3年，第6页。

Box. 'Ancestors' Take me as a substitute ... Trans. by James Hart,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Chinese Civilization：A Sourcebook. rev.ed.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3), P.6.

第四章

㊁第64页 "确保无土地闲置，无闲人游荡，豪门士族不能垄断肥沃土地，贱民也能够耕种属于自己的一份田地。" 伊懋可：《中国的历史模式》，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48页。有所改动。

'ensure that no land ...'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48, modified.

㊂第74-75页 彩页，早期佛教艺术，"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幡没幢若林......" W·J·F·詹纳：《洛阳的记忆：杨衒之与逝去的都城（493－534）》。牛津：克莱尔顿出版社，1981年，第208页。

Picture Spread .Early Buddhist Art.'The gold and the flowers…, from W.J.E.Jenner.Memories of Loyang: Yang Hsuan-chih and the lost capital (493-534)(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1),p.208.

第五章

㊃第95页 杜佑相信，位尊者认识到其目的在于使国家有序，而使国家有序则在于行事有成，行事有成又在于能学习过去，学习过去又必须根据时势的需要因时而变。彼得·博尔：《"我们的文化"：中国唐宋时期的思想变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第26页。

'for the superior…'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p.26.

第六章

㊄第102页 马可·波罗，"我告诉你，这条江很长，流经很多地区，两岸有很多城市……" A·C·莫尔和保罗·佩利奥译自马可·波罗的《世界的图景》(伦敦：劳特利奇，1938年）第1辑，第320页，有所改动。

Marco Polo, 'I tell you that this river ...'A.C. Moule and Paul Pelliot,trans.,Marco Polo,Thc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London:Routledge, 1938).1,320,modified.

㊅第105页 马可·波罗，"任何人看到如此众多的居民，都会认为不可能有足够的食物养活他们……" 《莫尔和佩利奥》，第1辑，第329页，有所改动。

Marco Polo, 'Anyone seeing such a multitude...' Moule and Pelliot,I,329,modified.

第七章

㊆第127页 马可·波罗，"所有汉人都讨厌大汗的统治，因为大汗使鞑靼（即蒙古人）……"《莫尔和佩利奥》第1辑，第215页，有所改动。

Marco Polo, 'All the Cathaians detested the rule Of the great khan 'Moule and Pelliot,I,215, Modified.

第八章

㊇第142页 太祖，"朕清晨方处罚数人，至晚又有犯罪者……" 华丽莉译，载于伊佩霞所编《中华文明史资料》修订版，纽约：自由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Taizu,In the morning I punish a few ..."trans. By Lily Hwa in Patricia Buckley Ebrey, ed.Chinese Civilization:A Sourcebook,rev,ed.(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93),p.207.

㊈第145页 "得汉人，缚之于树，乱射之……" 牟复礼：《成化和弘治统治时期（1465－1505）》载于《剑桥中国史》，第7卷，《明朝（1368－1644）》，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83－384页。

'When they capture a Chinese...'Frederic Mote The Cheng-hua and Hung-chih reigns,1465-1505'.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7, The Ming Dynasty 1368-1644(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p.383-4

㊉第145页 王阳明，对于那些未汉化的部落民族来说，创立汉官直接管理的体制，就像把鹿赶到一座大厅中，然后再驯服它们一样…… 赫罗德·J·威恩斯 ：《汉人在华南的扩张》，纽黑文：鞋线出版社，1988年，第219页。有所改动。

Wang Yangming .' Instituting direct civil adminis-Tration...' Herold J. Wiens. Han Chinese Expansion in South China(New Haven:The Shoe String Press. 1967),p.219. modified.

㊀第149页 利玛窦，"数不胜数的书籍堆积于此，其售出的价格也低得惊人。" 路易斯·J·盖勒：《16世纪的中国：利玛窦日记，1595－1610年》，纽约：兰登书屋，1953年，第20－21页。

Matteo Ricci. the exccedingly large numbers... Louis J. Gallagher.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s of Matteo Ricci. 1595-1610(New York:Random House, 1953),p.20-21.

㊁第155页 吕坤，当佃户向地主请求帮助的时候，地主却向佃户追求更大的利益。乔安娜·汉德琳：《晚明思想中的行：吕坤和其他仕官的重新定向》，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Lu Kun,' when tenants ask for help,' Johanna F Handlin. Action in Late Ming Thought:The Reorientation of Lü Kun and Other Scholar-Officials (Berkeley: Univer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24.

㊂第154页 南怀仁，"把世界七大奇迹合在一起，也无法与之相比，在欧洲出版的关于它的所有传闻都与我所目睹的相去甚远……" 阿瑟·沃尔德伦《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06页。

Verbiest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uld...' Arthur Waldron, The Great Wall of China:From History to Myth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 206.

㊃第159页 "老天爷，你快点吧，你的耳聋啦，眼瞎啦，看不见人，听不见话……" 居密：《主与奴：17世纪的奴变》，《明史研究》，1979年，第8期，第57－64页。引自第63页。

'Old Skymaster...' Mi Chu Wiens,Masters and Bondservants:Peasant Rag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 Ming Studies 8 (1979):57-64.quote 63.

㊄第161页 插页文字说明，"如果各件绘饰不尽相同，工序则无规则而易乱……" 罗伯特·季哈内：《景德镇－瓷都的景象》，纽约州釉质研究院，1983年，第142页。有所改动。

Photo Spread caption ' If the painted decoration...' Robert Tichane Ching-te-chen:Views of a Porcelain City.(New York State Institute for Glaze Research,1983), p.142,modified.

第九章

㊅第172－173页《红楼梦》的大段引文引自丹尼尔·霍克斯：《石头记》，(企鹅丛书)，第1辑，第465－467页。

Long passage from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From Daniel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 (penguin books).I,pp.465-67.

㊆第177页 乾隆，"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远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哈利·法恩斯沃思·麦克奈尔：《现代中国历史选读》，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4页。

Qianlong,' we possess all things...' 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elected Readings (Shanghai:Commercial Press, 1927),p.4.

㊇第179页 林则徐，"设若他国之人携鸦片赴英吉利售卖……" 邓嗣禹和费正清所编《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概览，1839－1923年》，纽约，安萨姆，1971年，第26页。

Lin Zexu, 'Suppose there were people...' 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New York: Antheum, 1971), p.26.

㊈第184页 倭仁，"从古至今，从未有用数学使国家由弱变强者。" 同上，第76页。有所改动。

Woren, 'From ancient down to modern times...' 'Teng and Fairbank,p.76,modified.

㊉第192页 "洋人侵略我中华，破坏我领土完整，践踏我人民……" 维克托·珀塞尔：《义和团起义的背景研究》，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225页。有所改动。

'The foreigners have been aggressive...' Victor Purcell ,The Boxer Uprising,A Background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3), p.225,modified.

第十章

㊀第199页 邹容，"诛绝五百万有奇披毛戴角之满洲种……" 迈克尔·加斯特 ：《共和革命运动》，《剑桥中国史》，第11卷，《晚清》第二部分，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482页。

Zou Rong. 'Wipe out the five million barbarian Manchus...'Michael Gasster.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11 part 2 Late Ch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p. 482.

㊁ 第202-203页　陈独秀“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7年，第45－46页。

Chen Duxiu. 'Youth is like early spring...'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pp. 45-46.

㊂ 第203页　“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林毓生：《中国的意识形态危机：五四运动时期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1979年，第76页。

'We must be thoroughly aware...'Lin Yu-sheng The Crisis in Chinese Consciousness: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 1979), p. 76.

㊃ 第204页　《铲共大观》的引文引自杨宪益和戴乃迭所译《鲁迅作品选》，北京：外文出版社，1956年，第3辑，第45－47页。有轻微改动。

Wiping Out the Reds-A Great Spectacle,'from Lu Xun, Selected Works, trans.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56),Ⅲ,45-47. slightly midified.

㊄ 第206页　约翰·杜威，“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青年像中国青年这样一致地、迫切地关注何为现代化，何为观念更新并特别关注社会和经济的问题……”引自周策纵前书第183页。

John Dewey,' There seems to be no country...' Cited in Chow, p. 183.

㊅ 第210页　“就是使整个社会、全体国民生活军事化……”史景迁：《现代中国研究》，纽约：诺顿，1990年，第415页。

'Militarize the life of the people...'Jonathan D. Spence .The Re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Norton. 1990),p.415.

㊆ 第211页　托尼，“在某些地区，农民们的处境就像是长期站在及颈深的水中那样，甚至一阵涟漪微波都会将他们冲倒”。R·H·托尼：《中国的土地和劳力》，波士顿：比肯出版社，1932年，第77页。

Tawney. 'In some districts...'R.H.Tawney.Land and Labor in China (Boston:Beacon Press. 1932), p.77.

㊇ 第213页　宋庆龄，“如果我们不答应妇女的离婚要求，她们就会失去对妇联和我们所倡导的妇女自由的信任……"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四万万中国人》，纽约：考吾德－麦肯，1928年.

Song Qingling .'If we do not grant...'Anna Louise Strong,China's Millions (New York: Coward-McCann, 1928).p.125.

㊈ 第220页　“国民党领导下，税多；共产党领导下，会多。”爱德华·弗里德曼，保·G·皮科维茨及马克·塞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1页。

Under the Nationalists...'Edward Friedman. Paul G.Pickowics.and Mark selden.Chinese Village,Socialist State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41.

㊉ 第223页　插页，现代中国画，“中国的水墨画从世界上来说都是最伟大、最高明的一种绘画形式……”李楚清（音译）：《现代中国绘画的趋势》，(阿斯科纳，瑞士，亚洲艺术)，1979年，第131页。有所改动。

Picture spread,Modern Chinese Painting 'Chinese ink painting...' Chu-tsing Li, 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Ascona.switzerland: Artibus Asiae,1979),p.131 modified.

第十一章

㊀ 第237页　“共产主义是天堂，公社就是登天梯……”爱德华·弗里德曼等人所著前书，第218页。

' Communism is heaven...'Friedman et al,p. 218.

进一步阅读书目

有些读者愿意对中国文明的主要问题了解得更多些，那么他们可以去阅读另一些中国历史的通览性著作，比如黄仁宇生动而富解释性的《**中国大历史**》(Armonk, N.Y., M. E. Sharpe, 1988)、费正清的《**中国新史**》(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费著中经常谈到最新的学术动态。读者还可读谢和耐扎实的《**中国文明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该书对前现代时期和中外交流方面的阐述可圈可点。康拉德·史洛考尔的《**中国文明简史**》(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1)是一部通俗和内容均衡的教科书。关于前现代时期，有贺凯的《**中国帝制史**》(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除政治和制度之外，它还提供了关于文学艺术的广泛内容。关于近代中国，费正清的《**中国的大革命**》(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7)提供了一个准确的解释。至于更全面且很可读的著作，见史景迁的《**寻找现代中国**》(New York, Norton & Company, 1990)。政治史可见于多卷多作者的大型作品《**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现已出版15卷。保罗·罗普主编的《**中国的遗产：透视当代中国文明**》(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给读者提供了有关宗教、思想、家庭、艺术及其它主题的文章。为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而需要的中文作品的英文译本，可参见伊佩霞的《**中华文明史资料**》(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3)。

要想快一些了解当代中国和历史上的中国，最好的单本的工具书是布里安·胡克与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百科全书**》第2版(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具有类似价值的是安斯利·安布里主编的《**亚洲史百科全书**》(New York, Scribner's, 1988)的中国部分。关于省级和城市的地图、自然地理、人口、气候和经济条件，见吉兰和崔瑞德主编的《**泰晤士中国地图集**》(London, Times Books, 1974)。关于历史地图和精彩图说的主题论文，见凯罗琳·布伦登与伊懋可的《**中国文化图集**》(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3)。关于当前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学术状况，可见亚洲研究学会的年刊《**亚洲研究书目**》，亦可见美国历史学会的《**历史文献指南**》的中国部分。关于文学艺术问题，可看威廉·小尼恩豪瑟编《**印第安纳指南：中国传统文学**》(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其中包含了大量关于小说、戏曲、诗歌的信息，附有详细的关于作者、标题等内容的记录。

关于社会经济史方面的广泛解释，可见赵冈的《**中国史上的人与地：一个经济分析**》(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伊懋可的《**中国历史模式**》(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和易劳逸的《**家庭、土地和祖先：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恒久与变异(1550–194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食品也是经济与文化史中很重要的侧面，安德森的《**中国食品**》(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和张光直的《**中国文化中的食品：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视角**》(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对此都有所涉及。

对制度史的广泛研究包括法律与刑事制度两项内容，如瞿同祖的《**传统中国的法律与社会**》(Paris, Mouton, 1961)和杰弗里·迈克扩玛克的《**传统中国的刑律**》(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对外关系，见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世界秩序**》(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及其《**美国与中国**》(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4版。关于中国与其北邻的关系，欧文·拉铁摩尔的《**中国的内亚边疆**》(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51)第2版，对此进行了概述，现在部分地被另一部书即塞钦·贾格齐德和范·杰伊·西蒙斯的《**长城沿线的战争、和平与贸易：两千年间游牧民族与中国人的互动**》(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取代了。关于军事史，见弗兰克·小基尔曼与费正清主编的《**中国的战争方式**》(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中国家庭与宗族制度史见伊佩霞和詹姆斯·华生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亲族组织，1000–194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鲁比·华生与伊佩霞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婚姻与不平等**》(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关于福建和广东宗族的经典研究是莫里斯·弗里德曼的《**华南的宗族组织**》(London, Athlone Press, 1965)。有两本论文集特别审视了不同时期的妇女生活，见理查德·归索和斯坦利·约翰尼森编的《**中国妇女：当前历史学术的方向**》(Youngstown, NY., Philo Press, 1981)，及玛格利·沃尔夫与罗克森尼·威特克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妇女**》(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武雅士的《**台湾农村的妇女与家庭**》(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具有特别的价值，注意到了妇女的家庭观与男性的不同。对妇女生活更侧重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是武雅士和黄洁珊（音译）的《**中国的婚姻与收养，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对思想史的全面探讨见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德克·波德译本(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狄百瑞、陈荣捷、伯顿·华生合编的《**中国传统资料**》2卷本(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64)，对于所选中国史上重要思想家的作品提供了导读。有几次会议的论文集显示了儒学的多样性，见戴维·尼维森和芮沃寿编的《**行动中的儒学**》(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芮沃寿编的《**儒家的说服力**》(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0)、芮沃寿和崔瑞德编的《**儒家的人格**》(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由一位有影响的解释者所做的、对儒学的广泛分析是狄百瑞的《**中国的自由传统**》(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和《**儒学的困境**》(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关于中国科学史，标准的作品是百科全书式的、多卷本研究——李约瑟及其合作者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关于中国的史学与史学思想，见比斯利与普莱布兰克主编的《**中国与日本的史学家**》(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关于中国宗教的概览，见欧大年的《**中国的宗教：作为一种生活体系的世界**》(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86)，或劳伦斯·汤普森的《**中国宗教导论**》(Belmont, Calif., Wadsworth, 1988)。

有关艺术与文学方面的好书很多。它们包括劳伦斯·西克曼与亚历山大·索珀的《**中国艺术与建筑**》(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8)、杰西卡·罗森编的《**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艺术**》(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2)。关于中国绘画的最好的总体研究依然是詹姆斯·卡西尔的《**中国画**》(New York, Skira/Rizolli, 1985)，麦琪·凯斯威克和查尔斯·甄克斯的《**中国园林：历史、艺术与建筑**》(New York, Rizzoli, 1978)也值得推荐。在文学方面，很容易得到的、又有大量引文的一本书，是柳无忌的《**中国文学导论**》(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6)。翻译的文学作品选中，较好的是西里尔·伯奇编的《**中国文学选编**》(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1972)，2卷本。关于诗歌，最好的入门书是斯蒂芬·欧文的《**传统中国的诗歌与诗学：世界之兆**》(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关于中国语言学的介绍，见罗伯特·兰姆西的《**中国的语言**》(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除了涵盖时段较长、范围广泛的图书以外，还有数以百计的涉及具体时期的好书。关于古代，最好的入门书是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作品，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考古**》第4版(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商代文明**》(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及《**艺术、神话与仪式：古代中国通往政治权威之路**》(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了解有关史前史和古代的比较研究，见吉纳·巴恩斯的《**东亚文明的兴起**》(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3)。更详细的分析，见大卫·凯特莱编的《**中国文明的起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许倬云与凯瑟琳·林杜芙的《**西周文明**》(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李学勤著、张光直译的《**东周与秦文明**》(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这些书都广泛利用了考古发现。萨拉·阿兰在其《**龟形：早期中国的神话、艺术和宇宙观**》(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York, 1991)中，考察了商代的宇宙观和周代的神话。关于古代的艺术与技术，见冯文（音译）所编内有大量插图的《**中国伟大的青铜时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展览**》(New York,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1980)，杰西卡·罗森的《**古代中国的艺术与考古**》(London, British Museum, 1980)及威廉·华生的《**古代东亚的文化边界**》(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1)。

战国时期思想上的繁荣为其后许多世纪的中国思想提供了基础。很好的概览性著作可见格拉汉的《**道的争论者：古代中国的哲学论争**》(La Salle, IL, Open Court, 1989)、本杰明·施瓦茨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更简明的著作可见牟复礼的《**中国的思想基础**》(New York, McGraw Hill, 1989)。理雅各的全译本《**中国经典**》5卷本(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0)完成于19世纪，较近的翻译包括劳的《**孔子：论语**》(Baltimore, Penguin, 1979)、《**道德经：中国经典**》(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2)、《**孟子**》(Baltimore, Penguin, 1970)，以及伯顿·华生的《**左传：中国最早的叙述史选编**》(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庄子全集**》(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墨子、荀子和韩非子的基本作品**》(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关于军事思想，见罗杰·T·阿麦斯翻译的《**孙子：战争艺术**》(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3)。

关于秦代的最好的研究著作还是德克·波德的《**中国的第一次统一：从李斯的生平看秦朝**》(Leiden, E.J.Brill, 1938)。关于汉朝的较好的研究包括余英时的《**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华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迈克尔·卢威的《**汉代的日常生活，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London, Carousel Books, 1973)、米歇尔·培拉佐利－瑟斯特文斯著、贾奈特·塞利格曼译《**汉王朝**》(New York, Skira/Rizzoli, 1982)，也见埃蒂安·巴拉兹著、莱特译《**中国的文明与官僚制度：对共同主题的不同看法**》(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中的文章。社会文化生活的其他方面可见瞿同祖的《**汉代社会结构**》(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2)、许倬云的《**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以及巫鸿的《**武梁祠：中国早期绘画艺术思想**》(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关于宗教，见迈克尔·卢威的《**中国人的生死观：汉代的信仰、神化和理性（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82)。

有几种传记为读者提供了关于汉代中国社会的个人看法，特别是伯顿·华生的《**司马迁：中国的大史学家**》(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南希·李·斯旺的《**班昭，一世纪中国一流的女学者：背景、祖先、生平**》和《**列女传**》(New York, Century, 1932)。罗纳德·苗向读者介绍了诗歌的世界，见其《**中世纪早期的中国诗歌：王粲（177-217）的生平与诗句**》(Wiesbaden, Steiner, 1982)。汉人对本朝历史的看法可见伯顿·华生的译著《**中国大史学家的记录**》两卷本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以及《**古代中国的朝臣与平民：〈汉书〉选**》(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关于汉朝灭亡后动荡的分裂时代，最新的学术研究可见阿尔伯特·迪恩编的《**中世纪早期中国的国家与社会**》(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也可推荐芮沃寿的文笔优美的《**隋朝**》(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78)。邓嗣禹翻译的《**颜氏家训**》(Leiden, E.J. Brill, 1968) 提供了一个对6世纪社会生活与文化价值观的看法，或如詹纳的《**洛阳的记忆 ：杨衒之与失落的都城（493-53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文学人物的传记为了解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视角，见约翰·弗洛斯汉姆的《**潺潺流水：中国诗人、康乐公谢灵运（385-433）的生平与作品**》(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 Press, 1967)；理查德·马特的《**诗人沈约（441-513）**》(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以及约翰·马尔尼的《**梁简文帝**》(Boston, Twayne Publishers, 1976)。

对中国佛教这个主题最好的简介依然是芮沃寿的简本《**中国历史上的佛教**》(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更全面的研究是埃里克·祖彻的令人入迷的高水平学术著作《**佛教征服中国 ：中世纪早期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与接纳**》(Leiden, E.J. Brill, 1959)，亦见之于肯尼思·陈的《**佛教的中国化**》(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艾德温·赖肖尔为了解唐代佛教社会文化的侧面提供了一个视点，见其翻译的《**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及其姊妹篇《**圆仁唐代中国游记**》(New York, Ronald Press, 1955)，亦见雅克·特耐特的《**中国社会中的佛教：5-10世纪的经济史**》(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两本论文集对唐代的不同侧面进行探讨，芮沃寿和崔瑞德编的《**唐史观**》(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约翰·库提斯·佩里和巴德威尔·史密斯编的《**唐代社会论文集：社会、政治与经济力量的互动**》(Leiden, E. J. Brill, 1976)。关于唐代的统治方式，见霍华德·维施乐的《**天子之镜：太宗朝的魏征**》(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关于公共财政与经济状况的历史，见崔瑞德的《**唐朝的财政管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R·W·L·归索分析了中国惟一的一位女皇的经历，见其《**武则天与唐代中国的合法化政治学**》(Bellingham, Washington, 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1978)。关于唐代的国家，亦可见艾德温·普莱布兰克的《**安禄山反叛的背景**》(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及大卫·麦克姆兰小心求证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对于唐诗的介绍，见斯蒂芬·欧文的《**中国诗歌的伟大时代：盛唐**》(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或唐代诗人的许多传记之一，如威廉·黄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阿瑟·瓦莱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772-846**》(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49) 或查尔

斯·哈特曼的《**韩愈与唐朝对统一的追求**》(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有关宋代最概括性的介绍大概是谢和耐著、莱特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1250–1276**》(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有关宋代著名人物的传记,见赫伯特·弗兰克编《**宋人传记**》(Wiesbaden, Franz Steiner Verlag, 1976)。关于宋代的经济繁荣,可见斯波义信著、伊懋可译的《**宋代中国的商业与社会**》(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970)。关于宋代的对外关系,可见莫里斯·罗萨比编的会议论文集《**处在竞争对手中的中国:中央王国及其邻居**》(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关于宋代政府的经典研究是爱德华·小克拉克的《**宋代中国的文官制度,960–1076**》(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968)。最近,约翰·霞飞精彩地分析了科举制的发展,见其《**宋代中国知识的荆棘之门:考试的社会史**》(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林语堂关于苏轼的文学传记《**风流才子:苏东坡的生平与时代**》(New York, John Day, 1947)仍然是有价值的,尽管作者在该书中对王安石有偏见。更公允的概括见詹姆斯·刘的《**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1021–1086)及其新政**》(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保罗·史密斯的《**天府征税:官僚企业与四川的茶马贸易, 1074–1224**》(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布里安·麦克奈特的《**宋代中国的法律与秩序**》(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详细描述了捉拿和惩罚罪犯过程中的警察制度和刑法体系。

与新儒学相关的自唐至宋的思想变化在彼得·鲍的《**这是我们的文化:唐宋中国的思想变迁**》(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中得到分析。关于宋代的思想史,也见格拉汉的《**两位中国哲学家:程明道和程伊川**》(London, Lund Humphries, 1958)、霍伊特·蒂尔曼的《**儒家话语与朱熹的支配地位**》(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关于新儒学文本的翻译,见陈荣捷译《**身边之事的反映:朱熹与吕祖谦的新儒学文选**》(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丹尼尔·加德纳译的《**学习做圣人:典型安排的朱熹对话录选**》(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关于宋诗,见乔纳森·沙夫的《**梅尧臣及宋初诗歌的发展**》(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关于宋代士绅精英的出现,见罗伯特·海姆斯的《**政治家与绅士:两宋时期江西抚州的精英**》(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关于宋代社会史的其它问题,见瓦拉里·韩森对大众宗教的研究《**变迁之神, 1127–1276**》(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理查德·范·格兰更为前沿的研究《**溪洞之乡:宋代川边的扩展、拓居和开化**》(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伊佩霞对家庭和婚姻的研究《**屋里人:中国宋代妇女的婚姻与生活**》(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和《**宋代中国的家庭与财产:袁采的社会生活观**》(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有关征服王朝的书与有关宋的书一样多。契丹建立的辽是魏特夫和冯家升的引用丰富文献所著巨作的主题,即《**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美国哲学学会会刊第36号)。关于金史的最具权威的是陶静深(音译),见其《**12世纪中国的女真:汉化的研究**》(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6)。莫里斯·罗萨比对最重要的元朝统治者之一的生平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说明,见其《**忽必烈汗:生平与时代**》(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在《**一个炼金术士的游记**》(London, Poutledge and Keegan Paul, 1931)中,读者可以得到更具私人化的观感,此即阿瑟·瓦莱翻译的曾到过成吉思汗营帐的旅行者的日记。《**马可·波罗游记**》的权威翻译是莫尔和佩罗特的《**马可·波罗:对世界的描述**》(London, G·Routledge and Sons Ltd, 1938)。关于元朝的社会、文化、政治方面的进一步资料,可见约翰·小朗格伊斯编的《**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关于元代的中国文化,见陈学霖与狄百瑞合编的《**元代思想:蒙古人统治下的中国思想与宗教**》(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克鲁普的《**忽必烈时期的中国剧场**》(Tucs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0)。有两部重要著作涉及这一时期的艺术,即谢尔曼·李和何外堪(音译)的《**蒙古人统治时期的中国艺术:元朝(1279–1368)**》(Cleveland, The Cleveland Museum of Art, 1968)及詹姆斯·卡西尔的《**江外远山:元代的中国画, 1279–1368**》(New York, Weatherhill, 1976)。

从元到明的变化,可以从一个士人的生平中得到说明,见牟复礼的《**诗人高启, 1336–1374**》(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这种变化也可以通过那些接近皇帝的人的生平得到说明,见约翰·达代斯的《**儒家与专制:**

明朝建立过程中的职业精英》(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对于明代中国社会和政府的通俗易懂的介绍,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明代政治的其它有价值的研究包括贺凯的《**明代中国的监察制度**》(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阿瑟·瓦尔德伦的《**中国长城:从历史到神话**》(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从明代到清末的士绅流动性的两项重要研究是何炳棣的《**中华帝国的晋身阶梯**》(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和希拉里·贝蒂的《**中国的土地与宗族:明清安徽桐城研究**》(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对这一时期农业经济的分析,见伊芙琳·罗斯基的《**华南的农业变化与农民经济**》(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关于明代文化,最新最重要的研究包括包筠雅的《**功过格: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变化与道德秩序**》(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克莱格·克鲁纳斯的《**多余之事:中国近代早期的物质文化与社会地位**》(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2)。另外戴维·约翰逊、黎安友、伊芙琳·罗斯基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大众文化**》(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也收入了有关明清文化的论文。明代思想生活的多样性,在狄百瑞主编的《**明代思想中的自我与社会**》(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中得到详细说明。杜维明考察了明代一位最有影响的思想家的早期生活,见其《**实践中的新儒学思想:王阳明的青年时代(1472-150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有关王阳明的著述,也见陈荣捷所译《**〈传习录〉及其它新儒学作品**》(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

对明代小说发展进行了精彩分析的是安德鲁·普拉克斯的《**明代四大奇书**》(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莫斯·罗勃茨翻译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西德尼·夏皮罗翻译的是《**水浒传**》(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1)。晚明文化人物的传记包括张孙康仪(音译)的《**晚明诗人陈子龙**》(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维拉尔德·伯恩哈特的《**苦葫芦:方以智与思想变革的动力**》(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王方宇(音译)、理查德·伯恩哈特、朱迪思·史密斯主编的《**园主:八大山人的生活与艺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明代其他重要人物的传记,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见卡林顿·古德里奇和房兆楹主编《**明人传记词典,1368-1644**》(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明代绘画史见詹姆斯·卡西尔的两部著作,《**岸边画作:明初与明中叶的中国画,1368-1580**》(New York, Weatherhill, 1978)和《**远山:晚明的中国画,1570-1644**》(New York, Weatherhill, 1982)。

在史景迁和卫思韩编的《**从明朝到清朝:17世纪中国的征服、区域与连续性**》(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一书中,明朝的灭亡是其中心议题,而南明政权力图复明的努力,被司徒琳在其《**南明史,1644-1662**》(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中进行了更详细的叙述。在张春树(音译)和张雪伦(音译)的《**17世纪中国的危机与变迁:李渔世界的社会、文化和现代性**》(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1)中,可以从一个迷人的文人的视角来看待纷扰的17世纪,帕特里克·哈南的《**李渔的创作**》(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也是如此。

介绍清朝历史最好的也许是魏斐德的《**中华帝国的崩溃**》(New York, Free Press, 1975)和韩书瑞、伊芙琳·罗斯基的《**18世纪的中国社会**》(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史景迁在《**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New York, Knopf, 1974)中,用他自己的眼光审视了康熙。孔飞力在《**盗魂者:1768年中国的妖术恐慌**》(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中,则考察了乾隆时期大众文化与官僚体制的关系。卡林顿·古德里奇研究了18世纪销毁反满作品的运动,见其《**乾隆文字狱**》(Baltimore, Waverly Press, 1935)。哈罗德·卡恩在《**皇帝眼中的君主:乾隆朝的想象与现实**》(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中,对乾隆皇帝个人的自我想象进行了敏锐的分析。恒慕义的两卷本《**清代名人传(1644-1912)**》(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3)包括了800个重要的汉人、满人和蒙古人的传记。

通过阅读下列著作可以了解清朝,如史景迁的《**王氏之死**》(New York, Viking, 1978)、阿瑟·瓦莱的传记《**18世纪中国诗人袁枚**》(New York, Crove Press, 1956)、伊芙琳·罗斯基的《**清代中国的教育与大众识字率**》(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8)、朱江翻译的黄六鸿《**福惠全书**》(Tusc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1984)。德克·波德与克拉伦斯·莫里斯通过翻译案例,揭示了许多中国社会的情况,见其《**中华帝国的法律:190件清朝案例**》(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关于清

代的城市，见施坚雅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以及罗威廉的两卷本《**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989)。

对清代思想文化史感兴趣的读者应该看看本杰明·艾尔曼的《**从哲学到文字学 ：中华帝国晚期变革的思想社会层面**》(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周凯文（音）的《**中华帝国晚期儒家仪式主义的兴起：伦理的、经典的和宗族的话语**》(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还有一本很好的传记是戴维·尼维森的《**章学诚（1738-1801）的生平与思想**》(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谢和耐对中国与欧洲思想和宗教的接触进行了深入分析，见其《**中国与基督教的影响：文化冲突**》(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分析绘画在盛清的位置见周如溪（音译）和克劳迪亚·布朗编的《**神来之笔：乾隆皇帝统治下的中国画，1735-1795**》(Phoenix, Phoenix Art Museum, 1985)。中国最伟大的小说被戴维·豪克斯和约翰·闵福德精彩地翻译出来，见其《**石头记**》(《**红楼梦**》)五卷本(Hardmonsworth, Penguin, 1973-1982)。另一部重要而有趣的小说《**儒林外史**》(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73)是杨宪益和戴乃迭翻译的。

叛乱与镇压是关于19世纪研究的一个中心，见韩书瑞的《**中国的千禧年叛乱：1813年的八卦教起义**》(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6)、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弗朗兹·米歇尔与张仲礼的《**太平天国起义**》三卷本(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6-1971）以及裴宜理的《**华北的反叛与革命，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裴氏在该书中强调了环境与反叛的关系。

对中西关系问题的研究至少在详细程度上是与研究反叛问题一样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较好的概览性著作有杰罗姆·陈的《**中国与西方：社会与文化，1815-1937**》(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9)、罗德斯·墨菲的《**外人**》(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7)。史景迁的《**为了改变中国：西方顾问在中国，1620-1960**》(Boston, Little, Brown, 1969）描述了某些最杰出的在华外国顾问的经历。关于那些出国的中国人，见欧达伟和利奥·李的《**无鬼之地**》(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关于通商口岸的开端，见彼得·菲·瓦兹的《**鸦片战争，1840-1842**》(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5)、阿瑟·瓦莱的《**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关于遭遇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影响，见侯启明（音译）的《**中国的外国投资与经济发展，1840-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该书的分析引起了争议，因为它主张外国贸易与投资对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至关重要，所以它们不应被视为帝国主义性质的。有两本书特别涉及了中国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即保罗·柯文的《**中国与基督教：基督教运动与中国排外情绪的增长，1860-187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简·亨特的《**文雅的福音：世纪之交在中国传教的美国妇女**》(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后者特别论述了传教对中国妇女发生影响的性质。

张灏（音译）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领先的知识分子领袖们关注的问题，见其《**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亦见对一些特定思想家的研究，如本杰明·施瓦茨的《**寻求财富与权利：严复与西方**》(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保罗·柯文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中国的改革**》(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萧公权的《**一个现代中国与一个新世界：改革家与空想家康有为，1858-1927**》(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5)，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的思想变迁，1890-190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关于义和团运动，见周锡瑞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义和团运动之后的10年以及君主制度的崩溃在芮玛丽的《**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1900-191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及周锡瑞的《**中国的改良与革命：1911年的两湖革命**》(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中得到探讨，亦见哈罗德·施夫林的《**孙逸仙：勉强的革命家**》(Boston, Little, Brown, 1980)。对19世纪末文化变化的不同看法，见丹·科恩编的《**来自中国人的文饰：19世纪末上海的版画**》(Hong Kong: Research Center for Translation,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7)，该书考察了报纸的插图；柯林·迈克拉斯的《**近代中国剧场：自1840年至今**》(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5)。伊达·普鲁伊特的《**汉人的女儿：一个中国劳动妇女的自传**》(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向读者提供了在其它书中难得描绘的中国社会的侧面。

对民国历史的探讨见詹姆斯·谢里登的《**分裂的中国：中国史上的民国时代,1912–1949**》(New York, Free Press, 1975)。黎安友分析了民国初年扭曲的政治，见其《**北京政治,1918–1923：宗派与宪政的失败**》(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关于军阀时代政治形势的分析见齐锡生（音译）的《**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易劳逸批评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见其有影响的著作《**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Cambridg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及其《**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有两本书讨论了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第一次联合战线(1922–1927)，分别是哈罗德·以萨克的《**中国革命的悲剧**》(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及丹·雅各布斯的关于孙中山高级苏联顾问的传记《**鲍罗廷：斯大林的人在中国**》(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关于国民党控制上海的努力，见魏斐德的《**管辖上海,1927–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关于蒋介石的生平，见布里安·克罗吉尔的可读性很强的传记《**失去中国的人：蒋介石全传**》(New York, Schribners, 1976)。

对五四时期知识界主要变化的讨论见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利奥·李《**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林毓生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的激进与反传统**》(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0)，以及薇拉·施瓦茨的《**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与1919年五四运动的遗产**》(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周民智（音译）论述了当时的一位最有名的知识分子，见其《**胡适与现代中国的思想选择**》(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4)。史景迁的《**天安门：中国人及其革命,1895–1980**》(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81)记述了20世纪许多重要知识分子的生活经历，包括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代人。并非所有知识分子当时都欢迎新潮，关于保守派的研究见夏洛特·弗思编的《**变革的局限：民国时期保守派论文选**》(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居伊·阿利托的《**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性的两难困境**》(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作为一个概览，C. T. 夏的《**现代中国小说史**》(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1) 还没有被其它研究所超过。关于此时期的作家，见李欧梵编的《**鲁迅及其遗产**》(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及奥尔加·朗的《**巴金及其作品：两次革命间的中国年轻人**》(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有关作品的翻译，见《**鲁迅作品选**》(或其它一些小说选)、西德尼·夏皮罗翻译的巴金的《**家**》(New York, Anchor Books, 1972)、简·詹姆斯翻译的老舍的《**骆驼祥子**》(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79)，以及塔尼·巴洛与加里·比约吉编的《**我是个女人：丁玲作品选**》(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关于一个最受欢迎的京剧明星的有趣传记，是斯科特的《**梅兰芳：梨园魁首**》(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59)。同一时期的对上等阶级生活的论述见伊达·普鲁伊特《**殷老夫人：北京生活回忆录，1926–193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霍华德·布尔曼与理查德·霍华德的《**中华民国传记辞典**》四卷本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1977)，提供了1912–1949年间的600个重要人物的小传。此外，唐纳德·克雷恩和安妮·克拉克的《**中国共产党传记辞典,1921–1965**》两卷本(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收录了自中国共产党创立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名人。

拉曼·迈耶斯分析了农业经济的变迁，见其《**中国的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的农业发展,1890–1949**》(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以及黄宗智的两本书《**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与农业发展,1350–1988**》(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990)，二者涵盖的时段都很长。丽莲·李分析了工业经济与商业经济，见其《**中国的丝绸贸易：现代世界的传统工业，1842–193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谢尔曼·柯其兰的《**中国的大生意：香烟生意中的中外竞争，1890–1930**》(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以及帕克斯·柯布尔的《**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7**》第2版(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关于城市产业工人的生活，见盖尔·赫沙特尔的《**天津工人,1900–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986)，及埃米丽·汉尼格的《**姐妹们与陌生人：上海棉纱厂中的妇女，1919–1949**》(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经济学家对近代中国经济所做的更综合的分析，见托马斯·罗斯基的**《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阿里夫·德里克考察了共产党力量的兴起，见其**《中国共产党的兴起》**(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及马克·塞尔丹的**《中国革命的延安道路》**(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和苏珊娜·佩珀尔的**《中国的内战：政治斗争，1945—1949》**(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有两部第一手的记述提供了对那个时期独到而令人兴奋的观察，埃德加·斯诺在其**《红星照耀着中国》**(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 Reprint,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8)中包括了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经历，而杰克·贝尔登则在**《中国震撼世界》**(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0)一书中报道了内战的情况。威廉·欣顿罗列了数不清的政治运动对一个农民村庄的影响，见其**《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6)。

关于1949年以后的历史，较好的书有莫里斯·梅斯纳尔的**《毛泽东时代及其以后的中国：人民共和国史》**(修订版)(New York, Free Press, 1986)。关于毛泽东的生平，见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New York, Harper & Row, 1980)。埃兹拉·福格尔考察了地方上的共产党政策，见其**《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州：省会中的计划与政治，1949—1968》**(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维维安妮·舒考察了中国农业政策，见其**《变迁中的农民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1949—1956》**(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国家组织，见哈里·哈定的**《把中国组织起来：官僚制度的问题，1949—1976》**(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维克托·李的**《没有律师的法律》**(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对经济发展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把卡尔·里斯金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学：1949年以来的寻求发展》**(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作为很好的出发点；亦见多萝西·索林格尔的**《社会主义下的中国商业：国内商业的政治学，1949—1980》**(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对毛泽东式制度的最彻底的批评之一是爱德华·弗里德曼、保罗·皮克威兹、马克·塞尔丹和凯·安·约翰逊的**《中国村庄：社会主义国家》**(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该书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初，追踪研究了华北一个村落的变迁。

关于当代中国生活的第一手说明和口述史大量存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变化可以从地方领导地位的角度加以考察，见黄树民（音译）的**《盘山路：共产党领导人眼中的中国农村变化》**(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关于中国人生活的其它个人的看法可见迈克尔·弗罗里克的**《毛泽东的人民：中国革命时代的16幅生活肖像》**(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张容(音译)的**《野天鹅：中国的三个女儿》**(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以及张辛欣和桑晔的**《中国人的生活：当代中国的口述史》**(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7)。对社会变化更具分析性的处理，见威廉·帕里什和马丁·维特的**《当代中国的村落与家庭》**(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和**《当代中国的城市生活》**(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亦见安妮塔·陈、理查德·麦迪逊、乔纳森·安格尔的**《陈村：毛泽东时代农民社区的当代史》**第2版(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关于文化大革命较好的第一手说明，包括高元（音译）的**《生在红旗下：文革编年史》**(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乐黛云和凯罗琳·威克曼的**《风乍起：一个革命的中国妇女的奥德赛》**(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梁恒（音译）和朱迪思·夏皮罗的**《革命之子》**(New York, Vintage Press, 1983)、程年（音译）的**《上海生死》**(New York, Grove Press, 1986)。安妮·瑟斯顿考察了此运动的消极面，见其**《人民的敌人：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的遭遇》**(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及其与政治之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见爱伦·梁的**《睁一只眼的猫头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艺术》**(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茉莉·古德曼的**《共产党中国的文学异端》**(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后者主要研究了40和50年代的作家。波尼·麦克道格尔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流行文学和表演艺术》**(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保罗·克拉克的**《中国电影：1949年以来的文化和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以及理查德·克劳斯的两本书**《中国的钢琴与政治：中产阶级的野心和对西方音乐的斗争》**(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和**《权力之笔：现代政治与中国书法艺术》**(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等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时代以后的变化见埃兹拉·福格尔的《**中国的超前一步：改革的广东**》(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沃威尔·舍尔的《**迪斯科与民主：改革阵痛中的中国**》(New York, Archor Books, 1989),及詹姆斯·鲁尔的《**中国开放了：电视、改革与抵抗**》(London, Routledge, 199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妇女的命运，见玛格里·沃尔夫的《**推迟的革命：当代中国妇女**》(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盖尔·赫沙特尔与爱米丽·洪的《**个性的声音：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妇女**》(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关于1989到1993年的中国，有两部记者写的很好的作品，它们是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和谢里尔·武顿的《**中国醒了：为提高权利意识而斗争**》(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以及沃威尔·舍尔的《**天命**》(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4)。

索 引

D

E

F

J

K

L

M

N

O

P

S

T

W

X

Y

Z

译者后记

正如本书作者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教授在中译本序言中所讲，本书是为英语世界的普通读者写的，因此它并不是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历史学著作，但是它却是在大量学术著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概括而成的，因此明眼人可以从书中发现，它的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读完本书后的感受是：它与我们从小就熟读的历史教科书有许多不同，与我们今天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上讲的东西也有许多不同。正因为有这些不同，我们才会开卷有益——我是指，对于我们的专业历史学工作者，也会有所启发。

但它毕竟是普及性的读物，对外国读者如此，对中国读者也是如此：文字凝练，叙述概括，图文并茂，更重要的是，它不大像我们以往的历史书那样，即使是普及性读本，也是社会发展史或政治史的。图书没有鲜活丰富的内容，也就没有了普通大众对它的亲近感。这本书是我们身边生活的源头，是身边发生的一切的过去和现在。我相信，任何一个希望了解本国历史的普通读者，包括青少年朋友，都会喜爱这本书。我也希望，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也能写出这样雅俗共赏的作品来。

附带说，书后的一些附录也相当有用，说明作者并没有忘记那些有进一步求知欲的读者。特别是那些书目，几乎是近年来欧美学者在特定领域中的权威著作。如果我们的出版社有心选择一些海外中国历史研究的作品进行翻译介绍的话，这就是一份很好的、可供选择的书单。

最后需要向读者道歉的是，由于本书是一本普及性的读物，因此原书在征引中国历史文献——尽管不很多——的时候，没有提供任何出处，中国的人名、地名等也没有学术专著通常提供的中英文对照。所以对史料和人名、地名的还原，我们虽力所能及地去做了，但还是有几处未能查出，只好按意直译。译文中若有不当之处以及其它翻译上的问题，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赵世瑜谨识

2000年8月6日